

黃克武 著

顧孟餘的清高



中國近代史的
另一種不可能

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

open access

本書電子版為開放取用圖書，在遵守相關授權條款的前提下，公眾可以免費閱覽、下載和傳播。開放取用電子書的出版獲得香港中文大學圖書館的資助，特此致謝。

建議引用格式：黃克武著：《顧孟餘的清高：中國近代史的另一種可能》，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20。DOI: <https://doi.org/10.978.988237/1330>

This book is freely available in an open access edition thanks to funding from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Library. It may be read online, downloaded, and shared under the terms of a Creative Commons (CC-BY-NC-ND 4.0) license.

Suggested citation: Max Ko-wu Huang, *Gu Mengyu de qinggao: Zhongguo jindaishi de lingyizhong keneng* (Above and Apart: Gu Mengyu and His Search for an Alternative Path in Modern Chinese History). Hong Kong: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Press, 2020. DOI: <https://doi.org/10.978.988237/1330>

顧孟餘的清高

在國民黨的黨國歷史中，孫中山、蔣介石是主流，在黨內與之對抗者為非主流，非主流者每以民主、自由自我標榜，「改組派」是明顯的例子；而「改組派」的重鎮顧孟餘，更是明顯的例子。本書在這方面有深入而有系統的探討。

——張玉法（中央研究院院士）

顧孟餘可歸類為汪精衛嫡系的國民黨左派領導人。二十世紀前半，在國共兩黨之間還存在著各式各樣政治勢力與思想的對立。其中如國民黨左派，就扮演著對中央集權化——蔣介石的國民黨、中國共產黨——最有力的批判勢力。……本書不僅回顧了顧孟餘（1889–1972）的一生，也廣泛蒐集了顧孟餘的相關史料，並參照中國近代史的最新視野，反映了中國近代史這40年來的研究取向。

——山田辰雄（慶應義塾大學名譽教授）

本書作者在思想史的基礎上，透過資料分析，呈現了顧孟餘的精彩一生。

——劉維開（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系教授）

作為北伐前後國民黨左派和1949年後「第三勢力」代表人物的顧孟餘，長期被國共正統歷史所遮蔽。本書首次為顧氏立傳，很好地再現了一位從政書生的政治理想與個性情懷。

——王奇生（北京大學歷史系教授）

顧孟餘的清高

中國近代史的另一種可能

黃克武 著



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

《顧孟餘的清高：中國近代史的另一種可能》

黃克武 著

© 香港中文大學 2020

本書版權為香港中文大學所有。除獲香港中文大學書面允許外，不得在任何地區，以任何方式，任何文字翻印、仿製或轉載本書文字或圖表。

國際統一書號 (ISBN) : 978-988-237-133-0 (精裝)
978-988-237-937-4 (電子書)

2020年第一版

2024年第二次印刷

出版：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
香港 新界 沙田 · 香港中文大學
傳真：+852 2603 7355
電郵：cup@cuhk.edu.hk
網址：cup.cuhk.edu.hk

*Above and Apart: Gu Mengyu and His Search for an
Alternative Path in Modern Chinese History* (in Chinese)

By Max Ko-wu Huang

©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2020

All Rights Reserved.

ISBN: 978-988-237-133-0 (hardcover)
978-988-237-937-4 (ebook)

First edition 2020

Second printing 2024

Published by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Press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Sha Tin, N.T., Hong Kong
Fax: +852 2603 7355
Email: cup@cuhk.edu.hk
Website: cup.cuhk.edu.hk

Printed in Hong Kong



本書電子版採用創用CC授權條款 CC-BY-NC-ND 4.0，提供免費閱覽和下載，
具體使用條款請參見：<https://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nc-nd/4.0/>

The digital edition of this book may be downloaded and shared under the terms of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NonCommercial-NoDerivatives 4.0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BY-NC-ND 4.0).
For information about this license, see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nc-nd/4.0/>.

DOI: <https://doi.org/10.978.988237/1330>

目次

山田辰雄序	xi
自序	xiii
第一章 導論	1
第一節 追尋一個忽隱忽現的身影	
第二節 主義時代的來臨	
第三節 汪蔣在政壇的崛起	
第四節 「聯俄容共」與1920年代國民黨內派別的形成	
第二章 早年生涯(1889–1924)	31
第一節 早年經歷	
第二節 任教北大	
第三節 參與校務：五次出任教務長	
第四節 「坐而言」還是「起而行」：胡、顧分道揚鑣	
第三章 左黨要人(1924–1931)	69
第一節 書生從政：加入國民黨	
第二節 從廣州到武漢	
第三節 武漢分共：從左派思想家到「反革命分子」	
第四節 改組派與擴大會議	

第四章 汪蔣合作(1931–1938)	135
第一節 汪蔣合作與汪氏組閣	
第二節 出任鐵道部長	
第三節 從鐵道部長到交通部長：顧孟餘與汪蔣之分合	
第四節 和戰爭議與汪之出走	
第五章 豔電之後(1938–1949)	183
第一節 晴天霹靂：豔電後重慶汪派分子的困境	
第二節 蔣對顧的籠絡	
第三節 從中研院院長風波到出任中央大學校長	
第四節 淡出政壇	
第六章 第三勢力(1949–1952)	229
第一節 第三勢力的起源	
第二節 張顧集團的形成	
第三節 台灣對第三勢力的拉攏與打擊	
第七章 步入尾聲(1952–1972)	271
第一節 第三勢力在日本的文化冷戰	
第二節 低調度日：從美國到台灣	
第八章 結論：從挺汪、擁蔣到支持第三勢力	301
附錄：顧孟餘著作分類目錄	319
參考書目	329
圖片出處	355
索引	359



擔任北京大學經濟系主任時之顧孟餘

來源：北京大學經濟學院編，「北大教務長兼經濟學系主任顧孟餘先生」，《北京大學經濟學院(系)百年圖史》(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2)，頁16。



擔任鐵道部長時期的顧孟餘

來源：〈鐵道部部長、部長顧孟餘(照片)〉，《鐵展畫刊》，
第1期(北平，1934年5月)，頁2。



顧孟餘及周德偉(左)

來源：周德偉，《落筆驚風雨：我的一生與國民黨的點滴》
(台北：遠流出版社，2011)，書中插頁，無頁碼。



顧孟餘題字三幅

來源：「任重致遠」，《交通雜誌》，第1卷第6-7期（1933年），頁1；「作育恢弘」，《中法國立工學院院刊》，第1期（1934年），無頁碼；「鐵道年鑑」，鐵道部鐵道年鑑編纂委員會編，《鐵道年鑑》（上海：鐵道部鐵道年鑑編纂委員會，1933），封面。

山田辰雄序

黃克武先生是台灣著名的中國近代思想史研究者，他早年從研究梁啟超、嚴復等人思想著手，爾後再逐步拓展研究領域。而以顧孟餘為研究主旨的本書，可謂是他累積近年研究成果之大成。本人從1970年代開始研究國民黨左派，研究主題與對象皆與孫文思想息息相關，特別聚焦於1920年代的國民黨左派與改組派。相較於既有的研究，本書不僅回顧了顧孟餘(1889–1972)的一生，也廣泛蒐集了顧孟餘的相關史料，並參照中國近代史的最新視野，反映了中國近代史這40年來的研究取向。

顧孟餘可歸類為汪精衛嫡系的國民黨左派領導人，這亦是黃克武先生擬將他置於二十世紀中國政治脈絡中解讀的緣由。二十世紀前半，中國革命以蔣介石的國民黨和毛澤東的中國共產黨對立為主軸，但事實上在國共兩黨之間，還存在著各式各樣政治勢力與思想的對立。其中如國民黨左派，就是扮演著對中央集權化——蔣介石的國民黨和中國共產黨——最有力的批判勢力。

顧孟餘在第一次國共合作時期與汪精衛並肩合作，到了1920年代後半期，更以國民黨改組派自居，充分展現他鮮明的反蔣、反共立場。黃克武先生特將雙方的爭議，彙整為黨的階級基礎問題、階級鬥爭問題、《太原約法》中的中央與地方關係、黨內與黨外民主主義等四個關鍵性議題，並逐一解析。不過當抗日戰爭爆發後，顧孟餘因反對汪精衛的

和平運動，而於1938年與汪精衛分道揚鑣，轉而投入抗日陣營。1949年以後的顧孟餘，與蔣介石的國民黨和中國共產黨都保持距離，嘗試整合第三勢力，但終以失敗收場。黃克武先生對顧孟餘在抗日戰爭爆發後的動向、思想，都有非常細緻的敘述與分析，這是本書的特色之一。本書另一值得特書之處，在具體呈現蔣介石與汪、顧之間政治對立面的同時，亦不忘彰顯雙方陣營在國民黨的黨組織改造、紀律強化、反帝國主義、反馬克思主義、民生主義、文化經濟建設等方面的共通點，十足反映了作者對中國近代史的獨到見解。

顧孟餘不僅是一位政治家，也是一位讀書人。誠如黃克武先生所指陳，在捭闔縱橫、紛擾不斷的中國近代史中，顧孟餘仍一本初衷地追求「自由民主理念」。所以本書試圖將顧孟餘的自由、民主理念，與他的政治活動、政治主張環環相扣，並利用有限史料，成功地勾勒出顧孟餘的人格特色與生活處境，特別是將深受西方文化薰陶的顧孟餘，個性深沉多慮且性情淡薄；身體虛弱，但家庭幸福美滿；堅守「三民主義」信仰等等的生活面向，與他的政治生涯相互交錯與串聯，讓這本傳記有異常豐富的內涵。

慶應義塾大學名譽教授

山田辰雄

自序

顧孟餘(兆熊，1889–1972)的名字對今日大多數讀者來說可能都十分陌生，少有人知道他的生平事蹟，然而在二十世紀中國歷史上，他在學術界、政治界曾是一位叱咤風雲的人物。他早年赴德國留學，專攻政治經濟學。返國後，在蔡元培的邀請下他到北京大學教書，擔任過德文系與經濟系的教授兼系主任，又多次出任教務長，與蔣夢麟、胡適等人齊名，和李大釗也是好朋友。在任職北大之時他對政治即很感興趣，有經世濟民的志向，曾多次組織、領導群眾運動，並在報刊上撰文介紹馬克思思想、肯定五四北京學生運動之歷史意義。1924年春天他加入國民黨，開始步入從政之途，參與北方國民黨的組織工作。1926年中國國民黨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中被選為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歷任黨政要職。他進入政壇之始，即受到汪兆銘的賞識與重用，而與陳公博並稱汪之「左膀右臂」。此後他參與聯俄容共、武漢分共、中國國民黨改組同志會(改組派)與擴大會議等，也在汪兆銘任行政院長時主導黨政改革，並擔任鐵道部長。英國大使卡爾(Clark Kerr)於1938–1939年有關中國政治領導人物的報告中說他「仍與汪精衛有親密的關係而知名」(“Reputed to be still a close associate of Wang Ching-wei,” FO 371-24699-59)。1938年底汪自重慶出走、與日和談之後，他極力反對、勸阻不成，與汪分道揚鑣，後赴重慶加入蔣中正的抗戰陣營。抗戰時他曾擔任過中央大學校長。抗戰勝利之後，他曾被任命為行政院副院長、考試院

長(均未就)，李宗仁代總統時曾力邀他組閣，亦為他所婉拒。1949年之後，他在香港和日本與張發奎、張君勱、張國燾等人領導第三勢力運動。余英時在他的回憶錄中提到，中國第三勢力「企圖在國民黨和共產黨兩個『專政』的政權外，建立起一個以民主、自由、人權等普世價值為終極價值的精神力量」。1949年底「國民黨中的自由主義者當時奉顧孟餘為精神領袖……顧氏的影響力很快便擴張到黨外，成為整個『第三勢力』的領袖之一」，很可惜第三勢力「不能做什麼事，也不能影響政策」。¹1972年顧氏以84歲高齡病死於台灣。他的朋友陳克文說：在國民黨六位左派領袖之中，廖仲愷、鄧演達、陳公博死於非命，汪兆銘、甘乃光則客死他鄉，唯一在國土之內壽終正寢、得到善終的人只有顧孟餘。我們姑且不論他在政治上之浮沉顯隱、成敗功過，以人格操守來說，他畢生堅持自由民主理念，不忘情於中國苦難的人民，一生有為有守、能仕能隱，確有值得吾人讚賞之處。

本書研究顧孟餘的一生與二十世紀中國的歷史。筆者以前對顧孟餘之生平的瞭解也很少。2008年我參加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黃自進教授主持的「蔣介石研究群」以及呂芳上教授主持的「《蔣中正總統檔案：事略稿本》讀書會」（2007–2017，我於2008年開始參加），逐冊閱讀、討論《事略稿本》後，開始對民國政治史有一些認識。2011年在接觸到周德偉的回憶錄《落筆驚風雨：我的一生與國民黨的點滴》，我才注意到顧孟餘的重要性。筆者要特別感謝周德偉的哲嗣周渝先生邀請我參加2011年5月22日在台北紫藤廬所舉辦的新書座談會，會前他將書稿的排印本寄給我，捧讀之下彷彿為我打開了一扇歷史之窗，讓我對於汪派（以及國民黨左派）視角下的民國史、國民黨史開始產生了濃厚的興趣，也感受到在黨派、國族意識之下，歷史書寫要達到中立、客觀難度很大。後來，因緣際會因為汪榮祖教授的介紹，去拜訪李敖先生，其間提及周德偉，李敖大師慷慨地將他收藏的此書手稿影印本送給我。從周德偉先生秉筆直書、一氣呵成的字跡中我更能體會他的心境。冥冥之中似乎有一條線透過周德偉的回憶錄的引介，引誘我去探討顧孟餘的一生。

1 余英時，《余英時回憶錄》（台北：允晨文化，2018），頁125、128。

周德偉是顧孟餘在北大時的學生，曾因顧的影響而加入國民黨，在顧孟餘任鐵道部長時擔任秘書工作，參與機要事務，也屬汪派人物。他在近代中國以師事、譯介海耶克(Friedrich August von Hayek, 1899–1992)的自由思想而有名於世，倡導儒家與自由、憲政的結合。這本回憶錄不但讓我瞭解湖南地區辛亥革命前後的複雜過程，也對周德偉年輕時激賞嚴復著作(尤其是《原富》、《群學肄言》等譯作)，而批評《新青年》、不喜歡胡適的思想傾向，留下深刻的印象。他所撰寫的對聯「豈有文章覺天下，忍將功業苦蒼生」，是周氏一生對學術工作與政治事功的深刻感受。書中縱論近代中國的人物與史事，而其中最為突出的一位人物無疑地是他的老師顧孟餘。我也逐漸領悟到為何在台灣我所接觸到的中國近代教科書中沒有這一位歷史人物。這主要因為他曾是汪兆銘身邊的要人，多次「擁汪反蔣」，1949年後又參與第三勢力，在美國與李宗仁等方面的支持下反共、批蔣。這樣的一位人物在國共兩黨正統歷史論述之中注定要被「銷聲匿跡」。

然而在周德偉的筆下，從1925年孫中山過世至1938年底汪發表「豔電」之間，顧孟餘被描寫為汪兆銘的「頭號軍師」、「台柱」、「汪之靈魂」，汪對顧之謀略幾乎可以說是「言聽計從」。的確，汪派的理論大師有二，一為陳公博、一為顧孟餘，汪對這兩個人十分倚重，而各有取捨。陳公博因為一路挺汪、至死不渝，又寫了《苦笑錄》而為大家所熟知。顧的名氣似乎不如陳，然而事實上汪的重要思想與決策，包括他革命理論之演變(如從肯定馬克思主義到否定「階級」觀念、否定「三大政策」等)，1927年武漢和平分共、1930年「太原約法」、1931年底汪蔣復合、1932年後汪任行政院長的政策與人事布局等，都深受顧的影響。周德偉指出「蔣氏知道顧孟餘能包辦汪精衛之事」。周也說顧孟餘在汪的身邊也精心維繫自己的軍師地位，「余察顧雖為汪之台柱，然自十三年識汪後，非奉汪之邀不入汪邸，或由汪親自訪顧，或用電話聯繫；凡汪召開大宴會，顧每先到後退，不欲與人多言，藉保其軍師地位之尊嚴。顧揣知汪之不能容納其意見者即不發言，汪本身亦有多方關係，言論龐雜，多言無益，或反遭多方之疑忌」。這些描述都點出顧在汪身邊的關鍵地位。周德偉的回憶錄中無疑地也有一些個人的偏見、記憶的錯誤等

嚴重缺失，也在某些地方誇大了顧的重要性，然而我覺得如果中國近代史中（尤其是國民黨史、汪兆銘研究、第三勢力的發展等）缺少了他所描述的這一塊「被遮蔽的歷史」，我們所理解的過去必然是不完整的。

在國共正統的歷史論述之中，改組派、汪派分子乃至「第三勢力」的歷史與人物一直不那麼受到重視，對其所做的評估也是非常負面的。簡單地說，他們成為隱藏在歷史角落的「失敗者」。然而如果不從「成王敗寇」的角度來做論斷，這些邊緣的聲音在與主旋律互動的過程之中，或許也能夠映現出歷史中鮮為人知的複雜面貌。這樣來看「失敗者」的故事或許不是毫無意義的，可以幫助我們省視成功的代價與成功者背後的陰影。

出於對顧孟餘一生經歷的好奇心，我開始搜索這一位在中國近代史上「或隱或現」的歷史人物。我發現他本身留下來的材料不多，沒有出版過著作集、回憶錄，沒有口述訪問錄，更沒有任何一本有關他的專書。其他汪派的要角，如陳公博、高宗武等留下回憶錄；陶希聖、周佛海、陳克文則留有日記。顧和他們截然不同。經過好幾年的摸索、沉浸、耙梳，一點一滴地蒐集材料、整理排比，我終於完成這一本三十多萬字的書稿，希望能把顧孟餘帶回我們的歷史視野，補足被國共正統歷史論述所抹去的一面。在探討了顧的一生之後，我覺得他針對二十世紀中國的核心問題所提出的許多想法並未過時。他在早期從政之時是汪身邊的「諸葛亮」，為汪出謀獻策，是瞭解汪思想變遷的一位關鍵人物，奠定了改組派的经营理念；在汪發表豔電、建立附日政權之後，顧極力反對，顯示汪派之中亦有主戰的觀點，此後顧與汪分道揚鑣。雖然如此，顧在1940年代之後所從事種種的努力與汪派的政治理想仍有很深的關連，唯一的差別大概是他沒有走上所謂「附逆」或「漢奸」之路。1949年之後他與張發奎、張君勱等推動「第三勢力」、批判蔣氏父子威權統治與中共極權政治，支持台灣的民主化，也是順著早期肯定自由民主的思路而產生的。

周德偉將顧孟餘描寫為「汪之靈魂」，此一論斷可能會引起爭議。顧汪在反清革命時雖均為同盟會成員，然兩人並無聯繫（顧在入黨前與蔡元培關係較深）；1938年底汪出走河內、與日和談，顧則支持抗戰，

兩人亦分道揚鑣。汪顧的密切交往主要是從武漢國民政府時期至他出任鐵道部長的階段(約1926–1938)，此時他與陳公博無疑地是汪的「頭號軍師」、「左膀右臂」。然而如果我們將「汪」解釋為「汪派」而不只是汪一個人，而是在汪身邊的一群人，其政治立場與利害關係大致相同，不過也有許多內在分歧的複雜結合，那麼顧的一生及其理念或許可以反映汪派分子在一般人所認定的「主和」、「漢奸」等標籤之外的其他面向。

筆者之淺見是：顧的思想歷程可以幫助我們認識汪兆銘個人與汪派思想的變遷，乃至於汪過世之後汪派分子的處境與作為等議題。長期研究民國史的山田辰雄教授在他的《中國國民黨左派之研究》(中国国民党左派の研究)一書中指出：作為國共之間反共、反蔣的「中間派的改組派」，其政治理論與改革方案具有一定的現代意義。改組派批判蔣中正的集權獨裁，主張強化黨的領導權、黨內民主，實施「民主集權制」，同時認為需喚起民眾普遍參與，實現國家的民主化，他們也反對帝國主義的侵略，要聯合一切被壓迫的民眾，實現共同的利益。另一方面他們則質疑中共的階級革命，與中共領導下日益激進的工農運動。在反共、批蔣的鬥爭之中，改組派對近代中國追求民族獨立與社會變革的構思有其重要性。

顧孟餘的政治經歷和他思想主張一樣重要。讀者可以把他的的一生視為一個獨特的旅程，從他的眼中觀察二十世紀初年以來在內憂外患下，中國所經歷痛苦、動盪的轉型歷程，也可以具體地瞭解國民黨聯俄容共、蔣汪鬥爭、中日戰爭、國共內戰、美蘇冷戰等對顧孟餘一生的衝擊。我覺得他的一生經歷提供一個重要的個案，讓我們可以瞭解五四時期知識分子與政治權威、國共鬥爭、國民黨內部派系競合，以及國民黨由興盛而衰亡的過程。

顧一生命運與汪兆銘、蔣中正兩位政治領袖有密切的關係。對他來說「得君行道」、「以義相交」是書生從政時努力追求而難以實現的一個夢想。他與汪交情深厚。他看到汪的一生一方面受到不斷變遷的意識形態之影響(從左傾到反共)，另一方面則為複雜的政治環境所左右。在此過程之中，顧孟餘(與陳公博)對他的政治理論之建構與政治行為之抉擇扮演著關鍵性的角色。就個性而言，他認為汪有激情、有領袖魅力，

然而過於衝動，又太受陳璧君影響，在關鍵時刻不接受勸諫，終於走向一個悲劇的結局。他和蔣之間也是恩怨糾結。蔣在內心痛恨顧孟餘等汪派（改組派）分子，甚至比擬共產黨，多次背叛過他，至遷台之後仍耿耿於懷；然表面上仍尊稱顧為「孟餘同志」，並多方籠絡，共謀國事。從顧孟餘所觀察到的蔣中正，一方面是工於心計、勾心鬥角、心狠手辣與表裡不一的政客，另一方面則是豁然大度、有禮有節、高瞻遠矚，在危急關頭會對同志施以援手的黨國領袖。顧孟餘退出政壇後，流浪異鄉、生活貧困，夫婦兩人在美國與返台後的生活費主要依靠蔣所給的津貼。

我長期以來研究中國近代知識分子的歷史，探討知識分子與政治人物的互動等課題。如果借用北京大學歷史系歐陽哲生教授的區分方式，顧孟餘和朱家驊、羅家倫、王世杰等人類似，在近代中國屬於「參政型知識分子」，而與其他兩種類型，亦即「議政而不參政的知識分子」（如胡適、傅斯年）與不問政治而專注學術研究的「純學者型知識分子」（如陳寅恪、王國維）有所不同。對於顧孟餘的研究一方面延續了我對中國近代「讀書人」與「書生從政」的關懷，看到從傳統士人到新知識分子的轉變；另一方面也開拓了民國史、抗戰史、冷戰史等研究領域，而對二十世紀中國重大歷史事件有了新的認識。

如前所述，顧孟餘曾留學德國，1916年9月在蔡元培的邀約下進入北京大學，1924年加入國民黨，1925年3月因領導三一八事件被通緝而離職。此後他棄學從政，而歷任黨政要職。為了研究他的從政經歷，我接觸到以往較少接觸的各類檔案與報紙，也熟悉了國民政府、國民黨的組織與運作，以及黨內的派系鬥爭等。本書也大量地徵引近年來問世的各種日記，而能精確地掌握顧孟餘一生事蹟，與他人對顧孟餘的評估。顧孟餘參與聯俄容共，遊走於汪兆銘與蔣中正之間，國共鬥爭、汪蔣分合及其與粵系、桂系、閻錫山、馮玉祥等地方軍人之合縱連橫，都影響到顧氏的命運。1949年之後，顧孟餘在香港、日本從事第三勢力運動，則揭示了一個美蘇冷戰時期以汪派、桂系合作為中心所形成的東亞地區的人際關係與資訊網絡。他在1949年的抉擇與留在中國大陸後來「自覺主動相應」地接受思想改造的知識分子（如楊奎松在《忍不住的關懷：1949年前後的書生與政治》書中所分析的張東蓀、王芸生、潘光旦等

人)，以及赴台知識分子在蔣中正的威權統治下困居海島而受其箝制的窘境(如雷震、殷海光、傅正等人)均有所不同。顧、張等人在國共的夾縫之中，以獨特的方式維繫了自身的尊嚴。顧孟餘從改組派到第三勢力運動期間所努力追尋的超越國共、建設現代中國的政治理想，在海峽兩岸對峙、香港在一國兩制下摸索未來的今日，仍然值得吾人思索沉吟。

在讀者閱讀本書之前，我約略地介紹一下他的性格與人們對他的評價，或許可以幫助讀者走進他的世界。在我研究顧孟餘的過程之中，我發現他的性格十分獨特，和清末民初「轉型時期」之中許多具有矛盾、衝突、糾結、悔恨的人物(如蔣中正、汪兆銘等政治人物或嚴復、梁啟超、吳宓、胡適等學者)截然不同；顧的思想觀念與行事作風較為平穩。他一生雖經歷政治上的起起伏伏、或左或右，然在思想上、情感上長期保持一致性與穩定性，而看不到太多傳統與現代的糾結、理智與情感的衝突，以及公益與私利之矛盾。如果我們採用西方學者普魯塔克(Plutarchus)、尼采(Friedrich Wilhelm Nietzsche)、托馬斯·曼(Paul Thomas Mann)等常用的「酒神」與「太陽神」二元對立精神範式，酒神精神代表打破禁忌、放縱慾望，解除一切束縛，復歸自然，呈現出痛苦與狂喜交織的非理性狀態；太陽神則象徵理性清明、操控情欲，追求明晰區分及重視個體性的文化表現。顧孟餘無疑地屬於「太陽神」類型的人物。

這可能出於幾種原因。第一，顧自幼受到西化教育的影響。他自年輕時代即進入京師大學堂譯學館學習德文，17歲考取公費，赴德國留學，能操流利的德文、英文與法文，又懂得西方的科技與政治經濟理論。他在生活與思想上都深受德國文化的影響，喜吃西餐、著洋服、讀西書、愛簽名(少蓋章)。他一生在思想與行為上比較徹底的西化或許是使他避免了傳統與現代糾結的一個原因。第二，顧在個性上深沉多慮、性情淡薄，說話要言不煩，做事則有條不紊，絕不衝動。這也是蔡元培、李石曾希望他加入國民黨之後能輔佐汪兆銘的原因(或說是以太陽神的理性來調節酒神的衝動)。第三，顧身體多病，因而行事較為謹慎。他年輕時曾患有肺病，後雖痊癒身體卻頗為虛弱，尤其是工作繁忙而無法承擔時，他的身體常出現一些病徵(他自己所謂「體弱不勝繁

劇))。在他擔任改組派領袖時，陳公博說「孟餘先生身弱多病，談一個鐘頭的話就要睡一天的床」。他一生中曾擔任過最重要的兩個職務，國民政府鐵道部長、中央大學校長，任職期間都因為工作繁忙而多次就醫。1935年12月25日他寫信給行政院長蔣中正時即說自己「近者我公主持中樞，海內人心莫不振奮。孟餘猥以疏慵，辱蒙提攜，原應勉力追隨……乃以體弱多病，未能拜命」；中大校長任內他覺得自己有「神經衰弱」。身體多病對他的性格有一定的影響，使他行事較為謹慎。第四，他的婚姻幸福和諧，在情感上從一而終。他的妻子韋增瑛也是留德學生，對他不離不棄、照顧備至，然兩人沒有子嗣，而更增加了彼此相依為命的依賴感。

第五，在政治與經濟理念上，他信仰孫中山在《三民主義》中所構想的國家藍圖，曾與汪兆銘一樣支持孫所主張的聯俄容共，為「左派要人」，吳稚暉說他是「額角頭上不刻字的共產黨」，然而他在思想上從來不曾認同過馬克思主義。從1912年在《獨立週報》與1919年在《新青年》撰文、1929年主編的《前進》雜誌，到1950年代在《大道》、《中國之聲》上的文章，都保持一致的學術觀點，反對專制獨裁（用他的話說是廢止「武裝同志專政」），也反對唯物辯證法與剩餘價值說、反對階級觀念與階級鬥爭論（強調互助）、反對以群眾運動的手法鼓動農村暴動，也不主張土地國有；同時他肯定歐洲的文官體制、由國家調節的資本主義的市場經濟與自由民主的政治體制，亦主張孫中山提出之「平均地權」、「耕者有其田」等政策。顧孟餘在1927年七一五武漢分共之後，他首先質疑「三大政策」非孫中山先生所言，乃鮑羅廷所創，主張回到三民主義。他認為「國民黨……已共同反共，何來左右之分」。如果有所謂的「左派」是就「財政經濟分界」，顧的看法是和汪類似，主張「向帝國主義交涉，收回關稅、鹽稅自主，充實中央財政。廢除釐金……及地方一切苛捐雜稅，資以培養民力，另訂合理之中央及地方財政收支劃分辦法，一切地方稅需以法律定之，無倚輕倚重之弊，以收地方政府之向心，並得自行發展經濟，平均裁減各方兵員，以充實建設經費，實現中山之實業計劃」。²

2 周德偉，《落筆驚風雨：我的一生與國民黨的點滴》（台北：遠流出版社，2011），頁321-322。

因此就性格與思想來說，顧孟餘其實並不難把握，為他寫一本傳記時比較困難的地方是：第一，他一生的經歷豐富，過程撲朔迷離，然而因其性格深沉多慮、謹言慎行，低調而不願張揚，留下的史料不多，尤其缺乏個人私密性的材料（如日記、回憶錄），因此必須要依靠各種零碎的史料方能拼湊出一幅完整的畫像。第二，撰述者必須要把他的一生放置在歷史情境中，將他所擔任的工作與特定事件、人際網絡和國內外的動態政經關係等勾勒出來。這兩點是本書撰寫時所面臨的主要挑戰。

人們如何來評價這樣的一個人物呢？世人對他褒貶不一。有不少人指出他個性膽小、多慮畏縮，書卷氣太重，而少了政治人物所需要的流氓氣。陳公博在回憶錄中檢討1930年改組派組織上的不健全時說「孟餘先生說他身體多病，是一個很好的參謀，而不是一個司令官」，改組派因缺乏領袖人物而歸於失敗。1938年底汪兆銘發表豔電、與日議和之後，顧持反對意見，陳璧君對他的評論是「學者膽小，不足以成大事」。1950年代與顧孟餘共同領導第三勢力運動的張發奎則說，顧孟餘與常人無異，個性過於謹慎小心、膽小怕事，「顧孟餘早年在汪精衛的改組派中，即有『取消派』之名，因為有很多事交他去辦，都是大事變為小事，小事變為沒有」。³ 1949年後隨蔣赴台的知識分子對顧孟餘接受美國人與李宗仁的資助，聯合張發奎等人從事第三勢力亦有所不滿。任職於台灣行政院僑務委員會的李樸生於1950年8月20日寫信給在香港的好友陳克文時表示顧氏從政的問題是雖為人正派又有學問，然書卷氣太濃而缺乏「梁山泊氣概」。1952年2月8日的信中李樸生又說：「存齋（顧孟餘的筆名）現在打起鮮明的旗幟來搞，所依附的卻是軍閥官僚，大失學者身份，必無好果。捧李失國人之同情，尤甚於汪昔日之捧閻也。現在他們在香港之作為我想是希望借美人之垂青，在『大世界』撈翻若干名位置而已！豈真反共乎！豈真反共乎！」⁴ 後來確實如李樸生所預料的，張發奎與顧孟餘等人所從事的第三勢力運動在國共對峙、美蘇對抗的冷戰格局之下，終歸失敗。

3 黃宇人，《我的小故事》（香港：吳興記書報社，1982），下冊，頁143。

4 陳方正藏，〈李樸生致陳克文函〉，未刊。

但是另一方面也有一些人看到顧孟餘的優點。1925年善後會議之時，胡適說顧孟餘人格「清高」。任職於國民政府鐵道部的王奉瑞說顧「清廉、有立場、守原則」（與曾仲鳴的「胡搞亂來」截然不同，兩人有天淵之別）。杭立武在口述訪問紀錄中說「顧是一位沉默寡言，有守有為的人」。傅斯年說「平情而論，孟餘清風亮節，有可佩之處，其辦教育，有歐洲大陸之理想」（1940年）。曾與顧孟餘共事的陳克文也十分肯定顧孟餘的個性與操守。他說：「顧氏一生對於革命和黨國大事，雖抱著高度的熱誠，但對於個人的權利名位卻看得十分淡薄。他雖然做過短時期的鐵道部長，和抗戰時期的中央大學校長，黨裡的中央委員和部長之類的職位，更經常少不了他的一份。不過這些黨國名器之落到他的身上，多半是當時的政治環境使然，並不是他主觀願望的要求；他也從未覺得這對他有甚麼光榮或者可以炫耀於人的地方；他始終保持著謙沖自退的學者風度，在左派領袖中固可以說他是對名利最為淡薄的一人，就是同時的黨國要人能夠和他一樣『為而不有』的也是鳳毛麟角，很不易得的了」。

梁漱溟與顧孟餘為北大同事，他也十分看重顧孟餘的道德與學問。1949年2月13日梁漱溟在重慶《大公報》第2版發表了一篇〈論和談中一箇難題——並告國民黨之在高位者〉，文中他推崇顧的人品與學問，他說「顧孟餘先生是今天國民黨元老中唯一人品學問最好之人。今天為國家設想，不應該讓國民黨完全垮台；相反地應當盼望它再興。但黨內黨外有資望之國民黨員，簡直沒有一個乾淨無疵之人，足以領導了。只有顧先生夠資格。我請李公注意在黨內推重顧先生，並協助顧先生。——但此事卻須以顧先生自己有志願有興趣為前提」。李宗仁後來邀約顧孟餘組閣、支持顧孟餘從事第三勢力運動與此一論斷應不無關係。

1950年代末期，當雷震在台灣宣傳自由思想、推動民主政治，想要組織反對黨時，他心目中理想的領導人物是胡適、顧孟餘與張君勱等三人（然遭到胡適婉拒，並說這三人都已垂垂老矣）。1972年顧孟餘過世時，錢穆對他的評價也是十分正面。「顧先生夫婦可算得是能隱的人物了。中國歷史上，不只看重顯在政治社會上層的人，更能看重隱在一旁的人。這是中國傳統文化精神的偉大。如果我們只懂得前者，易於導引人性爭奪，而看重後者可使社會平衡，可使人心獲得安慰振奮」。陶

希聖等人則說「其愛國愛黨之真誠不可及，其持身之寧靜高潔尤不可及也」。趙惠謨（四川人，曾任立法委員）在1976年《傳記文學》所辦的座談會中對顧孟餘的評價最高，他說「我深知他除了學問淵博之外，其為人處事，實非常人所可企及！律己持身，有為有守。我自認為有四個字，可以表彰顧先生。曰：貞。曰：固。曰：清。曰：正」，可謂「今之完人」。

整體來說，在個性上深藏若虛與多慮畏縮是顧孟餘為人批評之處；「清風亮節」、「有為有守」、「為而不有」、「能仕能隱」，在人品學問上「有立場、有原則」，力求「乾淨無疵」則是顧孟餘為友人所稱道的地方。

在國民黨高層政治人物之中汪兆銘身邊的重要人物顧孟餘一直是一個長期被人忽略、而認識不足的人物，無論我們如何看待顧孟餘一生的功過，他一生豐富的經歷，尤其是他與蔡元培、胡適、汪兆銘、蔣中正、李宗仁、張發奎、張君勱等人的交往與互動，應該可以讓我們對二十世紀中國歷史有一番新的體悟。

本書能在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出版也是一件令人感到欣慰之事。這一方面由於海峽兩岸的正統論述都對顧孟餘與相關汪派人物的歷史有所疑慮，也不太肯定研究這一批歷史上的失敗者的重要性。香港無論在空間與理念上均處於國共之間，又與大陸和台灣保持一些聯繫，此一形象與顧孟餘頗為相合。在二十世紀歷史上，香港與汪派及第三勢力聯繫在一起既是偶然也是必然。汪在生前即將香港作為汪派的政治、經濟與文化的重心（在此發行機關報《南華日報》）。1949年後許多汪派人士以香港為棲身之所，顧孟餘也在香港從事第三勢力運動，希望為未來的中國找到一種超越國共兩黨的政治理想。半個多世紀之後，海峽兩岸均發生了巨大的變化，大陸在改革開放後由極權變為專政，展現「大國崛起」之勢，台灣則從蔣氏專政走向民主化與「中華民國的台灣化」（參見若林正丈《戰後台灣政治史——中華民國台灣化的歷程》一書），然而如何能超越兩岸找到一條未來的路仍是一個猶待追尋的目標。在此情境下，能在香港出版一本有關顧孟餘一生的專書以見證歷史、思索未來，這應該是他所樂見之事。

汪兆銘與「汪派分子」的研究仍有許多可以拓展的空間，我覺得較大的挑戰其實並不在於要不要為他們「翻案」，而是盡可能地掌握歷史事實與還原歷史脈絡，在此之上才能進一步地討論「知人論世」的議題。本書的個案研究是為此所盡的棉薄之力，希望藉此可以讓我們更為認識過去研究不足的汪兆銘與汪派分子。我所撰寫有關顧孟餘的文章初稿完成後，曾在國史館所辦的「戰爭的歷史與記憶：抗戰勝利七十週年國際學術討論會」（2015年7月7-9日）上發表。因會議論文篇幅有限，會後應呂芳上館長的邀約，我將修改後四萬多字的長文〈顧孟餘的政治生涯：從挺汪、擁蔣到支持第三勢力〉交《國史館館刊》刊出。2017年5月中我又應梁元生、陳方正與鄭會欣等教授的邀約，參加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舉辦的「民國人筆下的民國」國際學術討論會，發表〈顧孟餘的晚年：從領導第三勢力到遠離政治〉（該文的刪節版刊於2017年8月號的《二十一世紀》）。這兩篇文章就是本書的雛形。後來我在此基礎之上，利用檔案與報刊資料等再做增補，並加上我所能收集到顧孟餘的分類著作目錄做為附錄。此書出版過程中承蒙友人劉季倫、黃自進、劉維開、王奇生等教授及毛升博士的協助，並經過前後多次的匿名審查。這些審查意見對於拙稿之文字、架構與史料運用、主要觀點等都提出細緻而嚴厲的批評，對書稿的修改有很大的幫助，謹致最高的謝意，當然書中所有的錯誤還是我個人負責。

最後我想感謝香港中文大學的王宏志教授，由於他的邀約讓我有半年休假的時間到中大翻譯系訪問，得以心無旁騖地收集材料、撰寫書稿，本書的主要部分都是2017年上半年在中大梁銻瑠樓109號的辦公室內完成，窗外的藍天綠地與校園內的一草一木仍常留我心。在中大訪問期間，中國文化研究所的陳方正教授將他所藏李樸生、陳克文往來信函交給我整理，提供了非常珍貴的一手史料。在訪港期間樹仁大學的區志堅教授亦多方協助我蒐集第三勢力之史料，又親自帶我去浸會大學圖書館查訪友聯集團的材料，檢閱友聯出版社、自由出版社、亞洲出版社等機構的各種出版品。再者，日本關西大學沈國威教授於2018年兩度邀我去訪，讓我能全心全意地修改書稿，增補了與日本相關的部分。日本慶應義塾大學山田辰雄教授賜序，讓我倍感榮幸。最後我要感謝中華民

國科技部的支持，本書為2015至2016年「蔣介石、汪精衛與抗戰時期中國知識分子」研究計劃與2016至2018年「專書寫作計劃」的部分研究成果。此書的完成承蒙計劃助理趙席篋、鄭巧君、王慧婷、林敏慧等人的多方協助，他們幫助我蒐集整理資料、修改格式、編製書目等。在出版過程中則承蒙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甘琦社長、編輯葉敏磊女士、陳甜女士與張煒軒先生等人的費心協助，敬表謝意。在本書撰寫過程之中家母賴芸馨(1924–2015)與家姐黃珍妮(1953–2015)於2015年上半年先後辭世，他們的過世讓我更加珍惜生命、珍惜時間。我常常想到墨子刻(Thomas A. Metzger)教授的教誨，努力追求孔子所謂「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云爾」(《論語·述而》)的生命境界。謹以此書獻給我摯愛的師長與家人。

2017年6月4日寫於香港中文大學

2019年6月26日修改於南港

第一章

導論

第一節 追尋一個忽隱忽現的身影

顧孟餘(1889–1972)曾經在中國近代學界、政壇叱吒風雲，不過在死後，卻逐漸地為人們所淡忘。現在無論在中國大陸或台灣，很少人聽過他的名字，或知道他的生平事蹟，即使是研究中國近代史的學者對他的瞭解也很有限。本書嘗試追索他的一生，並瞭解他在二十世紀中國歷史上所扮演的角色。他生於清末，早年曾進私塾，然並未參加科舉考試，而是受到新思潮的影響，接受了新式教育，又考取官費，赴德國留學，成為一位具有專業訓練的新知識分子。返國後，顧擔任北京大學教授、教務長，後因蔡元培(1868–1940)、李石曾(1881–1973)、李大釗(1889–1927)等人之介紹，於1924年加入國民黨，輔佐汪兆銘，成為汪派、國民黨左派與改組派中的骨幹人物，為汪出謀獻策。¹顧孟餘有汪

1 「汪派」是指支持汪兆銘的一群人，1925年7月1日汪出任國民政府委員會常務委員與主席之後，報紙上即有「汪派」、「反汪派」的說法。如在1925年7月19日的《申報》上「倘汪派佔勝，汪氏入政，則反汪派必將失敗」。木庵，〈粵政局最近之形勢〉，《申報》，1925年7月19日，第10版。王克文認為「汪派」之雛形見於1926年「迎汪運動」，後來這些人集中於武漢政府，接受汪之領導，亦佩服汪氏之見解與能力。從寧漢分裂到合作期間，「汪派」才成形。1927年底，反「特別委員會」時，仍跟著汪氏西走武漢、南下廣州的原武漢領袖，如陳公

的「頭號軍師」、「諸葛亮」或「汪之靈魂」的稱號，與陳公博並稱汪身邊的「左膀右臂」，曾參與聯俄容共、武漢分共、改組派與擴大會議。在國民黨內他們經常與蔣站在敵對位置，蔣中正一生三次「下野」中的前兩次都與這一批反對派有關。² 1931年九一八事變後汪蔣合作，顧擔任鐵道部長（1932–1935），參與國家建設，支持蔣所主導的剿匪抗戰。然而在1938年底汪兆銘自重慶出走、發表「豔電」，建立附日政權後，他不像陳公博、周佛海、褚民誼、梅思平等人那樣跟隨汪，而毅然勸阻，反對和談，後投奔蔣中正的抗戰陣營，並獲得蔣的重用。蔣任命他為中央大學校長（1941–1943），並支持他出任行憲後的行政院副院長、考試院長（1948，均未就）。蔣一直稱他為「孟餘同志」或「孟餘先生」，以示尊重，然而即使如此，汪派人物的戳記與政治理念卻深深影響他一生的遭遇，以及日後歷史的地位。1949年國共內戰期間、蔣第三度下野之後，李宗仁曾邀請他組閣，顧以時局太難、和戰兩不成而婉拒。中共建政後，顧孟餘對國共兩黨均感失望，他與張發奎、張國燾、張君勱、童冠賢、陳克文等人合作，在桂系李宗仁與美國的支持之下，參與香港與日本的「第三勢力」、批判國共兩黨。此一抉擇雖出於政治考量，然與汪派的政治理念實有密切的關係。這一方面是因為汪在出走之前，顧孟餘與陳公博為汪的智囊，規劃汪派的治國藍圖，另一方面在汪所主導的附日政權結束之後，顧則延續早期的主張，貫徹汪派「批蔣反共」之理念，

博、顧孟餘、何香凝、陳樹人等人，可視為「汪派」的核心。此後十年，甚至直到汪氏去世，此一形成於武漢時期之「汪派」，始終是汪氏在國民黨內爭奪領導權的最大資源。王克文，《汪精衛·國民黨·南京政權》（台北：國史館，2001），頁119。陳公博則說：最接近汪氏的是他左右的親信，亦即「汪派」，最外圍的是「信奉汪先生的主張」的「左派」，而「改組派」（改組同志會之同志）則介於二者之間。「這三派的分野雖然大方明瞭，內部卻著實有些傾軋的痕跡」。陳公博著，汪瑞炯、李鐸、趙令揚編註，《苦笑錄：陳公博回憶，一九二五至一九三六》（香港：香港大學亞洲研究中心，1979），頁211。

- 2 第一次是1927年8月13日，蔣於寧漢分裂時，在桂系與汪兆銘、唐生智等人的逼迫而下野。第二次是1931年12月15日，他在寧粵之爭的過程中，受到胡漢民、孫科、汪兆銘等人之逼迫而下野。

期盼為中國走出另一條路。此一運動失敗之後，他赴美國加州定居，後病逝於台灣。本書以顧孟餘的一生經歷為主軸，討論他的個人際遇與政治抉擇，以彰顯各種歷史機緣使他在引領時代風潮與隨波逐流的夾縫中走了一條曲折的人生道路。

顧孟餘一生雖涉及民國史上許多重大事件，不過他所留下來的資料並不多。誠如論者所言，「在中國現代史上，顧氏……是一個忽隱忽現、忽進忽退的影子。有關顧氏之文獻與史料少而又少。顧氏雖居高位，卻難得出現在公眾之前，就職、離職，既不發表通電，也不公開演說，更從未印行言論集、演講集之類書籍，甚至其本人之墨跡及照片流傳在外者也極罕見。」³在史料之中能找到一些他的著作、墨跡與照片等，也有一些簡短的回憶文章與二手研究。除此之外，相關的材料並不多見，這與顧孟餘「淡薄持身」的性格頗相符合。⁴

1972年顧孟餘在台北過世時，曾由陶希聖(1899–1988)、谷正鼎(1903–1974)、李壽雍(1902–1984)、周德偉(1902–1986)等人共同執筆，寫了一篇〈顧孟餘先生事略〉，簡要地敘述了他一生的事蹟。當時蔣中正尚在世，文中對於他與汪兆銘、國民黨左派、改組派的關係等均含糊帶過，且汪的名字並未出現，只含蓄地說「抗戰既發之後，更堅持民族大義，摒棄奸偽組織，雖相從多年之友亦凜然不可干」；對於顧與蔣的衝突、恩怨、離合，與他參與第三勢力運動時反共、反蔣等事蹟則完全不提。他被描寫為一位畢生忠黨愛國、協助蔣中正反共大業的國民黨員。該文最後，陶、周等人以蓋棺論定之筆法強調顧孟餘「以博學深思之學人，獻身於三民主義國民革命，其言論文章从不曲學阿世，其政治行徑亦和而不同。知之者咸以為其愛國愛黨之真誠不可及，其持身之寧靜高潔尤不可及也。」⁵然究竟如何「不曲學阿世」、「和而不同」，則不得

3 編者，〈關於顧孟餘先生及本社座談會的一些報告〉，《傳記文學》，第29卷第1期(台北，1976年7月)，頁30。

4 陶希聖，〈記顧孟餘先生〉，《傳記文學》，第21卷第2期(台北，1972年8月)，頁29。

5 國史館編，〈顧孟餘先生事略〉，《國史館現藏民國人物傳記史料彙編》(台北：國史館，1998)，第17輯，頁564–567。

其詳，其中似乎留下一些伏筆，頗耐人尋味。《中央日報》在顧過世時的報導則說「對孟餘先生民族大義之堅持，出處大節之分明，學術思想之深遠，從政治事之廉能，忠黨愛國而淡於名位，高風亮節，備致欽敬」。其中也同樣地隱蔽了他與汪兆銘及第三勢力運動的關係。⁶在英文的《民國名人傳》之中，有一篇顧孟餘的小傳，寫於顧過世之前（1966年），作者可能曾經訪問過顧。此文寫得較為公允，作者開宗明義即說「顧孟餘（1889—）是德國訓練的經濟學家、北大教授，1920年代加入國民黨。1933年之前他是汪精衛的政治伙伴。1949年後，他參與所謂香港的第三勢力運動。1950年中期赴美國，回歸學術生活」，文中並不避諱他與汪兆銘以及第三勢力運動之關係，也簡單地描述他在美國加州的平淡生活。⁷由此可見1960—1970年代蔣中正統治下的台灣與美國學界在民國史論述上的差異。蔣中正在1975年過世之後，顧孟餘的生平才開始變成一個可以公開討論的課題。1976年在《傳記文學》「每月人物專題座談會：顧孟餘」專號中，梅恕曾（1901—1982）、吳榦（1903—1990）、胡耐安（1899—1977）、凌鴻勛（1894—1981）等人有幾篇回憶文字，⁸不過也沒有觸及顧孟餘和汪及第三勢力的關係。這種情況到台灣解嚴之後方逐漸有所改善。⁹2010年代之後海峽兩岸學術作品中有一、兩篇曾探討他擔任鐵道部長時所引發的彈劾案，¹⁰顧孟餘與第三勢力之關係或簡述其一生

6 〈顧孟餘病逝治喪會決定 喪葬從簡〉，《中央日報》，台北，1972年6月28日，第3版。

7 Howard L. Boorman, ed., *Biographical Dictionary of Republican China*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67–1979), Vol. 2, pp. 252–255.

8 參見〈每月人物專題座談會：顧孟餘〉，《傳記文學》，第29卷第1期（台北，1976年7月），頁6–30。

9 如符滌泉，〈顧孟餘傳〉，《國史擬傳》（台北：國史館，1992年6月），第3輯，頁295–299。此文的主要內容採自上述1972年的〈顧孟餘先生事略〉一文，不過增加了一些顧孟餘與汪兆銘及香港第三勢力的關係。

10 如劉云虹，〈從顧孟餘案看監察院的彈劾制度〉，《民國檔案》，2010年第4期（南京，2010年11月），頁80–85；段智峰，〈蔣汪合作格局下的另一種局面——以1934年顧案為中心〉，《民國檔案》，2011年第1期（南京，2011年2月），頁103–110。盧豔香，〈實際運作中的中政會——以「顧案」為中心〉，收

的作品。¹¹ 外文有關汪兆銘與國民黨左派的著作中則並無像台灣學界那樣的禁忌，1970–1990年代的幾本專書都比較忠實地提到顧的生平與思想以及他與汪兆銘的關係，而特別注重顧孟餘與陳公博作為左派理論家在思想上的差異。¹²

最近十多年以來，因為各種新史料的出現，顧孟餘在歷史上的身影才逐漸浮現。第一類資料是三部由曾與顧孟餘共事者所寫的書，其中有兩本回憶錄、一部日記。第一本書是筆者在序文中所提到2011年出版的周德偉的回憶錄《落筆驚風雨：我的一生與國民黨的點滴》。該書對蔣所主導「一言堂」之下的國民黨史有所不滿，大力批評擁蔣、抑汪的書寫方式。該書稿在1983年完成之後一直沒有出版，延宕多時，至2011年才問世。此書之中揭露了許多有關顧孟餘的事蹟。在書中周德偉特別突出顧孟餘在汪兆銘身邊所扮演的重要幕僚之角色，以及顧孟餘在「太原約法」之中建構汪派政治理念的貢獻。此書是事後追憶性文字，一方

入《中國國民黨中政會研究，1924–1937》（北京：社科文獻出版社，2016），頁143–157。

- 11 陳正茂、李語寧，〈書生從政的悲劇——顧孟餘政治活動之探討〉，《台北城市大學學報》，期37（台北，2014年3月），頁247–268。黃克武，〈顧孟餘的政治生涯：從挺汪、擁蔣到支持第三勢力〉，《國史館館刊》，第46期（台北，2015年12月），頁103–168。
- 12 Gerald E. Bunker, *The Peace Conspiracy: Wang Jing-wei and the China War, 1937–1941*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2), pp. 119, 147; Wai-chor So (蘇維初), *The Kuomintang Left in the National Revolution, 1924–1931* (Hong Kong: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1); 山田辰雄，《中国国民党左派の研究》（東京：慶応通信，1980）。山田辰雄教授從國民黨、共產黨的相互作用與觀點異同之比較來看國民黨左派研究之意義。他指出這些政治集團的研究可以從各種政治勢力相互作用之中來理解現代中國。國民黨左派居於蔣中正之國民黨與毛澤東之共產黨的中間路線。它與國共兩黨在大眾政治參與及大眾組織動員上均有異同，此一課題之研究對於理解中國革命之全體有重要的意義。他在該書第五章、第六章提到顧孟餘在武漢國民政府與改組派之中所扮演的角色，並詳細地描述了陳公博與顧孟餘有關國民黨階級基礎的辯論，見頁181、188、208、216–217、219–231。

面有一些具有「偏見」的一家之言，另一方面也有不少記憶的錯誤。¹³就顧孟餘研究來說，因顧氏本身的傳記材料比較缺乏，周德偉的記述提供了非常重要的線索，讓我們認識到一些他所觀察到的顧孟餘，以及背後複雜的歷史脈絡。

第二部書是2012年陳方正編輯、校訂的《陳克文日記，1937–1952》。¹⁴陳克文過世之後，其子陳方正在家中抽屜內發現此一日記，因而整理出版、公諸於世。此一日記先由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出版正體字版，再由北京的中國社科文獻出版社出版簡體字版（此一版本改正了許多正體字版中的錯字，在版本上較佳），在海峽兩岸乃至歐美近代史學界廣受注目。陳克文（1898–1986）為廣西岑溪人、廣東高等師範學校畢業，1923年入黨之後即受廣西籍同鄉甘乃光（1897–1956）的影響而與汪建立密切的關係，也是一位「汪派分子」。¹⁵他曾在廣州與武漢政府時期負責

13 筆者特別感謝王奇生、劉維開教授指出書中的一些錯誤。

14 陳克文著、陳方正編輯校訂，《陳克文日記，1937–1952》（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12），上、下冊。

15 甘乃光字自明，廣西岑溪人。1922畢業於嶺南大學經濟系，後留校任教；1924年7月任黃埔軍官學校英文秘書兼政治教官，與汪兆銘熟識。1925年汪成為廣州國民政府主席，對甘氏十分器重。他在黨內地位開始崛起。1926年出任國民黨青年部部長、農民部部長，1928年赴芝加哥大學深造。1932年出任國民政府內政部政務次長；此後與汪的關係較為疏遠。1938年4月出任國民黨中央黨部副秘書長、國防最高委員會副秘書長；1947年出任行政院秘書長，1948年出任駐澳大利亞大使，1951年去職，1956年9月30日病逝澳洲。在抗戰時期推動行政院公文型式等的改革。有關甘乃光生平參見陳克文，〈甘乃光先生事略〉，《自由人》，第604期（香港，1956年12月15日），第2版。李樸生，〈憶甘乃光先生〉，《自由人》，第649、650期（香港，1957年5月25日、29日），第2版。至於學界對甘乃光生平與思想，與他在1930年代從事行政改革（行政三聯制）的研究，可參考Morris L. Bian, “Building State Structure: Guomindang Institutional Rationalization during the Sino-Japanese War, 1937–1945,” *Modern China*, 31:1 (2005), pp. 35–71. Lane J. Harris, “Defining the Nationalist Party Center: The Text and Context of Gan Naiguang’s Outline of Sun Wenism,” *Southeast Review of Asian Studies*, Vol. 34 (2012), pp. 87–113. 林瑾芬，〈抗戰時期行政三聯制的推動與檢討〉（台中：東海大學歷史學系碩士論文，2015）。

農民部的工作，1930年任職於香港的《南華日報》（汪派所辦的報紙），1932年出任僑務委員會委員與僑民教育處處長，後又返港辦報。他在抗戰初期任行政院參事，擔任汪的貼身秘書（1937–1938）。這一本日記記載了他個人對時代的真實感受，可以幫助我們瞭解其從政的心路歷程與時局之變化。此外，陳克文日記中有關國共內戰與1949年前後的記載，提供了有關桂系與汪派的合作，共同推動第三勢力運動的一手史料，可以讓我們對第三勢力的起源、發展與顧孟餘在其中所扮演的角色有十分具體的認識。再者，書中的附錄收有陳克文所撰〈國民黨左派三傑：甘乃光與顧孟餘〉（原刊於1975年，是作者為紀念顧孟餘逝世三週年所寫的悼念文字）、〈改組派與回憶錄〉、〈曇花一現的左派〉等文。¹⁶文中從「左派領袖」、改組派「巨頭」的角度介紹了顧氏的生平，「從十三年黨的改組開始，至廿六年對日抗戰發生止，十幾年中，左右兩派的糾紛衝突，此起彼落，或大或小，始終未曾停止過；其間尤以武漢政府的成立，改組派的出現，和擴大會議的召開，這幾件事和顧氏的關係最深」。其次他則強調在1949年之後第三勢力運動中的角色，「大局岌岌不可終日的時候，顧氏竟挺身而出，糾集少數國民黨同志，要把國民黨從危難困厄中挽救起來，後來事雖不行，他愛護國民黨的一片熱心和勇氣，實不可沒」。陳克文也說，在左派領袖中，顧孟餘是「最長壽的一個」，且是唯一的一位「在國土之上壽終正寢的」。¹⁷此外筆者也特別感謝陳方正教授將陳克文與李樸生的百餘封通信交給筆者整理，其中亦揭露1949年之後港台知識分子對顧孟餘的看法。

第三本書是張發奎（1896–1980）將軍的口述歷史，《蔣介石與我：張發奎上將回憶錄》。張發奎為國軍一代名將，威名卓著。他所統帥的軍隊驍勇善戰，有「鐵軍」之稱，在抗戰時立下許多戰功。本書係張發奎晚年在香港接受哥倫比亞大學學者夏蓮蔭（Julie Lien-ying How）四百

16 陳克文著、陳方正編輯校訂，《陳克文日記，1937–1952》，下冊，頁1329–1370。

17 陳克文著、陳方正編輯校訂，《陳克文日記，1937–1952》，下冊，頁1335–1336。

餘次的訪問，後由夏蓮蔭與她的先生 William Hwa 合作整理完成。1983 年出了英文版 *The Reminiscences of Chang Fa-k'uei (1896–1980) as Told to Julie Lien-ying How (1926–1982)*，¹⁸ 後由鄭義翻譯為中文，並於 2008 年在香港出版。書中第 20 章敘述了 1950–1954 年間他與顧孟餘合作在香港「創建第三勢力的努力」，讓我們對顧氏在 1949 年之後的事蹟有較多的認識。¹⁹

第二類資料是近年來公布的蔣中正日記與年譜等材料，如國史館 2003 年開始印行的《蔣中正總統檔案：事略稿本》、2005 年蔣家後人公布的「蔣中正日記」，以及 2014 年呂芳上主編《蔣中正先生年譜長編》（書中收錄了許多「蔣中正日記」、國史館檔案的內容）等史料。蔣中正研究近年來因新史料的公布而有長足進展。就顧孟餘研究來說，顧與蔣關係密切，蔣氏史料（特別重要的是日記）的記載使我們得以認識顧與蔣的互動，以及蔣對他的觀感、印象，和他對汪派分子與其他反對者的處置方式。蔣的視野可以幫助我們解釋民國史的許多關鍵轉折是如何產生的，此一批史料無疑地是民國史研究的一個寶庫。

第三類資料是政府機構的檔案。在本書中我運用較多的是中研院近史所檔案館的外交檔案與個人檔案（主要是朱家驊檔與王世杰檔）、國史館的「蔣中正總統文物」、「汪兆銘史料」與「國民政府檔案」、「閻錫山史料」、中國國民黨黨史會的材料，此外我也用了中國大陸南京第二歷史檔案館（教育部檔）、南京大學檔案館與重慶市檔案館的材料等。這些檔案保留了官方記載之中顧氏活動之痕跡。其中比較重要的是 2005 年由法務部調查局轉移至國史館的「汪兆銘史料」（起迄時間為 1923 至 1944 年），收有汪兆銘與汪派人物相關之函電，如顧孟餘與汪兆銘之間的往來函電、汪與蔣之間的往來函電，以及汪出走之後蔣動員各方力量規勸

18 Fa-k'uei Chang, *The Reminiscences of Chang Fa-k'uei (1896–1980) as Told to Julie Lien-ying How (1926–1982)* (New York: Chinese Oral History Project, East Asian Institute, Columbia University, 1970–1983).

19 張發奎口述，鄭義譯註，《蔣介石與我：張發奎上將回憶錄》（香港：文化藝術出版社，2008）。

汪的函電等，是十分珍貴的一手材料。另一部分則是「蔣中正總統文物」、「國民政府檔案」、外交部檔案等，保留了許多1949年之後情治單位、外交部門對於第三勢力活動的報導，可以幫助我們認識美蘇冷戰格局之下顧孟餘、張發奎等人的動向，及其接受美國補助的情形。

第四類資料是清末民國的書籍、期刊與報紙數據庫。其中較重要的是「民國時期文獻總庫：圖書庫」、「民國時期期刊全文數據庫(1911–1949)：1–11輯」、「抗日戰爭與近代中日關係文獻數據平台」、「《申報》資料庫」、「《大公報》資料庫」、「《中央日報》資料庫」，以及中研院近史所開發的「報刊資料檢索系統」(收錄之報刊如《福爾摩斯報》、《社會日報》、《晶報》)、香港公共圖書館的「舊報紙資料庫」(收錄了《香港工商日報》等14份中英報紙，可檢索)、日本報紙資料庫(收錄《朝日新聞》、《讀賣新聞》)等。這些報刊數位資料庫讓筆者很容易地掌握各種媒體中顧孟餘所發表的言論、著作，以及報章中與顧孟餘相關之報導等，而能從零碎的資訊中拼湊出一幅比較完整的歷史圖像。報紙資料庫的優點是在事件的時間上較為精準，但是有些報紙的報導，尤其是一些小報，其內容不盡可信，需要加以甄別、判斷。雖然如此，報紙報導還是提供許多重要的訊息，讓我們能掌握顧孟餘的活動與社會觀感。我深刻地感覺到如果不是數位資料庫的發展，這些被壓抑，或隱藏在歷史邊緣的一些人物很難再次活靈活現地重登歷史舞台。科技的進步也促成我們對歷史霸權話語的挑戰。

總之，上述幾種材料的出現讓我們可以追索這樣一位謎樣的政治人物。本書以下各章將依照時序先後敘述顧孟餘的一生，探討他的早年經歷、在北京大學教書與擔任教務長的情況，他如何入黨從政，又如何在國共鬥爭與中日交戰的背景下與汪兆銘、蔣中正互動，以及1949年之後參與第三勢力的經緯等。顧氏一生的經歷曲折動人，他所參與的諸多活動可以幫助我們認識國民黨高層的派系鬥爭與二十世紀中國政治的變化。

為了瞭解顧孟餘一生的經歷，在具體地描述顧氏生平之前，我嘗試從「主義時代」的來臨、汪蔣在政壇的崛起，以及在1920年代國民黨環繞著「聯俄容共」所發生的變化等三個方面，來勾勒顧氏所處的時代環境與背景。

第二節 主義時代的來臨

顧孟餘的早年生涯處於清末民初的「轉型時代」（根據張灝的定義大約為 1895–1925 年之間），²⁰ 中國在各個領域都正經歷著從傳統到現代的變革，例如在政治體制上從君主專制轉為民主共和，在知識上從經學時代到科學時代，在菁英分子的身份認同上從傳統士紳到新知識分子等，這些變革形塑了他們這一代讀書人的生命歷程。

就政治參與來說，傳統讀書人是透過科舉考試而晉身仕途。1905 年廢除科舉制度之後，一方面切斷了士人透過科舉考試而參與政治的晉身之階，另一方面隨著新式教育的發展，受過新式學堂與留學教育之「知識分子」的人數越來越多，造成社會領導階層在結構上的轉變。²¹ 清末民初之後的知識分子接受了新式教育，其精神特質不再以通才性的儒家文化為主，而轉以專業知識作為參與政治及影響社會的基礎。這些專業知識都是以科學為基礎而建立的新學科，包括自然科學與社會科學，顧孟餘所專研的政治經濟學即為其中之一。新知識的出現打斷了傳統藉儒學而晉身政治的社會流動管道。誠如許倬雲（1930–）所述「近代中國知識分子，其成分與功能，均有重大的改變……最主要的現象，則是知識分子中的主流，逐漸由以文化為志業的通識之士，轉變為以追求知識為志業的學術人士，與以知識為工作資源的專業人士。一方面，近代中國知識分子由此可以擺脫政教不分的特性；另一方面，知識分子與社會大眾之間，又橫亘了一條深廣的鴻溝」。²² 總之，傳統士大夫與新知識分子的社會角色及參政方式有明顯的不同。不過清末民初士大夫與知識分子之間的替代與推移不是單方面的，有許多傳統的面向在現代時期繼續存在。例如有不少知識分子即飽讀儒家經典、熟稔詩詞歌賦，甚至具有科舉功名（如蔡元培、胡漢民、汪兆銘等）；同時，傳統士大夫「以道

20 王汎森等，《中國近代思想史的轉型時代》（台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2007）。

21 張朋園，〈近代中國的政治領導階層〉，收入氏著，《知識分子與近代中國的現代化》（南昌：百花洲文藝出版社，2002），頁 277–289。

22 許倬雲，〈序二〉，收入余英時等，《中國歷史轉型時期的知識分子》（台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92），頁 viii。

自任」、「道統尊於治統」的想法，在二十世紀中國知識分子身上並未斷絕，仍是他們面對政治權威的根本信念。²³

就清末民初轉型時代的知識人來說，多數人都擺脫不了傳統的羈絆，在理智或情感上依附傳統。顧孟餘卻與他們不同，他的「轉型」似乎較為成功，因而離傳統士大夫較遠，而更接近五四的新知識分子。在政治認同上他接受民主共和，反對專制；在知識領域上，他留學國外，先學機械工程，後轉讀政治經濟學，受到科學知識的洗禮；在身份認同上，在1911年自國外留學返國之後，他和胡適等人一樣，是一個不折不扣的新知識分子。

辛亥革命之後從「帝國」到「民國」的政治變遷，及其後的軍閥混戰、五四運動、中日戰爭等社會、政治的動盪再次對讀書人帶來巨大的衝擊，這涉及上述許倬雲所說的近代中國知識分子一方面與政治分離，另一方面又與社會隔絕的特殊處境。許紀霖借杜亞泉(1873–1933)的「游士」觀念來描寫此一處境：「從此天下精英與從體制內部被拋離出來，成為帕森斯所說的『自由流動資源』，一部分被新的社會體制吸納，成為軍人、商人、律師、醫生、工程師、教師和出版商，另外一部分始終漂浮在外，無法在體制裡面找到自己的位置，這就成為所謂的『游士』：在體制邊緣和外部遊蕩的、漂泊不定的讀書人」。至1920年代隨著「主義時代」的來臨，²⁴政黨角色興起，政黨又結合了軍隊的武裝與社會的動員力量，宣傳以主義為基礎的革命事業，此一歷史動向主導了歷史的進程，

23 錢穆的思想即反映此點。他強調學術領導政治，所以學術界與教育界所形成的「道統」地位應在政府所形成的「治統」之上。他在1945年與1977年先後撰寫〈學統與治統〉和〈治統與道統〉表達這種看法。錢穆，〈學統與治統——政學私言五〉，刊於《東方雜誌》，第41卷第15號（上海，1945年8月），頁4–8；後收入《政學私言》（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67），頁64–75。1977年錢穆應中央研究院之邀以〈治統與道統——從中國文化來看國父與故總統孫、蔣二公及當前之學術界〉（台北：中央研究院三民主義研究所，1977）為題作專題演講，後收為中央研究院三民主義研究專題選刊（七）。兩文的篇名雖略有不同，但主旨卻一致。

24 王汎森，〈「主義時代」的來臨——中國近代思想史的一個關鍵發展〉，《東亞觀念史集刊》，第4期（台北，2013年6月），頁3–88。

此後知識分子的影響力下降，地位日益「邊緣化」，²⁵戰爭又摧毀了「民間資本和文化權力的社會基礎」，這時失去了社會基礎的「游士」被迫在黨派力量之間進行政治選擇。²⁶這是1920至1950年代許多讀書人所面臨的難題，國共兩黨的參與者有不少人即出自這一群人。²⁷

國民黨人十分注意接受過新式教育的知識分子，並透過宣傳、辦教育、發展組織等方式，嘗試將他們吸納入革命的隊伍。1920年代在廣州青年們，如廣東高等師範學校的學生，即受到孫中山三民主義演講（1924年1月27日至8月24日，每週一次在該校大禮堂演講）的啟發而加入國民黨。陳克文當時是廣東高等師範文史系的學生，受到同鄉嶺南大學的甘乃光影響，1923年畢業後在許崇智的介紹下加入國民黨。他說「孫中山的淵博學識，偉大人格自然是為我們所崇拜」，「我加入國民黨的經過，主要因為聽了孫中山先生三民主義的演講，再加上當時內憂外患交相煎逼，青年人受了刺激，很自然的走上這條路來的」。²⁸陳克文在高師的同學李樸生（1896–1986）也聽過孫中山的演講，不過沒有立即入黨。1925年六月廣州發生「沙基慘案」，他目擊死傷之幼童而痛恨帝國主義之暴行。他覺得「教書對打倒帝國主義不夠快、不夠力量」；²⁹「打倒列強的帝國主義，求中國之獨立自由，應該有一個集中全國人才，組織

25 余英時，〈中國知識分子的邊緣化〉，收入《中國文化與現代變遷》（台北：三民書局，1992），頁33–50；羅志田，〈近代中國權勢的轉移——知識分子的邊緣化與邊緣知識分子的興起〉，收入許紀霖編，《20世紀中國知識分子史論》（北京：新星出版社，2005），頁127–161。

26 許紀霖，〈重建社會重心：現代中國的「知識人社會」〉，王汎森等著，《中國近代思想史的轉型時代》，頁166–167。許紀霖，〈「土豪」與「游士」：清末民初地方與國家之間的士大夫精英〉，《華東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5年第4期（上海，2015），頁25–37。

27 以1920至40年代中國北方的共產革命運動來說，主要的參與者即是環繞著李大釗的一群知識分子。陳耀煌，《統合與分化：河北地區的共產革命，1921–1949》（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12）。

28 陳克文著、陳方正編輯校訂，《陳克文日記，1937–1952》，下冊，頁1340–1341。

29 李樸生，〈憶甘乃光先生〉，《自由人》，1957年5月25日。

嚴密的黨來負責領導，否則事情太艱難，個人的努力，正如以寸膠澄黃河，無濟於事」。這時廣東省黨部的宣傳部長甘乃光和他討論到這一類的問題，就吸收他入黨。³⁰至於北方的青年加入國民黨則主要是受到孫中山北上的影響，然在此之前汪兆銘即負責國民黨北方的工作，他與奉系、皖系軍閥有往來，並與李石曾、易培基（1880–1937）等關係很深，「段祺瑞等電邀中山北上議商國事，汪精衛可能有穿針引線之功」。³¹下文也會談到，顧孟餘、周德偉等北大師生加入國民黨的一部分原因是為汪兆銘演講所吸引。陳克文與李樸生等人的例子顯示，1920年代許多青年人開始相信，個人只有透過參與一個組織嚴密的政黨、團結在主義的共同理念之下，才能救國。這是主義時代的重要特徵。

國民黨之所以強調吸收新知識分子入黨是因為在理念與組織上它都具有菁英主義的色彩，認為黨員是引領時代的火車頭（共產黨也是如此）。北伐成功之後，1928年國民黨的刊物《訓練月刊》中有一篇〈在國民革命路上知識分子應認清的方向〉，在該文中作者將孫中山稱為「先知先覺」，「智識分子」是「後知後覺」，一般民眾則是「不知不覺」。他希望「革命的智識分子」學習三民主義，再領導民眾實行三民主義，並批判那些不革命、假革命與反革命的「智識分子」。³²蔣中正顯然地同意此一觀點。1931年12月22日，蔣第二次下野回到家鄉浙江奉化，他在日記中檢討失敗的原因，認為「對於反動智識階級之不注意，教育仍操於反動者之手，此亦本人無幹部、無組織之過也」，此後他透過錢昌照（1899–1988）、周炳琳（1892–1963）等人的協助，有系統地與知識分子（即他所說的「智識階級」）接觸，一方面交換知識，一方面選拔人才，最後吸收

30 李樸生，〈參加黨務工作的甜酸況味（上）〉，《傳記文學》，第8卷第3期（台北，1966年3月），頁24。

31 李國祁，〈民國十四年汪精衛的爭權〉，《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17期（台北，1988），頁119。

32 周普，〈在國民革命路上知識分子應認清的方向〉，《訓練月刊》，1928年第4期（上海，1928年9月），頁15–18。

了一批學者加入國民政府。³³1934年2月19日蔣中正在南昌演講〈新生活運動之要義〉時，第一條就要求：「全國知識分子要負起教導國民的責任，使國民具備國民知識與國民道德」。³⁴蔣對知識分子的態度顯示菁英主義的色彩，他們希望將知識分子吸納入政黨組織，讓他們以黨員的身份帶領社會政治的變革。另一位國民黨的領導人汪兆銘也積極的吸收新知識分子，他藉由動人的演說、組織力量的拓展與地緣因素的結合等建立自己的班底。日本學者山田辰雄將國民黨具有菁英主義色彩的理論稱為「代行主義」；沙培德 (Peter Zarrow) 則稱為「先鋒主義」。³⁵

本書主角顧孟餘的一生正是處於上述讀書人脫離鄉村社會，游離於體制內外及學術與政治之間，而嘗試依附政黨組織、接受主義之號召，而實現政治理想的一個時代。顧孟餘一方面是受過新式教育的知識分子，也在某種程度上具有「游士」的性格（顧孟餘是北方人，但一生的事業與家鄉的關係不密切）。他具有政治上的使命感，而加入了國民黨、投身國民革命，成為三民主義的擁護者。對於像顧孟餘等國民黨員而

33 金以林，〈蔣介石的一九三二年〉，收入呂芳上策劃、導讀，《蔣介石的親情、愛情與友情》（台北：時報文化出版企業股份有限公司，2011），頁227-257。1931年6月錢昌照出任教育部常務次長，此後他常替蔣聯絡知識分子。如1934年2月蔣曾請錢昌照代約胡適、丁文江在南昌見面。「蔣中正電錢昌照代約胡適丁文江在南昌會敘」（1934年2月7日），〈籌筆——統一時期（一〇三）〉，《蔣中正總統文物》，國史館藏，典藏號：002-010200-00103-028。周炳琳是留學歐美的經濟學家（哥倫比亞大學碩士），與國民黨及學界之關係均十分深厚，多次出任政府官員並兼任黨務工作。1930年代初期，周炳琳曾參加胡適、蔣廷黻等人所組的《獨立評論》社，後來他擔任北大法學院院長，同時也兼中央政治學校教務長。他所扮演的角色工作不但是一個學者，也是政學之間的聯繫人，賀麟與蔣中正的聯繫即透過周。參見黃克武，〈蔣介石與賀麟〉，《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67期（台北，2010），頁22。

34 蔣中正，〈新生活運動之要義〉，《現代社會》，第3卷第1期（天津，1934年5月），頁1-8。

35 山田辰雄，〈序論——現代中国における代行主義の伝統について〉，《歴史のなかの現代中国》（東京：勁草書房，1996），頁1-9。沙培德，〈民權思想與先鋒主義：民國時期孫中山的政治主張〉，《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78期（台北，2012），頁1-28。

言，三民主義是共同的政治理念，國民黨組織力量則是最重要的政治資產，他們相信只有依附政黨才能實現其理想，而離開了政黨則無所依託。³⁶他的從政生涯與1920年代開始在國民黨內崛起的政治領導者汪兆銘與蔣中正兩人有密切的關係。

第三節 汪蔣在政壇的崛起

孫中山過世後中國國民黨內最具實力的人是汪兆銘、胡漢民(1879–1936)和廖仲愷。後來廖仲愷在1925年被暗殺；胡漢民先支持蔣中正，後又受蔣排擠，於1936年過世。國民黨內逐漸形成以汪兆銘與蔣中正為兩大領袖之領導架構。汪蔣兩人在政壇上的崛起有先後之別，以在國民黨內的資歷來說，汪較早參加同盟會，其輩份要高過蔣。汪兆銘，字季新，別號精衛。他的祖父是安徽婺源人，後遷至浙江山陰(今紹興)，他的父親到廣東做官，落籍廣東番禺。汪兆銘生於廣東三水縣(今佛山市三水區)，故算是廣東人。汪從小在父親教導之下背誦傳統典籍。他在〈自述〉中說：

我只記得父親是一個勤學的人，七十一歲以後，眼生蒙翳，不能看見細字，耳又重聽。當我傍晚由書塾放學回家的時候，父親必令我大聲誦讀王陽明《傳習錄》等書兩三頁，傾耳而聽。又令我在一塊白漆木板上寫三四寸大的字，或《陶詩》，或《陸放翁詩》兩三首。背手徐看，直至背誦得出，方纔罷休。每有和作，便令我筆記起來。我父親是九月初七日夜半得霍亂病，初八日午時死的。死前一晚，這功課並沒間斷。我自己因此所受的益，比在書塾裡似乎多些。³⁷

36 顧孟餘在這方面的體會最為深刻，1929年他曾和周德偉說：「凡國民黨人，不論其現在擁護何人，將來均可化敵為友，為吾人之政治資本，決不能隨自己之好惡作人身之攻擊。吾人如離開國民黨及黨員，即無政治資本」。周德偉，《落筆驚風雨：我的一生與國民黨的點滴》，頁213。

37 汪兆銘，〈汪精衛先生自述〉，《申報》，上海，1944年11月13日，第4版。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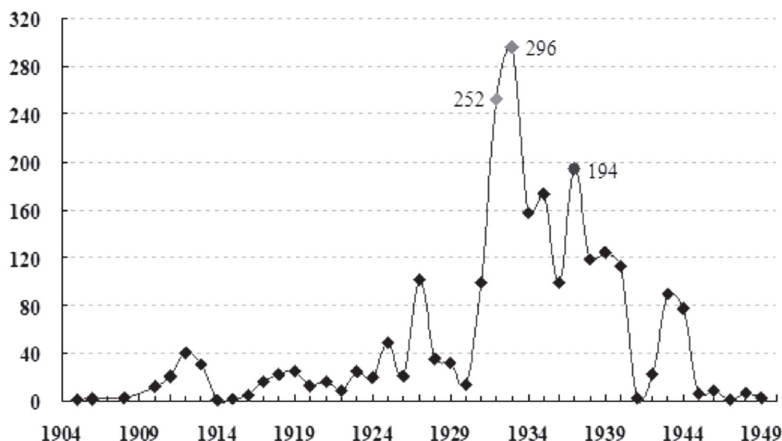
1896年父母親過世之後汪兆銘由同父異母的大哥汪兆鏞(1861–1939)照顧，繼續學習經典，並準備科舉考試。³⁸由此可見他在幼年時代便奠定了傳統學問的基礎，具有士大夫或傳統文人的一些特質。汪兆鏞的一生仍屬於傳統的「士紳」階層(入學海堂讀書、中舉、擔任兩廣總督岑春煊的幕府)，汪兆銘則已由「士紳」轉向「知識分子」。1901年汪兆銘應番禺縣試，名列第一、府試亦名列第一。1903年他考取廣東官費留學，與胡漢民、朱執信(1885–1920)、古應芬(1873–1931)等人一起赴日留學，學習「法政速成科」，又自費入法政大學的「專門科」，得到法學學士學位。他於赴日途中剪去髮辮，以示對舊體制的反抗，後於1905年加入同盟會。在晚清革命之時，汪因富於文采、文思快捷，參與《民報》的編輯，發表了多篇文章，與《新民叢報》的梁啟超(1873–1929)辯論。在《民報》的撰稿者之中汪兆銘撰文數量高達33篇(535頁)，僅次於章炳麟(1868–1936)，而超過胡漢民、朱執信與汪東(1890–1963)等人。³⁹後來他又在1910年因刺殺攝政王載灃(1883–1951)而入獄，寫下「引刀成一快，不負少年頭」的詩句，而聲名大著。如果以「汪兆銘」與「汪精衛」的名字在《申報》上的見報率作分析(每一則報導計算一次)，1904–1949年之間的變化反映出汪兆銘生平的幾個重要階段，如圖1.1。

從折線圖來看汪兆銘的一生在《申報》上的見報率，從1905年首次出現之後約有四個高峰。第一個比較低的高點是1911–1913年，分別為21次、40次、31次，應該與他革命志士之角色有關。辛亥革命成功之後，汪淡泊名利，與陳璧君(1891–1959)結婚，並赴法國留學，考察西

刊於汪精衛，〈時賢自傳：自述〉，《東方雜誌》，第31卷第1號(上海，1934年1月)，頁1–3。此文寫於1933年12月7日。

- 38 有關汪早年的經歷及其與大哥汪兆鏞的關係，以及辛亥革命之後兩人的歧途發展，參見Steven B. Miles, *The Sea of Learning: Mobility and Identity in Nineteenth-Century Guangzhou*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 2006), pp. 290–292。汪兆鏞後來反對共和，以「清遺民」自居，避居澳門，參見林志宏，《民國乃敵國也：政治文化轉型下的清遺民》(台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2009)。
- 39 朱沅源，《同盟會的革命理論：「民報」的個案研究》(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85)，頁337–343。

圖 1.1 《申報》上汪兆銘見報率



方社會文化。此時他希望透過教育方式來感化國人，展現出不凡的氣度，至1917年1月方返國。

第二個高峰在1924–1927年間，分別為20次、49次、21次、101次。汪崛起的關鍵時間為1924年，他擔任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的宣言起草人、主席團的五人之一，繼而當選中執委，兼任實業部長、後改任宣傳部長，黃埔軍校成立之後擔任政治教官。在孫中山逝世之前，汪負責政宣、胡漢民負責行政、廖仲愷負責財政、許崇智負責軍事（蔣中正為其屬下之參謀長），是最重要的幾位輔佐人物。⁴⁰ 1924年底，孫北上商討國是，汪因熟悉國民黨在北方的工作，又與李石曾、易培基等人關係深厚，故北上發展黨務，又隨行擔任孫中山之中文秘書，負責起草「北上宣言」。孫生病至過世之前，他負責草擬遺囑，成為國民黨內聲望甚高的一位領袖。1925年7月，他在加拉罕(Lev Mikhailovich Karakhan, 1889–1937, 1924年7月至1926年9月任蘇聯駐中國大使)、鮑羅廷(Borodin Mikhail Markovich, 1884–1951)的支持下被選為國民政

40 李國祁，〈民國十四年汪精衛的爭權〉，《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17期（台北，1988），頁117。

府常務委員會主席和軍事委員會主席。⁴¹ 1925年8月20日廖仲愷被刺，汪又藉此驅逐了胡漢民在黨政中與許崇智在軍隊中的勢力。⁴² 汪的地位從此開始崛起，代表支持「聯俄容共」政策的國民黨「左派」，主張「要和共產黨為中國革命同生死共存亡，並大呼『革命的向左來，不革命的滾開去！』的口號」。⁴³ 汪兆銘的「左派」立場最明顯地表現在他在1926年3月1日為《左向週刊》所寫的序言之上，他說：「革命之需要，由於時代與環境而益呈露，在中國今日，凡努力於打倒帝國主義，打倒軍閥，努力於工農運動者，謂之革命派。反之勾結帝國主義與軍閥而摧毀農工運動者，謂之反革命，此兩派勢力，在各種社會中為不斷的明爭暗鬥：革命派勝，則中國能自由平等，反革命派勝，則中國不免於國亡滅種。……我今日號於眾曰，求中國之自由平等者向左去，欲中國國亡滅種者向右去」。⁴⁴ 1927年4月與7月之後，蔣、汪先後放棄與蘇聯及中共的合作，展開清共，第一次國共合作結束，國民黨左派亦隨之終結。其後汪、蔣之間衝突日多，從改組派、擴大會議到中原大戰，兩人爭執不斷，蔣也在汪派與其他反蔣勢力的逼迫之下，於1927年8月與1931年

41 據胡漢民的說法：鮑羅廷與加拉罕擬爭取的國民黨人物有三人。第一是胡漢民、第二是汪兆銘、第三是戴季陶。經過詳加考慮之後各下一考語。對胡的評語是「難相與」；對戴的考語是「拿不定」；對汪的評語是「有野心，可利用」，故決定予以扶持。胡漢民，〈閻馮汪勾結的因緣與汪精衛降共的實證：十九年八月十八日在立法院紀念週講演〉，《中央週報》，第117期（1930年9月），頁5。

42 李國祁，〈民國十四年汪精衛的爭權〉，頁144。

43 陳克文，〈鄧演達和國民黨左派〉，陳克文著、陳方正編輯校訂，《陳克文日記，1937-1952》，下冊，頁1387。1927年嶺南大學的學生曾發行了一個雜誌叫《左向週刊》，第1期的封面上的標語為「革命的向左邊來！不革命的滾開去！」，並註明這是汪兆銘的名言，在該刊發刊詞的最後又寫明「希望我們革命的同志們，大家站到左邊來，把那些反革命者打出去」。見葉裕，〈左派改組，與取消〉，《一九》，第1期（上海，1930年9月），頁23。

44 汪兆銘，〈《左向週刊》序〉，收入何孟恆編，《汪精衛先生政治論述》，頁641-642。汪精衛紀念託管會：《汪精衛網站》，<http://wangjingwei.org/zh/his-ideas-cn/political-writings/#1447608167429-b11a662e-ac7d>（2017年3月14日檢閱）。

12月兩次下野（第一次從1927年8月12日至1928年1月8日；第二次從1931年12月15日至1932年1月27日）。

汪兆銘政治生涯中見報率的第三個高峰是1932–1935年，分別是252次、296次、157次、173次，此一階段為汪一生中見報率最高的時期。九一八事變之後汪、蔣第一次合作，汪擔任行政院長並兼外交部長，蔣主理軍事與剿共，顧孟餘出任鐵道部長。1932年汪、蔣合作之下，《申報》上一整年中有關汪的報導有252則，1933年更高達頂點296則，至1935年底，汪因推行對日妥協外交被刺，隔年初出國休養，至西安事變之後方才返國。⁴⁵

汪兆銘生涯中第四個高峰為1937–1940年，其間1937–1938年底為汪蔣第二次合作。從七七抗戰、1938年底汪發表「豔電」到1940年初汪組織「附日政權」，因和戰抉擇與中共問題，汪蔣兩人分道揚鑣。⁴⁶這一階段中1937年抗戰開始，報紙有關汪的報導有194次、1938年118次、1939–1940年汪出走至南京汪政府正式成立，報紙報導有124次、112次。此後汪的知名度開始走下坡，1941至1949年之間，只有1943年89次、1944年77次（1944年3月3日赴日治病，11月10日因「多發性骨髓腫」，病死於名古屋帝國大學附屬醫院），報紙的報導較多，其他年份只有零星的幾則消息。⁴⁷從汪過世到抗戰勝利，汪派勢力可謂徹底瓦解，曾參與汪政權的人幾乎都被國民政府逮捕，以「漢奸」罪名處刑（在1945至1947年間國民政府的各級法院先後審理過兩萬多個「漢奸」）。⁴⁸抗戰

45 有關汪被刺的經過，參考征鴻，〈汪精衛被刺目擊記〉，收入任思等著、蔡登山編，《汪精衛集團》（台北：獨立作家，2014），頁29–33。

46 有關汪兆銘與當時多位主和者在抗戰時與日本和談之經過，可參見邵銘煌，《和比戰難？八年抗戰的暗流》（台北：政大出版社，2017）。

47 有關汪兆銘在日本名古屋過世之經過，請參考小野稔，《汪兆銘 名古屋に死す》（東京：東京ジャーナルセンター，1998）。汪過世之後家屬在醫院中庭（名古屋巨蛋體育館旁）植梅三株以為紀念，後一株枯死，目前尚存兩株。醫院在這兩株梅花之前立有「汪兆銘氏紀念之梅」的牌子。

48 有關汪政權的興衰可參考：邵銘煌，〈汪政權的登場與落幕〉，收入呂芳上主編，《中國抗日戰爭史新編：戰時社會》（台北：國史館，2015），頁471–525。

勝利後蔣中正在輿論的壓力下，命何應欽（1890–1987）派遣工兵營於1946年1月21日炸毀位在南京中山陵旁梅花山上的汪墓，並將其棺材與屍體焚化。⁴⁹1949年之後海峽兩岸的主流觀點均將汪與他的追隨者定位為「漢奸」，並摧毀了相關的史蹟文物，將汪從歷史記憶中抹去。今日梅花山汪墓舊址上建了一座稱為「觀梅軒」的涼亭，其中只有門邊一對隱諱的對聯提起孫權墓的故事以及此地與抗戰的關係，「欣敵寇潛蹤，景物依然，河山如故，此日花香鳥語，鐘阜麗明，若同和靖重游，應媿六橋三竺；問吳王何處，墳塢已渺，史跡尚留，當年虎踞龍蟠，石城安穩，端賴武鄉定策，永垂九鼎一言」。⁵⁰與汪相關的遺跡已杳無蹤影。

蔣中正比汪兆銘小四歲，在黨內的輩分起初不如汪兆銘、胡漢民等人。蔣出身於河北保定的陸軍速成學堂，曾留學日本，學習現代軍事。1912年蔣刺殺光復會領袖陶成章（1878–1912）、1922年在陳炯明（1878–1933）事件中前往救援，「千里赴難」，表現出對孫的效忠，而取得孫的信任與重用，孫認為蔣「勇敢、誠篤、知兵事」。⁵¹在得到孫中山的賞識後，蔣地位漸升，使得原本是陳其美（1878–1916）隨從的他，逐漸躍入中國政壇，成為第一流人物，並叱吒風雲了半個世紀以上。蔣一生的經歷也可以從報刊統計一窺其關鍵點。透過以下兩個統計數字嘗試反映此一過程。第一是以1911至1927年《申報》新聞中他所出現的頻率作統計：從以下蔣中正在國內報紙上出現的頻率，就能清楚看到1911至1923年數量都不多，1924開始有32次，1925年之後，蔣在《申報》上的

有關參與「附日政權」之文人的研究可以參考：蔡登山，《叛國者與「親日」文人》（台北：獨立作家，2015）。這些與汪兆銘關係密切的「附逆」文人，包括江亢虎、梁鴻志、周作人、管翼賢、陳彬龢、金雄白、張資平、何海鳴、朱樸、周黎庵、紀果庵、周越然、龍沐勛、趙叔庸、冒效魯、柳存仁、陶亢德、穆時英、樊仲雲等人，其中除少數例外，大多數人都淪為「漢奸」。

49 黎明起，〈汪精衛死後遷棺瑣憶〉，收入任思等著、蔡登山編，《汪精衛集團》，頁118–120。

50 筆者於2016年5月19日去訪梅花山，抄錄該聯。

51 黃自進，〈青年蔣中正的革命歷練（1906–1924）〉，《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65期（台北，2009），頁15–16、42–4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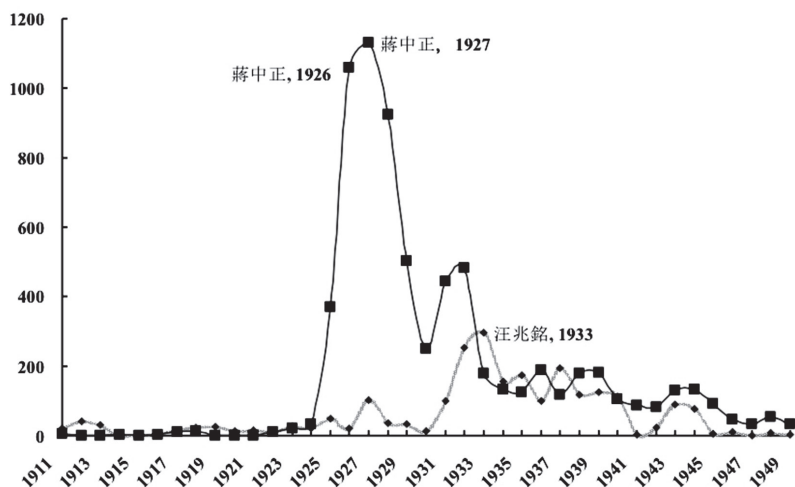
見報率就大幅超過汪(汪最多僅兩百餘次，而蔣則高達一千多次，表1.1)。汪、蔣見報率之比較如圖1.2(汪的數字包括「汪兆銘」、「汪精衛」；蔣的數字則包括「蔣中正」、「蔣介石」)：

圖1.2反映蔣中正從擔任黃埔軍校校長到北伐成功之間，即1925至1927年，迅速崛起於中國國民黨與中國政壇。1927年底，他與宋美齡(1898–2003)結婚。此後他接受基督教信仰，在為人處事上有很大的轉變。平穩的婚姻、妻子的規勸與虔誠的信仰使他的心性更為堅定、平和，同時也因為宋美齡人脈的關係，蔣得到宋子文(1894–1971)、孔祥

表1.1 1911至1927年《申報》上蔣中正見報率

年代	見報次數(包括標題或非標題)
1911	6
1912	0
1913	0
1914	3
1915	1
1916	2
1917	9
1918	13
1919	1
1920	0
1921	0
1922	9
1923	21
1924	32
1925	371
1926	1,059
1927	1,131

圖 1.2 《申報》上汪兆銘與蔣中正見報率



熙 (1881–1967) 的協助，取得江浙財團之支持，而終能成就事業。⁵² 簡單地說，通過掌握黃埔軍校，北伐成功，又掌握財政上之優勢，使蔣成為國民黨內部最有實力的一號人物。⁵³ 1930年，他在中原大戰中得到東北軍的協助，打敗了閻錫山 (1883–1960)、馮玉祥 (1882–1948)、李宗仁 (1890–1969) 等地方實力派，牢固掌握軍權；⁵⁴ 1932年之後又從軍事領袖向政治領袖轉型，建立起「一支完全效忠於他個人的核心組織」。⁵⁵

52 郭岱君，〈蔣介石在國民黨之崛起 (1925–1928)〉，呂芳上主編，《論民國時期領導精英》（香港：商務印書館，2009），頁91。

53 有關蔣中正與孫中山的關係與《申報》中報導蔣氏之內容，請參閱黃自進，〈青年蔣中正的革命歷練 (1906–1924)〉，頁1–50。

54 參見陳進金，《地方實力派與中原大戰》（台北：國史館，2002）。

55 金以林，〈蔣介石的一九三二年〉，收入呂芳上策劃、導讀，《蔣介石的親情、愛情與友情》，頁255。

總之，1928年至1936年之間，蔣一方面致力網羅地方菁英，並與地方勢力妥協，另一方面也以武力討伐或政治方式和平解決地方問題。直到1936年「蔣在歷經剿共、平息閩變、解決兩廣事變後，才成為具有全國性威望的政治領袖」。⁵⁶

1936年底西安事變之後他在國內甚得人心，成為舉國推崇的民族領袖；太平洋戰爭後他又成為中國戰區最高統帥（1942年1月）。若以世界史的眼光來看，統計美國由亨利·魯斯（Henry R. Luce, 1898–1967）所主辦的《時代》（*Time*）雜誌和《生活》（*Life*）雜誌，加上《紐約時報》（*The New York Times*），同樣以他出現的頻率畫成曲線，並參考成為封面人物的時間點，會呈現另一種更寬廣的視野，大致也是自1926年國民革命軍北伐時崛起，到1945年到達頂峰，當中他多次成為雜誌的封面人物，其後方漸衰退。⁵⁷

由此可見，蔣氏自北伐開始步入中國政壇之核心，到對日抗戰勝利，其聲望如日中天。然而自1945年到1949年國共內戰，國民黨戰敗，蔣在桂系與其他勢力之逼迫下於1949年1月21日第三度下野，⁵⁸蔣中正與中華民國政府則於該年年底遷至台灣，他的聲望也隨之降到谷底。美國總統杜魯門（Harry S. Truman, 1884–1972）甚至以極負面的措詞在白皮書中譴責蔣氏與他所領導的政黨要為大陸淪陷負責。他到台灣後，重起爐灶希望能建設台灣，進而反攻大陸。⁵⁹在台期間，他實施戒

56 呂芳上，〈抗戰前的中央與地方——以蔣介石與廣東陳濟棠關係為例的探討（1929–1936）〉，收入氏著，《民國史論》（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2013），中冊，頁1029。

57 王良卿，〈美國報刊裡的“Chiang Kai-shek”對於*Time*、*Life*與*The New York Times*的基本調查〉，黃克武主編，《海外蔣中正典藏資料研析》（台北：國立中正紀念堂管理處，2013），頁107–148。

58 劉維開，〈蔣中正第三次下野之研究〉，《政大歷史學報》，第17期（台北，2000年6月），頁131–156。

59 有關1950、60年代蔣中正在台灣的努力，參見黃克武主編，《遷台初期的蔣中正》（台北：國立中正紀念堂管理處，2011）；黃克武主編，《重起爐灶：蔣中正與1950年代的台灣》（台北：國立中正紀念堂管理處，2013）；黃克武主

嚴統治、四次連任總統(共擔任五任, 1948–1975), 多次成功抵抗中共武力犯台之企圖, 使在台灣的中華民國逐漸能站穩腳跟, 為後來的政經發展奠立基礎, 直到1975年逝世。

汪、蔣兩人一方面受傳統影響, 另一方面也接受新式教育, 同時具有傳統性與現代性。在生活上與思想上, 兩人與傳統文化的關連很深, 均自幼學習傳統典籍。再者, 兩人都有國外留學的經驗。汪留學日本與法國, 研習法政; 蔣則留學日本, 研讀軍事。他們在國外習得的專業知識與國際視野, 成為他們一生貢獻國家、成就事業的重要資產。汪、蔣又因對日採取不同的因應方式, 抗戰期間轉變為「中國民族主義」與「東亞民族主義」的對峙。⁶⁰汪、蔣的差異在他們與顧孟餘等人的互動之中更充分地表現出來, 顧一生在政治上的發展先是依附汪, 繼而投靠蔣, 最後則是在香港從事第三勢力運動, 批蔣反共。

第四節「聯俄容共」與1920年代國民黨內派別的形成

顧孟餘的政治生涯除了與上述「主義時代」的來臨, 以及汪、蔣兩位政治領袖有關之外, 也涉及1924年國民黨改組, 主張「以俄為師」、「聯俄容共」, 以及此後黨內出現的派系問題。此一政策允許共產黨員以個人身份加入中國國民黨, 兩黨建立「革命統一戰線」, 中國共產黨後來稱之為「第一次國共合作」, 並宣稱孫中山政策是「聯俄、聯共、扶助農工三大政策」。國民黨「聯俄容共」政策的出現涉及孫中山晚年思想的一個重要轉折。根據張朋園的觀點, 孫中山思想有兩個階段, 是從「民權」

編,《同舟共濟: 蔣中正與1950年代的台灣》(台北: 國立中正紀念堂管理處, 2014); 黃克武主編,《1960年代的台灣》(台北: 國立中正紀念堂管理處, 2017)。

60 黃克武,〈民族主義的再發現: 抗戰時期中國朝野對「中華民族」的討論〉, 北京中國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編,《近代史研究》, 總214期(北京, 2016年7月), 頁4–26。

到「威權」，⁶¹此後主張「以俄為師」，終於走向蘇俄式列寧主義威權政黨、主張聯俄容共的政治道路。

從清末到民初，孫的思想屬於「民權」階段。孫中山的民權思想受到歐洲啟蒙運動、日本明治維新與清廷預備立憲的影響，他又嚮往美國共和精神，提倡以武力推翻君主專制，實施民主憲政，施行政黨政治、代議政治、權力分立、地方自治；然而在此轉換過程之中需要訓練人民熟悉民主運作，他因此提出「軍政、訓政、憲政」的三階段論。不過民初以來，亂象叢生，共和國建立之後，上述民權主義的推展並不順利，孫的革命大業一再受挫，陳炯明的叛變（1922–1923）是他一生革命事業的重大挫折，而堅定了他革新黨務的決心。在思想上，1915年孫中山即開始質疑代議制的議會政治，主張直接民權。1920年代，孫中山受到義大利學者（原為德國人）密且兒（Robert Michels, 1876–1936）「寡頭政治論」與德國社會民主黨的影響，嚮往嚴密的政黨組織。他因而放棄了自由主義，改採「一黨專政」的威權主義，並主張「聯俄容共」政策。國民黨的聯俄容共政策的出現具有雙重背景，一方面孫中山鑑於國內情勢不利、軍閥割據、分崩離析，希望獲得蘇俄的支持，再則，列寧（1870–1924）希望在中國發展布爾什維克的革命，而俄國也的確給予大量武器和財政援助，並派出軍事及政治顧問幫助他興辦黃埔軍校、建軍北伐。⁶²

孫中山思想的改變與共產國際的對華政策有密切的關係。在這方面王奇生的作品與李玉貞的《國民黨與共產國際（1919–1927）》一書有很清楚的梳理。⁶³ 1919年3月2日共產國際成立，在全球掀起世界性的共產

61 張朋園，《從民權到威權：孫中山的訓政思想與轉折——兼論黨人繼志述事》（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15）。

62 參見李玉貞，〈共產國際、蘇聯與黃埔軍校關係的幾個問題〉，「國軍與現代中國：黃埔建軍九十年國際學術討論會」會議論文，台北國史館，2016年6月13日。作者從俄文史料中，特別針對黃埔軍校與蘇聯、共產國際的關係方面，探討黃埔軍校的創建，以及從共產國際世界革命的戰略角度來看蘇聯援助等問題。該文指出孫中山請求蘇聯給予援助，蘇聯欲利用廣州政府作為在東方推進的工具，因而促成雙方的合作，並埋下衝突的原因。

63 李玉貞，《國民黨與共產國際（1919–1927）》（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革命，國共兩黨的發展均與此有密切的關係。中國國民黨為蘇聯的盟友，中共則為共產國際的一個支部，兩者有絕對的從屬關係。由於早期中共勢力弱小，故莫斯科方面將希望放在國民黨主導的「民族資產階級革命」之上，並要求中共加入國民黨，共同從事國民革命。⁶⁴ 1923年1月4日俄共中央局開會，俄共與共產國際正式決定全力支持國民黨的革命工作。1月12日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又做出了中共與國民黨關係問題的決議，認定「中國唯一重大的民族革命集團是國民黨」。鮑羅廷於1923年10月6日抵達廣州，10日，孫中山在廣州國民黨黨務會議上指出黨的問題在於組織渙散、缺乏革命精神、沒有黨軍等；18日，孫任命他為國民黨組織教練員。⁶⁵ 在組織方面，孫接受鮑羅廷的建議，10月開始籌備改組國民黨，1924年元月，召開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確立了採取列寧主義模式的新政綱。國民黨改組是孫中山思想的內在變化與共產國際外部推動所共同造成的。

國民黨的改組造成了國民黨的基本性格與建國理論的改變。孫中山民權思想原本受西方自由民主觀念影響，此後轉而接受列寧思想，使國民黨轉變為「類似列寧主義的政黨」(Quasi-Leninist Party)。⁶⁶ 經過改組之後的國民黨納入列寧的革命理論而具有兩大特色：第一是改造國民黨組織，實行以黨治國。國民黨之統治從民主集中制到總理制(1938年後改為總裁制)，完成政黨性質之轉型，其目標為建立「黨國體制」之國家。國民黨設中央黨部為總部、各省設分部、下設支部、最基層為小組。第二是建立黃埔軍校，訓練黨軍。1924年黃埔軍校的成立即是「聯俄容共」策略下的產物。黃埔軍校設立初期由蘇聯提供一些財政、人力上的支援，課程是由蘇聯顧問指導，體制亦參考蘇聯紅軍，除強調戰法

64 王奇生，〈搖制與強控：莫斯科與早期中共的權力機制〉，「五四運動 100 週年國際學術研討會」會議論文，台北：中央研究院，2019 年 5 月 2-4 日。

65 盧華，〈孫中山的第三條道路：張朋園《從民權到威權》書評〉，《思想史》，第 7 期（台北，2017），頁 209-226。

66 參見張朋園，《從民權到威權：孫中山的訓政思想與轉折——兼論黨人繼志述事》。

與技能外，更重視政治教育。這批黃埔軍校學生是孫中山為建立革命武力，以謀統一中國的基石。不過在孫接受列寧主義組織型態、黨治思想、大眾動員的同時，他對蘇維埃制度與共產組織、激烈的土地改革、世界革命等仍有所保留，且並未完全放棄三民主義中民權主義與五權憲法的主張。⁶⁷孫中山晚年因推動革命的實際考量而採取聯俄容共，在此一轉向之後他的思想同時包含了民權與威權（民主體制與黨國體制）的兩部分，此一張力導致了日後國共雙方之糾結。中共奉他為「革命的先行者」，國民黨則尊稱他為「國父」，雙方表面上似有共識，而實際上裂痕很深，中共突出聯俄容共（「三大政策」）與威權部分；國民黨清共之後則強調三民主義中的民權部分，卻未能放棄黨國體制（民主化前）。三民主義至今未能統一中國肇因於此。

孫中山去世之後，汪兆銘、蔣中正等國民黨人均以總理信徒自居，爭取對孫中山思想的繼承權。蔣中正強調自己是孫中山先生的信徒。在孫中山開始聯俄容共政策之後，蔣與孫的關係更為密切，而原本意識形態傾向不強的蔣也很快地接受了孫中山的聯俄容共、以黨治國等觀點，至1927年4月清共之後方有所轉變，將矛頭指向中共與國民黨左派。汪兆銘本來並不贊成孫的想法，後來態度轉變，一改反共的態度，思想左傾，擁護聯俄容共，成為國民黨左派的領袖。1927年7月武漢分共之後，汪派再次確定民權主義，主張實施地方自治，完成訓政、實施憲政。⁶⁸

在1920年代初期，國民黨的建國理論從「民權」轉向「威權」，而有聯俄容共政策的出現，革命陣營因聯俄容共政策導致內部的分化，出現了國民黨內的左、中、右派。根據李玉貞的研究，左中右三派的劃分是「共產國際的傳統策略」，在共產國際第一次代表大會就把世界範圍內的社會主義活動家分為左派、中派與右派。他們一貫的策略是：「右派是革命派的敵人，在被打倒之列。中派在被分化之列，可以爭取其中的一

67 盧華，〈孫中山的第三條道路：張朋園《從民權到威權》書評〉，頁209–226。

68 參見張朋園，《從民權到威權：孫中山的訓政思想與轉折——兼論黨人繼志述事》，頁110–130。

部分，吸收來壯大左派。左派不言而喻是革命的領導者和依靠對象」，「鮑羅廷到中國接觸國民黨工作不久，也就以這個策略為指導展開工作」。⁶⁹由此可見開始之時此一黨內派別的劃分是由共產國際所主導。在鮑羅廷的指導下，中共刊物內刊登了大量劃分國民黨左、中、右派的文章。從1924年初開始，中國共產黨的輿論刊物《嚮導週報》刊登多篇文章，對國民黨作出派別劃分，並極力宣揚支持國民黨左派、爭取中派，與打擊國民黨右派的政治主張。⁷⁰此一劃分涉及其內部政策與階級屬性的差異，他們還撇清共產黨與國民黨左派之關連。⁷¹在共產黨的支持下，國民黨左傾聲勢漸強。此舉引起一部分人的疑慮，終致發生1925年8月20日廖仲愷被刺事件，以及該年年底西山會議派主張取消容共政策。此後中共所採用的國民黨左右派之分又從「他稱」部分地轉而為「自稱」，形成內部激烈的黨派之爭。

國民黨人對於「左派」、「右派」的區分有不同的反應。被指稱為國民黨右派者，因為「右派」一詞具有貶意（所謂「非革命」、「反革命」），因而對此提出反擊。他們認為「國民黨原無所謂左派，也無所謂右派」，此一劃分是共產黨的「陰謀」，企圖「把國民黨員分化起來」，「這才有所謂左派及所謂右派」。他們也認為，國民黨之中有一部份人「不大明白這是共產黨預定的計劃，甚且反而隨聲附和，以左派自居，而幫同共產黨攻擊那些被指為右派的三民主義者」。⁷²他們所說「隨聲附和」的人主要是廣州、武漢與鮑羅廷親近的國民黨員，也就是以汪兆銘為主的所謂「國民黨左派」。⁷³國民黨左派的力量在孫中山聯俄容共政策開始，至

69 李玉貞，《國民黨與共產國際》，頁282-284。

70 楊天宏，〈蘇俄與20年代國民黨的派別分化〉，《南京大學學報》，2005年第3期（2005年5月），頁86-96。

71 為人，〈國民黨左右派之爭〉，《嚮導週報》，第80期（上海，1924年8月），頁638。

72 新，〈誰是國民黨的左派〉，《三民週報》，第7期（上海，1927年5月），頁6。

73 李志毓認為1925-1927年間，汪以左派領袖的身份積極支持國共合作，這是因為汪企圖尋求蘇聯勢力的支持，借助共產黨的群眾動員與組織方式，來增強自身實力，為推行其政治主張的一種策略。李志毓，〈論汪精衛1925-1927年「聯共」的策略性〉，《史林》，2009年第2期（2009年4月），頁62-68。

1925年7月汪任國民政府主席而實力增強。這一些人不像被稱為「國民黨右派」者對「右派」的標籤那麼反感，反而較願意採用以「左派」為「自稱」。在廖仲愷被刺之後，左派的自我意識變得更為強烈。⁷⁴

1927年「四一二」事件之後蔣也有意識地注意到派別劃分導致黨內的分裂，希望以後黨內不再提左、右派，國民黨內「只有三民主義的信徒」。他說「年來共產黨分化我黨政策，無所不用其極，造作『左派』、『右派』、『西山會議派』、『新右派』等等名詞，任意加於本黨同志之上。受之者如被符魔，立即癱瘓而退，其實所謂各種派別，從何衡評，今日之為左派者，明日即可為右派，今日之為右派者，明日即可為左派，西山會議派，尤為代表任何罪惡之名詞，可以加之任何不取悅於共產黨者之身，其實主持西山會議者，苟願被其利用，又何嘗不可據其所謂中央黨部及國民政府最高之位置」。他因而「與本黨同志約，以後種種敵人，用以分化吾輩之名詞，一概屏棄」，「國民黨裡沒有左右派，只有三民主義的信徒」。⁷⁵在蔣中正「四一二」清共之後武漢也在「七一五」進行分共，國民黨內左右之爭至此才暫時告一段落。

總之，聯俄容共之後，國民黨內親共的汪兆銘、廖仲愷、鄧演達等被歸為左派，堅持反共的西山會議派則被歸為右派。蔣中正在去蘇聯訪

74 有關「國民黨左派」的終結，學者提出不同的看法。例如陳克文認為「鄧氏的出走，武漢的分共，以及七月十三日共產黨發表和國民黨分道揚鑣的宣言，已等於正式宣告左派壽終正寢了。」陳克文，〈鄧演達和國民黨左派〉，陳克文著、陳方正編輯校訂，《陳克文日記，1937-1952》，下冊，頁1393。王克文認為1929年汪在陳公博、顧孟餘的辯論之中，站在顧孟餘的一邊，將國民黨的核心訴求從「走非資本主義的民生道路」，調整為爭取政治民主，從此汪就取消了反帝與群眾運動的立場，這意味著左派運動的終結。王克文，《汪精衛·國民黨·南京政權》，頁144、154。李志毓則認為1928至1931年間，左派仍然存在，他們以改組派為名發展出一套獨立的左派理論。1932年汪蔣合作以後，改組派組織消滅，「這意味著國民黨左派的終結」。李志毓，〈國民黨左派問題的再思考〉，發表於國立政治大學人文中心、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等主辦，2016年4月16-18日「蔣介石日記與民國史研究的回顧」學術討論會。

75 蔣中正，〈蔣總司令告全國國民黨同志書〉，《清黨特刊》，第4期（重慶，1927年7月15日），頁38-58。

問時曾被認為是「左派」或赤色將軍 (Red General)；⁷⁶在接任黃埔軍校校長時，他被認為是在左右之間，並同情中共的「中派」，⁷⁷後來在「四一二」清共之後，被視為右派的領袖。當顧孟餘於1924年加入國民黨之時，正處於孫中山採行聯俄容共的階段，他選擇了汪兆銘的系統，加入「國民黨左派」。1926年1月，國民黨在廣州舉行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顧的入黨資歷雖甚淺，然具有北大教授的資格，且在汪派與李大釗、于樹德等共產黨員的支持下，順利當選了中央執行委員，由此進入國民黨上層的政治舞台。

顧孟餘一生與上述主義時代的來臨、汪蔣兩位政治領袖競合與國民黨內派系紛爭有密切的關係，以下將從顧孟餘早年經歷說起，依照時序先後描述他的生平與思想。

76 蔣在當時西方報紙上被稱為「赤色將軍」(The Red General)。例如“Coup Spilts Canton Reds: One Faction Jails Others and Russians are Reported Killed,” *New York Times*, New York, March 26, 1926. Hannah Pakula, *The Last Empress: Madame Chiang Kai-Shek and the Birth of Modern China* (New York: Simon and Schuster, 2009), p. 346.

77 周恩來認為1925–1926年蔣在擔任黃埔軍校校長時「蔣是國民黨『中派』的代表人物」，不偏左、亦不偏右。他說蔣對俄國顧問十分友好，接受軍事顧問的作戰指導。另一方面，蔣對共產黨員也比較友好，並明確支持工農運動。周恩來，〈關於一九二四至二六年黨對國民黨的關係〉(1943)，《周恩來選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上冊，頁112–124；曾慶榴，〈共產黨人與黃埔軍校〉(廣州：廣州出版社，2013)，頁311–312。

第二章

早年生涯 (1889–1924)

第一節 早年經歷

顧孟餘，原名兆熊，字夢漁、夢餘，後改孟餘，筆名公孫愈之、存齋等。原籍浙江紹興府上虞縣西華村，1889年10月18日（光緒十五年〔民國前二十三年〕九月二十四日）生於直隸省宛平縣，1972年6月25日卒於台北，享年84歲。¹顧氏之祖籍為浙江，始祖顧遷在宋哲宗時自浙江嵊縣的顧港徙居至上虞的西華里，第五世以後分為後宅、前宅、東宅等支。1911年顧乃眷所編纂的《上虞西華顧氏宗譜》記載了上虞西華顧氏家族宋代以來發展的歷史（圖2.1）。²至清末之時，此一家族已經是一

1 顧孟餘之出生年「民國前二十三年」（1889）是根據「軍事委員會委員長侍從室人事調查表」，〈顧孟餘〉，《軍事委員會委員長侍從室》，台北，國史館藏，典藏號：129-200000-3519。然而有些資料將他的出生年記載為1888年，例如維基百科。這可能是根據徐友春主編，《民國人物大辭典修訂版》（石家莊：河北人民出版社，2007），頁2841。

2 顧孟餘在擔任鐵道部長期間到上海一所學校視察，在同該校一名顧姓的職員交談中發現，彼此是同宗，且後來在這位職員所藏的《上虞西華顧氏宗譜》中找到了自己的先人，於是他認定上虞西華是自己的祖籍。辰易，〈民國奇人顧孟餘〉，《上虞新聞網》，<http://synews.zjol.com.cn/synews/system/2010/05/24/012149015.shtml>（2018年1月7日檢閱）。（清）顧乃眷編纂，《上虞西華顧氏宗譜》（上虞：格思堂活字本，宣統三年〔1911〕）。

個人丁茂盛的大家族，家譜的書寫反映出宗族發展的狀況。顧孟餘的祖父與父親都是透過科舉考試入仕，離開家鄉至外地任官，後居於北方。³顧家在北方沒有太多的親戚，顧孟餘的學生梅恕曾說「自我於民國八年至十一年在北大和顧先生在北平開始接觸以來，除了看到他和顧師母之外，未見他家的其他人」。⁴根據顧孟餘過世時訃文與相關的記載，他有一個胞弟顧兆馨、弟媳陳英年，兩人育有二子、一女，長子名為顧彥和，另外有一個堂弟叫顧兆豐。⁵

顧孟餘的青少年時代的經歷沒有任何記載，我們只知道他曾經在私塾接受過傳統的經典教育。14歲時（1903）投考京師大學堂譯學館，11月放榜，顧孟餘名列榜首。報紙登出榜單：「譯學館第一次招考附學各生，業經管學大臣取錄八名，於十月初四日以前由取錄各生父兄親身帶領來館，並遵繳一期學費。茲將名次列左：顧兆熊 李世昌 蔡世溶 王國銘 韓述成 蕭維岳 郭振勳 英傑」。⁶1903至1906年間他就讀於京師大學堂譯學館，專攻德文。譯學館的前身為同文館，1902年併入京師大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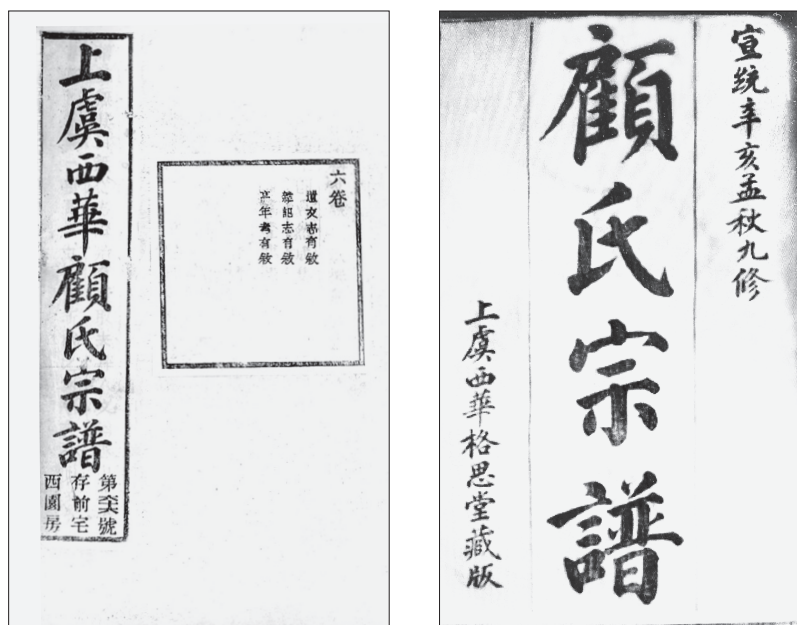
3 “Ku Meng-yu,” in Howard L. Boorman, ed., *Biographical Dictionary of Republican China*, Vol. 2, p. 253. 他父親的名字為 Ku Chia-hsiang，不確定中文為何。周德偉記載「顧的祖父與李鴻藻同科進士，在朝亦為侍郎，父為府道，故自幼即同李〔石曾〕的交情極密」，周德偉，《落筆驚風雨：我的一生與國民黨的點滴》，頁166。按李鴻藻（1820—1897）為咸豐二年（1852）進士。同科中進士的只有顧鳳仞有可能，不過顧鳳仞的出生地為江蘇常州。周德偉有關顧孟餘祖、父的記載是否正確仍待考。

4 梅恕曾，〈孟餘先生的生平與往事〉，《傳記文學》，第29卷第1期（台北，1976年7月），頁7。梅說「我只知道他有一個兄弟，好像叫作顧兆馨」。

5 顧氏訃文見《中央日報》，1972年7月11日。蔡元培的日記記載顧孟餘有一個弟弟叫顧兆林，1913年3月27日「致夢漁函。致劉子英函（教育部），為夢漁之弟兆林屬託補官費事」。見蔡元培著、王世儒編，《蔡元培日記》（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0），頁226。按顧兆馨亦作兆林，字石君，直隸宛平人。時留學德國，返國後任京師學務局科長、副局長、代理局長。見歐美同學會編，《歐美同學通信錄》（北京：歐美同學會，1922），頁44。顧彥和曾撰寫〈我所知道的顧孟餘〉，刊於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北京市委員會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文史資料選編（第32輯）》（北京：北京出版社，1987），頁216—222。

6 〈中外近事：北京譯學出榜〉，《大公報》，天津，1903年11月21日，第2版。

圖 2.1 《上虞西華顧氏宗譜》封面



堂，1903年改為譯學館，8月24日學政大臣張百熙（1847–1907）因軍機大臣瞿鴻禨（1850–1918）介紹，奏請委任朱啟鈐（1871–1964，瞿之外甥）出任譯學館監督，在沙灘舊北大紅樓對面的北河沿購置房舍，招生開學，其宗旨為造就「周知環球萬國之情勢，體用兼備、本末交修」的人才，該館共設有英、俄、法、德、日五國的語文專科。⁷

顧孟餘入學時為德文班的甲級學生（譯學館共辦了五級，分別為甲乙丙丁戊。甲級為光緒三十四年畢業之班），而該校有德籍教員師德威、孔拉德、華根納等人，此外亦有華籍老師，如汪榮寶（1878–1933）教授「本朝史」，⁸而1906年秋天之後，蔡元培亦在德文班擔任教習，教授

7 孔祥吉，〈辛亥革命前后的朱啟鈐與北京〉，《福建論壇（人文社會科學版）》，2011年第10期（福州，2011），頁96。

8 汪榮寶，《本朝史講義第2編：全盛時期》（北京：京師譯學館，清光緒三十二年〔1906〕）。

國文與西洋史，至1907年初方離開。⁹譯學館之中有一位國文教習楊毓麟（後易名守仁，1872–1911）曾任瞿鴻禨幕府，後留學日本，返國之後由張百熙推薦，擔任譯學館教職。楊毓麟思想激進，在授課之餘，參加革命黨人的活動，並影響了幾位館內的學生，這些學生同情革命排滿，因而引發風潮。¹⁰在就讀期間，顧孟餘曾結交具有革命思想的同學張榕（字蔭華，1884–1912）、潘智遠等人。¹¹張榕為撫順的漢軍旗人，家境富裕、性格豪爽，在譯學館學俄文，後與吳樾（1878–1905）友善，吳、張共同策劃謀刺五大臣，吳當場喪命、張則因案入獄。據馮自由的記載，楊毓麟也參與此事，然因掩飾得宜而未受懷疑。¹²由譯學館之政治氛圍，可推測顧孟餘在譯學館學生時期可能已受到革命思想的薰染。1903年直隸總督袁世凱視察京師大學堂譯學館，曾與張百熙與朱啟鈐合影，1904

-
- 9 陳初輯，《京師譯學館校友錄》（台北：文海出版社，1978），頁1–9。蔡元培到譯學館的時間是在1906年9月18日，當時清廷擬派翰林院編檢出國留學，蔡元培至北京等候派遣。譯學館監督章梈（1861–1949，號一山）聘他為教習，講授國文及西洋史，並編有《國文學講義》。蔡元培教書時活潑有趣，頗受學生歡迎，他教了一學期之後即離館。陶英惠，《蔡元培年譜》（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76），頁174。高平叔編著，《蔡元培年譜》（北京：中華書局，1980），頁21。依照時間推算，顧孟餘在1906年秋天時應已出國，因此沒有直接受教於蔡元培。
 - 10 孔祥吉，〈辛亥革命前后的朱啟鈐與北京〉，頁97–98。譯學館內傳播革命思想而引發風潮的學生是軍機大臣瞿鴻禨的兒子希馬，後由朱啟鈐妥善處理，方彌平此一風潮。孔祥吉、鄭匡民，〈英倫蹈海烈士之真史——楊毓麟未刊函簡述考〉，鄭大華、鄒小站編，《辛亥革命與清末民初思想》（北京：社科文獻出版社，2012），頁385–411。
 - 11 徐珂，《清稗類鈔》（上海：商務印書館，1916），冊27，「師友會黨類」，頁131–132。「當革命潮流彌滿東南之際，北方健兒應時而起者曰撫順張榕，字蔭華，家計饒裕，以運動革命故，傾家資大半。夙與京朝官談革命事，多無效，乃求諸學界，於保陽得吳樾，於京師得潘智遠、顧兆熊。潘、顧皆譯學館學生」。
 - 12 馮自由，〈新湖南作者楊篤生〉，《革命逸史》（北京：中華書局，1987），第2集，頁117–118。楊毓麟於1906年在東京加入中國革命同盟會，1909年赴英學習，擔任中國同盟會駐英國聯絡員。1911年4月，廣州黃花崗起義失敗，楊十分悲痛。1911年8月5日，他在英國利物浦的大西洋海灣投海身亡。

年2月同文館譯學館德文班師生也留下一張合照，由此可以想見當日之情景。

1905年顧孟餘（當時的名字為顧兆熊）考取公費出洋留學，《東方雜誌》刊出〈各省遊學彙誌〉，京師「譯學館選拔優等學生吳慶嵩、徐穉、侯維良、楊曾浩、曹鈞、周秉清、周緯、金國寶、黃廣徵、王廷璋、陳永治、張謹、顧兆熊、陳浦、陳大岳等十五人，分赴英俄德法四國留學」。¹³ 1906年顧孟餘進入德國萊比錫大學，學習電機工程，旋因興趣不合，後來轉至柏林大學攻讀政治經濟學。

有關顧孟餘在留學期間的事蹟，所留下之史料不多，我們只能依賴零星的紀錄重建這一段歷史。1907年7月初蔡元培談到他和齊宗頤（壽山，1875–1965）、錢方度（軼斐）等人到柏林時曾得到顧孟餘的協助，為其聘請德語教員，又因顧的介紹認識了薛頌瀛（字仙舟，1878–1927）、賓步程（1880–1943）、韋增瑛（1890–1975，薛頌瀛之甥女，後來嫁給顧孟餘）等人，而得到許多照顧：

到柏林後，我與齊、錢二君同寓，齊君本通德語，錢君善英語，我得兩君助力不少。齊君本譯學館學生，他的同學顧君孟餘（兆熊）留德已數年，諸事熟悉，我等所請的德語教員，均顧君所代選代訂。又由顧君而認識薛先生仙舟（頌瀛）、賓君敏陔（步程）。薛先生愛國好學，自奉甚儉，攜他的甥女韋增瑛女士留學，常自購蔬菜，借房東廚房自烹。最惡同學中的遊蕩者，對於娶西婦的人，尤時時痛罵，憫我初學德語的艱苦，排日為我講德語的文法，而囑我為彼講中國古文，作為交換條件，我得益不少。¹⁴

13 〈各省遊學彙誌〉，《東方雜誌》，第2卷第11號（1905年12月），頁294。其中的張謹（字仲蘇，1879–？）於1905年前往德國留學，是萊比錫最早的中國留學生之一。他和齊壽山在留德期間對蔡元培多有照應。張後來轉到柏林大學攻讀法律，1913年學成回國。先後任京師學務局局長、直隸教育廳長、上海國立同濟大學校長（1927–1929）、教育部大學委員會委員、北平大學區教育行政院普通教育處處長、河北大學校長等。

14 蔡元培，《蔡元培自述》（北京：中國言實出版社，2015），頁62–63。薛仙舟，廣東香山人，返國後創辦上海國民合作儲蓄銀行，開中國信用合作之先河。賓

1908年8月蔡元培自柏林遷往萊比錫，才較少與顧孟餘接觸。

此外，檔案之中僅有留德期間，顧孟餘向清政府的學部申請一筆250馬克的實習經費：「留德學生顧兆熊稟稱，學生本年暑假經大學教授薦往尼溫堡電氣工廠實習三個月，每月需付廠費七十五碼克，另付保險費，合計共二百五十碼克。此等費用實在學費之外，請特別發給」。學部的回答是「飭知向章不准於學費外另行給費」。顧又寫信表示：「照德國工科大學章程，卒業前至少須實習一年，此次到尼溫堡實習，係由大學教授介紹，並經學生與該工廠訂立合同，此項廠費實屬不能不付，仍請特別開支」，然而學部仍表示「與定章不符……礙難照准」。¹⁵這可能是促使顧從專攻電機工程轉為研讀政治經濟學的一個原因。

顧孟餘轉讀政治經濟學也可能因為受到當時德國「自然科學」與「精神科學」並重之觀念的影響，他本身對文科亦很感興趣。他頗有語言天才，外語能力甚佳，德語、法語和英語都很流利。¹⁶在個性上，顧深沉內斂而多謀，有人形容他是一位「天下獨一無二之深謀遠慮之人」、¹⁷「為人沉默寡言，從不自矜其學以驕人，與語十問不一答，即答亦唯唯而

步程，湖南東安山口鋪鄉人。1900年，赴德國柏林工科大學留學，學習機械工程。留學期間，曾擔任留德學生會會長，並參加同盟會。歸國後，歷任粵漢鐵路局工程師、南京機器製造局局長兼火藥局局長、湖南公立工業高等專門學校校長、湖南造幣廠廠長、水口山礦務局局長等職務。

15 〈筭代辦歐洲遊學生監督學生顧兆熊所請另給廠費之處礙難照准文〉，《學部官報》（1909），第108期，頁7。尼溫堡可能是Nienburg。

16 「當民國八、九年……杜威、羅素來華，有一次北大第三院馬神廟大廳授學位大典是由顧先生，他發表一篇講詞，除了中文外立即譯為英語，及法語，聽得我們瞠目結舌」。梅恕曾，〈孟餘先生的生平與往事〉，《傳記文學》，第29卷第1期（台北，1976年7月），頁7。再者，也有文獻記載蔣介石與通曉德文的蘇聯顧問鮑羅廷的重要談話均由顧來翻譯。蔣描寫他與鮑羅廷對話經過，他說「當時我問他的時候，是顧孟餘作翻譯的，他竟答不出話來」。這是蔣於4月18日在慶祝國民政府建都南京歡宴席上演講中所說的。見淞滬警察廳政治部編，《護黨救國重要文件彙編》（上海：淞滬警察廳政治部，1927年5月），頁48。亦參見〈蔣介石與鮑羅廷〉，《大公報》，天津，1927年5月10日，第2版。

17 望塵生，〈顧孟餘之錦囊〉，《社會日報》，上海，1931年5月27日，第2版。

已，不著邊際，豈所謂深藏若虛者耶」、¹⁸「他說話不多而要言不繁，面無笑容頭腦冷靜」；¹⁹缺點則是因多慮而畏縮，「慮事太深，不免畏葸」。²⁰在外觀上，顧孟餘給人的印象極佳，「身軀挺健，衣履華潔，每日必修面刮鬚丰度俊整」，且生活習慣上十分洋化，喜簽名而不喜蓋印，喜食西餐，²¹「不嗜菸酒賭博，飲食尤為慎重，雖市肆飲水，亦不隨便服用」。²²

留歐期間，他因認同孫中山之革命理念，於1910年時加入中國革命同盟會，並與蔡元培等革命黨人有所往來。1911年10月辛亥革命爆發時，蔡元培接到吳稚暉函，「以武漢消息告我，並言或者是一大轉機，我輩均當盡力助成」，²³於是蔡元培在10月19日從萊比錫到柏林，宣傳革命並從事募款。蔡元培記載在柏林「每日總往同學會，與諸同學購報傳觀，或集資發電，大家都很熱烈地希望各省響應就是了」。²⁴蔡又「晤同學俞大純、李倜君及顧兆熊等」，眾人對時局及未來行動發表了一些議論。李儻(1884–1965)主張「宜即時研究何以能使我新政府容易為外國所承認」；²⁵顧孟餘提出「在歐洲辦一報紙，為鼓吹機關」；俞大純(1883–1941)則主張急發電報。²⁶蔡元培認為「李、顧二君之所主持皆於

18 汲惛，〈顧孟餘悄然去國〉，《天文台半週評論》，第36期（香港，1937年3月17日），頁4。

19 胡耐安，〈我所認識的顧先生〉，《傳記文學》，第29卷第1期（台北，1976年7月），頁21。

20 《譚延闓日記》，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典藏，1927年5月9日。

21 「顧孟餘於未顯貴時，甚至在最窮困之時，每飯必西餐，否則食不下嚥」，又他不喜蓋印而喜簽字，直到任鐵道部長後，始備有一印。見〈洋化之顧孟餘氏〉，《社會日報》，上海，1933年2月14日，第1版。再者，報紙上曾報導「有人說過：顧孟餘先生不吃中國飯，孫哲生先生不寫中國字」，〈奔走和平的孫科（附圖片）〉，《申報》，上海，1946年10月14日，第12版。

22 德器，〈顧孟餘廉介自處〉，《照明彈》，第1期（廣州，1946年6月），頁8。

23 蔡元培，《蔡元培自述》，頁201–213。

24 蔡元培，《蔡元培自述》，頁213。

25 李儻，字倜君，當時就讀於柏林大學法學院經濟系，也是中國留德學生會主席。

26 俞大純曾留日，後赴德國，畢業於柏林工科大學。20世紀30年代初擔任交通部隴海鐵路局局長。

目前鄂事非直接有效者，直接有效者，惟俞君之策」。議定之後大家分頭合作，於是「李倜君用朱筆畫出革命新聞及其要語，顧夢漁則節譯其大要而書於黑板，其他同學爭閱報」，「或歡躍、或嘆惋、或懷疑，均發於革命速成之希望心」。眾人將重要消息，「作文數篇，送登各報」，又「集款發電予本國各省當局，促其響應革命」。蔡元培在柏林住了約一個月，曾將德國學界響應革命的情況寫信告訴吳稚暉。²⁷

1911年11月28日蔡元培自德國返國，抵達上海。²⁸顧孟餘也大約在1911年底自德國柏林大學畢業，返回中國。²⁹隔年春天他與同是留德的「時髦女性」韋增瑛女士結婚，由蔡元培證婚。³⁰韋女士「母家固富有，奩資頗豐也，顧因無經濟之憂，得以注力事業」，且韋氏對顧一生照顧備至，被譽為「賢內助」，「顧孟餘先生讀書讀到入迷時，飯不吃了，顧太太強制他去吃，卻許可他帶著書，吃和讀同時來，讀書也可以下飯，怕的是因此會營養不足，壞了身體，所以太太得替他挾菜，偶或故意挑好的送到他嘴邊，藉此來分散他的精神，是一種調劑作用」、「每出，其夫人必預將一切所需文件，預置皮包中，不必顧自為操心也」、「勤勞扶助，七十年如一日，至老彌篤」（圖2.2）。³¹

27 陶英惠，《蔡元培年譜》，頁216-217。蔡元培赴柏林響應革命一事亦見高平叔編著，《蔡元培年譜》，頁2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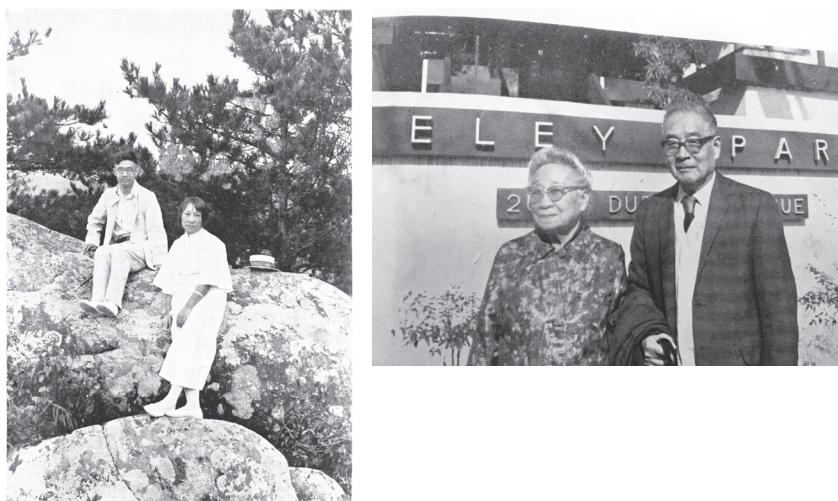
28 高平叔，《蔡元培年譜長編》（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8），第1卷，頁391。

29 根據「軍事委員會委員長侍從室人事登記片稿」，〈顧孟餘〉，《軍事委員會委員長侍從室》，台北，國史館藏，典藏號：129-200000-3519。學歷欄記載「德國柏林大學畢業」。

30 韋增瑛於1904年10月赴德國留學。當時《女子世界》曾報導此事：「韋增瑛女士，亦於十月下旬，乘德國船前往德國留學。女士習英文多年，今子身渡大西洋求學，異日學成歸國，裨益於我女學界者當不淺矣」，見〈留學一斑〉，《女子世界》，1904年第10期（上海，1904），頁72-73。蔡元培在1911年11月返國，1912年任教育總長。國史館編，〈顧孟餘先生事略〉，《國史館現藏民國人物傳記史料彙編》，第17輯，頁567；胡美琦，〈紀念顧孟餘夫人〉，《傳記文學》，第29卷第1期（台北，1976年7月），頁29。

31 孔曰，〈顧孟餘內助得人〉，《攝影畫報》，卷9期10（上海，1933年3月），頁11。顰顰，〈顧孟餘之賢內助〉，《福爾摩斯》，上海，1933年6月11日。陶希

圖 2.2 顧氏夫婦合照



辛亥革命成功之後，孫中山就任臨時大總統，蔡元培為首任教育總長，曾邀請顧孟餘為司長，他力辭未就。3月袁世凱當政之後，繼續任用蔡元培為教育總長，1912年5月5日蔡元培依據教育部官制，以部令委任一廳三司各科科員。顧孟餘受聘為教育部承政廳編纂員，負責「編纂法令」、「輯譯書報」，與他同時擔任編纂員的還有湯中(1882–?)、張軼歐(1880–1938)、常福元(1874–1939)等人。³²後蔡因反袁，辭去教育總長職(1912年7月14日獲准)，並於9月16日攜眷赴德，從事學術交流，並考察學校事務、研究教育改革。³³蔡元培赴德時顧孟餘以秘書的身份攜帶新婚夫人隨行。1912年9月27日，一行人途經新加坡時，顧孟

聖，〈記顧孟餘先生〉，《傳記文學》，第21卷第2期(台北，1972年8月)，頁30。查子仁，〈一談顧孟餘〉，收入好文章社編輯，《好文章(二集)》(上海：好文章出版社，1948)，頁54。

32 〈教育部委定職員名單〉，《大公報》，天津，1912年5月5日，第3版。陶英惠，《蔡元培年譜》，頁319。高平叔，《蔡元培年譜長編》，第1卷，頁443。

33 陶英惠，《蔡元培年譜》，頁357–383。

餘陪同蔡元培在華僑總商會演講；顧夫人則陪同蔡夫人至商會與總領事館拜會；午後學務總會開歡迎會，「請蔡君演說，賓主交歡。茶會後，蔡、顧二君即登船，該晚啟程赴歐」。³⁴離開新加坡後，船途經檳城靠岸，與汪兆銘見面，「停舟僅兩點鐘，精衛及諸同志強邀登陸」，再赴德國。³⁵蔡、顧兩人同在萊比錫大學訪問，顧後因健康關係搬到柏林，兩人至1913年6月2日方返國。³⁶蔡元培在自述中曾回憶起他與顧孟餘夫婦重返德國的經歷，以及顧孟餘在此期間對他的協助：

我長教育部的時候，蘭普來西氏曾來一函，請教育部派學生二人，往文明史與世界史研究所相助，我已於部中規定公費額二名，備擇人派往，人選未定，而我去職。南歸後，預料政治上的糾紛方興未艾，非我輩書生所能挽救，不如仍往德國求學；適顧君孟餘亦有此意；我遂函商范君靜生，告以與顧君同往德國之計劃，請以前所規定之公費額二名，分給我與顧君二人，范君復函批准。我遂於□月□日偕黃夫人及威廉、柏齡啟行，顧君亦偕其夫人同行。記得所乘之船為奧國的「Africa」（阿非利加號）。偕婦孺作遠遊，尚是第一次，幸有顧君及顧夫人助為照料，得減除許多困難。到德國後，仍住萊比錫。蘭普來西要求我供給中國文明史材料，我允之。擬由我起中文稿，由顧君譯成德文。但顧君因肺疾，與萊比錫之空氣不相宜，醫院的設備亦不完善，不得已而遷柏林。譯事用通訊，亦無妨。³⁷

34 〈記事：新加坡商學各界歡迎蔡元培君〉，《教育雜誌》，第4卷第8號（上海，1912年11月10日），頁57。該則新聞記載「顧夫人在德國留學有年，語言文字，均臻佳妙」。

35 蔡元培，〈蔡元培致吳稚暉函〉（1912年11月26日），《蔡元培文集》（台北：錦繡出版社，1995），卷十，書信（上），頁240-241。

36 陶英惠，《蔡元培年譜》，頁394。

37 蔡元培，《蔡元培自述》，頁95-96。范靜生即范源濂（或作范源廉，1876-1927），蔡氏辭職後繼任教育總長。

根據蔡元培的日記，1913年蔡、顧之間有許多書信來往，蔡元培去柏林時也請顧氏夫婦協助安排住宿。³⁸經過半年期間的異鄉共事，顧孟餘和蔡元培的關係變得更為密切。

顧孟餘在任職教育部，至陪同蔡元培出國的期間，也開始在報刊上發表文章。1912至1913年，他曾為章士釗(1881–1973)在上海所辦的《獨立週報》撰寫了多篇社論與專論，討論政治、經濟問題，並介紹新思想。《獨立週報》由章士釗與同盟會會員王無生(1880–1914)合辦，從1912年9月創刊到1913年7月章士釗投身二次革命時終刊，歷時10個月，出版發行40期。這一個報紙是在章士釗參與《民立報》到主編《甲寅雜誌》之間的一個刊物。此報模仿英國報紙*The Spectator*（《旁觀者》，1828年開始在英國發行的一個週刊雜誌）的精神，高揚「獨立」旗幟，以「袖手旁觀」和「不偏不倚」超然而立的姿態，針對時勢，闡發學理，消除黨見，開言論之正風。³⁹過去研究章士釗的學者幾乎沒有注意到章、顧兩人此時期的合作，以及在思想上的相互呼應。顧孟餘在《獨立週報》上以「夢漁」和「顧兆熊」的名字發表了多篇論文（參見附錄）。他所討論的議題包括政黨、官吏、幣制與國民生計等。此外，他也介紹了追求「生計之平均」的社會主義各家學說，並評論其得失。顧氏的基本立場是中國應建立英國式的政黨政治、歐洲式的文官制度、穩定之貨幣制度、精確的貿易統計（模仿「海關報告」），以鼓勵生產，增進財富，改善民生。⁴⁰至於中國是否應追求社會主義的理想呢？他認為此一理想的實現

38 蔡元培著、王世儒編，《蔡元培日記》，頁224–230。

39 龍敏賢，〈章士釗與《獨立週報》〉，《出版科學》，2004年第4期（武漢，2004），頁67–68。森川裕貫著、袁廣泉譯，《政論家的矜持：章士釗、張東蓀政治思想研究》（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7），頁54–56。

40 夢漁，〈社論：官吏問題〉，《獨立週報》，第1年第10號（上海，1912年11月24日），頁19–22。顧兆熊，〈論政黨（未完）〉，《獨立週報》，第2年第4號（上海，1913年2月2日），頁31–33。顧夢漁，〈論政黨（續）〉，《獨立週報》，第2年第5號（上海，1913年2月9日），頁27–29。夢漁，〈社論：說幣制（其一）〉，《獨立週報》，第2年第11號（上海，1913年3月23日），頁14–18。夢漁，〈社論：中國國民生計之現狀〉，《獨立週報》，第2年第14–15號（上海，1913年4月13、20日），頁39–42。

需有政治與生計之「前提」，「必在憲法成立，法律修明、民權穩固之後」，而目前中國「無憲法之國，人民呻吟於強權之下，生命廉恥尚不遑顧，何暇以爭生計之平均乎？」再者，顧氏強調平均財富的目的是「增長全社會之幸福，促進全社會之文明」，而貧富不均如太嚴重固然影響社會進化，然「使社會毫無貧富之別，則優秀者困於生計，不能盡其心力，以專其物殊之業，社會無分工之益，則偉人奇才，無出類拔萃之機，此亦阻礙社會之進化者也」。⁴¹這些觀點和章士釗「追求英國式政治制度」的想法應該是比較接近的，⁴²也與後來顧孟餘對資本主義、馬克思學說利弊的討論有一致之處。1913年7月，爆發二次革命，顧孟餘和章士釗、蔡元培等人一樣，參加了討袁大業。⁴³9月革命失敗，參與者多流亡海外，顧則密赴上海。1914年，德國西門子公司聘其為工程師，自滬北上，遷居北京，1914–1916年間顧「為西門子電廠整理機械，兼改善工廠管理法，使西門子廠營業，得以蒸蒸日上」。⁴⁴

第二節 任教北大

1916年11月8日蔡元培自法返國，抵達上海，12月26日被任命為北京大學校長。1917年1月4日蔡元培到校就職，開始從各地網羅人才，充實北大師資。蔡元培擔任校長後聘請了陳獨秀（1879–1942）、胡適（1891–1962）、王星拱（1887–1949，字撫五）、陳大齊（1886–1983）等

41 夢漁，〈社論：論社會主義〉，《獨立週報》，第2年第12號（上海，1913年3月30日），頁18–20。

42 森川裕貫著、袁廣泉譯，《政論家的矜持：章士釗、張東蓀政治思想研究》，頁32–57。

43 丁仕原，〈「二次革命」中的章士釗〉，辛亥革命網，<http://www.xhgmw.org/html/xiezhen/renwu/2017/0210/23221.html>（2017年3月29日檢閱）。

44 顰顰，〈顧孟餘之賢內助〉，《福爾摩斯》，上海，1933年6月11日。西門子公司（Siemens）於1847年由維爾納·馮·西門子（Werner von Siemens）建立，是德國的一家跨國企業，在電機和電子領域為全球業界先驅，當時販賣馬達、電話、電扇、燈泡等商品。

人至北大任教。⁴⁵此時顧孟餘亦收到北大的聘書。⁴⁶如上所述，蔡與顧淵源極深，顧孟餘是清末譯學館的學生，而蔡元培亦曾任教於此；此外他與蔡同樣留學德國柏林、萊比錫大學，返國後顧曾服務於教育部，為蔡之下屬；蔡辭去教育總長之後，顧孟餘又陪同他出國考察，因此蔡在為北大招兵買馬之時自然想到顧孟餘。

1917年9月20日北大開學那一天，校長蔡元培主持開學典禮，介紹新聘諸教授。當天在場者除了顧孟餘外，還有胡適、陶孟和 (1887–1960)、王星拱、何炳松 (1890–1946)、陳大齊、朱家驊 (1893–1963) 等人。⁴⁷當時北大的教授中與顧孟餘齊名者，首推1917年7月自美返國、至北京大學哲學系任教的胡適。1918–1919年時顧孟餘在北大為三級教授，月薪為220–240銀元，在北大教授薪資結構之中屬於中上。本科教授薪資從180銀元到280銀元，胡適、陳大齊 (1886–1983)、朱希祖 (1879–1944)、蔣夢麟 (1886–1964)、陶孟和、劉師培、馬敘倫 (1884–1970) 等人的薪資為教授第一級，月薪280元；朱家驊則為200元。⁴⁸

到北大之後，顧擔任文科德國文學系及法科經濟系之教職，後又擔任德文系主任、經濟系主任與教務長，他在校時教授「德文」與「經濟學原理」、「錢幣與信用」、「社會主義及合作」等課程。⁴⁹顧氏上課頗受學生

45 參見蔡元培，〈我在北京大學的經歷〉，《東方雜誌》，第31卷第1號（上海，1934年1月），頁5–13。

46 根據國史館藏「軍事委員會委員長侍從室人事登記片稿」，顧孟餘開始任職北大的時間為1916年9月。

47 胡頌平編，《朱家驊年譜》（台北：傳記文學出版社，1969），頁9。胡頌平編，《胡適之先生年譜長編初稿》（台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84），冊1，頁295。

48 有關北大教授的薪資參見陳明遠，《陳明遠文集一：文化人的經濟生活》（西安：陝西人民出版社，2013），頁162–165。江勇振，〈舍我其誰：胡適，第二部，日正當中，1917–1927〉（台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2013），頁88–90。陳初輯，《京師譯學館校友錄》，「北京大學職員履歷表：七年九月造」，頁13–16。

49 1917年顧孟餘擔任北大教授兼文科德文門主任，至1920年2月改組之後，他為德國文學系系主任，兼圖書委員長。見申江，〈北京通信：北京大學新組織〉，《申報》，1920年2月23日，第7版。1919年經濟學門改為經濟系，馬寅初是第一任系主任（1919年9月–1921年8月），自1921年9月至1926年3月顧孟餘

歡迎，演講時「發言厚重有力，雖三千人之廣座，全場皆可聽聞」。⁵⁰他的學生梅恕曾（1901–1982，1919年入北大經濟系）回憶：「顧先生的教學方法，純屬德國大學的教授方式，沒有固定的課本，但參考書卻非常多。他上經濟學原理這門課，不僅國語標準、聲音宏亮，而且材料之豐富，尤非一般人所能想像。所以每逢顧老師上課，都是座無虛席，一定要安排在北河沿北大第三院的大教室才容納得下。來聽講的，除本系選課學生外，其他系的學生都有，甚至還有許多校外人士也來『揩油』旁聽……顧老師的課程，其票房價值之高，實在驚人」。⁵¹

顧孟餘授課的內容不但豐富，且井井有條，「先生汲取奧地利心理學派之菁華，並採取德國麥克斯威爾博與佛蘭茲奧本海末爾之社會歷史學方法，剖析經濟結構」。⁵²周德偉（1920年秋就讀北大預科，外語選德文，1923年秋升入本科經濟系）回憶顧氏教書時的情景：

顧孟餘先生主講經濟學原理，上第一堂課時就問：「你們為何要學經濟？」學生皆寂靜無聲，顧先生曰：「經濟學不是教你們去發財，不是教你們經營工商業或從事銀行會計業務的，而是教你們如何經世濟民。習經濟須高瞻遠矚，注意全盤人民各方面的經濟活動，加深其瞭解，從而培養自己成為社會的領導人才，此一學科，需要輔助的知識甚多，牽涉到社會學、倫理學、法學、哲學、史學等知識，缺一不可，你們無如此等志願或無力奠定鞏固的基礎，改習他科還來得及！」

為北大經濟系主任，他的前任系主任為馬寅初（1882–1982），繼任者為余文燦（1892–？）。參見北京大學經濟學院編，《北京大學經濟學院（系）百年圖史》（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2），頁15–16。

50 德器，〈顧孟餘廉介自處〉，《照明彈》，第1期（廣州，1946年6月），頁8。

51 梅恕曾，〈五十年前的一段往事〉，《傳記文學》，第29卷第2期（上海，1934年1月），頁83。

52 陶希聖，〈記顧孟餘先生〉，《傳記文學》，第21卷第2期（台北，1972年8月），頁29。這兩位德國學者指Max Weber（1864–1920）與Franz Oppenheimer（1864–1943）。

此一觀點與周德偉本來的抱負與父親對他的期許相配合，而使他對顧孟餘十分尊敬。周德偉又說：「顧先生不是一個雄辯家，但授課條理井然，他雖有講義，但發出不多。從一〇〇一頁習起，他構思謹慎，一字不妥，就不發出，一年之內，只發出百餘面講義。道林紙精印。但指定應習參考書不少，包括孟格爾 (Carl Menger)、耶芬斯 (Stanley Jevons) 的《經濟學原理》，並勸學生，如外文程度不佳，可讀嚴 (註：嚴復) 譯《原富》。又告知學生，馬夏爾的書篇幅太大，而且局限於能以貨幣計算的專家，目前不必理會」。⁵³

在德語教學方面，顧孟餘編有《德意志科學論文選讀》，「此書包含包爾生、龐巴維克、孟格爾、維塞爾 (Friedrich Wieser) 及韋伯 (Max Weber) 等名家的論文約卅餘篇，顧先生於每一篇之末寫一作者簡歷及學說提要」，對學生幫助很大。當時有一位德國籍的語文教師海理威 (Hellwig) 甚至稱讚「顧先生的德文比德國教授更好」。⁵⁴

從《北京大學日刊》所保留的北大校務訊息來看，顧孟餘在北京大學語文教育上扮演重要的角色。當時北大主要的外國語文有英文、法文與德文等，分別由胡適、賀之才 (1887–1958，留學比利時、法文系教授，曾翻譯羅曼·羅蘭的作品為中文) 與顧孟餘等三位擔任教授會的主任。

53 馬夏爾 (Alfred Marshall, 1842–1924) 為現代經濟學之父，任教於英國劍橋大學。1890 年出版《經濟學原理》(The Principles of Economics)，成為經濟學的經典著作。

54 周德偉，《落筆驚風雨：我的一生與國民黨的點滴》，頁 138。海理威「本青島德國總督府秘書，與教務長顧孟餘先生善，日本佔據青島後顧先生乃迎之教德文，初教席勒 (Friedrich von Schiller) 《威廉·泰爾》(Wilhelm Tell) 劇本，彼不解華語，必須耐心聽講，後教歌德 (Wolfgang von Goethe) 之《浮士德》(Faust)」(頁 125)。根據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的北洋政府外交檔，海理威在 1919 年時擔任私立正志學校教員，因校長擔保，免因「敵僑」身份而被遣送離境。「仍請將正志學校德教員海理威等免予遣送由」(1919 年 2 月)，〈遣送敵僑〉，《北洋政府外交部歐戰檔》，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藏，檔號：03-36-070-01-042。1923–1925 年間海理威在北大德文系擔任教師，教授作文、尺牘、戲曲等課程。參見〈註冊部布告：海理威先生所授德文系一二三年級功課均提前考試〉，《北京大學日刊》，期 1239 (北京，1923 年 5 月 15 日)，第 1 版。

顧孟餘所負責的德文教授會成員有王孟群、朱家驊、李彥士、何德美、高雲渠等人，該會需「開會討論下學年德文教案並審定各科各班應用書籍」。⁵⁵1918年時，北大的德文課分為「德文班」與「德文兼習班」（以德文為第二外國語）。主要採用的教科書有：Karl Krause的 *Deutsche Grammatik für Ausländer jeder Nationalität*、A. L. Meissner的 *The Public School German Grammar*、Emil Otto的 *German Conversation-Grammar* (29th Edition) 等書，此外亦採用商務印書館出版之《德文讀本》。⁵⁶顧孟餘在任教北大期間也積極地發表經濟學方面的學術著作。他在《國立北京大學社會科學季刊》上發表了兩篇文章，即〈錢幣理論與本位政策〉、〈現代銀行信用之性質〉，同時也撰寫數篇書評，介紹歐美最新的學術研究成果，如〈學術書籍之紹介與批評——幾種近年出版的關於社會主義的著作〉等，可見他對歐美學界之動向十分熟悉（參見附錄）。再者，顧孟餘也擔任系主任，負責系上的行政工作。他在擔任經濟系系主任期間，對北大經濟系的建立貢獻很大。北大經濟學院的教授張友仁（1923–2015）曾提到北大原來就有經濟門，顧孟餘按照德國的制度將它改造成北大經濟系，「他從德國留學歸來，按照德國大學的模式來建立北大經濟系，而且同時建立了北大經濟系的圖書館，那個時候不叫圖書館，叫Arkives[Archives]是指文獻資料室的意思。後來翻譯成中文先叫經濟記錄室，後來叫法政經濟記錄室。位址在北河沿北大第三院，有一個尖頭的小鐘樓，這個樓現在還在，不過那個院子現在歸機械工業部使用了。」⁵⁷

此外，顧孟餘也積極支持蔡元培所提出來的治校理念，並參與校內社團。首先是參加「進德會」。1918年1月，蔡元培呼籲在北大成立進德

55 顧兆熊，〈德文教授會開會通告〉，《北京大學日刊》，期83（北京，1918年3月5日），第2版。

56 顧兆熊，〈德文教授會紀事〉，《北京大學日刊》，期91（北京，1918年3月14日），第3版。顧兆熊，〈顧兆熊先生致丁性存、楊丙辰、高雲渠諸先生函〉，《北京大學日刊》，期205（北京，1918年9月10日），第2版。

57 張譯元、王曉萍，〈珍貴的回憶——張友仁教授訪談錄〉，「北大經濟學院」，<http://econ.pku.edu.cn/displaynews.php?id=15176>（2017年5月6日檢索）。此一訪談是在2011年4月6日進行的。

會，該會源於1912年吳稚暉、李石曾、汪兆銘於上海所發起的一個組織，後來蔡又在南洋公學同學會、譯學館校友會再次提倡，而未能實行。在蔡元培擔任北大校長之後，乃「試之於此二千人之社會」。北大進德會的會員分甲、乙、丙三種：甲種會員以不嫖、不賭、不納妾為條件；乙種會員除以上三戒外，還加不作官、不當議員二戒；丙種會員除以上五戒外，則更加上不飲酒、不食肉、不吸煙三戒（後來改為會員不分等，以不嫖、不賭、不納妾為基本條件，後五戒隨意選擇）。⁵⁸至五月中該會會員已達468人，職員有92人、教員有76人，而學生有301人。⁵⁹蔡元培以身作則，加入乙種會員。顧孟餘則與李大釗、陳獨秀、許德珩、沈尹默、章士釗、馬寅初、陳大齊、沈兼士、王星拱、張桐文、馬敘倫、鄧之誠、羅家倫、周炳琳、朱家驊、羅常培、胡適、陳漢章、王寵惠、張國燾、朱希祖、俞同奎、馬裕藻、張大椿、辜鴻銘等成為甲種會員。至於堅持最高之道德標準，同時也遵守不飲酒、不食肉、不吸煙的丙種會員，則有梁漱溟、李石曾、張崧年、傅汝霖等人。⁶⁰

顧孟餘支持蔡元培的另一個理念是「溝通文理，合為一科」。蔡元培與顧孟餘留學德國之時「適當專家學風已越過頂巔，綜合觀察又復抬頭之時」。⁶¹蔡元培發現文理分科之流弊，「文科學生，因與理科隔絕之故，直視自然科學為無用，遂不免流於空疏」、「理科學生，以與文科隔絕之故，遂視哲學為無用，而陷於機械的世界觀」。他整頓文理兩科，並將職業專科，如商工科歸併他校。北大提出大學本科「融通文理兩科之界線，習文科各門者，不可不兼習理科中之某種（如習史學者兼習地

58 〈北京大學之進德會〉，《北京大學日刊》，期50（北京，1918年1月19日），第2–4版。

59 蔡元培，〈校長致進德會會員公函〉，《北京大學日刊》，期145（北京，1918年5月24日），第1版。

60 湯銳，〈民國初年的進德活動——以上海、北京為中心的考察〉（天津：天津師範大學歷史文化學院碩士論文，2011），頁42。〈蔡元培發起的北大組織：進德會〉，http://article.netor.cn/article/memtext_12403.html（2017年3月25日檢閱）。

61 顧孟餘，〈追悼蔡子民先生特輯——憶蔡子民先生〉，《東方雜誌》，第37卷第8號（香港，1940年4月），頁63。

質學，習哲學者兼習生物學之類），習理科者，不可不兼習文科之某種（如哲學史、文明史之類）。⁶²再者，蔡元培也主張思想與研究自由，「開闢以科學方法整理國學之途徑」。⁶³為了推行蔡元培上述之構想，顧孟餘在《北京大學日刊》發表了一篇〈文理兩科合併之理由〉。在該文中他提出了三點文理兩科應合併之理由：第一，關於科學本體之理由，自然科學與精神科學兩者「互相補助之處極多」，且有些學科是以「二者為基礎」，故不宜強分。第二，關於大學教育之根本理想，大學教育不在傳授「雜俎之知識，及片面之技術」，而是追求真理，並形成「合己身與宇宙之現象及意義」的世界觀與人生觀，再以此貢獻於中國社會，為國民「精神之前導」。第三，在教學與研究方面，教員之間應有「聯合之精神……有屬於一體之自覺，俾保持互助之觀念」。他認為學生亦應如此，理科學生與文科學生之間彼此交際、相互影響，則「眼光見識，必可大為增長。即對於其專治之科，亦可免偏狹之弊」。⁶⁴這一篇文章已表達出顧氏基本的觀點，亦即同時注重精神與物質，並強調個人對國家與社會之責任。

顧氏在北大期間也參與王光祈（1892–1936）發起的「工讀互助團」。1919年3月北京工讀互助團由王光祈發起，李大釗、蔡元培、陳獨秀、胡適、顧孟餘等17人聯署，並募集經費，希望達到教育和職業合一的理想。該團規定：第一，團員須每天工作四小時。第二，團員生活必需之衣、食、住，由團體供給；團員所需的教育費、醫藥費、書籍費，由團體供給；惟書籍為團體公用。第三，工作所得歸團體公有。然因經濟危機、意見紛歧，工讀互助團很快就解散了。胡適批評這一種方式「不切實際」，一方面工作時間太長，沒時間讀書；另一方面所做的工作又是粗笨、簡單與機械的，無法引出樂趣。他們只做了「工」的計劃，不

62 〈本校擬在專門以上各學校校長會議提出討論之問題〉，《北京大學日刊》，期240（北京，1918年10月30日），第3版。

63 顧孟餘，〈追悼蔡子民先生特輯——憶蔡子民先生〉，頁63。

64 顧兆熊，〈文理兩科合併之理由〉，《北京大學日刊》，期223（北京，1918年10月9日），頁2–3。

曾做「讀」的計劃。胡適認為工讀只是「靠自己的工作去換一點教育經費」，不必去構想一個烏托邦式新生活的試驗。⁶⁵顧孟餘也對此有所反省。他在演講中表示：「兩三年前，本校同學王光祈先生，提議組織工讀互助團，那時我也是發起人之一。我對於這件事情的動機，表極端的同情；但對於這件事情的辦法，懷根本的疑惑。……我所疑惑的，且工且讀的辦法，工作所得代價，不夠自己生活讀書的消費，而同時所讀的書，不能盡求學的效能，故工讀互助團，終歸試驗失敗了」。顧孟餘提出了另一個辦法，他從德國的麵包店得到靈感，主張學生除了研究學問之外，應學會一項謀生的技能。而他認為求學不必連續下去，可以分階段來做。譬如中學畢業，如無力升學，先進職業學校，擁有專門技能，開一間店賺錢，存夠了錢再去升學。讀大學時如沒錢，可以請兩年假去學習一項技能，賺夠了錢再來讀書。⁶⁶顧孟餘所提出的工讀互助方式顯示他們的觀點仍奠基於資本主義社會，與陳獨秀、李大釗、惲代英、毛澤東、施存統等人質疑工讀互助團背後的社會與制度，而擬從事的共產主義運動，以求根本的解決，有很明顯的不同。

顧孟餘有關馬克思學說的觀點發表於1919年5月出版的《新青年》第6卷第5號（實際出刊時間為1919年9月，圖2.3）。這一期是由北大圖書館主任李大釗（1889–1927，字守常，河北樂亭人）主編的「馬克思研究專號」。1919年5月，為紀念馬克思誕生101周年，李大釗一方面協助《晨報》開闢「馬克思研究」專欄，連續刊載了馬克思的〈勞動與資本〉等文章，同時也編輯了《新青年》的專號。顧孟餘與李大釗均為北方人，兩人私交甚篤，故顧氏答應撰文。

這時《新青年》仍未成為中共宣傳馬克思主義的機關刊物，⁶⁷李大釗所編的專號只是個人行為，與組織無關。在此期專號之中，顧孟餘所寫

65 胡適，〈工讀主義試行的觀察〉，《胡適全集》，卷1，頁701–706。

66 顧孟餘講演、陳東原述，〈顧孟餘氏之工讀互助論〉，《晨報副鐫》，北京，1922年11月27日，頁1–2。

67 中共成立於1921年7月。《新青年》要到第8卷（1920年9月1日）開始方為中共上海發起組所主控，逐步從同人刊物向黨刊過渡。歐陽哲生，〈五四運動的歷史詮釋〉（台北：秀威資訊科技有限公司，2011），頁211。

圖 2.3 《新青年》，第6卷第5號目次

新青年	
(第六卷第五號目次)	
馬克思學說	顧兆熊 四六〇
馬克思學說批評	凌霜 四六六
俄國革命之哲學的基礎	趙明輝 四七〇
樂	魯迅 四七九
詩	胡適 四八五
一瞥見	胡適 四八五
讀任公遺稿	胡適 四八五
鳥	胡適 四八五
讀孟餘詩一首	胡適 四八五
我為什麼愛白話詩	胡適 四八八

的〈馬克思學說〉一文列於篇首。過去許多學者都將此一專號視為李大釗藉此宣傳馬克思主義，「中國共產黨的早期領導人李大釗把馬克思主義作為救國救民的科學真理進行傳播，幫助人們認清中國革命的正確方向、探尋解決中國問題的正確道路，是馬克思主義大眾化的先行者」。⁶⁸這樣的論述其實並不適用於此一專號。的確，李大釗在同一期的專號中撰寫了〈我的馬克思主義觀〉，而在1919年8月，李大釗又針對胡適〈多研究些問題少談些主義！〉一文，發表〈再論問題與主義〉，提出「根本解決」的想法。⁶⁹然而如果仔細閱讀顧孟餘在《新青年》上的文章，會發

68 朱文通，〈李大釗與馬克思主義大眾化〉，《人民日報》，2011年7月7日，第7版。

69 有關這一爭論及對李大釗思想的影響，參見董國強，〈論「問題與主義」之爭前後的李大釗思想——對爭論性質的再探討〉，《社會科學研究》，2004年第4期，頁99–104。作者認為爭論發生時李大釗仍是溫和的改良主義者，他所認同的理想政治目標，包容在現有的「民主」、「憲政」制度框架之內。他對馬克思的「階級鬥爭」、「社會革命」、「奪取政權」等概念的理解，與後來流行的「槍桿子裡面出政權」、「XX階級打天下、坐天下」的理解有很大的差異。這可以部分

現顧孟餘將馬克思的觀點稱為「學說」，而非「主義」，其立場是學理之探討與反思，與李大釗與後來共產黨人秉持的「主義」觀點並不相同。顧文的內容主要是介紹馬克思的生平，以及他的唯物的歷史觀和經濟理論，如剩餘價值論、階級鬥爭論與革命論等。接著顧氏再介紹各國學者對馬克思學說之「詳覈」的批判，並認為「經過這種批判，馬克思學說的真意義固然明顯，他的缺點卻也昭著了」。⁷⁰ 顧孟餘對馬克思學說的想法是，此一理論有其成就、亦有其限制。首先他肯定馬克思思想「在歷史上的大意義」是「終古不能磨滅的」，亦即「他的功效，就是對於現代經濟制度的批判。自經他的批判，然後現代社會制度裡的弊病纔暴露出來」，而出現「現代社會制度的調劑方法」。然而另一方面，顧氏根據德國社會黨 (Social Democratic Party of Germany) 如卞斯天 (Eduard Bernstein, 1850–1932)⁷¹、達維德 (Eduard David, 1863–1930)、師培爾 (Max Schippel, 1859–1928) 等人的修正理論，認為「馬克思學說的嚴酷的格式，始終沒

解釋為何此時他願意邀約顧孟餘撰寫文章。汪榮祖則指出李大釗在接受馬克思主義之前，托爾斯泰 (Leo Tolstoy, 1828–1910) 人道主義與無政府主義對他的影響不可小覷。他反對暴力，主張基於愛與個人道德，以求邁向無階級、無政府的境界。汪榮祖，〈從文化與政治解讀五四前後的李大釗〉，收入黃克武主編，《重估傳統·再造文明：知識分子與五四新文化運動》(台北：秀威資訊科技有限公司，2019)，頁134–153。

70 顧孟餘撰寫此文的參考資料不詳，他可能依賴一些西文的作品再加以改寫。白瑜說「他是留德學生，在北大教書時，根據一本德文的《馬克思淺說》(英譯本 *People's Marx*) 寫成數千字的短文，將唯物史觀、剩餘價值、階級鬥爭要義分別的簡明剖析，告訴國人什麼是馬克思主義。他是反對馬克思之經濟學者，也是中國第一位有系統介紹馬克思學說的學人。」郭廷以、張朋園訪問，馬天綱、陳三井紀錄，《白瑜先生訪問紀錄》(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87)，頁51–52。 *People's Marx* 可能是指 Gabriel Deville, *The People's Marx: A Popular Epitome of Karl Marx's Capital*, trans. Robert Rives La Monte (New York: The International Library Publishing Co., 1900). 此書主要是譯介《資本論》而不談馬克思的生平，及他人對馬克思理論之評論。顧文所涉及的範圍更廣，因此顧孟餘應該還有參閱其他的作品。

71 胡漢民將此人的名字譯為「柏斯坦恩」，並稱他為「德國經濟主義修正派的領袖」。不過胡漢民並不贊成他的修正觀點。胡漢民，〈唯物史觀批評之批評〉，收入《唯物史觀與倫理之研究》(上海：民智書局，1925)，頁1–62。

經科學界的贊許……他的積極的、抽象的構造與偏狹的推測，卻是不與事實真相相符。馬克思價值論裡所用的論理，狠屬勉強；並且有根本矛盾的地方」。具體來說，顧孟餘反對「歷史的唯物主義」，他強調精神面與主動面，認為「人的歷史是人造的，人都有頭腦」，而其判斷不專受經濟因素之影響，而可以脫除經濟羈絆。其次，顧孟餘反對階級鬥爭論，他認為社會中階級分析的情況很複雜，「決不像馬氏理論中所稱的那麼簡單」，而且他相信「聯合互助」，階級競鬥固然是事實，卻在文明各國競鬥之形式漸漸緩和，而可以尋得「調和的方法」。再其次，顧孟餘也反對以「無資產階級」的「革命論」，來推翻資本主義的私有財產制、建立「社會主義的共有財產」。他認為社會主義的實行只能預測大概的趨勢與條件，而無法按照一個嚴格的模型、或根據預想的詳細程序而去實現，而「國家社會的漸漸演進，和教育等公正事業的積極建設，都可以促進社會理想的實現」。⁷²由此可見，顧孟餘的思想和馬克思主義者並不相同，反而與胡適的觀點比較類似。⁷³在同期專號中還刊登有具無政府主義思想傾向的北大學生凌霜（1898–1988，即黃文山）所寫的〈馬克思學說的批判〉一文，性質與顧文類似。此文也是「把馬氏學說的缺點和他的好處寫出來」，而他對馬克思學說的批評「對於他的經濟論和唯物史觀，以德人E. Bernstein的批評為根據。對於政策論的批評，以俄人Z. Kropotkin的批評為根據」。⁷⁴總之，1919年李大釗所編的《新青年》「馬克思研究專號」仍具有包容開放、討論學理的精神，才會出現兩篇批判馬克思學說的文章。1922年5月5日「北京大學馬克斯學說研究會舉行

72 顧兆熊，〈馬克思學說〉，《新青年》，第6卷第5號（北京，1919年5月），頁450–465。

73 顧孟餘的觀點受到梁漱溟的肯定，1920年梁漱溟在《東西文化及其哲學》上表示，「顧孟餘先生作〈馬克思學說〉其中批評唯物史觀道：……改革與否，並如何改革，這是視人的意志而定的，並不是機械的、被動的」（《新青年》，第6卷第5號）。這個意思不是很同我們相近了麼？」梁漱溟，《東西文化及其哲學》（上海：商務印書館，1922），頁44–45。

74 凌霜，〈馬克思學說的批判〉，《新青年》，第6卷第5號（北京，1919年5月），頁466–469。

馬克斯誕生百又四週年紀念，李大釗、顧孟餘、陳啟修、高一涵講演」。⁷⁵在學理上，顧當時是少數懂得社會主義、共產主義、共產黨的人。⁷⁶

顧孟餘雖批評馬克思學說，然而卻認定社會改革有其重要性。他積極支持透過群眾力量而實現社會的改善。在五四學生運動爆發之後，他立即在報紙上發表言論，支持學生運動。他認為學生示威運動之基礎是一種基於「人之主動的活潑的理性」所形成的「真道德」或「主動的道德」，而表現在「決鬥」的精神，此一決鬥即「社會進步的原動力」。他認為人們針對社會中不合理之現象，「社會之分子，得人人自由用其臂腕之力以從事建設新秩序，且剷除其阻礙，此乃國民最高的義務」。⁷⁷此一觀點顯示顧孟餘十分支持北京學生運動，肯定以群眾運動的方式追求政治理想。這樣的想法與胡適的觀念有所差異，促使顧孟餘後來親自參與了許多群眾運動、加入國民黨，並進而走出校園、下海從政。

75 郭廷以編著，《中華民國史事日誌》（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79），第1冊，頁638。該研究會成立於1920年3月，由李大釗領導，發起人有王有德、羅章龍等19人。1922年時有會員150餘人。有關北京大學馬克思學說研究會運作情況與會員名單參見：王效挺、黃文一主編，《戰鬥在北大的共產黨人》（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1），頁2–4，644–648。

76 1926年胡漢民曾說「關於馬克思主義，我懂得少，顧孟餘懂得多」，他並建議將赴俄國留學的白瑜向顧請教馬克思主義。顧建議白瑜讀兩本書，「一本是《通俗馬克斯》（*People's Karl Marx*）、另一本是《列寧死後的俄國》（*Russia since Lenin Died*）」。白瑜，〈出身世家而愛惜羽毛的顧先生〉，《傳記文學》，第29卷第1期（台北，1976年7月），頁16。《通俗馬克斯》的原書參見本章註70。《列寧死後的俄國》則是Max Eastman, *Since Lenin Died* (New York: Boni and Liveright Publishers, 1925)。周德偉也說：「當時國民黨及國民政府內懂得共產黨者惟顧孟餘一人，凡鮑羅廷之發言之含有政略不同於國民黨者，顧屢屢駁之。如是鮑羅廷亦憚孟餘，凡顧之任何發言，必令其黨徒紀錄呈閱」。周德偉，《落筆驚風雨：我的一生與國民黨的點滴》，頁198。

77 顧兆熊，〈對於北京學生運動的輿論：一九一九年五月四日北京學生之示威運動與國民之精神的潮流〉，《晨報》，1919年5月9日，第6版。亦刊於《每週評論》，第22期（北京，1919年5月18日），頁4。

第三節 參與校務：五次出任教務長

顧孟餘在北大任教之時也開始參與校務。北大在蔡元培到任之時，校務是由「北大的校長與學監主任、庶務主任等少數人主持的」。蔡元培到校後推行改革，落實「教授治校」。他首先「設評議會，恢復學長的權力」，校內的大事均須由評議會議決。其次他強化原有的教授會，教授會的主任由成員互推，並組織各種委員會（如預算、聘任、圖書、出版等）。第三「學長制取消，代之以教務長」。教務長地位隆重，產生的方式是由教授會主任互推，其地位遠高於由校長任命的總務長。⁷⁸顧孟餘對蔡元培制訂的民主的教授治校制給予很高評價：

先生長北大數年，以政治環境關係，在校之時少而離校之時反多。其離校之時，校務不但不陷停滯，且能依照計劃以進行者，則以先生已樹立評議會及各種委員會等之制度。此制度之精神，在以教授治理校務，用民治制度決定政策，以分工方法，處理各種興革事宜。然而非校長之清公雅量，則此制度無由樹立；非師生絕對信賴校長，此制度不易推行也。⁷⁹

由此可見制度改革與北大校務推展之關係。

顧孟餘從1920年開始因行政能力強、聲望高，曾五次出任教務長，亦常連任評議會主席。在此期間蔡元培常常長期出國，由蔣夢麟代理校長，並由蔣夢麟與顧孟餘兩人共同處理校務（蔣夢麟不在則由顧孟餘代理）。他的學生李壽雍（1902–1984）回憶「我在民國九年進入北大，一直讀到民國十五年畢業，其中兩年是預科。我在入校時，顧先生在北大任教務長兼德文系主任，在我進本科經濟系時，顧先生任教務長兼經濟系主任，這都在蔡元培長北大的期中。蔡先生長北大時的制度，各系

78 江勇振，《舍我其誰：胡適，第二部，日正當中，1917–1927》，頁60–61。周德偉，《落筆驚風雨：我的一生與國民黨的點滴》，頁171。

79 顧孟餘，〈追悼蔡子民先生特輯——憶蔡子民先生〉，頁63–64。

系主任，由各系教授選任，教務長則由各系主任選出。……在這樣一個校園裡被選為教務長，實非易事。可是顧先生卻一再連任」。⁸⁰

的確，在北大歷史上五次出任教務長的情形並不多見。1920年4月底，教務長改選，計有各系教授會的主任11人參加，顧孟餘以八票當選，接替陶孟和的位置，「陶履恭因期滿辭職，前由校長召集各系教授會主任開選舉會，投票結果顧孟餘得票最多當選」。⁸¹顧因此以教務長的身份來襄助校長，並與校內其他教師如胡適等人共同處理學校行政與學生事務。如1920年12月之後北京政府好幾個月發不出高校與中學教職員薪水，然而1921年1至9月，校長蔡元培在多事之秋出國考察，⁸²由蔣夢麟代理校長。1921年3月開始，各校出現教師罷教、學生罷課。⁸³4月15日，八所高校在北京美術學校舉行的「八校代表聯席會議」，選出北大教授馬敘倫為聯席會主席，顧孟餘亦以北大代表的身份參加，就經費積欠問題與政府談判「索薪」問題。六月中又舉行大規模的遊行，顧孟餘抱病參加。⁸⁴馬敘倫回憶：

80 李壽雍(1902–1984)，江蘇鹽城人，畢業於北京大學、英國牛津大學、倫敦大學。曾任國民黨江蘇省黨部委員、指導委員、常務監察委員，國立中央大學教授，湖南大學文法學院院長等職。1948年6月至1949年5月任國立暨南大學校長。1961年3月至1971年7月任中華民國考選部部長。李壽雍，〈顧先生早年在北大的一些回憶〉，《傳記文學》，第29卷第1期(台北，1976年7月)，頁13。

81 靜觀，〈北京通信：上課前之北大狀況〉，《申報》，1920年5月20日，第6版。〈本校新聞：教務長選舉會紀事〉，《北京大學日刊》，期595(北京，1920年4月30日)，頁2。「四月二十九日下午四時，教務長選舉會開會，到會者十一人。選舉結果，顧孟餘教授得八票、陳惺農教授得二票、蔣夢麟教授得一票。顧教授當選為教務長」。陳惺農即陳啟修(1886–1960)，為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家，後任漢口《中央日報》總編輯。

82 參見〈二十日歡迎蔡校長大會顧孟餘先生之歡迎詞〉、〈蔡校長演說詞〉，《北京大學日刊》，期847(北京，1921年9月22日)，頁1；蔡元培表示：「兄弟這次出去，差不多九個多月。這中間學校裡出了許多想不到的事情，我在外邊，不能同諸位一樣的盡責任，諸位偏勞了」。

83 江勇振，《舍我其誰：胡適，第二部，日正當中，1917–1927》，頁112–116。

84 顧孟餘此時得了肺病，病情十分嚴重。6月15日胡適記載：「夢漁又病，已入醫院」，至八月底他仍在西山養病。胡適著、曹伯言整理，《胡適日記全集》(台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2004)，第3冊，頁113、300。

我們專門以上八校的教職員在女校集合了，整齊了隊伍，直向教育部去請教育部長馬鄰翼，同赴總統府請願……我們到了新華門，我回頭一看才見得我們陣容的壯盛，原來平常不肯輕輕出來的北京大學教務長顧孟餘先生也參加了陣闖（他有肺病的，所以平常群眾運動，他總不參加），可見得各校教職員真有團結的精神，也認識運動的意義。⁸⁵

1921年6月28日，胡、顧與丁燮林(1893–1974)、李四光(1889–1971)、王世杰(1891–1981)等人一同商量學潮的處理方式，並提出「善後辦法」，後由教育總長范源濂出來調停，至7月中問題才得到解決。⁸⁶7月底至8月初胡適南下南京、上海，顧、胡兩人有電報與書信往來，討論學校行政、招生與教育事業，並擬籌款編譯書籍或辦自修大學。⁸⁷9月6日，蔣夢麟亦南下上海與蔡元培聯繫，「其校長職務、託由顧孟餘代為執行」。⁸⁸9月18日蔡元培返回北京，下午胡適與顧孟餘同至蔡宅「談甚久」。19日，顧孟餘、胡適、顏任光、陳世璋等人又在蔡先生家中談大學的事情，決定要「破釜沉舟」，商定圖書館募捐與主任、教務長改選等事。⁸⁹

1921年9月底，教務長改選，顧孟餘以九票再度當選。他力辭連任，想要請胡適接手，而胡適也不願意，顧只好就任。⁹⁰在教務長選舉

85 馬敘倫，〈對於敬師運動的感想〉，《馬敘倫言論集》（大連：大眾書店，1947），頁167–168。馬鄰翼（1874–1938），回族，時為教育部次長，代理部務。

86 胡適著、曹伯言整理，《胡適日記全集》，第3冊，1921年6月28日，頁141；1921年7月9日，頁187；1921年7月14日，頁196–201。

87 同上，第3冊，1921年8月8日，頁267；1921年8月12日，頁273；1921年8月23日，頁291；1921年8月31日，頁300。

88 一士，〈八校上課後之京學界〉，《申報》，1921年9月14日，第10版。

89 胡適著、曹伯言整理，《胡適日記全集》，第3冊，1921年9月18日，頁316；1921年9月19日，頁317。

90 選舉結果顧孟餘九票、胡適三票、陶履恭一票。〈校長通告〉，《北京大學日刊》，期650（北京，1921年9月26日），頁1。

過程中兩人似乎暗中較勁。胡適在日記中寫到「大學選舉教務長，孟餘當選。前夜蔡宅商議時，孟餘力辭連任，故他們要我幹此事。我也知道有些人的推我未必出於誠意，但我也曾力辭。我也要看看他們的把戲。今日舉我的票數少於那夜的人數；這是我意料之中的。孟餘是熟手，自然最適宜。舉出後，他推辭不肯連任，但他的理由不能成立，故我駁他，勸他不要辭了」。⁹¹ 1921年10月11日，北大開學，在典禮上校長蔡元培首先演說，提倡「活潑進取」與「堅忍耐勞」的精神。其次由教務長顧孟餘演說，強調大學不是職業學校，要「研究高深學問」、「要注重體育，因為要有強健的身體，才有偉大的精神」。⁹² 蔡元培也邀請胡適致辭，他足足說了30分鐘，主旨在如何提高大學的程度，並希望學生「宜有決心，以後不可再罷課了」。⁹³ 說完之後，胡適似乎覺得不妥，又說「說的話，也有不應該我說的。有許多話應該是子民先生或孟餘先生說的。但我起立時，學生即大鼓掌歡迎；我上台，他們又鼓掌。他們這種好意，我只能用老實話報答他」。⁹⁴ 由此可見當時學校的行政領導雖是蔡元培、顧孟餘等人，然在學生心目中胡適非常受歡迎，地位不比兩人來得低。10月底，顧孟餘因太忙，想請胡適代理教務長，胡適則以身體不好，「自顧尚不暇，如何能代他人」而婉拒。⁹⁵ 隔年初，顧孟餘辭去教務長，1922年4月胡適以四票當選教務長，多於顧孟餘的兩票，4月底胡適上任。⁹⁶ 該年十月，北大因徵收講義費事件，要按頁收費，數百學生馬上集合示威，反對此項規定，甚至包圍校長室。蔡元培因而請辭，北大全體職員發佈「暫時停止職務宣言」，使全校陷於無政府的狀態。在

91 胡適著、曹伯言整理，《胡適日記全集》，第3冊，1921年9月23日，頁321。

92 〈北大開學典禮之演講〉，《民國日報》，上海，1921年10月14日，第6版。

93 胡適著、曹伯言整理，《胡適日記全集》，第3冊，1921年10月11日，頁374。

94 同上，1921年10月11日，頁375。

95 同上，1921年10月28日，頁384。

96 同上，1922年4月25日，頁537；1922年4月29日，頁549。4月25日的選舉胡適得四票當選，其他人之票數如下：陳世璋兩票、陶孟和兩票、顧孟餘兩票、馬裕藻一票。〈校長通告〉，《北京大學日刊》，期1012（北京，1922年4月27日），頁1。

此過程中胡適、顧孟餘也多次與蔡元培討論解決辦法。後來由顧孟餘出來「解圍」，「簽字擔任講義費事，大家方才散去」。⁹⁷

在1923–1924年間，北京學潮不斷。1923年春天胡適因病南下杭州休養，又忙於《努力週報》的事，一度擬辭去教務長一職，顧孟餘於2月9日去信表示：「來信提及辭職一節，果一提出，對外示分裂之象，對內有拆台之嫌，弟與夢麟皆以為不可……弟為子民先生計，此次事變，各校表示同情犧牲不少，迄今不但無勝利之可言，且各校基礎相繼動搖，以情誼言，當此時機，實不宜忽然遠去，不知兄意云何？」（圖2.4）⁹⁸胡適接到信後方打消辭意，不過他仍在南方養病，至該年年底方北上。

1923年3月30日教務長再度改選，顧孟餘以七票當選，另外兩位候選人王星拱得了三票、陳啟修得一票。⁹⁹上述顧孟餘致胡適信中所謂「事變」的起因是教育總長彭允彝（1878–1943）干涉財政總長羅文幹（1888–1941）的司法案件，使北大校長蔡元培憤而辭職出京（1923年1月），先去上海，7月再赴歐洲考察；¹⁰⁰彭又發布「大學條例」（1924年2月23日），要求各大學設校董會。「學界方面既見部派校董中難以失意官僚、無聊政客，又明白了『大學條例』的背後的黑暗勢力與黨派利用，頗表示不滿」，因而群起抵抗，反對政治干涉教育。北大由評議會選出王星拱、陳大齊、顧孟餘等專任研究，在1924年3月9日發表宣言，表示「北京大學全體教授反對教育部所頒國立大學條例，不承認國立學校有設置校董之必要」。¹⁰¹1924年4月25日，教務長改選，顧孟餘以八票

97 胡適著、曹伯言整理，《胡適日記全集》，第3冊，1922年10月20日，頁883–884、891。有關北大講義費事件的經過，參見江勇振，《舍我其誰：胡適，第二部，日正當中，1917–1927》，頁119–122。

98 顧孟餘，〈顧孟餘致胡適〉，收入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中華民國史研究室編，《胡適來往書信選》（香港：中華書局，1983），上冊，頁205。

99 〈本校布告〉，《北京大學日刊》，期1203（北京，1923年4月2日），頁1。

100 〈蔡元培辭職後之宣言〉，《東方雜誌》，第20卷第1號（上海，1923年4月），頁145–147。

101 朔一，〈大學條例又引起了學潮〉，《東方雜誌》，第21卷第7號（上海，1924年4月），頁5–8；〈時事日誌〉，《東方雜誌》，第21卷第7號（上海，1924年4月），頁156。

圖 2.4 1923 年 2 月 9 日 顧孟餘致胡適函 (節錄)



當選，而王星拱、胡適、王世杰等人都只得到一票。¹⁰² 1925年3月16日教務長選舉，顧孟餘再次以八票當選，其他兩位候選人陳大齊得兩票、王星拱得一票。¹⁰³ 10月，顧與胡適等17人當選為北大新的評議員，顧孟餘得了48票，高居第一。¹⁰⁴

總之，從1917至1925年，顧孟餘在北大擔任德語和經濟學的教授，而胡適則為哲學系教授，就理念上來說兩人都傾向自由主義與資本主義，對於許多問題的看法也有類似之處。1920至1925年的六年間，顧孟餘五次出任教務長，1922年則由胡適擔任教務長。兩人也同時是北大評議會的成員。在此期間蔡元培多次出國，出國時由蔣夢麟代理校長，而顧孟餘與胡適則是當時協助蔡元培、蔣夢麟處理北大校務的關鍵人物。

第四節「坐而言」還是「起而行」：胡、顧分道揚鑣

顧與胡在北大期間除了在校務方面合作之外，也參與校外的政治活動，而兩人的分歧也開始變得十分明顯，其中有關簽署〈我們的政治主張〉一事即反映出兩人政治觀點的不同。

1922年5月胡適在《努力週報》第2期發表的〈我們的政治主張〉一文。¹⁰⁵ 這篇文章的主旨在「議政」，主張建立憲政、公開、有計劃的「好人政府」，以保障個人自由與個性發展。此事的起源其實是研究系的林長民(1876–1925)與具有學者背景之北洋政府官員王寵惠(1881–1958)、

102 〈本校布告〉，《北京大學日刊》，期1457(北京，1924年4月29日)，頁1。

103 〈校長布告〉，《北京大學日刊》，期1649(北京，1925年3月18日)，頁1。

104 參見〈校長布告〉，《北京大學日刊》，期1792(北京，1925年10月28日)、期1793(北京，1925年10月29日)。

105 相關背景之分析請參見潘光哲，〈胡適與《努力週報》的創辦〉，收入李金銓編，《自由的理解與實踐——民國時期知識分子與報刊》(台北：政大出版社，2008)，頁81–108；潘光哲，〈《我們的政治主張》及其紛爭：1920年代中國「論述社群」交涉互競的個案研究〉，收入李金銓編，《報人報國：中國新聞史的另一種讀法》(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13)，頁147–188。

羅文幹等人邀約蔡元培等人「組織一種研究政治社會的團體」、「發表對於現今各種大問題之意見」，¹⁰⁶以解決裁兵理財、軍閥混戰(直奉戰爭)的亂象。這一件事情涉及北大教授與研究系之間的結盟關係。1920年代初期以梁啟超(1873–1929)為首的研究系想要聯合南北建立全國的政治網絡，他一方面聯絡江蘇教育會與東南大學，另一方面也與北洋故舊(如王寵惠、羅文幹等)、國民黨人聯繫。此外，梁啟超有出掌北大之企圖，因此北大教授也是研究系想要爭取合作的對象。¹⁰⁷1920年3月至8月之間，梁啟超等人非常積極的與胡適接觸，討論合作的可能性，雙方並共同邀約羅素(Bertrand Arthur William Russell, 1872–1970)來華訪問。¹⁰⁸這些活動引起陳獨秀等人的疑慮，因而去信質疑胡適(和陶孟

106 胡適著、曹伯言整理，《胡適日記全集》，第3冊，1922年4月22日，頁529。

107 當時兩派之間的關係有分有合，例如胡適對梁啟超「機會主義」的作風不滿，且認為梁一生所犯的錯誤在於出任北洋的官職。不過兩人對聯省自治運動意見倒是十分接近。張朋園，《梁啟超與民國政治》(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06)，頁207–208；有關研究系聯絡南北之政治活動，及梁啟超對北大校長的興趣，參見丘文豪，〈梁啟超的政治面向〉(台北：師大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2013)，頁40–61。

108 從胡適的書信、日記來看，1919–1922年間他與研究系有許多的接觸。1919年6月胡適擬邀約杜威來訪時「林宗孟一系的人，也發起了一個『新學會』；籌款加入」。(致蔡元培)，《胡適全集》，冊23，頁236。1920年初期開始梁啟超通過丁文江、林長民的介紹與胡適、陶孟和接觸。3月21日，梁任公從歐洲返國不到兩週，胡適與梁啟超見面，胡適日記記載當天下午六時「宗孟宅飯，初見梁任公，談」(《胡適日記全集》，第2冊，頁665)。這應該是兩人首次見面，是在林長民家安排的飯局。此後雙方互動頻繁。1920年3月27日，一早他與張慰慈送林長民至公園。5月6日，胡適送杜威至天津，下午他與梁啟超見面，「見梁任公。他談做中國史事，頗有見地」(第2冊，頁703)。8月27日梁又主動邀胡適發表政治宣言：「梁伯強家飯，有梁任公、藍志先、蔣百里、蔡、蔣、陶等。任公談主張憲法三大綱：(1)認各省各地有權自定自治憲章，(2)採用『創制』、『免官』等制，(3)財政問題。他很想我們加入發表，我婉辭謝之。」(第2冊，頁739)梁伯強是研究系的要人梁善濟(1861–1941)；藍志先是藍公武(1887–1957)，也是研究系的要員。8月30日，胡適又與梁任公等人見面：「梁任公兄弟約，公園，議Russell事。飯後與夢麟、伯強在公園吃茶，談甚久。」(第2冊，頁742)上文中的「公園」為中央公園。

和)，「南方頗傳適之與孟和兄與研究系接近，且有惡評……我盼諸君注意此事」，¹⁰⁹不過胡適卻否認了他與研究系的關係，認為這是「絕對無稽的謠言」。¹¹⁰

其實這一件事並不盡然「無稽」，此時胡適與研究系之間維持了若即若離的關係。1922年4月底，胡、蔡兩人就北大與研究系合作一事有所討論，蔡元培表示擔心此舉會受到研究系之操縱，「宗孟為研究系頭領，恐不好拉入」，「弟告以有此等頭領在內，外人即以為此舉全是某系作用，而以亮疇等為傀儡，發言將不足取信」。¹¹¹4月27日，林長民再次與胡適見面，希望胡適「起草作宣言」。胡適在考慮了蔡元培的意見之後決定主動參與，但又覺得不希望被研究系「拖下水而於事無濟」。¹¹²他於5月11日起草了〈我們的政治主張〉，主張「好人」參政，組成「好政府」為政治改革的目標，日記中寫這「是第一次做政論，很覺得吃力」。¹¹³完稿之後胡適打電話給李大釗，隔日約了幾位「好人」在蔡宅開會。這一天上午來開會並連署胡適之文章者計15人，顧孟餘也參加了此次聚

109 1920年初期開始梁啟超的研究系與胡適接觸，引起陳獨秀和他周圍的新的共產黨員的注意。1920年12月16日，陳獨秀因而寫信給胡適與高一涵，請他們注意。錢玄同與李大釗也聽到了這個消息。1921年3月，陳望道在致周作人的信中將《新青年》南方同仁對胡適的不滿和盤托出。他們提出許多證據質疑胡適的政治態度及其與研究系的諸多關係。參見歐陽哲生，《五四運動的歷史詮釋》，頁228–233。

110 胡適，〈致陳獨秀〉（寫於1921年初），《胡適全集》，卷23，頁287。

111 胡適著、曹伯言整理，《胡適日記全集》，第3冊，1922年4月22日，頁530。亮疇為王寵惠。

112 同上，1922年4月27日，頁539。

113 胡適「好政府主義」其實已經醞釀了約一年了。1921年6月18日，他與安徽籍的舊國會議員汪建剛談話時為了反對「無政府主義」，提出「有政府主義」與「好政府主義」。後來胡適即開始構思「好政府主義」的觀念，而先後在8月5日、8月14日與10月22日在學校主講「好政府主義」。胡適主張「好政府主義實行的條件：（1）要有一個簡單明白、人人都可懂得的公共目標——好政府。（2）要一班「好人」都結合起來，為這個目標作積極的奮鬥。好人不出頭，壞人背了世界走！」。胡適著、曹伯言整理，《胡適日記全集》，第3冊，1921年8月5日，頁259–262。這些觀點與〈我們的政治主張〉基本上是一致的。

會：「十一時，在蔡宅開會，到者：梁漱溟、李守常、孟和、孟餘、湯爾和、徐伯軒（未約他，偶相值）、經農等。他們都贊成了，都列名做提議人。蔡先生留我們吃飯；飯後他們都散了，我獨與蔡先生閒談。三時，王亮疇、羅君任也來，他們略有討論，修改了幾處，也都列名。連知行、在君、王伯秋、文伯和我，共十五人。」後來因故，簽署人數有所出入，胡適表示「下午，孟餘自行取消，加入一涵、慰慈，共十六人。」¹¹⁴這一個宣言於兩天之後在《努力週報》第2期刊出（圖2.5）。出版之時署名者計有16人，提議人的名字與頭銜依序是：

蔡元培	國立北京大學校長
王寵惠（亮疇）	國立北京大學教員
羅文幹（君任）	國立北京大學教員
湯爾和	醫學博士
陶知行	國立東南大學教育科主任
王伯秋	國立東南大學政法經濟科主任
梁漱溟	國立北京大學教員
李大釗（守常）	國立北京大學圖書館主任
陶孟和	國立北京大學哲學系主任
朱經農	國立北京大學教授
張慰慈	國立北京大學教員
高一涵	國立北京大學教員
徐寶璜（伯軒）	國立北京大學教授
王 徵（文伯）	美國新銀行團秘書
丁文江	前地質調查所所長
胡 適	國立北京大學教務長 ¹¹⁵

114 同上，1922年5月12日，頁569。

115 同上，1922年5月14日，頁575–576。

如果比對前後兩個名單，可以發現除了顧孟餘是自行退出，另外被胡適等人排除掉的簽署者主要是研究系的林長民與蔣百里(1882–1938)，剩下的簽署人幾乎都與北大有關。這很可能是蔡元培的主張，突出該宣言與學者之關係，並與研究系有所區隔。宣言發出之後，梁啟超與林長民對此很不滿意，認為胡適與蔡元培「有意排擠他們研究系的人」，並調侃胡適說「我們不怪他，他是個處女，不同意同我們做過妓女的人往來。但蔡先生素來是兼收並蓄的，何以也排斥我們？」¹¹⁶ 1922年9月22日，在顧維鈞家開茶會，討論新內閣成立以後的「政治計劃」，上述16人之中有三人入閣(王寵惠、羅文幹、湯爾和)。此次討論的焦點在於王寵惠的新內閣可否實現〈我們的政治主張〉一文中的理念。胡適與顧孟餘均參加了茶會。胡適積極地表達了意見，顧卻始終沒有開口說話。胡適日記記載：「這一次談論頗激烈，頗有點意思；可惜有許多人始終不肯開口，如孟餘、撫五、石曾、慰慈等。他們也許笑我們多事；我們也知道這班閣員是抬不起來的，但我們到了這個時候，不能不把死馬做活馬醫，只是盡人事罷了！」。¹¹⁷

無論如何，顧孟餘主動退出連署〈我們的政治主張〉一文，又在討論中沉默不語，是一件值得玩味之事。顧的性格深沉內斂而「多慮」，圖

116 同上，1922年5月14日，頁570。李大釗對於研究系與北大學者的合作，也有一類似的比喻。他在1921年初寫給胡適的信中說：「現在我們大學一班人，好像一個處女的地位，交通、研究、政學各系都想勾引我們，勾引不動就給我們造謠；還有那個國民系看見我們為這些系所垂涎，便不免引起點醋意，真正討厭」。見〈關於《新青年》問題的幾封信〉，收入張靜廬輯注，《中國現代出版史料甲編》(北京：中華書店，1954)，頁12。1922年5月27日，林長民又約胡適、蔡元培、梁啟超、張嘉璈等人吃飯，並希望胡適出來組黨「宗孟極力勸我們出來組織一個政黨，他尤注意在我，他的談鋒尖利得很，正勸反激，句句逼人」。胡適著、曹伯言整理，《胡適日記全集》，第3冊，1922年5月27日，頁596。

117 胡適著、曹伯言整理，《胡適日記全集》，第3冊，1922年9月22日，頁808–809。撫五為化學家王星拱(1887–1949)。

動是主動道德之復甦、活潑的理性之實現，更是社會進步的原動力。下文會談到，顧孟餘在擔任北大教授期間積極地參與、領導工人與學生等群眾運動。胡適則對五四學生運動發表了褒貶參半的評論。胡適對學生運動的態度表現出兩重性：一方面是同情與理解，肯定學生主持社會正義的熱情和學生運動的愛國性質，也鼓勵學生有效地參與社會政治事務。但是另一方面他則不支持、不倡導，更反對學生罷課。他說「單用罷課作武器是最不經濟的方法，是下下策。屢用不已，是學生運動破產的表現。罷課於敵人無損，於自己卻有大損失」。作為一個教育家，社會要求他履行教師的天職，教導學生勤奮學習，立志成才，而他認為罷課耽誤了求知時光。這種態度也由於胡適對直接參與政治不感興趣，他只想從知識分子獨立的立場對政治提出批判、議論，做一個「忠誠的反對者」。¹²⁰簡單地說胡適是一個思想較為激進而行動相對保守的人，而且願意為追求點滴的改革、階段性的目標而與政治權威妥協，而顧孟餘則在思想與行動上均較為激進，有打倒權威的傾向。總之，無論對於五四運動的評價、對於學潮、罷課的看法，乃至對參政的興趣等方面，胡、顧都抱持著不同的觀點。

其次，胡、顧的差異不只是觀點的不同，可能也涉及北大之內「法日派」與「英美派」的派系之爭，這種爭執在教務長選舉，以及校內評議會對許多問題的討論上都表現出來。顧孟餘在北大與蔡元培以及李石曾交情都很好，¹²¹顧、蔡之情誼上文曾述及，所以顧多次出任教務長並代理校長。此外蔡元培很依賴李石曾與北京政府交涉經費。¹²²李石曾與顧

120 呂實強，〈胡適對學生運動的態度〉，周策縱等，《胡適與近代中國》（台北：時報出版公司，1991），頁253-274。

121 有關李石曾與北大的關係，參見王月，〈李石曾與北京大學（1917-1929）〉（北京：北京大學歷史學系碩士論文，2011）。李石曾為李鴻藻的三子，1902年隨孫寶琦赴法國學習農學，1917年應蔡元培之邀，到北大教授生物學，又參與籌建生物學系，出版生物學書籍。

122 周德偉表示當時北大教授月俸280元，只有李石曾支領月俸360元，而且不教課，「蓋石曾乃前清宰相之子，與北〔洋〕政府之官僚多世交，北〔洋〕政府常欠發教育經費，蔡每請李交涉經費，李至財政總長或次長之官邸，臥在鴉片煙床

也有很深的交情。看在胡適等人的眼中，這些人是「陰險下流」的「法國文化派」，「此輩者，李石曾、顧孟餘、沈尹默也」。¹²³他們「結黨把持，傾軋夢麟的情形，聞之一歎。夢麟方倚此輩為心腹朋友呢！」。¹²⁴後來在1925年女師大風潮與北大脫離教育部事件，¹²⁵雙方人馬在北大的評議會開會，胡適與李石曾、顧孟餘、馬裕藻 (1878–1945)、朱希祖等人的意見也是針鋒相對，分屬不同陣營，多年之後，胡適仍記得此事。¹²⁶

總之，胡、顧兩人在政治方面的分歧日益明顯。在1924–1925年間，有關支持孫中山的「國民會議」還是支持段祺瑞政府的「善後會議」的選擇上也表現出兩人抱持著不同的想法。此一分歧後來更導致了顧孟餘加入國民黨，脫離北大、下海從政，以經世濟民為人生目標。當時不

上，與之閒談，不費絲毫之力即取得柒萬玖千元之支票（當時北大之每月經費數目）。蔡乃極有手段之人也。」周德偉，《落筆驚風雨：我的一生與國民黨的點滴》，頁171。

123 沈尹默 (1883–1971) 早年留日，為書法家與詩人，北大文學教授。他是《新青年》雜誌的編輯之一，新詩作品多發表於《新青年》。

124 胡適著、曹伯言整理，《胡適日記全集》，第4冊，1925年1月17日，頁297–298。

125 胡適，〈這回為本校脫離教育部事抗議的始末〉，《胡適全集》，卷20，頁119–126；邵建，《瞧，這人：日記、書信、年譜中的胡適 (1891–1927)》（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7），頁332。1925年8月18日北大評議會的投票中反對章士釗為教長，並主張北大脫離教育部的人有：李石曾、馬裕藻、朱希祖、沈尹默、譚仲達、馮祖申及顧孟餘。見〈時評〉，《甲寅周刊》，第1卷第6號（北京，1925年8月22日），頁2–8。

126 胡適在1931年曾回憶此一爭議，「北大評議會。我自從十四年秋天出席評議會與教務會議聯合會議和李石曾、顧孟餘等爭論之後，至今將六年……會所即是六年前吵架的會議室」。胡適著、曹伯言整理，《胡適日記全集》，第6冊，1931年3月26日，頁535；江勇振，《舍我其誰：胡適，第二部，日正當中，1917–1927》，頁122–126。胡適與馬裕藻的衝突也涉及北大之內胡適與章太炎弟子的恩怨，或新舊之爭。馬裕藻從1920年至1934年擔任國文系主任。1934年胡適與蔣夢麟聯手整頓國文系，導致林損 (1890–1940) 的去職與馬裕藻的下台。其後由胡適以文學院院長兼國文系系主任。參見桑兵，〈馬裕藻與1934年北大國文系教授解聘風波〉，《近代史研究》，2016年第3期（北京，2016年5月），頁32–55。

少知識分子如石瑛、朱家驊、王世杰、翁文灝、蔣廷黻等人都與他走了一條類似的「起而行」道路。胡適則選擇繼續留在北大教書，「坐而言」，議政而不參政。胡適一生不曾加入政黨，也不願意組黨。他希望能儘量維持知識分子的獨立角色，除了1938至1942年出任駐美大使之外，其他的時間胡適都留在學術界，以自由主義者的立場批判政治。顧孟餘與胡適代表二十世紀中國知識分子兩種不同型態的政治抉擇。

第三章

左黨要人(1924–1931)

第一節 書生從政：加入國民黨

顧孟餘早年最重要的經歷是從出國留學到返回北大任教，在北大他受到蔡元培的重用，與蔣夢麟、胡適等人齊名，是一位以教育、學術研究為專業的新式知識分子。¹1924年春天時，他的生活出現一個重要的轉折，他因蔡元培、李石曾、李大釗的介紹，與丁惟汾的支持，加入了國民黨，開始走向從政之路。行狀記載「先生素為冷靜沉潛之學者，至此轉為慷慨激昂之戰士」。²

1 經濟學家高廷梓(1895–1984)談到蔡元培在北大新舊學者兼容並蓄之時，即舉胡適與顧孟餘為新派學者之代表：「先生的博大淵深一般人是不会容易领略的。例如他延聘辜鴻銘任教授，同时又聘请胡適、顧孟餘、杜威、羅素諸先生講學，是一件不平凡的事。過去北大能成功為全國最高學府，實在是先生的宏大的精神所創造」，見高廷梓，〈追悼蔡子民先生特輯——悼吾師蔡子民先生〉，《東方雜誌》，第37卷第8號（香港，1940年4月），頁64。

2 〈顧孟餘先生事略〉，國史館編，《國史館現藏民國人物傳記史料彙編》，第17輯，頁565。周德偉，《落筆驚風雨：我的一生與國民黨的點滴》，頁151。有關顧入黨的時間仍有爭議，在胡疊寫的〈顧孟餘與國民黨〉一文，認為1926年國民黨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時顧仍未入黨，因于樹德、李大釗支持才當選中委，「于等乃力保顧為中委，雖經毛澤東反對，但李大釗來電推薦，故顧終得當選為中委，其實此時彼尚未入黨也。非黨員而當選中委，實開天下政黨未有之奇聞」。該文收入海天出版社編，《現代史料》（上海：海天出版社，1934），

顧氏加入國民黨之抉擇與他對現實的關懷與從政的意願密切相關（如上所述他認為經濟學者的使命是經世濟民），和上文提及的甘乃光、陳克文與李樸生等人加入國民黨有類似的動機。當時北大教授之中如石瑛、朱家驊、王世杰等人也做出了相同的選擇。其實顧氏從1923年開始，即以北大教務長、北京教育會會長的身份，積極參加了一些群眾集會。例如1923年7月，顧孟餘等北京教育會成員與直隸、湖南學界，共同通電，反對財政總長王克敏（1876–1945）「利用法國賠款案，向法國借款數百萬元，為助成大選之用」。³ 1924年1月26日，北京各團體在北大舉行「列寧遙祭大會」，與祭者共千人。在會中顧孟餘提議，請政府承認蘇俄，結果「全體一致通過」。⁴ 10月5日，在北京東交民巷的俄國駐華大使館舉行第一次升旗典禮，顧孟餘以北大教務長身份應邀參加，並在加拉罕大使之後登台演說，希望中蘇兩國聯合被壓迫民族共同奮鬥。⁵

此時國民黨亦支持中蘇友好，如上所述，1924年1月，孫中山在廣州召開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提出「聯俄容共」政策。其後，吳稚暉、李石曾、丁惟汾等人奉孫中山先生之命北上，與李大釗等人合作，發展國民黨在北方之組織，希望能結集同志，致力青年思想領導，以期匯合於三民主義國民革命之主流。1924年4月17日，汪兆銘曾為發展北方黨務與戴季陶與廖仲愷討論，他採納石瑛的觀點，認為：「北京為各省人才所聚，大學尤為社會運動之中堅，今委員中北大教授唯李守常、石蘅青二人，意欲多延北大教授入黨，以收薈萃人才之效。」石瑛

第一集，頁70–71。此刊物為陳立夫主辦，目的在攻擊汪兆銘與顧孟餘等人，顧此時是否仍未入黨之事待考。

- 3 〈反對王克敏向法借款聲〉，《大公報》，天津，1923年7月16日，第3版。1923年7月，王克敏就任高凌霨內閣財政總長。不久，在張作霖的反對下，王克敏僅任職一週便被迫辭職。10月，辭任中國銀行總裁。同年11月，直系曹錕大總統為解決金佛郎案，任命和該案關係密切的王克敏為財政總長。
- 4 〈昨日之列寧遙祭大會〉，《大公報》，天津，1924年1月27日，第2版。列寧（Vladimir Lenin, 1870–1924）逝世於1924年1月21日。
- 5 〈俄國大使館升旗盛況補誌〉，《大公報》，天津，1924年10月7日，第5版。

並主張在執行部下多留部長位置，以安置入黨之北大教授。⁶4月20日北京執行部成立，推動黨組織的擴展。南方的國民黨也積極地向北方發展。11月孫中山發表「北上宣言」，後赴日本神戶演講，並於12月底抵達北京，發表「入京宣言」，受到兩萬多民眾的歡迎。孫中山北上之後，「北方的學生群眾掀起了對中山的熱烈信仰」。⁷這時汪兆銘也因孫中山生病，代其四處演講，因汪的宣傳詞鋒工巧，贏得青年的同情與愛戴，「故將三民主義帶到北方，精衛是無可爭議的首功」。⁸國民黨內不少人看好汪兆銘日後將擔當重任，如譚延闓(1880-1930)就說：「汪……演說，語沉〔誠〕摯動人，孫先生後必以此子為巨擘矣」。⁹

當時加入國民黨手續很簡單，「加入的只是填了表格，附相片兩張，由介紹人送去，過幾天拿回像名片大小的黨證，即算完成了入黨手續」。¹⁰顧孟餘究竟何時加入國民黨，無法確知。我們只能推測大約是在1924年春天，當國民黨北上發展組織，成立北京執行部之時，他響應號召，參加了國民黨、投身汪陣營，並很快地在黨內具有「學者」、「左派思想家」的封號。¹¹影響顧孟餘入黨的第一個人是北大的同事李大釗。在

6 參見李雲漢，《從容共到清黨》(台北：中國學術著作獎助委員會，1973)，頁277-278。亦收入：〈汪精衛為北京黨務致戴季陶、廖仲愷函(節錄)〉，中共北京市委黨史研究室編，《第一次國共合作在北京》(北京：北京出版社，1989)，頁88-89。李守常即李大釗，石蘅青為石瑛(1879-1943)。石瑛於二次革命失敗後赴英國伯明罕大學學習礦冶，獲碩士學位，1922年回國，應蔡元培之邀任北京大學化學系教授。

7 周德偉，《落筆驚風雨：我的一生與國民黨的點滴》，頁163。

8 同上，頁193、163。

9 《譚延闓日記》，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藏，1925年9月27日。

10 高拜石，〈七老的誠與拙：丁惟汾清剛耿介〉，《新編古春風樓瑣記》(台北：正中書局，2002)，第12集，頁228。

11 共產國際對中國革命運動的報告書中均稱顧孟餘為「學者」與「左派思想家」。如1926年8月17日維經斯基同顧孟餘談話記錄之標題即為「謝爾蓋同學者的談話」，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譯，《聯共(布)、共產國際與中國國民革命運動(1926-1927)》(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1998)，上冊，第3卷，頁398。1927年5月28日〈羅易就中國形勢給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政治書記處和

孫中山生前，李大釗即向孫推薦顧孟餘，顧亦表示有入黨意願，而得到孫的認可。¹² 范予遂曾問邵力子(1882–1967)誰是顧孟餘入黨之介紹人，邵回答說：「或係李大釗先生介紹」。范又表示：「當時的高級知識分子贊成孫中山的聯俄、聯共、扶助農工三大政策而參加國民黨得〔的〕是極少數，顧孟餘以李大釗的影響而加入國共合作的國民黨」。¹³ 1926年3月12日，顧李兩人在北京三殿參加了左派舉辦的孫中山逝世一週年公祭活動，留下一張合影，可以見證兩人的友誼(圖3.1)。¹⁴

另外兩位影響顧加入國民黨的人也是他的北大同事——蔡元培和李石曾。蔡顧的關係上文曾述及，至於李石曾與顧的關係也十分密切，根據周德偉的說法李、顧兩家為世交。李石曾是前清軍機大臣李鴻藻(1820–1897)的幼子，「顧的祖父與李鴻藻同科進士，在朝亦為侍郎，父為府道，故自幼即同李的交情極密」。¹⁵ 蔡元培和李石曾介紹顧入黨的目的之一是希望將來顧能輔佐汪兆銘：「當時顧孟餘尚未入黨，蔡元培等觀察形勢，知汪精衛將來不論居何名義，總是孫先生最適宜的繼任人選，但汪太感情化，容易衝動，考慮事理欠周密，想覓一位深沉冷靜的

斯大林的書面報告)稱顧為「左派思想家顧孟餘」，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譯，《聯共(布)、共產國際與中國國民革命運動(1926–1927)》(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1998)，下冊，第4卷，頁280。

- 12 「顧與陳獨秀情感不治，與李大釗則頗要好。……適國父北上，顧乃要求李大釗先在國父面前打一個招呼……顧的加入國民黨……得到國父之認可」。萱，〈顧孟餘的籍貫與學歷之謎〉，《文飯》，第18期(1946年6月27日)，頁4。
- 13 范予遂，〈我所知道的顧孟餘〉，收入中國人民及政治協商會議全國委員會文史資料委員會編，《文史資料存稿選編：軍政人物下》，第20冊(北京：中國文史出版社，2002)，頁473。
- 14 張同樂，〈新發現李大釗、顧孟餘合影考證〉，《中國國家博物館館刊》，2015年第3期，頁134–140。根據顧頤剛的敘述，1926年3月12日北京有三場孫中山逝世紀念會，「左派在三殿開會，右派在中央公園開會，超然派在碧雲寺開會，予均未去」。顧頤剛，《顧頤剛日記》(台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2007)，第1卷，1926年3月12日，頁726。
- 15 周德偉，《落筆驚風雨：我的一生與國民黨的點滴》，頁166。此處對於顧孟餘父祖之敘述或可存疑，筆者利用中研院史語所「清代職官資料庫」搜尋，卻找不到顧姓、曾任侍郎而籍貫為浙江上虞者。

圖 3.1 顧孟餘與李大釗合照



人物輔佐他。最後選定顧孟餘，由蔡元培、李石曾介紹入黨。……蔡李介紹顧於汪，態度極為嚴肅，請汪遇事與顧商酌，故顧一入汪幕，即猶諸葛亮之於劉備」。此後他成為「汪之靈魂也」！¹⁶ 顧孟餘於入黨之初選擇投向汪而不親近蔣，可能也有他自己的考量。他清楚瞭解汪、蔣兩人性​​格之差異，汪是書生、蔣是軍人；顧認為汪較易受到他的影響，可以作為自己的「政治資本」，而「蔣非可運用之人，且其親信如吳稚暉、張靜江等已為老朽，陳果夫本綢緞店經理，毫無知識，羞與為伍。故對蔣除有普通禮敬外，一無衷誠之言」。¹⁷

16 周德偉，《落筆驚風雨：我的一生與國民黨的點滴》，頁166、337。蔡元培等人對汪的觀察與周佛海相同，周佛海說：「汪之短處，一在猶豫，一在衝動，而其長處則在頗能納言」。周佛海著、蔡德金編注，《周佛海日記全編》（北京：中國文聯出版社，2003），上編，1938年12月1日，頁203。

17 周德偉，《落筆驚風雨：我的一生與國民黨的點滴》，頁198。此處有關蔣中正與吳稚暉關係的記載可能有誤。吳稚暉早期與汪氏夫婦感情甚篤，1927年任

除了上述三人之外，顧孟餘入黨也與國民黨北京執行部的重要人物丁惟汾有關。丁惟汾為山東日照人，字鼎臣，早在1922年他即奉孫中山之命回山東成立平民學會，透過辦學，吸收青年知識分子與工人入國民黨。他又領導一個學生社團「孫文主義大同盟」，宣揚三民主義。此外，一個類似性質的學生團體「三民主義實踐社」則受顧孟餘的指揮，¹⁸這兩個團體之成員大部分為北大學生。當時參與者周德偉說「此等團體均非派系，因均崇信中山之主義也，丁顧之間感情又極融洽」。¹⁹中國國民黨一大改組後，丁惟汾是國民黨北京執行部與北京特別市黨部的主要負責人（1924年4月–1927年4月），與北京執行部組織部長及中國共產黨北方區委負責人李大釗合作，共同推動北方黨務工作。²⁰ 1924年3月

中國國民黨中央監察委員，他認為蘇聯與中共之聯繫危害中國未來，力倡清黨。之後吳極力挺蔣，成為蔣的心腹智囊。顧入黨之時蔣與吳稚暉關係仍不甚密切。

18 「三民主義實踐社」（亦稱「實踐社」、「中山主義實踐社」）是一個北大學生組織的社團，成立於1923年，主旨是吸收青年加入國民黨，該社辦有《實踐旬刊》，刊登批判馬克思理論的文章。李壽庸，〈顧先生早年在北大的一些回憶〉，《傳記文學》，第29卷第1期（台北，1976年7月），頁13。中共在一份〈中共北京地委國民運動工作報告〉（1927年2月10日）中曾將該社列為國民黨內「左派團體」，「可以說是清一色左派」，以鄧文輝、蕭忠貞、李壽庸為首領，社員有三百多人。中共北京市委黨史研究室編，《第一次國共合作在北京》，頁364–369。

19 周德偉，《落筆驚風雨：我的一生與國民黨的點滴》，頁166–167。

20 參見陳耀煌，〈北方地區的共產革命，1920–1927——一個組織史的考察〉，《新史學》，第26卷第1期（台北，2015年3月），頁123–125。國民黨北京執行部成立後，北方青年踴躍加入國民黨，並成立了若干小組。郭春濤、王仲裕等成立了孫文主義大同盟，並通過路友于、王仲裕把這個團體依附於丁惟汾。孫文主義大同盟是丁惟汾在國民黨北京執行部裡的一個小團體。延國符談到該團體的設立，以及丁惟汾在黨內依賴該團體與中共競爭，「時在北京有奮鬥經驗之各省同志，深慮共產分子將來之篡竊，亟謀維護本黨之辦法，體會先生之意旨，卻未敢明告先生，秘密歃血為盟，組織孫文主義大同盟（簡稱SL），初期加盟者，計有三十六人，籍貫幾遍全國各省。推出同志，分別深入青年農工群眾，與共產黨工作人員，在工作競賽方式下，爭取領導地位。李大釗曾以此事訴之先生，先生告之曰：青年運動、農工政策，為國民黨所決定的，國民黨

出任中國國民黨北京執行部組織幹事、北京特別市黨部籌備委員的延國符(1900-1975)在〈追述往事悼念丁老先生〉一文中指出，丁惟汾為要牽制國民黨內李大釗等共產黨的勢力，邀約北大教授顧孟餘和朱家驊入黨，以為抵制，「共黨首要李大釗，任教北京大學，講授唯物史觀，許多青年受其麻醉。先生想從學術思想方面，謀求抵制之策，乃秘密建議中央，勸請顧孟餘、朱騷先(家驊)兩教授加入本黨，共同領導北京青年運動，制服共黨，立收宏效」。²¹如上言屬實，顧孟餘入黨也涉及國民黨北京執行部之內國共關係以及丁惟汾與李大釗的角力。²²

顧孟餘入黨後即參與上述由李大釗、丁惟汾、王法勤、于樹德、石瑛等人為核心分子的「國民黨北京執行部」。北京執行部在1924年4月20日成立時設於織染局29號，1926年初遷至翠花胡同8號，三一八事件之後，執行部又被迫遷入東交民巷蘇聯大使館區。執行部下設秘書處和組織、宣傳、青年、工人、農民、調查、婦女等七個部。秘書處設常務委員三人，由丁惟汾、王法勤、石瑛負責日常黨務。此外，李大釗為組織部長、馬敘倫為宣傳部長、于樹德為青年部長(負責北京、天津地區學生運動)、丁惟汾為工人部長、譚仲達為農民部長、王法勤為調查部長、褚松雪為婦女部長。²³1926年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之後，北京執行部取消，改為國民黨中央政治委員會北京分會(1926年2月)，政治委員計有李大釗、吳稚輝、李石曾、陳友仁、于右任、徐謙與顧孟餘等人。²⁴顧孟餘在分會之中負責黨務與草擬對外宣傳文件。于右任對於顧

員參加此項運動，為其本分，何必多怪？大釗為之語塞」。延國符，〈追述往事悼念丁老先生〉，葉飛鴻、程玉鳳編，《丁惟汾先生史料彙編》(台北：國史館，2014)，頁3285-3286。

21 延國符，〈追述往事悼念丁老先生〉，頁3285。

22 李文平，〈論李大釗與丁惟汾在國共合作的關係〉，《河南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第32卷第5期(新鄉，2005)，頁90-93。

23 〈國民黨北京執行報告書〉(1926年1月)，中共北京市委黨史研究室編，《第一次國共合作在北京》，頁282-283。

24 李大釗說「國民黨在廣州召集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釗曾被孫先生指派而出席，被選為中央執行委員。前歲先生北來，於臨入醫院施行手術時，又任釗為

的表現並不滿意。他不喜顧之文字，認為「孟餘之文，純用科學分析方法，雖條理明晰，而筆鋒缺感情，不具縱橫捭闔之煽動力量」，故常予批評。顧自尊極強，認為是對他的侮辱，因而與于右任發生衝突，甚至不願一起開會。後來顧任鐵道部長時于右任對他的彈劾案可能部分肇因於此。²⁵

顧孟餘入黨之後對他的同事、學生也產生影響。當時北大師生如谷錫五、周德偉、李壽雍、樊宏、郭春濤(1898–1950)、鄧飛黃(1895–1953)、廖維藩(1898–1968)、童冠賢(1894–1981)等，因崇信孫中山思想，在顧的引導下積極參與此類團體，並加入國民黨。²⁶周德偉是在1925年5月入黨，對他來說「當時的形勢，北洋政府已屆末日，只有國民黨與共產黨夠格打倒北洋政府，我不相信共產主義及唯物史觀……打倒北洋政府，只有國民黨是當前可行之路，成功雖未可必，但總比其他黨派進步得多。政治運動總是現實的，個人幹不起來，故加入國民黨」。²⁷至於童冠賢，從南開大學畢業後曾留學日本、歐美，於1925年返國，擔任北大教授。次年，他追隨顧孟餘去廣州，加入了國民黨。²⁸

政治委員。其時同被指認者，有：汪精衛、吳稚暉、李石曾、于右任、陳友仁諸人。後來精衛回廣州，政治委員會中央仍設在廣州，其留在北京、上海之政治委員，又略加補充，稱分會。留於北京之政治委員，則為吳稚暉、李石曾、陳友仁、于右任、徐謙、顧孟餘及釗等」，見李大釗，〈獄中自述〉(1927年4月)，中共北京市委黨史研究室編，《第一次國共合作在北京》，頁397。周德偉的說法略有不同，「段祺瑞初任執政時期，國民黨仍得在北京公開活動(孫段合作並未宣言取消)，故在北京成立政治分會，主持北方黨務。蔡元培、李石曾、吳稚暉、于右任、丁惟汾等均為委員，顧孟餘當時非中央委員，但以汪精衛之台柱資格，請其列席分會」。周德偉，《落筆驚風雨：我的一生與國民黨的點滴》，頁170。

25 周德偉，《落筆驚風雨：我的一生與國民黨的點滴》，頁170。

26 同上，頁167。

27 同上，頁167。

28 陳正茂，〈從立法院長到第三勢力要角——童冠賢〉，《逝去的虹影：現代人物述評》，頁198。

顧孟餘入黨後也積極支持孫中山召開「國民會議」的提議。從1924年底開始，顧孟餘就參與了「北京國民會議促進會」，並開始與汪兆銘多所接觸。此會為一全國性組織，在1924年11月10日孫中山發表「北上宣言」之後，各地的國民黨與共產黨的分支機構就在全國各地掀起了一個聲勢浩大的促成國民會議的運動，會議名稱或為「促進」或為「促成」。在北京、上海、南京、廣州、濟南、天津以及江西、湖南、湖北、浙江、安徽等地都成立了人民團體，接連發表宣言、通電等，支持召開國民會議。例如12月5日，上海13個婦女團體發起「女界國民會議促成會」。²⁹ 12月14日，湖北武漢各界成立了「國民會議促成會」，並派代表赴各縣宣傳鼓動。³⁰ 1925年1月5日在北大召開「北京國民會議促進會」成立大會。顧孟餘為主席，會中首先由汪兆銘演講，「群眾歡呼，聲震屋瓦」，其次譚仲達、顧孟餘、雷殷諸先生相繼演說，並通過章程及宣言，又選出幹事40人。³¹ 3月1日，國民會議促進會的全國代表大會在北平召開。此次會議在北大三院大禮堂舉行，顧孟餘擔任大會主席，並由汪兆銘與徐謙演講。「演詞甚為淋漓盡致。聽者頗為動容。蕭〔按指蕭人鵠，共產黨員，1897-1932〕演畢。眾皆起立高唱國民革命歌，奏軍樂，高呼（打倒帝國主義）（打倒軍閥）等口號後，遂攝影而散」。³²

當國共兩黨積極推動國民會議之時，段祺瑞（1865-1936，圖3.2）為回應孫中山召開「國民會議」之提議，在北京政變之後以「解決時局糾紛，議籌建設方案」為宗旨召開「善後會議」（1925年2月1日召開，圖3.3）。胡適與顧孟餘都以北大教授的身份應邀參加。

29 〈女界國民會議促成會之發起 發起者有十三女團體〉，《申報》，上海，1924年12月5日，第13版。

30 〈武漢各界成立國民會議促成會〉，《申報》，上海，1924年12月14日，第7版。

31 〈北京國民會議促成會成立大會之盛況〉，《大公報》，天津，1925年1月6日，第4版。

32 〈全國國民會議促成總會成立〉，《大公報》，天津，1925年3月2日，第4版。汪兆銘的演講內容參見：〈三月一日在全國國民會議促成會總會演說辭〉（1925），收入何孟恒編，《汪精衛先生政治論述》，頁375-379。汪精衛紀念託管會，汪精衛網站，<http://wangjingwei.org/zh/his-ideas-cn/political-writings/#1447608167429-b11a662e-ac7d>（2017年11月8日檢閱）。

圖 3.2 段祺瑞



圖 3.3 善後會議開幕



胡適在開始之時較積極地參與善後會議。³³他延續了他在〈我們的政治主張〉一文的看法，認為「我是不怕人罵的。我此次願加入善後會議，一為自己素來主張與此稍接近；二為不願學時髦人談國民會議；三為看不過一般人的輕薄論調」。³⁴胡適在寫給善後會議秘書長許世英(1873-1964)的信中說：「我是兩年來主張開和平會議的一個人，至今還相信會議式的研究時局解決法，總比武裝對打好一點；所以我這回對於善後會議雖然有許多懷疑之點，卻也願意試他一試」。³⁵不過胡適參與善後會議(以及為清室辯護)等事頗受南方批評，並造成其聲望大跌，³⁶有人罵他是「賣身於段賊」；此後胡適與青年學生的關係開始逐漸疏遠。³⁷這一件事也顯示出胡適在現實政治中願意妥協的性格。然而胡適的妥協亦有底線，2月18日會議召開之中，胡適對於段祺瑞未能停止國內軍事行動感到失望，撰寫了〈退出善後會議〉一文。³⁸3月6日《晨報》刊出胡適的辭職消息，「認為在戰爭狀態之下無從善後」。³⁹

33 有關胡適參與善後會議的前因後果及其反應，見邵建，《瞧，這人：日記、書信、年譜中的胡適(1891-1927)》，頁273-279。

34 胡適著、曹伯言整理，《胡適日記全集》，第4冊，1925年1月17日，頁297。胡適在同日也記載他和陳西滢、王世杰等人所參與的「現代評論社」在1月16日晚間曾約汪兆銘、吳稚暉吃飯，「席上力勸國民黨加入善後會議」。

35 胡適著、曹伯言整理，《胡適日記全集》，第4冊，1925年2月1日，頁299-300。

36 周德偉提到當時他看到胡適「稱溥儀為皇上」、「陳炯明之行動乃革命行動」、「出版紅樓夢考證，……費大力研究死問題，真是玩物喪志」，「如是胡先生在我心中價值表上，一落千丈」。周德偉，《落筆驚風雨：我的一生與國民黨的點滴》，頁135。

37 邵建，《瞧，這人：日記、書信、年譜中的胡適(1891-1927)》，頁275。

38 胡適，〈退出善後會議〉，胡適著、季羨林編，《胡適全集》，第21卷，頁325-326。

39 〈胡適辭善後會議會員〉，《晨報》，北京，1925年3月6日，第2版。根據該文「胡適此次加入善後會議，本出自嘗試態度，所謂嘗試者，即察看善後會議是否有作為之可能性，如各方確有誠意解決糾紛，便在會中奮鬥，否則即行辭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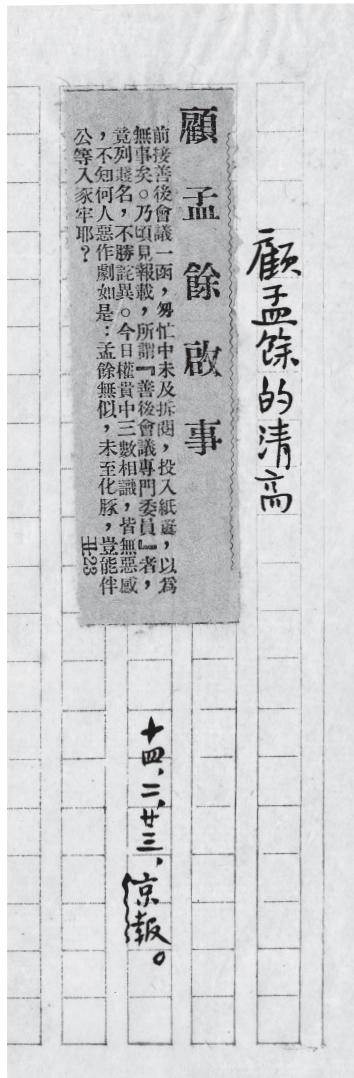
顧孟餘對善後會議採取排斥的態度。根據張國燾的回憶，1925年1月17日，孫對於段的善後會議表示讓步，並提出兩個條件：一為兼納人民團體代表；一為會議涉及之軍事財政最後決定權，應歸屬國民會議。然而，孫的訴求卻遭段政府拒絕。孫段因而絕裂。1月30日國民黨通過「中國國民黨員概不參加善後會議」的決議。⁴⁰ 顧孟餘的態度或受此影響，周德偉注意到顧孟餘與胡適對善後會議的不同態度：「段亦注意到北大的教授，最享盛名的是胡適之、顧孟餘，乃聘二人參加善後會議，結果胡適之參加了。顧孟餘眼光銳利，且素有政治抱負，平日不露聲色而已。彼於接到聘書後，立即退還並在北京《晨報》登出一啟事，有『孟餘決不入此豬圈』之語。顧孟餘向不動怒，但此次忍不住了。此是他一生最激烈之言，此語得罪了不少所謂名流，尤其傷了胡適之。……從此胡顧之間相處甚不愉快，直到兩人之死未恢復交情！」⁴¹ 周德偉的記憶略有出入，此則「顧孟餘啟事」乃登載於1925年2月23日的《京報》，原文是：「『善後會議專門委員』者，竟列賤名，不甚詫異。……孟餘無似，未至化豚，豈能伴公等入豕牢耶？」胡適當時看到這則報導，剪下此一啟事保留在他的檔案之中，並加上「顧孟餘的清高」為標題（圖3.4）。⁴² 胡適對顧孟餘的評論主要是從道德層面來考量，然而此時顧孟餘抉擇應該主要是出於支持國民黨決議的政治考量。

40 張國燾，《我的回憶》（香港：明報月刊出版社，1974），第2冊，頁547。

41 周德偉，《落筆驚風雨：我的一生與國民黨的點滴》，頁164。周德偉對顧胡關係不睦的觀察有其敏銳之處，然而「直到兩人之死未恢復交情」的論斷則有待商榷。

42 「剪報：顧孟餘的清高」（1925年2月23日），〈北京檔〉，《胡適檔案》，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藏，檔號：HS-JDSHSC-0267-049。顧孟餘登報是因為看到他列名善後會議「教育專門委員名單」，因而「不勝詫異」。該名單參見善後會議秘書廳編，《善後會議公報》，第3期（北京，1925年2月），「附錄」，頁10；《大公報》也刊出此一名單，〈續誌專門委員會要訊〉，《大公報》，天津，1925年2月23日，第4版。《京報》創刊於1918年10月5日，由邵飄萍（1886–1926）與潘公弼（1895–1961）於北京創辦，無黨無派，主張言論自由，在北方的影響力很大。1918年該報因批評政壇混亂，被安福系所查封，1922年10月復刊。參見林溪聲、張耐東，《邵飄萍與〈京報〉》（北京：中華書局，2008）。

圖 3.4 〈顧孟餘的清高〉



很可惜，就在此時孫中山病故，壯志未酬。1925年3月12日早晨9時27分孫中山逝世，不少人早已得到消息，李大釗與顧孟餘也在第一時間趕到了現場。《申報》登出壯行所寫的〈北京通信：孫寓弔唁記〉，記載了他所目睹的情況：「臥房之外室，黨員已滿，汪精衛面白如紙，李石曾低頭默坐，左黨要人李守常、顧孟餘等均在。孫之內弟宋子文及襟兄孔祥熙奔走甚忙。女賓中如李石曾夫人首先到寓，廖仲愷夫人（即何香凝女士）兩目紅腫如核桃。是時孫之遺骸由協和院派人清洗，內室嚴閉，隱隱聞淚聲」。⁴³3月19日上午11時，孫中山的遺柩由協和醫院移至中山公園社稷壇大殿，重要黨員分為12組，每日兩組輪流負責招待的工作，顧孟餘與戴天仇（戴傳賢）為第三組，移柩過程之中顧孟餘亦與眾人一同執紼護柩。當天最引人注目的送喪者是俄國大使加拉罕，「由孫式甫書記官持勞農之赤色國旗為導而前進，飛行機二架亦在空中相隨，以示弔問，沿途民眾如堵，異常熱鬧」。⁴⁴

孫中山逝世之後，國民黨北京執行部更積極地主導各種的群眾運動。3月21日顧孟餘主持了國民會議促成會專門委員會議，討論了國際、內政、財政等問題，當時由隨孫中山北上，擔任行營機要主任秘書、中央政治委員會委員邵元冲（後與鄒魯、謝持同屬西山會議派）也參與了會議。⁴⁵五卅慘案之後「北京執行部即由在京黨員中指派同志十人，用各種團體名義，與北京其他各界接洽，發起北京各界對英日帝國主義慘案同胞雪恥大會」。⁴⁶顧孟餘十分積極地參加此類聚會。1925年6月30日，北京召開「全世界被壓迫民族國民大會」，此會專為廣州沙基慘案而召集，到會者有約十餘萬人，德意志、朝鮮、土耳其、印度諸國

43 壯行，〈北京通信：孫寓弔唁記〉，《申報》，1925年3月16日，第5版。「左黨要人」的名稱顯示顧當時與李大釗都被視為國民黨內的左派。

44 〈孫中山喪禮雜聞〉，《申報》，1925年3月21日，第10版。〈中山靈柩移往中山公園〉，《申報》，1925年3月22日，第5版。

45 邵元冲，《邵元冲日記》（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頁134。

46 〈國民黨北京執行報告書〉（1926年1月），中共北京市委黨史研究室編，《第一次國共合作在北京》，頁289。

圖 3.5 1925年6月30日顧孟餘擔任北京國民大會中央壇之主席



均有代表出席，顧孟餘擔任中央壇之主席(圖3.5)，邀約國際勞工聯合會代表林哈德等人演講，此次會議延續到7月中旬。⁴⁷ 1925年10月底，顧孟餘與胡適等17人當選為北大新的評議員。⁴⁸ 1925年11月28日北京發動示威運動，要求段氏下野，「北京工人學生舉行國民革命大示威運動，北京大學教授朱家驊、顧孟餘等指揮，包圍段祺瑞宅，要求段氏下野，組織國民政府，大眾搗毀章士釗、李思浩、梁鴻志、朱深、曾毓雋

47 郭廷以編著，《中華民國史事日誌》，第1冊，頁901；〈北京之國民大會〉，《圖畫時報》，第258號(上海，1925年7月)，頁7；〈天安門之國民大會〉，《申報》，上海，1925年7月21日，第6版。

48 〈北大新評議員選出，顧孟餘等共十七人〉，《順天時報》，北平，1925年10月29日，第7版。

住宅。」⁴⁹ 1925年11月，鄒魯參與發起西山會議，汪兆銘免了他廣東大學校長的職務，交顧孟餘接任，然顧孟餘一時無法前往，故由陳公博先行代理。⁵⁰

1926年初時顧孟餘仍在北京。1月在廣州召開國民黨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中，顧被選為中央執行委員。3月發生「三一八事件」，馮玉祥（1882–1948）國民軍與張作霖奉軍作戰期間，在大沽口一帶建砲台，且在水道中布施水雷。大沽口守軍又砲擊日本軍艦，日本等國認為違反《辛丑和約》，對北洋政府提出抗議。由國民黨中央政治委員會北京分會及北京市黨部在北京發動群眾運動，進入天安門抗議帝國主義，要求廢除所有不平等條約。3月17日下午3時，國民黨特別市黨部、廣州外交代表團、中俄大學、畿輔大學、中法大學等校在北大三院開會，討論大沽事件與相應的對策，議決召集80多校學生、工人、市民在天安門開會。1926年三一八的抗議大會由徐謙、顧孟餘、李大釗等主持，先由徐謙報告開會之旨趣，其次由顧孟餘演講打倒帝國主義的方法，又認為「對待國中內奸，須以對待帝國主義方法對待之」；⁵¹大會並發表宣言，再舉行示威遊行，計有數千人參加。⁵²北大教授朱家驊亦加入學生行列。此次集會遭到鎮壓，有40餘人身亡、150餘人受傷。慘案之後「段祺瑞及北京國務院通電謂本日慘案乃徐謙等鼓動所致，令通緝徐及李大釗、李煜瀛（石曾）、易培基、顧兆熊（孟餘）五人」，其罪名是「假借共產學說，嘯聚群眾，率暴徒闖襲國務院」。⁵³ 1926年3月20日的《申報》對此

49 郭廷以編著，《中華民國史事日誌》，第1冊，頁950。

50 「顧孟餘金湘帆張之麟等接任廣東執信雙十等學校校長職務」（1925年11月30日），〈學校校長更迭〉，《國民政府》，台北，國史館藏，典藏號：001-090000-0006。

51 徐、顧兩人之演講內容參見〈徐季龍、顧孟餘演說詞（要點）〉（1926年3月18日），載《國民新報》，1926年3月19日。

52 林本元，《三一八慘案始末記》（台北：革新堂，1926），頁11。

53 郭廷以編著，《中華民國史事日誌》，第2冊，頁28。三一八事件之後顧南下廣州，前任廣東大學校長，之後辭職，10月改任中山大學副委員長。范予遂，〈我所知道的顧孟餘〉，頁473。

有詳細報導：

政府認徐謙、李大釗、李石曾、易培基、顧孟餘五名為國務院前大慘劇之首謀者。已於十九日下逮捕令，其內容略謂：徐謙等五名，藉名共產學說，屢釀事端，此次徐謙以共產黨執行委員之名義，散佈宣傳傳單，率暴徒數百名襲國務院、灌火油、投炸彈、用棍棒毆打軍警，軍警出於正當防衛，其結果致雙方皆有死傷。如此行為，幾無國法，深堪痛恨。今已暴露該暴徒等曾潛赴各地方，屢謀不軌，國家之秩序，將瀕於危機，除京師令軍警盡力防範外，著各地方長官一律嚴重取締，以減禍機。徐謙等五名不問在北京內外，概行逮捕，依法處罰。⁵⁴

事發之後，輿論譁然，紛紛譴責段氏政權的「獸行」，魯迅甚至稱此為「民國成立以來最黑暗的一天」。⁵⁵李、顧等人被通緝之後，躲到俄國使館內，後輾轉南下。由俄使館加拉罕等為之設法，同時與國民軍鹿鐘麟(1884-1966)等商妥，由國民軍護送至張家口，橫斷內外蒙古至赤塔，

54 〈北京軍警槍殺請願團之慘劇〉，《申報》，上海，1926年3月20日，第6版。

55 魯迅對三一八事件的感受參見〈無花的薔薇之二〉、〈死地〉、〈可慘與可笑〉、〈紀念劉和珍君〉等文，收入《華蓋集續編》，《魯迅全集》(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7)，卷3，頁261-278。魯迅為這五位領導人抱不平，他說：「徐謙，李大釗，李煜瀛，易培基，顧兆熊的通緝令發表了。因為他們『嘯聚群眾』，像去年女子師範大學生的『嘯聚男生』(章士釗解散女子師範大學呈文語)一樣，『嘯聚』了帶著一根木棍，兩支手槍，三瓶煤油的群眾。以這樣的群眾來顛覆政府，當然要死傷三百多人；而徐謙們以人命為兒戲到這地步，那當然應該負殺人之罪了；而況自己又不到場，或者全都逃跑了呢？以上是政治上的事，我其實不很瞭然。但從別一方面看來，所謂『嚴拿』者，似乎倒是趕走；所謂『嚴拿』暴徒者，似乎不過是趕走北京中法大學校長兼清室善後委員會委員長(李)，中俄大學校長(徐)，北京大學教授(李大釗)，北京大學教務長(顧)，女子師範大學校長(易)；其中的三個又是俄款委員會委員：一共空出九個『優美的差缺』也」。引文見〈可慘與可笑〉。有關魯迅與顧孟餘往來的情況參見陳棉武，〈魯迅與上虞人的交往〉，趙暢主編，《上虞文史資料選粹》(北京：中國廣播電視出版社，2008)，頁278-279。

經西伯利亞赴海參崴，轉海道南下。4月3日抵達庫倫、7日抵達海參崴，19日晚間與胡漢民、鮑羅廷、陳友仁、邵力子、譚平山、黃昌穀等同船返國，4月29日抵達廣州黃埔。⁵⁶鮑羅廷後來告訴陳友仁的兒子陳丕士，顧孟餘在逃亡的路上表現出堅毅的個性，讓他甚感欽佩，他說：

他對顧孟餘在1926年從北京逃脫軍閥對他下毒手時所表現的態度感到欽佩。顧先生從北京坐汽車走不被人注意的公路經南口到張家口。俄國人在張家口準備了一輛大篷車，把這一批逃難者經戈壁灘送到庫倫。然後再用汽車把他們送到貝加爾湖畔西伯利亞鐵路上的烏丁斯克（現名烏蘭烏德）站，他們從那裡到達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參崴），然後再去廣州。鮑羅廷說，在這整個艱險嚴酷的旅程中，他從未聽到顧孟餘抱怨過一聲。當1926年他的名字在國民政府委任官員的名單上出現時，鮑羅廷支持對他的任命。⁵⁷

1926年三一八事件之後顧離開北京、南下廣州，此後即脫離北大。他先任廣東大學校長（1925年11月30日發佈，未到任，由陳公博代理），1926年3月辭職。當顧孟餘在籌劃、參與包圍段宅與「三一八事件」之時，胡適一直置身事外，他從1925年8月底啟程南下，到武漢演講，又到上海訪友、割痔瘡。到1926年5月才回北京，7月他又去歐洲開會，再去美國訪問。1927年5月才回到上海。⁵⁸

56 蔣永敬，《胡漢民先生年譜》（台北：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委員會，1978），頁375。

57 陳丕士著、郭濟祖譯，《中國召喚我——我參加中國革命的歷程》（北京：商務印書館，1983），頁58。Percy Chen, *China Called Me: My Life Inside the Chinese Revolution* (Boston: Little Brown, 1979), p. 62.

58 江勇振，《舍我其誰：胡適，第二部，日正當中，1917–1927》，頁130。

第二節 從廣州到武漢

顧孟餘以北大教授的身份加入國民黨之後，多次參與、領導黨部所發動之群眾運動，他一方面具有理論的素養，另一方面也有領導群眾運動的實際經驗，他的政治地位因而迅速提升。他在黨內具有正式的職位是在1926年1月廣州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這一次會議舉行之時仍為國民黨「聯俄容共」時期，大會由汪兆銘擔任主席，吳玉章為秘書長，議決繼續執行聯俄容共的政策。在此次大會中，顧孟餘因李大釗、于樹德兩人的極力推薦，⁵⁹1月18日他當選為中央執行委員。該次選舉共發出253張選票，收回252張，其中廢票三張，有效票為249票。顧孟餘得到222票，排名第13。在他之前的中執委包括汪兆銘(248票)、譚延闓(248票)、胡漢民(248票)、蔣中正(248票)、譚平山(246票)、宋慶齡(245票)、陳公博(242票)、恩克巴圖(237票)、于右任(234票)、程潛(234票)、朱培德(231票)、徐謙(224票)等人。⁶⁰從上述的票數可以反映，在孫中山逝世之後，汪、譚、胡、蔣四人是黨內聲望最高的領導者，中共與附和中共的左派人物則有譚平山、宋慶齡、徐謙等；除此之外，汪派人馬(亦左傾)有陳公博與顧孟餘。⁶¹

如上所述，三一八事件後，顧離開北京，輾轉南下。此時因中山艦事件，蔣中正成功迫使共產國際讓步，替換了與汪親密、反對北伐的蘇聯駐廣州軍事顧問團團長季山嘉(Kissarka)等人的職務，汪兆銘則以治

59 萱，〈顧孟餘的籍貫與學歷之謎〉，《文飯》，第18期(1946年6月27日)，頁4。有關李大釗、于樹德在國民黨一大之後受孫中山支持，推動國共合作，參見李戴，《國民黨員毛澤東》(台北：李敖出版社，2014)，頁333-340。

60 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編，《中國國民黨第一、二次全國代表大會會議史料》(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86)，上冊，頁376。

61 在上述名單之中，恩克巴圖與汪的關係也很好。1939年8月，恩克巴圖投奔汪，擔任(汪派)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11月，任伊克昭盟鄂爾多斯左翼後旗協理。汪兆銘政權成立後，恩克巴圖任汪政權的國民政府委員。蔣陣營方面則因此開除他的黨籍，1941年「恩克巴圖附逆有據，永遠開除黨籍」。劉維開編，《中國國民黨職名錄》(台北：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委員會，1994)，頁123。

療糖尿病的名義，離開廣州，前往法國馬賽。1926年4月底至該年年底，顧孟餘一直在廣州參與黨務活動，並與北方的李大釗保持聯繫。⁶²5月3日，在鮑羅廷宅開政治委員會，參加者有譚延闓、胡漢民、譚平山、陳友仁等，由顧孟餘報告「與馮玉祥商確事」。⁶³5月12日，譚延闓又在張靜江處，與「老鮑、顧孟餘、介石談黨事」。⁶⁴

5月15–22日的國民黨二屆二中全會通過「整理黨務案」，提出改善中國國民黨與共產黨之關係，主張「中國國民黨對於加入本黨之共產主義者，只能問其行動是否合於本黨之主義政綱，而不問其他」。⁶⁵由譚延闓、蔣中正、張靜江、孫科、譚平山、于樹德、顧孟餘為審查委員。此案並規定共產黨員在國民黨各級黨部執行委員會之人數不得超過全體委員的三分之一、共產黨員不能擔任黨中央各機關之部長等。根據譚延闓的記錄，蔣中正主張嚴格限制共產黨員，要求將其交付審查，「介石又提八條，以限制共產為言，最要者送名冊，辭部長，亦付審查」。⁶⁶5月16日，譚延闓又「赴張靜江家，開審查會。譚平山、顧孟餘、蔣介石、孫科、于樹德皆至。議昨日兩案，略有改易，皆文字修正耳」。⁶⁷5月20日顧與張靜江、蔣中正、譚延闓、吳稚暉共同出任國共兩黨聯席會議之代表。⁶⁸5月28日張靜江任國民黨中央常務委員會主席、譚延闓任政治委員會主席兼國民政府代理主席。蔣中正出任組織部長，由陳果夫任該部秘書。此時蔣忙於準備北伐，他指示組織部的部務由陳果夫「隨時乘

62 李大釗，〈守常政治報告〉（1926年9月8日），中共北京市委黨史研究室編，《第一次國共合作在北京》，頁344–345。報告中提及「近據四日顧孟餘由廣東來電，似革命軍對江西已下動員令，則對奉的折衝已不可緩」。顧孟餘在廣州時的活動在《譚延闓日記》中留下詳細的紀錄。

63 《譚延闓日記》，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藏，1926年5月3日。

64 《譚延闓日記》，1926年5月12日。

65 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編，《中國國民黨第一、二次全國代表大會會議史料》，下冊，頁713–719。

66 《譚延闓日記》，1926年5月15日。

67 《譚延闓日記》，1926年5月16日。

68 〈時事日誌〉，《東方雜誌》，第23卷第13號（上海，1926年7月），頁137。

承丁鼎臣、顧孟餘兩先生辦理」。⁶⁹同時，甘乃光任農民部長、何香凝任婦女部長。顧孟餘接替了毛澤東擔任國民黨代理宣傳部長，⁷⁰6月7日就任，「偕段錫朋、陳友琴輩走馬上任。時宣傳部職員共有二十一人，差役一人，顧氏到任後，除賴特才外，均易新人」。⁷¹6月22日宣傳部改組，由何香凝、甘乃光、譚延闓、鄧演達、顧孟餘五人擔任該部委員。⁷²二屆二中全會閉幕後，黨內的中共分子多被排除，在組織上國民黨左派則佔有明顯的優勢。

1926年9月20日俄國遠東局所做的〈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遠東局使團關於對廣州政治關係和黨派關係調查結果的報告〉之中對二屆二中全會之後的人事變動做出以下的分析，文中指出此一會議決議是由「左派作為議案發起人之一與蔣介石一起簽署的」：

蔣介石3月20日的行動以及隨後5月15日國民黨中央全會的決議，把共產黨人排除在國民黨和國民政府的整個領導工作之外。……

69 「陳果夫呈蔣中正總裁」(1949年6月16日)，〈特交檔案(黨務)——總裁訓示及各方建議(第027卷)/001〉，《蔣中正總統文物》，台北，國史館藏，典藏號：002-080300-00033-001。

70 顧於1926年5月28日國民黨二屆二中全會之後出任代理宣傳部部長；1927年3月11日國民黨二屆三中全會當選宣傳部長。劉維開編，《中國國民黨職名錄》，頁48-55。

71 翠芬，〈現代史料：顧孟餘軼事〉，《社會新聞》，第2卷第24期(上海，1933)，頁341。賴特才(1890-1963)廣東蕉嶺人，為宣傳部秘書。賴的小傳參見徐志超編著，《蕉嶺人新傳》(北京：人民日報出版社，2004)，頁56。當時擔任鮑羅廷之翻譯、任職中央執行委員會軍人部宣傳科主任的朱其華(1907-1945，早期中共黨員)，在回憶之中也說「他一到中央宣傳部，就把全部的人員都撤了職，而完全換上了他自己的一批人……他所帶來的人都是他的高足」，朱其華，《一九二七年底回憶》(上海：新新出版社，1933)，頁25。

72 毛澤東在1926年5月25日辭去代理宣傳部長後，據中國國民黨中執行委員會常務委員會第33次會議記錄，由顧接任，6月7日就職視事。顧在1926年10月2日的第62次中央執行委員會常會曾請辭代理宣傳部長，惟會議決定予以慰留。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編，《中國國民黨第一、二次全國代表大會會議史料》，上冊，頁566、582-583，下冊，頁688-689；亦參考李戡，《國民黨員毛澤東》，頁387、322-323。

5月15日的中央全會是在蔣介石的直接施加壓力的情況下進行的。旨在反對共產黨人的決議不僅是在左派參與下通過的，而且是由左派作為議案發起人之一與蔣介石一起簽署的。在第二次代表大會上選出的中央政治局人員組成沒有變化，也就是說其中多數是左派。但在6月的中央全會上，蔣介石被選為中央主席而在這以前蔣介石這個獨裁者就在中央內部確定了他的全部工作。左派被解除了某些工作部門的領導職務，但勞工部和農民部以及宣傳部等還留在他們手裡。共產黨員、國民黨中央政治委員會譚平山同志離開了廣州。共產黨人也離開了一些部的領導崗位，雖然在5月15日以後的整個時期，他們還直接參與某些部的工作。⁷³

稍早，1926年5月30日鮑羅廷在寫給加拉罕的信中則指出，在3月20日到5月15日之間，國民黨內左中右派勢力之消長，及各方之折衝：

〔二屆二中全会的〕決議通過後，右派對待這些決議很認真，把它看作是履行3月20日政變的手續，以為他們在黨內的權力會增大，將在黨內佔據相應的部長職位，同時他們在政府中的權力也會增大。但是他們連一個職位也沒有撈到，幾乎所有部長都是左派，如宣傳部落入顧孟餘之手，農民部落入原青年部部長甘乃光之手。蔣介石負責組織部。唯一的變化是發生在對待中派的態度上。我們作出了讓步，吸收邵元冲擔任青年部部長，但他要履行黨的二次向他提出的放棄西山會議的條件。戴季陶將被任命為廣東大學校長，葉楚傖在同樣條件下也將受到應有的關照（任中央書記之一）。可以對情況作出以下說明，中央全會調整了同共產黨人的關係（縮小了他們的權力），吸收中派參加工作，沉重打擊了黃埔以外的右派。⁷⁴

73 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譯，《共產國際、聯共（布）與中國革命檔案資料叢書：聯共（布）、共產國際與中國國民革命運動（1926-1927）》，上冊，第3卷，頁453。

74 同上，頁273。

由此可見二屆二中全會是蔣中正與國民黨左派的結盟，打擊共產黨與黃埔軍校以外之右派分子。⁷⁵

為了貫徹「整理黨務案」，1926年7月6日，組織部推動「黨員重新登記事項」，由組織部長蔣中正與宣傳部長顧孟餘共同發表〈關於登記意義之演說詞〉，表示黨員登記時「學生工人農人是愈多愈好」，至於「無聊政客，貪官污吏，以及土豪劣紳」、「遊民流氓，地痞匪徒工賊」則要拒絕他們。⁷⁶ 7月27日蔣中正擔任國民革命軍總司令，準備從廣州黃沙車站出發，督師北伐。張靜江、吳稚暉、譚延闓、陳潔如、蔣緯國與顧孟餘等人齊集車站送別，於出發前攝影留念。照片中顧孟餘著白色西服，立於鮑羅廷與鮑夫人中間（圖3.6）。10月17日，顧孟餘出任國立中山大學委員會副委員長，該會之委員長為戴季陶，其他的委員有徐謙、丁惟汾、朱家驊。⁷⁷

75 蔣中正也同時採取一些左右開弓的手段，他同時打擊了國民黨內黃埔之外「右派」的勢力與共產黨。1926年5月30日，鮑羅廷給加拉罕的信中指出：「今天吳鐵城入獄。孫科將被建議去俄國，他去那裡不知是糾正自己過去的錯誤，還是同馮玉祥談判。傅秉常要被免去海關監督職務以及外交秘書職務。伍朝樞將被建議休假一段時間，如果能辦得到的話，要預先拿走他那裡的檔案。至於內務秘書古應芬，決定保留他的原職到李濟深的兩個師離開這裡時為止。這樣一來，可以認為對危險的右派集團的打擊已成既成事實。5月30日，即逮捕吳鐵城之日，不只是對3月20日的補救，而且對國民黨中央全會5月15日決議的涵義作出了完全不同的解釋。如果右派把3月20日理解為向右轉，而中央全會是完成這次轉變的手續，那麼今天他們會明白，不是這麼回事」。《共產國際、聯共（布）與中國革命檔案資料叢書：聯共（布）、共產國際與中國國民革命運動（1926-1927）》，上冊，第3卷，頁272。此外6月7日，他又下令黃埔軍校中所有的共產黨員退出共產黨，或者離開黃埔軍校。〈維經斯基給聯共（布）駐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代表團核心小組的電報〉（1926年7月1日），《共產國際、聯共（布）與中國革命檔案資料叢書：聯共（布）、共產國際與中國國民革命運動（1926-1927）》，上冊，第3卷，頁319。

76 蔣中正、顧孟餘，〈關於登記意義之演說詞〉（中央組織部印行），1926年7月6日，《五部檔案》，台北，中國國民黨黨史館藏，檔號：部4198。

77 〈中央執行委員會常務委員會第六十六次會議錄〉，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編，《中國國民黨第一、二次全國代表大會會議史料》，下冊，頁706。1924年2月

圖 3.6 1926 年 7 月 27 日歡送蔣總司令北伐(左三為顧孟餘)



1926年10月，國民革命軍佔領武漢三鎮。11月8日，中國國民黨中央政治會議決定將中央黨部和國民政府遷移到武漢。11月16日國民政府成立遷都委員會，討論遷都事宜。蔣致電譚延闓與張靜江：「聞徐、宋、孫、鮑諸同志來贛，甚喜。務請孟餘先生速來，中意中央與政府如不速遷武昌，非特政治黨務不能發展，即新得革命根據地亦必難鞏

廣東大學籌備處成立，主任為鄒魯，隨即聘任胡漢民等35位籌備委員，顧孟餘為其中之一。1925年11月30日成立廣東大學管理委員會，顧孟餘為主席，未到任，由陳公博兼代。1926年3月1日改由褚民誼任校長，1926年7月17日改名為中山大學，由戴季陶為校長。1926年10月改為委員制。有關廣東大學及中山大學的校史，請參考：黃福慶，《近代中國高等教育研究：國立中山大學（1924—1937）》（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88）。三一八事件後，朱家驊亦南下，7月出任國立廣東大學地質系教授、系主任。10月，廣東大學改組為國立中山大學，朱家驊出任中山大學委員會委員與副校長。此後開始從政。參見黃麗安，《朱家驊與中央研究院》（台北：國史館，2010）。

固」。⁷⁸ 11月26日召開政治會議臨時會議，決議中央黨部及國民政府的遷移方案與預備案。12月5日，中國國民黨中央正式宣佈中央黨部和政府停止在廣州辦公，各機關工作人員分批前往武漢。在廣州國民政府停止辦公至完成北遷武漢的期間，以「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與國民政府委員臨時聯席會議」作為臨時領導機構，徐謙為聯席會議主席。

國民黨與國民政府從廣州經南昌遷到武漢是一個很大的工程，分為好幾批出發。第一梯次為調查團，於1926年11月初出發，共有約兩百人同行。有關國民黨部這一次的搬遷過程，當時在農民部長甘乃光手下擔任秘書的陳克文詳細地記載了此行的經過。⁷⁹ 此行人從廣州出發，乘車北行，在廣東南雄曾參觀珠璣巷；過大庾嶺之時則有兩件讓眾人印象深刻之事，「一件，是從南向北，走的全是逐漸升高的峻坂斜坡，山路曲折，兩邊林木豐茂，風景甚佳。過了大庾嶺最高處，便陡然下降，贛水平原全在眼底。嶺南嶺北，地理形勢迥不相同。又一件，便是嶺南氣候溫暖如春，嶺北已經寒風颯颯」。過大庾嶺之後「沿贛江坐船到南昌……在十日至兩星期之間。冬季水淺，我們坐的只是很小的木船，每一隻船，客人和舟子最多不過七八人。全部船隻約在十艘以上，浩浩蕩蕩，順流而下」。12月2日，國民黨中央執監委員宋慶齡、陳友仁、宋子文、孫科、徐謙、鮑羅廷等人先行抵達南昌。⁸⁰ 眾人抵達南昌之後，受到蔣中正的歡迎與招待。⁸¹ 在南昌時陳克文第一次聽到蔣中正與陳果夫(1892-1951)、陳立夫(1900-2001)的談話。在南昌停留三四日後，黨部人員即「乘坐南潯鐵路火車往九江(也有少數留在南昌的)，轉乘長江輪船到武漢」。抵達武漢後一行人亦受到盛大歡迎，晚間的談話會由

78 呂芳上主編，《蔣中正先生年譜長編》，第1冊，頁578。

79 陳克文，〈鄧演達和國民黨左派〉，收入陳克文著、陳方正編輯校訂，《陳克文日記，1937-1952》，下冊，頁1383。亦參見陳克文，〈曇花一現的左派〉，收入陳克文著、陳方正編輯校訂，《陳克文日記，1937-1952》，下冊，頁1365-1368。

80 呂芳上主編，《蔣中正先生年譜長編》，第1冊，頁590。

81 《蔣中正日記》，1926年12月2日，「七時起床，入浴，批閱後即搭船溯贛江迎中央各委員。十二時即在途中相遇，乃來南昌。下午招待歡迎」。

徐謙、鄧演達、譚平山等左派領袖主持。左右派對立的局勢開始出現。⁸²第二梯次是12月11日，由譚延闓率中央黨部僚屬、家眷遷徙。眾人所採取的路線與調查團相同，從廣州乘車出發，經贛赴鄂。同行者有「顧孟餘、彭澤民夫婦、廖夫人母女、丁鼎丞、江浩、朱霽青、陳其瑗」，以及鮑羅廷夫人等，2時至英德，下午5時許至韶關。陳友仁的兒子陳丕士也在此行之中，去武漢與父親會合，他記載了搭乘火車的情景：

列車由旅客車廂組成。機車是舊式的，而且比較殘破，前面裝有排障器。車廂分成一個個小隔間，我和鮑羅廷夫婦佔一間，緊鄰的那間是何香凝和他的女兒辛西婭。……在列車上，還有譚延闓將軍。他看來像一位學者，身體很結實。……國民政府的宣傳部長顧孟餘先生和夫人在車廂的另一隔間的坐席上。顧先生體質瘦弱，看來比較文雅，但顧夫人卻很茁壯，充滿活力。⁸³

12月12日一行人又由韶關啟程，乘船溯北江的支流潯水北去，蔣於當日電告沿途之國民黨黨部與縣長，「望沿途歡迎及護衛，並隨時電告其到達時日」。⁸⁴陳丕士記載了在各地受到官員、國民黨部接待的情形：

不論我們在哪一天什麼時候到達一個城鎮，船隊總要靠岸纜舟，停留下來。這時，岸上總是有一群地方官員在那裡恭候。這群官員一般是駐軍的司令及其隨從和鎮長及其部下等人。國民黨黨部的官員也總是在場，有時還有幾位當地工農組織的成員。譚延闓……及其他的領導人也要上岸。他們同迎接者握手後，就鑽進轎子或坐上人力車，徑赴鎮長衙門。……

82 陳克文，〈曇花一現的左派〉，收入陳克文著、陳方正編輯校訂，《陳克文日記，1937-1952》，下冊，頁1367。

83 陳丕士著、郭濟祖譯，《中國召喚我——我參加中國革命的歷程》，頁58。（英文版頁62）

84 「蔣中正電吉安贛州大庾南雄各黨部各縣長及郭沫若」（1926年12月12日），〈領袖指示補編（五）〉，《蔣中正總統文物》，台北，國史館藏，典藏號：002-090106-00005-041。

長長的一列轎子或人力車緩緩地向衙門前進。到了門口，轎夫就把轎子放下，然後就從後面把轎槓抬起來，轎中人就可以躬身出轎，跨過轎槓。我們是嚴格地按照如下順序行進的：張靜江走在最前面，依次是譚延闓、于右任、鮑羅廷夫人、何香凝女士、顧孟餘，等等。……在這樣的場合下，款待我們的酒席和宴會是多麼豐富和美妙啊！……酒席上有紅燒雞、乾鮮蘑菇、清燉家鴿湯、炒鴿心肝雜碎配檸檬片，還有我聞所未聞的蔬菜。我們豪吃痛飲。⁸⁵

譚延闓等一行人復於12月18日抵廣東南雄、12月25日抵達江西贛州，再經萬安、泰和，28日到吉安。12月31日，國民政府代主席譚延闓、中央常會代主席張靜江及何香凝、丁惟汾委員與顧孟餘等抵達南昌，蔣親自乘船前往迎接。譚延闓記載了當日的情景：

蔣介石乘輪來(賀耀組偕至)，過張靜江船見之，談甚歡。十二時至南昌，遂登岸，於民眾夾道中入總司令部，前清撫署也。客全集，朱、程軍長、白參謀長以下均集。入座，食西餐。……晚，偕魯、呂、繩、秋至總司令部，則鮑、廖、顧、丁諸人皆至，談頃之出。入座，仍西餐也。將畢，介石起致辭，余及孟餘、澤民、廖夫人作答，鮑夫人、加倫皆不發言。散後，與介石入後宅，共靜江談，孟餘、鼎臣在座。談甚深至，但無決定。⁸⁶

顧孟餘在抵達南昌之後一直留在此地，至1927年1月11日他才陪同蔣赴武漢。在武漢期間，顧孟餘仍繼續擔任中央黨部代理宣傳部長(3月11日之後為部長)。在此他創辦了一份中國國民黨的黨報，於3月22日創刊，稱為《中央日報》，同時由他擔任漢口《中央日報》社的社長。該報的編輯團隊有主編陳啟修(1886-1960)、副刊主編孫伏園(1894-1966)、副刊星期日特刊「上游」的主編沈雁冰(1896-1981，茅盾，也是

85 陳丕士著、郭濟祖譯，《中國召喚我——我參加中國革命的歷程》，頁65-66。
(英文版頁70-71)

86 《譚延闓日記》，1926年12月31日。鼎臣為丁惟汾。

武漢《民國日報》主編)。⁸⁷《中央日報》的名稱一直沿用到今日(圖3.7)。在報紙版面和內容方面：

顧孟餘當時對於《中央日報》的篇幅，是主張用中張，比時下流行的對開式的紙略小，後來因為印刷機和紙的關係，結果是用四開式，日出五張，星期一出三張。星期一的報，除重要消息外，全是一週來新聞的綜合報導，每週不變的總題名是「我們和世界」，分軍事，常務，政治，社會等欄。⁸⁸

顧孟餘指示當時擔任採訪主任胡耐安等同人，「千萬別作人身攻擊，就事理論以至於辨駁責難，也無須用罵術的語調」，絕不狂捧與亂罵。⁸⁹同時為了達到國際宣傳，武漢的中國國民黨宣傳部還辦了兩份英文刊物，作為宣傳機關報，一份是 *People's Tribune* (1926–1927)，另一份是 *Chinese Correspondence*。⁹⁰*People's Tribune* 由 Rayna Prohme (1894–1927) 以及她的丈夫 Bill Prohme (?–1935) 負責編輯工作，另外 Milly Bennett (1897–

87 有關《中央日報》的編輯團隊，以及陳啟修的生平與理念，參見張武軍，〈國民革命與革命文學、左翼文學的歷史檢視——以武漢中央副刊為考察對象〉，《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2015年第5期(北京，2015)，頁166–177。朱其華對陳啟修的評價不高，他說陳是「一個在共產黨內的不重要的『學者』。陳啟修君的學問如何是另一問題，但他當新聞記者是很不適宜的。第一，他的文字非常拙劣，他做的論文，囉囉嗦嗦使人不能卒讀……」。朱其華，《一九二七年底回憶》，頁118。

88 外史氏，〈顧孟餘與《中央日報》〉，《星島晚報》，香港，1951年12月8日。

89 漢口《中央日報》是中國國民黨中央黨部宣傳部主辦的機關報，於1927年3月22日發刊，9月15日停刊，共發行176號。社長為宣傳部長顧孟餘，楊綿仲任經理、胡耐安為採訪主任。周開慶，〈追懷胡耐安先生〉，《中外雜誌》，第23卷第1期(台北，1978年1月)，頁33–35。胡耐安，〈皓首榮歸顧孟餘〉，《傳記文學》，第22卷第3期(台北，1973年3月)，頁32–33。胡耐安，〈談漢口發行的中央日報(上)〉，《傳記文學》，第29卷第1期(台北，1976年7月)，頁65–68。此一階段的《中央日報》已經不全。不過該報由孫伏園所主編的《中央副刊》(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年重印)卻完整地保存下來。

90 Harold R. Isaacs, *The Tragedy of the Chinese Revolution*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1), p. 381.

圖 3.7 1927年8月23日《中央日報》



1960) 也參加該刊的編輯團隊。7月底因分共帶來的政策轉變，7月30日顧孟餘與外交部長陳友仁(反對分共)討論後決定重組該刊，Rayna Prohme與Milly Bennett隨宋慶齡離開武漢赴上海，再陪同宋慶齡、陳友仁訪問莫斯科，Rayna Prohme病逝於此。⁹¹

⁹¹ Baruch Hirson and Arthur J. Knodel, *Reporting the Chinese Revolution: The Letters of Rayna Prohme* (London: Pluto Press, 2007). Milly Bennett, *On Her Own: Journalistic Adventures from San Francisco to the Chinese Revolution, 1917-1927* (London: Routledge, 1993). Rayna與Milly與宋慶齡離開武漢是因為政治立場與顧孟餘不同。Milly說「中央宣傳部長顧孟餘是武漢政壇的中間派。他公開反對孫中山夫人、陳友仁以及鮑羅廷和中共。他是宣傳工作的推動者」(見 *On Her Own*，頁205)。People's Tribune後來成為汪派國際宣傳的刊物，1931至1949之

在1925–1927年間，顧的思想和汪兆銘類似，是左傾的，與甘乃光、陳公博並列為「左派三傑」。⁹²上述孫中山逝世時報紙上文章稱他和李大釗為「左黨要人」，共產國際的報告則稱他為「左派思想家」，可以顯示當時輿論對他的政治定位。1925年之時在陳獨秀的眼中，顧孟餘與汪精衛、蔣介石、胡漢民、譚延闓、程潛、于右任、徐謙、吳稚暉、李石曾、丁惟汾、王法勤等人並列為「國民黨左派的領袖」。⁹³吳稚暉則罵他說是「額角頭上不刻字的共產黨」。⁹⁴不過誠如上述，顧孟餘雖號稱國民黨左派，但自他回國以後所發表的言論來看，他的觀念與共產黨員、中國的馬克思主義者仍有明顯的差距，尤其不贊成唯物史觀、階級鬥爭論與無產階級革命論。共產國際遠東局的調查說「顧孟餘教授現在主管國民黨的鼓動宣傳部，他害怕工人運動和階級鬥爭」。⁹⁵在1926年8月17日第一次與俄人維經斯基(Grigori Naumovich Voitinsky, 1893–1956)會談時，對於「國民黨過於布爾什維化了……隨時可以看到階級鬥爭的精神，而不是民族的精神」而深感憂慮，他說部分的左派黨人甚至比共產黨員還激烈，他們要打倒地主與資本家。例如，汪總是「從馬克思主義的觀點來論述一切」，亦即「把一切都建立在開展階級鬥爭上」。的確，此時顧孟餘與汪兆銘對「階級鬥爭」的看法並不相同，1926年之時，汪兆銘在多篇文章中都肯定馬克思的「階級鬥爭」論，「馬克思看得出社會

間，由汪的英文秘書湯良禮(T'ang Leung-li, 1901–1970)主編，在天津、北平、上海與香港等地出版。參見山田辰雄，〈湯良禮訪問記〉，慶應義塾大學法學研究會編，《法學研究》，第45卷第10號(東京，1972年10月)，頁114。Shuge Wei, *News under Fire: China's Propaganda against Japan in the English-Language*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2017), pp. 136–137. 美國史丹佛大學胡佛研究所與英國國家檔案局FO 371之中藏有一部分的 *People's Tribune*。

92 陳克文著、陳方正編輯、校訂，《陳克文日記，1937–1952》，下冊，頁1329。

93 獨秀(陳獨秀)，〈什麼是國民黨左右派〉，《嚮導週報》，第137期(上海，1925年12月3日)，頁1246。

94 惠林，〈愧死顧孟餘〉，《社會日報》，上海，1932年6月29日，第1版。

95 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譯，《聯共(布)、共產國際與中國國民革命運動(1926–1927)》，上冊，第3卷，頁454。

階級鬥爭的病理」，而主張孫中山的「民生主義」與馬克思的「民生主義」並無衝突、孫中山的民生主義與共產主義也沒有衝突。⁹⁶對顧孟餘而言，「不能持有階級的觀點」，而應號召「各個階級」參與國民革命，爭取民族解放。顧對於蔣中正也感到不滿，他說：「我們很難指望和期待蔣介石向左轉。很可能他會進一步右轉。蔣介石在廣大居民和國民黨眼裡已名譽掃地。這不是因為他對北伐作了軍閥式的闡釋，而是因為他妄圖把全部權力集中在自己手裡，不僅是軍權，而且還要奪取國民黨並使它服從於自己」。⁹⁷這樣看來顧政治立場上其實傾向「中間派」。1926年8月31日，顧孟餘在與維經斯基第二次會談時，明白表示希望由汪兆銘、甘乃光、何香凝與他所領導的國民黨左派能與共產黨合作，雙方「達成協議」、「結成聯盟」，同時由共產黨「提供聯繫」，協助國民黨「在工農群眾中進行工作」，而能「站在農民運動的前列」。⁹⁸不過雙方似乎未能達成共識。

96 如汪在他所寫的〈我們怎樣實行三民主義〉一文，強調「總理憑著馬克思的學說，看出今日的社會經濟狀況，階級鬥爭之現象，必日趨於劇烈，苦心孤詣，想出種種防微杜漸的方法，如節制資本、平均地權等等。綜其要旨，無非以革命的手段，取得政權，以平和的方法，處理經濟，以除去階級鬥爭之病根，而謀社會經濟狀況之安全發展。這正是對於中國今日的社會經濟狀況，而下對症的藥」。汪兆銘，〈我們怎樣實行三民主義〉（1926年4月22日），收入何孟恆編，《汪精衛先生政治論述》，頁765。汪兆銘，〈我們應該怎樣的努力〉（1926年4月22日），收入何孟恆編，《汪精衛先生政治論述》，頁770。汪精衛紀念託管會，汪精衛網站，<http://wangjingwei.org/zh/his-ideas-cn/political-writings/#1447608167429-b11a662e-ac7d>（2017年3月14日檢閱）。

97 〈維經斯基同顧孟餘談話記錄〉（1926年8月17日於廣州），收入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譯，《聯共（布）、共產國際與中國國民革命運動（1926-1927）》，上冊，第3卷，頁398-401。維經斯基的中文名為吳廷康，他是共產國際創立初期有影響的人物，也是中共初創時期經費的實際提供者。其生平事蹟可參考周利生，《吳廷康與中國大革命關係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4）。

98 〈維經斯基同顧孟餘談話記錄〉（1926年8月31日於廣州），收入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譯，《聯共（布）、共產國際與中國國民革命運動（1926-1927）》，上冊，第3卷，頁422-424。

第三節 武漢分共：從左派思想家到「反革命分子」⁹⁹

1926年底之後，顧與蔣決裂，並參與了與汪兆銘主導的武漢分共、改組派、擴大會議等事件。武漢分共一事尤其顯出顧孟餘對汪兆銘思想與行動的重要影響。如上所述，1926年3月20日中山艦事件後，汪被迫出走法國。10月18日國民黨在廣州召開的聯席會議通過迎汪返國案，「推何香凝等四人為迎汪代表，顧孟餘起草迎汪電稿，蔣介石亦有電勸汪返粵」。¹⁰⁰ 1926年底國民政府決定遷都武漢，12月31日顧與譚延闓、張靜江抵達南昌。次年1月3日在南昌行營舉行國民黨中央政治會議第六次臨時會議，就駐在地應為武漢還是南昌進行討論，出現了以蔣中正為首的南昌陣營，與以鮑羅廷、徐謙為核心的武漢陣營之間的權力鬥爭。¹⁰¹ 顧對於此事的態度有些搖擺不定，¹⁰² 他一方面與張靜江一樣支持蔣設於南昌的提案，¹⁰³ 另一方面他似乎也傾向孫科與宋子文等遷都武漢的看法，認為「唯有國府遷漢，黨才免得分裂」。¹⁰⁴ 1927年1月4日蔣在日記中記載「憂患以今日為甚，逼迫振憾，而決議之後，決無成敗利鈍之可慮。只有負責遠行而已。上午顧孟餘同志幾為動搖。子文且以財政無法相要脅。辦事困苦莫甚於經濟相逼也」。¹⁰⁵ 這時蔣希望藉著顧的

99 〈羅易就中國形勢給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政治書記處和斯大林的書面報告〉（1927年5月28日）指出「原先的左派思想家顧孟餘成了不折不扣的反革命分子。他主張實行矛頭明顯指向工人階級和共產黨人的政策」，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譯，《聯共（布）、共產國際與中國國民革命運動（1926—1927）》，下冊，第4卷，頁280。

100 〈時事日誌〉，《東方雜誌》，第23卷第23號（上海，1926年12月），頁143。

101 呂芳上主編，《蔣中正先生年譜長編》，第2冊，頁2。

102 陳公博認為在遷都問題上「顧孟餘呢，比較中立，也與共黨積不相容」。陳公博，《苦笑錄》，頁105。

103 根據譚延闓所記，「開會，議黨部政府設南昌事，子文抗事，公博異語，靜江、孟餘持之甚堅，吾依違而已，餘皆不發言，遂決暫緩遷移」。《譚延闓日記》，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藏，1927年1月3日。

104 陳公博，《苦笑錄》，頁98—106。

105 《蔣中正日記》，1927年1月4日。

力量促成黨內合作，於是親自訪問顧，「請其赴武漢說服譚延闓等將國民政府及中央黨部遷南昌，擺脫共產黨之干擾」。¹⁰⁶ 1月11日，顧以國民黨代理宣傳部長的身份伴隨蔣從南昌出發赴武漢，13日抵達漢口，商討遷移問題，1月18日蔣搭乘長安輪返回南昌。¹⁰⁷ 對蔣來說，遷至南昌的主因是為了擺脫鮑羅廷的影響。1927年1月蔣在武漢期間曾與鮑羅廷發生了一次嚴重的衝突，受到鮑的公開指責，這一件事情讓他覺得是畢生難忘的奇恥大辱（第二次是1958年胡適在台北就任中研院院長時，蔣受到胡適公開的批評）。¹⁰⁸ 蔣與鮑的對話由顧孟餘擔任翻譯，蔣的日記僅簡單記載他的感受，1月12日下午「赴歡迎會，到者約數萬人，講演畢散會。晚宴會，席間受辱被譏，生平之恥，無踰於此。為被壓迫而欲革命，不自由何不死，伸中華民族之正氣以救黨國，俾外人知華人非盡是賤辱而不可侮蔑也」；1月13日又記「昨晚憂患，終夜不能安眠。今晨八時起床，幾欲自殺，為何革命而欲受辱至此」。¹⁰⁹ 蔣在日記之中並未記載詳情，而4月18日他在慶祝國民政府建都南京歡宴席上的演講，則詳細地敘述了他與鮑發生衝突的經過：

我在正月到武漢去的第一天晚上，在宴會場中，我講完了話。鮑羅廷是在最後講話。他居然公開的在宴會中間批評本黨不好。最要緊的一點，是說我們革命軍裡面有摧殘農工的行為，而且對本黨領袖詆毀污蔑得無微不至。最後警告我說「蔣介石同志，我們三年以來，共事在患難之中，所做的事情，你應該曉得，如果有

106 周德偉，《落筆驚風雨：我的一生與國民黨的點滴》，頁203。

107 呂芳上主編，《蔣中正先生年譜長編》，第2冊，頁6-8。

108 「今天實為我平生所遭遇的第二最大的橫逆之來，第一次乃是民國十五年冬——十六年初在武漢受鮑爾廷宴會中之侮辱，今天在中央研究院聽胡適就職典禮中之答辭的侮辱亦可說是求全之毀，我不知其人之狂妄荒謬至此，真是一個妄人，就又增我一次交友不義之經驗，而我之輕交過譽、待人過厚，反為人我輕侮，應切戒之，惟余仍恐其凜病態已深，不久於人世為慮也」。《蔣中正日記》，1958年4月10日。

109 《蔣中正日記》，1927年1月12日。

壓迫農工、反對CP的這兩種事情，我們無論如何，要想法子來打倒他的」。各位，他對於本黨，雖然沒有指明那一個，他講完之後，我本想起來質問他，不料主席徐謙就宣告散會。所以當時沒有質問他。到了第二天我就問他，「你所說的話完全沒有根據。你講出那一個軍人壓迫農工、那一個領袖是摧殘黨權」。當時我問他的時候，是顧孟餘做翻譯的。他竟答不出話來。我說：「你不能說這種沒有根據的話，你是一個蘇俄的代表，你就不能這樣破壞本黨。……如昨夜在宴會中間所講的話，我可以說凡真正的國民黨員，乃至於中國的人民，沒有一個不痛恨你的。你欺負中國國民黨，你仍是壓迫中國的人民。這樣並不是我們放棄總理的聯俄政策，完全是你來破壞我們總理的聯俄政策。就是你來破壞蘇俄以平等待我民族的精神」。¹¹⁰

鮑羅廷的批評給蔣內心帶來的壓力一直無法解除，後來四一二事件即部分肇因於此。此後蔣曾與顧孟餘、何香凝等人會談，1月17日「上午會客，與顧、何二部長敘談。下午往訪孟瀟〔唐生智〕、真如〔陳銘樞〕，議決河南軍事後，參列聯席會議，議決外交宣言案。晚往子文處敘餐，回後會客，與孟餘、香凝談黨事，不勝悲傷」。隔日，他即離開武漢，返回江西。1月19日，他又想起鮑羅廷之事，甚至想要自殺，「余直言，余與鮑爾廷不能相容，既不能為國雪恥，何忍復為余辱國。革命至此，總受帝國主義與外人壓迫，何如及時辭職以謝國民與已死同志之靈，否則殆有自殺而已」。¹¹¹1927年1月27日，蔣記載他曾與顧孟餘、戴季陶與張靜江討論驅逐鮑羅廷之事，不過這幾個蔣口中的「書生」對此均感疑慮。蔣記載「余必欲去鮑爾廷顧問，使政府與黨部能運用自由也，彼等恐牽動大局，不敢決斷。書生辦事，誠非敗壞不可也」。¹¹²

110 淞滬警察廳政治部編，《護黨救國重要文件彙編》（上海：淞滬警察廳政治部，1927年5月），頁48-49。〈蔣介石與鮑羅廷〉，《大公報》，天津，1927年5月10日，第2版。

111 《蔣中正日記》，1927年1月17、19日。

112 《蔣中正日記》，1927年1月27日。

經過多日之思索，蔣決定在遷都一事上與反對者妥協。2月1日「八時起床，與張戴顧各同志商議黨務及鮑事，吾不忍為帝國主義者之誹笑，甯屈己卑思，以求革命之發展，故放棄主張，決將政府遷移武昌也。英國派兵恫赫，日本想來妥協，皆毅然與之決鬥也。生死成敗，置之度外而已，下午回院批閱，寫經緯兩兒各函，不勝感慨與想念而已。舊曆度歲，於此一年中之痛苦艱難，不能與外人道也」。¹¹³ 蔣態度轉變還有一個很關鍵的原因是北伐的軍費、軍餉遭宋子文暫扣不發，蔣從1月1日起讓軍需處長徐桴(字聖禪，1882-1958)與宋子文接洽發款事宜，¹¹⁴ 1月29日蔣又命徐桴去武漢見宋子文，宋則說「湖北財富之區，籌款本易，現政府在南昌，一人辦事不動」，暗示「要解決軍費問題，必須遷都武漢」。蔣在軍費被扣之下，不得不向反對者妥協。¹¹⁵

1927年1月中之時，顧對遷都問題的態度開始轉變。首先是電請汪兆銘回國，1月14日，顧孟餘與何香凝在蔣的同意下，聯名電汪兆銘，請汪返國主持黨務政務，電文中並表示蔣中正已同意汪返國之後，於3月1日開全體會議，決定黨國大政方針。¹¹⁶ 對汪返國的期待可能影響到了顧對遷都一事的態度。其次，顧孟餘也受到李大釗的影響。李大釗於1月24日寫信給顧孟餘與柏文蔚(1876-1947)、王法勤(1869-1941)、徐謙等人談遷都問題而力主遷往武漢，他說：「夫國民政府定都何所，中外觀瞻所繫，豈能朝令夕更，視若兒戲？以今日論，廣州為革命根據，武漢為全國中心，不留於廣州，必遷於武漢，百思而不可得可以遷移南昌之理由？如為集中起見，如果不為一時軍事上的必需，即介石同志及

¹¹³ 《蔣中正日記》，1927年2月1日。

¹¹⁴ 「蔣中正電徐桴希接洽宋子文照發三月份全軍動員臨時費」(1927年1月1日)，〈一般資料——手稿錄底(一)〉，《蔣中正總統文物》，台北，國史館藏，典藏號：002-080200-00396-042。

¹¹⁵ 楊天石，〈北伐時期的遷都問題與宋子文〉，原刊《團結報》，1988年2月2日，收入楊天石，《國民黨人與前期中華民國》(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7)，頁515-517。

¹¹⁶ 〈汪兆銘投日前與政府首要函電(二)〉，《汪兆銘史料》，台北，國史館藏，典藏號：118-010100-0049-049。

總司令部亦宜坐鎮武漢，今忽輕易的提起移都南昌，致令外交團對我內部頻生懷疑，以為我之內部中有危機，不然何以遽棄武漢耶？」¹¹⁷此信對顧氏應該有所影響。2月7日，顧孟餘自九江去電蔣中正，託病返回武漢就醫，「夫婦俱病，回漢就醫，有必要時再赴尊處」。¹¹⁸2月9日，武漢國民黨中央宣傳委員會通過了三項「黨務宣傳要點」：一、鞏固黨的權威，一切權力屬於黨；二、統一黨的指揮機關，擁護中央執行委員會；三、實現民主政治，掃除封建勢力。2月17日，漢口的國民黨中央聯席會議議定「反革命罪條例」，並發宣傳品，批評蔣的「獨裁」與張靜江的「昏庸」。¹¹⁹顧並認為蔣對邀汪回國之事並無誠意，¹²⁰因此定下迎汪返國之大計，支持「迎汪復職運動」。¹²¹蔣感到受顧玩弄，恨之入骨，甚至懷疑他是共產黨間諜，「顧某詆毀中正不遺餘力，以宣傳委員會名義，提倡黨權集中，防制獨裁制，我甚贊成，但CP跨黨，使真正黨員對黨不能信仰，何余欲及時擺脫而又不得苦甚。顧之言行，令人不得不疑其為CP之間諜。彼猶如此，則黨尚能為乎？痛甚」；¹²²「杭州佔領，軍事勝利，沉悶憂患中聊作自慰。而政治與黨務之困難，反因軍事勝利而

117 李大釗，〈李大釗致柏文蔚、王法勤、徐謙、顧孟餘函〉，《李大釗文集》（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4），下冊，頁958-959。

118 〈親批文件——民國十六年一月至民國十七年十二月〉，《蔣中正總統文物》，台北：國史館藏，典藏號：002-070100-00001-003。

119 漢口的中國國民黨中央聯席會議訂「反革命罪條例」，批評蔣中正與張靜江，見呂芳上主編，《蔣中正先生年譜長編》，第2冊，頁23。

120 蔣中正於1926年10月3日曾電請汪兆銘返國「共荷艱鉅」。呂芳上主編，《蔣中正先生年譜長編》，第1冊，頁528-529。但顧孟餘一直不相信蔣，他告訴陳公博：「蔣介石天天說要請汪先生回國，都不是誠意的」。陳公博，《苦笑錄》，頁106。1927年4月3日，在汪返國前夕，蔣又發出「蔣總司令為支持汪兆銘復職之通電」，羅家倫主編，《革命文獻》（台北：中央文物供應社，1957），第16輯，頁2797-2798。

121 此一運動從1926年8月即開始，共產黨結合在廣東以及北伐中崛起的反蔣派系，又支持親汪的軍人唐生智，抑制蔣中正的勢力。李志毓，《驚弦：汪精衛的政治生涯》，頁70、73。

122 《蔣中正日記》，1927年2月18日。

益增。吾黨以孫顧之態度觀之，人心卑污惡劣，一至於此，不敗亦頹，豈其天乎？訓練不到，良心墮落之所致也」。¹²³2月24日蔣又派陳公博赴武漢與宋子文、孫科與顧孟餘討論，為促成黨內團結，決議遷都武漢。¹²⁴

1927年3月7日蔣接到顧孟餘轉來汪兆銘返國電文，在時間上已經延遲了一個月，「接顧孟餘轉來精衛電文，掩藏一月之久，至今日政府遷去而始寄來，其播弄挑撥，幸災樂禍，小生之貪諂，不知有羞恥事。亡黨賣國無所不為，可歎。」¹²⁵蔣又說徐謙與顧孟餘聯合起來反對他，「武漢徐、顧搗亂已極，亡國亡黨，在所不恤，而以必倒中正個人以為快，多見其不自量也」。¹²⁶3月10日至17日，國民黨二屆三中全會在漢口南洋大樓召開，由孫科與鄧演達主導，顧孟餘等人也參加此次會議（圖3.8）。¹²⁷

3月7日，國民黨二屆三中全會舉行預備會議，選舉主席團。此次選舉採用無記名投票，選出五名，結果如下：徐謙13票、譚延闓13票、孫科11票、宋慶齡11票、顧孟餘11票。¹²⁸這一次會議「通過了譴責蔣介石軍事獨裁，統一黨的領導權，統一革命勢力等一系列決議案，決定由汪精衛擔任國民黨中央和國民政府的主要領導職」。¹²⁹此外，於4月2日成立「中央土地委員會」，委員有鄧演達、徐謙、顧孟餘、譚平山與毛澤東等五人，來推動農民運動，以解決土地問題。¹³⁰

123 《蔣中正日記》，1927年2月19日。

124 陳公博，《苦笑錄》，頁105。

125 《蔣中正日記》，1927年3月7日。

126 《蔣中正日記》，1927年3月17日。

127 南洋大樓為原南洋兄弟煙草公司漢口分公司，座落在漢口中山大道，大樓建於1917年，為一西式樓房。國民黨中央黨部與國民政府自廣州遷到武漢之後，此大樓成為國民政府辦公地點與黨政聯席會議的所在地。

128 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編，《中國國民黨第一、二次全國代表大會會議史料》，下冊，頁753。

129 吳克輝，〈北伐時期「迎汪」事件探究〉，《理論界》，2011年第6期（2011年6月），頁113。

130 李戡，《國民黨員毛澤東》，頁309-313。楊天石認為：「二屆三中全會是國民黨左派和中國共產黨人的一次空前的勝利。它完成了1926年中央及各省區聯席

圖 3.8 漢口的南洋大樓之外觀與國民黨二屆三中全會會場



1927年4月初汪兆銘返國，抵達上海，4月5日與陳獨秀（1879–1942）發表聯合宣言，號召兩黨同志「相互尊重，事事開誠」。¹³¹ 4月6日，汪從上海去武漢的船上寫了一封信給李石曾，說明：一、「聯俄容共」為總理所定之政策，「不容輕易更改」；二、如要更改需經過正當程序，此為尊重黨紀。最後，寫到：「弟等今行矣，兄如能繼來與孟餘諸人一

會議未能完成的任務，糾正了二屆二中全會所作出的許多錯誤決定，從新右派手中奪回了黨權和政權，其意義重大。但是，興高采烈的左派們很快就發現，他們的勝利遠不是鞏固的，因為蔣介石還掌握著軍權。當紙上的宣言和決議與槍桿子發生矛盾的時候，前者顯然不能與後者較量」。楊天石，〈北伐時期左派力量同蔣介石鬥爭的幾個重要回合〉，《中共黨史研究》，1990年第1期（北京，1990），頁43。

131 李志毓，《驚弦：汪精衛的政治生涯》，頁76。該宣言之內容見：羅家倫主編，《革命文獻》，第16輯，頁2798–2800。郭華倫，《中共史論》（台北：國際關係研究所，1969），第1冊，頁231–232。

晤，助成弟等此行之目的，感綢無涯。不則弟等之與兄，僅僅意見之不同，道義感情，一切如故」。¹³²

4月10日汪至武漢，受到譚延闓、顧孟餘等人盛大的歡迎。¹³³ 蔣認為汪、陳之聯合宣言顯示汪乃「袒共」，¹³⁴ 4月12日，蔣在上海展開清共，並在南京成立政府。4月18日，南京國民政府成立，蔣並發文否認武漢國民黨的決議，即寧漢分裂：「第二屆第三次全體中央執行委員會之議，皆為徐謙、鄧演達、顧孟餘等，受俄顧問鮑羅廷之指揮所顛倒，所有由該會議產生之機關，其所發命令，本會亦認為發生疑問，並請貴委員等應按酌事實，分別接受與否；其准予接受施行者，以備下屆全體中央執行委員會討論追認，其有不得不否認者，應暫時擱置。因中間夾雜有便於叛徒之命令，恐適釀大患也」。¹³⁵ 4月20日武漢亦掀起規模浩大的討蔣運動，發出通電宣布開除蔣之黨籍，並免本兼各職。5月底汪兆銘、譚延闓、孫科、徐謙、顧孟餘、譚平山、陳公博、毛澤東等四十餘人發出討蔣通電，「悍然自立中央而無所顧，於是一切革命分子，皆被以共產或勾結共產黨之名，除之務盡。今已開始進行，將來必變本加厲。東南革命基礎，由之崩壞，革命民眾，將無噍類。凡我民眾及我同志，尤其武裝同志，如不忍革命垂成之功，隳於蔣中正之手，惟有依照中央命令，去此總理叛徒、本黨之敗類、民眾之蠱賊，為國民革命軍滌此污辱」。¹³⁶

132 汪兆銘，〈四月六日寄李石曾的一封信〉（1927），收入何孟恆編，《汪精衛先生政治論述》，頁782-787。汪精衛紀念託管會，汪精衛網站，<http://wangjingwei.org/zh/his-ideas-cn/political-writings/#1447608167429-b11a662e-ac7d>（2017年11月8日檢閱）。

133 《譚延闓日記》，1927年4月10日。

134 陳公博，《苦笑錄》，頁111。

135 王正華編，《蔣中正總統檔案：事略稿本》（台北：國史館，2003），第1冊，頁232。

136 〈汪譚孫唐等聯名討蔣之通電〉，《工商日報》，香港，1927年5月23日，第3版。

5月之後共黨繼續在各地推行激烈的工農運動。5月21日許克祥(1889–1964)發動「鏟共行動」的馬日事變，濫殺左傾者、釋放所有在押的地主，並宣布擁護蔣中正的南京國民政府。6月「武漢政府因豫局之開展，深感北方之作戰，並軍事政治兩方面之活動，有統一之必要，且為與馮玉祥為完全之聯絡起見，遂決在鄭州開重要首腦會議」。¹³⁷馮玉祥在寧漢分裂中成為第三種力量，寧漢雙方均嘗試拉攏，而馮則從雙方都取得經費。¹³⁸6月6日下午顧孟餘與汪兆銘、譚延闓、徐謙、孫科、加倫(Vasily Konstantinovich Blyukher, 瓦西里·康斯坦丁諾維奇·布留赫爾, 1889–1938, 為軍事總顧問)等人率隨從部隊近400人，在大智門車站，乘火車赴河南鄭州，與馮玉祥、張發奎、唐生智、鄧演達等會議，討論豫陝甘三省事務，並設立開封政治分會，爭取馮玉祥的支持。6月11日汪、譚等人先返，顧孟餘與徐謙則在河南處理後續事務，並擔任開封政治分會的委員，至7月5日才返回武漢。¹³⁹馮玉祥則在前一天(7月4日)「率總部各處，由鄭移洛陽」。¹⁴⁰汪、顧爭取馮玉祥之計劃並不完全成功，報紙記載「據外報載開封消息，漢口總政治部，在開封設立之支部，業被馮玉祥下令關閉，所有人員，亦均全回武漢，離開豫省」。¹⁴¹總之，馮玉祥參加武漢的鄭州會議後，與汪在分共問題上取得一致的看法，但馮不同意「討蔣」，力勸漢方息爭，主張寧漢聯合北伐。會議的結果是將河南、陝西、甘肅的軍事政治交由馮玉祥負責。漢方在獲取馮的支持之後，讓唐生智與張發奎班師回朝，並策劃東征。當時積極支持武漢國民政府的將領主要為唐生智、張發奎、魏益三、魯滌平、何健、劉佐龍等人。¹⁴²會議結束後，加倫表示馮玉祥的立場「加劇了國

137 〈鄭州會議再報〉，《大公報》，天津，1927年6月11日，第3版。

138 王正華，〈北伐前期的蔣馮關係(民國15至16年)——以《蔣中正總統檔案》為中心的考查〉，《國史館學術集刊》，第7期(2006年3月)，頁193–221。

139 《譚延闓日記》，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藏，1927年6月6日至7月5日；郭廷以編，《中華民國史事日誌》，第2冊，頁216。

140 〈馮赴洛陽 顧孟餘回漢〉，《大公報》，天津，1927年7月15日，第2版。

141 〈汴總政治部關閉〉，《大公報》，天津，1927年7月13日，第3版。

142 〈漢口短簡〉，《大公報》，天津，1927年8月5日，第2版。1927年7月23日，

民黨上層首領的動搖。比如，顧孟餘和徐謙表示支持北伐並贊成與蔣介石保持軍事聯繫」。¹⁴³

鄭州會議之後，馮玉祥又在6月19日與蔣中正在徐州見面。蔣同意每月發軍餉兩百萬元；馮同意與蔣聯名通電北伐，並由馮個人致電武漢政府取消，希望達成雙方和解。徐州會議之後，馮致電武漢，促其反共、清黨、驅逐鮑羅廷。同時馮也在豫、陝、甘實行清黨，此舉為武漢分共的一個因素。¹⁴⁴

7月時，汪知悉共產第三國際的陰謀，蘇聯顧問鮑羅廷欲分化國民政府，以助中國共產黨奪取武漢政府權力、破壞國民革命，武漢國民政府也決定分共，結束了第一次國共合作。此一決策過程與顧孟餘關係密切。7月14日汪約了譚延闓、孫科、于右任、陳公博、顧孟餘等人「商國共分家問題」，而得到共識，譚延闓記載「仁智之見，雖各不同，王霸之道，其趨則一」。¹⁴⁵ 7月15日當天下午4時半在漢口中央黨部舉行中央執行委員會第二十次擴大會議。主席為譚延闓，出席者名單如下：「汪精衛、孫科、程潛、于右任、王法勤、陳公博、謝晉、經亨頤、詹大悲、潘雲超、朱霽青、宋子文、何香凝、彭澤民、顧孟餘、譚延闓、鄧懋修」。¹⁴⁶

汪在會議中宣讀了第三國際對中共的訓令，要點有五項，其內容與孫中山的三民主義的想法截然矛盾：

汪曾宴請團長以上的將領九十餘人，這些將領都參加了，席間唐生智演講「望努力打到南京，方可得著出路」。

143 阿納斯塔西婭·卡爾圖諾娃編，張麗譯，李玉貞校，《來到東方：加倫與中國革命史料新編》（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17），頁13。

144 陳哲三，〈鄭州會議與徐州會議：馮玉祥在兩次會議中所扮演的角色〉，《傳記文學》，第45卷第4期（1984年10月），頁63–72。王正華，〈北伐前期的蔣馮關係（民國15至16年）——以《蔣中正總統檔案》為中心的考查〉，《國史館學術集刊》，第7期（2006年3月），頁193–221。

145 《譚延闓日記》，1927年7月14日。

146 本次會議之內容參見：「二屆中央第1–20次擴大會議速紀錄」（1927年7月15日），中國國民黨黨史館藏，檔號：會2.4/14。亦參見李雲漢，《從容共到清黨》，頁557–558。

(一)沒收土地不要國民政府下令，須由下級沒收，怪不得湖南鬧成這個樣子，有一般同志還說農工的行為並不幼稚，原來他們是照著第三國際的訓令在那裡做，但總理在民生主義中說得很清楚，要實行耕者有其田，須以法律同政治的方法來解決，¹⁴⁷也就是說，要由國民政府下令沒收，我們不必批評是由下級沒收的好，還是由上級沒收的好，蘇俄當日就是先由下級沒收，然後政府再加以承認。第三國際固應如此，但與三民主義相衝突，國民黨就應該怎麼辦。

(二)在中央委員之中，增加工農領袖。本黨的中央委員，是由全國代表大會選出，他們有錯誤，當然可以制裁，如楊希閔、蔣介石等之受處分，但中央不能任命誰作中央委員。他們要本黨在中央委員之中，多增加工農領袖，試問有什麼方法可以增加？如何能干涉代表大會的權限？這簡直是破壞本黨的組織，要我們違背總章。

(三)國民黨現在的構造，必須改變。這是何等的大事，中央委員有什麼方法可以改變，而且，又改變成一個什麼東西？(四)由二萬武裝的C.P.同志，及五萬工農分子組織新的軍隊，消滅舊的軍隊，我們的軍隊向來不分C.P.不C.P.，為什麼單單要二萬武裝的C.P.同志組織軍隊？這是根本搖動我們的軍隊，完全變成C.P.的軍隊好了。(五)組織特別法庭處分革命派，不要C.P.同志參加，由老黨員組織。這就是說：讓國民黨來作劊子手。綜合這五條而論，隨便實行那一條，國民黨就完了！

汪又說：

現在不是容共的問題，乃是將國民黨變成共產黨的問題，國民黨的同志想起來，能不痛心，從前C.P.同志加入國民黨，我們知道他們

147 汪在1927年7月5日所寫的〈黨與民眾運動〉一文就談到群眾運動必須接受黨的領導。以土地問題來說，國民黨土地政策是實行民生主義的「耕者有其田」，其實行方法是「用政治和法律來解決」，「不是叫農民起來，搶去地主的田，便算解決」。收入何孟恆編，《汪精衛先生政治論述》，頁794-796。汪精衛紀念託管會，汪精衛網站，<http://wangjingwei.org/zh/his-ideas-cn/political-writings/#1447608167429-b11a662e-ac7d> (2018年11月8日檢閱)。

是要受第三國際的指揮，但我們始終不知道第三國際是如何訓令他們，一直到現在才曉得。一個黨的存在，不外主義與政策，其次是組織，再其次是軍隊，C.P.同志加入國民黨，一方面受國民黨的指揮，一方面受第三國際的指揮，當然是受第三國際指揮的時多，那末，就是國民黨完了，現在所行的不是三民主義，不是建國大綱，是第三國際的訓令。¹⁴⁸

在汪兆銘講話之後，孫科接著發言，他認為從電報內容來看，第三國際企圖將國民黨、三民主義「共產主義化」，因此國共有根本的衝突，無法繼續合作：

關於這個問題，主席團在一月之內天天開會研究，自此問題發生，將國民黨根本搖動，不但搖動了主義，也搖動了政策。我們可以將他們天天所喊的「擁護三大政策」的口號研究一下，看是否與總理的政策相符？總理在十三年決定聯俄，同時容納革命分子加入國民黨，C.P.同志也包括在內。但總理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的訓詞中說得很清楚：我們容納C.P.同志加入國民黨，是要使他們國民黨化。但從第三國際這個電報看來：C.P.同志加入國民黨，是要使三民主義共產主義化，國民黨C.P.化，將國民黨作為C.P.的工具，由第三國際發號施令，以農工專政，將國民黨變成布爾西維克式的革命。這可以證明同總理的政策是兩個東西，而且是互相衝突，絕不能繼續下去。如果他們可以三民主義化，不妨一致努力，如果他們要將我們共產主義化，那就是根本衝突……。

148 1927年7月14日第三國際執行委員會對中國共產黨的訓令如下：「（一）立刻退出國民政府；（二）要求嚴懲一切壓迫農工之人；（三）共產黨員仍留國民黨內勿庸退出；（四）共產黨黨員應負傳布農民革命理論並以有系統的方法鼓動工人農民；（五）共產黨黨員在國民黨以內創立非法的戰鬥的機關」。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關於第三國際宣言的訓令〉（1927年7月27日），收入中央宣傳部編輯，《中國國民黨黨務文件論說集要·第一輯》（武漢：中央日報印刷所，1927年8月），頁19-20。

顧孟餘接著發言，支持汪、孫的分共主張。他在會議中從「主義政策同組織」等三方面來說明為何國共兩者要分家。首先是雙方在主義上的分歧：

現在先說主義，汪同志和孫同志已經說得很清楚，三民主義不是布爾西維克主義，但當初為什麼定下這個容共的政策呢？因為當時共產黨曾聲明認為中國現在不能實行共產主義，願服從三民主義，一致努力國民革命。但共產黨竟不履行這個條件，違背了三民主義，那末，容共的政策當然是失掉了效用。

其次，顧孟餘說國民黨的「三大政策」（聯俄、容共、農工政策）其實不是孫中山所說的，而是1927年1月11日鮑羅廷所製造出來的、「是共產黨的越俎代庖」，其具體內容需加以澄清：

國民黨在歷次的宣言中，本來是有許多政策，但外間宣傳的三大政策，卻找遍了總理遺囑，歷次宣言，以及各種決議案，找不出這麼一個東西。實在說三大政策的歷史很短，不過只有七個月。何以知道只有七個月呢？因為三大政策的內容，在七個月以前還沒有定。今年正月，本席由江西到武漢來，才聽見鮑羅廷同志說起三大政策，並勸大家要遵守，而當時他所說的三大政策，是反帝、聯俄、農工，同現在天天嚷的不同。可見得三大政策的內容，在正月時還沒有定，而且未經過任何會議決定，是共產黨替我們想出來的。於是各軍政治部、各報館、各團體的宣傳，只有三大政策，絕不提起三民主義，但我們要知道：第一、所謂三大政策的歷史很短，不出七個月；第二、所謂三大政策，未經過任何會議決定，是共產黨的越俎代庖。本來政策要靠宣傳，不過這個政策是共產黨代我們定的，也是共產黨在替我們宣傳，所以弄得外間對於本黨很是懷疑。就是說聯俄，也要有一番解釋，外交方面，有外交方面的聯絡，人民方面有人民方面的聯絡，黨部方面，有黨部方面的聯絡。用什麼主體而聯絡，以什麼關係而聯絡？這都是要研究的。至於說容共，究竟是有條件的容，還是無條件的容？也須加以考慮。還有農工

政策，也要以這樣的態度來研究，總而言之，所謂政策，一定要將他的內容解釋清楚，不然，使一般人聽了，只是迷離徬徨，不知道從。

由此可見顧孟餘首先發言否定聯俄、聯共、農工政策的「三大政策」，主張回到三民主義。¹⁴⁹最後顧孟餘則指出中共以錯誤的階級理論，以及為打擊異己所做的左派、右派之區分，來分化國民黨內的同志，「批評友黨的領袖」，破壞了國民黨的組織：

復次，再說組織，一個黨若是沒有組織，決不能存在，但共產黨的組織，與本黨的組織，往往有妨害的地方，例如左右派之分，無論那一黨都是免不了的，不過最近一兩年來，共產黨替我們分左右派實在是分得太不得當了，從前西山會議派是右派，去年春天，孫哲生同志和伍朝樞、吳鐵城成了新右派，到了秋天，新右派的人更多了，本席同在座的同志很有幾個都是的，這種分法本是毫無道理，而他們居然在報上宣傳。還有理論上的主張，同組織也有關係，如果社會上只有兩種階級，那末〔麼〕共產黨的主張恰恰是正式〔原文如此〕，但可惜社會的組織不是這樣簡單。不過共產黨總不願拋棄他們的迷信，至多也不過加上一個小資產階級，例如去年十月，第三國際的報紙公然將國民黨分為幾派：（一）右派，代表買辦階級；（二）蔣介石、戴季陶，代表資產階級；（三）汪精衛同志、何香凝同志，代表小資產階級。那個報紙行銷有二十幾萬份，英法德日幾國的文字都有，照他們所說的看來，國民黨沒有一個乾淨人，國民黨沒有一個是好東西！假如國民黨是共產黨的敵黨，他們發表這樣的言論還情有可原；但一直到現在國民黨還是共產黨的友黨，他們

149 有關國共兩黨對「三大政策」的爭論，及其與革命正統之爭的關連，請參見克思明，〈三大政策的辨正：論國共互爭革命正統的歷史根源〉，《輔仁歷史學報》，期15（2004年7月），頁145-205。作者指出孫中山沒有提出或訂定「三大政策」乃是事實；而共產黨人後來在歷來論述中加以詮釋和運用，企圖通過「肯定孫中山從而肯定自己」亦為事實。

這樣在國際上任意宣傳是很不對的，他們的根本錯誤，就是不應該說某一個人代表某一個階級。現在汪同志、何同志都在座，試問他們兩人承不承認代表小資產階級？而大資產階級與小資產階級的分別又在什麼地方？理論上的錯誤姑且不管，但根據這種錯誤的理論而批評友黨，批評友黨的領袖總是很不是的。在他們眼光中看來，汪精衛同志和蔣介石，一個代表大資產階級，一個代表小資產階級，不是性質上的不同，乃是程度上的差異。簡單一句話，都不是東西，這種說法是搖動一般人的信仰，減少了本黨的組織力量。

以上汪、孫、顧在會議上的發言可以代表武漢分共之後該派的基本觀點。

武漢的分共固然由汪主導，有其現實的考量，然而他也受到周圍的人影響。陳獨秀說：「我於4月初到漢口，第一次會見汪精衛，即聽到他一些有反動傾向的言論，和上海談話時大兩樣。我告之鮑羅廷，他也說是如此，並說汪精衛一到武漢，即受了徐謙、顧孟餘、陳公博、譚延闓等的包圍，漸漸和他疏遠了。蔣介石、李濟深相繼屠殺工農後，國民黨日益看輕了無產階級的力量，汪精衛及國民黨全體中央委員的反動態度與政策日益發展」。¹⁵⁰

汪尤其受到顧孟餘的影響。例如汪兆銘在〈武漢分共之經過〉（1927年11月5日，在廣州中大演講）一文也談到三大政策是1926年時才製造出來的觀念，它與三民主義不應並舉：

兄弟到了武漢，便覺得三民主義與三大政策並舉是很不妥當的，自從國民黨改組以來，第一、二次全國代表大會都未見過三大政策的名詞，這大概是去年才發生的。主義與政策的不同，沒有弄清楚，而把主義與政策相混，這是很不對的。……聯俄與容共政策，為應

150 〈陳獨秀告全黨同志書〉（1929年12月10日），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編譯，《共產國際、聯共（布）與中國革命檔案資料叢書：共產國際、聯共（布）與中國革命文獻資料選輯（1926-1927）（下）》（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1998），第6卷，頁354。

付時代和環境所取的一種政策，不能與三民主義同樣有長久的時間性。時代與環境變了，政策也即隨之而變化的。¹⁵¹

這一觀點與顧孟餘的想法完全一致，可見在七一五武漢分共之後汪、顧同樣否定三大政策而回歸三民主義，此一轉向奠定了汪派的理論與寧漢合作的基礎。

汪派的重要想法都是先由顧在漢口《中央日報》上揭示出來。從分共前後顧所發表的多篇言論即可顯示他在汪派中所具有軍師的角色。在分共前後，顧在漢口《中央日報》上發表了以下幾篇文章，標題分別為〈三民主義與虛無主義〉（7月10日）、〈糾正幾種錯誤的思想〉（7月15日、8月10日）、〈蘇聯政策的航線〉（7月26日）、〈怎樣完成國民革命〉（7月29日）等。

7月10日刊出之〈三民主義與虛無主義〉一文可謂武漢分共之先聲，顧孟餘主張三民主義的工作在建設，虛無主義（指共產主義）的工作在破壞，兩者不能並行。此文主要是針對國民黨改組之後的一個核心的爭論，亦即三民主義與共產主義有無區別。鮑羅廷對共產國際的報告指出：「孫逸仙……認為需要在國民革命運動中同共產黨人合作。他甚至試圖證明共產主義和他的三民主義沒有區別」。¹⁵²顧文刊出後鮑羅廷立刻發現國民黨左派立場的轉變，鮑羅廷後來在〈當前中國政治經濟的形勢〉的報告中指出：

恰恰是在革命最困難的時刻，小資產階級的國民黨人無恥地逃跑了。從這時起，他們開始發表文章論證，國民黨人和共產黨人走的不是一條路。〈孫文主義和虛無主義〉——這就是這個小資產階級的

151 汪兆銘，〈武漢分共之經過〉，何孟恆編，《汪精衛先生政治論述》，頁920。汪精衛紀念託管會，汪精衛網站，<http://wangjingwei.org/zh/his-ideas-cn/political-writings/#1447608167429-b11a662e-ac7d>（2017年3月14日檢閱）。

152 〈鮑羅廷在聯共（布）中央政治局使團會議上的報告〉（1926年2月15日和17日），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譯，《聯共（布）、共產國際與中國國民革命運動（1926-1927）》，上冊，第3卷，頁100。

鼓舞者之一——顧孟餘的一篇綱領性文章的標題，此人被我們當時的處境嚇得要死。他在這篇文章中說，孫文主義，這是進行創造的革命，而虛無主義（所謂虛無主義是指共產主義，共產黨所做的一切就是虛無主義）是在進行破壞，什麼都不創造。¹⁵³

鮑羅廷也注意到「就在一些人發表文章論證國民黨人和共產黨人走的不是是一條路的時候，另一些人，如汪精衛，還在革命與反革命之間搖擺不定。」¹⁵⁴

其次在〈糾正幾種錯誤的思想〉一文中顧孟餘特別批評中共的階級觀念。他說「共產黨的絕對社會階級論，原來是為煽動的需要而杜撰的：必說社會裡祇有兩個階級相對，一個壓迫的，一個被壓迫的，然後容易激動人的情感與義憤，必說社會裡除去壓迫與被壓迫之外沒有別的事情，然後可以集中人的意志」。同時他指出國民黨「不否認階級的存在」，然而「國民黨的意志，並不向着階級，國民黨的眼光，並不望着階級。國民黨工作的對象是『民族』、『民權』、『民生』，民族、民權、民生不是任何階級的事。」

顧孟餘又在〈蘇聯政策的航線〉一文中批評蘇聯對國民黨之政策：

蘇聯的朋友們已往對本黨的政策，不能不說是有很嚴重的錯誤。由以共產黨同化本黨，進而以共產黨代替本黨。這種政策，一面是由於株守刻板式的學說，不知變通；一面是由於對中國的社會經濟的認識，非常的缺乏。蘇聯的朋友們要知道，中國的國民革命，決不能中途變成無產階級革命，特別是要知道以中國的農民革命作城市無產階級革命的後援，這是行不通的……與其將來大失敗，莫如現在懸崖勒馬，改正過去的錯誤。¹⁵⁵

153 〈鮑羅廷在老布爾什維克協會會員大會上所作的《當前中國政治經濟形勢》的報告〉（1927年10月23日），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譯，《聯共（布）、共產國際與中國國民革命運動（1926-1927）》，下冊，第4卷，頁507。

154 〈鮑羅廷在老布爾什維克協會會員大會上所作的《當前中國政治經濟形勢》的報告〉（1927年10月23日），頁507。

155 〈漢口短簡〉，《大公報》，天津，1927年8月5日，第2版。中央宣傳部編輯，《中國國民黨黨務文件論說集要·第一輯》，頁89-91。

顧表示蘇聯的政治路線與國民黨政治路線根本不同，兩黨絕不能長期合作，為此顧頗受中共與共產國際之忌恨。¹⁵⁶在方法上，顧孟餘與周德偉力主和平：「分共，送之出境可也，不必效法京滬之殺人，累及無辜。蓋一開殺戒，不能制軍人行動之橫暴，累及無辜，差也」，故武漢政府採取的分共方式是「驅共產黨人包括鮑羅廷、鄧演達等，遣商輪送之赴九江，任其走上海，亦任徐謙、陳啟修等離武漢」。最早離開的是鄧演達，他於6月從河南回到武漢，6月30日給國民黨中央委員會留下了〈告別中國國民黨的同志們〉一信，譴責蔣、汪的行徑，化裝成檢查電線桿的工人離開武漢，在潼關與鮑羅廷等人歸國的汽車隊會合，同赴莫斯科。¹⁵⁷7月27日，鮑羅廷在陳友仁的兩個兒子（陳丕士和陳依範）陪同下離開武漢，經中亞返回俄國，10月6日安全抵達莫斯科。後來陳友仁也去了上海，8月，再陪同宋慶齡等人秘密乘船赴莫斯科。¹⁵⁸汪兆銘後來在〈武漢分共之經過〉一文即特別強調「中央雖然因為發現共產黨消滅國民黨之陰謀，不得已而與之分離，必經過鄭重的手續，且其分離必採

156 〈顧孟餘先生事略〉，收入國史館編，《國史館現藏民國人物傳記史料彙編》，第17輯，頁565-566。

157 周德偉，《落筆驚風雨：我的一生與國民黨的點滴》，頁205。根據陳克文所述，鄧演達於六月三十日秘密離開武漢，離開之前鄧「往見國府主席汪精衛，苦勸不要動搖，非倚靠民眾，沒有生路；但結果不歡而散。鄧氏覺得已事無可為，遂化裝工人，問道從西北出國」。鮑羅廷則是7月15日武漢政治會議決議分共之後「並准鮑羅廷辭職歸國」。陳克文，〈鄧演達和國民黨左派〉，收入陳克文著、陳方正編輯校訂，《陳克文日記，1937-1952》，下冊，頁1383。山田辰雄指出武漢政府末期已出現汪兆銘與鄧演達所代表的「反共」與「親共」兩條道路，汪主張中國革命之性格為反帝國主義的國民革命，黨的基礎是多階級的，並對各階級之利害作合理之調節，故反對激烈的勞農運動，選擇反共的道路；鄧則主張中國革命有反帝國主義的國民革命與反封建主義的社會革命之兩面性，故支持激進的勞農運動，而選擇了親共的道路。山田辰雄，《中国国民党左派の研究》，頁193-207。

158 陳丕士的書詳細地記載了他們一行人從武漢到莫斯科的經過。陳丕士著、郭濟祖譯，《中國召喚我——我參加中國革命的歷程》，頁104-170（英文版頁118-192）。

和平的方法，而不用激烈的行徑」。¹⁵⁹武漢分共的前後，顧在汪身邊扮演著重要的幕僚角色而影響了汪的決策。後來武漢分共未殺一人，深得輿論及人民之同情。

1927年11月11日，汪在廣州執信學校又以〈分共以後〉為題發表演講，汪兆銘提出一方面應繼續肅清中國共產黨，另一方面則應「重新整理國民革命的理論」，以三民主義為「度量衡」，「將共產黨理論，從國民黨裡分出去」。¹⁶⁰其中最重要的一點是放棄了他在1926–1927年所主張的「階級鬥爭」，認為在中國提出此一說法於民族聯合不但無利，而且有害。他說：

中國現在的情形，是處於次殖民地的地位……就全社會來看，最大的壓迫階級，是帝國主義，而全社會皆處於被壓迫階級的地位。所以中國今日所需要的，祇是國民革命。而國民革命所需要的，是民族聯合，反抗帝國主義。社會間各種力量，應該分工合作，以達此目的。提出階級鬥爭，使社會間自相殘殺，於民族聯合，不但無利，而且有害的。照中國現在的情形來說，已是如此。照民生主義之最終目的來說，「社會之所以有進化，是由於社會上大多數的經濟利益相調和，不是由於社會上大多數的經濟利益有衝突。」所以要達到民生主義之最終目的，也不當採用階級鬥爭之方法，而當採用聯合社會間各種力量的方法。

159 汪兆銘，〈武漢分共之經過〉，何孟恆編，《汪精衛先生政治論述》，頁920。汪精衛紀念託管會，汪精衛網站，<http://wangjingwei.org/zh/his-ideas-cn/political-writings/#1447608167429-b11a662e-ac7d> (2017年3月14日檢閱)。

160 汪在演講中討論到學生運動之時曾說「五六月間，我聞得湖北省黨部青年部的宣傳有所謂『讀書即是不革命，不革命即是反革命』。我初時不信，以為斷沒有如此荒謬的人，說如此荒謬的話，後來問顧孟餘同志，始知確有其事，真是可惡之極了」。由此可見，分共前後顧在汪身邊扮演重要的幕僚角色。汪兆銘，〈分共以後——十六年十一月十一日在廣州執信學校講〉，何孟恆編，《汪精衛先生政治論述》，頁939。

汪並進一步敘述了如何以「民族聯合共同致力國民革命」，來推動農民、工人、商民、學生等運動，而「不去上共產黨階級鬥爭的老當」。¹⁶¹ 上面的觀點與顧孟餘對階級的看法一致，應該也是受到顧孟餘的影響。換言之，武漢分共的理論基礎，以及分共之後汪派的政治理念有很重要的一部分是由顧孟餘所奠立的。

1927年8月9日，汪兆銘與顧孟餘向國民黨員宣傳武漢分共的原因與重要性，他們兩人的演講以〈汪顧兩委員在臨時宣傳大隊開會時之演說〉為標題登載於報紙之上。這兩個演說可以反映武漢分共的核心旨意，也顯示出分共之後汪顧兩人在思想上的一致。¹⁶²

汪顧兩人的演講陳述了武漢分共的主要理由，不過兩人的重點並不相同。汪強調：首先，國民黨實施容共政策之後發現國共無法合作，主要的原因是共產黨背著國民黨的招牌，而實行共產主義，並企圖奪權，想要消滅國民黨。共產黨很巧妙地利用「革命」的理論，一面認為「反共產即反革命」，另一方面又認為國民黨不革命。換言之，只有共產黨才是革命的。此一作法使得他們不得不採取清共的政策。其次，國共兩黨

161 汪兆銘，〈分共以後——十六年十一月十一日在廣州執信學校講〉，何孟恆編，《汪精衛先生政治論述》，頁925-942。汪精衛紀念託管會，汪精衛網站，<http://wangjingwei.org/zh/his-ideas-cn/political-writings/#1447608167429-b11a662e-ac7d> (2017年3月14日檢閱)。此文引起吳稚暉的不滿，他撰寫了〈吳稚暉對於汪精衛之分共以後的贅言〉，在上海《民國日報》上連載，他說武漢汪集團的「清黨」是執行「第三國際反共倒蔣的命令」，「仍舊跑到國民黨裡來，打倒國民黨」，並說「倒蔣」「就是打倒國民黨的武力」。吳稚暉此言論是為蔣介石張目。11月17日在汪的策劃下，張發奎、黃琪翔等人在廣州發動驅逐桂系李濟深、黃紹竑的政變。吳則藉「張黃事件」批評汪兆銘與顧孟餘，「以最近的把戲而論，顧孟餘先生在什麼地方，什麼地方就會打起來。他在漢口，唐生智便被人打起來了。他到廣州，黃紹雄（即黃紹竑）又被人打了。難道唐生智可以被人打，黃紹雄就不可以被人打。止許州官放火，不許百姓點燈。我們對黃琪翔、張發奎便有異議」。吳文收入上海會文堂新記書局編，《黨國名人重要書牘》（上海：會文堂新記書局，1929），頁112-141，引文見頁113。

162 〈汪顧兩委員在臨時宣傳大隊開會時之演說〉（1927年8月9日），中國國民黨黨史館，《一般檔案》，一般436/160.2。

在理論上無法調和。共產黨在理論上「劫持」了國民黨的理論。共產黨「暗暗中遂以共產黨的理論，代替國民黨的理論。甚至凡不與共產黨的理論主義相調和的，就認為〔是〕反革命的理論」。這樣的做法使「大家都以為國民黨沒有左派，左派就是共產黨」，國民黨左派因而無立足之地。第三，在國民黨開始和平分共之後，「他們遂喪心病狂似的明白向國民黨進攻。最近九江南昌等處的陰謀，相繼爆發，唯一的目的是要推翻我們國民黨、國民政府和國民革命軍！」這樣一來國民黨只有團結一致，「打倒他們，才有出路」！

顧孟餘的講話則有以下重點。第一，他呼應汪之觀點，指出「容共」政策本意是為了團結一切革命勢力，然而共產黨卻藉著國共合作企圖奪權，來「破壞國民革命」，這迫使國民黨提出分共之主張。第二，中共背後是「第三國際」，他們奪權的目的在實行「無產階級革命」，然而無產階級革命在理論上無法立足。共產黨號稱代表無產階級，然無產階級並非地痞流氓，而此一階級在中國並不發達。中共所謂無產階級專政實際上是共產黨專政。顧認為「共產黨人學問經驗大都非常幼稚，還不如一個中學生，絕不明白中國的國情」。中國共產黨真正代表的是地痞流氓的「假革命」。第三，他批評南京的國民黨和腐化分子、官僚政客相勾結，「南京派所謂國民黨員，天天拉攏軍閥，官僚政客，和一切腐化分子，企圖鞏固自己的地位。這種政策，就是國民黨的自殺政策」。第四：國民黨在社會階級上代表一切被壓迫的民眾，要實行人民自己當家作主的「民權主義」，這一條路才能真正解決中國的問題。由上述對汪顧兩人演講的摘述可見，汪長於政治煽動；顧則長於理論闡釋，為汪建立政治觀點的理論基礎。

寧漢對峙之中，馮玉祥公開支持武漢清黨（並不予蔣軍事上之護持），唐生智亦領兵東征，使得蔣中正不得不考慮下野。1927年8月14日蔣通電下野。9月16日寧漢合作，1926至1927年間分裂的國民黨、國民政府再度合而為一。寧漢合作後成立了由新桂系操控的「中央特別委員會」，控制了國民政府的大權，並且排擠汪兆銘。是年年底，汪前往廣州，想依賴張發奎、唐生智與南京對抗，發生了廣州張黃事變（欲

奪取李濟深軍政大權)與共產黨策動的廣州武裝暴動等。¹⁶³國民黨內對汪與陳公博、顧孟餘展開攻擊,12月初第四次中央全體會議預備會議中,中央監委張靜江、李石曾、蔡元培、吳敬恆等彈劾汪、陳、顧,認為黨內糾紛歸結於共產分子之雜入,而汪陳顧等三人「師共黨故智,買空賣空,變亂視聽」,應予察看,停止出席正式會議,以免產生重大糾紛。¹⁶⁴在南京方面的命令下,桂系的李宗仁、白崇禧(1893-1966)一方面在軍事上擊敗了張發奎與唐生智的軍隊,另一方面則主張懲處同情共產黨的國民黨員,而將矛頭對準汪兆銘。汪在桂系的逼迫之下於1927年12月15日辭職,再度流亡法國(至1929年11月方返國)。1928年初陳銘樞任東路總指揮,指揮第11軍討伐張黃,並取得勝利。1928年1月7日,中央執行委員會常務委員會決議「汪精衛、陳公博、顧孟餘、甘乃光四人應停止出席,交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處分」。¹⁶⁵2月2日,在國民黨二屆四中全會三大,組成了以譚延闓為主席的國民政府和以蔣介石為主席的軍事委員會;4日,通過蔣所提「黨務政治之徹底更始案」,「黨內黨外均應徹底更始,重新團結,以謀黨基之安定,而利革命之進行」,「將容共期中之理論與方法,一舉清之」;¹⁶⁶7日,選出蔣中正、丁惟汾、譚延闓、戴傳賢、于右任為中央執行委員會常務委員。¹⁶⁷此次會議前,中央黨部執監聯席會議曾對粵籍委員參與問題有所討論,「介石主席,蔡子民提出彈劾案」,後來決定何香凝、王法勤、陳樹人(1884-

163 陳克文,〈廣州共黨暴動目擊記〉,收入陳克文著、陳方正編輯、校訂,《陳克文日記,1937-1952》,下冊,頁1346-1351。11月18日,張發奎自任廣州軍事委員會主席,以汪派人物顧孟餘、陳公博分別出任廣州政治分會主席和廣東省長。

164 參見〈中央監委張人傑等彈劾汪陳顧文〉,廣州平社,《廣州事變與上海會議》(廣州:廣州平社,1928),頁163-166。

165 〈時事日誌〉,《東方雜誌》,第25卷第5號(上海,1928年3月),頁130。

166 〈蔣中正等於中國國民黨二屆四中全會關於黨務之提案〉,羅家倫主編,《革命文獻》,第17輯,頁3138-3152。

167 秦孝儀編纂,《總統蔣公大事長編初稿》(台北:中國國民黨黨史委員會,1968),第1卷,頁199-200。

1948)等人可以參加，¹⁶⁸汪兆銘、甘乃光、陳公博、顧孟餘等人則被限制出席。至1928年8月8–15日，國民黨二屆五中全會開會前，廣西派委員如李宗仁、李濟深(字任潮，1885–1959)，以及監察委員李石曾、張靜江、吳稚暉、蔡元培等，對廣東派委員的出席仍有意見。¹⁶⁹後來粵方委員出席者五人，為何香凝、陳樹人、王法勤、王樂平(1884–1930)、潘雲超，而陳公博與顧孟餘等人則未出席。¹⁷⁰

第四節 改組派與擴大會議

汪出走之後，陳公博與顧孟餘為重振革命精神，宣揚改組國民黨之理念，在蔣的同意下，由宋子文出資協助，¹⁷¹在上海分別辦了兩個刊物，一為陳公博主持的《革命評論》，一為顧孟餘主持的《前進》雜誌(圖3.9)。¹⁷²陳公博回憶說「《革命評論》的陣營，有許德珩、施存統、劉侃

168 《譚延闓日記》，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藏，1928年1月31日。

169 因粵變導致汪等之出席問題的相關史料參見：編者不詳，《汪陳甘顧出席問題》(出版地與出版者不詳，1928)。

170 呂芳上主編，《蔣中正先生年譜長編》，第2冊，頁301。王樂平於1930年2月18日，在上海被蔣派人所刺殺。汪兆銘、陳公博、顧孟餘等人為此曾發表聲明，抗議「蔣系這次的野蠻卑怯的行為」。查建瑜編，《國民黨改組派資料選編》(長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頁589–592。

171 蔣對於這兩個刊物的支持必須放在蔣、汪、胡三人的關係上來考察。段智峰對此有所分析「汪精衛於年底出國後，蔣汪合作仍予以維持，這一點突出地體現在蔣對待陳公博、顧孟餘等汪精衛心腹的態度上。1928年，當陳公博、顧孟餘等人籌辦《革命評論》與《前進》雜誌時，即得到了蔣的經費支持。此後，陳公博等人無論是通過《革命評論》與《前進》雜誌宣傳改組理論，還是舉辦所謂大陸大學培養改組派骨幹，皆未遇到國民政府的掣肘，這一切沒有蔣的默許，陳公博等人的活動不會如此順利。但國民黨二屆五中全會後，蔣介石與胡漢民合作漸入佳境。蔣要維持與胡的合作關係，就不能不對留在國內的汪系有所動作。此後，《革命評論》與《前進》雜誌相繼在當局高壓下被迫停刊」。段智峰，〈蔣汪合作研究(1931–1938)〉(杭州：浙江大學歷史系博士論文，2012)，頁41。

172 《革命評論》1928年5月7日於上海出刊，至1928年9月11日發表啟事，宣布停刊。《前進》雜誌半月刊於1928年6月1日在上海創刊。查建瑜，〈改組派的主

圖 3.9 《前進》與《革命評論》封面



元、蕭淑宇，最後加入黃惠平。《前進》的陣營，有潘雲超、王樂平，此外還有許多化名的黨員」。¹⁷³此外，1929年春天之後，周德偉赴上海，依附顧，為其核閱《前進》的稿件。¹⁷⁴

陳、顧兩人號稱汪手下的「左膀右臂」、「左輔右弼」、「哼哈二將」，不過兩人性格有所不同。當時報紙上曾有文章加以評論，「陳顧皆出身北大，陳篤信唯物、顧則大倡唯心；陳矯健而顧則有暮氣；陳有青年氣

要報刊》，收入查建瑜編，《國民黨改組派資料選編》，頁701-702。《前進》雜誌到1929年初才停刊。目前看到的最後一期是第1卷第11期。

173 陳公博，〈改組派的史實〉，查建瑜編，《國民黨改組派資料選編》，頁37。陶希聖記載1928年12月他參加「改組同志會」，然不曾為《革命評論》執筆。他記得「陳公博主辦《革命評論》週刊。他經常約集執筆者談話。那些執筆者之中，有程希孟、許德珩、沈懷素、陳翰笙、劉侃元、施復亮（即施存統）等，大抵是以唯物史觀來解釋三民主義的左傾分子。十三年中國國民黨改組之後，共產黨稱這種理論為『中山主義』。至此時，那些左傾分子自稱為『革命的三民主義』」。陶泰來、陶晉生整理，《陶希聖年譜》（台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2017），頁101-102。

174 周德偉，《落筆驚風雨：我的一生與國民黨的點滴》，頁213。

概、顧則官僚自負；陳注意下層組織、顧則著重政治活動，以故兩人積不相能，明爭暗鬥，由來已久」。¹⁷⁵也有人認為「陳與顧……兩人的性格卻不同：一個是不可一日無官的，一個對權位的觀念就淡泊得多」。¹⁷⁶另一篇報紙文章則說：「每一次改組派集會商討重要決策時陳公博總是慷慨陳詞，顧孟餘則縝密分析；陳公博陳述的結果是『無事不可為』，顧孟餘分析的結果是『無一事可為』；陳處處採進攻方式，顧處處用退守辦法；於是，一般人就替顧取了一個名稱：『取消派』」。¹⁷⁷

兩人所辦的雜誌風格也有所不同。陳公博談到：「我辦《革命評論》，所有文章都署名，他們辦《前進》，文章署名與不署名隨各人的自便。這個辦法決定後，我便找宋子文……他答應每月補助我們三千五百元，二千元是辦《革命評論》，而一千五百元是辦《前進》。」¹⁷⁸兩刊經費上的差異與陳、顧兩人辦刊的方向有關。顧的個性謹慎，他「無意廣收徒眾，藉以避免誤會」。在刊物內上力求理性討論，少有「愛而加諸膝、怒而墜深淵」的兩極化作法。¹⁷⁹他說「余辦刊物，只宣傳中山之主義

175 政聞，〈顧孟餘陳公博之爭鬥〉，《福爾摩斯》，上海，1933年3月31日。陳公博也承認兩人對組織問題有不同的觀點，「我是當時極力主張有組織的，孟餘先生則不大贊成有組織的」。陳公博，〈改組派的史實〉，查建瑜編，《國民黨改組派資料選編》，頁41。

176 陶菊隱，《最後一年》（上海：中華書局，1947），頁187-188。陶菊隱也說陳公博「性嗜女色」，所以陳璧君對他沒有好感，「怕他帶壞了汪先生」（頁190）。顧在這方面與陳公博不同。

177 陳拾遺，〈顧孟餘：第三勢力暗流人物〉，原刊1950年5、6月間香港出版的《星島晚報》，收入「軍事委員會委員長侍從室人事調查表」，〈顧孟餘〉，《軍事委員會委員長侍從室》，台北，國史館藏，典藏號：129-200000-3519。

178 陳公博，《苦笑錄》，頁180。蔣對《革命評論》與《前進》的經費補助在胡漢民返國之後因蔣胡合作，「蔣先生要表示示好於胡」而停止補助。然此二刊物在停止補助之後仍繼續出版，故蔣在1928年9月之後開始查禁改組派的刊物。在《革命評論》、《前進》被國民黨查禁後，陳公博、顧孟餘、潘雲超、施存統等人，先後發行《民意》、《民心》、《民主》、《民眾先鋒》等雜誌，亦被查禁。陳公博，《苦笑錄》，頁184；張順良，〈國民黨中央如何取締改組派的言論及其報刊（1928-1930）〉，《正修學報》，第20期（高雄，2007年11月），頁303-325。

179 胡耐安，〈皓首榮歸顧孟餘〉，《傳記文學》，第22卷第3期（台北，1973年3月），頁32-33。

及反共之主張，且將精選文章，不涉及人事糾紛問題。只擬出一小型刊物，且恐不能按時出版，無須多錢」、「吾輩所主張者，為反對軍事同志專政，不涉及私人恩怨……凡國民黨人，不論其現在擁護何人，將來均可化敵為友，為吾人之政治資本」。至於陳公博則採取不同策略，他一方面廣收群眾，因此「施存統、劉侃元等共黨分子加入」，此外陳公博的「素惡桂系指己為共產黨」，極力攻擊桂系，顧孟餘對此頗不以為然。顧孟餘曾經告訴周德偉「刊物決須將共產黨之言論洗伐淨盡，對桂系亦不必攻擊」。¹⁸⁰

這兩個刊物風格上的差異主要源於理論取向的不同。陳公博說：「《革命評論》的主張著重於民生革命，而在《前進》的主張則著重於民主政治」。陳公博所謂的「民生革命」是指，中國最終革命之鵠的在民生。¹⁸¹至於顧的主張則是「在民主勢力一天沒有養成而充實之前，一切裁兵計劃都是空談。民主勢力的養成與充實，在中國今日，祇有依靠本黨，依靠本黨的民眾運動」。¹⁸²這兩者的不同又牽涉到兩人對於社會階級的看法。陳公博主張「社會有階級的，不過我想以黨的力量調和而至消滅階級的鬥爭」，對他而言，「國民革命應該以農、工和小資產階級為基礎」，採取群眾運動、民主的集體主義與階級聯盟的激進方法推翻軍事獨裁；¹⁸³顧孟餘則為避免階級鬥爭起見，根本否認階級的存在與唯物史觀，他認為中國沒有階級之分，只有職業之分，故不應有階級鬥爭；國民黨的基礎是農民、工人及一般小市民，但卻不能說國民黨只代表這些人。他針對先前在武漢政權時，共產黨對農民與土地問題的政策與做

180 施存統(1899–1970)與劉侃元(1894–1989)均為宣傳馬克思主義的學者。周德偉，《落筆驚風雨：我的一生與國民黨的點滴》，頁212–213。

181 陳公博，《苦笑錄》，頁188。

182 公孫愈之，〈為第五次會議再進一言〉，《前進》，第1卷第5期(上海，1928年8月)，頁2。

183 陳公博，《苦笑錄》，頁188。韓孝榮認為陳公博與陶希聖對階級的看法較類似，他們都承認階級的存在，但質疑階級鬥爭的可應用性。Xiaorong Han, *Chinese Discourses on the Peasant, 1900–1949* (New York: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2005), p. 104.

法，於雜誌上發表大量關於「中國農民問題」的文章，從理論上與實際上，闡明中國社會非階級社會，乃「職業社會」，力闢階級鬥爭之謬。兩人在理論取向上的不同，使他們對於名詞使用都無法取得共識。陳公博說「在名詞就爭過好幾次。我主張還以社會學的名詞，攻擊共產黨的理論，所以仍用『小資產階級』、『階級鬥爭』的術語，而孟餘非改為『小市民』、『各界』的字樣不可」。¹⁸⁴

在土地問題上，顧肯定孫中山所提出的「平均地權」、「耕者有其田」，並主張用和平與合法的土地改革來解決中國土地分配的問題（而不像陳公博那樣以「土地國有」為終極目標）。¹⁸⁵他又大力駁斥共黨所謂中國是「封建社會」或「半封建半資本主義社會之說」。顧也認為馬克思與恩格斯的唯物辯證法並非基於科學與實證的研究，只能說是一種玄學。¹⁸⁶他反覆地反駁中共以解放農奴、打倒封建制度等方法來解決土地問題的說法：

中國沒有農奴，中國的農民沒有守田的義務，沒有強迫的力役，所以中國沒有封建制度。中國的農民問題，中國農民的土地問題，另

184 陳公博，〈改組派的史實〉，查建瑜編，《國民黨改組派資料選編》，頁42。陳公博指出顧孟餘對「階級」(class)的翻譯詞彙有戒心，因此將階級翻譯為「界」，所以農工階級變成了農界、工界。然而陳不以為然，他認為社會有此事實則即使避免使用階級，仍會出現「界限鬥爭」、「壓迫界」、「被壓迫界」等術語。陳公博，〈答荊璞先生論國民黨代表什麼〉，《革命評論》，第16期（上海，1928年8月），頁27。

185 Wai-chor So, *The Kuomintang Left in the National Revolution, 1924–1931*, pp. 87–88.

186 有關陳公博支持馬克思觀點與顧孟餘的反對馬克思觀點之對照與分析，參見Wai-chor So, *The Kuomintang Left in the National Revolution, 1924–1931*, pp. 63–68, 151–153。由瞿秋白主編的中共中央機關報《布爾塞維克》上有文章對顧孟餘的觀點大力抨擊，又揭示國民黨內部的矛盾。如撒翁的〈請看中國的階級與鬥爭！〉一文中認為中國當前的主要問題是階級利益鬥爭，而非國民黨所謂「國民革命中，應犧牲階級利益，而為民族利益鬥爭」，他又說：「顧孟餘卻一口斷定，中國沒有階級，所以不應有階級鬥爭。然而吳稚暉卻一口咬定，顧孟餘是共產黨」。撒翁，〈請看中國的階級與鬥爭！〉，《布爾塞維克》，第1卷第15期（上海，1928年1月），頁501。

有牠的特別性質……此地先要辨明的是：中國的農民問題與中國的土地問題，是絕不能在打倒封建制度的口號之下解決的。

顧孟餘甚至援引俄共反對派托洛斯基(Leon Trotsky, 1879-1940)對中國問題的說法來支持自己，此派主張世界革命，在中國問題上批判國共兩黨、反對國共統一戰線，顧、托雙方立場不同，但批判的對象相同，且有一部分觀點類似：

在俄國共產黨以內……反對派的杜洛斯基等，不但否認中國的農民革命有變成無產階級革命的可能，並且否認中國有封建制度。杜洛斯基的意思，以為中國的問題，最重要的，是關稅自主後建設本國的工業。¹⁸⁷

由此可見顧孟餘主張政治上主張民主化、經濟上以和平的土地改革解決分配問題、實現工業化的基本觀點。

後來汪兆銘設法調停顧、陳雙方，然而改組同志會內部的理論「自始就沒有統一」。¹⁸⁸不過就最關鍵的階級問題來說，汪兆銘傾向於支持顧孟餘的觀點。他公開表示：「關於階級理論之評判，我所最佩服的，是顧孟餘同志所說」、「顧孟餘同志已經說過，共產黨人根據著不正確的絕對階級論應用起來，創為聯合戰線之說」。¹⁸⁹汪氏認為大資產階級、

187 顧孟餘，〈國民黨必須有階級基礎嗎？〉，《前進》，第1卷第3期(1928年7月)，頁6-12。公孫愈之，〈中國農民問題(未完)〉，《前進》，第1卷第4期(1928年7月)，頁1-11。公孫愈之，〈中國農民問題(下)(續第四號)〉，《前進》，第1卷第6期(1928年8月)，頁1-11。

188 陳公博，《苦笑錄》，頁189。

189 汪精衛，〈階級理論之應用〉，刊於《京報》(1930年5月18、19日)，收入波多野乾一編，《現代支那之記錄(一九三〇年五月)》(北京：燕塵社，1930)，頁257。收入汪精衛，〈階級理論之應用〉，《汪精衛先生最近言論集》(香港：南華日報社，1930)，頁149-157。汪氏並將顧孟餘的兩篇文章〈關於階級問題之最後一言〉、〈論唯物史觀〉，收在本文之後作為附錄，與他所討論的「應用」問題相互配合。參見汪精衛，《汪精衛先生最近言論集》，頁157-180。顧孟餘所說的「絕對的階級論」是指「把階級放大至於包羅一切，把階級鬥爭看作歷史的內容」。顧孟餘，〈關於階級問題之最後一言〉，頁158。

小資產階級或無產階級「學理上雖有區別，事實上標準難定，敲剝未到，財主也是小，敲剝已到，五十元以上的耕牛，也就夠作資本家了」。他支持顧孟餘以「小市民」一詞取代陳公博之「小資產階級」。他認為國民革命旨在解放「被壓迫在下層之大多數人民」，在革命過程中，國民黨領導「農民、工人、商人和學生」，根據共同之主義，而非共同的物質利益聯合起來，為「民族解放」而奮鬥。¹⁹⁰

1928年11月28日，改組同志會正式成立，至1931年方解散，為期約兩年，主要參與者為顧孟餘、陳公博、王法勤、何香凝、王樂平、朱霽青（1899–1955）、陳樹人、甘乃光等人，以顧、陳為領袖。該會以國民黨正統自居，聲稱「本會繼承本黨孫總理的革命精神，以至誠接受孫總理的全部遺教，和第一、第二次代表大會的綱領，集合革命同志，努力改組運動，務期重新建設能擔負實現三民主義的中國國民黨而後已」。¹⁹¹

改組派成立之初，蔣對此深表不滿。1929年3月至9月，蔣中正在日記中大罵改組派與共產黨，對他來說兩者沆瀣一氣：「近日以來，改組派、共產黨反動傳單約有卅餘種之多，民眾與黨員信仰不堅者，頗為誘惑」、「改組派反動之極，反對收回中東路權。國民多視外交非己事。嗚呼！人心已死，可悲也乎」、「對敵易而對所部實難也。共產黨、改組派之造謠惑眾，無中生有，亦以今日為甚。內憂外患，公義私情，未有如今日之難也」。¹⁹²

1929年3月15日，蔣在南京召開國民黨第三屆全國代表大會，20日會中通過「一警告汪先生，二開除顧孟餘黨籍三年，三永遠開除甘乃光和我〔按：陳公博〕的黨籍」。¹⁹³ 3月21日《中央日報》上刊出了上述會

190 汪精衛，〈階級理論之應用〉，《汪精衛先生最近言論集》，頁149–157。王克文，《汪精衛·國民黨·南京政權》，頁143。

191 改組派的綱領見陳公博，〈黨的改組原則〉，《革命評論》，第10期（上海，1928年7月），頁1–5；參見張順良，〈析論國民黨改組派的由來、起迄時間與綱領〉，《正修通識教育學報》，第2期（高雄，2005年6月），頁337–360。

192 《蔣中正日記》，1929年3月14日、8月4日、8月19日。

193 陳公博，《苦笑錄》，頁208；亦參見〈時事日誌〉，《東方雜誌》，第26卷第10號（上海，1929年5月），3月20日條，頁162。該會開會前兩天，1929年3月13

議的決議。¹⁹⁴ 1929年6月28日，陳果夫建議蔣通緝改組派幾位領袖：「弟此次北上，親見北方黨務複雜已極，改組派及各種反動勢力到處活動、破壞中央，或勾結土劣，或誘脅青年，甚至軍閥時代之舊官僚政客，亦操縱搗亂于幕後，謀危本黨、毫無忌憚。弟認為非進一步嚴懲紀綱，不足以戢奸邪而正人心。擬請提出常會，將顧孟餘、陳公博、朱霽青、郭春濤及其他改組派首領，令行通緝，同時並將在粵謀亂之人，一併由國府通緝，庶幾視聽一新，種種妖言鼓動，無所憑以求逞，而後可謀根本上統一黨內之意志，以保黨基於不墜，兄等之意如何，即請商決示復」。¹⁹⁵ 此舉造成反蔣勢力之團結。汪兆銘的改組派與西山會議派在樹立民主、反蔣獨裁的目標之下結合在一起。此外，顧孟餘還建議汪做兩件事：第一，聯絡素來反對汪的桂系軍人，爭取其支持；第二，聯絡北方軍人閻錫山與馮玉祥。¹⁹⁶ 1929年10月11日，國民政府以「勾結軍閥餘孽，破壞國軍編遣之進行……實屬罪無可逭」，下令追緝改組派人士，「各機關一體按名協緝，務獲歸案嚴辦，以遏亂萌，而肅綱紀」(圖3.10)。¹⁹⁷ 1929年11月25日，在國民黨三中全會第52次會議中，決議將「顛覆黨國」的十位改組派領袖，陳公博、王法勤、柏文蔚、朱霽青、白雲梯、王樂平、顧孟餘、陳樹人、潘雲超、郭春濤等人永遠開除黨籍。¹⁹⁸

日「汪兆銘、王法勤、陳公博、王樂平、顧孟餘、陳樹人、何香凝、甘乃光、潘雲超等十四人宣言反對南京之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郭廷以編著，《中華民國史事日誌》，第2冊，頁438。

194 〈三大大會正式會議之第三日〉，《中央日報》，南京，1929年3月21日，第1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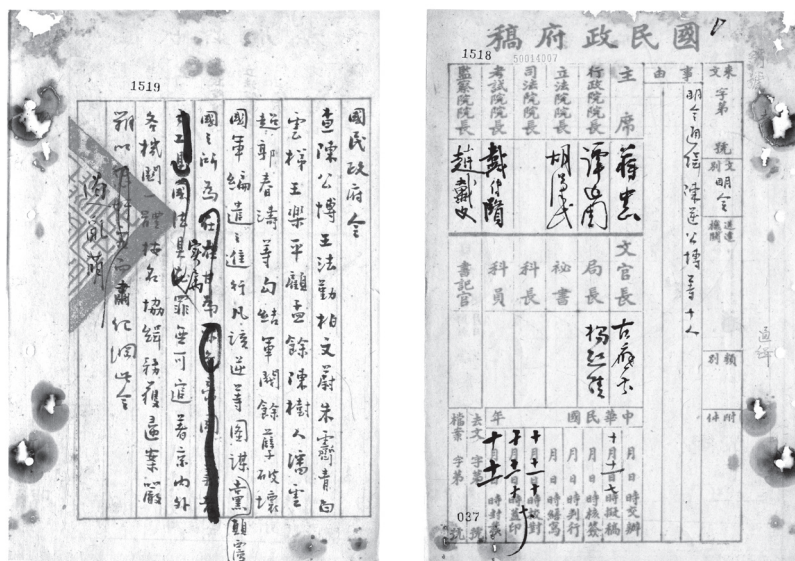
195 吳淑鳳編註，《蔣中正總統檔案：事略稿本》(台北：國史館，2003)，第6冊，頁96。

196 望塵生，〈顧孟餘之錦囊〉，《社會日報》，上海，1931年5月27日。

197 〈時事日誌〉，《東方雜誌》，第26卷第23號(上海，1929年12月)，頁114；〈國民政府令十八年十月十一日〉，《國民政府公報》，第292號(南京，1929年10月12日)，頁1。

198 中央監察委員會函：〈陳公博等永遠開除黨籍案〉(南京中央黨部，民國18年11月25日)，《國民黨三屆中常會第52次會議速記錄》(南京中央黨部，1929年11

圖 3.10 緝捕令



1930年初改組派對外之聯繫都由顧孟餘電商於汪，再交由王樂平執行。汪與地方實力派如閻錫山與馮玉祥的聯繫也是如此。3月21日閻錫山致電在天津的陳公博與王法勤，表示「今欲縮短革命期間，早免民眾痛苦，非迅速成立政府別無他法。惟環顧國中能領導中外同志，勝此重任者，舍汪先生殆無第二人」。陳、王於當日立即回電，表示反蔣之重點在政治與經濟，而非軍事。他們又表示汪希望閻錫山能出任國民政府主席。閻錫山則將雙方往來電文轉給馮玉祥。3月25日馮表示同意成立政府，「尚乞早定大計而奠國本」。¹⁹⁹

月28日)。轉引自：張順良，〈改組派與國民黨中央海外黨務組織爭奪戰初探（1928–1930）〉，《花蓮教育大學學報》，期23（花蓮，2006年11月），頁343。

199 「復天津陳委員王委員嘗密馬電」（1930年3月21日發）、「天津陳委員王委員嘗密號電」（1930年3月21日到）、「天津陳委員王委員嘗密漾電」（1930年3月24日到）、「潼關馮總司令士密同芒種電」（1930年3月25日到），〈討論黨國大事

1930年中，汪兆銘、顧孟餘等先後離開香港到北平舉行擴大會議，結合閻錫山、馮玉祥及西山會議派與南京中央相對抗。²⁰⁰ 7月13日擴大會議在北平正式成立，並發表宣言。汪兆銘於7月15日搭乘加賀丸離港，經日本長崎、門司，再乘長城丸，於7月23日抵達天津，至天津後不作停留，立即前往北平，此行由陳璧君、顧孟餘與曾仲鳴等同行。²⁰¹ 8月7日在北平中海懷仁堂正式舉行第一次會議，通過「擴大會議處置大綱」、「中央政治會議規則」，並推定顧孟餘、潘雲超、傅汝霖(1895–1985)、薛篤弼(1892–1973)、張知本(1881–1976)等人出任宣傳部委員。²⁰² 9月1日公布「國民政府組織大綱」，並推定閻錫山、馮玉祥、汪兆銘、李宗仁、唐紹儀、謝持、張學良七人為「國民政府委員」(張學良於9月4日通電拒絕接受)，閻錫山為「國民政府主席」。9月2日汪兆銘、顧孟餘、陳公博等七人出任約法起草委員，由汪任委員長。²⁰³ 9月25日擴大會議由北平移至太原開會，至10月27日完成「太原約法」。根據周德偉的回憶，當時軍事甚亟，無暇召開會議，約法草案「由顧孟餘一人草擬完成」，其主要精神為「結束訓政，制訂憲法，還政於民，以示大公……並規定政權和平轉讓辦法，杜絕軍人把持政權」。²⁰⁴ 如陳克文所述，改組派成為擴大會議之靈魂。擴大會議並沒有得到具體的結果，只能說「它前後兩次宣言所提的有關政治、軍事和黨務的主張不能不說在當時較為開明，較為符合民主原則的」，並對後來「訓政時期約法」有

之件(五)政治附組織政府》，《閻錫山史料》，台北，國史館藏，典藏號：116-010101-0097-174。

200 陳克文著、陳方正編輯、校訂，《陳克文日記，1937–1952》，下冊，頁1356。

201 〈汪精衛一週內到京，今日抵門司，顧孟餘等同行〉，《大公報》，天津，1930年7月20日，第3版。〈汪精衛到北平：顧孟餘陳璧君同行，對記者發表黨見政見〉，《通問報：耶穌教家庭新聞》，第29號第1407回(1930年7月)，頁12。

202 〈時事日誌〉，《東方雜誌》，第27卷第19號(上海，1930年10月)，頁128；收入呂芳上主編，《蔣中正先生年譜長編》，第3冊，頁205。

203 〈時事日誌〉，《東方雜誌》，第27卷第21號(上海，1930年11月10日)，頁113。

204 周德偉，《落筆驚風雨：我的一生與國民黨的點滴》，頁289、295。

所影響。²⁰⁵ 沈雲龍(1909–1987)則認為「『太原約法』為擴大會議最具意義之唯一收穫」。²⁰⁶ 後因張學良(1901–2001)派兵入關，閻、馮軍事失敗，1930年11月1日汪偕陳、曾等經大同、雁門關，沿平綏路至平津，再轉赴香港，顧孟餘與汪等於太原分手，陳公博則在大同延後一日出發，變裝乘車赴北平後南下，眾人分途出走，擴大會議垮台。²⁰⁷

1931年春，顧孟餘與陳樹人、王法勤等蟄居天津，「暗中主持該派華北黨務，並代表汪氏與閻、馮等秘密往還，收發函電」。²⁰⁸ 他們又在閻錫山的資助下創辦《人民日報》，以彭學沛(1896–1948)為總主筆，「竭力揭揚武裝同志專政之失，並鼓吹約法及憲政」。²⁰⁹ 5月7日，他與謝持、鄒魯等西山派，乘船自津赴港，協助汪兆銘處理因湯山事件引發寧粵之爭的相關事務。²¹⁰ 5月27日汪兆銘聯合反蔣勢力在廣州成立中國國民黨「中央執監委員非常會議」，由汪擔任該會議主席、孫科為廣州國民政府主席，發表「反蔣援胡」之宣言，要求蔣下野。²¹¹ 在非常會議期間，粵派，亦即胡漢民、陳濟棠等人，對汪兆銘一派採取所謂「去皮存骨」政策，亦即只要汪個人，而排斥汪派的陳公博、顧孟餘等人。²¹² 汪赴粵之時本擬帶顧孟餘同行，因古應芬(1873–1931)等人對他仍感疑慮，「汪

205 陳克文著、陳方正編輯、校訂，《陳克文日記，1937–1952》，下冊，頁1363、1357。

206 沈雲龍，〈擴大會議之由來與經過〉，《傳記文學》，第33卷第4期(台北，1978年10月)，頁19。

207 有關擴大會議，參見沈雲龍，〈擴大會議之由來與經過〉，《傳記文學》，第33卷第4期(台北，1978年10月)，頁11–20；陳進金，〈另一個中央：1930年的擴大會議初探〉，國史館編，《國史上中央與地方的關係——中華民國史專題第五屆討論會》(台北：國史館，1999)，第2冊，頁1441–1470。

208 克夫，〈顧孟餘由津赴港〉，《社會日報》，上海，1931年5月12日。

209 周德偉，《落筆驚風雨：我的一生與國民黨的點滴》，頁316。

210 克夫，〈顧孟餘由津赴港〉，《社會日報》，上海，1931年5月12日。

211 沈雲龍，〈廣州非常會議的分裂與寧粵滬四全代會的合作〉，《傳記文學》，第35卷第3期(台北，1979年9月)，頁15–26。

212 陳公博，《苦笑錄》，頁265。Wai-chor So, *The Kuomintang Left in the National Revolution, 1924–1931*, p. 188.

見右派對顧空氣惡劣，恐惹起反感，故亦不敢召其赴粵」；汪只帶了中層幹部前往廣東。顧乃北歸天津，至8月經汪在粵兩個多月的疏通，「並負責擔保其一切言論行動」，方「由非常會議通過准顧赴粵工作」。這時隨汪在粵工作的前改組派要人除了原有的陳樹人與經亨頤(1877–1938)外，又增加了顧孟餘。²¹³寧粵擾攘數月，然雙方均未用兵。不久發生九一八事變，在外敵欺凌之下，蔣感到獨力難支，須迎汪入主政治，因而促成了汪蔣之合作。蔣派宋子文、朱培德與汪聯繫，密電汪「介兄與弟等願與我兄合作，純出至誠」；他們並分化汪與粵方之關係，表示「廣東要汪先生是只要骨頭，不要皮，我們南京要汪先生是連骨帶皮一起要」，此話不但打動了汪，也打動了汪派分子。顧孟餘聽到之後表示「我們與其受地方小軍閥的氣，不如投降中央大軍閥」，極力贊成汪蔣合作。²¹⁴1931年12月15日，蔣為促成團結辭去國民政府主席與行政院長。1931年12月22日至29日，國民黨召開四屆一中全會，蔣、汪、胡三派表面上實現統一，以林森為主席、孫科為行政院長，蔣、胡、汪為中政會常務委員，輪流負責主持會議。國民黨高層再次團結以共赴國難。顧孟餘被選為中央執行委員、常務委員，此外又擔任財務委員會委員、中央政治會議委員。²¹⁵

213 波光，〈汪召顧孟餘赴粵〉，《社會日報》，上海，1931年8月13日。

214 金以林，《國民黨高層的派系政治：蔣介石「最高領袖」地位是如何確立的》（北京：社科文獻出版社，2009），頁294–296。引文出自周一志，〈「非常會議」前後〉，全國政協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文史資料選輯》（北京：中華書局，1960年9月），第9輯，頁88。

215 劉維開編，《中國國民黨職名錄》，頁100–107。

第四章

汪蔣合作(1931-1938)

自1931年的九一八事變至1938年12月底汪兆銘發表「豔電」，脫離重慶，展開對日和談為止，在汪、蔣合作的架構下，國民黨高層再度凝聚共識。顧孟餘在此合作過程中扮演著十分重要的角色。他「力主團結禦侮」，促成汪、蔣、胡三方的合作，因而「奠定八年抗戰的基礎」。¹ 1932年初汪出任行政院長，顧協助汪組閣與從事「黨務改革」，推動黨內民主，3月汪任命顧孟餘為鐵道部長。這個職位是顧氏政治生涯的一個高峰，讓他有機會展現出政治上的才華。他在部長任內，以鐵道建設，支援抗戰建國。1935年11月15日蔣中正在中國國民黨第五次全國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之中談到，1931年後的四年間鐵路建設的成果遠遠超過前此階段：「鐵路方面，這幾年來，同浦路係省款營造及京蕪路係商辦者不計外，由中央直接經營的如粵漢路已展築至三百五十公里，隴海路展築至三百七十五公里，蘇嘉路七十公里，浙贛路三百公里。尤其在隴海路延長到西安，乃是經過這三年的經營方始完成。粵漢路現在也完成了一大半，照目下工程進展的程度，計算預料明年雙十節前可以全部通車。所以我們觀察過去數年來的交通建設，自民國二十年以後，四年間所成就的，比二十年以前所成就的尤多，差不多可以作一個劃分的

1 梅恕曾，〈顧孟餘先生的生平與往事〉，《傳記文學》，第29卷第1期（台北，1976年7月），頁8。

時期」。²由此可見顧孟餘在部長任內對鐵路建設所做的重要貢獻。卸任鐵道部長之後，他退離政治舞台，「豔電」後與汪分道揚鑣，1940年至重慶投奔蔣陣營後才重返政壇。

第一節 汪蔣合作與汪氏組閣

汪蔣合作的重要契機是九一八事變。九一八事變之後，國民黨內部要求團結的聲浪日增。³根據周德偉的回憶，蔣此時對孫科與粵系之厭惡要超過汪，故願意與汪合作，以聯汪制粵。⁴汪得到此一消息後「派顧孟餘密赴上海，與陳銘樞斡旋和議」，迨和議談成，雙方再正式聯絡。⁵9月20日南京的國民黨中央致電粵方，希望精誠團結、共赴國難。9月

2 〈蔣中正以中政會議代表向大會報告〉，《中國國民黨第五次全國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速記錄》，台北：中國國民黨黨史館藏，檔號：會5.1/36.7。「同蒲路」應該指同蒲鐵路，該鐵路自山西大同，經太原至風陵渡口，過黃河至華山站與隴海鐵路交匯，全長865公里。

3 周德偉，《落筆驚風雨：我的一生與國民黨的點滴》，頁317。有關此時國民黨內部派系之爭與最後達成團結之經過，請參考金以林，〈汪精衛與國民黨的派系糾葛——以寧粵對峙為中心的考察〉，《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青年學術論壇（2007年卷）》（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9），頁450–473。金以林，《國民黨高層的派系政治：蔣介石「最高領袖」地位是如何確立的》，頁249–283。

4 周德偉描寫雙方接觸：「蔣氏知顧孟餘能包辦汪精衛之事，乃遣黃郛、張群乘軍艦赴香港迎顧」。又說黃郛與顧原為「北京大學同事」，兩人「交情甚篤」，又「自民國二年不參加中華革命黨以來，亦久通於汪」。黃、張見到顧之後，黃郛對顧表示「奉蔣先生之命來謁先生，願求良策，團結全國，應付危局」。顧回答：「良策須出自蔣先生，余手無寸柄，又何能為？」黃曰：「余等奉蔣先生之命，獲得全權，凡公所提示之辦法，蔣先生皆不折不扣，一概接受，只以團結全國各方為第一義，且尤尊重汪先生之地位」，顧回答：「既如此，此易事耳」，雙方因而達成協議。周德偉上述的回憶有嚴重誤差。如黃郛與張群不曾赴港，赴港的寧方代表為陳銘樞、蔡元培與張繼，後顧與陳銘樞等人同行赴滬。周德偉，《落筆驚風雨：我的一生與國民黨的點滴》，頁317–318。

5 海天出版社編，《現代史料》（上海：海天出版社，1934），第二集，頁73。

21日粵方代表汪兆銘、孫科、古應芬諸人發電，要求蔣下野，蔣氏表示願意與胡漢民、汪兆銘合作，自願交出政權。9月23日蔣指派蔡元培、陳銘樞、張繼三人赴港，商討如何共赴國難。蔣指示在此黨國存亡之際，為求圓滿解決，「僅可退讓一切」，然「必須來滬面商，方是開誠相見、同舟共濟之道」。9月29日粵方代表汪兆銘、孫科、李文範與寧方代表蔡元培、陳銘樞、張繼在香港談判，達成協議。後寧方三人於30日抵達廣州，與粵方會談。10月5日再度達成協議，要求蔣先釋放胡漢民。⁶10月7日，「陳銘樞離粵北返，粵方代表顧孟餘、黃華表同行」，⁷劉叔模（改組派）亦一同前往。⁸顧孟餘代表汪派、黃華表（1897–1977，廣西岑溪人）則代表桂系，北上斡旋。

10月11日，顧孟餘等人於下午2時半抵達上海，「在馬斯南路張靜江宅，與中央要人李石曾、吳鐵城、孔祥熙等，一度會商和平辦法」，商談結束後，「顧則留滬，寓法租借辣斐德路某外國飯店，候胡漢民來滬」。⁹陳銘樞於晚間11時與張靜江、李石曾、吳稚暉、吳鐵城、熊式輝晉京。¹⁰10月13日，蔣一方面指示張群在上海與顧孟餘「周旋接洽」，

-
- 6 金以林，《國民黨高層的派系政治：蔣介石「最高領袖」地位是如何確立的》，頁249–258。
 - 7 沈雲龍，《黃膺白先生年譜長編》，上冊，頁452。黃華表畢業於美國華盛頓大學教育系、加利福尼亞大學及丹福大學研究院，獲教育碩士學位。1926年歸國後，歷任廣西代理教育廳廳長、教育廳廳長、國立南寧師範學院院長等職。1927年在「清黨」中黃華表大規模搜捕中國共產黨黨員及左翼人士。
 - 8 陳銘樞於1931年9月底，透過改組派劉叔模（1897–1975）和自己的親信許錫清（1899–1978）與汪兆銘聯絡，並將汪願意來滬會談，甚至願意與胡漢民決裂的情況密電給蔣。後陳銘樞、劉叔模與顧孟餘搭同一條荷蘭船從香港去上海，並在船上討論和談的問題。參見劉叔模，〈一九三一年寧粵合作期間我的內幕活動〉，全國政協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文史資料選輯》（北京：中華書局，1960年9月），第17輯，頁115–117。亦參見金以林，《國民黨高層的派系政治：蔣介石「最高領袖」地位是如何確立的》，頁251–252、296–297。
 - 9 克夫，〈顧孟餘怕見新聞記者〉，《福爾摩斯》，上海，1931年10月13日，第2版。
 - 10 〈陳銘樞顧孟餘等到滬，即與在滬各中委會商一切，陳即晚返京覆命顧黃留滬〉，《時事新報》，上海，1931年10月12日。

另一方面則同意釋放遭其軟禁了八個月的立法院長胡漢民，次日胡漢民離開南京赴上海。¹¹ 10月18日，赴粵協商之蔡元培、張繼與粵方代表「汪兆銘、孫科、李文範、伍朝樞及陳友仁、唐生智、張發奎暨隨員等九十餘人由香港赴滬」。¹² 10月19日，國民黨中常會通過「凡因政治關係，遭開除黨籍者，一律恢復」，其中包括汪兆銘、顧孟餘、陳公博、甘乃光、李宗仁、馮玉祥、閻錫山、周德偉等35人，並「俟第四次全體代表大會開會時提請追認」。¹³

10月20日汪兆銘抵滬，22日蔣、汪、胡三方在上海孫科住宅召開和平會議，進行了三個小時的會談，達成和平統一的初步協議。¹⁴ 汪代表粵方發言：「提出總司令制宜廢除；主席制度不負政治上之責任，推年高德劭者任之；黨務宜由國民黨第一、二、三屆中央委員會同集議，決定辦法後再行召集四全大會」。蔣對此表示贊成，並說「胡、汪先生同意的事，無不同意照行」。¹⁵ 11月12日南京國民黨召開四全大會，于右任為主席、蔣中正演講，確立「團結內部」、「抵禦外侮」的兩大使命（23日閉幕）。會中並追認了上述汪兆銘、陳公博、顧孟餘等三百餘人的「恢復黨籍案」。¹⁶

對汪而言，寧粵會談的重點是以德法式的虛位主席（總統）、英法式的「責任內閣」，加上蘇聯式之委員制所結合成的政治體制，期望能從制度上抑制蔣的軍事獨裁，從而為施展自己的政治抱負贏得一定的空

11 呂芳上主編，《蔣中正先生年譜長編》，第3冊，頁530。蔣在日記中寫到：「下午展堂來會，約談半小時。心自慚愧，然神明泰然也」，《蔣中正日記》，1931年10月13日。「批閱後訪展堂，約談半小時。余以過去之是非曲直皆歸一人任之，並自認錯誤，彼亦感動。十時彼赴滬，派員送行」，《蔣中正日記》，1931年10月14日。

12 沈雲龍，《黃膺白先生年譜長編》，上冊，頁453。

13 呂芳上主編，《蔣中正先生年譜長編》，第3冊，頁534。

14 金以林，《國民黨高層的派系政治：蔣介石「最高領袖」地位是如何確立的》，頁261-263。

15 呂芳上主編，《蔣中正先生年譜長編》，第3冊，頁537。

16 金以林，《國民黨高層的派系政治：蔣介石「最高領袖」地位是如何確立的》，頁287。

間。¹⁷基於抑制蔣氏獨裁之考量，汪、顧亦主張設置「財政委員會」（當時軍費佔歲入的80%以上）。11月6日，京粵代表的第六次會議，決定「（一）設立財政委員會，以行政院長兼主席，（二）軍費用途以國防及剿匪為限」。11月11日「中央執委會臨時會議……通過財政委員會組織大綱及人選」（圖4.1）。¹⁸當天胡適就收到宋子文與張嘉璈（公權）的電報，邀約他參加此一委員會，胡適在日記寫道：「財政委員會之設是要監督財政，實行預算。此時談不到此事，但子文意在借財委會作一種擋箭牌，如此會能行使職權，亦可稍稍制裁軍人的浪費」。¹⁹國民政府的財政委員會由27人組成，分為政治界、工商界、金融界與學者四類。學者代表名單有：顧孟餘、胡適、馬寅初、朱家驊、楊銓（杏佛）等人。11月15日舉行財政委員會，由蔣主持，顧、胡均未出席。會中宋子文報告財政狀況入不敷出（軍費每月不足一千兩百餘萬元），張嘉璈則說公債發行宜有限制。蔣很明顯感到壓力，在日記中感嘆「上午財政會議，銀行界張公權等要脅政府，使政府仰其鼻息，痛哉」。²⁰

財政委員會的設置與顧孟餘的想法有密切關係。他的專長即為財經，同時他也考慮到未來有可能出任汪內閣的財政部長兼行政院副院長，故提議組織此一委員會。財政委員會的設置目的在政治上是牽制蔣的獨裁，然在施政上則是以此「為財政部之最高諮詢機關，專門研擬財政改革計劃」，審查軍政費概算、稽核公債之發行、考核收支，並設置特派員，調查地方財政。²¹此一機構運作至1937年，而顧孟餘一直擔任委員。²²

17 羅敏，〈蔣介石與1932年汪（精衛）、張（學良）交惡〉，收入黃自進、潘光哲主編，《蔣介石與現代中國的型塑——領袖的淬鍊》（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13），第1冊，頁472。

18 郭廷以編著，《中華民國史事日誌》，冊3，頁103、105。〈財政委員會組織法令案〉，《國民政府》，台北，國史館藏，典藏號：001-012071-00339-027。

19 《胡適日記全集》，冊6，頁614。

20 《邵元沖日記》，1931年11月15日，頁795。《蔣中正日記》，1931年11月15日。

21 周德偉，〈落筆驚風雨：我的一生與國民黨的點滴〉，頁321。

22 張朋園、沈懷玉合編，《國民政府職官年表（1925–1949）》（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87），第1冊，頁386–387。

圖 4.1 財政委員會組織大綱

財政委員會組織大綱				
第一條	國民政府為審查國庫各項收支實行財政統一並起見特設財政委員會			
第二條	本會設委員十八人以行政院院長充之委員十六人由行政院人員及全國軍工商業經濟學者選有附屬之專家充之			
第三條	本會之職權以整理財政以審查軍政各費之概算(即總撥發公債之概算)收支數目之核對及公佈			
第四條	本會設秘書處定期開會一次由委員召集之			
第五條	每屆新政府成立前向呈報收支概算開單報告本會審查			

1931年12月15日在以胡漢民為首的黨內反對派與廣東地方實力派的聯合逼迫下，蔣中正再度下野。²³他為了「以維團結而挽危亡」，辭去國民政府主席、行政院長及海陸空軍總司令本兼各職。同日，中常會決議批准蔣之辭職，並決定以林森代理國府主席，陳銘樞代理行政院長。²⁴12月17日，顧孟餘從上海赴南京。²⁵18日顧孟餘與陳璧君、陳公博代表汪與蔣協商，希望蔣參加政府、主持監察院，蔣「毅然允之」，並同意出席國民黨四屆一中全會。²⁶12月22日，蔣在參加四屆一中全會前

23 廣州的國民黨四大大會否認「上海和會」，堅持蔣下野，解除其兵權、開除其黨籍。郭廷以編著，《中華民國史事日誌》，冊3，頁110。

24 金以林，《國民黨高層的派系政治：蔣介石「最高領袖」地位是如何確立的》，頁328-329。

25 12月17日「留滬中委孫科、陳友仁、鄒魯、李文範、伍朝樞、居正、覃振、謝持、陳公博、顧孟餘、王法勤等三十餘人乘車抵京。汪兆銘藉病留滬」。沈雲龍，《黃膺白先生年譜長編》，上冊，頁461。

26 「上午與璧君、孟餘、公博談話，精衛先徵求余參加政府為監察院，與上海大世界十委員問題，助其解決，然後肯前來南京，余毅然允之」，《蔣中正日

召見陳公博、顧孟餘、王法勤，表示「本黨現值存亡危急之際，急須一得各方信仰之領袖，主持一切。本人甚盼汪先生能不顧一切，任此艱鉅。前在滬時，曾向汪先生面述此意，汪太客氣，希望請三位再代轉達。中興本黨非汪莫屬」，意圖聯汪制粵。²⁷然實際上蔣氏心中對汪派深感不滿。他在當天日記中表達了對顧、陳、王等三人之痛恨，「上午與顧孟餘、陳公博、王法勤三君談話後，到一中全會，腐惡敗類，凡為余之仇敵，皆被余打倒者，今皆齊集一堂，與之相晤，余對彼等惟有可憐可笑可歎，而毫無芥蒂之嫌，以若輩敗類，皆不足為我仇也」。²⁸

四屆一中全會以孫科、于右任、丁惟汾、顧孟餘、伍朝樞、何應欽為主席團，會中通過了〈關於中央政制改革案〉，再依據該案通過〈修正中華民國國民政府組織法案〉，從制度上打破過去蔣氏的獨裁。顧孟餘出任中央執行委員會常務委員會之委員（其他八人為蔣中正、胡漢民、汪兆銘、于右任、葉楚傖、居正、孫科與陳果夫）；²⁹他也出任特種外交委員會之委員。³⁰此外汪派相關人物如陳璧君、王懋功、曾仲鳴、谷正

記》，1931年12月18日。「上海大世界十委員」是指支持汪之代表退出廣州四全大會，於1931年12月3日在上海「大世界」舉行代表大會，選舉中央委員。後大世界所選出的委員被寧粵兩方所接受，而併入國民黨的第四屆中央委員。陳克文，〈南華日報與中華日報〉，收入陳克文著、陳方正編輯校訂，《陳克文日記，1937–1952》，下冊，頁1357–1358。蔣任監察院長的提議後因廣東方面不同意而作罷。胡漢民認為蔣任此職有隨時推翻政局之可能，故屬意于右任。金以林，《國民黨高層的派系政治：蔣介石「最高領袖」地位是如何確立的》，頁365–367。

27 金以林，《國民黨高層的派系政治：蔣介石「最高領袖」地位是如何確立的》，頁357。引文出自〈會後蔣返奉化〉，《國聞週報》，第9卷第1期（上海，1932年1月1日），「一週間國內外大事述評」，頁7。

28 《蔣中正日記》，1931年12月22日。

29 金以林比較四屆中常委與三屆中常委的人選，指出「增加了汪精衛、顧孟餘、居正三名原反蔣派領袖，以代替原親蔣的譚延闓、戴季陶、丁惟汾」。金以林，《國民黨高層的派系政治：蔣介石「最高領袖」地位是如何確立的》，頁370。

30 《邵元冲日記》，1931年12月23日，頁809。特種外交委員會至1932年1月2日結束。有關此一委員會的成立過程、決策方式與主要活動，參見左雙文，〈「九·一八」事變後南京國民政府設立的特種外交委員會〉，《近代史研究》，2003年第1期，頁296–314。

綱(1902–1993)、朱霽青、彭學沛、唐有壬(1894–1935)、郭春濤、范予遂(1893–1983)、潘雲超、鄧飛黃、蕭忠貞(1897–1943)、陳樹人、甘乃光等均被選為國民黨第四屆中央執行委員或中央監察委員。至於由中央執行委員和中央監察委員組織的「中央政治會議」由蔣、汪、胡三人任常務委員(由主席制改為常委制)，開會時輪流主持，曾仲鳴任秘書長。³¹12月底汪指派顧孟餘、陳公博與陳果夫聯絡，商討汪蔣合作。四屆一中全會之後由林森任國民政府主席，孫科出任行政院長(任期甚短，1932年1月1–29日)。

1931年底至1932年初，汪派在進入中央黨部擔任核心成員之後，顧孟餘即領銜在中常會提出「黨務改革案」，推動黨內民主。黨務改革案提案人計14人，計有：顧孟餘、陳公博、郭春濤、谷正綱、唐生智、王法勤、朱霽青、曾仲鳴、范予遂、蕭忠貞、陳璧君、潘雲超、鄧飛黃、王懋功，均為汪派中出任中央執行委員、候補中央執行委員、中央監察委員、候補中央監察委員的成員。黨務改革案主要有三點。第一，黨組織的調整：組織、宣傳兩部改為委員會，訓練部取消，另設民眾運動委員會。第二，黨部採取秘密運作的方式：縣及普通市以下之各級黨部一律秘密運作，並避免腐化、壓迫民眾。第三，推動黨內民主，實施「民主集權制」，亦即「實施有民主基礎的集權」，各級黨部應由黨員所選舉之委員來主持，以集中黨的力量與統一黨的行動。1月25日中常會通過了改革案，僅將第二點「一律秘密」調整為「力求秘密」。³²汪派所提出

31 劉維開編，《中國國民黨職名錄》，頁98–99，107–108。其中彭、唐、郭、范、鄧都是顧所提出之人選，而彭學沛(曾任北京大學政治學教授)、唐有壬(唐才常三子、畢業於日本慶應大學，曾任北京大學經濟學教授)兩人本非改組派，顧孟餘為籠絡大學教授，因而支持此二人，以擴大改組派之影響力。周德偉，《落筆驚風雨：我的一生與國民黨的點滴》，頁318。有關中央政治會議的角色及演變，參見劉維開，〈訓政前期的黨政關係：以中央政治會議為中心的探討〉，《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報》，第24期(台北，2005年11月)，頁85–129。

32 〈黨務改革案〉(1932年1月)，中國國民黨文化傳播委員會黨史館藏，《第四屆中央常務委員會會議紀錄》，檔號：會 4.3/24.15。

的黨務改革一方面延續了改組派時期的政治主張，另一方面則為汪氏主政奠定了基礎。

至1932年1月中，孫科因外交部長陳友仁提出的「對日絕交」政策受到各方反對，又得不到蔣汪各派之支持，已無法應付此一困難局面。³³1月15日蔣將一封親筆函交行政院副院長陳銘樞，16日晨陳至上海，將蔣函交顧孟餘轉給汪兆銘。汪得函後即赴杭州與蔣晤面會談。蔣在日記中記載他與汪兆銘（蔣在日記中稱他為「季新」）、孫科等人談話之經過：1月17日「上午與季新兄談話約一時半，余以精誠對之，彼當能諒解也」。1月18日「上午會客，季新兄來談甚久，接京電對日絕交案勢難終止，必欲通過，故急電哲生來杭詳談，幸未通過也。下午在煙霞洞與季新、哲生會晤，晚在澄廬商談，決不待展堂覆電，余與汪入京相助也」。

1月26日孫科辭職。1月28日蔣在日記中記載他勸汪出來組閣：「下午，往訪季新，與之商外交方針，確定：一積極抵抗；一、預備交涉，彼即贊同，並有願任行政院長之意。余再勸之，彼乃允就，晚即開會通過。」³⁴總之，此次汪蔣會談雙方達成協議，由蔣氏主理軍事及剿共，汪氏出掌行政院（兼內政部長）。³⁵3月18日，蔣宣誓就任軍事委員會委員長。

汪上台後的首要工作在處理對日問題，他提出「一面抵抗，一面交涉」的方針。1月27日，國民黨中央政治會議決議成立外交委員會，「行政院長、參謀總長、外交、軍政、海軍等部長為當然委員，蔣作賓任主席兼常委，顧孟餘、顧維鈞、王正廷、羅文幹為常務委員」。³⁶汪在被選

33 金以林認為：孫科的新內閣的情況是「內外交困」、「焦頭爛額」，一方面得不到蔣的支持，另一方面也遭到反蔣各派的抵制，而蔣、汪、胡三方又分別控制原有的政治勢力，使孫科無法處理此一錯綜複雜的局面，而促成蔣汪合作。參見金以林，《國民黨高層的派系政治：蔣介石「最高領袖」地位是如何確立的》，頁373–384。

34 《蔣中正日記》，1932年1月17、18、28日。

35 陳公博，《苦笑錄》，頁273。

36 《邵元冲日記》，1932年1月27日，頁824。呂芳上主編，《蔣中正先生年譜長

為行政院長的當天即爆發一二八淞滬戰役（由十九路軍與第五軍協同抗日），國府決定遷都至洛陽，4月7至12日汪主持了「國難會議」，討論如何團結禦侮，汪兆銘、蔣介石、于右任、居正、顧孟餘為主席團成員。會後發表宣言，主張「對外必須有獨立自主之外交，對內必須有充實國防之準備」。³⁷ 5月5日在英美法義等國協調下，汪在上海英國領事館與日本簽定「淞滬停戰協定」，簽訂之後乃宣告還都。

汪接任行政院長之後亦積極處理人事方面的布局。他決定「以羅文幹為外交部長，宋子文為財政部長，何應欽為軍政部長、陳公博為實業部長……教育部長則以政務次長〔段錫朋〕暫代，留待有份量之學人。汪氏自兼鐵道部長，留待蟄居上海之顧孟餘，以曾仲鳴為鐵道部次長，唐有壬為政治會議秘書長，褚民誼為行政院秘書長」。³⁸ 3月8日離開洛陽，返回南京後，汪再次任命內閣成員，「任顧孟餘為鐵道部長，朱家驊為交通部長，蔣氏忌其通於汪、顧，乃薦其軍需總監俞飛鵬為交通部政務次長以監視之」。顧曾又有意建請北京大學文學院院長胡適出任教育部長。周德偉當時擔任鐵道部秘書，他記載「顧孟餘知前途艱難，乃棄過去與胡適之宿嫌，建議以胡適為教育部長，命余撰函請胡……並命令余持函請朱家驊〔孫科內閣之教育部長〕會簽」，並由時任鐵道部參事、胡適密友張慰慈（1890–1976）牽線，然胡適力辭不就。³⁹ 4月8日晚

編》，第3冊，頁600。蔣作賓（1884–1942）時任駐日公使，1935年成為中國第一位駐日本大使。

37 秦孝儀編纂，《總統蔣公大事長編初稿》，卷2，頁192

38 周德偉，《落筆驚風雨：我的一生與國民黨的點滴》，頁323。

39 周德偉認為「胡有政治慾望，思附於實力派，嫌汪無實力，又不願因顧孟餘而進，力辭不就」，周德偉，《落筆驚風雨：我的一生與國民黨的點滴》，頁324。胡適在1931年11月中曾經做為學者代表，擔任過國民政府財政委員會之委員，監督財政預算。1932年4月，胡適又出席了在洛陽召開的「國難會議」。其實自1932年初開始胡適即有與國民黨合作的想法，1932年1月27日「在君、詠霓和我宴請『國難會議』的北方熟人，到者有周作民、王叔魯（克敏）、湯爾和、蔣廷黻、徐淑希、陳博生、傅孟真（斯年）、周寄梅（詒春）、叔永（任鴻雋）、林宰平、李石曾共十四人。大家交換意見，都以為這會議不當限於討論中日問題，也不應對國民黨取敵對態度。當以非革命的方法求得政治的改善」。胡適著，曹伯言整理，《胡適日記全集》，第6冊，頁614–618、628。

間，胡適「有復汪精衛的信，辭謝不願擔任教育部長」。⁴⁰顧孟餘又想邀約交情深厚的武漢大學教授周鯁生，周推薦王世杰，故在朱家驊、翁文灝之後由王世杰出任教育部長（1933年4月），段錫朋則為教育部政務次長。⁴¹

上述的任命可見汪內閣的主要構成部份，一為改組派成員，如顧孟餘任鐵道部長、曾仲鳴為鐵道部次長、陳公博任實業部長、郭春濤任實業部次長、谷正綱任實業部常務次長、陳樹人任僑務委員會委員長、內政部次長則為彭學沛（後調行政院政務處處長）、羅貢華（1894–1990）與甘乃光。⁴²其次，汪內閣中有不少與北大相關之人員，如顧孟餘、朱家驊、王世杰、段錫朋等，此一任命應與顧孟餘之人脈有關。但是在另一方面，顧孟餘也提醒汪須「泯滅派系之爭，在黨內化敵為友，以增厚自己之政治資本」，因此汪在各部會的中層幹部中（如次長級）也接受了一些蔣的人馬，或任命CC系⁴³出身者。⁴⁴

至於行政院長的幕僚機關秘書處與政務處，汪在其中也安插了不少自己的人馬。如秘書處的秘書長由褚民誼擔任；政務處則由彭學沛負責。有關汪任院長（1931年1月–1935年12月）時期，行政院部內汪派與改組派的成員，可以從一份1936年底蔣任行政院長之後的秘密人事報告中，約略瞭解其狀況。

40 胡頌平編，《胡適之先生年譜長編初稿》（台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84），冊3，頁1023。

41 段錫朋（1896–1948）為北大學生出身，曾參與五四運動，與汪、顧友好，然本身為CC系之中層幹部。

42 張朋園、沈懷玉合編，《國民政府職官年表（1925–1949）》，第1冊，頁60–61。羅貢華為陳銘樞之親信，非汪派成員。1932年1月，任國民政府內政部常務次長，並任全國內政會議副主席，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委員長南昌行營設計委員，委員長侍從室秘書等職。

43 所謂CC派是指國民黨內的二陳，陳立夫與陳果夫兄弟姓氏的縮稱，是國民黨內最大派系組織之一，擁護蔣介石領導。關於CC派與其在國民黨內的運作等研究，可參考張緒印主編，《國民黨派系鬥爭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頁580–604。王奇生，《黨員、黨權與黨爭：1924–1949年中國國民黨的組織形態（修訂增補本）》（北京：華文出版社，2010），頁269–292。

44 周德偉，《落筆驚風雨：我的一生與國民黨的點滴》，頁329–330。

1936年底蔣中正曾對行政院組織與人事作一調查，根據12月11日「周琴鶴呈陳述行政院內部組織積習及人事各情形並附行政院系統圖及組織法」的一份秘密報告，行政院部計有簡任秘書8人、簡任參事10人、薦任秘書6人，另外有一些科員。秘書處「掌機要、文牘、總務、招待、統計等事項」；政務處「掌會議、圖書編譯等事項」。報告之中並對各人任期與表現作一簡評，其中與汪關係密切者如下：「黃濬，二十一年以後到院，現任文牘組主任，詩詞優長」；⁴⁵「滕固：二十一年以後到院。現任編譯組及第二組主任。改組派嫡系」；⁴⁶「端木愷：二十二年以後到院。現任議事組及第七組主任。才具宏通，不矜細行」；政務處秘書陳克文「二十二年以後到院。改組派」；「陳皋，二十一年到院，現任庶務科主任」。⁴⁷此外，不到院上班而在「汪公館辦事」的人則有簡任

45 黃濬(1890-1937)，字秋岳，福建人。他曾留學日本，對日本的政治、經濟和文化情況十分熟悉。1932年汪出任行政院長後，延攬對日交涉人才，黃濬因熟悉日本情況而受重用，擔任行政院機要秘書。1937年因漢奸罪被處死。

46 滕固(1901-1941)，字若渠，上海美專畢業後先後赴日本、德國留學，獲德國柏林大學美術史博士。出國留學前，滕固任職於國民黨江蘇省黨部，並參與改組派之活動(1929-30)，擔任改組同志會江蘇行動委員，被通緝之後遠走國外留學。歸國後任行政院參事。1938年6月中，任湖南沅陵國立藝術專科學校校長。1939年遷貴陽、昆明(3月)。1940年秋，藝專遷至四川璧山，乃辭卸校長職，任職時間兩年三個月。滕固在1941年5月20日因腦膜炎過世，年僅四十歲。〈行政院參事滕固〉，《福爾摩斯》，1933年4月14日，第2版。《陳克文日記，1937-1952》，1937年1月14日、1月16日，上冊，頁24-26；1938年6月13日，上冊，頁238。朱家驊，〈悼滕若渠同志〉，《朱家驊先生言論集》(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77)，頁727-728。有關滕固在美術史上的貢獻，及其擔任國立藝專校長之事蹟可參考沈寧，〈走進滕固〉，《傳記文學》，第86卷第1期(2005年1月)，頁109-123。沈寧，《難忘帥府園：民國時期美術史料札記》(台北：新銳文創，2015)，頁21-46。

47 陳皋(1899-?)後隨汪出走，出任「汪偽行政院庶務科科長，偽江西省稅局局長。1941年7月，兼任汪偽軍事委員會委員長衛士長。1944年2月，汪偽首都憲兵司令部改稱中央憲兵司令部，任司令。1945年6月，任汪偽中央憲兵司令部特別黨部特派員。」徐友春主編，《民國人物大辭典(修訂版)》(石家莊：河北人民出版社，2007)，頁1366。

秘書曹宗蔭(少岩)⁴⁸、屈向邦與薦任秘書汪杞等人。⁴⁹ 由此可見汪任行政院長之後，汪系人馬在政府之中的任職情況。因此有不少人認為汪派人馬「雞犬升天」，而這現象一方面引起改組派內部因分配不均，未能謀得職位者心生不滿而內訌，同時也為蔣手下的嫡系所嫉恨，繼而在報章上攻擊改組派。⁵⁰

第二節 出任鐵道部長

1932年3月7日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政治會議通過特任顧孟餘為鐵道部長。⁵¹ 3月9日，國民政府發出任命狀(圖4.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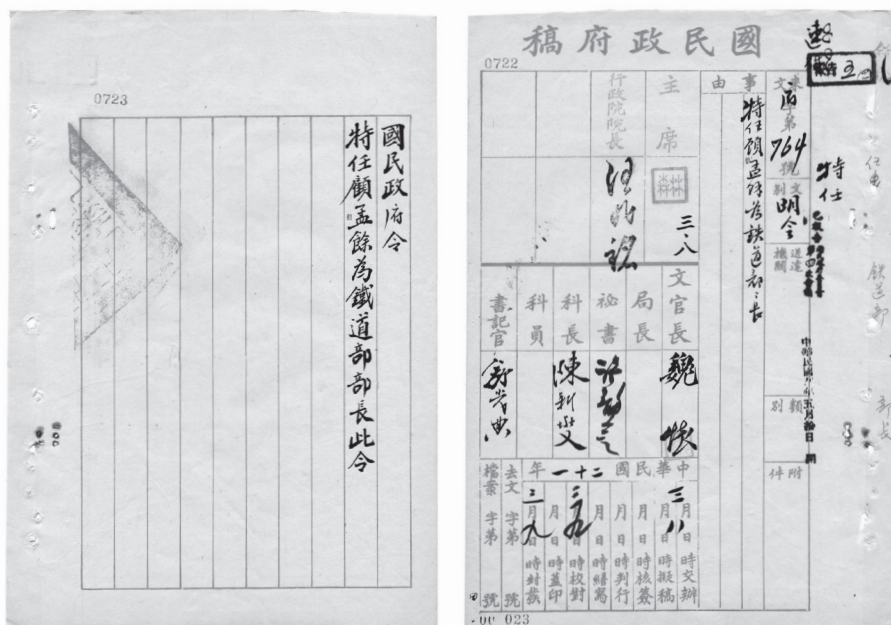
48 有關曹宗蔭的生平及其與汪的關係，參見汪精衛紀念託管會，〈曹宗蔭〉，汪精衛網站，<http://wangjingwei.org/associates-cn/cao-zongying> (2016年3月16日檢閱)。曹曾於1926年隨汪赴法國，1927年隨汪回國之後仍隨侍在側。曹於1932至1936年間任行政院秘書處秘書，後隨汪出走，任汪政權轄下之中國國民黨第六屆候補中央執行委員。有關曹在武漢的情況可參考《譚延闓日記》，如1927年6月24日「至精衛家飯。九時，偕精衛夫婦兒女、仲鳴、春圃、曹少巖，分三車至人民俱樂部，傷兵救護會演劇籌款」。

49 〈戰時重要措施(二)〉，《蔣中正總統文物》，台北，國史館藏，典藏號：002-080101-00015-006。

50 邵元冲談到「黃埔學生康澤等所辦之《中國日報》詆毀顧孟餘」，《邵元冲日記》，1932年8月6日，頁891。「閱上海出版之《現代史料》第一集，詆譏汪精衛、顧孟餘改組派等甚力。聞為陳立夫所辦，牴牾之勢至激，深虞其隙末也」。《邵元冲日記》，1934年4月25日，頁1109。按《中國日報》為「三民主義力行社」的機關報。又海天出版社編，《現代史料》，第一集。其中，胡疊，〈顧孟餘與國民黨〉，頁68–71，大力詆毀顧。陳公博也說汪內閣組成之後改組派受到蔣手下人的抨擊：「我也不願說蔣先生有意和我們為難，但底下的從龍人物，揣摩風氣者多，我們剛到南京，上海已辦了不少專對我們攻擊的雜誌。當中雜誌最著名的要算《現代新聞》……每次都有系統的登載共產黨的秘史，和製造改組派的謠言」。陳公博，《苦笑錄》，頁330–331。

51 〈鐵道部官員任免(二)〉，《國民政府》，台北，國史館藏，典藏號：001-032171-0004。

圖 4.2 國民政府發出的任命狀



汪內閣中的鐵道部為汪派的重鎮（另外幾個由汪系掌控核心的部會是實業部、僑務委員會等），除了部長顧孟餘之外，汪之親信曾仲鳴任鐵道部次長、谷正鼎任總務司長、⁵²陳耀祖（1892–1944，陳璧君的弟弟，在此之前為鐵道部南京辦事處主任）任代理常務次長、財務司司長。顧孟餘上

52 谷正鼎於1932年5月13日擔任鐵道部參事，年底升為該部總務司長，至1935年12月31日辭。「該司兼主管交通大學之預算並主管各路所設之小學，又主管鐵路工會，設有育才及勞工各科」，見周德偉，《落筆驚風雨：我的一生與國民黨的點滴》，頁340。1974年谷正鼎在台灣過世，王世杰也記載了顧孟餘對谷正鼎的信任，「今晨往參加谷正鼎君之喪弔。此君素日政見，時或不免偏激，私行甚好，故顧孟餘長鐵道部時即甚信賴其人。余亦欽其剛直」。王世杰著、林美莉編輯校訂，《王世杰日記》，下冊，1974年11月16日，頁1610。

任後，3月16日立即派胡滌、周德偉為鐵道部秘書，在部長室辦事；⁵³又令鄧飛黃任鐵道部職工教育委員會委員長。⁵⁴

顧孟餘深知鐵道部的工作甚具挑戰性。他在上任之初曾說：

鐵道部名為管理全國鐵道的機關，可是能完全管理的，全國中不知有幾條鐵道，就廣東講，廣九、廣三、廣韶三條鐵路，半年來就與鐵道部脫離關係，營業情況如何，中央不得而知，用人情況如何，局長是誰，也不得而知，叫他們報告，他們不理，可是那三條鐵道的外國債務，卻要中央為之償付。次言湘鄂鐵路，中央費了大半年的力量才派去一個局長。再其次說北寧路（北平至榆關）、平綏路，這兩條路中央幾全不能管，如整理營業整理財務等，中央都不能過問。

其次就鐵路本身來說，這幾年因為內戰的關係，鐵路被破壞得不堪思議，「枕木、路軌、車身，無一不是破壞到極點」。而破壞之後為何不能整修？這則牽涉到政治問題，各地的地方軍人以鐵道為私產，修鐵路時

53 周德偉在鐵道部任職約半年（1932年4月30日–8月26日）「多辦政治會議之案件，及顧與知識界（多大學教授）聯絡之函札」。後於1933年7月得到鐵道部獎助赴英留學。周德偉，《落筆驚風雨：我的一生與國民黨的點滴》，頁344–347。胡滌是原鐵道部秘書（任職時間為1928年11月13日–1933年2月21日）。他的別名為位炎、儀曾，江蘇東台人，曾任南通縣立圖書館助理員、江蘇省立一中國文教員兼兩江民立中學歷史教員、江蘇省長公署秘書、鐵道部秘書、立法院秘書、京滬鐵路局秘書等職。1949年後任上海鐵路管理局圖書館管理員。譚延闓對他的印象不差，「有胡滌者，東台人，上書及詩，文筆不惡，亦近今所罕，年三十四云」，《譚延闓日記》，1928年8月22日。兩人任職時間見劉國銘主編，《國民政府軍政職官人物志》（北京：春秋出版社，1989），頁55。

54 顧孟餘，〈鐵道部令：第231號〉，《鐵道月刊》，期251（1932），頁2、8。顧孟餘，〈鐵道部令：第232號〉，《鐵道月刊》，期251（1932），頁9。鄧飛黃（1895–1953），1918年考入北京大學經濟系，與羅隆基、傅斯年等投身五四運動；1924年參加中國國民黨，任國民黨北京執行部青年部秘書，主編《國民週報》、《國民新報》；1926年，赴廣州任國民黨中央宣傳部《政治週報》主編。1928年後參與改組派活動。1931年，任鐵道部職工教育委員會委員長，後當選為國民黨第四屆中央執行委。

如何應付地方勢力、如何發行債券、利用外資、籌付本息等，都是問題。這就是當時鐵路行政狀況的真實寫照。⁵⁵

他接任部長之後即開始整頓上述的問題，首先他對於職位內的各項工作一絲不苟，在個人操守上做到清廉自持，以身作則。例如鐵道部部長官邸本為孫科掌部時所建，十分奢華。顧孟餘請汪院長居住鐵道部一號官舍，⁵⁶「自己則改次長所居之二號官舍為辦公室，僅命谷錫五居之，另在南京鼓樓附近賃住宅，月租僅五十元，亦不開支部款……各種公私宴會均不參加。彼亦喜北方肴饌，常偕谷錫五及余至北方館小食，一餐之費僅數元而已」！⁵⁷

又如他節省鐵道部的行政經費，減省員工福利，充實修理經費，⁵⁸「對於路政頗有整頓決心，對於職工教育特別注重」。⁵⁹他除了決定大的方針之外，也躬親瑣事，顯示出他在工程與材料方面的專業，「凡鐵道用的機件、物料，那一種適用，那一種能夠經久，都詳細指示，使得屬下肅然，不敢以事涉專門而有所馬虎。如何造房子，他也懂得……雖然說鐵道部錢多，也得有辦事認真的人來主持才得有工精料足的結果」。⁶⁰

顧氏上任之初有幾件重要的工作。第一是安撫改組派之中下層人員。汪任院長之後「從前改組派同志，紛紛以改組同志會之徽章向汪求工作」，汪則轉請陳公博與顧孟餘處理。部分人員由陳公博安排到實業

55 顧孟餘，〈中國現有鐵道狀況——七月十三日歡送學術專家席上顧部長報告詞〉，《鐵道公報》，第298期（1932），頁18–20。有關顧孟餘上任前鐵道部之狀況，可參考孫科，《二十五年來之鐵道》（南京：鐵道部印行，1930）。

56 陳克文於1945年底抗戰勝利後，首次短暫返回南京即趁機去走訪了汪之故居：「京中景物雖經兵燹，固依稀如故也。鐵道部一號官舍，為當年汪精衛寓居辦事之所，其中一椅、一硯、一草一木，皆未變動，尤覺感喟萬端」。陳克文著、陳方正編輯、校訂，《陳克文日記，1937–1952》，1945年12月3日，下冊，頁1007。

57 周德偉，《落筆驚風雨：我的一生與國民黨的點滴》，頁339。

58 周德偉，《落筆驚風雨：我的一生與國民黨的點滴》，頁335。

59 九君，〈顧孟餘新猷——注意職工教育〉，《福爾摩斯》，上海，1932年7月11日，第1版。

60 查子仁，〈一談顧孟餘〉，《好文章（二集）》，頁55。

部及所屬各機關。其他人陳公博「胥推往鐵道部，請顧分派工作」。⁶¹「一日，改組派同志集結二百餘人包圍顧之鐵道部官邸」。後顧接受周德偉建議，首先撥了五萬元由谷正鼎交周，發給同志為生活費。其次顧在部內設立「職工教育委員會」，由鄧飛黃為委員長，並安插改組派省級主持同志為委員。此外，周亦選拔數十人，「顧乃一一安置於鐵路黨部及工會中，如是顧氏對於各鐵路之情報方得靈通。此輩後有起為鐵路黨部及工會之委員以及各路之處長者」。⁶²

圖 4.3 王懋功



第二整頓鐵道部之內「舊交通系」人員。顧氏上任之時鐵道部的重要職務都由所謂的「舊交通系」盤據。主要的人物有葉恭綽 (1881–1968)、顏德慶 (1878–1942，顏惠慶之弟、技監)、關賡麟 (1880–1962，業務司長)、薩福鼎 (工務局長) 等人。顧將關賡麟調為顧問，又以部內參事俞棧任業務司長，「如是舊交通系俯首聽命，風紀大肅」。第三，顧孟餘又任改組派幹部擔任一些重要的職位，如任王懋功為正太鐵路管理局局長兼接收委員長 (圖 4.3)、范予遂 (1893–1983) 為道清鐵路管理局長等。⁶³

至 1932 年底時，顧以鐵道部為中心的組織架構已搭建完成。當時有報紙文章指為「新新交通系」：

61 政聞，〈顧孟餘陳公博之爭鬥〉，《福爾摩斯》，上海，1933 年 3 月 31 日，第 1 版。

62 周德偉，《落筆驚風雨：我的一生與國民黨的點滴》，頁 332。

63 周德偉，《落筆驚風雨：我的一生與國民黨的點滴》，頁 338–339、334–335。王懋功於 1932 年 4 月出任正太鐵路 (由石家莊至太原) 管理局局長兼接收委員長，1932 年 10 月自法國商人手上接收此鐵路，由鐵道部管理。正太鐵路管理局編，《全國鐵路職員錄 (正太鐵路)》(石家莊：正太鐵路管理局，1934)，頁 1。范予遂亦於 1932 年 4 月就任道清鐵路 (河南道口至清化) 管理局局長，見道清鐵路管理局編，《道清線全國鐵路職員錄》(道口：道清鐵路管理局，1934)，頁 1。

新新交通系之組織，以顧孟餘為最高領袖，餘如彭學沛、谷正綱、谷正鼎兄弟，皆為重要分子。其型態之構成，即現代派之全部、北大系全部，以及屬於谷氏兄弟之改組派均屬之，而以鐵道部為唯一地盤。南北西方，分別活動。北方由王懋功負責，南方則由彭學沛負責，長江方面，由谷正綱負責。關於經濟一項，除每月由鐵部支出三萬元外，其餘則由張公權負責。⁶⁴

此一組織系統雖不可盡信，然大致反映出外人對顧孟餘掌鐵道部之後其組織力量的觀察。

此後約三年間，在蔣、汪合作的格局之下，顧孟餘負責全國鐵路建設，為剿共與抗戰的基礎建設而努力，並與蔣多所互動。3月22日蔣與顧談話至11時。⁶⁵6月24日，蔣特別指示顧孟餘交通建設應配合剿共之軍事行動，「在剿匪期間，暫勿變更舊制，以免為人所煽惑，反使路上發生危險，阻礙進剿」。⁶⁶6月汪因張學良拒絕出兵熱河，發動倒張風潮，顧「對張感想極壞，謂張部足以亡國」，⁶⁷亦主張罷免張學良一切職務。8月6日汪因理想不能實現而請辭，隔日行政院各部會長總辭職。⁶⁸8月

64 生，〈短小精悍：新新交通系之組織〉，《社會日報》，上海，1932年11月17日，第1版。大蛇，〈現代派之政治把戲〉，《福爾摩斯》，上海，1933年5月23日，第2版。所謂現代派指彭學沛、王世杰、李四光、陳西滢等人。

65 《蔣中正日記》，1932年3月22日。

66 「蔣中正電顧孟餘剿匪期間暫勿變更鐵道部舊制」（1932年6月24日），〈籌筆——統一時期（六十八）〉，《蔣中正總統文物》，台北，國史館藏，典藏號：002-010200-00068-018。

67 「陳果夫致蔣中正電」（1932年6月28日），〈親批文件——民國二十一年六月至民國二十一年六月〉，《蔣中正總統文物》，台北，國史館藏，典藏號：002-070100-00026-095。

68 邵元冲指出汪之辭職原因複雜，也涉及國民黨內鬥，「晚立夫、希孔〔方治，1895-1989〕等來，談汪精衛赴滬後忽來電請辭，其理由為張漢卿不肯抵抗，故以去就爭，又因黃埔學生康澤等所辦之《中國日報》詆毀顧孟餘，亦為彼等悻悻求去之一因，故令《中國日報》暫停一日，以平其憤，然汪內容複雜，能歸與否，尚未可知也」。《邵元冲日記》，1932年8月6日，頁891。

底經中央再三挽留，汪因病未癒，堅決辭職，赴莫干山養病，中央政治會議決定由宋子文代理行政院長。汪又勸顧留任，以保留政治實力。顧於8月29日打消辭意，到部辦公。⁶⁹ 10月汪出國療養，至1933年3月底方返國。

1932年年底，顧孟餘赴武漢視察路政、參加鐵路材料會議（11月28日–12月7日），並就粵漢鐵路修築、⁷⁰「川戰問題」與「邇來鐵部歸併交通部之說」，「赴漢謁蔣」。⁷¹當時胡適正在武漢大學訪問（1932年11月27日–12月3日）。11月29日，顧與陳布雷（1890–1948）、陳立夫、胡適等人在蔣中正位於武漢的寓所晚餐，飯後顧又與胡適討論「代表民意機關的選舉原則」，至夜深始散。⁷² 1932年12月13日，蔣曾致電在海外的汪「真電敬悉，尊恙肝硬化尚未痊癒，不勝繫念，弟昨日回京，三中全會可如期開成，諸事已與孟餘兄面商，請兄在德靜養，勿遠念也」。⁷³ 12月21日，國民黨四屆三中全會通過顧出任中央政治會議常務委員。⁷⁴ 在汪

69 〈顧孟餘業已打銷辭意，今日到部視事〉，《中央日報》，南京，1932年8月29日，第2版。

70 〈時事日誌〉，《東方雜誌》，第29卷第8號（上海，1932年12月16日），頁57。

71 〈鐵路材料會議，昨行閉幕禮，顧孟餘親自出席致訓，希望逐步進行決議案〉，《中央日報》，南京，1932年12月8日，第7版；〈顧孟餘赴漢任務〉，《社會日報》，上海，1932年12月7日，第1版。

72 胡適著，曹伯言整理，《胡適日記全集》，第6冊，頁632–633。1932年11月29日，胡適赴蔣宅晚飯，他在日記中寫到「今晚無談話機會，我送了一冊《淮南王書》給蔣先生」。1935年7月26日胡適寫給羅隆基的信中曾說明他送此書的用意，「我前在漢口初次見蔣先生，不得談話的機會。臨行時贈他一冊《淮南王書》，亦在請他稍稍留意《淮南王書》中的無為主義的精義……我的意思是希望他明白為政的大體，明定權限，知人善任，而不『侵官』，不越權。如此而已。《淮南》說的『處尊位如尸，……尸雖能剝狗燒毚，弗為也。弗能，無虧也』。此似是淺訓，今日之為政者多不能行」。胡適，〈致羅隆基〉，《胡適全集》，第24卷，頁230–231。

73 王正華編註，《蔣中正總統檔案：事略稿本》（台北：國史館，2005），第17冊，頁570。

74 劉維開編，《中國國民黨職名錄》，頁108。

出國時期，顧代表汪與蔣洽商，因此顧與蔣的關係變得較為密切，不過蔣在考慮身邊人才問題時，並不將顧視為自己的政治人才。⁷⁵

為了博取蔣的信任、打開與蔣之關係，顧在鐵道部人事安排上頗費苦心，他所採取的策略是「資黃郭以安蔣氏之心」。首先他任命黃郭的姪子、上海工務局局長黃伯樵（1890–1948）為津滬鐵路管理局局長。黃為留德的工程專家，在工務局聲望不差。其次，顧任命黃郭的內姪、留學美國康乃爾大學工程學碩士的沈昌（1904–1942，號立孫）為購料委員會主任委員（1927年任平綏鐵路局長、1938年任交通部材料司司長），此一位置在鐵道部內乃一肥缺，可以合法獲得優厚的佣金。⁷⁶這兩個任命案使顧黃、顧蔣關係均有所改善。

在重大的鐵路建設工作上，顧首先從事三條鐵路的建設，分別是：一、大同至潼關（舊的同蒲鐵路）；二、正大鐵路（由石家莊延至大沽）；三、杭江鐵路（由杭州至江山）。⁷⁷在規劃好上述的工程後，他開始處理經過粵、湘、鄂三省的粵漢鐵路，此一工作在財政上主要是依賴中英庚款與發行公債來籌款。⁷⁸粵漢鐵路之修建倡議於1896年，1901年開工，

75 《蔣中正日記》，1932年6月22日。金以林認為1932年是蔣從軍事領袖轉為政治領袖的關鍵一年。他努力思考「無幹部」、「無組織」的問題，並多方聯絡知識界。然而作者指出「在蔣介石反復提到的幹部名單中，主要是原本得到他信任的幹部，和一些黨外的知識分子，幾乎沒有一人是原黨內反蔣的汪精衛、胡漢民等派系成員」。金以林，〈蔣介石的一九三二年〉，收入呂芳上策劃、導讀，《蔣介石的親情、愛情與友情》（台北：時報出版公司，2011），頁234。

76 周德偉，《落筆驚風雨：我的一生與國民黨的點滴》，頁335–336。沈昌曾談起此一時期擔任購料委員會主任委員的經歷「二十一年夏，余受知於孟餘先生，經辦事務，動盈千萬，人為余危。先生（案指黃郭）則曰：『孟餘先生清廉，出於本性，汝家亦勤儉有則，吾固不為慮也。』迨余出任平綏路局，先生方開府北平，二年有餘，從未薦一人囑一事」。沈昌，〈黃膺白先生所期望於後進者〉，黃膺白先生紀念刊編輯委員會編，《黃膺白先生故舊感憶錄》（上海：黃膺白先生紀念刊編輯委員會，1937），頁50。

77 顧孟餘，〈中國現有鐵道狀況——七月十三日歡送學術專家席上顧部長報告詞〉，《鐵道公報》，第298期（1932），頁18–19。

78 有關抗戰前後英國退還的庚款對於交通建設之貢獻，以及其中顧孟餘在鐵道部長任內與中英庚款會董事長朱家驊所簽訂的多項借款契約，參見周琬環，〈抗

至1936年全線通車，共經約40年（圖4.4）。全線計分為以下幾段來修建：廣三段（廣州至三水，1903年通車）、廣韶段（廣州至韶州，1916年通車）、武長段（武昌至長沙，1918年通車）、株韶段（湖南株州至廣東韶州）、廣九段（廣州至九龍，1911年通車）。由於株韶段遲遲未能完成，使粵漢鐵路南北隔絕。⁷⁹

1932年6月19日蔣中正指示：「粵漢路之重要與緊急，實比其他鐵路為甚，近聞只由南段韶關修起，而北段尚未準備同時興修。則此路不知成於何日？焦急之至！務希該部長設法由北段同時並修。如工程費無現款，則可以庚款為基金，分期發行公債。中當盡力促成，並期於民國二十四年底通車，則國防尚有可為。再杭甬路尚有一段未成。此路甚短，且於沿海國防，為東南唯一鐵道。如此路果成，則寧波、上海可省數倍兵力，如能於庚款中提出修築，則輕而易舉也」。⁸⁰顧也瞭解到「日本對我國多方壓迫，華北情形日形緊張，而共匪又在贛南活動，粵漢鐵路的地位太關重要」。⁸¹1932年8月他找了當時隴海鐵路工程局的局長兼總工程師的凌鴻勛負責株韶段450餘公里、工程款高達四、五百萬英鎊的鐵路工程。⁸²

根據凌鴻勛的回憶：「在我和孟餘先生第一次而且時間較長的談話中，發現他態度非常誠懇，而且的確有學者的風度」；「我和他無一面之交。他把株韶段的事情交給我之後，的確給我全權，一點干預都沒有，幾年功夫，從來沒有薦過一個人給我，連整個鐵道部也沒有薦一個人給我。而且我有公事向他請示，他的回電總是自稱『弟孟餘』，這一點我覺得很不容易。我們兩人既然建立了彼此的互信，我就專心做我的事。顧

戰前後中英庚款會的交通建設》，《國史館學術集刊》，第5期（2005年3月），頁161–208。庚款共撥付工程費三千五百多萬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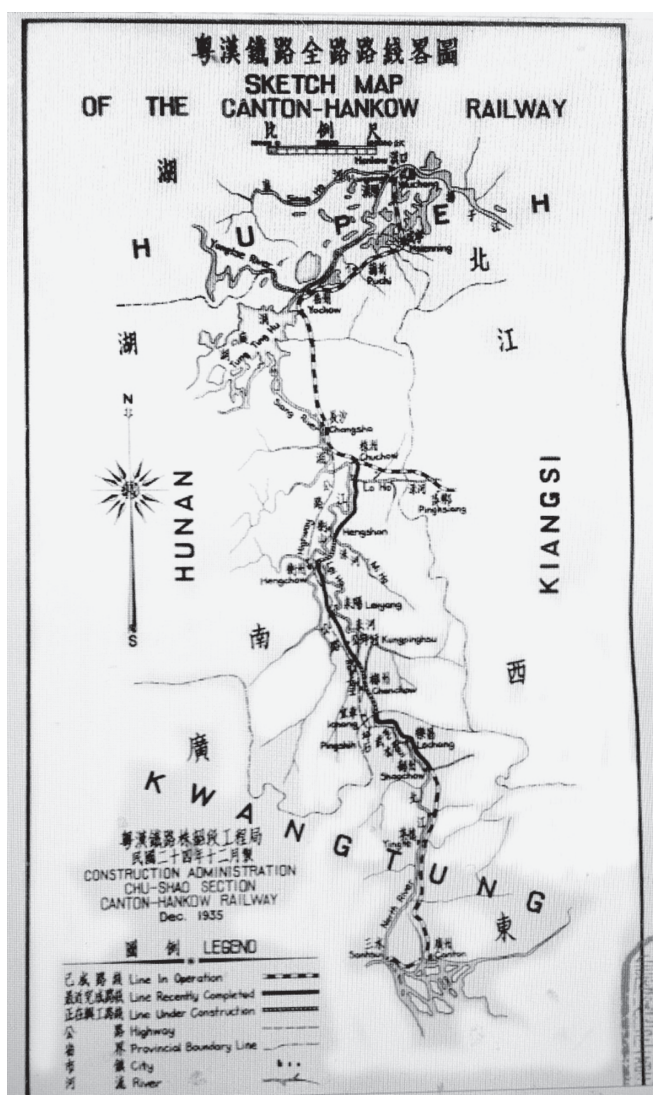
79 行政院新聞局，《粵漢鐵路》（南京：行政院新聞局，1947），頁3–5。

80 呂芳主主編，《蔣中正先生年譜長編》，第3冊，頁679。

81 凌鴻勛，〈悼念顧孟餘先生——並述粵漢鐵論之一段故事〉，《傳記文學》，第21卷第2期（1972年8月），頁27。

82 沈雲龍訪問，林能士、藍旭男紀錄，《凌鴻勛先生訪問紀錄》（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82），頁94–95。

圖 4.4 1935 年 12 月粵漢鐵路略圖



先生這個人別的我不知道，但在謙虛這點上看來，真是一個書生本色，沒有官僚的氣味」。⁸³後來凌鴻勛得知，顧孟餘和擔任過鐵道部建設司長、粵漢鐵路委員會委員長的陳伯莊 (1892-1960) 談及人選問題，陳推薦曾任交通大學校長、現任隴海鐵路工程局局長凌鴻勛，顧才將這一件重要的工作交給凌。⁸⁴

因為顧孟餘部長在工程款上大力支持，以及陳伯莊委員長的協助，⁸⁵粵漢路的株韶段進行順利，並提早完成。1935年顧孟餘又想派凌鴻勛兼任京湘鐵路贛湘段工程局長兼總工程師，負責由南京經南昌到萍鄉的京湘鐵路，以此連接粵漢鐵路。後因顧孟餘去職，凌鴻勛也隨之辭職。凌對顧的印象是「彼此信賴，內外呼應」，因而能成就事業。⁸⁶

鐵路問題亦涉及外交，在塘沽協定簽訂後，中日停戰，山海關內外的通車問題隨即產生。從1933年七月之後華北與日本之間就通車、通郵、通航問題展開交涉。中方由「行政院駐平政務整理委員會」（委員長黃郛）負責，日方則由關東軍出面。在此過程之中顧孟餘曾親赴平津考察，並與前後任北寧鐵路局長錢宗澤 (1891-1940)、殷同 (1889-1942) 等人參與交涉，8月時達成協議「北寧車直通關外，奉山車不入關」。自

83 凌鴻勛，〈悼念顧孟餘先生——並述粵漢鐵論之一段故事〉，頁26-28。

84 凌鴻勛，〈悼陳伯莊先生〉，交大同學會友聲月刊社編，《友聲》，第96期（台北，1960年11月），頁2-3。陳伯莊為廣東番禺人，早年考取清華學生留美，赴哥倫比亞大學學習工程，與胡適同學。返國後曾在大學任教職。1928年11月，任國民政府鐵道部建設司司長，1929年12月去職。後來，陳伯莊擔任粵漢鐵路委員會委員長，並在上海交通大學研究所主持社會經濟調查工作、在國防設計委員會任委員及交通組長。陳家與凌家累世交好，孫科任鐵道部長時，陳伯莊介紹凌入鐵道部工作。

85 胡適說：陳伯莊「是完成粵漢鐵路委員會的委員長，粵漢鐵路的株韶段的完成，他是有功的」。胡適，〈陳伯莊「卅年存稿」序〉，收入陳伯莊，《卅年存稿》（香港：東南印務出版社，1959），頁1。

86 凌鴻勛，〈悼念顧孟餘先生——並述粵漢鐵論之一段故事〉，頁28。

1933年8月至1934年4月又進行了第二階段的通車談判，⁸⁷後經殷同與日方磋商，於7月1日平瀋正式通車。⁸⁸

除了鐵路建設之外，顧孟餘在鐵道部長任內也積極地聯絡知識界。他一方面依賴彭學沛、唐有壬與大學教授聯絡關係，另一方面則運用鐵道部的資源，支持學者所主持的調查、研究活動。例如，他以鐵道部經費每月五千元支援教育部（部長為朱家驊，任職時間為1931年12月31日–1932年10月28日）成立國立編譯館，由辛樹幟（1894–1977）任館長，專事翻譯外國重要名著，審查教科書，尤其注意科學名詞的編訂與統一。又如他請中央研究院南京社會調查所所長陳翰笙（1897–2004）「代為調查京滬沿線及江蘇全省的經濟情形，畀余能資以改良舊路，籌建新路」。再者，他請武漢大學「調查京漢沿線及北方各省之物產及生產潛力」，「並請其工學院（院長為石瑛、同盟會之開創會員）特別研究鐵路建築工程，月助經費五萬元」。⁸⁹此外，顧孟餘也邀請地質學家丁文江（1887–1936）探查粵漢鐵路沿線可開採的煤礦，以解決鐵路全線煤的供給問題。根據凌鴻勛的記載丁文江的調查計劃如下：

在君先生以為湘南雖多煤，然苟非靠近路線者，則運輸成本較重。舉其距路最近，則較有開採價值者，則湘潭有譚家山，耒陽有馬田墟，宜章有楊梅山，廣東樂昌有狗牙洞。譚家山產煙煤，且可煉焦。馬田墟一帶為華南最大之煤田，距鐵路至近，惟係無煙煤。楊梅山、狗牙洞兩處有無開採價值，則尚待研究……。

87 王世杰反對與日妥協，曾於1934年6月1日為通車事請辭，然為蔣所挽留，「汪、蔣兩公對日之態度與政策，日趨于妥協。日本方面要求與偽滿洲國通車通郵，汪、蔣均主遷就。予以此事將影響政府對東四省之原來立場，力爭無效。六月一日曾向汪院長堅請辭職，嗣因汪雖應允，蔣仍強余留職，遂作罷議」。《王世杰日記》，1935年1月13日追記1934年之事。

88 1934年6月底《滿洲日報》登出了7月1日通車的消息，〈奉天一北平間通車交成立するまで大連協定で原則諒解〉，《滿洲日報》，1934年6月29–30日。有關通車談判過程參見李君山，〈中日塘沽協定後「關內外通車」談判之研究〉，《興大歷史學報》，期16（台中，2005年6月），頁305–344。

89 周德偉，《落筆驚風雨：我的一生與國民黨的點滴》，頁318、336–337。

1935年底丁文江即赴湖南長沙從事考察，12月7日至譚家山，下至斜深170餘米處之礦坑考察。8日赴衡陽，由凌鴻勛安排，住進粵漢鐵路株韶段路局賓館。隔日即在房間內因一氧化碳中毒而住院，並於1936年1月5日過世。丁文江住院時積欠大筆醫藥費，胡適得知之後與曾仲鳴聯繫，請顧孟餘協助，由鐵道部負擔丁文江的醫藥費。⁹⁰丁文江的煤礦考察計劃雖未能完成，然可以顯示顧孟餘掌管鐵道部時期對於調查鐵路沿線資源之重視。

總之，在顧孟餘任職鐵道部長期間鐵路建設有具體的進展，奠定抗戰時期經濟建設與軍事行動的基礎工作。

第三節 從鐵道部長到交通部長：顧孟餘與汪蔣之分合

顧任鐵道部長之時一方面與蔣中正的關係較為密切，另一方面似乎與汪較為疏遠。如上所述，1932年8月汪與張學良在日軍進攻熱河之後的和戰問題上發生衝突，而蔣又偏袒張學良。10月汪辭職赴歐，至次年3月才回來。3月15日，顧由南京乘車赴上海，迎接汪返國。⁹¹3月20日，汪在南京國民黨紀念週發表演說，「時至今日，除了抵抗二字，更無話說」、「今日以後，抵抗愈得力，交涉愈有希望」。汪返國之後，中央常會敦請汪院長早日復職，23日汪卻請顧轉致中央常會，表示「連日勞累，糖尿症加重……懇請准予辭職」，並希望由宋子文接任。⁹²次日孫科、顧孟餘再度前往上海勸說，汪方同意復職。此後汪展開對日和平交涉，五月簽訂「塘沽協定」。不過此時報紙上屢屢傳出顧、汪不合的消息，這些報導之內容不盡可信，卻可顯示出顧的公眾形象。「顧孟餘自長鐵道部之後，固以發財為第一目的，但欲發財，自非有清一色之人物

90 胡適，《丁文江的傳記》（台北：胡適紀念館，1973），頁108–112。胡適著、曹伯言編，《胡適日記全集》，冊7，頁326，1936年1月22日。

91 〈顧孟餘赴滬迎汪〉，《天光報》，香港，1933年3月16日，第1版。

92 〈中常會決定，請汪院長早日復職，汪電京，仍請宋子文真除，推孫科顧孟餘赴滬敦勸〉，《中央日報》，南京，1933年3月24日，第2版。

不可，於是顧孟餘造系之念日切，一方面並將汪之親信，如曾仲鳴等之實權取銷，其用心可謂惡毒，是無怪汪之氣憤填（膺）而亟求出國也」。⁹³ 也有報紙報導顧被曾仲鳴所排擠，故拉攏王世杰等人自組「教育系」。⁹⁴

1933年4月，香港的《工商晚報》亦報導改組派發生內訌：「蓋陳（公博）顧（孟餘）自任部長以後，於汪漸疏，汪之心腹曾仲鳴大為不滿。曾又與顧同官鐵部，以其所組織之職工教育委員會為武器，攻顧尤力」。⁹⁵ 這些消息雖真偽難判，然此時汪顧的關係可能已經有所變化。

相對而言，此時顧與蔣之間互動較多。1933年6月8日，為清剿共軍，蔣一方面在南昌召開「五省剿共軍事會議」，同時致電財政部次長鄒琳（1888–1984）、鐵道部長顧孟餘、軍政部次長陳儀（1883–1950）、交通部長朱家驊，商築萍玉鐵路：「查萍玉路由贛省萍鄉至玉山，西接株萍、粵漢，東通杭江，轉達杭甬，倘速築鐵道，則湘、黔、粵、桂，皆可不經長江而有陸路交通，與京滬聯為一氣。憶前年援滬抗日之棘手，即知此路在國防上位置極為重要，計全長僅六百公里，而能貫通西南、東南諸省，首尾相應，效用綦宏。其在贛省，則可穿越東西兩匪區，尤盼修築，以利清剿，並藉工事，足以收容難民，一舉數善，亟應促其成功。日前在牯嶺，曾商由汪院長返京提出院議，頃悉交由財、鐵、軍、交四部審查，特電陳概要，請熟察，此路關係非同尋常，迅籌切實辦法，趕緊進行，是所切禱。」⁹⁶ 12月8日，蔣再次為萍玉鐵路之事通電顧孟餘，希望由江西省與鐵道部合作來修築此一鐵路。⁹⁷

上述兩個直接由蔣指示興辦的鐵路建設工程都具有軍事上的重要性，是為了剿共之布局。除此之外，顧孟餘還從事多項借款修築鐵路，

93 〈短小精悍：顧孟餘組系心切〉，《社會日報》，上海，1932年11月2日，第1版。

94 左君，〈顧孟餘創立新教育系之動機〉，《福爾摩斯》，上海，1933年6月16日。

95 〈改組派之蠢動與內鬨 汪圖攫取華北政權 陳公博顧孟餘對汪漸疏 中華日報社成反幹部派〉，《工商晚報》，香港，1933年4月29日，第2版。

96 王正華編註，《蔣中正總統檔案：事略稿本》（台北：國史館，2005），第20冊，頁400。

97 呂芳上主編，《蔣中正先生年譜長編》，第4冊，頁245–246。

計有平漢路、滄石路、平綏、隴海路、大潼路等對外借款。⁹⁸在這些借款中，顧被人指控「收取回扣」，除中飽私囊外，據說還要與汪兆銘分成，並為改組派籌措「公積金」，用來在香港開辦「四海銀行」。⁹⁹此時報紙上有不少關於顧孟餘貪污枉法的報導：

鐵道部長顧孟餘，固亦改組派中之幸運兒，聞在正太鐵路借款項下，不費吹灰之力，由其部屬，報酬其大洋四千萬，更不暇詳計，但祇就此一筆而論，則顧所發之財，決不在二陳之下，可憐黨紀先生，為他們升官，為他們發財，其本人則眾叛親離，焦頭爛額而去國，其痛心可知也。¹⁰⁰

顧孟餘自任鐵道部以來，毀譽參半。顧至今日，罪惡彰著，乃有黨員陳柏英、杜明笙等五十八人，臚舉顧孟餘之十大罪狀，上呈各機關各法團以及各報館。所謂十大罪狀者，一為盜黨為奸、見利忘本，二為妄耗國庫、以供私人揮霍，三為舞弊分肥、有損官常，四為利慾熏心、網羅宵小，五為濫支路帑、藉遂私圖，六為私用

98 先導出版社編印，《監察院彈劾顧孟餘案始末記》（廣州：先導社，1934），頁4，本書藏於哈佛燕京圖書館，現收入中國社會科學院、國家圖書館、國家檔案局抗日戰爭與近代中日關係文獻數據平台，<http://www.modernhistory.org.cn/index.htm>（2018年11月11日檢閱）。先導社的社址在廣州，曾出版《胡漢民先生政論選編》、《胡漢民先生歸國後之言論》等書籍，並出版期刊《先導》，對蔣汪政權竭力攻擊，故該社為與南京蔣汪政府敵對的廣東胡漢民等人所操控的一間出版社。該書對顧案的看法是：這是「一幕南京政府的醜劇」，「貪贓枉法是南京政府的家珍，顧孟餘的大潼路案，比較起來，實在小之又小，可憐只能專拍蒼蠅的監察院，打狗也會遇到狗主人，彈劾案鬧的震天響，結果只是無形消散」。無形消散的原因則是「行政院長汪精衛的包庇及太上皇帝蔣介石的鎮壓」。此書於同年11月30日為南京國民政府以「詆毀中央」為由查禁。民國研究，〈反腐還是權鬥？1934，監察院彈劾鐵道部長顧孟餘〉，《搜狐》，2017年12月3日，http://www.sohu.com/a/208176260_631330（2018年11月11日檢閱）。

99 先導出版社編印，《監察院彈劾顧孟餘案始末記》，頁8。

100 〈短小精悍 顧孟餘發了大財〉，《社會日報》，上海，1932年11月28日。「黨紀先生」指汪兆銘，是吳稚暉給汪的一個稱號，見《陳克文日記，1937–1952》，1939年1月2日，上冊，頁344。

同學、貪潤私囊，七為破壞路政、干犯路章，八為仰承軍人鼻息、損失國權，九為私用女婿、損失對外威信，十為包庇親戚、弁髦國法，此皆瑩瑩大者也。¹⁰¹

1934年4月，監察委員劉侯武(1894–1975)為顧孟餘「對大潼路購料訂約，有違法舞弊情事」、¹⁰²「喪權違法，害國營私」，向監察院長于右任提出彈劾案。¹⁰³劉為廣東潮州人，僑居海外多年。他曾是改組派的一員，「劉在華僑頗有聲望，改組派之經濟活動，得劉之力頗不少」，後來被排除於政治之外。他與監察院院長于右任有「詩畫文字之交」。于右任「對於劉之灰心政治，頗致惋惜」，提拔他為監察委員。¹⁰⁴劉侯武的彈劾案提出後，顧謂「劉失節叛變也」。¹⁰⁵7月1日，顧發表書面談話，對彈劾案提出申辯，「監察委員等審查報告所稱之違法舞弊情事三項，全無事實之根據，悉屬臆測之言辭」；「該委員劉侯武不但昏聩糊塗，不查事實，且又造此毫無根據之爛言，全以毀壞他人名譽為事。但使國家有常法，社會有良俗，此種爛言，一出諸私人之口，已構成毀謗之罪，今以監察院之尊嚴，其行使職權，提出彈章，公開發表者，乃為文明國家法律所戒，風俗之所不許，誠不禁為吾國監察制度之前途悲矣」。¹⁰⁶顧因此憤而辭職。對於此案，汪極力加以營救，他反駁報紙言論，甚至提議

101 〈顧孟餘之十罪狀〉，《社會日報》，上海，1933年2月17日。

102 〈時事日誌〉，《東方雜誌》，第31卷第15號(上海，1934年8月1日)，頁73。

103 彈劾案涉及一些人際間的恩怨，周德偉表示：「彈劾原因甚複雜，劉侯武事先向顧部長有求不遂，又查知蔣氏忌顧；又于右任與顧積怨甚深……CC系陳果夫、陳立夫必欲代蔣驅顧」。周德偉，《落筆驚風雨：我的一生與國民黨的點滴》，頁376。

104 青牛，〈彈劾顧孟餘之劉侯武〉，《社會日報》，上海，1933年11月29日。

105 道盜，〈劉侯武與顧孟餘〉，《社會日報》，上海，1936年2月8日。

106 〈時事日誌〉，《東方雜誌》，第31卷第15號(上海，1934年8月1日)，頁74。當時擔任國民黨中央監察委員的王子壯(1901–1948)曾記述此事，他說「自星期日監察院將彈劾顧孟餘案之原文發表，顧立有萬言答辯之談話，反唇相譏，詞近謾罵」。王子壯，《王子壯日記》(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01)，第2冊，1934年7月3日，頁94。

修改「彈劾法」，限制監察院之職責，並提高中央政治會議對此類案件之裁決、覆核權。對此，蔣也相信顧並無貪污。1934年5月11日，蔣致電于右任：「聞監委劉侯武近以修築大潼關鐵路購買材料一事，提案彈劾孟餘，已指定楊天驥、劉莪青、李正樂三委員審查。按孟餘在部長任內清廉穩健，迄未改學者態度，實可信其無他，年來整理鐵路，頗有頭緒，對外信用亦日漸提高，於路改建設，實心努力，實可稱佩，想兄亦所素稔，其經辦事件，但求大體無差，實非中飽，則縱或有手續末節不合，亦宜諒其勇事急功之誠，加以原恕，尚希兄婉為解釋，務予設法打銷此案，以免其正在進行之各種路政建設計劃，遭受影響。轉致因小誤大，區區此意，當荷洞諒。如何仍盼電復」。他又致電汪兆銘曰：「孟餘同志，清廉穩健，弟所深佩，已另電右任懇切言之，毋令借故糾紛，京中迭生麻煩，實可痛心，一切請兄忍耐，並盼勿以瑣事而秘不告，蓋積瑣成鉅，吾人不能不同心協力、刻刻警戒也」。¹⁰⁷ 1934年7月15日，蔣中正又再次致電于右任，希望監察員能「適可而止」：「關於監院彈劾顧（孟餘）案，前接兄復電謂：宥在監委，即為失職，宥在中央，則監委當無異詞，維持體制，兼顧中樞，苦心調護，欽佩殊深。現此案事實，漸次明顯，而中政會亦已議定適當解決之辦法，收帆息紛，此正其時，尚希我兄轉勸各監委同仁，適可而止，不可再起波瀾，激成意氣。國家危難至此，無論內外，均有人企願中樞解體，以起大紛，吾輩於互相規勉之餘，正宜益加團結，以期免於棟折榱崩之局，想賢明當亦謂然也」。¹⁰⁸ 9月22日「購料合同案全部既經審查明確，決定不予懲戒」。¹⁰⁹

107 高素蘭編註，《蔣中正總統檔案：事略稿本》（台北：國史館，2006），第26冊，1934年5月11日，頁66–67。

108 蔣中正，〈致于院長右任請勸各監委對彈劾顧孟餘案適可而止電〉，秦孝儀主編，《總統蔣公思想言論總集》（台北：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委員會，1984），卷37，「別錄」，中華民國二十三年，頁101。

109 周美華編註，《蔣中正總統檔案：事略稿本》（台北：國史館，2007），第28冊，1934年9月22日，頁68。

從政治局勢與權力鬥爭的角度來分析，顧案是孫科、于右任等聯合反汪的一次嘗試，「以劉為工具耳」。¹¹⁰于右任與汪、顧之衝突其來有自。從1925年北京政治分會開始，于、顧即有衝突。1931年四屆一中全會時蔣曾屬意于右任為國民政府主席，後汪受胡漢民影響，支持林森，于右任擔任主席一事落空，因而大憤。¹¹¹再者，1932年汪任行政院長時，與日方簽訂《上海停戰協定》；于右任認為此約「不交立法院議決，遽行簽字」，曾彈劾過汪。後來此案以上海協定「係中央政治會議第二十九次臨時會議決議」，無須交立法院，而被汪壓了下來，兩人之矛盾愈為激化。至於孫科方面，孫想為粵籍的梁寒操（1898–1975）、馬超俊（1885–1977）謀「一二閣部，如鐵道交通是也」而不果，也對汪有所不滿，於是與于右任合作。¹¹²這些人事之間的糾葛是促成顧案的重要因素。¹¹³

蔣處於蔣汪合作之格局，不希望因顧案而生變。1934年2月11日汪、蔣通電全國「救亡圖存之方案，以治標莫急於剿除赤匪，治本莫急於生產建設」，希望順利展開剿匪、建設以抗日，對他而言彈劾顧將會影響蔣、汪之合作，故採取「袒汪抑于」的政策，使顧案最後以「不予懲戒」收場。¹¹⁴

110 有關彈劾案與國民黨內派系鬥爭，以及彈劾案背後之政治目的，劉維開根據1943年7月3日《王子壯日記》指出「劉侯武原為改組派人士，以要求不遂，改投孫科，孫欲取鐵道部長一職與馬超俊，現于右任與孫科合作以反汪，故以劉為監委而打擊顧。『此于孫之共同政策以劉為工具耳』」。劉維開，〈訓政前期的黨政關係（1928–1937）：以中央政治會議為中心的探討〉，《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報》，第24期（台北，2005年11月），頁107。

111 周德偉，《落筆驚風雨：我的一生與國民黨的點滴》，頁320。

112 《王子壯日記》，第2冊，1934年1月16–17日，頁8–9。盧豔香，〈實際運作中的中政會——以「顧案」為中心〉，《中國國民黨中政會研究 1924–1937》（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6），頁150–151。

113 有關此案之經緯在原始材料方面有可參見上述先導出版社編印，《監察院彈劾顧孟餘案始末記》；徐永棠編，《顧案紀詳》（出版地與出版者不詳，1934年9月），本書收集有關此案之重要文獻及報紙上對該案討論之文章。相關研究請參看盧豔香，〈實際運作中的中政會——以「顧案」為中心〉，收入《中國國民黨中政會研究，1924–1937》，頁143–157。

114 硯農，〈三週問國內外大事紀要：自二十八年二月一日起至二十八年三月一日止〉，《國聞週報》，第11卷第9期（上海，1934年8月），頁1；段智峰，〈蔣汪

此後顧孟餘繼續從事多項鐵路建設，蔣亦持續關注全國的鐵路建設，1934年10月27日，蔣曾下令要顧孟餘整頓路警及各站環境，「各鐵路路警急須整頓，不特其服務責任需特別訓練，甚至日常行動亦應切實規定。例如在站上任意吐痰，在路旁隨便解手。而於各站場之清潔與破屋舊物之整理，亦應從速注悉為荷」。¹¹⁵ 這一指示應與新生活運動有關，亦反映出蔣重細節、直接干預的個性。惟1934年冬天，顧的身體多次出現狀況，患腎病失眠症，也曾傳出患肺病，¹¹⁶ 數度赴上海治病，又去北平西山養病，部務由曾仲鳴代行。至1935年6月中才返回南京。¹¹⁷ 1935年8月8日，汪因和戰問題與主戰派發生衝突，提出辭呈，12日陳公博與顧孟餘表示與汪院長同進退，亦提出辭呈。¹¹⁸ 此外教育部長王世杰、僑務委員會委員長陳樹人、行政院政務處處長彭學沛亦相繼呈辭。¹¹⁹ 後各人均獲慰留。

1935年11月1日上午汪兆銘在國民黨的四屆六中全會上遇刺，被軍人、鐵血鋤奸團團員孫鳳鳴(1905–1935)擊中三槍重傷(圖4.5)。孫鳳鳴被捕之後當晚十時在中央醫院接受張道藩(交通部常務次長)、陶履謙

合作格局下的另一種局面——以1934年顧案為中心》，《民國檔案》，2011年第1期(南京，2011年4月)，頁103–110。

115 「蔣中正電顧孟餘整頓各鐵路路警及注重各站場之清潔與舊物之整理」(1934年10月27日)，〈籌筆——統一時期(一二一)〉，《蔣中正總統文物》，台北，國史館藏，典藏號：002-010200-00121-041。

116 次君，〈顧孟餘一病幾殆〉，《福爾摩斯》，上海，1934年11月26日，第1版。

117 〈顧孟餘續假，部務曾仲鳴代行〉，《中央日報》，南京，1935年2月3日，第2版。〈顧孟餘赴平養病〉，《香港華字日報》，1935年4月21日，第1張第3頁。〈顧孟餘暫無南下意 尚須靜養一月〉，《香港工商日報》，1935年5月23日，第1張第4版。〈顧孟餘抵平〉，《香港工商日報》，1935年8月8日，第1張第2版。〈顧孟餘返京銷假，病體復元，短期內不再他往〉，《中央日報》，南京，1935年6月16日，第2版。

118 〈汪精衛辭職後 陳公博顧孟餘亦提出辭職〉，《香港工商日報》，1935年8月13日，第1張第2版。

119 〈新聞網〉，《社會日報》，上海，1935年8月14日，第1版。

(內政部政務次長、代理部長)、彭學沛(行政院政務處處長)、谷正綱(實業部常務次長)、谷正倫(憲兵司令)、陳焯(首都警察廳廳長)等訊問官的審問。¹²⁰根據其供詞，孫曾在十九路軍當過連長(參加過一二八淞滬戰役)，「我的女人抗日時在上海死於日本人的刀下了」，「我一個鳥字也不認識，沒有什麼主義」，只希望全民抗日。刺汪的原因是他擔心「六中全會開完就要簽字，再不打他，要亡國，做亡國奴了」。¹²¹隔日清晨孫鳳鳴因傷重過世，此案牽連了一百多人被捕。11月28日，蔣曾致電汪請其專心靜養，政治方面的問題，他會與顧孟餘討論，請汪不必擔心：「傷痛未痊，不勝憂悶，請兄專心靜養，期早勿藥。政事請勿在念，近以華北擾攘，尚未計及於此，一俟有暇，再與孟餘先生等詳商請示也」。¹²²12月執行對日妥協政策的外交部次長唐有壬亦遇刺身亡。次年2月，汪兆銘前往歐洲療養，至1937年1月(西安事變後)方回國。

1935年12月2日至7日國民黨召開五屆一中全會，顧因汪的關係被選為主席團成員。王子壯記載「今日為一中全會開幕之日……十時於禮堂行禮後，即接開預備會議，推定主席團十人，以原擬無顧孟餘，繼因汪先生關係，復以加入，適為十人，向所無也」。¹²³全會中通過行政院

120 這些審問者多為與汪較為親近之人，這可能是蔣所刻意安排的。徐永昌在日記中曾記載他所聽到的傳聞，據說顧孟餘、唐生智也參與此事：「汪先生係被一改組派人物所狙擊，已獲其主謀犯，交由顧孟餘、唐孟瀟(汪派)及鐵道部之警察隊長(汪親戚)審問，得到之口供，私的方面係工作後未得到報酬，公的方面係問問汪自己做了些什麼事，汪被擊時，蔣適未在地，因之頗有疑難蔣者，所以蔣對緝犯問題特急，今獲得主謀犯，即令汪之親近審問也」。徐永昌，《徐永昌日記》(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1)，第3冊，1935年11月9日，頁325。

121 「嚴彭齡呈汪兆銘被刺兇犯孫鳳鳴各嫌疑人供詞彙錄」(1935年11月1日)，〈其他——汪兆銘楊永泰案卷(二)〉，《蔣中正總統文物》，台北，國史館藏，典藏號：002-080101-00067-002。

122 王正華編註，《蔣中正總統檔案：事略稿本》(台北：國史館，2009)，第34冊，頁487-488。

123 《王子壯日記》，第2冊，1935年12月2日，頁524。

圖 4.5 英國報紙刊登汪兆銘被刺的消息



各部會改組，由蔣中正出任行政院長，顧被調任為交通部長（1935年12月12日–1937年3月4日），鐵道部長遺缺則由張嘉璈（1889–1979）接任。12月12日蔣電顧孟餘：「今已發表兄為交通部長，部務不可一日無人，請兄即日蒞京面商一切，政、常二次長人選是否更調，亦請詳告，俾得與各部次長同時發表」，¹²⁴然而顧到南京之後，蔣卻因為事情太忙無法接見。此舉使顧大為惱火。蔣在日記中提到：「孟餘以昨未晤，今晨即回滬，心甚不快，世人不知余之忙迫與苦痛。昨日自朝至晚幾乎無片刻暇咎而猶以為不見客，發怒招怨非孟餘一人而已也」。¹²⁵12月16日顧

124 王正華編註，《蔣中正總統檔案：事略稿本》，第34冊，頁660。

125 《蔣中正日記》，1935年12月15日。蔣後來為「以當日未晤」託曾仲鳴向顧致歉。顧孟餘在1935年12月25日致蔣函中提及當時國事繁忙且他需返滬就醫，

並未就職。交通部的主要工作均由蔣的同鄉與親信、常務次長俞飛鵬(1884–1966)代理，至1937年3月3日，中政會方通過顧「辭職照准，特任俞飛鵬為交通部長」。¹²⁶

在黨職方面，顧孟餘在五屆一中全會出任政治委員會委員，同時擔任此一職務的汪派人士還有汪兆銘(主席)、唐生智、陳璧君、陳公博等人。¹²⁷蔣也希望顧出任中央政治委員會秘書長(1935年12月7日通過、陳布雷為副秘書長)，他卻屢屢稱病請辭，後由朱家驊代理。¹²⁸蔣甚至多次請汪出馬協助，顧亦不改初衷：「電復上海汪兆銘，元辰電敬悉，政會秘書長非孟餘先生擔任不可，騶先本擬今日北上就醫，彼實有病，茲特強留半月，暫代孟餘職務，切盼其速來京。彭學沛已由行政會議提請任為交通次長矣」、「上海汪主席精衛先生尊鑒。尊體近日如何？甚念。孟餘先生何時來京？務請再為催促，以交部事非其到京，不能進行也，如何？盼復。」¹²⁹一直到1936年12月1日，蔣仍繼續努力延請顧到南京來協助，然顧均未應允：「電上海顧孟餘，告以先生休養已久，尊體諒已復元，騶先兄將赴浙江就任，務望先生即日命駕入京，主持委會為盼。」¹³⁰蔣可能為了拉攏顧孟餘，在1936年國慶授勳典禮頒發給顧孟餘「二等采玉勳章」以資鼓勵，當時同樣獲得此一勳章的國府官員有何

故未能在京恭候。他也表示「惶悚之忱正切於懷，乃反勞我公齒及，既佩謙光，亦增慚感。謹再附陳，尚祈垂宥為幸」。「顧孟餘致蔣中正函」，〈一般資料——名人書翰〉，《蔣中正總統文物》，台北，國史館藏，典藏號：002-080200-00622-023。

126 〈王寵惠繼任外長 中政會昨日會議決定 張群曾仲鳴任中政會正副秘書長 顧孟餘辭交通部長由俞飛鵬升任 通過粵港和工程公債二百萬元案〉，《天光報》，香港，1937年3月4日，第1版。

127 劉維開編，《中國國民黨職名錄》，頁131。

128 同上，頁132。

129 蔡盛琦編註，《蔣中正總統檔案：事略稿本》，第35冊，1936年1月15日、1936年2月8日，頁112、554。

130 高素蘭編註，《蔣中正總統檔案：事略稿本》(台北：國史館，2009)，第39冊，1936年12月1日，頁351–352。

應欽、陳紹寬、王世杰、張嘉璈、吳忠信、陳樹人、翁文灝等人。¹³¹

1935年12月由蔣中正主導的國民黨與政府的改組，重新掌握了黨政軍權，在此過程中蔣十分重用顧孟餘。陳公博記載在汪被刺之後，蔣曾考慮請顧孟餘擔任行政院副院長，「在汪先生出國之時，以副院長代行政院長的職務」，後為顧所拒絕。¹³²行政院重組之後，又任命顧為交通部長，以及中央政治委員會秘書長等職。此舉應係藉此慰藉汪兆銘、拉攏汪派人士。王子壯（當時為中央監委會秘書長）則認為此次改組是由政學系楊永泰（1880–1936）所策劃，「蔣先生所組織為混合的、親日政府」，張群以親日而畀以外交重任；吳鼎昌是「舊安福系」，曾留學日本，與日本頗有淵源；張公權為「研究系」，亦親日。汪胡各派「均不能與中央政權」，然蔣重用顧因而「略有保留」了汪派的勢力；CC系則未能參與。¹³³如果他的分析是正確的話，顧受到重用，以及蔣多次親自致電請其就任新職，應該是出於蔣希望與汪系繼續維持合作關係所致。

然而顧對於各種職務一律懇辭「不就」，「蟄居滬寓，杜門謝客」，這一做法引起外界許多揣測。1937年初的一篇報導可見其端倪，「前歲汪精衛在五〔六中〕全會前被狙擊，身負三創而去國，掀動政治微波，其左右如陳公博、曾仲鳴、谷正綱等，亦隨汪而受黜。獨顧孟餘既辭鐵長矣，復遷交通，時人以為異數，而不知此迺一種政治手法，所謂『欲取故予』者也。詎顧燭其謀，固辭弗就，年來蟄居滬寓，杜門謝客」。¹³⁴顧從鐵道部長任內卸任，又不再就任交通部長，顯示汪蔣合作關係的破裂。1937–1938年汪蔣雙方與汪派內部又因對日和戰問題再生分歧。

131 「何應欽等十二員分別給予采玉勳章」（1936年11月12日），〈民國二十五年國慶授勳（一）〉，《國民政府》，台北，國史館藏，典藏號：001-035111-0048。

132 陳公博，《苦笑錄》，頁325。

133 《王子壯日記》，第2冊，1935年12月11、13日，頁533–535。

134 汲冢，〈顧孟餘悄然去國〉，《天文台半週評論》，第36期（香港，1937年3月17日），頁4。

第四節 和戰爭議與汪之出走

顧孟餘在鐵道部長任內即有報紙報導他與汪兆銘關係較為疏遠，這一變化也涉及兩人對和戰問題的不同看法。1933年5月31日「塘沽協定」簽訂前，日軍佔領熱河、進攻瀋東，平津為之震動，出現了與日簽訂休戰協定之擬議。5月21日顧孟餘與王世杰商訂對日政策，曾致書汪兆銘採取審慎態度，「力主維持政府歷來外交政策，必于國聯監視或列強居間調停之下，方與日本交涉」，「廿三日晚，復與孟餘聯名以一函致汪，力主避免文字的協定，並主張召回黃郛；對西南政府則主極端隱忍」。¹³⁵這時顧孟餘仍對和談抱著謹慎而樂觀的態度，只是希望不因協定而影響國府對東三省與熱河問題所採取的作法。至1935年汪主持行政院與外交部，推行對日妥協外交。7月時，中日有「何梅協定」，國軍退出河北，取消河北國民黨活動，並禁止該省一切反日活動。汪所主導中日之間的和平談判受到國內主戰派的反對。顧孟餘曾為此勸汪急流勇退，他與王世杰、彭學沛、石瑛（1879–1943，時任考試院銓敘部長）等人一起署名致函汪，請其改變對日妥協方針，並辭去外交部長（圖4.6、4.7）：

今後對日外交似可立以下方針：甲、對日不為激怒之舉動或言論。乙、對於無關重要之事項，雖不妨為權宜之措置，但對於一切含有直接或間接承認滿洲國之危險以及他種關係主權之事項，決不讓步。丙、對乙項方針宜常有堅決表示，以杜日方僥倖覬覦之心。丁、必須假想敵方於最近期內對於華北或華中，將為再度之武力壓迫，因此，汪先生應與蔣宋諸公切實會商，迅速對於政府安全，軍事佈置，以及財政外交等事，極力準備，以免臨事陷於屈服或崩潰之窮境。戊、凡任敷衍日本工作之人，不宜在國防或外交機關居負責地位，以防因敷衍而輕為許諾，鑄成大錯；或因不能滿足對方要求而失其機能；並防引起國民或國際之猜疑，減損政府之權

135 王世杰著，林美莉編輯校訂，《王世杰日記》，上冊，1933年5月25日，頁1-2。

圖 4.6 王世杰等致汪兆銘函手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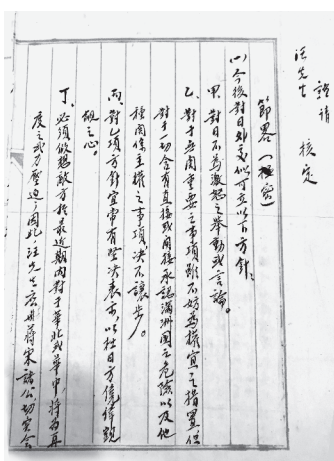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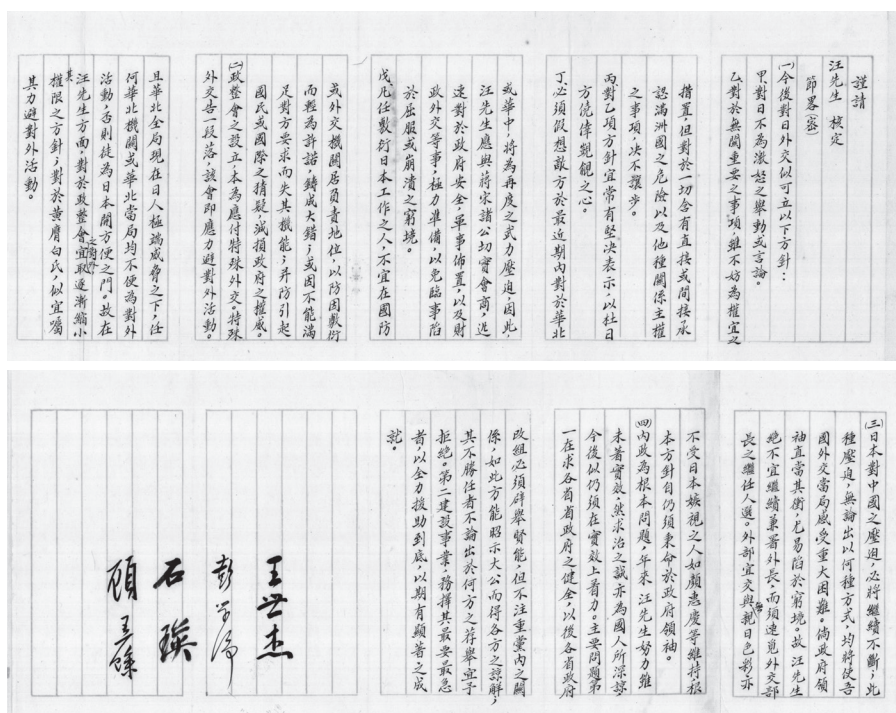


圖 4.7 王世杰、彭學沛、石瑛、顧孟餘致汪兆銘函



威。……日本對於中國之壓迫，必將繼續不斷；此種壓迫，無論出以何種方式，均將使吾國外交當局感受重大困難。倘政府領袖直當其衝，尤易陷於窮境。故汪先生絕不宜繼續兼署外長，而須速覓外交部長之繼任人選。外部宜交與無親日色彩亦不受日本嫉視之人如顏惠慶等維持，根本方針自仍須秉命於政府領袖。¹³⁶

然而汪卻不肯接受他們的建議，後來情況越演越烈，才出現被刺之事。報刊上曾有文章對此有所評論，「廿四年秋，日寇華北急，舉國目汪為親日魁首，顧嘗以急流勇退勸汪退讓賢路，毋為世人罵也，汪弗聽，顧迺恚而稱病，走北平，久久不歸，汪莫奈何，即以曾仲鳴權代鐵道部務，其後果有十一月十二〔一日〕之變，喋血都門，負傷幾死」。¹³⁷汪被刺殺之後，出國療傷，顧則心灰意冷而退隱北京，1936年7月，報紙報導顧在北京遁入佛門：「顧行蹤不明，經多方刺探，始知顧在北京逃禪，一說僅歸依佛法，一說已正式披剃為僧」。¹³⁸「前任鐵道部長中委顧孟餘，不就交通部長後，即行隱居他鄉，友朋間亦絕無音信往還……良以顧氏鑑於汪氏熱心衛國，遭此不幸暗算，因感政治與社會，不適於學者性之接近，故具此消極之決心，隱姓埋名以去耳。又有人云，顧已出家為僧，此說尚待互證，總之在現時各方尚未知顧氏所在地，則為事實云」。¹³⁹一直到1936年12月，新聞媒體還在猜測他有沒有出家，「現在顧先生是否真個退隱，還是個沒有分曉的謎。只是在我們看來，現值國家多事之秋，還熱望他繼續以前精神，再出來幹一下子」。¹⁴⁰

136 「王世杰、彭學沛、石瑛、顧孟餘函汪兆銘」(1935)，〈汪兆銘投敵前與政府首要函電(一)〉，《汪兆銘史料》，台北，國史館藏，典藏號：118-010100-0048-005。

137 汲惛，〈顧孟餘悄然去國〉，《天文台半週評論》，第36期(香港，1937年3月17日)，頁4。

138 〈顧孟餘出世〉，《晶報》，上海，1936年7月20日。

139 露軒，〈顧孟餘中委何往〉，《晶報》，上海，1936年7月21日。

140 〈顧孟餘出家之謎 國事螭蟾仍希努力〉，《天光報》，香港，1936年12月10日，第2版。

1937年1月，西安事變之後，汪兆銘回國。在此之前，他曾表示希望顧孟餘、陳公博與陳璧君等人到新加坡去接他。¹⁴¹後來陳璧君去新加坡迎接，陳公博留在香港與國民黨中央所派的邵力子(1882–1967)、周佛海、周啟剛(1896–1978，時任職於僑務委員會)等人在香港候駕，並同船於1月14日返抵上海。¹⁴²但顧一直沒有出現，「連歡迎電報也不發一個」。¹⁴³1937年1月7日蔣中正曾致電顧孟餘，請他到京商議，可能是為了安排與汪見面之事，然顧似乎亦未回覆。¹⁴⁴直到1937年1月31日，仍有報刊文章說「顧自卸職以後，即赴西山修養，今已皈依佛法，一心念經，頗有看破紅塵之意」。¹⁴⁵從1936年中至1937年初報紙上有多起顧孟餘出家為僧的報導，然而這些報導似乎均無事實根據，只能視為記者對顧氏行蹤之猜測。不過也有人推測汪回國之後，顧「宿疾全消」，將離平返京，出任中政會秘書長。¹⁴⁶

汪回國之後，立即前往溪口見蔣中正，從1月24日至27日，汪表示兩人「密晤聚三日，悲喜交集」。¹⁴⁷蔣在日記中一直關心汪返國之後的

141 〈汪精衛電陳璧君〉(1936年12月14日)，蔡德金輯，〈西安事變前後汪精衛與陳璧君等來往電函〉，收入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史資料編輯組編，《近代史資料》，第60號(北京，1986)，頁133。

142 李珂，《陳公博》(石家莊：河北人民出版社，1997)，頁287。

143 報紙上有人猜測「上年因汪氏慘遭狙擊，扶病出國，他的部下，也大半離開南京。這次汪氏又扶病回國，將到香港了，……在汪氏左右地位最崇高的，要算是陳公博和顧孟餘了。陳公博如今早已到香港迎汪，顧孟餘卻聲息全無，還在北平養病。正在這迎汪聲中，忽然消息傳來，說顧氏已經看破紅塵，在西山碧雲寺出家……厭棄政治生涯，不願再列身仕途了」。秀水，〈汪精衛返國聲中的顧孟餘——北平西山禮佛參禪？〉，《福爾摩斯》，上海，1937年1月11日。

144 「蔣中正電顧孟餘即日到京詳商」(1937年1月7日)，〈交擬稿件——民國二十五年一月至民國二十六年十一月〉，《蔣中正總統文物》，台北，國史館藏，典藏號：002-070200-00007-002。

145 依然，〈顧孟餘念佛西山〉，《華字晚報》，香港，1937年1月31日，第3頁。

146 欣草，〈汪先生急難返國，顧孟餘宿疾全消，將離平返津任政會秘書長〉，《福爾摩斯》，上海，1937年2月1日。

147 「汪兆銘電蔣中正」(1937年1月29日)，〈汪精衛致總裁函電〉，《汪兆銘史料》，台北，國史館藏，典藏號：118-010100-0043-007。

動態，並準備與汪見面。1月18、19日蔣即預備「與汪談話次序」；23日擬定「與汪先生談話要點」、並提醒自己注意「對汪懇切示之」；24日「正午汪先生來慈庵相晤，下午汪〔往〕樂亭訪汪」；25日「見汪先生」；26日「上午批閱後與汪先生談黨部與經濟，彼甚注重經濟也，下午陪汪遊奉化錦屏公園，談對共問題為多」。¹⁴⁸汪返國之後並未出任正式職務（為國民黨中常委，1938年3月任副總裁），不過行政院秘書處的簡任秘書曹宗蔭、薦任秘書汪杞（字彥慈、汪兆銘的次子）一直在「汪公館辦事」，擔任隨從秘書。¹⁴⁹汪返國之後，政務處的簡任參事滕固、陳克文與端木愷，組織部副部長谷正綱等人則協助他與政府機關、黨部與新聞界的聯絡工作。¹⁵⁰

汪返國之後與顧的關係如何，並無太多線索。《申報》報導1937年2月5日汪由陳璧君與曾仲鳴陪同，由南京乘飛機到上海。午餐後，至褚民誼家中休息，三時許，宋子文、顧孟餘先後赴褚宅晉謁，據云晤談頗歡。¹⁵¹2月15至22日，顧參加了在南京召開的國民黨五屆三中全會，會中確定停止內戰，實行國共合作。1937年初之後汪顧之間可能開始出現了分歧。根據周德偉，汪回國之後曾請谷正綱赴西山謁顧，「詢以大政方針」。顧建議汪再出國赴英美結交國際友人、堅持先剿共再抗日、支持民主法治，反對獨裁。汪卻沒有採納顧的建議，而接受了陳璧君的意見留在國內。顧見汪不肯出國，於是決心自行出國，「避免蔣氏之注意，並培養聲望」。¹⁵²1937年3月9日，他與蔣中正在上海見面，「上午在滬寓會客，顧孟餘來談，謂對現局應急其要者、大者，不應放鬆之

148 《蔣中正日記》，1937年1月18-26日。

149 「周琴鶴呈陳述行政院內部組織積習及人事各情形並附行政院系統圖及組織法」（1936年12月11日），〈戰時重要措施（二）〉，《蔣中正總統文物》，台北，國史館藏，典藏號：002-080101-00015-006。

150 《陳克文日記，1937-1952》，1937年1月16日，上冊，頁26。

151 〈汪精衛昨由京飛抵滬，陳璧君曾仲鳴等同來，宋子文顧孟餘曾往訪〉，《申報》，上海，1937年2月6日，第13版。

152 周德偉，《落筆驚風雨：我的一生與國民黨的點滴》，頁407-408。

事，決不可放鬆，公謂其言頗中肯也」。¹⁵³隔了幾天(1937年3月12日)他就帶著夫人去歐洲：「顧氏十二日自滬乘意船干德華地號放洋，十四日過港，原輪赴歐，夫人韋增英[瑛]女士同行」，「一來一去，背道而馳」。¹⁵⁴顧在船上向記者表示「本人因身體不適，病魔纏綿，現遵醫囑，呈准中央當局，放洋暫為修養。此行赴法國延醫調治。本人在京參加三中全會，所獲印象甚佳，各地中委，熱烈參加，為空前所未有，足徵我國統一，精誠團結。當茲國難嚴重關頭，我國能有此種良好景象，國運必漸有轉機也云」。¹⁵⁵

當顧在英國時汪兆銘曾託駐英大使郭泰祺(1888–1952)轉交一封信給他，表示目前要持久抗戰，希望他能利用機會「在歐洲策動輿論」，並允諾給予經費支持，然顧似乎並未依照其指示辦理(圖4.8)。¹⁵⁶1937年10月，顧氏夫婦在德、奧、英諸國遊歷後，自英國返回上海。¹⁵⁷10月底，蔣在改組行政院時一度擬請顧孟餘入閣，主管教育。¹⁵⁸淞滬會戰失敗後，政府遷至武漢，11月26日他陪同汪兆銘從南京乘船赴武漢，旅途之中他向中央社記者說明旅歐觀感：「自我全面發動抗戰以來，歐洲一般輿論，對我均具同情。就德國言，商界及實業界，因貿易上密切關

153 王正華編註，《蔣中正總統檔案：事略稿本》(台北：國史館，2010)，第40冊，1937年3月9日，頁254。亦見《蔣中正日記》，1937年3月9日。

154 汲惺，〈顧孟餘悄然去國〉，《天文台半週評論》，第36期(香港，1937年3月17日)，頁4；〈顧孟餘赴歐〉，《申報》，上海，1937年3月16日，第14版。顧出國之時，汪曾致贈五萬元，顧拒收。蔣聽到之後致贈十萬元，顧亦拒收。後來是由中央研究院、教育部、中央大學、武漢大學等機構以贊助出國研究的理由，各贈萬元，支持顧出國。周德偉，《落筆驚風雨：我的一生與國民黨的點滴》，頁40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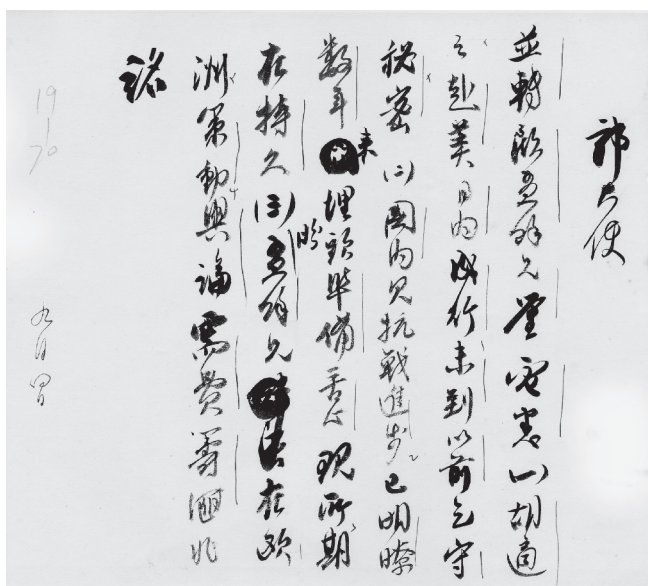
155 〈新任駐波公使魏宸組出國過港 顧孟餘亦同輪赴歐考察〉，《華字晚報》，香港，1937年3月14日，第4頁。魏宸組(1885–1942)，外交官，1937年1月7日，國民政府任魏宸組為駐波蘭特命全權公使。

156 「汪兆銘函顧孟餘」(1937年9月4日)，〈國際各有關方面致汪兆銘函電〉，《汪兆銘史料》，台北，國史館藏，典藏號：118-010100-0056-032。

157 〈顧孟餘抵漢談歐遊觀感〉，《申報》，上海，1937年11月28日，第2版。

158 《蔣中正日記》，1937年10月31日。

圖 4.8 汪兆銘致郭泰祺函



係，對我同情尤深。英國方面，朝野上下均極關切遠東局勢。惟以歐洲種種問題之牽掣，殊難使其放手去做」。¹⁵⁹ 1937年底之後顧氏夫婦又離開武漢，移居香港，1938年一月時顧氏夫婦已抵達香港，年底時他的姪子顧彥和正讀初中二年級，「是年冬某日，我與二妹同去界線街伯父居所，預備在他家後院草地上打羽毛球。那天伯父似乎很不高興，伯母告訴我們，伯伯有事，你們過幾天再來打吧。聽了這話，我們稍待了一會兒就回家了。過了幾天『豔電』在港報上發表」。¹⁶⁰ 顧氏夫婦在香港一直住到1940年8月。¹⁶¹

159 〈歐洲一般輿論對我同情 顧孟餘之談話〉，《香港華字日報》，1937年11月27日，第1張第3頁。

160 顧彥和，〈我所知道的顧孟餘〉，刊於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北京市委員會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文史資料選編（第32輯）》，頁216-217。

161 顧氏夫婦在此期間的具體活動情形不詳。在蔡元培的日記中曾留下四次與顧見面的紀錄，分別是1938年的1月18日、1月20日、3月4日，以及1939年7月

1937–1938年之時汪兆銘正積極地朝著對日和談之路前進。陳公博說「自西安事變發生後，汪先生更是傾向和平，以為中國對日應該尋出一條和平之路」。¹⁶²汪也表示，在蘆溝橋事變發生以後，「我對中日戰爭，固然無法阻止，然而沒有一刻不想著轉圜」，「對於日本，本著冤仇宜解不宜結的根本意義，努力於轉敵為友」。¹⁶³周佛海說在廬山談話會之後，即以汪為中心策劃了一系列與日本交涉的計劃。在淞滬抗戰失利、南京陷落、政府機關遷至武漢後，求和的氣氛更是濃厚。¹⁶⁴

1938年3月29日至4月1日在武昌召開的臨時全國代表大會，主旨為策定抗戰建國方針，會中通過國民黨總章修正案，增設總裁、副總裁各一人，以鞏固領導中心，會中推舉蔣汪為正副總裁。汪、蔣再次合作。¹⁶⁵4月6日，在蔣當選總裁之後，黨部提出了黨務改革建議案，提出黨部組織的重整與各單位主管的建議名單。其中新設「社會職業部」，建議由顧孟餘或翁文灝擔任部長，副部長的建議名單則為甘乃光、劉健群、張道藩。¹⁶⁶不過這個建議並未被蔣所採納。4月8日國民黨中央「互選常務委員並通過各部部長及任命秘書長」，蔣屬意由顧孟餘出任宣傳部長，並於4月8日的會議中通過。蔣請汪兆銘說服顧接受此一職務，汪乃去函顧：「轉孟餘先生鑒：蔣先生在全會提請兄任宣傳部長，周佛

22日。顧也參加了1940年3月蔡元培在香港舉行的葬禮。蔡元培著、王世儒編，《蔡元培日記》，頁533、542、626。此外張慰慈也在1939年10月與顧孟餘在香港見面，談起陶希聖的事。參見〈張慰慈致胡適函〉（1939年10月27日），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中華民國史研究室編，《胡適來往書信選》，中冊，頁438–439。

162 陳公博，《苦笑錄》，頁409。

163 汪兆銘，〈我對於中日關係之根本觀念及前進目標〉，《三民週刊》，第1卷第1期（上海，1939年8月），頁19–22，這是1939年時汪回憶自己在1937年時的想法。

164 李志毓，《驚弦：汪精衛的政治生涯》，頁169–173。

165 陳克文著、陳方正編輯、校訂，《陳克文日記，1937–1952》，1938年4月2日，上冊，頁209。陳克文對此頗感振奮，認為此舉可以終止國民黨之內鬥。

166 「對中央黨務關於召集臨時代表大會要義、手續及方針之建議案」（1938年4月6日），〈特交檔案（黨務）——總裁訓示及各方建議（第〇二四卷）/006〉，《蔣中正總統文物》，台北，國史館藏，典藏號：002-080300-00030-006。

海、董顯光為副部長，弟曾再三說明兄未必就，蔣先生堅持並囑弟力勸。弟意國難如此。無所逃於天地之間，況宣傳部在抗戰期間，舍軍事外實為最要，以兄主持黨內外，皆慶得人，盼兄勉為提任，剋日前來，至懇至懇。銘」。¹⁶⁷不過顧仍然沒有改變心意，「孰料消息傳來，顧氏留港，毫無所動」，宣傳部長由周佛海代理，周佛海得知之後「不勝焦灼，以致全夜未能安睡」。¹⁶⁸

此時顧雖退居幕後，隱居香港，然其對時局與汪之動向仍頗為留心。1938年7月之後，汪秘密籌劃與日和談，主要參與人是高宗武、周佛海、陳公博、曾仲鳴等人。¹⁶⁹11月12–20日在上海重光堂舉行會談，20日梅思平、高宗武與今井武夫(1898–1982)等人簽訂《日華協定記錄及諒解事項》。顧可能聽到這方面的消息，1938年11月22日他從香港發了一封電報給汪：「重慶汪主席都密，弟觀最近內外形勢，言和已不可能。餘」。¹⁷⁰汪顯然不接受他的建議，12月18日離開重慶，抵達昆明，次日在周佛海等人陪同下飛往越南河內。29日發表「汪兆銘電中央黨部蔣中正暨中央執監委員等主張響應日本首相近衛聲明與日談和」的「豔電」(圖4.9)。¹⁷¹

167 「汪兆銘函顧孟餘」(1938年4月8日)，〈汪兆銘與汪政府各省市長函電(一)〉，《汪兆銘史料》，台北，國史館藏，典藏號：118-010100-0019-06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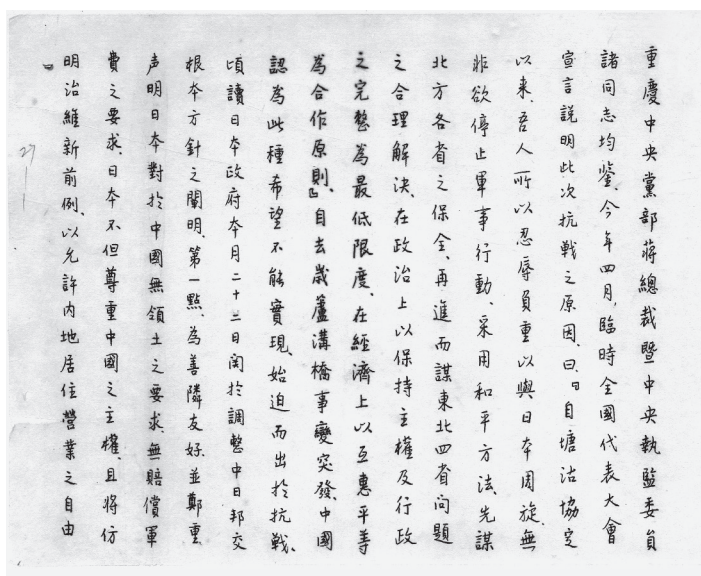
168 信陵，〈政海秘聞：顧孟餘有官不做〉，《晶報》，上海，1938年5月13日，第2版。當晚陳布雷將此事電告周佛海，參見周佛海著、蔡德金編注，《周佛海日記全編》，上編，1938年4月8日，頁110。1943年周佛海回憶：「臨時全國代表大會開會之後，接著開中央全體會議。顧孟餘被推為宣傳部長，我被推為宣傳部副部長。當時顧在香港，明知他是不會來的，所以就叫我代理部長」。周佛海，〈武漢追憶鱗爪〉，《古今半月刊》，第31期(1943年9月16日)，頁1154。

169 有關1938年七月初高宗武赴東京與日人會談，至年底汪出走河內的詳細經過與當時複雜的環境，請參考Rana Mitter, *Forgotten Ally: China's World War II, 1937–1945*(Boston: Houghton Mifflin Harcourt, 2013), pp. 197–210。

170 「顧孟餘電汪兆銘」(1938年11月22日)，〈抗戰前汪兆銘與各方首要函電〉，《汪兆銘史料》，台北，國史館藏，典藏號：118-010100-0055-023。

171 「汪兆銘電中央黨部蔣中正暨中央執監委員」(1938年12月29日)，〈汪兆銘與中國國民黨有關之各項函電(一)〉，《汪兆銘史料》，台北，國史館藏，典藏號：118-010100-0005-064。

圖 4.9 豔電 (第一頁)



汪交待陳公博將「豔電」帶至香港，交給汪派機關報《南華日報》(圖 4.10)的林柏生 (1902-1946) 發表。汪兆銘同時指示林柏生：

此電係醞釀年餘然後發作，而此電文又係數日以來幾經討論、幾經修改，然後定稿。且已由航空直寄重慶，故無論如何勿改一字，至要至要……弟此電係根據臨全大會宣言，而和平條件又非亡國條件，何為抗戰到亡國而後已。此意人人心中所有而又人人人口中所不敢言。弟毅然言之，以盡其對國家、對民族及對良心之責任。其他一切急功近利，皆所不為。¹⁷²

172 「汪兆銘電林柏生」(1938年12月)，〈國際各有關方面致汪兆銘函電〉，《汪兆銘史料》，台北，國史館藏，典藏號：118-010100-0056-006。

圖4.10 《南華日報》的刊名為汪兆銘題字



顧得知豔電內容之後先與陳公博、林柏生發生激烈的辯論，堅持汪之宣言不宜發表。¹⁷³ 29日晚間陳公博與林柏生也將顧孟餘的看法告訴剛從河內飛抵香港的周佛海，周在日記中記載：「顧孟餘堅持汪先生宣言不宜發表，並囑柏生停發，電汪阻止。余深深不以為然，主立即發出，多數人數日商量的結果，決不能以一人之意見而改變。公博主張不論汪有無回電，明日再發，余亦同意」。¹⁷⁴ 根據陳春圃（陳璧君之姪，1900–1966）的回憶，1938年12月27日下午4時，他去陳公博的九龍塘私宅訪問，陳告訴他當時的情況如下：

汪精衛即托陳（按：指陳公博）帶了親筆函連同自擬的響應近衛第三次對華聲明的〈豔電〉電稿交顧孟餘，以為顧會同意；不料顧孟餘看畢之後大吃一驚，表示反對說：「萬萬不能發表，這是既害國家又毀滅自己的蠢事。我馬上去電力爭，未得他（按：指汪）復電之前千萬不要發表，如怕遲誤一切由我負責」。陳唯唯而退，即歸告周佛海於九龍塘約道5號。不料周聽了大怒，竟暴跳如雷地說：「秀才造反，三年不成。如果因為顧孟餘一人的

173 林柏生的部分參見陳克文的日記，「據香港方面的傳說，汪先生的豔電是林柏生和梅思平等發表的，顧孟餘極不以為然，曾因此掌林之咀。汪先生被開除黨籍的消息到港後，柏生知已闖禍，通電話至口顫手震云」。陳克文著、陳方正編輯、校訂，《陳克文日記，1937–1952》，上冊，頁380。

174 周佛海著、蔡德金編注，《周佛海日記全編》，上編，1938年12月29日，頁217。

反對就不依期發表，那就散伙好了。我沒有什麼關係，馬上可以回重慶見『蔣先生』認錯請罪，料想不會有什麼問題。打開天窗說亮話，事已至此還有什麼商量的，幹就幹，不幹就拉倒。顧孟餘不過是個部長，我難道就沒有當過部長嗎？怎麼可以因他一人反對就推翻一切，連電報也壓住不發呢？」¹⁷⁵

顧對此感到無奈，12月30日凌晨直接發電報給汪兆銘，試圖阻止，「鄙意響應近衛聲明有百害而無一利，惟此層非一二言所能詳，但就先生對中央建議言之，此係內部商討，大計今既提出，應俟中央決定，不宜再在報章發表，以免公開決裂。如公開決裂，則對內、對外其影響之惡必至不可收拾，其結果與先生所期望者，或正相反。頃與公博先生談亦完全贊同此意。特電奉商，如承允諾，祈即電示柏生先生照辦，餘尚有進言。孟餘豔」(圖4.11)。¹⁷⁶ 陳公博、林柏生也隨後致電汪兆銘，陳公博告知「孟餘對建議在報發表爭持極烈，弟若堅持立即破裂。彼已電先生。若依原議請逕電柏生，不必覆弟。博」；林柏生則表示：決定只擱一日，「遵原命發表。柏」。¹⁷⁷ 30日晚間6時半，顧又再約陳公博見面，「蓋渠聞宣言仍將發，又欲阻止也。公博至九時始以臧告之，謂此乃鐵案，不能變更」。¹⁷⁸

顧致汪之電報發出後仍然未能改變汪的決定，30日晚間，林柏生依照汪之指示發出汪之通電，此後顧與汪、陳、林等人分道揚鑣。陳公博在1939年時曾告訴陶希聖，「汪先生沒有璧君不能成事，沒有璧君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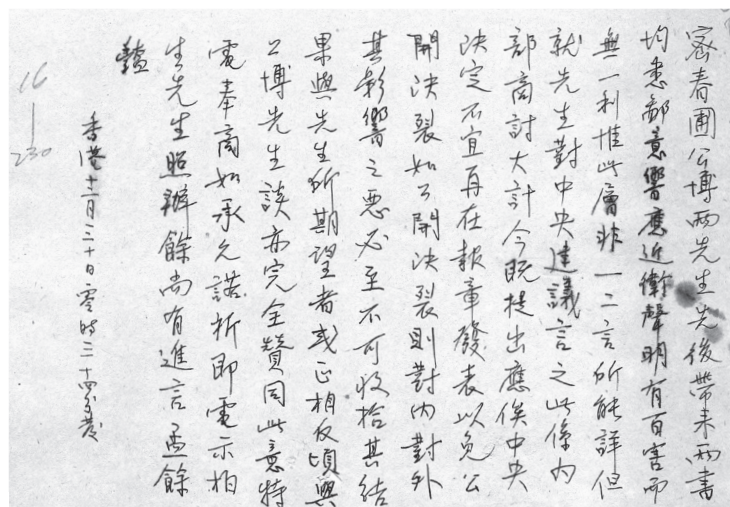
175 陳春圃，〈汪精衛集團投敵內幕〉，收入黃美真編，《偽廷幽影錄——對汪政權的回憶》(上海：東方出版社，2010)，頁74–75。陳春圃又說陳璧君得知之後僅淡淡地說「學者膽小，不足以謀大事」(頁75)。

176 「顧孟餘電汪兆銘」(1938年12月30日)，〈汪兆銘投日前與政府首要函電(二)〉，《汪兆銘史料》，台北，國史館藏，典藏號：118-010100-0049-056。

177 「陳公博、林柏生電汪兆銘」(1938年12月30日)，〈汪兆銘投日前與政府首要函電(二)〉，《汪兆銘史料》，台北，國史館藏，典藏號：118-010100-0049-054。

178 周佛海著、蔡德金編注，《周佛海日記全編》，上編，1938年12月31日，頁217–218。

圖 4.11 顧孟餘電汪兆銘



不致敗事」、「我（公博自稱）與孟餘一同跟隨汪先生多年，二人不同之處，是孟餘冷得下來，我冷不下來……所以這次孟餘脫離了汪先生，我仍然跟著他走」。¹⁷⁹ 豔電之後，汪派內部因主戰、主和而產生分裂，主和派跟隨著汪在南京建立附日政權，並在抗戰勝利之後，多因漢奸罪而被懲處；汪派之中像顧孟餘那樣反對和談的人（尤其是留在重慶的一批人）則因汪的出走而陷入一個政治上的困境。

179 陶泰來、陶晉生整理，《陶希聖年譜》，頁161。

第五章

豔電之後 (1938–1949)

第一節 晴天霹靂：豔電後重慶汪派分子的困境

汪兆銘的出走對蔣中正與國民政府來說是一個很大的衝擊。1938年12月21日，蔣在日記中曾紀錄，他在第一時間接獲雲南省府主席龍雲（圖5.1）於19日的電報，得知汪「潛飛到滇」，又稱病出走越南河內，¹「此事殊所不料，當此國難空前未有之危局，不顧一切，藉口不願與共黨合作，拂袖私行，置黨國於不顧，豈是吾革命黨員之行動乎？痛惜之至，惟望其能自覺回頭耳。」²

為了挽回汪，1938年12月23日蔣第一波行動是請張群出面，找汪的好友、交通部政務次長彭學沛於晚間11時50分發電給汪。張群給汪的建議是「先生行動為中外所屬目，發表談話務望不着痕跡，以免對內對外發生影響，且為敵方宣傳之資。尤盼在此期間萬勿遠行」；彭學沛

1 龍雲表示「汪副總裁於昨日到滇，本日身感不適，午後二時半已離滇飛航河內」，「龍雲電蔣中正」（1938年12月19日），〈汪偽組織（一）〉，《蔣中正總統文物》，台北：國史館藏，典藏號：002-090200-00022-002。

2 美國史丹佛大學胡佛研究所藏，《蔣中正日記》，1938年12月21日。蕭李居編輯，《蔣中正總統檔案：事略稿本》（台北：國史館，2003），第42冊，頁689–690。有關龍雲與汪出走之關係，及蔣對龍雲之爭取與防範，參見楊天石，〈再論龍雲和汪精衛出逃事件〉，收入呂芳上主編，《戰爭的歷史與記憶2：戰時政治與外交》（台北：國史館，2015），頁385–417。

圖 5.1 蔣中正與雲南省主席龍雲合照，
1945年3月25日攝於昆明金碧別墅



也說他和孔祥熙討論後都「切盼先生歸」。³ 12月27日蔣又親自召見彭學沛，「屬其電汪，駐港不如赴歐，以至誠動之」。⁴ 彭隨即於12月27日晚間，去電轉陳委座之意，「香港為是非最多之地……如能游歐二三個月……最妥，……盼先生不作任何宣言」、「此間諸友謂此事於公私情誼均無損傷，盼照常服務」。⁵

3 「彭學沛電汪兆銘」（1938年12月23日），〈各軍事首長與汪兆銘之函電（一）〉，《汪兆銘史料》，台北，國史館藏，典藏號：118-010100-0003-017。

4 《蔣中正日記》，1938年12月27日。蕭李居編，《蔣中正總統檔案：事略稿本》（台北：國史館，2010），第42冊，頁711，1938年12月27日。

5 「彭學沛電汪兆銘」（1938年12月27日），〈汪兆銘與中國國民黨有關之各項函電（一）〉，《汪兆銘史料》，台北，國史館藏，典藏號：118-010100-0005-068。

蔣爭取汪的第二波行動是透過朱家驊與陳公博。1938年12月24日上午11時35分，蔣中正指示由朱家驊致陳公博一封電報，希望由他轉給汪副總裁，「抗戰年餘維持不墜，幸得外力之助者，亦惟總裁副總裁之治決無間，以統一昭示世界……萬懇晤見副總裁時委婉陳詞，切請千萬珍重，仍本年來為黨、為國領導諸同志之苦心。偕兄返渝，黨國幸甚」。⁶

蔣方爭取汪的第三波行動是在12月26日由吳稚暉(敬恆)寫信給陳璧君。吳與汪、陳兩人交情深厚。1925年中，國民黨左右鬥爭之際，陳璧君曾有信，將其子女汪文嬰、汪文惺託孤給吳稚暉，可見其交情。⁷吳向陳璧君表示不忍汪「萬一墮落」，又深知汪之行動受陳左右，故望能動之以情，勸兩人返渝，「三十年來，先生梁孟，如斗星之朗耀，為通國所仰望，『引刀成一快，不負少年頭』，人當信老人顏，更華貴於少年頭也。今精衛先生病中，不知外事，望先生必速為預清污障，使天際永現真人。知先生必早為之，忝附知末，敢贅一言，並祝精衛先生早日康復」。⁸

6 「朱家驊電陳公博」(1938年12月24日)，〈汪兆銘與中國國民黨有關之各項函電(一)〉，《汪兆銘史料》，台北，國史館藏，典藏號：118-010100-0005-065。

7 在信中她說：「璧非以遣兩孩經先生者(一)故為兩兒求學(二)則更有不能言之苦心孤詣，我為其友，亦為其妻，目睹其憔悴煩憂之形容情緒，復知其以負責而觸他人怒，因救其友而犧牲其身，旦暮可為人乘矣。則託孤之責捨先生其誰！」。廖案發生後，陳璧君甚至擔心國民黨右派會因為怨恨汪而遷怒於嬰、惺兩人，在致吳稚暉函中又說：「海濱(註：鄒魯)自瀏陽失敗以來。態度殊不明白，廖仲愷被人暗殺，不知何故彼急逃口，近來更發生種種不當之言論，散布種種奇異之不利謠言，因失意而憤慮，因憤慮而怨恨季兄。璧甚憂，彼或將遷怒於嬰惺兩人，故請先生留意，若海濱及黎仲民等欲帶嬰、惺外出食飯或遊戲，切不可任其同往，海濱來校亦不必使之與兩兒接近，以海濱近事及其妻死事，觀之不能不預防。先生以為防不勝防，此可暫令嬰離校，未知先生以為然否？」。兩信藏於中國國民黨黨史館，〈陳璧君致吳稚暉函〉(1925年8月16日)，《吳稚暉檔案》，台北，中國國民黨黨史館，典藏號：稚07645；〈陳璧君致吳稚暉函〉(1925年12月14日)，《吳稚暉檔案》，台北，中國國民黨黨史館，典藏號：稚07644。亦可參考李志毓，〈汪精衛視野中的國民黨：《汪精衛「自傳」草稿》解讀〉，《史林》，2017年第6期(2017年12月)，頁165-175。

8 「吳敬恆函陳璧君」(1938年12月26日)，〈汪兆銘叛國(一)〉，《國民政府》，台北，國史館藏，典藏號：001-103100-00001-003。

上述的爭取行動都無法達到效果，汪仍執意出走河內，發表豔電。等到確定汪的去向後，國民黨於中常會決議開除汪兆銘黨籍。1939年1月1日中央黨部召開常會討論開除汪之黨籍案，在林森(1868–1943)與蔣中正等人表態要「嚴正表示」之後，進行表決，根據陳克文得自甘乃光的訊息，「乃光說，表決的時候，孔院長、陳樹人、于右任沒有舉手，他自己卻舉手了。這件事在我們跟隨汪先生十多年的人，除了痛心之外，還有何說？」⁹後此一開除黨籍案經中央監察委員會通過，中國國民黨發表〈開除汪兆銘黨籍決議〉一文，「汪兆銘……擅離職守，匿跡異地，傳播違背國策之謬論……此種行動，其為違反紀律，危害黨國，實已昭然若揭，大義所在，斷難姑息，即予永遠開除其黨籍，並撤除一切職務，藉肅黨紀，以正視聽」。¹⁰蔣在日記中記載此事：「下午召集臨時中央常會，及駐渝各中委討論汪電，決議開除其黨籍〔籍〕，解除其一切職權。元旦決定此案，實足為黨國之大慶也」。¹¹中執會於1月10日發文國民政府，「決議汪兆銘永遠開除黨籍並撤除其一切職務」，再由國民政府明令通緝汪兆銘，「如能就獲賞給國幣拾萬元」(1940年11月30日)(圖5.2)。¹²

在中央黨部開除汪黨籍之前後，蔣仍未放棄爭取汪。1939年1月3日蔣又請彭學沛向汪說明此乃不得已之舉措，為「維持人心，不致崩潰」，將來可再恢復，並無害於兩人公私之交誼：

密頃委座召見，對昨日決議有懇摯說明，謂係維持人心，不致崩潰，不得已。將來仍回復如舊，公私交誼均無害。委座講演，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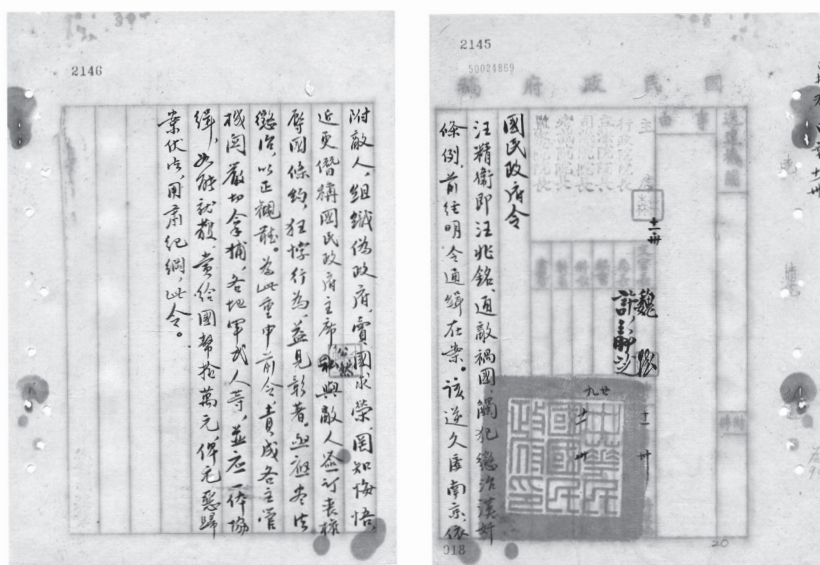
9 陳克文著、陳方正編輯、校訂，《陳克文日記，1937–1952》，1939年1月2日，上冊，頁344

10 國立政治大學人文中心主編，《民國二十八年之蔣介石先生》(台北：國立政治大學人文中心，2016)，頁6–7。

11 《蔣中正日記》，1939年1月1日。

12 〈開除汪兆銘黨籍案(一)〉，《國民政府》，台北，國史館藏，典藏號：001-014162-00001-000。〈開除汪兆銘黨籍案(一)〉，《國民政府》，台北，國史館藏，典藏號：001-014162-00001-008。

圖 5.2 國民政府通緝汪兆銘令



公發電時，尚未聞及。香港諸人情報不可靠，請勿置信。云明日航函詳。學沛冬。重慶，三日上午。¹³

此信反映出蔣對汪的兩面手法，一方面公開開除黨籍，另一方面又暗中表示兩人情誼依舊，然汪均不為所動。

蔣同時又利用汪的好友谷氏兄弟來說服汪。1938年12月29日，蔣即電谷正綱、谷正鼎兄弟，「汪先生最近離渝養病……深望兄勿因是焦慮而照常努力工作。吾人許身革命，為共同實現主義而奮鬥，同志之間一以推誠相與為本」。¹⁴1939年二月中旬，蔣派谷正鼎赴越南河內遊說

13 「彭學沛電汪兆銘」(1939年1月3日)，〈各軍事首長與汪兆銘之函電(一)〉，《汪兆銘史料》，台北，國史館藏，典藏號：118-010100-0003-016。

14 「蔣中正電谷正綱、谷正鼎」(1938年12月29日)，〈汪兆銘叛國(一)〉，《國民政府》，台北，國史館藏，典藏號：001-103100-00001-008。1月6日兩人即回電表示「絕不因私情而附和」。「谷正鼎谷正綱龍雲電表心志不附和汪兆銘」，

汪，同時送去汪、陳、曾三人出國的護照和鉅額旅費，勸汪去法國等地療養。谷轉達蔣的意見稱：不要去上海、南京另搞組織，免得為敵人所利用，造成嚴重後果。汪表示不願意接受，請谷轉達了以下的話給蔣：

其一，我不離重慶，豔電不能發出；然當此危難之時，離重慶已經很痛心的了，何況離國！我所以願意離國，是表明只要主張得蒙採納，個人不成問題。其二，聞得國民政府正在努力促成國際調停，這是可以的；然而至少國際調停與直接交涉同時並行；如此，則我以在野之身，從旁協助，亦不為無補。其三，如果國民政府，始終不下決心，任這局面僵下去，我雖離國，也會回來。¹⁵

谷聽了以後知道勸說無望，無功而返。蔣方屢勸不成，三月才出現刺汪行動（1939年3月21日在河內高朗街住宅發生刺汪案，汪兆銘的秘書曾仲鳴被誤殺）。

在此同時，蔣也開始處理重慶汪派分子的問題。1月2日蔣召見國民黨中央黨部副秘書長甘乃光。¹⁶1月3日甘告訴陳克文昨日被蔣接見的經過，「昨午見蔣委員長的情形。蔣告訴他這次對汪先生的處置實迫於情勢，不得不然，平時和汪先生接近的應該安心工作，不要灰心，不要生疑」。¹⁷蔣透過甘乃光對汪派的人進行安撫、拉攏，希望平常與汪較

〈汪兆銘叛國（二）〉，《國民政府》，台北，國史館藏，典藏號：001-103100-00002-000。

15 汪兆銘，《汪先生最近重要論文：舉一個例》（上海：中華日報館，1939），頁14。

16 蔣中正日記僅簡單地寫「注意……對汪以後之處置……上午紀念周訓話，批閱記事與乃光談話」。《蔣中正日記》，1939年1月2日。

17 陳克文著、陳方正編輯校訂，《陳克文日記，1937-1952》，1939年1月3日，上冊，頁345。據陳克文表示甘乃光雖曾是汪派要角，然在武漢時代之後已經「和汪氏貌合神離」，後被歸入「政學系」，與汪的關係較為疏遠。這應該是蔣主動找甘談話的一個原因。陳克文，〈國民黨左派三傑：甘乃光與顧孟餘〉，收入陳克文著、陳方正編輯、校訂，《陳克文日記，1937-1952》，下冊，頁1330、1333。

接近的人能安心地留在重慶，此一舉動對汪系人馬應該產生了一定的影響。1月14日，重慶方面對新聞界通電，對於汪的處分在開除黨籍之後已告一段落。曾協助汪預定飛機出走的彭學沛，由中央常務會議決定保留現職。此外，與汪共同行動的幾位「中央汪派要人」，如陳公博、顧孟餘、陳璧君、褚民誼、周佛海等人，此時則不予追究。¹⁸

汪陣營對國民黨中央開除汪之黨籍一事立即表達抗議。1月3日，在香港的汪系報紙《南華日報》刊出〈我們的鄭重抗議〉一文，抗議中常會開除汪之黨籍，並重申「豔電」是根據去年國民黨全國臨時代表大會宣言之原則，追求「光明磊落的和」，同時也批評「黨國中樞為共黨所脅持，中國不亡於日本，即亡於第三國際指揮下的赤色傀儡」。¹⁹

在重慶的汪派分子對此事之態度則有所不同。汪兆銘的出走對留在重慶的汪派人士而言為一晴天霹靂。1938年12月21日擔任汪貼身幕僚的陳克文在日記中記載聽到汪出走的消息，「汪先生突然於星期日秘密離開重慶。消息到了昨日，才漸漸透露出來。今早去問乃光，彼尚茫然」。²⁰開始時他認為這是「無稽」之談，多方打聽之後才由汪彥慈（汪祀）告知「不止汪先生，曾仲鳴、汪夫人都已經走了，連一些辦事人員也都隨去。彥慈、允文明早也飛往昆明，除了一些衛士之外，便全家無人了」。汪彥慈與陳克文在汪公館之前黯然道別，並囑咐他不要洩漏消息。²¹12月24日，陳克文從報上得到消息：「汪先生遠行的消息今日報紙已正式發表，原因說是因為旅行昆明，觸發舊疾，已赴河內就醫，一時不能回渝。到香港的消息，似未證實」。²²

18 〈汪兆銘の和平通電に 重慶政府の態度微妙 汪派要人（重慶脱出）追究せず〉，《朝日新聞》（夕刊），1939年1月15日。

19 流沙，〈我們的鄭重抗議〉，《南華日報》，香港，1939年1月3日，第1版。

20 陳克文著、陳方正編輯校訂，《陳克文日記，1937–1952》，1938年12月21日，上冊，頁335–336。

21 陳克文著、陳方正編輯校訂，《陳克文日記，1937–1952》，1938年12月21日，上冊，頁336。

22 陳克文著、陳方正編輯校訂，《陳克文日記，1937–1952》，1938年12月24日，上冊，頁337。

汪的無預警出走使汪派成員頓失龍首。特別是對陳克文這樣的貼身幕僚，經常出入汪公館又曾是政界與汪聯絡的管道，對其出走一事未曾預聞，卻又不被身邊之人套問，可想其處境之尷尬。汪派其他成員甘乃光、彭學沛、羅君強等都猜測汪蔣之間因中共問題而產生矛盾。甘乃光也認為除了中共問題之外，還有其他的因素，如蔣汪之間的權力衝突：

汪先生此行恐不止共產黨問題意見不合。這一年來，他在政府固然沒有甚麼地位，即在黨裡，雖有副總裁之名，亦不過徒有其名，許多措施他從來不曾知道。這是大足以引起他的無名悲憤的。還有最近因參政員攻擊孔財政部長，蔣委員長在聯合紀念周上，罵攻擊的人是敲搾〔詐〕不遂，這也給汪先生以難堪的。據乃光的推測，汪先生遠行的原因很複雜，並且醞釀的時間也決不止一日兩日。這推測是很可信的。²³

甘的分析對陳有所影響。1939年1月1日他前往孔祥熙家賀年之時，孔還拉他到房間，私下問他對汪通電之看法，「孔院長把我拉到一個房間裡，問汪先生發通電的事。我有何話可說呢？只好說，汪先生這種意見，醞釀恐怕不止一日。我並且說拿近衛的演說做立論根據，實在很不好。孔連連點頭」。²⁴

汪兆銘也嘗試爭取他在重慶的原有勢力。1939年一月底，陳璧君曾發電報給彭學沛，「請設法取回汪先生衛士的槍械，並且要原來的一部分衛士到香港去」；「陳國琦三日前來信，並且說衛士的旅費已經寄來」。²⁵這有可能是汪打算從河內去香港，預先所做的安排。4月1日，汪又派一周姓人士來重慶送旅費給他舊日的下屬，請他們去香港，這些

23 陳克文著、陳方正編輯校訂，《陳克文日記，1937-1952》，1938年12月23日，上冊，頁337。

24 陳克文著、陳方正編輯校訂，《陳克文日記，1937-1952》，1939年1月1日，上冊，頁343。

25 陳克文著、陳方正編輯校訂，《陳克文日記，1937-1952》，1939年1月31日，上冊，頁363。

人包括陳皋、陳樹人、鄧飛黃、范予遂、陳克文等，²⁶然汪擬赴香港的計劃可能因港督不同意而作罷。²⁷

汪所邀約的舊屬中陳皋接受了他的邀請，其他人如陳樹人等則不肯收下旅費。陳克文記載：「中午參政會秘書處庶務科長陳皋來寓。他說已經辭職，這是因為汪先生的關係。他說汪先生有話傳來，說最好能夠離開重慶」、「晚飯後陳皋來寓。他說明天便乘飛機到昆明，轉往香港」。²⁸陳皋後出任「汪偽行政院庶務科科長，偽江西省稅局局長。1941年7月，兼任汪偽軍事委員會委員長衛士團團長。1944年2月，汪偽首都憲兵司令部改稱中央憲兵司令部，任司令。1945年6月，任汪偽中央憲兵司令部特別黨部特派員」。²⁹

重慶汪派人物之中最積極附汪的人是羅君強，他平素與汪主張接近，贊成和談，³⁰又與蔣、孔不合，故傾向與汪同進退。他於2月初離開重慶，先去昆明，輾轉投靠了汪，在上海出任「中央黨部的副秘書長」。³¹1939年夏天，汪透過羅君強請曾任職行政院的關德懋 (1903–1999) 傳話

26 陳克文著、陳方正編輯校訂，《陳克文日記，1937–1952》，1939年4月1日，上冊，頁392。

27 「吳鐵城致蔣中正電」(1939年4月20日)，〈汪兆銘叛國(三)〉，《國民政府》，台北，國史館藏，典藏號：001-103100-0003。吳表示他於4月20日訪問港督，「據云：精衛近擬來港居住，請求保護，港督意擬拒絕，並詢鈞座意見如何」。蔣的答覆是：「應設法促成其堅決拒絕為盼」。後來汪於4月24日離開河內，直接去了上海。

28 陳克文著、陳方正編輯、校訂，《陳克文日記，1937–1952》，1939年3月15日，上冊，頁385；1939年4月1日，上冊，頁392。

29 徐友春主編，《民國人物大辭典(修訂版)》，頁1366。

30 1939年初，羅君強與陳克文討論汪的問題時，羅即表示贊成和談，「中午君強來寓午飯，又談汪先生的提議。他甚表贊同，他說照現在的情形抗戰下去，愈戰中國愈弱，共產黨則愈形得勢，愈見發展。要防止共產黨的禍害，非早日和日本講和不可」。陳克文著、陳方正編輯、校訂，《陳克文日記，1937–1952》，1939年1月3日，上冊，頁345。「君強來寓午飯，與之邁共談時事竟日，大都為共產黨問題。君強主張聯日以反共反俄」，陳克文著、陳方正編輯校訂，《陳克文日記，1937–1952》，1939年1月8日，上冊，頁351。

31 陳克文著、陳方正編輯校訂，《陳克文日記，1937–1952》，1939年9月8日，上冊，頁478。

給陳克文，希望他去上海「共赴國難」。³² 陳克文不為所動，「我想我個人絕不應該說無條件的隨汪先生進退，今後更不應該以同進退或共患難的理由，而對於汪先生有任何的要求」。³³ 事實上，羅君強一直替汪在網羅舊部，如滕固也是他想爭取的對象。1939年10月滕固返回重慶探視妻子，也順道拜訪好友，他將羅君強想吸收他的事告訴陳克文。陳克文說「原來羅君強到昆明後，多方設法收買各方面的人投入和平運動，若渠〔滕固〕也是他們想收買的人，但沒有成功。若渠又說景薇³⁴告訴他，汪因我〔陳克文〕今年一月四日的信，對我很為抱怨。我想後來汪派人送旅費給這個給那個，他們到香港、上海去，始終不及我，便是因為那封信的原因。我實在幸而發了這信，省了許多麻煩」。³⁵

上述蔣的招安與汪的邀約使重慶汪派人士感到內心的掙扎與拉扯。陳克文曾與友人討論是否要與汪同進退，此一議題讓他感到私情與公誼之間的矛盾：「汪先生的事實在給人精神太痛苦了。順便探視朱綸的病。她又把這事提起，並問我，我們的進退如何，是否要一同引退？這話真不容易答覆。以私情說，當然可以引退，以公誼言，如果不贊成現在談和的提議，和汪先生這種做法的，當然不必和他一致的離開重慶，離開政府和黨」。³⁶ 他也向直屬長官蔣廷黻、魏道明等承認自己曾寫信給汪並託林柏生轉交。其中1939年1月6日的〈致汪先生函〉在日記中留有

32 關德懋忠實地將話帶給陳克文，不過其反應是「笑話，不去管他」。關德懋，〈憶羅君強〉，頁80-81；亦見沈雲龍校閱，沈雲龍、張朋園訪問，林能士紀錄，《關德懋先生訪問紀錄》（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7），頁43-44。

33 陳克文著、陳方正編輯校訂，《陳克文日記，1937-1952》，1939年4月1日，上冊，頁392。

34 徐象樞，字景薇，原是復旦大學法學教授，1936-1939年任行政院參事。陳克文著、陳方正編輯校訂，《陳克文日記，1937-1952》，1937年1月19日，註7，上冊，頁27。

35 陳克文著、陳方正編輯校訂，《陳克文日記，1937-1952》，1939年10月6日，上冊，頁490。

36 陳克文著、陳方正編輯校訂，《陳克文日記，1937-1952》，1939年1月2日，上冊，頁344。

手稿，信中針對汪之豔電主張提出七點疑問，也說明他這些日子的心情。他寫到「文追隨 先生十有餘年，突於報端看見中央決議與豔電主張，精神上所感痛苦實難以筆墨形容。廿四年冬得 先生被奸徒狙擊之訊，悲憤之深，尤不及此，曾與乃光先生論及此事，竟於不知不覺之間泫然落淚也。文深信 先生此次舉動純然為國家民族之前途打算，又深信將來必有事實可以證明 先生之用心」。³⁷我們不確定陳克文在日記中留下此信的底本是否亦出於「自保」之動機，然而他繼續留在重慶，而不像羅君強等人出走，可以推測陳克文因理念與汪不同，而拒絕了汪的邀約。

汪出走之後重慶的汪派分子行事十分低調。1939年1月21日至1月31日，國民黨在重慶召開五屆五中全會，會議的中心議題為抗戰與反共。受到汪出走的影響，汪派分子在各種會議中保持沉默：「汪系中委谷正綱、朱霽青、彭學沛等，在大會中態度力持沉默」。³⁸2月12日至21日又召開了國民參政會第一屆第三次會議，「汪系分子消極：范予遂認為，委座任議長，無人敢自由發表意見；其他馬秉鳳〔乘風〕、伍智梅等，亦僅連署提案而已」。³⁹

37 陳克文著、陳方正編輯校訂，《陳克文日記，1937–1952》，1939年1月6日，上冊，頁349。

38 參見張有高選編，〈軍統局渝特區1939年度工作總結報告〉，《檔案史料與研究》，1993年第1期（重慶，1993年3月），頁18。

39 張有高選編，〈軍統局渝特區1939年度工作總結報告（續）〉，《檔案史料與研究》，1993年第2期（重慶，1993年6月），頁14。馬乘風（1906–1992），河南省宜陽縣人，曾就讀黃埔軍校武漢分校，後進入馮玉祥的部隊，並於河南省國民黨部工作。1933年任職於鐵道部職工教育委員會。1938年起，馬乘風被遴選為國民參政會參政員，1946年任立法委員。1949年赴台後以「保匪諜趙守志入台，而知情不報」，入獄21年。伍智梅（1898–1956），廣東台山人，伍漢持之女。他與宋慶齡是好友，後擔任第一至第四屆國民參政會參政員，1948年當選廣州市立法委員，1949年後赴台。

蔣更進一步指示情治機關偵察在重慶的汪派分子。⁴⁰汪的貼身秘書陳克文即被懷疑其對蔣陣營的忠誠度，認為他可能是汪的內應，「替汪先生在這裡通消息」。⁴¹他還被人密告到他的上司蔣廷黻、孔祥熙處，⁴²甚至長期遭到跟監，防止他逃離重慶。1939年5月18日下午，陳克文與庶務科長乘車往成渝公路老鷹岩歌樂山，調查行政院鄉間辦公房的地點，車子卻在路上被擋住，不准前行，「受到莫名其妙的限制」。5月24日，陳克文與工程師到中樑山甘燕岩踏勘工地，又遭到衛戍司令部的人盤查。陳克文對此感到十分生氣，「回到重慶後曾經去找戴笠吵架」。⁴³

其他汪派分子也受到類似的待遇。根據陳克文記載，1939年4月11日汪的衛隊長周烈洪就在海棠溪車站被懷疑想去河內或香港，而遭便衣特務所扣留；⁴⁴隔日周烈洪的妻子「也被便衣偵探拘去了，仍舊不知下

40 有關重慶的特務機構，尤其是軍統所控制的「衛戍總司令部稽查處」的組織、職掌與活動，參見曾任該處督察長與副處長沈醉（1914–1996）的回憶。沈醉，《我知道的軍統內幕》（出版時地與出版者不詳），頁114–140。

41 陳克文著、陳方正編輯校訂，《陳克文日記，1937–1952》，1939年5月7日，上冊，頁417。

42 陳克文著、陳方正編輯校訂，《陳克文日記，1937–1952》，1939年4月20日，上冊，頁402–403。

43 「陳方正致黃克武電子郵件」，2016年8月8日。陳克文對於監視者很不滿意，曾以騙術報復，5月24日「上午八時再和齊次青，興業建築公司的工程師兩人，到中樑山甘燕岩踏勘建築地址，把各部分辦公房屋的地點都約略分配好了，十二時過後才回來。去時車子過小龍坎，衛戍司令部盤查車輛的人又是囉囉唆唆，並且硬要坐我們車子同去，說是保護我們。一直到了目的地還不肯走，不知是何用意，旁的車子並不如此。連起上一次山洞口的往事一想，也許他們是專為留難我個人的，這自然是因為汪先生的關係。他們做法實在太笨了，我如果要離開重慶，何必一定要坐汽車。他們對於公共汽車不查，行路的人不查，我要走也早走了，想起來真好笑又好氣。今天強坐我們的車子，形同監視我們〔中間〕的那一個人。我用了小小的騙術，便把他中途放下，讓他步行二三十公里。我想他知道上了當，也一定很氣的。」陳克文著、陳方正編輯校訂，《陳克文日記，1937–1952》，1939年5月18日、5月24日，上冊，頁421、424。

44 周在一月被繳械後即打算去投奔汪，「汪先生的衛士長周烈洪來院見我，把汪公館的衛士繳械經過相告。他說他本人打算到香港去，道路遠，去本不易，不去又恐汪先生見怪。他說汪先生對這些事很小氣的」。陳克文著、陳方正編輯

落」。⁴⁵根據〈軍統局渝特區1939年度工作總結報告〉，汪出走之後軍統局對重慶地區汪系人物偵察監視，調查這些人與汪「勾結」的狀況。其偵察之內容如下：

汪逆出走事件之偵察：汪逆於27年12月18離渝，至29日於河內發出荒謬豔電，媚敵求和。本區當時工作曾有如下之指示：(甲)分令各外勤注意汪系在川康人員之言論行動；(乙)注意中央與地方軍政人員有無與汪勾結情事；(丙)令各檢所切實檢查與汪有關之文電；(丁)密派人員駐守車站、碼頭、機場，經常施行檢查與汪案有關人員；(戊)汪系重要分子如彭學沛、陳樹人、陳克文等，均秘予監視，並翻印照片，分寄各站組，作為必要時之用；(己)注意中央各首要及川康軍政要員對汪電真實之態度及外僑對此之態度。⁴⁶

經過近一年的調查，軍統局對重要分子陳樹人、彭學沛、陳克文、楊全宇(1902–1940，曾任成都市長、大川銀行的總經理，因囤積麥子三百石而被處死)、武和軒(1901–1986)、冷融(1896–1943)等人提出詳細的報告。⁴⁷

其中名列榜首、最受懷疑的人是僑委會委員長陳樹人，被認為極可能是「汪逆在渝活動之負責人」，而僑委會的其他人也受到懷疑。這主要是因為行政院僑務委員會在汪當行政院長之後一直為汪派所掌控。僑務委員會的委員張永福(1872–1957)為新加坡僑領、橡膠商人，與汪氏夫婦關係素佳，對汪十分敬重，故積極附汪，被軍委會與監察院撤銷職

校訂，《陳克文日記，1937–1952》，1939年1月19日，上冊，頁357。

45 陳克文著、陳方正編輯校訂，《陳克文日記，1937–1952》，1939年4月11日，上冊，頁397；1939年4月12日，上冊，頁397–398。

46 此件藏於重慶市檔案館。參見張有高選編，〈軍統局渝特區1939年度工作總結報告〉，《檔案史料與研究》，1993年第1期(重慶，1993年3月)，頁16。

47 張有高選編，〈軍統局渝特區1939年度工作總結報告(續)〉，《檔案史料與研究》，1993年第2期(重慶，1993年6月)，頁12–30。唐潤明，〈汪精衛出逃後軍統對汪系人物的監視〉，《民國春秋》，1997年第2期(南京，1997年4月)，頁11。

務，並付懲戒；⁴⁸後他出任汪政府僑務委員會委員與駐越南特使。陳克文的好友李樸生亦任職僑委會，在越南辦僑務之時即因「汪公南行，謠言極盛」，被人攻擊為「主和派走狗李樸生」。他並寫信給陳樹人，希望僑委會能在重慶發一消息，表明對汪離渝後的態度，「俾便海外同志及僑胞不致為謠言所動，而影響捐輸」。⁴⁹

在香港的李樸生寫信告訴陳克文「昨日港電傳，樹公亦離渝，不知確否」。⁵⁰軍統局的情報也說陳樹人「二月中旬，曾囑僑委會事務科購買飛機票，準備赴港，並已付出400元票價」；又說陳樹人「曾將參政會之決議案及中央之密件，令其汽車夫黃來乘飛機送赴河內」。⁵¹不過陳樹人可能沒有採取具體行動，又協助提供汪在海外之消息，⁵²因而得到蔣的信任，繼續擔任僑委會委員長（至1947年）與國民黨中央海外部部長。即使如此軍統局對陳樹人的監控並未間斷。

名列第二的汪派大將是上述為蔣發電給汪的交通部次長彭學沛。據軍統局的報告，「交通部次長彭學沛，與汪關係最深。汪出走後，對該系分子之轉達意旨及其衛隊旅行與保釋陳昌祖事，多函彭辦理」。⁵³彭

48 張有高選編，〈軍統局渝特區1939年度工作總結報告（續）〉，頁15。汪兆銘與張永福為好友，1924年汪曾寫信給吳稚暉，「銘此函亦不述他事，惟星加坡張永福先生有一女名舜琴於八月十日赴英留學，欲銘介紹一二同學，銘以永福先生為老同志難卻其請，曾作一介紹書與女公子，敬乞先生家書之便為言及之」，〈汪兆銘陳璧君致吳稚暉函〉（1924年1月5日），《吳稚暉檔案》，台北，中國國民黨黨史館藏，檔號：稚07552。

49 李樸生，〈李樸生致陳克文函〉（1939年1月2日），收入蘇熊瑞、李樸生、龍大均等，〈抗戰時期的社友書札〉，香港知用學社編，《知用學社五十周年紀念集》，頁19。

50 李樸生，〈李樸生致陳克文函〉（1939年1月2日），收入蘇熊瑞、李樸生、龍大均等，〈抗戰時期的社友書札〉，香港知用學社編，《知用學社五十周年紀念集》，頁19。

51 張有高選編，〈軍統局渝特區1939年度工作總結報告（續）〉，《檔案史料與研究》，1993年第2期（重慶，1993年6月），頁15。

52 「陳樹人致蔣中正函」（1939年2月3日），〈汪兆銘叛國（三）〉，《國民政府》，台北，國史館藏，典藏號：001-103100-0003。

53 張有高選編，〈軍統局渝特區1939年度工作總結報告（續）〉，頁15。陳昌祖（1904-1994）為陳璧君的同父異母弟，後赴南京投汪，1945年以漢奸罪被補入

學沛也深知自己必定受到懷疑，他對此處理的方式則是親自寫信向蔣翰誠，並在報紙上刊登支持抗戰的文章。1939年6月8日，彭寫了一封信給蔣（圖5.3）：

近來敵方百般造謠，希圖淆亂視聽，影響所及，足使社會不察者以為沛等果有不滿於中央之政策，甚至騎牆觀望，伺機脫離。此種敵謠如有絲毫真實性，則沛一面備員政府，一面意存觀望，豈非人格破產，尚何面目以立足於社會。固知鈞座明察秋毫，無贅陳之必要，唯在此國家危急存亡之秋不容省些須之含糊，重煩塵慮，故敢不憚詞費，以人格擔保鄭重陳明個人之信念……國人必須一心一德，堅決抗戰，方有出路……。⁵⁴

為進一步表明心跡，彭學沛附呈了一篇文章談中國的前途，希望能「發交重慶各報聯合版登載」，以「稍祛社會無謂之謠詠」。⁵⁵陳布雷在將彭的信轉交蔣之時，建議「擬酌覆慰勉。所附之文，亦尚平正，擬准交發表」。蔣同意了擬辦方式。⁵⁶彭以此種方式表白而通過了忠誠檢驗，後來他頗受蔣之重用，1946年出任國民黨中央宣傳部部長。⁵⁷

另外一位向蔣翰誠的汪派人士是行政院政務處簡任參事滕固。滕固從改組派時期即支持汪，在汪任行政院長時則為汪的貼身秘書。1938年6月中，滕固因有德國美術史博士學位，被調為國立藝術專科學校校

獄。陳克文，〈憶陳璧君與陳春圃〉，收入陳克文著、陳方正編輯校訂，《陳克文日記，1937–1952》，下冊，頁143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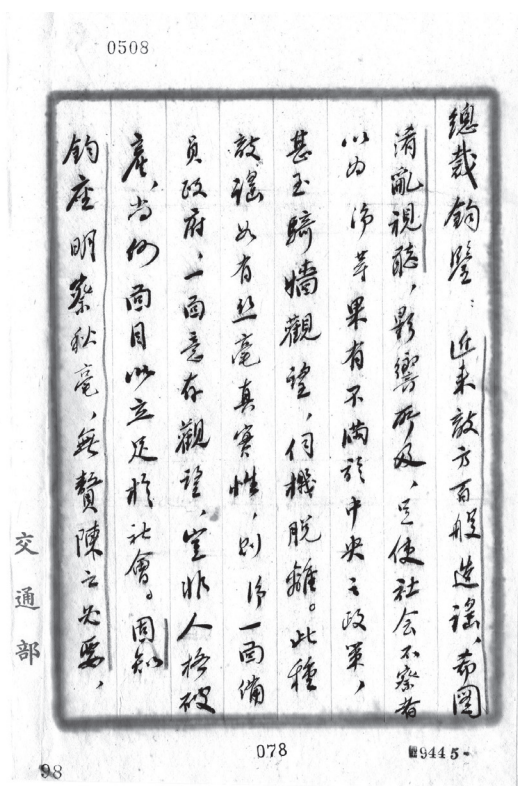
54 「交通部政務次長彭學沛函軍事委員會委員長蔣中正函」，〈汪兆銘叛國（四）〉，《國民政府》，台北，國史館藏，典藏號：001-103100-00004-016。

55 當時的謠傳是「汪的能夠從容出走，都是彭學沛預先布置的，而且飛機也是彭所供給的」。見王鼎，〈彭學沛與顧孟餘〉，《時代風》，創刊號（上海，1946年4月6日），頁5。

56 「彭學沛致蔣中正函」（1939年6月8日），〈汪兆銘叛國（四）〉，《國民政府》，台北，國史館藏，典藏號：001-103100-00004-016。

57 〈中樞人事局局部更動：俞大維長交通王雲五長經濟，中央宣傳部長以彭學沛繼任〉，《報報》，第2卷第7期（重慶，1946），頁20。

圖 5.3：彭學沛致蔣中正函（部分）



長。如上所述，汪出走之後曾透過羅君強吸收滕固，希望滕固能支持和平運動為其效命，而滕固不為所動。⁵⁸1939年9月，他曾以國立藝術專科學校校長的身份通電蔣委員長，「汪逆精衛叛國通敵，國人共棄，近復企圖組偽組織，倒行逆施，千人所指。固忝領導藝校，受命國家，惟知擁護國策，服從領袖，誓反對一切漢奸叛逆行為。謹此電陳」（圖 5.4）。⁵⁹

58 陳克文著、陳方正編輯校訂，《陳克文日記，1937-1952》，1939年10月6日，上冊，頁490。

59 「滕固電蔣中正」（1939年9月4日），〈汪偽組織（一）〉，《蔣中正總統文物》，台北，國史館藏，典藏號：002-090200-00022-123。

圖 5.4 滕固通電效忠

2242 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辦公廳機要室

28年9月4日 來電紙 發次 3330A

渝要員長	蔣介石	汪精衛	叛國通敵	國人	17
共黨近	援企圖	顛倒行	逆施千人	所	34
指國谷	領獎校	受命國家	惟知擁護	國策服	51
從領袖	贊反對	一切漢奸	叛逆行為	此電	68
陳國史	贊術東	科學校長	滕固叩	支印	85

116 28012138

評電員 28年9月5日

由以上的描述可見，豔電後汪派人士對於汪的出走有不同反應，有人支持、有人反對。顧孟餘在此一階段沒有留下史料，因此我們無從瞭解他內心的狀況與變化，然而他的心境與留在重慶的汪派分子，如陳克文等人，應該是比較類似的，他們一方面不贊成汪議和之舉，另一方面基於舊日之情誼，心中多充滿了公誼與私情的衝突。只是因為顧孟餘人不在重慶，而未受到情治單位的監控，也不必像彭學沛、滕固那樣寫親筆函向蔣說明自己的忠誠。那麼顧如何來面對汪出走之後的情境、顧蔣關係又有何變化呢？

第二節 蔣對顧的籠絡

顧在反對汪兆銘的「豔電」以及汪與中央決裂之時，一直蟄居香港（1937年底至1940年8月），密切觀察時局演變。1月3日中共方面由周恩來發表談話，評論汪的出走。首先他對汪的反叛並不驚訝，並說此舉對時局並無影響。接著又表示，陳公博與顧孟餘是否會參加汪的行動「刻尚未定」。⁶⁰此時顧孟餘、陳公博與梅思平（1896–1946，北大政治系畢業，曾參加五四運動）等人在香港仍有聚會，商討因應之方。⁶¹1939年2月11日，顧孟餘自香港致書王世杰。王向蔣報告，說顧「寄來《南華日報》社論一紙，據云此論係汪先生主張。並云汪先生似不致有意外行動」，又將剪報轉呈蔣。顧的目的似乎為汪做一解釋，表示和議的主體是國民政府、和議的前提是「日本有放棄侵略主義的誠意」，他顯然希望藉此能調和蔣汪之矛盾（圖5.5）。⁶²

在1939年的上半年，顧孟餘仍為汪兆銘陣營視為是自己人。1939年6月28日，汪派在上海籌組各委員會之工作時仍表示「軍事由葉蓬主持，政治由周佛海主持，文化由林柏生主持（林未到滬前，由殷汝為暫代），經濟內定由顧孟餘負責。另組國民黨代表大會籌備處及特務部由褚民誼主持」，⁶³可見此時顧仍被視為汪派的核心成員。

60 〈周恩來談話：對汪反叛並不驚異 謂與時局毫無影響〉，《申報》，上海，1939年1月3日，第8版。

61 〈汪精衛任意造謠 陳公博顧孟餘等在港有集議〉，《申報》，上海，1939年1月10日，第3版。

62 「王世杰呈蔣中正」（1939年2月11日），《蔣中正總統文物》，台北，國史館藏，典藏號：002-080103-00009-012。顧孟餘所寄來的簡報是：佩弦，〈「答問」的幾點解釋〉，《南華日報》，香港，1939年2月7日，第1版。

63 「汪系最近在滬活動情形」（1940年6月28日），〈汪兆銘叛國（一）〉，《國民政府》，台北，國史館藏，典藏號：001-016052-0008。葉蓬（1901–1947），湖北黃陂人，曾任陸軍師長，汪政權的武漢綏靖公署主任、湖北省長，參謀總長、陸軍部長。1947年以漢奸罪被槍決。

在此同時蔣則透過戴笠等情治機構密切監視汪派之舉動，事實上，汪出走之後的行蹤，包括住處與行動經過等皆為蔣方的情治單位所完全掌控（圖5.6）。⁶⁴

1939年3月11–22日戴笠自香港發來多封電報，向蔣報告汪與汪派分子的動向。他除了詳細報告曾仲鳴被刺案，以及汪與各界的聯繫之外，也提及汪系的狀況，「汪系活動，除重要事赴河內接洽外，其活動主力則仍在香港。高宗武對外負責，陳公博對內負責，曾仲鳴妻亦負要職，陳璧君則負越港聯絡之責。西貢由總領事方賢俶負責，極活動」。⁶⁵在港之顧孟餘近意志動搖，曾仲鳴囑林（知淵）勿與接洽」。⁶⁶1939年5月19日，吳鐵城從香港發給蔣的電報則轉述「香港方面留心政治人士」針對處置汪問題提出的三項辦法，除了將汪定位為「漢奸」，「宣佈叛黨禍國罪狀，加以通緝」之外，對於「平日與汪接近諸人，義不附逆者，當待以寬大」，而附逆之人則應「嚴厲制裁」。⁶⁷六月上旬，蔣方曾派中英庚款董事會總幹事杭立武（1903–1991）赴港，他從蔡元培處得知顧孟餘的地址，去見了顧。顧開門見山向他表示「不會助紂為虐」。⁶⁸6月17日蔡元培從友人得到的訊息則說「仲瑜來，言立武曾訪孟餘，無辦法」。顧可能沒有向杭立武明白表示他有投靠蔣的意願。⁶⁹

64 「汪兆銘叛國行動經過」，〈汪兆銘叛國（二）〉，《國民政府》，台北，國史館藏，典藏號：001-016052-00009-007。

65 「戴笠電蔣中正」（1939年3月11–22日），〈敵偽組織（一）〉，《蔣中正總統文物》，台北，國史館藏，典藏號：002-080103-00009-019，頁6–7。方賢俶（1900–？）是曾仲鳴的姐姐曾醒的兒子。

66 「戴笠電蔣中正」（1939年3月11–22日），〈敵偽組織（一）〉，《蔣中正總統文物》，台北，國史館藏，典藏號：002-080103-00009-019。林知淵（1890–1969）是戴笠派往河內，透過曾仲鳴與汪接觸的一位密探。參見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福建省委員會文史資料委員會編，《政壇浮生錄——林知淵自述》（福州：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福建省委會文史資料委員會，1989），頁102–106。

67 「轉報處置汪精衛辦法三項」（1939年5月19日），〈汪兆銘叛國（四）〉，《國民政府》，台北，國史館藏，典藏號：001-103100-0004。

68 王萍訪問、官曼莉紀錄，《杭立武先生訪問紀錄》（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0），頁90–91。蔡元培著、王世儒編，《蔡元培日記》，頁620–621。

69 蔡元培著、王世儒編，《蔡元培日記》，頁621。仲瑜為陳政，字仲瑜，浙江紹興人，曾就讀北大德文系，後在中央大學時擔任顧孟餘秘書，與梁漱溟關係密切。

至1939年中期，蔣或許自戴笠處得知顧「意志動搖」，又自杭立武處得知他不會「助紂為虐」，屬於吳鐵城電報中所謂「與汪接近諸人」中「義不附逆」者，故決定進一步爭取顧的支持。1939年7月1日，在蔣的授意下王世杰飛抵香港。3日，王世杰記載：「昨晚晤顧孟餘，據云汪先生此次行動，陳璧君負大部分責任」。⁷⁰ 8日王世杰返回重慶後，向蔣報告了他在香港的工作狀況。王世杰離港之後，顧孟餘曾去蔡元培處，可能是為了討論去重慶的事，不過蔡沒有留下兩人的談話記錄。⁷¹ 10月23日，蔣曾去電，請顧孟餘到重慶參加五屆六中全會（1939年11月12日至20日），「中央六中全會開會在即，甚望吾兄駕渝參加」。⁷² 11月18日蔣的本星期預定工作有「電孟餘速來」。⁷³ 不過顧孟餘並未參加六中全會。會後，蔣又親自寫了一封信給顧，王世杰記載「今日午後蔣先生作一函致顧孟餘，促其來渝，似欲孟餘加入行政院」（11月22日）。顧對此有所動心，11月27日去電王世杰，表示願意前往重慶。顧孟餘大約在12月初飛抵重慶，12月6日，蔣曾命陳布雷陪顧吃晚餐，陳因病未往，可見此日顧應已抵渝。⁷⁴ 12月8日，王世杰日記中記載：「顧孟餘自港來渝。蔣先生告我欲其留渝，藉以影響外間對汪之觀感。據孟餘言，陳璧君對偽組織事已趨消極」。⁷⁵ 1939年12月10日，蔣的日記記載：「下午與孟

70 王世杰著、林美莉編輯校訂，《王世杰日記》，上冊，1939年7月3日，頁208。

71 蔡元培著、王世儒編，《蔡元培日記》，1939年7月22日，頁626。

72 「蔣中正電顧孟餘」（1939年10月23日），〈籌筆——抗戰時期（二十八）〉，《蔣中正總統文物》，台北，國史館藏，典藏號：002-010300-00028-067。

73 《蔣中正日記》，1939年11月18日。

74 陳布雷，《陳布雷先生從政日記》（樣稿；台北：東南印務出版社，時間不詳），1939年12月6日。「九時起。傷風未癒，體寒如粟，甚感不舒……歸寓午餐畢……委員長命往陪顧孟餘晚餐，遂以病假請焉」，頁384。

75 王世杰著、林美莉編輯校訂，《王世杰日記》，上冊，1939年7–12月，頁208–209、237、238、240。

餘談話約二小時」。⁷⁶ 蔣對顧孟餘來渝一事感到十分高興，「顧孟餘來渝，有朋自遠方來，可知國勢漸佳，足慰寸衷」。⁷⁷

顧到重慶之後十分低調，然而不久此一消息即為國內外的新聞界所得知。最早是由美國媒體美聯社發出報導。12月16日陳璧君在香港的報紙看到顧去重慶的消息，她立刻拍了電報給汪兆銘。⁷⁸ 電文中表示幾天前她曾派人往訪顧孟餘，顧之家人告知他去了上海，不知是否屬實，陳不相信顧會如此，她要汪立刻派人去上海找顧：

密前三日烈往訪顧孟餘，其家人云顧已赴滬，今日各報載美聯社〔消〕息顧已抵重慶。此事我不問其是非如何，但我不相信。其原因兄亦可想而知。……始有顧上海住址，始到後請囑其按址往訪，如確可見顧，則彼餘情尚在，請出力勸回，如不見顧，則恐真赴重慶矣。⁷⁹

汪在回信中表示「妹欲赴渝勸蔣真乃與虎謀皮，萬不可行」，又說曾仲鳴死後顧全無表示，已對顧感到十分失望：「已遣始探顧，如何再覆。顧於仲鳴死無一言、不弔唁，其心已死，不必再注意其人矣」。⁸⁰

顧孟餘赴重慶一事逐漸被媒體所被證實。1939年12月17日《紐約時報》刊出顧抵達重慶的消息，標題為“MAY JOIN CHIANG REGIME:

76 《蔣中正日記》，1939年12月10日。

77 《蔣中正日記》，1939年12月16日，「上星期反省錄」。

78 當時香港多份報紙均報導了此一消息。「〔重慶十五日美聯社電〕中委顧孟餘頃已抵達重慶」，〈顧孟餘抵渝〉，《大公報》，香港，1939年12月16日，第3版。〈傳顧孟餘已抵重慶 表示反汪態度〉，《香港華字日報》，1939年12月16日，第1張第2頁。

79 「陳璧君電汪兆銘」（1939年12月16日），〈汪兆銘組偽政府時各方函電〉，《汪兆銘史料》，台北，國史館藏，典藏號：118-010100-0052-089。

80 「汪兆銘電陳璧君」（1939年12月21日），〈汪兆銘與各方往返函電（三）〉，《汪兆銘史料》，台北，國史館藏，典藏號：118-010100-0009-009。這可能是汪最後一次對顧表達的意見，此後《汪兆銘史料》中不再出現顧孟餘的名字。

Ex-Wang Aide, Now in Chungking, Slated for New Ministry” (可能加入蔣陣營：前汪派人物，現居重慶，可能為新的部會首長)。⁸¹至1940年1月，中外文報紙也刊出了顧孟餘赴渝的消息。1月12日《申報》報導，「顧氏係於上月由港飛抵重慶，聞曾切實聲明反對和平運動。顧氏與政府各領袖，晤談後甚洽，旋於12月14日飛返香港」。⁸²消息刊出之後，汪派立即「否認顧孟餘曾至重慶」，不過重慶方面則立刻予以反駁。⁸³1940年1月17日《北華捷報》也確認顧抵達重慶。⁸⁴此後幾個月，顧似乎往返於香港、重慶之間。⁸⁵根據《事略稿本》與蔣檔，蔣於1月14日電香港顧孟餘，「有要事面商，請駕渝面敘」；5月12日又請在香港的宋子文轉告「顧孟餘兄，務望早日飛渝相助為荷，盼復」。在蔣盛情邀約之下，1940年8月4日下午顧孟餘夫婦由香港飛至重慶。⁸⁶8月7日「上午批閱文件，正午宴顧孟餘夫婦」。⁸⁷當時蔣頗望借重顧在經濟上的規劃能力，

81 “May Join Chiang Regime: Ex-Wang aide, Now in Chungking, Slated for New Minister,” *New York Times*, New York, December 17, 1939.

82 〈外交部發言人鄭重闢謠〉，《申報》，上海，1940年1月12日，第3版。

83 〈顧孟餘留渝時訪各要人〉，《申報》，上海，1940年1月14日，第3版。

84 “Dr. Ku Meng-yu Did Visit Chungking,” *North China Herald*, Shanghai, January 14, 1940.

85 1940年5月21日，王世杰在給胡適的電報之中曾表示「孟餘（顧孟餘）日內將來渝，或可長住」。王世杰，〈王世杰致胡適（代電）〉，《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中華民國史組編，《中華民國史料叢稿專題資料選輯第三輯：胡適駐美大使期間往來電稿》（北京：中華書局，1978），頁40。

86 〈顧孟余、重慶へ和戰問題協議か/日中戦争〉，《讀賣新聞》（朝刊），1940年8月7日，頁1。

87 「蔣中正電宋子文轉顧孟餘赴渝面商要事」（1940年1月14日），〈籌筆——抗戰時期（三十一）〉，《蔣中正總統文物》，台北，國史館藏，典藏號：002-010300-00031-017。「蔣中正電宋子文轉顧孟餘盼早日飛渝襄助」（1940年5月12日），〈籌筆——抗戰時期（三十四）〉，《蔣中正總統文物》，台北，國史館藏，典藏號：002-010300-00034-027。蕭李居編註，《蔣中正總統檔案：事略稿本》（台北：國史館，2010），第43冊，頁44、499；薛月順編註，《蔣中正總統檔案：事略稿本》（台北：國史館，2010），第44冊，頁146。

「主持實業計劃之起草」。⁸⁸8月9日，他即指示張群、陳布雷擬定「戰後建設計劃與新實業計劃」，並說「最好孟餘兄能專心主持其事」。⁸⁹不過後來蔣指派顧負責其他的幾個任務，此一計劃因而未能推展。

第三節 從中研院院長風波到出任中央大學校長

1940年3月5日，中央研究院院長蔡元培病逝香港，顧孟餘深感哀痛，他參加了3月7日在香港摩理臣山道「福祿壽殯儀館」的葬禮，⁹⁰又在《東方雜誌》上寫了〈憶蔡子民先生〉一文。他認為蔡元培開啟了近代追求思想自由、研究自由之風，並開闢以科學方法整理國學之途徑。蔡元培後葬於香港仔的「華人永遠墳場」（圖5.7）。⁹¹

隨著蔡元培的過世，出現了中研院院長繼任人選的問題。⁹²王世杰認為最適合者為顧孟餘，3月7日他說「關於中央研究院院長之繼任人選，余與段書詒〔段錫朋〕及張岳軍〔張群〕言，認顧孟餘為適當，並擬向各方推薦」。又在3月14日展開推薦活動，「今晨傅孟真、汪敬齋〔緝齋〕來談，謂翁詠霓極思繼任中央研究院院長職。余告以余不欲當選為候補人，並謂院長席以專任為宜，顧孟餘可供考慮」。⁹³蔣接受了王世杰提名顧孟餘為中研院院長的建議，並請陳布雷向翁文灝接洽，希望評議

88 《蔣中正日記》，1940年8月7日。

89 「蔣中正電示張羣陳布雷指定人員從速擬訂戰後建設計劃與新實業計劃」（1940年8月9日），〈籌筆——抗戰時期（三十七）〉，《蔣中正總統文物》，台北，國史館藏，典藏號：002-010300-00037-01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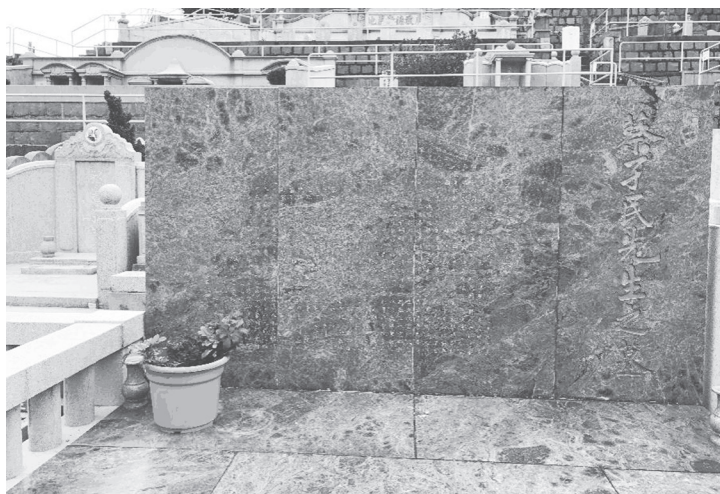
90 運公，〈舉國悼念蔡元培〉，《東方雜誌》，第37卷第8號（香港，1940年4月），頁55。蔡元培後葬於香港仔「華人永遠墳場」。

91 顧孟餘，〈追悼蔡子民先生特輯——憶蔡子民先生〉，《東方雜誌》，第37卷第8號（香港，1940年4月），頁63。

92 有關此次選舉與任命，參見張劍，〈學術獨立及其限度——1940年中央研究院院長選舉與任命再探〉，《華東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6年第6期（上海，2016），頁43-51。

93 王世杰著、林美莉編輯校訂，《王世杰日記》，上冊，1940年3月14日，頁257。

圖 5.7 香港「華人永遠墳場」蔡元培墓



會能選出顧孟餘。⁹⁴翁文灝的日記記載，3月16日接到「陳布雷函，蔣盼以顧孟餘為中研院院長」。次日，翁即往訪陳布雷，表示對於顧孟餘出任院長事「盼能依法辦理」。他並將此一消息散佈出去，沒想到傅斯年聽到之後，勃然大怒，認為這是蔣「下條子」，又怪罪王世杰「建議此意」。⁹⁵3月21日陳布雷也聯繫了浙江大學校長竺可楨 (1890–1974)，傳達蔣的意旨，竺認為「恐評議會中通不過」。⁹⁶其他的評議員對此案均有所保留，如汪敬熙 (1893–1968) 認為顧「只是個 politician [政客]」；陳寅恪 (1890–1969) 強調學術自由，又說院長必須在國外學術界有聲望，「我們不能單

94 王世杰著、林美莉編輯校訂，《王世杰日記》，上冊，1940年3月20日，頁258。

95 李學通等整理，《翁文灝日記》（北京：中華書局，2014〔2010〕），頁455–456。
傅斯年，〈傅斯年致胡適〉，收入王汎森、潘光哲、吳政上主編，《傅斯年遺札》（台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2011），第2卷，頁1098。

96 竺可楨，《竺可楨全集》（上海：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11），第7卷，1940年3月21日，頁321。

舉幾個蔣先生的秘書」。⁹⁷ 3月23日評議會選舉，王世杰為主席，投票結果翁文灝24票、朱家驊24票、胡適20票、李四光6票、任鴻雋4票、竺可楨2票，而顧孟餘只得到1票。⁹⁸ 蔣所屬意的顧孟餘沒有當選，顧本身似淡然處之，不以為然。⁹⁹ 蔣表面上不露聲色，「笑了一下」，內心可能對翁與朱的「忤旨」有所不滿。¹⁰⁰ 當時最高票的翁、朱均負擔重要職務（翁為經濟部長、經濟部資源委員會主任委員與中研院評議會秘書；朱為中央黨部組織部長），蔣擬調胡適返國出任中央研究院院長。4月30日，「電王寵惠請與孔祥熙切商駐美大使胡適之繼任人選」。¹⁰¹ 不久胡適來信表示「不就中央研究院院長職」。¹⁰² 中研院院長一職至9月18日蔣指定朱家驊為「代理院長」，至1957年10月朱辭職，由胡適接替，總計代理了18年。

中研院院長一事不成之後，蔣又想請顧出任國防最高委員會秘書長，1940年11月6日曾親自召見，「正午，約顧孟餘來談，勸其任國防

97 傅斯年，〈傅斯年致胡適〉，頁1098。

98 樊洪業，〈中央研究院院長的任命與選舉〉，《中國科技史料》，第11卷第4期（1990年8月），頁52，根據《竺可楨全集》，第7卷，1940年3月23日所記之票數，頁322。

99 陶英惠，《典型在夙昔：追懷中央研究院六位已故院長（上）》（台北：秀威資訊，2007），頁211。

100 傅斯年，〈傅斯年致胡適〉，頁1100。

101 呂芳上主編，《蔣中正先生年譜長編》，第6冊，頁299。此一決定可能受孔祥熙的影響，1940年4月7日；《王世杰日記》記載「杭立武為余言，孔庸之欲調胡適之返國任中央研究院院長，並擬以宋子文使美，宋表示不願往」。見王世杰著、林美莉編輯校訂，《王世杰日記》，上冊，1940年4月7日，頁262。

102 王世杰著、林美莉編輯校訂，《王世杰日記》，上冊，1940年8月5日，頁287。胡適在1940年7月22日的日記中說明不就任的原因，「今天發憤寫航空信給王雪艇，說我若不做大使，決不就中央研究院院長。因（1）我捨不得北大，要回去教書。（2）詠霓或朱驥先都比我更適宜。（3）我要保存（或恢復）我自由獨立說話之權，故不願做大官。（4）大使是『戰時徵調』，我不敢辭避。」中研院長一類的官不是『戰時徵調』可比。胡適著、曹伯言整理，《胡適日記全集》，第8冊，1940年7月22日，頁58。

最高委員會秘書長」。¹⁰³ 1940年11月8日王世杰記載，「今午晤顧孟餘。蔣先生欲其任國防最高委員會秘書長（張岳軍現任此職，但蔣先生以擬令其赴成都主持行轅或省政）。彼不願就。據彼語予，彼之來渝，係對汪表示反對，但其精力實不能任繁劇」。在顧懇辭之下，1941年4月2日蔣任命王寵惠為國防最高委員會秘書長。¹⁰⁴

在顧婉拒國防最高委員會秘書長之後，蔣又就如何安排顧的職務徵詢宋子文的意見。11月12日宋子文電錢昌照「提出請孟餘兄主持軍事經濟交通遠東合作機關」，14日錢回答「孟餘先生對軍事有興趣，對經濟有研究，對交通有經驗」，是一個十分恰當的人選，25日錢表示此事已得到顧孟餘首肯。12月15日，蔣約見顧孟餘「囑弟負責與英美代表商洽合作事，其範圍為幣制，物質、物價、交通等項」。¹⁰⁵

1941年1月21日，蔣曾約顧孟餘、沈怡兩人一同午餐。¹⁰⁶ 1月底時宋子文邀約英美經濟專家組團來中國考察經濟，並提供幣制改革與平抑物價之建議。29日宋又向蔣表示英美兩國擬商討經濟同盟計劃，用以對付德義日三國，且羅斯福將派居里（Lauchlin Currie, 1902–1993，後被懷疑是蘇聯間諜）訪華。¹⁰⁷ 由於國際經濟合作是顧孟餘的專長，蔣即指示其協助處理相關事務。1941年1月30日在顧孟餘與孔祥熙的陪同下，蔣接見英國駐華大使卡爾（Archibald Clark Kerr, 1882–1951、1938–1942年任駐華大使），就英美合派經濟使節來華草案交換意見。決議將該項計劃的草案「由行政院副院長孔祥熙將該項計劃與交通部長張嘉璈、經濟部長翁文灝會商後，再會同顧孟餘先生做最後之修正定稿，即交英使轉達倫敦」。¹⁰⁸

103 薛月順編註，《蔣中正總統檔案：事略稿本》，第44冊，頁583。

104 郭廷以編著，《中華民國史事日誌》，第4冊，頁163。

105 美國史丹佛大學胡佛研究所藏《宋子文檔案》（吳景平教授提供）。

106 《蔣中正日記》，1941年1月21日。沈怡（1901–1980）為黃郭夫人沈亦雲的弟弟，原名沈景清，字君怡，浙江嘉興人，為留學德國的水利學家專家。1941年出任甘肅省建設廳廳長、甘肅省水利林牧公司總經理，後又任全國水利委員會委員。

107 呂芳上主編，《蔣中正先生年譜長編》，第6冊，頁489。

108 呂芳上主編，《蔣中正先生年譜長編》，第6冊，頁489。

1941年2月美國總統羅斯福的代表、白宮經濟顧問居里來訪，處理援華的「租借法案」與國共問題，此行他同時見了蔣中正與周恩來。蔣也請顧孟餘協助處理此事，並擬定對策。2月8日，蔣首度接見居里。2月9日顧有一封給蔣的親筆函（圖5.8），建議蔣交給居里的一切材料與建議方案，在提出之前應「由鈞座約同孔副院長及孟餘詳商後正式提出」，以示慎重。¹⁰⁹2月10日一早，居里在與蔣見面之前，即與顧孟餘與財政部次長徐堪見面，由兩人提供相關資料，協助居里瞭解中國經濟之現況。11點蔣再次接見居里，討論中國當前五大問題（抗日問題、消滅汪兆銘等漢奸問題、共黨問題、樹立民主政治所需的國民基本訓練與教育問題、經濟問題），以及戰後中美互助建設問題。¹¹⁰這些議題應該都是蔣、孔、顧三人商量之後所擬定的。

除了上述臨時交辦的國際經濟合作任務之外，蔣為顧找到的第三個職位是中央大學校長。1941年5月羅家倫（1897–1969）因學校經費支絀、人事紛爭、師生綱紀紊亂，辭去中央大學校長一職。¹¹¹蔣希望由顧孟餘來接任。事先教育部長陳立夫曾代表蔣與顧相商，顧「謙遜不就」。¹¹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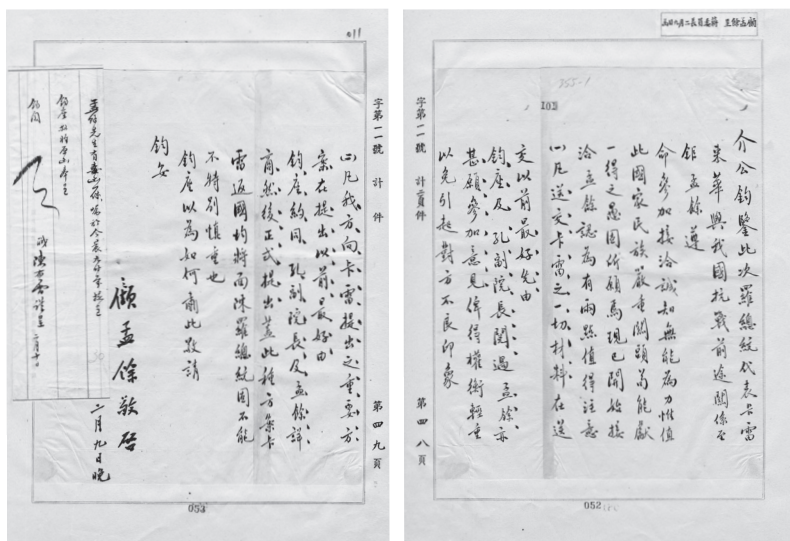
109 「顧孟餘函蔣中正提交居里參考資料及重要方案均應經由鈞座孔祥熙閱過」（1941年2月9日），〈革命文獻——對美外交：居里兩度來華（一）〉，《蔣中正總統文物》，台北，國史館藏，典藏號：002-020300-00033-011。

110 「蔣中正與居里談話紀錄中國當前五大問題」（1941年2月10日），〈革命文獻——對美外交：居里兩度來華（一）〉，《蔣中正總統文物》，台北，國史館藏，典藏號：002-020300-00033-014。

111 〈顧孟餘將有新任命，羅家倫辭中大校長〉，《大公報》，香港，1941年5月4日，第3版。許小青，《誠樸雄偉——中央大學校長羅家倫》（濟南：山東教育出版社，2012），頁271–288。

112 蔣寶麟，〈抗戰時期的國家與大學政治文化：中央大學「易長」研究〉，《史林》（2009年6月），2009年第3期，頁89–100。有關顧孟餘接掌中央大學有一個傳聞，據說中大校長懸虛之際，陳立夫曾同蔣商量人選。陳說：「顧先生出任最佳」。陳所說的顧先生是指CC派的顧毓琇（1902–2002，字一樵）。蔣觀念中的「顧先生」卻是顧孟餘。他聽到之後頻頻點頭說「那好極了！顧先生德高望重」。馬上發佈顧孟餘為中大校長，弄得陳立夫啼笑皆非。陳拾遺，〈顧孟餘：第三勢力暗流人物〉，原刊1950年5、6月間香港出版的《星島晚報》，收入「軍事委員會委員長侍從室人事調查表」，〈顧孟餘〉，《軍事委員會委員長侍從室》，台

圖 5.8 顧孟餘致蔣中正函



5月29日，蔣在日記上記了「約顧孟餘」，應與此有關。¹¹³王世杰也直接與顧討論此事，7月16日，「午後晤孟餘。彼被任為中央大學校長，有畏難之意。予勸其決定仍從事教育工作」。王世杰很清楚地瞭解中央大學為培養人才的一所重要學校，有其重要性，「中大之重要，尚不在目前，而在將來遷回首都以後，誠能決心準備以十年、二十年之力，為首都學府，樹良好基礎，其影響所及，將不限于教育本身」。王世杰還說服周炳琳 (1892–1963) 赴中大協助顧孟餘。周說：「當然，這是我義不容辭的事」。¹¹⁴陳布雷也多次與顧氏夫婦見面討論，至七月底他才答應

北，國史館藏，典藏號：129-200000-3519。顧毓琇後於1944–45年，在蔣之後接任中大校長。

113 《蔣中正日記》，1941年5月29日。

114 張友仁，〈雜憶北大經濟系顧孟餘主任〉，收入《張友仁回憶文集》（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2），頁83。

就任。¹¹⁵1941年8月7日，蔣又親自「約顧孟餘談話，顧氏允就中央大學校長職」。¹¹⁶教育部隨即啟動任用程序，在「任用審查表」上註明：顧孟餘「品高學粹」、「體格健壯」，以簡任一級、俸額680元，實授中央大學校長。¹¹⁷

8月22日，顧由王德芳（1905–1985，王世杰的姪兒）、范予遂陪同上任，當天中央大學遭日機轟炸，中彈數十枚，受損傷甚鉅。¹¹⁸王世杰記載：「午後敵機八十餘架襲沙坪壩〔壩〕文化區，中央大學中彈數十枚，受損傷甚鉅。而今日恰為顧孟餘接收中大之日」。¹¹⁹郭廷以則記載「顧先生接任那天，日敵特別來炸中大，炸得很慘，圖書館受創最烈」。¹²⁰8月底與9月初，顧孟餘兩度在中大歡迎會致詞希望「與諸同人共甘苦，同奮鬥」，「希望本校培養成自由學術空氣，並有更優良之紀律」。¹²¹當時中大西語系法語教授徐仲年（1904–1981，江蘇無錫人）聽到後認為顧的發言「與同仁以絕大的興奮」，而「自由學術空氣」是帶領學校走出困境的「康莊大道」。¹²²

115 《陳布雷先生從政日記》，1941年7月21日，頁490。

116 葉惠芬編註，《蔣中正總統檔案：事略稿本》（台北：國史館，2010），第46冊，頁590。《蔣中正日記》，1941年8月7日。

117 《教育部檔》，南京，第二歷史檔案館藏，檔號：5-2530。

118 王世杰著、林美莉編輯校訂，《王世杰日記》，上冊，1941年8月22日，頁370；〈顧孟餘接收中大〉，《教育通訊》，第4卷第32、33期合刊（1941年8月），頁7。有關范予遂參與改組派之經過及其與顧孟餘之關係，可參考范予遂，〈我所知道的改組派〉，收入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全國委員會文史和學習委員會編，《文史資料選輯合訂本 第16卷 總第45–47輯》（北京：中國文史出版社，2011），頁144–157。

119 王世杰著、林美莉編輯校訂，《王世杰日記》，上冊，1941年8月22日，頁370。

120 張朋園等訪問，陳三井、陳存恭紀錄，《郭廷以先生訪問紀錄》（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87），頁208。

121 〈顧校長招待各教授、教授會歡迎顧校長〉，《中大週刊》，第15期（1941年9月14日），第2版。

122 參見蔣寶麟，《體國經世：民國的學人與商人》（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15），頁72–73。

10月底學校開學之前，顧孟餘任命童冠賢為教務長、王書林為總務長、張慶楨為訓導長，協助校務推廣，並發佈了各院的院長。¹²³顧擔任中大校長之後，與國民黨中央黨部的關係也更密切。1941年12月23日，在國民黨五屆九中全會，因王法勤病故、陳濟棠請辭，葉楚傖、顧孟餘遞補為中央執行委員會常務委員。¹²⁴

1942年1月1日，顧孟餘在中大元旦慶祝會上向全體師生致詞，說明治校理念。他主要指出兩點：第一，大學有「崇高」、「廣大」之義，「因此在大學裡做研究工作的人的意志、精神、氣度也要恢闊寬宏……同時，我們研究學問，一面要重理論，一面也要講實際，總之，通古今、貫中外、並體用，為今日大學之職志」。第二，知識的追求與個人的操守密不可分，同學要能秉持孟子所謂的「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道德勇氣。¹²⁵在學生的印象之中，顧校長的治校宣言是：「大學是研究學術的機關，在以國家民族利益為前提的原則下，思想是絕對自由的」。¹²⁶當時任教於中大的黃淬伯（1899–1970，江蘇南通人，專長於音韻學）在1942年1月17日的日記中記載「中大易長以來，氣象漸好。顧氏提倡學術，冀使國故化為神奇，融洽西學變為國有，此誠通人之見也」。¹²⁷

顧孟餘在校長任內採取無為而治、作風明快，並力主學術自由，不受黨派干預而頗獲好評。當時在中大歷史系任教的郭廷以說顧校長：「在黨、政、學界是老資格了，他連教育部也不敷衍，風度之佳不可及，他不多管事，不多講話，講起來幾句話簡單明瞭……夠有風度，

123 〈開學有定期，三長均實授，院長已發表，分校主任易人〉，《中大週刊》，第16期（1941年9月28日），第2版。

124 劉維開編，《中國國民黨職名錄》，頁137。

125 顧孟餘，宓超群紀錄，〈民國三十一年元旦顧校長對全體師生致詞〉（1942年1月1日），《中央大學日刊》，復第54號（1942年1月7日），第1版。

126 陳德林，〈中央大學素描〉（1942年8月），《行健》，第4卷第7期（末陽，1942），頁28。

127 陸遠整理校註，《黃淬伯先生日記》（手稿打字本），此一史料由蔣寶麟教授提供，謹致謝忱。

有派頭」。¹²⁸當時在中大擔任會計工作的閻鴻聲(1912-?)則回憶,「顧先生給人的第一眼印象是莊嚴、高傲,不苟言笑……但是他的胸襟開闊,氣度恢弘,內心深處有濃厚的愛心和同情心」,「先生主持中大校務雖僅兩年,頗多興革,對於中央大學日後之發展,確有深遠影響」。¹²⁹可見顧孟餘待人處事深得師生之敬愛。

顧孟餘上任後也積極改善中大財政拮据的狀況,他向財政部與教育部爭取經費,結果不但補足了原有之虧空,也開始大禮堂與宿舍的建設工程。大禮堂於1942年4月竣工,供全校師生聚會之需,「大禮堂建成後,校內立即洋溢起一片歡欣氣氛,尤其是學生們更興高彩烈的舉辦各項慶祝活動,就是一向不愛多事的職員們,也感覺到整個學校都在變了,師生們似已由沉悶中活躍起來,個個顯得活潑有朝氣,人人都有進取精神,還真是可喜的現象」。學生宿舍則由原先八人一間,改為六人一間,並增添桌椅,供學生自習。¹³⁰

1942年11月13日,英國議會訪華團曾至中央大學參觀,由校長顧孟餘接待,「至接待室休息時,顧校長除將年來頻遭暴敵慘炸情形及維持之種種困難向各團員說明外,並特贈書面報告一份做為參考,旋參觀圖書館實驗室等部分」。中午,由重慶各校聯合宴訪華團,席間由顧孟餘以英文致詞,談到中英之間文化交流與雙方共肩作戰。接著由英國代表團勞森致答詞。最後中央大學文學院院長樓光來(1895-1960)代表各校致贈卷軸一幅留念。¹³¹

128 張朋園等訪問,陳三井、陳存恭紀錄,《郭廷以先生訪問紀錄》,頁208-209。

129 閻鴻聲,〈顧孟餘軼事—沙坪壩中央大學雜憶〉,《中外雜誌》,第38卷第5期(台北,1985年11月),頁87。

130 閻鴻聲,〈顧孟餘軼事—沙坪壩中央大學雜憶〉,頁87。中央大學於1937年10月自南京遷至重慶,位於重慶沙坪壩的(現重慶大學內)的「松林坡」,當時的房舍多已被拆除,而該校大禮堂仍在,被稱為「七七抗戰大禮堂」。「當年全國最高學府在重大松林坡叫國立中央大學」。《國立中央大學新聞網》, http://big5.xinhuanet.com/gate/big5/www.cq.xinhuanet.com/2013-04/25/c_115534910.htm (2017年4月13日檢閱)。

131 編者不詳,《英國議會訪華團資料》(出版地與出版者不詳,1942),頁22-23。

1942年12月中旬，顧孟餘以「校務繁重」、「體力不支」向教育部長陳立夫提出辭呈，¹³²陳先回函，希望顧「打消辭意，照常任職」，同時立即報告蔣中正。蔣於12月27日下令「由部予以慰留」。12月28日，陳立夫回覆顧「任職以來經營擘畫，備著堅勞，仍望勉力策進，共際時艱，承請辭職一節，應無庸議，此令」。顧接到公文之後，於12月30日再度請辭，「無如瞻念繁劇，自審精力確有不勝之懼，謹再呈懇，務祈顧念校務重要，迅賜令准簡派繼任接收」。12月31日陳立夫批示為「再予懇切慰留」。¹³³

不久顧辭職的消息為外界所得知。1943年1月，報上傳出顧孟餘辭中大校長，「於月前提出辭呈，周餘未到校辦公」。¹³⁴當時又謠傳教育部擬派CC系的吳南軒(1893–1980)當校長，也傳說陳立夫擬親掌中大。¹³⁵中大學生因而發起遊行請願的挽留活動，有一千五百餘名學生參加。當時擔任學生自治會主席的楚崧秋(1920–2017)回憶「這時學校同學反而捨不得他走，發動一系列遊行請願挽留活動。推其原因是他保持一些神秘色彩的魅力，平日與師生雖不多接近，但對校務推進，予以良好印象。當時我以學生自治會主席的身份，應同學要求共同出面，大家步行到離學校十華里外的顧校長住所，請他繼續留任。教授方面也有類似表示，但都未能為顧所接納」。¹³⁶

132 顧孟餘辭職的原因可能也因為校務繁瑣，根據郭廷以的回憶：「由於文學院和教育學院兩個院長為學生吃飯的事吵起來，顧先生從中調解，沒說幾句，兩個人又吵起來，顧先生不講話，站起來就走了，從此不到學校，不再復職」。張朋園等訪問，陳三井、陳存恭紀錄，《郭廷以先生訪問紀錄》，頁209。

133 〈國立中央大學校長羅家倫辭職顧孟餘任職教職員名錄資格審查聘用辭呈休假生補費表冊等有關文書，1941年3月至1943年2月〉，頁68–69、72、74–75、78。《教育部檔》，南京，第二歷史檔案館藏，檔號：5–2530。

134 蔣寶麟，〈抗戰時期的國家與大學政治文化：中央大學「易長」研究〉，《史林》，頁95。

135 朱斐主編，《東南大學史（第一卷），1902–1949》（南京：東南大學出版社，1991），頁196。

136 楚崧秋口述，呂芳上、黃克武訪問，王景玲紀錄，《楚崧秋先生訪問紀錄：覽盡滄桑八十年》（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01），頁28–29。

1943年2月蔣接到顧孟餘的辭呈之後，2月8日擬「約孟餘」；2月11日「往訪孟餘，談中大校長事後回寓，乃知文大學非實施軍事訓練不可，至根本教育，又非自家庭與小學教育着手不可也」。¹³⁷顧孟餘並不接受蔣之慰留。2月15日蔣「決定親自擔任中央大學校校長，以各大學學風之壞已極，非此不足以挽救民族之生命，然可憐亦極矣」。¹³⁸2月19日，國民政府正式發布指令，顧孟餘「迭請辭職，情詞懇切」，故准予辭去中央大學校長，由蔣中正兼任中大校長。¹³⁹兩天之後，蔣親赴中大「正午召見中央大學校各院院長，與各主委職員聚餐，訓誡之」；¹⁴⁰並於3月1日正式上任。蔣上任之後再度召集各系主任點名，並巡視全校各處，「上午到中央大學，召集各學系主任以上教職員，點名訓話後，巡視全校各處，其宿舍之擁塞污穢，不堪言狀，設備之簡陋與師生之無秩序，思之痛心，惟學生體格壯健，皆無營養不足之象，甚為自慰。正午到學生膳廳，與學生同餐，粗飯冷蕒，並無難食之味，此為平生最得意之一事，能與青年同飲食、共甘苦，殊不易多得之機會也」。¹⁴¹這些狀況似乎也是顧孟餘卸任時中央大學的寫照。為解決上述問題，蔣當天即決定「約顧來見」。¹⁴²

顧辭職的原因一方面固然是身體因素，無力負擔繁重的校務工作。據說他在當中大校長時「兼著譯書籍，因用腦過度成高度神經衰弱症，心理上又侵成恐懼病態，據云顧聽到響聲即驚惶萬狀」。¹⁴³另一個傳聞是蔣中正正在訓話時對於中大有所指責，顧孟餘一怒之下，堅決辭職。¹⁴⁴

137 《蔣中正日記》，1943年2月8、11日。

138 《蔣中正日記》，1943年2月15日。

139 〈國民政府令〉，《教育部公報》，第15卷第3期（重慶，1943年3月），頁7；郭廷以編著，《中華民國史事日誌》，第4冊，頁229。

140 《蔣中正日記》，1943年2月21日。

141 《蔣中正日記》，1943年3月4日。

142 《蔣中正日記》，1943年3月4日。

143 望平軒，〈改組派健將：顧孟餘苦諫汪精衛〉，《快活林》，第14期（1946年5月4日），頁6。

144 此一傳聞如下：1943年初蔣介石在復興關中央訓練團舉行「紀念周」，在渝的各大學校校長奉召聆聽「訓話」。各校長俯首聽命，惟中大校長顧孟餘不

不過他辭職的主因應該涉及國民黨內陳立夫的CC系與朱家驊派因教育系統之掌控而產生的衝突。¹⁴⁵如上所述顧在北大即認識同赴德國留學的朱家驊，並共同組織群眾運動；在鐵道部長任內亦曾以經費資助教育部（朱為部長）擬開辦之國立編譯館，每月5,000元。¹⁴⁶在1941年10月，朱家驊（時任組織部長）曾介紹國立編譯館館長辛樹幟（1894–1977）至中大任教，顧允其擔任「師範學院博物系主任」。¹⁴⁷總之，顧在國民黨內無疑與朱家驊較親近，而成為陳立夫等人想要打擊之對象。陳立夫所採取的手法有二，他一方面指控朱家驊系統的人鼓動中大學生風潮，另一方面則在學校經費上加以封鎖，使顧面臨了與羅家倫當校長時類似的財政困境。當時顧頤剛（1893–1980）在中大任教，同時也在國民黨組織部工作，在日記中他對此有詳細記載：「陳立夫蓄意統制教育界，非其私人必加以困厄，逼其脫離，屬其私人，則無論如何辦得壞，亦與維持。五年以來，一個個大學收為己有，助紂為虐者張北海、吳俊升也。所未入侵者，中央大學、西南聯大、武漢大學、浙江大學四校而已。中大有四千學生、四百教員、七院六十二系，而孟餘先生不肯投降，彼遂以經濟

顧就範，委派訓導長周鴻經代表。蔣介石十分不滿，竟在眾目睽睽之下將曾留學英國的數學家周鴻經教授奚落一番，並指桑罵槐地斥責顧孟餘。顧獲悉，又氣又惱，以辭職抗議。「顧孟餘」，百度百科，<https://baike.baidu.com/item/%E9%A1%BE%E5%AD%9F%E4%BD%99>（2018年2月1日檢閱）。

145 杭立武指出「我與陳立夫經常同時出席各項會議，我與他在教育部是先後任，是友人。陳立夫與陳果夫一般被認為屬於黨的保守派，有一段時期與朱家驊派對立。大陸上若干學潮，有些是因為這兩個派別對立衝突而發生的」。王萍訪問、官曼莉紀錄，《杭立武先生訪問紀錄》，頁79。

146 「民國21年（朱家驊為教育部長）朱在行政院會議再提（國立編譯館）設立，但經費只有1500元經費，經鐵道部長顧孟餘同意每月補助5,000元，獲准成立，以辛樹幟為館長，除審查教科書外，主要工作——翻譯外國重要劃時代名著，使國人真正瞭解西洋文化編譯〔科學名詞〕」。見胡頌平編，《朱家驊年譜》，頁26。

147 〈顧孟餘函〉（1941年10月20日），〈人才人事〉，《朱家驊檔》，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藏，檔號：301-01-23-224。

封鎖政策相脅迫，以至一年半來虧空至五百萬元（等於戰前五萬），聞孟餘先生辦不下去，已提出辭職」。¹⁴⁸顧頤剛又補充說明中大在財政上的窘境，「學校過年開銷，教部仍未發下，仍出借貸。此之謂經濟封鎖」。總之，他的日記明白地透露顧辭職的原因，「孟餘先生被陳部長所迫而辭職」。¹⁴⁹

顧孟餘遞出辭呈之後，顧頤剛亦跟進，1月26日在顧頤剛向顧孟餘遞了辭呈，「孟餘先生不許，謂要走一起走，而孟餘先生之自身去留迄猶未定，只得待之」。¹⁵⁰2月顧頤剛又表示「予對中大學生情感甚好，期望亦殷，而不得不去者，一來事務太忙，休息無時，二則亦不願在CC統制下過生活也」。¹⁵¹2月17日顧頤剛到組織部，朱家驊亦表示要顧頤剛在處理中大事務時謹慎，「朱先生囑予勿顧問中大事，因他現在如此避嫌疑，陳立夫猶以鼓動中大風潮中傷之，若我一入漩渦，更將使彼撇不清也」。¹⁵²這些訊息都顯示陳立夫的CC系與朱家驊的人馬在中大的角力。

148 參見顧頤剛，《顧頤剛日記》，第5卷，1943年1月5日，頁7；1943年3月30日顧到編譯館見到張北海，頗感痛恨，「今日得見張北海一識此『桀犬』、『閹黨』面目」，《顧頤剛日記》，第5卷，頁49。張北海（1877–1977），廣東惠陽人，北大哲學系畢業，曾任教育部督學，當時任職於國立編譯館，參見沈雲龍、張朋園訪問，林能士紀錄，《關德懋先生訪問記錄》（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7），頁28。顧頤剛說「西北臨時大學本來徐誦明做得很好，他派張北海做該校法學院長，帶了手槍去發給學生，叫他們鬧起風潮來，就把徐氏逼走」。顧頤剛，〈顧頤剛自傳〉，收入《寶樹堂文存》（北京：中華書局，2010），卷6，頁386。吳俊升（1901–2000）為江蘇如皋人，東南大學畢業，法國巴黎大學博士。1935年任北大教育系主任。後出任江蘇省教育廳主任秘書。1938–1945年間任教育部高教司司長。

149 雷天模，〈大足小志〉，《國民公報》，重慶，1945年4月9日，見《顧頤剛日記》，第5卷，頁454。

150 顧頤剛，《顧頤剛日記》，第5卷，1943年1月26日，頁17。

151 顧頤剛，《顧頤剛日記》，第5卷，1943年2月2日，頁21；1943年2月9日，頁24。

152 顧頤剛，《顧頤剛日記》，第5卷，1943年2月17日，頁28。

在顧孟餘卸任之後，中大人事進行了很大的調整。蔣在陳布雷的協助下開始整頓校務，首先是任命曾任湖南教育廳長的朱經農 (1887–1951) 為教育長。朱之任命應該是得到陳立夫的認可。2月26日「三時朱經農君自湖南來，命竺副官至機場往接來寓。談教育事約一小時餘。四時十分往訪立夫兄，偕經農同往，談卅分鐘而歸」。2月27日「午餐時偕經農同謁 委員長，委座命經農擔任中央大學教育長，經農接受任命，並述其辦學意見」。3月4日陳布雷「奉 委座諭，往訪顧孟餘先生。九時五十分抵老鷹岩，與顧君談約一小時」。次日「九時許，朱經農君來談校中情形，約一小時而去。中大情形整頓不易」。3月6日陳布雷記載「午刻胡煥庸、馮澤芳兩教授來訪。與胡君談話甚久」，當晚九點，陳布雷「謁 委座，談卅分鐘歸」，陳布雷的日記沒有記載兩人談話內容。¹⁵³不過蔣的日記則說兩人談到童冠賢把持校務，此一訊息應是胡煥庸等人所提供的：「與布雷兄談中大童冠賢等作梗情形，書生學者必欲把持學校，其惡習之深，甚於軍閥之誤國，思之痛憤」。3月7日蔣再去中大，對學生訓話一小時，「就中央大學校校長對師生訓話及巡視全校，與學生共食，皆具改造學風意義」。¹⁵⁴

蔣擔任校長之後將顧孟餘所任命的親朱家驊系統之人，如童冠賢等，都換了下來，CC系與中大校友派 (包括南高、東南大學出身) 的人則掌握了實權。朱經農為教育長、胡煥庸為教務長、江良規為總務長、郭廷以任訓導長。1943年3月12日顧頤剛記載：「中大教務長已發表為胡煥庸，總務長為江良規，皆CC系也，誣謂童冠賢、馬洗繁、伍叔儻、沈剛伯及我皆為鼓動學生鬧風潮者」。¹⁵⁵

153 陳布雷，《陳布雷先生從政日記》，1943年2月26日至3月6日，頁604–606。

154 《蔣中正日記》，1943年3月6、7日。

155 顧頤剛，《顧頤剛日記》，第5卷，1943年3月12日，頁41。胡煥庸 (1901–1998) 為地理學者，畢業於南京高師地學系，為竺可楨的學生，曾任中央大學地理系主任。江良規 (1914–1967) 中央大學體育系畢業，獲德國萊比錫大學博士學位，1943年時擔任中央大學體育系主任。兩人均屬於「南高」系統。馬洗繁 (1894–1945)，為中央大學法學院院長，1942–1945年為國民參政會參政員。他與童冠賢為好友，曾同組「新中國學會」、信奉拉斯基的學說，協助羅

第四節 淡出政壇

從中央大學校長一職退下來以後，顧孟餘在官場上的政治生涯幾乎已告結束。抗戰勝利之後，顧不曾擔任過政府中正式的職務。1943年，蔣中正曾兩次與他見面，第一次是8月16日「往訪林故主席靈堂省視後，與顧孟餘談話」，第二次是11月8日「正午約顧孟餘夫婦聚餐」。¹⁵⁶ 1943年底，顧與陳布雷談話時即多次告知「將於下月攜眷出國也」、「定詢日內攜眷赴美」，目的之一是「考察中美經濟合作之要點」。¹⁵⁷

1943年11月18日，顧孟餘夫婦與王世杰、王雲五、杭立武、李惟果等訪英團同機，從重慶飛至昆明，在此住了三五日。21日蔣夢麟宴請顧孟餘，並由在西南聯大任總務長、歷史系教授的鄭天挺(1899–1981)作陪，賓主「談甚暢」。兩天以後鄭天挺與章廷謙(1901–1981)、姚從吾(1894–1970)、羅常培(1899–1958)、楊振聲(1890–1956)等人於「三時……同往金碧別墅謁孟餘先生……談至六時始出」。眾人對教育、政治問題有十分深入的討論。12月9日中午，鄭天挺又與周炳琳、錢端升等人再度宴請顧孟餘，當天下午顧孟餘夫婦即乘飛機前往印度，再乘船轉赴美國。¹⁵⁸ 此後他滯留美國約四年多。1945年5月17日，在國民黨第

家倫校長處理校務。伍叔儻(1897–1966)，中央大學國文系教授，1932年朱家驊任教育部長時，調任教育部參事至1937年。沈剛伯(1896–1977)為中央大學歷史系教授。其妻曾祥和(1920–2013)的口述回憶提到「剛伯從前人緣很不好，憤世嫉俗，不服權威，說話放言無忌，甚至在課堂上公然批評政府」，結果「上了CC的黑名單」，「幸虧朱家驊出面保他，說他只是一個讀書人，秀才不會造反，才把這案子消掉，沒受到什麼傷害」。游鑑明、沈懷玉訪問、周維朋紀錄，《曾祥和女士訪問紀錄》(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18)，頁465。

156 高素蘭編註，《蔣中正總統檔案：事略稿本》(台北：國史館，2011)，第54冊，頁308；第55冊，頁338。按：林森於1943年8月1日因車禍過世。

157 陳布雷，《陳布雷先生從政日記》，1943年8月30日、10月27日、11月8日。

158 鄭天挺，《鄭天挺西南聯大日記》(北京：中華書局，2018)，下冊，頁758–760、766。

六次全國代表大會，顧孟餘被選為中央執行委員。¹⁵⁹ 11月1日，他又當選故宮博物院第六屆理事。抗戰勝利之後，宋子文曾考慮請顧出任駐英大使，取代顧維鈞，後此事未成。¹⁶⁰ 日本外務省所編纂的資料說「顧孟餘……太平洋戰爭終了後，擔任聯合國中國代表團顧問，活躍於美國」，¹⁶¹ 不過是否如此仍有待確認。

1946年6月顧維鈞擔任中國駐美大使，朱家驊亦曾經託顧維鈞轉一封信給顧孟餘，請他再度出任中央大學校長，顧孟餘並未應允。¹⁶² 蔣中正也曾指示俞鴻鈞，由中央銀行撥付顧孟餘美金一萬元，交駐美大使顧維鈞轉交。¹⁶³ 顧孟餘在訪美期間先住在華盛頓，後來搬到加州柏克萊，在此過著「淡泊寧靜」的日子。「有人說他開汽車之『慢』，是柏克萊的美國人所共知的。他喜歡到一個小湖邊，看天、看水，坐上一兩個鐘頭」，偶爾坐電車十分鐘，到加利福尼亞大學圖書館看書。1947年2月他曾向去訪的記者表示「中國目前政治方向走向民主和法治，是無可非議的。『也許我們不能進步得很快，但總比不進步的好』！」¹⁶⁴ 此一經歷無疑地影響他後來在1950年代後期第三勢力運動失敗後，又選擇了加

159 劉維開編，《中國國民黨職名錄》，頁180。

160 「宋子文電蔣中正」(1945年8月29日)，〈對英法德義關係(三)〉，《蔣中正總統文物》，台北，國史館藏，典藏號：002-090103-00013-198。

161 日本外務省調查局編纂，《現代東亞人名鑑(昭和二十五年版)》(東京：東邦研究會，1950)，頁6。

162 電文如下：「中大自經兄一任校長以後，繼任人選遂一一不滿人意，至今未上軌道。此無異兄負間接之責任。今適兄長北大，鯉兄長武大，情勢不同。公私益盼兄再勉為其難。事關東南文教，請賜惠允」。見「電顧維鈞轉顧孟餘」(1946)，〈人才人事〉，《朱家驊檔》，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藏，檔號：301-01-23-724。案胡適於1946年7月回到北平，任北京大學校長；周鯉生於1945年7月任武漢大學校長。1946年時中央大學校長為吳有訓(1945–1947任校長)，他對國民黨鎮壓學生民主運動的做法感到憤慨，曾多次提出辭職，朱家驊可能因此想請顧孟餘接任。

163 洪葭管編著，《中央銀行史，1928.11–1949.5》(北京：中國金融出版社，2005)，頁1074。

164 毛樹清，〈顧孟餘作寓公〉，《工商晚報》，香港，1947年2月16日，第1頁。

州柏克萊作為棲身之所。1947年9月8日，王世杰赴美訪問，出席聯合國大會，在舊金山時曾訪問顧孟餘，兩人就時局問題有一長談。¹⁶⁵

1948年1月中旬，顧孟餘偕夫人經東京返回上海。¹⁶⁶2月4日，顧孟餘與秘書谷錫五及中央圖書館館長蔣復璁（1898–1990）至南京拜訪中央部會之友人。¹⁶⁷當晚蔣中正邀約晚宴，晚課後又「見顧孟餘約談半小時」。¹⁶⁸2月10日，蔣「敦聘顧孟餘先生為國民政府顧問」。¹⁶⁹3月底時北方戰事吃緊，冀察晉魯綏各地，國軍戰事失利，報上「傳張群已提出辭呈，行憲後之政府，聞宋子文及政學系將全力支持顧孟餘組閣」。¹⁷⁰

顧氏組閣之事後來未成。5月底翁文灝出任行憲後首屆的行政院長，當時報紙上曾經報導此人「個兒頂小、官兒頂大」，十分期待這一位地質學專家以「精明幹練和廉潔的操守再加上學者的風度來從事中國的新政……以『科學的方法』來辦理政治，創造一個新的中國的命運」。¹⁷¹

165 王世杰著、林美莉編輯校訂，《王世杰日記》，上冊，1947年9月8日，頁879。

166 〈顧孟餘朱世明過東京返國〉，《中央日報》，南京，1948年1月13日，第3版。「顧氏訂於本日午離橫濱，可望於十六日抵滬」。顧孟餘夫婦乘船於1月10日抵達橫濱，再赴東京，與李書華一同參觀上野公園的帝國博物館。李書華，《日本一周》（出版地不詳：李書華發行，1948），頁5。

167 1948年2月4日顧頤剛到南京的行政院「訪薛銓曾秘書……到教部，訪朱〔家驊〕部長、杭〔立武〕次長、張幫辦天麟、潘科長平之。出，遇顧孟餘先生及谷錫五、蔣慰堂」。由此推測顧、蔣等人可能正要去拜訪朱家驊。顧頤剛，《顧頤剛日記》，第6卷，1948年2月4日，頁225。

168 《蔣中正日記》，1948年2月4日。

169 〈顧孟餘受聘任國府顧問〉，《中央日報》，南京，1948年2月10日，第2版。程玉鳳編註，《蔣中正總統檔案：事略稿本》（台北：國史館，2013），第72冊，頁516。

170 〈宋子文及政學系將全力支持顧孟餘組閣〉，《華僑日報》，香港，1948年3月26日，第1張第1頁。一直到1948年5月底，新加坡的報紙仍猜測顧孟餘「和TV宋有著勾搭，在蔣宋變不出什麼花樣來的時候，他也有資格被當作一張政治上的王牌」。見〈汪記夥伴顧孟餘〉，《新加坡南僑日報》，1948年5月29日。

171 舒放，〈個兒頂小、官兒頂大：翁文灝其人〉，《北平北方日報》，1948年5月26日。

經過蔣的同意，翁提名顧孟餘為行政院副院長，¹⁷²一方面是因為顧為北方人，與翁配合，可達到「南北均利」，另一方面則希望藉助他的長才來改善財政經濟，會「不避一切和豪門財蛆打交道」。¹⁷³《大公報》及不少民眾認為此一內閣名單因有顧孟餘在內，而有「新意」。¹⁷⁴《中央日報》也刊登出內閣成員的照片。

不過顧孟餘並無意出任行政院副院長。5月26日，顧孟餘致電蔣表示婉拒，「是職責重事煩，決非庸拙如孟餘者所能勝任。與其倉皇受命終至貽誤，莫如披瀝直陳蘄求慎選，敬祈另簡英才當茲重任」。¹⁷⁵5月27日，翁親自從南京抵滬見顧，希圖轉圜，當晚10點多，在拜訪完何應欽之後，「驅車至湖南路二八〇號某公寓訪新近返國之顧孟餘氏，至午夜始返。……據消息，行政院副院長已內訂為顧孟餘」。¹⁷⁶無奈顧孟餘仍堅拒此職，¹⁷⁷蔣又擬提名他為考試院長。6月13日蔣致電「上海吳市

172 《蔣中正日記》，1948年5月25日。「朝課後約見亮疇、布雷等，與翁院長商談政院人選，彼提顧孟餘為副院長，余甚贊成。彼恐余不能以全權賦予組閣，余即告以全權賦彼，余有所見，亦必開誠明告也」。

173 韓家崑，〈翁內閣為何需要顧孟餘？〉，《建中週報》，第1卷第4期（南京，1948年6月），頁6–7。

174 馮靜甫，〈讀者投書：顧孟餘〉，《觀察》，第4卷第16期（1948年6月12日），頁2。本文寫於1948年6月7日。文中表示「這一次大家都不滿意的，就是各部會首長，全部都是舊人，這一次只拖出了一個顧孟餘。《大公報》把顧孟餘捧得厲害，說這一次有了顧孟餘，總算有了一點『新』意」。顧頤剛得知翁文灝擬招聘顧孟餘為行政院副院長，也在日記中表示「顧孟餘先生人甚淡泊，不慣爭競。戰前鐵道部長卸任，即隱居北平西山者多年，及中大校長為二陳排擠，又赴美國者五載。此次翁文灝招為行政院副院長，至今不赴」，當時有一些刊物曾造謠中傷顧孟餘，顧頤剛為此表示不滿，「天下事何能為！不讓一好人存在，不論換何政府，當局者必皆壞坯子矣」。顧頤剛，《顧頤剛日記》，第6卷，1948年6月8日，頁295。

175 「顧孟餘電請另簡賢能為副院長」（1948年5月26日），〈行政院所屬官員任免（七）〉，《國民政府/人事/中央機關人員任免/行政院人員任免》，台北，國史館藏，典藏號：001-032110-0011。

176 〈翁文灝抵滬訪問何應欽顧孟餘〉，《中央日報》，南京，1948年5月28日，第2版。

177 顧孟餘不願出任新內閣的副院長，亦涉及他對當時主計處主計長徐堪（1889–1969）的不滿。據陳克文的記載，「將來國家總預算的編製、審檢大權完全操在

長轉顧孟餘先生：「兄對行政院副院長堅辭不受，中甚諒解。但必須兄另受他職，方准辭去。前已推兄為考試院長，此職重要，但較簡易，務望兄俯就，並提先發表，希勿再辭為盼。」¹⁷⁸6月14日顧孟餘再度懇辭，「承命擔任考試院院長職務，餘以庸拙，累辱誣諉，聞命之餘，實深慚悚，此次我公行憲伊始，總持國政，凡在舊交，原應竭盡知能，共效壤流之助，惟餘自問違雜實際行政工作，瞬逾十載，平居不揣譴陋，輒以誦習研究為業，疏慵日久，實已無復從改之興趣，復思國家大業，萬緒千端，餘原已早承寵命，備位顧問，竊願勉竭所知，上備諮詢，苟能所貢獻替，其所裨助，或反較多，為此瀝陳衷曲，敬辭新命，務乞恕其愚固，曲賜諒宥，不勝感幸」。¹⁷⁹6月21日蔣任命張厲生（1900–1971）為行政院副院長，¹⁸⁰張伯苓（1876–1951）為考試院長。

1948年7月3日，翁上任之後，顧孟餘前往南京致意。中午蔣中正「召見畢范宇與顧孟餘聚餐」。¹⁸¹晚間政府官員與立法委員特地為他舉行了一個歡迎會。新上任的廣西立法委員陳克文記載，「晚間參加歡迎顧孟餘先生宴會，宴後談一些時局問題。孟餘先生對共產黨土地政策的宣傳甚為注意。他說國民黨不只是地主的代表，國民黨的黨員和官吏本身便是地主。談到十一時才散。他這一次來京，是因為擺脫了行政院副院長的新職，他笑說是來『謝恩』的」。¹⁸²

徐的手裡，「預算大權現在完全操在徐的手中，徐很專橫，實在無可奈何。顧孟餘先生深有同感，所以不肯做副院長」。見《陳克文日記，1937–1952》，下冊，頁1104。

178 「蔣中正電請顧孟餘就任考試院長」（1948年6月13日），〈籌筆——戡亂時期（九）〉，《蔣中正總統文物》，台北，國史館藏，典藏號：002-010400-00009-020。

179 高素蘭編註，《蔣中正總統檔案：事略稿本》（台北：國史館，2013），第75冊，頁136–137。

180 〈時事日誌〉，《東方雜誌》，第44卷第7號（上海，1948年7月），頁64。

181 《蔣中正日記》，1948年7月3日。

182 陳克文著、陳方正編輯、校訂，《陳克文日記，1937–1952》，1948年7月3日，下冊，頁1120。

7月之後，顧孟餘又去了北平，10月4日中午，曾與蔣中正見面並共進午餐，「談約二小時」。¹⁸³11月19日翁文灝因幣制改革失敗、人心恐慌，報紙上的文章分析「翁氏雖經以大刀闊斧的手段，頒佈財政經濟緊急處分令，凍結物價，改革幣制，施用閃電戰術，想挽救其所面臨的經濟崩潰危機，但結果大大失敗」，只好引咎請辭行政院長，12月23日卸任。顧孟餘在當時仍頗孚眾望，立法委員范予遂曾向蔣氏建議「今後轉移國際輿論，振奮軍心民心之最佳方法為敦請第一流人才黨外如胡適，黨內如顧孟餘者擔任行政院長，授以全權，做全面而徹底之改革」。¹⁸⁴翁氏辭職之後，王世杰(得到政學系的支持)、張群都有意爭取，然而「陳儀在台灣發生『二二八』事變，熊式輝、張嘉璈把東北弄得一團遭，行憲前後張群和翁文灝的執政期間，對經濟危機的無法克服，人民怨聲載道」，政學系受到抨擊。最後在CC系的支持下，行政院長一職由能緩和派系鬥爭的孫科接任。¹⁸⁵

1949年初蔣中正正在桂系逼迫之下三度下野，由李宗仁出任代總統，為籌組新政府，並與中共談判，曾有意請顧出山，協助「謀取和平革新政治」。¹⁸⁶李宗仁邀約顧孟餘的原因之一，可能是出於梁漱溟的推薦。1949年2月13日，梁漱溟在《大公報》之上公開表示「顧孟餘先生是今天國民黨元老中唯一人品學問最好之人」，「乾淨無疵」，希望李宗仁能予以重用。¹⁸⁷根據美國中央情報局的資料：「顧孟餘於1949年2月27

183 〈總統訪遊蘆溝橋，曾接見顧孟餘施奎齡〉，《中央日報》，南京，1948年10月5日，第2版。

184 「范予遂呈請任胡適或顧孟餘為行政院長」(1948年12月14日)，〈國是意見(九)〉，《國民政府》，台北，國史館藏，典藏號：001-010020-0010。

185 〈從翁文灝垮台到孫科組閣〉，《建設日報 中國日報 評論日報聯合版》，1948年11月30日。

186 克明，〈東南西北風：顧孟餘有官不做〉，《時局觀察》，第2期(上海，1949年2月)，頁16。

187 顧孟餘與梁漱溟為北大同事。1949年2月13日梁漱溟在重慶《大公報》第2版發表了一篇〈論和談中一箇難題——並告國民黨之在高位者〉，文中他推崇顧的人品與學問，他說「顧孟餘先生是今天國民黨元老中唯一人品學問最好之人。今

日自香港抵達上海。代總統李宗仁派遣了一位個人代表邀約顧去南京開會。報告顯示顧於2月28日抵達南京」。¹⁸⁸3月7日孫科請辭行政院長後，各方對繼任者應為何人有不同的看法，坊間雜誌透露李宗仁表示「新閣人選有六人，何應欽 張治中 邵力子 顧孟餘 黃紹紘 閻錫山」；¹⁸⁹不過根據桂系的黃旭初（1892–1975）回憶，「李代總統屬意居正，白崇禧屢薦何應欽，而立法院方面卻推顧孟餘」。¹⁹⁰上文所稱的立法院實際上是指1948年12月剛當選的立法院正副院長童冠賢與劉健群。

童冠賢與劉健群能當選立法院正副院長，涉及國民黨內的派系競爭。1948年底孫科接替翁文灝出任行政院長，立法院長出缺，立法院舉行正副院長選舉。蔣中正提名李培基（1886–1969）為院長候選人，黨內的正統派「革新俱樂部」（CC派立委）屬意程天放（1899–1967）為副院長，¹⁹¹但院內的民主自由社、新政俱樂部與一四座談會卻推出童冠賢、

天為國家設想，不應該讓國民黨完全垮台；相反地應當盼望它再興。但黨內黨外有資望之國民黨員，簡直沒有一個乾淨無疵之人，足以領導了。只有顧先生夠資格。我請李公注意在黨內推重顧先生，並協助顧先生。——但此事卻須以顧先生自己有志願有興趣為前提」。梁漱溟，〈論和談中一箇難題——並告國民黨之在高位者〉，載中國文化書院學術委員會編，《梁漱溟全集》（濟南：山東人民出版社，1993），第6卷，頁801。

188 「李宗仁電請梁漱溟顧孟餘來京」（1949年1月24日），見郭廷以編著，《中華民國史事日誌》，第4冊，頁829。“Briefs: China Central Government, Mar. 3, 1949, Daily Report,” Foreign Radio Broadcasts, Foreign Broadcast Information Service (FBIS) Daily Reports.（「美國中央情報局海外情報檔案：1941–1996」資料庫）

189 本刊記者，〈新閣人選有六人〉，《新聞雜誌》，新第2卷第11期（1949年3月），頁2。

190 黃旭初，《黃旭初回憶錄：李宗仁、白崇禧與蔣介石的離合》（台北：獨立作家，2015），頁327–328。

191 陳克文著、陳方正編輯、校訂，《陳克文日記，1937–1952》，1948年12月22、24日，下冊，頁1182–1183。

劉健群為正副院長的人選，¹⁹²結果當選的是童冠賢與劉健群。¹⁹³童、劉兩人當選之後即任命汪派出身、「民主自由社」的成員陳克文為立法院秘書長。¹⁹⁴童冠賢當時是李宗仁智囊團首席顧問，他與顧孟餘關係極為密切，他是顧在北大時的同事，後隨顧赴廣州參加國民北伐革命，也曾任中央大學法學院長與教務長，兩人亦同為汪派分子。孫科辭職之後，童冠賢向李宗仁力薦顧孟餘組閣。¹⁹⁵

李宗仁在與白崇禧商量過後，「以顧孟餘為第一人選，何應欽為第二人選，居正為第三人選，依次提出徵求」。¹⁹⁶三月初李宗仁派遣私人代表甘介侯、邱昌渭來滬，訪晤顧孟餘。1949年3月9日原改組派成員、立法委員范予遂亦赴上海訪問顧孟餘，表達李宗仁代總統邀約之意，但顧以為「當前局勢太難，和戰都無辦法，不願負此重任」，而加以婉拒。¹⁹⁷次日，李宗仁決定任命何應欽為行政院長。該年4月共軍渡江，此後顧孟餘往返於廣州、香港之間，最後移居香港。國民黨在大陸的政權隨即結束，蔣於12月10日從成都敗退到台北。

192 童冠賢為民主自由社、劉健群為新政俱樂部成員。民主自由社、新政俱樂部與一四座談會為1948年時立法院內的小團體。「民主自由社」是以吳鐵城為中心的一批立委，有一百三十餘人，背後為政學系；「新政俱樂部」為三民主義青年團，結合黃埔系與復興社的立委；「一四座談會」於週一、週四晚集會，準備週二與週五開會的一群立委，他們不屬於CC，也不屬於青年團。羅成典，《立法院風雲錄》（台北：獨立作家，2014），頁172–173。《陳克文日記，1937–1952》，1948年10月17日，下冊，頁1157。

193 程思遠認為「民主自由社」成功推選童冠賢、劉健群為立法院正副長是因為他們串連了華北大同盟、黃埔系、三青团、朱家驊派與桂系。程思遠，《政壇秘辛》，頁233。

194 1948年11月15日「民主自由社」舉行第三次社員大會，由陳克文、張潛華、王澤民三人擔任主席。見〈民主自由社立委昨集會討論時局〉，《申報》，1948年11月16日，第2版。

195 程思遠，〈我在香港從事「第三勢力」活動的前前後後（上）〉，《縱橫》，1997年第6期（北京，1997），頁20。

196 程思遠，《李宗仁先生晚年》（北京：文史資料出版社，1980），頁61。

197 黃旭初，《黃旭初回憶錄：李宗仁、白崇禧與蔣介石的離合》，頁327–328。

第六章

第三勢力 (1949–1952)

中共建國之後，顧孟餘沒有留在中國大陸，也不願意隨蔣中正去台灣。1949年至1952年之間，他在香港與張發奎、張君勱等人合作，在李宗仁與美國的支持下，參與了一場介於國共兩種勢力之間，主張「國家獨立」、「政治民主」、「經濟平等」、「文化自由」的政治運動，此即「第三勢力」運動。¹誠如余英時所述，香港的自由環境使他們可以追尋自身的政治理想：「我在香港的五年（1950–1955）一直生活在流亡知識人的

1 1949年之後的「第三勢力運動」與抗戰時期的「第三種力量」及1945至1949年國共內戰期間的「中間黨派」有所承接亦有斷裂。有關抗戰時期「第三種力量」可參見聞黎明的研究。他所說的第三種力量包括「救國會」之名的救亡團體、由國民黨左派如鄧演達所組的中國國民黨臨時行動委員會、鄉村建設派、以及中國國家社會黨、中國青年黨等政治團體。聞黎明，《第三種力量與抗戰時期的中國政治》（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04）。抗戰勝利之後在國共兩黨之間也存在不左不右的「廣大人群及其政治代表」，他們組成了一百多個大小不一的政黨，或稱「中間黨派」。中間黨派主要有中國青年黨、中國國家社會黨（1946年改名為中國民主社會黨，即民社黨），以及中國民主同盟（1941年成立）、民主促進會、九三學社等。其中青年黨、民社黨並不認同中共的理念，也不滿中國國民黨的黨治，後來他們一方面接受國民黨籠絡，但另一方面也參與1949年後香港的第三勢力運動。至於民盟等團體則向左轉，不斷向中共靠攏。有關內戰時期的「中間黨派」，參見汪朝光，〈戰後中間黨派的政治抉擇〉，收入《1945–1949：國共政爭與中國命運》（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0），頁415–435。

小世界中，和香港作為英國殖民地的工商社會根本沒有接觸的機會……這其實是中國自由派知識人匯聚而成的社群，生活並活躍在一個最自由的社會中……人人都享有言論、結社、出版等的自由……使他們可以無所顧忌地追尋自己的精神價值。更值得指出的是，當時流亡在港的自由派知識人數以萬計，雖然背景互異，但在堅持中國必須走向民主、自由的道路，則是一致的」。²為了宣揚其政治理念，他們辦了不少的雜誌，如《自由陣線》、《獨立論壇》、《祖國》、《大道》、《中國之聲》、《聯合評論》等十餘種刊物，而發揮了一定的影響力。1952年中，因第三勢力組織分裂，顧孟餘轉至日本發展，1955年再轉赴美國加州、1969年去台灣定居，三年後過世。本章將以顧孟餘在香港三年的活動為焦點，探討他與第三勢力由合而分的經過。

第一節 第三勢力的起源

香港的第三勢力運動起源於廣州。大約從1949年5月底開始，李宗仁與一批國民黨籍的立法委員在中共席捲大陸之際，希望為國民黨找到一條出路，而發起了一個革新運動。此時國民政府已遷到廣州，一批反對CC系（即反對「革新俱樂部」）的國民黨高層政治人物，主要是三十多位「民主自由社」、「新政俱樂部」等組織的立法委員，³於5月24日晚間聚會，「大體上擁護李德鄰先生為領導者，商議組織一個新政團。名稱未定，綱領及組織均已推定起草人」。⁴至6月中旬，組織政團的想法更為具體，參與者認為「目前這一場可怕的災難，不僅由共產黨的叛亂造成，也是國民黨本身有了毛病才發生出來的結果」，因此「反求諸己」，

2 余英時，《余英時回憶錄》，頁124。

3 有關當時立法院的各派系，請參考劉維開，〈七年中國國民黨秘書長的吳鐵城〉，收入陳鴻瑜主編，《吳鐵城與近代中國》（台北：華僑協會總會，2012），頁33。徐升，〈民國立法院重構及運行中的派系鬥爭（1946-1949）〉，《暨南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總第187期，卷36期8（廣州，2014），頁94-101。

4 陳克文著、陳方正編輯、校訂，《陳克文日記，1937-1952》，1949年5月24日，下冊，頁1229。

決定應先集合志同道合的同志，組織一個新的政團。⁵不過在具體作法上眾人意見並不一致，6月10日，「到〔廣州〕東山某處，談組織政團的進行和今後政治上的作法，推定政治綱領的起草人議論儘管很多，但是得不到結論。批評國民黨過去的失敗和共產黨的缺點，雖然頭頭是道，今後我們到底怎樣做法呢？卻沒有辦法」。⁶

由此可見此一革新運動開始時是以桂系、汪派為中心聯合其他反蔣、反CC的勢力所籌組而成，由於李宗仁不便出面，顧孟餘成為最適合的一位領導者。6月11日立法院長童冠賢與李永懋（1903–1977）、尹述賢（1897–1980）、陳克文等人到李樸生寓所開會討論，決定「推顧孟餘先生做領導，已經得他的同意」，「但是這團體和李德鄰的關係怎樣呢？對現實政治採甚麼態度呢？對於參加的分子如何選擇呢？都還沒有若何決定」。⁷次日，在東山開會，參加者更多，包括「童冠賢、周天賢、彭鎮寰、尹述賢、程思遠、黃雪邨、任國榮、鄭震宇、李永懋、王鴻韶」，眾人「通過了組織綱領，並推顧孟餘先生做籌備會主任」。當時顧孟餘也在廣州，午飯後與會者至沙面訪問了顧孟餘。顧認為國民黨的失敗在於沒有解決國民經濟問題，此點應為未來努力的重點。⁸7月初童冠賢、尹述賢、黃宇人，又去香港和顧孟餘討論，「大家決定應先集合志同道合同志，組成一個新的政團，負擔長期研究、設計、和推動的工作」，據陳克文記載，討論的時候「顧先生發言最多，態度亦最誠懇，極

-
- 5 陳克文，〈國民黨左派三傑：甘乃光與顧孟餘〉，收入陳克文著、陳方正編輯、校訂，《陳克文日記，1937–1952》，下冊，頁1336。
 - 6 陳克文著、陳方正編輯、校訂，《陳克文日記，1937–1952》，1949年6月10日，下冊，頁1233。
 - 7 陳克文著、陳方正編輯、校訂，《陳克文日記，1937–1952》，1949年6月11日，下冊，頁1234。
 - 8 陳克文著、陳方正編輯、校訂，《陳克文日記，1937–1952》，1949年6月12日，下冊，頁1234。陳克文雖尊敬顧孟餘，然此時他對於顧是否適合擔任政治領袖表示懷疑，他在日記中寫到「他的見解自然比一般人深刻，但是他是否適合做一個政團的領袖，尤其是和共產黨鬥爭的政治團體的領袖，我是有些懷疑的」。

富鼓舞精神」。⁹不過此時新政團內部出現分歧。童冠賢、黃宇人、甘家馨(1904–1977)、尹述賢、彭鎮寰(1903–1975)等立法委員，和李宗仁身邊的邱昌渭(1898–1956)、周天賢(1908–1989)、白崇禧等政軍人物，在觀念與作法上「相去很遠」，無論如何討論，都「不見得很容易把現實和理想團結起來」。¹⁰

7月12日，陳克文再次應李宗仁之命赴香港「請顧孟餘先生來廣州。德鄰先生有事要和顧商量，同時組織政治團體的事已經遷延一月有餘。德鄰先生和一班朋友都希望能夠早些成立籌備機構，請顧先生親來參加(顧被推為這團體的主席)」。陳克文到香港之後與住在堅尼地道的顧孟餘長談了三、四個小時。顧本擬答應，後來考慮到蔣中正「這幾天便要來廣州，其他許多政治上的重要人物都將陸續到來」，因而感到遲疑，決定暫時不來。¹¹當晚陳回到廣州，向李宗仁報告赴港經過。接著陳克文又參加了童冠賢主持的新政團談話會，決定明天召開籌備會的成立會議。次日，在童冠賢主持下，籌備會議通過了由顧孟餘所草擬的「一篇公開的文告，和若干條政治主張」。其後的幾日，陳克文頻繁地參加在愛群酒店召開的新政團的常務委員會議，研究預算與經費。後由李宗仁撥了「二十萬港幣」給陳克文，作為新政團的經費。7月24日陳克文赴香港，處理新政團之房屋租賃問題，「並且和顧先生對於目前的幾個問題交換意見，決定了未來組織與宣傳之方針」。7月30日，陳克文回到廣州，隨後的五、六天，他向李宗仁、童冠賢報告了新政團的各項問題，並與其他參與者就組織、經費問題進行討論，而發生爭執。陳克文記載：

9 陳克文，〈國民黨左派三傑：甘乃光與顧孟餘〉，收入陳克文著、陳方正編輯、校訂，《陳克文日記，1937–1952》，下冊，頁1336。

10 陳克文著、陳方正編輯、校訂，《陳克文日記，1937–1952》，1949年7月2日，下冊，頁1236。

11 蔣中正於1949年7月14日從台灣去廣州，14至22日在廣州召開了國民黨中常會，通過改造黨之方案，並接見軍政要員。呂芳上主編，《蔣中正先生年譜長編》，冊9，頁321–327。

我想這團體也會和其他許多團體一樣，因為經費待遇等等問題，內部發生意見、猜忌、磨擦。中國人實在是太窮了，窮人對於金錢特別看得分明，也特別發生興趣。現在才不過一二十人，事情也並不多，但是因為經費的支配和旅費的開銷等等，已經彼此都有煩言，將來必定不免會越來越利害的。¹²

1948年擔任廣西省立法委員、李宗仁秘書的程思遠(1908–2005)在回憶錄中也記載了1949年8月時政團發展的經過，他說：

八月四日，美國國務院發表了《中美關係白皮書》，對國民黨政府採取袖手靜觀政策。一時組織「第三勢力」的呼聲，甚囂塵上。頗負時望的顧孟餘忽於八月十五日應李宗仁之邀，從香港來到廣州，住沙面陳伯莊家，就組織第三勢力問題，與美使館顧問何義均、立法院長童冠賢、總統府秘書長邱昌渭等反覆交換意見，並將可能採取的方案提供李宗仁考慮，結果李宗仁主張：由顧孟餘出面領導，而由他從旁予以支持，並指定我負責居中連繫。這樣，我就往返於港澳、廣州之間，為這個所謂「第三勢力」組織籌措經費佈置人事。¹³

程思遠說顧孟餘在廣州與李宗仁長談三日後，答應出面領導「自由民主大同盟」。程也指出李宗仁與美國的接觸是透過駐廣州美國領事館的顧問何義均，何為美國耶魯大學法學博士，曾任職中央大學，擔任過法律系主任與三民主義青年團的書記，¹⁴與顧孟餘、童冠賢熟識。程思遠說「何義均是湖南人，40年代初，我在三青團中央黨部當服務處處長時，他以中央大學教授兼任三青團中大分團主任，當時中大校長是顧孟餘，

12 陳克文著、陳方正編輯、校訂，《陳克文日記，1937–1952》，1949年7月12日至8月5日，下冊，頁1237–1246。

13 程思遠，《政海秘辛》（香港：南粵出版社，1988），頁221–222。陳伯莊的經歷參見本書第四章。

14 楚崧秋口述，呂芳上、黃克武訪問，王景玲紀錄，《楚崧秋先生訪問紀錄：覽盡滄桑八十年》，頁21、26、189。

他不常到，校務由中大教務長童冠賢代行。從而使何義均同顧孟餘、童冠賢兩人的關係極其密切」。¹⁵

在國民黨中的桂系、汪派分子與一些反蔣、反CC系的立法委員的合作下，此一政團逐漸成形。桂系的參與者主要有黃旭初、徐啟明、周天賢、程思遠等；汪派則有顧孟餘、童冠賢、陳克文（廣西籍，與桂系關係密切）等。此一組織的宗旨是集合「志同道合」之人，故後來也加入了其他對國共兩黨均表失望的人士，其中最重要的是國民黨籍、曾擁汪反蔣的軍方將領張發奎、許崇智，與曾隸屬孫傳芳的將軍上官雲相等，¹⁶以及民社黨（張君勱、伍憲子、伍肇池、王厚生、李微塵、孫寶

15 程思遠，〈我在香港從事「第三勢力」活動的前前後後（上）〉，《縱橫》，1997年第6期，頁20–21。有關何義均在中央大學的情況在《顧頤剛日記》中有一些零碎的記載。1942年5月3日顧孟餘校長宴客，當日參加者除了顧頤剛之外還有「李惟來夫婦及其子素行、何義均、馬洗凡（繁）、〔辛〕樹幟、童冠賢、吳幹」，見顧頤剛，《顧頤剛日記》，卷4，頁675。香港友聯集團的核心人物何振亞（1920–2009）表示1950年代初期，何義均曾介紹香港的友聯出版社與美國中央情報局支持的「亞洲基金會」（Asia Foundation）接頭，該出版社因而獲得亞洲基金會之經濟援助。何振亞為何義均在中央大學的學生。後來何義均自香港移民美國，在2012年前後過世，去世時約一百歲。參見〈何振亞口述訪問紀錄〉，收入盧瑋鑾、熊志琴，《香港文化眾聲道——第一冊》（香港：三聯書店，2014），頁32–33。何義均離開香港去美國的時間是1953年，據程思遠表示「原在美國總領事館工作的何義均，他在一九五三年共和黨政府上台以後，辭職去美。行前他對我說『戰盟』的失敗，固有其內在原因，主要還是由於美國改變政策。外因比內因重要」。程思遠，《政海秘辛》，頁240。何義均的分析有其道理，1953年1月美國共和黨的艾森豪與尼克森就任正副總統，該黨對國民黨與蔣中正較為同情，因而政策有所改變，不再積極支持第三勢力。1963年郭廷以在美國時曾與何義均見面，「何義均夫婦來，談三小時。義均現寓 Virginia 之 McLean，去 Arlington 不遠」。《郭量宇日記殘稿》，1963年3月31日，頁390。

16 上官雲相（1895–1969），保定陸軍軍官學校第六期，國民革命軍上將。據說此時他「與政府駐港情報人員有聯繫」。「唐縱、張其昀呈蔣中正留港九華人政治活動經過及派系分析與各派系主要人物動態等現狀」（1951年3月31日），〈一般資料——民國四十年（二）〉，《蔣中正總統文物》，台北，國史館藏，典藏號：002-080200-00345-057。

剛、孫寶毅)、青年黨(李璜、左舜生、謝澄平、何魯之)的成員，此外還有一些知識分子，如黃如今、張純明、王季高等。¹⁷

有關程思遠回憶錄所說的1949年8月中，美國發表白皮書之後第三勢力的籌組工作，在陳克文的日記中有比較詳細的紀錄。事實上顧孟餘在8月6日一早就從香港到了廣州，¹⁸次日在愛群酒店開會，參加的人有顧孟餘、童冠賢、邱昌渭、甘家馨、何義均與陳克文等。會中顧孟餘提出：「總部是否設香港，如何收集情報，如何吸收青年幹部，如何籌募經費等問題」。陳克文則說：「組織的發展必須得領導的人物和主張做號召，兩者不可偏廢。現在許多人對國民黨失望，對共產黨反對，希望有民主自由的組織出來做領導。若果這種領導的人物和他們的主張不公開出來號召，是不能夠形成陣線，發生力量的」。當晚眾人參加了李宗仁的晚宴。8月14、15日由顧孟餘主持會議，「參加的近二十人。決定了組織工作計劃，和一些有關經費的問題」。¹⁹此一組織正式定名為「自由民主大同盟」。陳克文可能不知道，8月11日，顧孟餘主持會議之前，他與美國駐廣州公使Lewis Clark(中文名為柯慎思)聯絡，詢問美國對他籌組第三勢力，在國、共之外走出另一條路的看法。顧表示在袁世凱

17 「張其昀陳雪屏呈蔣中正南方執行委員會許孝炎王任遠來台述職，請定期召見，並抄呈顧孟餘張發奎等醞釀第三勢力近況報告摘要」(1951年6月19日)，〈一般資料——民國四十年(三)〉，《蔣中正總統文物》，台北：國史館藏，典藏號：002-080200-00346-028。黃如今(1898-?)、張純明(1903-1984)、王季高(1904-?)均為國民黨。黃如今，湖南永興人，北京師範大學畢業，留學美國，曾任職西南聯大與國民黨組織部；1945年任教育部代理社教司司長，1946-1948年任東北的國立長春大學校長。張純明河南洛寧人，美國耶魯大學博士，曾任南開大學教授、行政院秘書。王季高，湖南常德人，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博士，曾任中央大學教授，北平教育局局長，為朱家驊的親信。

18 顧孟餘本來計劃8月2日從香港程飛機到廣州白雲機場，童冠賢為他買好了機票，可是陳克文去接機時發現他沒有來。童推測「大概因為他恐怕乘機容易給人看見他到了廣州，因此臨時做罷，改乘輪船」。陳克文著、陳方正編輯、校訂，《陳克文日記，1937-1952》，下冊，頁1244-1245。

19 陳克文著、陳方正編輯、校訂，《陳克文日記，1937-1952》，下冊，頁1247-1249。

當大總統時美國與英國不支持孫中山，導致孫後來向蘇俄求助，而有聯俄容共。故美國對自由民主勢力的支持十分關鍵。Clark表示要請示上級，然而他私人覺得美國對於在中國有反共力量的出現，會樂觀其成。²⁰

顧雖然沒有從美國人處得到肯定的答案，然他似乎相信美國應該會支持此一行動。在8月14、15日的會議之後，他開始推動「自由民主大同盟」的籌組工作。邱昌渭（哥倫比亞大學政治學博士、北大教授，長期任職廣西省政府，為李宗仁的顧問）隨即在廣州東山租了一棟樓作為辦事地點。新政團於此舉行第一次會議，選出顧孟餘為主席，童冠賢、程思遠、邱昌渭、黃宇人、甘家馨、李永懋、尹述賢等為幹事，並推童冠賢為書記、程思遠為副書記、周天賢為組織組長、涂公遂為宣傳組長、何義均為政治組長、陳克文為財務組長等。²¹如上所述李宗仁捐了二十萬港幣為開辦費，另補助顧孟餘三萬港幣，一年後又給顧六千美元，大同盟中的幹事、組長每人港幣五千元。這些錢都是在中央銀行總裁劉攻芸（1900–1973）於離職時撥給李宗仁的一筆專款項內開支的。²²

這時新政團因為錢與權而出現了內部的糾紛，如尹述賢即因「用錢受到了指摘」而提出辭職。²³此外支持李宗仁的一批人主要是顧孟餘、童

20 “The Chargé in China (Clark)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 US Department of State,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1949, Vol. 8: The Far East: China* (Washington, DC: The Government Printing House, 1978), pp. 482–483. 其實1949年6月27日香港總領事Hopper就已經向國務卿報告此一組織是由李宗仁結合反蔣、反CC系的國民黨人，組成一個自稱China Democratic Association的團體，該組織並聯合劉斐、黃紹雄等反蔣親共者（劉與黃後均投共），打算與中共談判，謀求和平。此一組織希望得到美國的經濟支援，朝向建立追求民主、反共、親美之政權的方向努力。“The Consul General at Hong Kong (Hopper)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 US Department of State,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1949, Vol. 8: The Far East: China*, p. 399.

21 程思遠，〈我在香港從事「第三勢力」活動的前前後後（上）〉，《縱橫》，1997年第6期，頁21。

22 程思遠，《政海秘辛》，頁234。

23 陳克文著、陳方正編輯、校訂，《陳克文日記，1937–1952》，1949年8月15日，下冊，頁1249。

冠賢等文人，他們對軍人出身的張發奎、薛岳 (1896–1998) 等人有意見。李宗仁對陳克文表示他較欽佩顧孟餘，而瞧不起張發奎與薛岳。根據陳克文的記載，李宗仁說：「張向華、薛伯陵輩對於組織政治團體認識不夠，他們只知道要急速從事，卻不知道這並不是簡單容易的事情」。李宗仁又說：「張向華說，『難道我反不如蔡廷楷〔錯〕嗎？』其實他錯了，蔡廷楷〔錯〕固然不成，連李任潮都不成」。「張、薛輩的頭腦，對於組織政治團體以為憑軍人的見解即可成功，是錯誤的，連李任潮這樣的軍人都不成」。²⁴ 李宗仁雖瞧不起張、薛等人，然而以顧為首的一批文人又不得不與張發奎等軍人合作，結果造成雙方的摩擦。中共席捲大陸之後，大同盟從廣州遷移到香港，內部的矛盾逐漸變得更嚴重。

第二節 張顧集團的形成

1949年10月初，「自由民主大同盟」由廣州移到香港，在九龍福佬村道的街口租了一層樓做為辦事處，顧的秘書谷錫五和童冠賢的秘書劉漢文住於此處。²⁵「這個組織吸收了一些新人，其中有：前清華大學教授張純明、前東北大學校長黃如今、原屬CC派小組組織革新俱樂部立法委員王孟鄰、邵鏡人以及前北平教育局長王季高等」。該同盟的幹事會每週開會一次，由顧孟餘親自主持。²⁶此一組織決議：一、由程思遠、李永懋、陳克文成立財務委員會，經管撥付款項之收支。二、由童冠賢、李永懋、甘家馨成立事業委員會，推展文化工作。三、出版一個期刊，名為《大道》月刊 (共出版了四期) (圖 6.1)。²⁷該刊之宗旨「在以客觀實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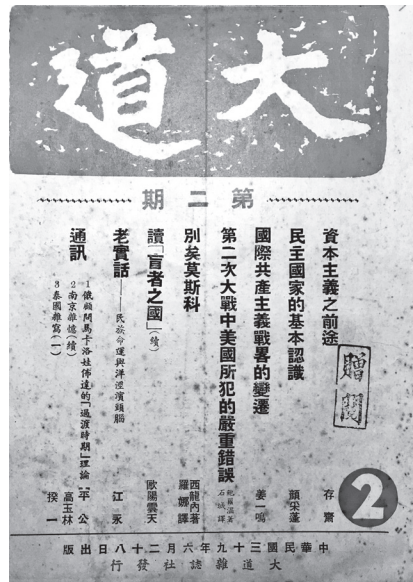
24 陳克文著、陳方正編輯、校訂，《陳克文日記，1937–1952》，1949年8月17日，下冊，頁1250。李任潮即李濟深 (1885–1959)、蔡廷鍔 (1892–1968)。李蔡均為粵軍，抗戰有功，後參加閩變反蔣。1948年組織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響應中共的政治協商。

25 參見周德偉，〈谷錫五先生事略〉，《自由中國》，第13卷第1期 (1955年7月)，頁15–17。

26 程思遠，《政海秘辛》，頁234–235。

27 程思遠：〈我在香港從事「第三勢力」活動的前前後後 (上)〉，《縱橫》，1997年第6期，頁22。

圖 6.1 《大道》第2期封面



之觀察，對於國家社會之一切設施，學術思想之一般動向，予以深刻公平之檢討與評論」。²⁸顧孟餘在該刊以存齋之筆名發表幾篇文章，如〈中國現在所急切需要的是什麼？〉、〈資本主義之前途〉、〈民族之生命〉、〈再論民族之生命〉等。其中〈中國現在所急切需要的是什麼？〉一文，他明確指出中國現在所需要的是：自由民主、法治國家、經濟民主、國家獨立、國家武力等五項。²⁹

28 〈徵稿簡約〉，《大道》，創刊號（1950年4月20日），封底。《大道》雜誌社地址在九龍金巴利道諾士佛台14號；督印人為陳叔高。該刊究竟出版了幾期眾說紛紛，程思遠說只出了兩期，但實際上曾出版四期。台灣大學圖書館最齊全，收藏了第1-4期。

29 存齋，〈中國現在所急切需要的是什麼？〉，《大道》，第1期（香港，1950年4月20日），頁3。存齋，〈資本主義之前途〉，《大道》，第2期（香港，1950年6月28日），頁1-3、7。存齋，〈民族之生命〉，《大道》，第3期（香港，1950年12月5日），頁2-4。存齋，〈再論民族之生命〉，《大道》，第4期（香港，1951年5月15日），頁1-4。

《大道》雜誌出版之後頗受好評，香港曾有報紙評論，「顧孟餘主編的《大道》雜誌，在反共理論上尚能自成一家之言，卻是值得珍重之至。……〔他〕多從經濟觀點立言、議論，發前人所未發。本來反共理論之建立，必須從經濟理論入手，因為共產黨在理論上，體系之精髓悉在唯物史觀之經濟論上，如此點顛撲不破，餘均枝節之談。顧孟餘幾次為表鞭辟入裡之論，不獨同道者馬首是瞻，共產黨中人亦為之側目」。³⁰「《大道》創刊號顧氏以存齋筆名發表〈中國現在所急切需要的是什麼？〉一文，多從經濟觀點立言，議論發前人所未發。《大道》現已發刊至第三期，本期中顧氏仍以存齋筆名發表〈民族之生命〉一文，從社會學之見地，痛論民族與社會改造之關係。……觀乎顧氏發憤為文，猶如老將黃忠，自矜寶刀未老，筆者擲筆而起曰，矍鑠哉，是翁也」。³¹

顧孟餘又請程思遠赴重慶，邀約梁漱溟（中國民主同盟秘書長、政協代表）赴港參加自由民主大同盟。11月5日程思遠乘專車去北溫泉拜訪了梁漱溟。程說「他對顧先生請他去香港的誠意表示感謝」，但他表示：「近兩年來，我立論處世，堅持著兩大原則：一是我只有言論，而不採取任何行動；一是我只是個人特立獨行，而不願附任何組織。所以顧先生的盛意，我只辭謝了」。³²

30 斯人，〈顧孟餘不肯出山〉，《真報》，香港，1955年3月2日。

31 錦江，〈顧孟餘之近作〉，《上海日報》，香港，1950年12月22日。

32 程思遠，〈我在香港從事「第三勢力」活動的前前後後（上）〉，《縱橫》，1997年第6期，頁22。梁漱溟在1976年12月30日與學生陳政（仲瑜）通信時談起此事，他說「全國解放前夕，顧先生在香港，囑谷錫五寫信給我，邀我去香港相會，值航空公司起義，致未成行」。1977年1月9日的信又說：他與顧先生「往昔在北大同事，甚少談話，但後來對於國事政局的行動態度卻往往若有契合。曾聞羅莘田從美國回北京，與我云他在彼間看到顧先生，顧先生談及國內政治上有可能與我合作，此或即解放前夕，邀我赴香港見面之由乎。顧先生今不在矣，不知身故在港抑在美國」。梁培寬編著，《梁漱溟往來書信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上冊，頁223、224。陳政與羅莘田都是梁漱溟的學生。文中所說的「航空公司起義」是指1949年11月9日中國航空公司、中央航空運輸公司飛行員駕機投共事件。參見「兩航事件」，維基百科，<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85%A9%E8%88%AA%E4%BA%8B%E4%BB%B6>（2018年2月2日檢閱）。

當顧孟餘等人在香港籌組第三勢力時，在美國的蔣廷黻也希望組織一個政黨。1949年11月蔣廷黻發起中國自由黨，想仿英國勞工黨的方式草擬組織大綱、主要政綱及組織，其內容並經胡適修正。蔣廷黻當時想邀請胡適出面領導，同時他也致函顧孟餘、童冠賢，邀約顧、童與杭立武在國內共同發起。不過胡適並不支持，顧孟餘也無意參加。11月11日顧孟餘致蔣廷黻函「中國自由黨的組織，弟十分表同情，但弟以種種原故不能參加作發起人」。³³

1949年年底時局生變，11月20日李宗仁從海南島飛抵香港。為因應此一變化，顧孟餘邀約了幾位參與新政團的人士於11月23日發表了一個談話。其內容有兩點：第一點強調反共，認為共產黨所說的「人民民主」就是「無產階級專政」；第二點政治活動需要理論，卻不能迷信理論，要徵召具有眼光與見識的人才。³⁴顧孟餘談到他之所以要反共也因為他對中共的領導能力十分悲觀，他說：「中共的領袖們對於工業城市的治理和外交的知識、能力都太欠缺，不能夠有甚麼成就」。³⁵11月26日顧赴太和醫院探望李宗仁，並支持李宗仁以代總統名義去美國，尋求協助。李於12月5日去了美國。

1950年之時，除了顧孟餘等人之外，香港第三勢力有好幾支力量分頭發展。在台灣的中華民國政府則密切觀察這些變化，並在香港辦《香港時報》，由王世杰任管理委員會主席，社長許孝炎（1900–1980）在香港主持，以蒐集情報與影響輿情。³⁶1950年9月24日，許孝炎曾致函王

33 傅敏、陳紅民，〈哈佛燕京圖書館藏蔣廷黻為組建中國自由黨與胡適等人來往函件〉，《民國檔案》，2015年第3期，頁45。

34 陳克文著、陳方正編輯、校訂，《陳克文日記，1937–1952》，1949年11月23日，下冊，頁1282。

35 陳克文著、陳方正編輯、校訂，《陳克文日記，1937–1952》，1950年1月23日，下冊，頁1296。

36 《香港時報》為中國國民黨在香港所辦的報紙，1939年7月創刊，原名為《國民日報》。1949年8月4日改名為《香港時報》，1993年2月7日停刊。參見「《香港時報》」，維基百科，<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A6%99%E6%B8%AF%E6%99%82%E5%A0%B1>（2017年4月12日檢閱）。

世杰表示「香港第三勢力蓬勃而不可抑止」。不過王質疑此一情報，認為「〔許〕孝炎在港受了民主人士的包圍，多少軟化了，即意志不夠堅強」。³⁷ 1950年10月12日，當時擔任國策顧問、中央銀行監事與《香港時報》管理委員會委員兼秘書雷震得到的消息則說「王震海來訪……告香港第三勢力有三派，一為謝澄平，有徒眾三十人；二為孫寶剛，原有徒眾十人，現只剩有七、八人；三為羅夢冊，有學生十餘人，現另組織社會思潮研究所，由謝澄平接濟」。³⁸ 由此可見當時第三勢力多途發展之情況。

1951年3月，國民黨香港工作組針對「留港華人政治活動現狀」向蔣中正做了一個報告。報告指出當時香港第三勢力有四個主要派系，分別是民主反共同盟、桂系、自由陣線、中國自由聯盟；而主要領導人物有六位：許崇智、張發奎、顧孟餘、黃旭初、謝澄平、任援道。其中關於顧孟餘的近況如下：

顧孟餘：居港已數年，生活淡樸，但政治雄心未減。大陸淪陷，港九人士紛紛從事政治活動，顧亦以超然面目，多方接觸。近雖與許崇智等聯合，但與桂系亦間接有關係。顧之得力幹部蘇民曾為李品仙主皖時之秘書長，兼民政廳長，蘇經常代表顧氏吸收幹部，並與桂省游擊隊聯繫。顧常獲華僑接濟款項，近並有創辦一日報之意。揣顧之野心，顯不欲受任何方面之約束，而自為中心。³⁹

-
- 37 雷震撰，《雷震日記》，收入傅正主編，《雷震全集》（台北：桂冠圖書公司，1990），冊32，1950年9月24日，頁193；1950年10月3日，頁197。
- 38 雷震撰，《雷震日記》，收入傅正主編，《雷震全集》，冊32，1950年10月12日，頁203–204。謝澄平（1905–1992）為青年黨人。孫寶剛（1909–1990），中國民主社會黨人。羅夢冊（1906–1991），法學家，專研法律學與中外法制史，曾辦《主流》雜誌，又應錢穆之邀任教於九龍土瓜灣農圃道的新亞研究所。參見官德祥，〈羅夢冊教授的生平及其歷史應然論〉，《新亞論叢》，期10（2009年6月），頁173–181。
- 39 蘇民，1903年出生，湖南長沙人，東南大學畢業。曾擔任第五戰區司令部秘書。李品仙（1890–1987）為新桂系將領，1939至1948年任安徽省政府主席。

其他人的情況則是「許崇智：主持所謂『民主反共同盟』，並無實力，嘗受李福林之斥責」；「張發奎：擁資甚豐，與許崇智等從事活動，與東京盟總有聯絡」；「黃旭初：擁有鉅資，有赴日之意，曾派程思遠等赴日請求麥帥香港受侵時予以援助，赴菲北某島墾荒」；「謝澄平：原為青年黨中委因反對曾琦、陳啟天而脫黨，獨立活動。得李宗仁之資助創辦《自由陣線》半月刊，與民憲黨伍憲子、李大明呼應，得華僑捐助及美國新聞處之支援，在文化界活動日益開展」；「任援道：與漢奸陳中孚等組『大亞同盟』，與盟總及日本舊軍人有聯繫，經常往返東京香港間，有相當野心」。⁴⁰報告之中又推斷其缺乏經費支援「無法樹立實際力量」，且內部「互不統屬」、「複雜紛紜……不易產生一中心領導人物」（圖6.2）。由上述的情報可知當時第三勢力與外界聯繫之情況，其中主要的外界援助得自李宗仁、華僑捐款、東京盟軍總部、香港美國新聞處及日本軍人等，而內部則頗為分歧，不易合流。

上述的幾股勢力也開始注意到整合的問題。1951年2月12日顧孟餘在程思遠的陪同下與張發奎首度在香港見面，張告訴顧他在一月與美國人哈德曼（Ake Hartmann）接觸的狀況。⁴¹據程思遠記載「顧傾聽時極為注意，似乎抱著期待鴻鵠將至的心情」。張發奎又表示下次見面想找許崇智一起討論，顧對此則有所保留，他認為「許不能保守秘密」。⁴²張之所以建議找許崇智建立合作關係是因為在1951年初之時，許崇智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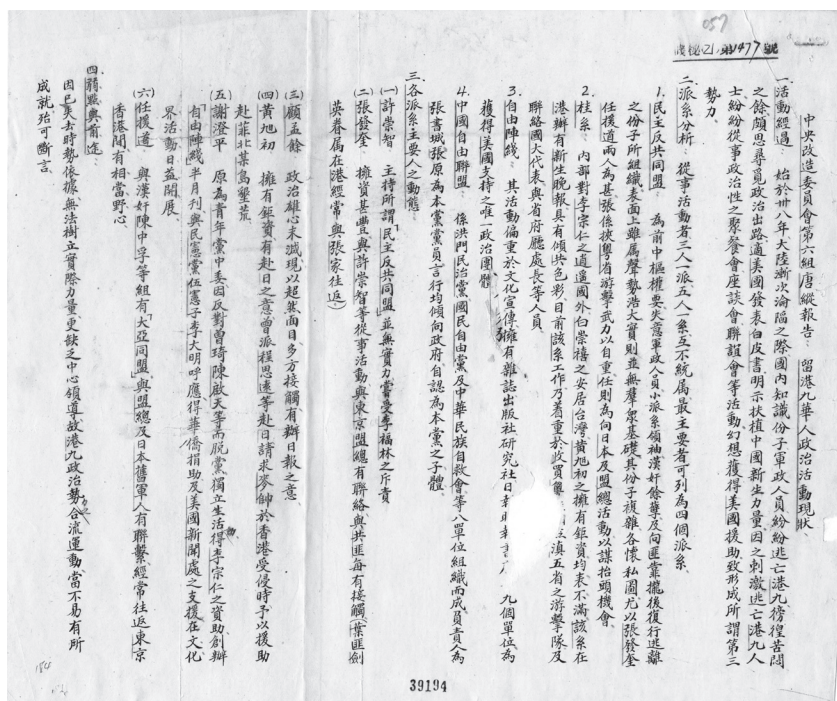
李品仙治皖期間，蘇民為其智囊團，蘇民自1946年開始擔任安徽省政府秘書長。顧孟餘重用蘇民一事也可以看出第三勢力之中汪派與桂系的合作。

40 「唐縱、張其昀呈蔣中正留港九華人政治活動經過及派系分析與各派系主要人物動態等現狀」（1951年3月31日），〈一般資料——民國四十年（二）〉，《蔣中正總統文物》，台北，國史館藏，典藏號：002-080200-00345-057。

41 哈德曼代表美國中央情報局（CIA）的政策協調辦公室（OPC）與張發奎聯絡。有關哈德曼的背景參見Roger B. Jeans, *The CIA and Third Force Movements in China during the Early Cold War: The Great American Dream* (Lanham, Maryland: Lexington Books, 2018), p. 60.

42 程思遠，《政海秘辛》，頁235。顧孟餘認為許崇智觀念陳腐，如果許加入這個團體，他就要離開。張發奎口述，鄭義譯註，《蔣介石與我：張發奎上將回憶錄》（香港：文化藝術出版社，2008），頁485。

圖 6.2 港九華人政治活動現況報告



得到美國的支持，企圖以武力反攻大陸。⁴³他在香港石塘咀設一俱樂部從事政治活動。3月底，許召開大會，通過組織及綱領，由許擔任領袖。顧孟餘、謝澄平與張發奎亦參加。不過該組織內鬨甚烈。⁴⁴5月21

43 有關許崇智與美方聯繫的情況，蔣中正正在1951年2月曾得到情報，「曾由張向華、梁寒操等具文邀請在港黨內外人物，在許寓開會，擬定組織名稱爲『民主反共聯合同盟』，並擬有『大陸游擊計劃』，將由香雅各及安娜（盟總駐港聯絡員）分別帶往華盛頓及東京。美駐港領事亦允代彼輩轉達意見。惟迄今尚無反應。許甚焦急，擬派溫應星赴美，進行美援」。（蕭吉珊呈蔣中正）（1951年2月8日），〈一般資料——民國四十年（一）〉，《蔣中正總統文物》，台北，國史館藏，典藏號：002-080200-00344-049。

44 雷震撰，《雷震日記》，收入傅正主編，《雷震全集》，冊33，1951年2月6、8日，頁31；1951年3月27日，頁69。1951年2月6日雷震與雷嘯岑訪問張國

日，甘介侯代表李宗仁將張發奎、顧孟餘等人三月底在港組織委員會，有二十五名委員的名單與活動等事報告美國國務院。⁴⁵至1951年5月下旬，顧孟餘與張發奎聯手驅逐了許崇智，結合其他力量，成為香港第三勢力的首領，形成了所謂的「張顧集團」。在此過程中，美方亦嘗試調停，後來發現「許並無號召力量，不足成事，決定專心支持張發奎、顧孟餘二人，由張主軍、由顧主政」。⁴⁶此後形成張顧兩人聯合領導香港第三勢力之局面。許孝炎曾將顧、張聯手主導第三勢力的情形告訴雷震：

上午訪許孝炎兄，渠謂許崇智已垮台，顧孟餘與張發奎為首領之組織業已形成，並約民、青兩黨，張君勳名字已列入，王厚生、伍藻池已加入，金侯城未加入，青年黨之李璜原加入，因要統一美援，故謝澄平之《自由陣線》未加入，且謝在《工商日報》登廣告謂李X不能代表青年黨……觀此則第三勢力之組織已實際上形成也。張、顧則謂不能反蔣，下面則有人主張要採用革命的辦法。⁴⁷

孝炎對顧、張主持之第三勢力略有報告，除上面記載外，另有補充。美國有三人參加，二武人，一文人，均自美國來，謂代表美國人民，助中國人民反共抗俄。聞美國人中有一名，名Cocker

燾，張、雷都瞧不起許，張國燾說他「看不起許之為人，只願參加文化運動，不願參加政治團體」；雷說「許之俱樂部在石塘咀，在妓女寓中，許請客一面大談政見，一面懷抱女人，大家都看不起其為人」（頁31）。

45 “Position of ‘Third Force’ Elements (1951),” 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State Bureau of Far Eastern Affairs Office of Chinese Affairs. Digital National Security Archive. Retrieved November 11, 2018, from <https://search.proquest.com/dnsa?accountid=13877>.

46 「張其昀陳雪屏呈蔣中正南方執行委員會許孝炎王任遠來台述職，請定期召見，並抄呈顧孟餘張發奎等醞釀第三勢力近況報告摘要」（1951年6月19日），〈一般資料——民國四十年（三）〉，《蔣中正總統文物》，台北：國史館藏，典藏號：002-080200-00346-028。

47 雷震撰，《雷震日記》，收入傅正主編，《雷震全集》，冊33，1951年5月22日，頁99。

〔Cox〕，⁴⁸與海軍上將現任總統府顧問之名相同；另有一名，名Hartmaun〔Hartmann〕，係一德國式之名字。他們的說法是台灣軍力不夠反攻大陸，而政治又不民主，故需要這個組織。顧、張原送去之名單為八人，美人覺得太少，乃決定二十五人與美人簽字。此二十五人中推常委五人，聞二十五人中有張發奎、顧孟餘、童冠賢、彭昭賢、宣鐵吾、張君勱、李璜、伍憲子、左舜生、謝澄平、黃旭初，另有一許君，許崇智不在內，方覺慧與梁寒操未參加，張發奎下面之五大將領，即卿〔鄧〕龍光、香翰屏、徐景唐、繆培南、張達未在二十五名之內，參加是不成問題。孫系之人則不要，黃宇人及甘家馨亦在二十五人之中，上官雲相在內。據云李德鄰亦參加在內。⁴⁹

許孝炎又說在美國的經濟支持之下，顧張等人計劃「在菲置地千餘畝，辦一大學訓練各種人才，並設一研究所，網羅香港青年及其他人士入菲受訓」。⁵⁰此外，還計劃辦報紙，以海外僑胞為宣傳對象。許孝炎與雷震談話的內容其實是根據他和王任遠（1910–1996）兩人聯名寫給蔣中正的一份報告「顧張等醞釀第三勢力近況」（1951年6月12日）。該報告亦摘錄了張顧兩人的主要理念：張認為此一組織要「容納台灣不能容納之反共力量」；他們反共而不反蔣，然希望「台灣應向開明寬大方向走，以容

48 許孝炎在寫給蔣中正的報告說「美國國務院派代表COOK等三人至港與張顧接洽表示（美代表對外自稱為美國人民代表）」。「張其昀陳雪屏呈蔣中正南方執行委員會許孝炎王任遠來台述職，請定期召見，並抄呈顧孟餘張發奎等醞釀第三勢力近況報告摘要」（1951年6月19日），〈一般資料——民國四十年（三）〉，《蔣中正總統文物》，台北，國史館藏，典藏號：002-080200-00346-028。

49 雷震撰，《雷震日記》，收入傅正主編，《雷震全集》，冊33，1951年5月25日，頁101。

50 雷震撰，《雷震日記》，收入傅正主編，《雷震全集》，冊33，1951年5月22日，頁99。此外，1952年時，美國也在塞班島和沖繩等地秘密培訓一批第三勢力的人，預備將他們送回中國大陸，反抗中共政權。李潔明著、林添貴譯，《李潔明回憶錄——美、中、台三角關係大揭密》（台北：時報出版社，2003），頁54–55。

納反共各黨派組織聯合陣線」。顧孟餘則表示「反共勢力應多方面發展，將來殊途同歸，政治上有一反對力量存在亦可收『制衡』之效」。至於第三勢力所遭到的困難，許孝炎表示包括「許崇智與張發奎不能合作」、「青年黨內部有意見」（「李左〔李璜、左舜生〕不合」），還有其他的「內部矛盾」，例如部分熱心人士，如涂公遂、程思遠、尹述賢及張發奎領導下之粵籍將領等人未能列名，引發不滿。因此許孝炎等建議，在消極方面，應針對組織中各種矛盾，「妥善運用，至少使彼等不能形成一完整之陣線」；積極方面，政府應直接或間接提出反共聯合陣線之主張，召開海內外領導人會議，制訂「反共抗俄救國綱領」。同時「政府對顧張等似應派適當人員從事疏解，不宜採對敵態度」。此一報告由張其昀、陳雪屏轉交給蔣。蔣於6月19日批示：「一、本報告可交蔣經國詳密通知駐菲陳大使查報。二、許王二同志約見」。⁵¹

在1951年中之前，美國對第三勢力的支援，都是以個人名義，或號稱代表「美國人民」，然而實際上背後為國務院與中央情報局。⁵²上述報告指出美國方面的想法是「台灣軍事力量不夠，政治欠民主，而大陸游擊尤不可靠。將來回大陸後，恐我仍走『一黨專政』之舊路，故美國認為有組織第三勢力之必要」。⁵³國民黨中央委員會第六組編印《關於「第三勢力」爭取美國支援綜合報告》曾對1951年3月美國與香港第三勢力聯絡情況有所說明：

51 「張其昀陳雪屏呈蔣中正南方執行委員會許孝炎王任遠來台述職，請定期召見，並抄呈顧孟餘張發奎等醞釀第三勢力近況報告摘要」（1951年6月19日），〈一般資料——民國四十年（三）〉，《蔣中正總統文物》，台北：國史館藏，典藏號：002-080200-00346-028。中華民國駐菲律賓大使為陳質平（1906–1984，1949–1954任大使）。

52 參見Roger B. Jeans, *The CIA and Third Force Movements in China during the Early Cold War: The Great American Dream*.

53 「張其昀陳雪屏呈蔣中正南方執行委員會許孝炎王任遠來台述職，請定期召見，並抄呈顧孟餘張發奎等醞釀第三勢力近況報告摘要」（1951年6月19日），〈一般資料——民國四十年（三）〉，《蔣中正總統文物》，台北：國史館藏，典藏號：002-080200-00346-028。

四十年三月美國國務院派赫特曼 (Hartman [Hartmann]) 及柯克 (Cooke [Cox]) 等赴港，表面以新聞記者身份，調查遠東反共情形，實際則為對在港之第三勢力，負有考察聯絡任務。當時赫特曼即曾對外強調聲稱：美國民間反共團體對中國之新興反共勢力甚表同情，願表支持。……第三勢力各派系對赫等此來，深知其有美國〔國〕務院背景，故趨之若鶩。許崇智、張發奎、顧孟餘，曾分別與赫等先後晤談多次。⁵⁴

另一份許孝炎提供的報告則清楚說明哈德曼 (即上文之赫特曼) 的背景為美國民主黨左翼的駐港代表人，而資金來源為東京盟軍總部新聞處，他的主要工作是「搜集情報，及培植中國新興勢力」。⁵⁵哈德曼所提出的要求是：希望張顧能聯合國民黨、青年黨、民社黨與其他反共力量，結成一個整體，美方才願意資助。然第三勢力內部出現許多矛盾，哈德曼對「許崇智與張發奎、顧孟餘間爭奪領導權」深感失望。⁵⁶1951年10月盟軍總部又派了一位工作人員威廉·拉根 (William Largans) 赴港與張、顧接觸，表示願意協助，並促成港日兩地「民主自由勢力」之合流。張顧要求盟總將韓戰之俘虜交由彼等訓練，拉根表示允與考慮，但後來也沒有落實。⁵⁷在1951年中時，美國也考慮組織一個委員會來處理東亞的事務。九月在舊金山開會，制訂了「自由亞洲委員會」(The Committee for

54 「關於『第三勢力』爭取美國支援的綜合報告」(1953年6月)，〈港九政治性組織〉，《外交部/歐洲司/香港及澳門地區/香港》，台北，國史館藏，典藏號：020-042701-0056。

55 「第三勢力在香港之活動情形」(1954年6月29日)，〈港九政治性組織〉，《外交部/歐洲司/香港及澳門地區/香港》，台北，國史館藏，典藏號：020-042701-0056。

56 「關於『第三勢力』爭取美國支援的綜合報告」(1953年6月)，〈港九政治性組織〉，《外交部/歐洲司/香港及澳門地區/香港》，台北，國史館藏，典藏號：020-042701-0056。

57 「關於『第三勢力』爭取美國支援的綜合報告」(1953年6月)，〈港九政治性組織〉，《外交部/歐洲司/香港及澳門地區/香港》，台北，國史館藏，典藏號：020-042701-0056。

a Free Asia，簡稱 CFA）的辦法。12 月正式成立。根據顧維鈞從中華民國駐美技術代表團代理團長李榦（1901–？）得到的訊息，「該委員會係由嶺南大學教務長香雅各為首的一些知名人士所組成，是由喬治·格林發起的。……該委員會強烈反共，但也並不太親國民黨。實際上，……懷著一種誘發鐵托主義的希望，鼓勵第三勢力在中國大陸出現，而不傾向於把幫助或推進國民黨的事業作為破壞共產黨在大陸統治……他們的背後有國務院和經合署作靠山」。⁵⁸ 如果對照美國中央情報局的檔案，此一協會宗旨的確很清楚：「美國國務院與中央情報局同意，在亞洲有一實際工作需要自由亞洲委員會來執行。此一工作是美國無法經由美國新聞處（USIS）與經濟合作委員會（ECA）來處理的」。⁵⁹ 此後對東亞反共勢力的支持主要由此一單位負責，1954 年之後該委員會改組為「亞洲基金會」（Asia Foundation），繼續執行任務。1950–1960 年代港台許多政論刊物（如《自由中國》、《自由人》、友聯集團的各刊物）均得到此一組織之資助。⁶⁰

58 顧維鈞，《顧維鈞回憶錄》（北京：中華書局，1983–1994），冊 9，頁 470。香雅各的名字是 James McClure Henry (1880–1958)。

59 CIA, “Committee for a Free Asia,” December 21, 1951, Special Collection, Nazi War Crimes Disclosure Act, Document Number (FOIA) /ESDN (CREST): 5197c267993294098d50e90a.

60 雷震從 1951 年開始即透過王世杰之子王紀五協助，請自由亞洲委員會協助《自由中國》，1953 年時該會決定「每期購買五百美金之《自由中國》分送海外華僑」。見雷震，〈雷震致王紀五函（1953 年 3 月 19 日）〉，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藏，檔號：052-02-11-020-009。蔣中正對《自由中國》接受美國亞洲基金會之津貼很不滿意，曾想加以禁止。1958 年 4 月 3 日的日記記載：「反動刊物《自由中國》，美國自由亞洲協會予以扶用金錢津貼，應加禁止」。《蔣中正日記》，1958 年 4 月 3 日。1958 年 11 月 15 日雷震告訴許孝炎 10 月底胡適在美國舊金山曾請亞洲基金會（Asia Foundation）會長 Blum 補助《自由中國》，曾告訴該基金會雷震與《自由中國》受到政府的多方打壓。上文之 Blum 是指 Robert Blum (1954–1962 任亞洲基金會會長)。參見雷震，《雷震日記》，第 39 冊，1958 年 11 月 15 日，頁 398–399。有關《自由人》接受亞洲金會的援助狀況，根據陳克文所留下的該刊財務紀錄，1955 年 4 月至 1959 年 6 月得自「亞洲協會」之金額為港幣 46,900 元。陳克文，「《自由人》財務報表」，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陳方正藏。

1951年時美國在香港支持了許多文化宣傳方面的活動。他們首先支持謝澄平的《自由陣線》、自由出版社。⁶¹在與張顧聯繫之後，美方每個月將一萬美元現款交給張發奎，張再將錢交給顧孟餘，由顧開具收據。顧拿到錢之後指定鄒安眾負責帳務、盧衍明負責管理現款。⁶²這些錢由張顧自行分配，不必向美國人說明分配方式。當時獲得津貼的刊物包括《獨立論壇》(每月8,000港幣)、張君勱的《再生》(每月6,000港幣)、羅吟圃負責的《華僑通訊》(每月8,000港幣)，此外補助陳濯生的

61 謝澄平為青年黨人，1949年底開始在香港辦「自由出版社」、《自由陣線》週刊。根據余英時的描寫「他是一位政治學家，曾在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研究院專攻國際政治。一九四七年七月青年黨參加國民政府，左舜生入閣任農林部部長，謝澄平是他的政務次長，一九四九年流亡到香港之後，由於謝的夫人是美籍華人，他很得美國人的信任，因此他較早獲得美國政府某一機構的大力支持」。見余英時，《余英時回憶錄》，頁133–134。根據台灣的情報，他獲得美國駐港新聞處之資助，「每月補助《自由陣線》美金四千元，除收購《自由陣線》二千冊為抵帳外，餘款即作為謝進行其他文化活動之補助經費」。「關於『第三勢力』爭取美國支援的綜合報告」(1953年6月)，〈港九政治性組織〉，《外交部/歐洲司/香港及澳門地區/香港》，台北，國史館藏，典藏號：020-042701-0056。另一材料則顯示「左舜生無意中透露，謝澄平四五年來花美國人的錢，為數約一千五六百萬元左右」。「第三勢力在香港之活動情形」(1954年6月29日)，〈港九政治性組織〉，《外交部/歐洲司/香港及澳門地區/香港》，台北，國史館藏，典藏號：020-042701-0056。有關《自由陣線》可參考：陳正茂，〈「第三勢力運動」史料述評——以自由陣線週刊為例〉，收入陳正茂，《中國青年黨研究論集》(台北：秀威資訊科技，2008)，頁13–39。區志堅，〈自由なくして生きる道なし：一九五〇年代の香港と『自由陣線』〉，中村元哉編，《憲政から見た現代中国》(東京：東京大學出版會，2018)，頁269–286。自由出版社自1950年至1954年共出版《自由叢書》256種，關於中國歷史、文化與中共問題等主題。謝因自行與美國聯絡，故他不願加入張顧的同盟，擔心經費會因此而減少。有關自由出版社之情況，可參考郭士，〈自由出版社滄桑史〉，收入陳正茂編著，《五〇年代香港第三勢力運動史料蒐密》(台北：秀威資訊科技，2011)，頁73–100。

62 鄒安眾(1898–1967)，湖南新化人，復旦大學經濟系畢業。長期任職於鐵道部門，曾任平漢鐵路局副局長、道清鐵路局長、漢口交通銀行經理等職。盧衍明為商人、住淺水灣，乃澳門富商盧華紹之後人。兩人均與顧孟餘熟識。據說顧當時住在盧的一間房子內。

友聯機構每月1,000元。⁶³經費分配最多的一本雜誌是《中國之聲》。此一雜誌由顧孟餘、張發奎聯合了張君勱、張國燾、李微塵(1904–1974)等人所創辦。⁶⁴《中國之聲》創刊於1951年10月11日，由張國燾主編，宗旨為「反共反獨裁」，每期印數約2,000至3,000本(張發奎說「哪一期《中國之聲》雜誌若刊有顧孟餘或張君勱的文章，我們會印3,000本」)，香港本地可以出售約1,200本。每個月預算為18,000港幣，其後略有增加。⁶⁵此一刊物延續了兩年多，至1953年12月底停刊(圖6.3)。

在該刊創刊號的〈徵稿簡則〉中表示：「本刊旨在宣達人民的正義呼聲。凡本民主自由的立場對中國實況，作客觀詳實之報導；對國內外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等問題，做深刻公正之探討者……均所歡迎」。⁶⁶《中國之聲》前期由張國燾負責，1952年9月之後，因張發奎對張國燾有所不滿，由他所信任的李微塵及林伯雅先後接管此一雜誌。⁶⁷1953年7月1日美國CIA在一份有關香港中文出版品的報告之中對《中國之聲》有如下的介紹：

63 有關友聯出版社的起源、宗旨與相關史料，參見區志堅、侯勵英，〈香港浸會大學圖書館友聯資料介紹〉，《近代中國史研究通訊》，期31(台北，2001)，頁92–10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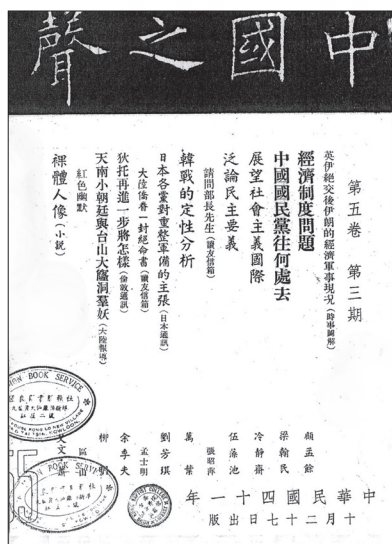
64 李微塵(1903–1977)原籍廣東台山，出生於夏威夷，為李大明的弟弟。李微塵曾就讀於哥倫比亞大學，1924年返中國，投入康有為門下。李微塵在思想上傾向自由主義，加入中國民主社會黨，著有《中國局勢的必然發展》(香港：自由出版社，1950)。後赴南洋，擔任《南洋商報》社長(1957–1960)以及新加坡總理李光耀之新聞秘書。香港友聯出版社的何振亞告訴胡適，李「是一個很有能力又有政治野心的人」。胡適著、曹伯言整理，《胡適日記全集》，第9冊，1957年7月6日，頁296。

65 張發奎口述，鄭義譯註，《蔣介石與我：張發奎上將回憶錄》，頁489, 492–493。

66 〈徵稿簡則〉，《中國之聲》，第1卷第1期(1951年10月)，封面底。

67 張發奎口述，鄭義譯註，《蔣介石與我：張發奎上將回憶錄》，頁501–502。張國燾是被張發奎所排擠，他說「張國燾事實上不適合當領導人。為什麼呢？他的私生活腐化，喜歡打麻將，不關心其他的事。他說話不負責。他把他家的女傭都列到《中國之聲》的員工薪酬冊中」。

圖 6.3 《中國之聲》雜誌卷5期3封面



《中國之聲》(Voice of China) 支持第三勢力。此一雜誌為週刊，代表張發奎與顧孟餘所領導的第三勢力運動。它的主編是林伯雅，廣東人，曾在美國編輯中文報紙。此刊印刷與編輯品質均優良，但是從來不曾很受歡迎。它最高的銷售量是一萬份，但現在降到三千份。⁶⁸

這大致上是1953年中期時該刊之狀況。

在《中國之聲》第一期之上，顧孟餘以「存齋」之筆名撰寫了一篇〈寫於本刊發行之日〉，強調革命之目標在追求「民族獨立」與建立「民主制度」，為此「必須反對一切高度帝國主義用任何口號利用中國為爭霸世界之工具，必須反對極權獨裁之制度及一切集中財產集中事業之試驗」。⁶⁹

68 CIA, "Chinese Language Publications in Hong Kong" July 1, 1953, CIA-RDP80-00810A001600610006-1, Released on March 19, 2003, FOIA.

69 存齋，〈寫於本刊發行之日〉，《中國之聲》，第1卷第1期（1951年10月11日），頁3–4。本文發表之後在香港學界曾引起討論，例如劉百閔撰寫〈為討論而討

1952年10月，顧又發表了〈經濟制度問題〉一文，文中分析了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以及市場經濟與管制經濟的問題，而提出所謂「國家調節下的市場經濟」的觀點，「以社會主義為理想而用市場經濟為器械」。此一觀點認為市場經濟是一個靈活有效的交易分工之工具，「有根本優點」，並與自由思想與自由政治制度相配合，然不能實現社會正義；故應由國家實行「有意識的」調節。不過新的經濟模型不能採取中央管制的計劃經濟，而應採取間接統治、輪廓計劃的「經濟計劃」。⁷⁰此文或可代表第三勢力所主張的「民主社會主義」的基本觀點，一方面不滿蘇聯與中共採取「管制經濟」，只重視經濟平等而箝制人民的政治自由，另一方面亦不滿意英美資本主義所採取的自由放任政策，忽略經濟平等。⁷¹這樣的立場與國民黨的經濟觀點較為類似。此外，《中國之聲》也「鄭重推薦」了當時在香港的六個刊物，分別是《獨立論壇》半月刊（由李永懋、黃宇人、程思遠、甘家馨、涂公遂等人所辦）、《再生》半月刊（張君勱編）、《自由陣線》週刊（謝澄平編，胡欣平、許冠三、陳濯生、余英時等人任編輯）⁷²、《人言報》半週刊（李微塵、黃旭初等桂系所辦）、《自由

論：我對存齋先生提出討論》，《自由人》，第66期（1951年10月20日），第1版。劉百閔肯定顧孟餘所謂「唯有內部建立了真正的民主制度，才能實現國家之獨立，亦唯有保障國家獨立，才能實現真正之民主」，作為政經改革之最高原則。

- 70 顧孟餘，〈經濟制度問題〉，《中國之聲》，第5卷第3期（1952年10月27日），頁3-6。
- 71 例如張君勱在《再生》上撰文，認為第三勢力的四大宗旨為「國家獨立」、「政治民主」、「經濟平等」、「文化自由」。有關冷戰時期香港「民主社會主義」者，如張君勱、孫寶毅、翁青萍、羅夢冊的觀點參見容啟聰，〈民主社會主義在冷戰香港：從理論闡述到參與本地政治〉，《中國文化研究所學報》，第67期（2018年7月），頁229-251。
- 72 1951-1953年間余英時曾在該社擔任編輯，負責「青年專欄」、「科學知識專欄」。他提到胡欣平、許冠三、陳濯生等人，「胡欣平先生，大約比我大八至十歲，東北人，曾留學日本。他有兩個筆名最重要，一是『胡越』，一是『司馬長風』。他對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曾深入研究，凡是批評馬列與中共的文字都用『胡越』之名，但是他又愛好文學，因此寫這一領域的東西則用『司馬長風』四字」。「許冠三先生。他是我的安徽同鄉，比我年長五歲，一九四七年畢業於

人》半週刊(陳克文等編)、《香港時報》日刊(國民黨在香港辦的媒體)。⁷³這些刊物是與《中國之聲》立場相近的盟友。

第三勢力的組織遷移到香港的前後，顧孟餘也受到港台人士的批評。任職於台灣行政院僑務委員會的李樸生，在1950年8月20日寫信給在香港的好友陳克文時表示，顧氏從政的問題在於他雖為人正派又有學問，然書卷氣太濃而缺乏「梁山泊氣概」：

蓋書卷氣雖較官僚氣為佳，但梁山泊氣若不夠，黨將為成為學術團體，而非革命政黨矣。辦黨的人要有種矛盾性格，有學問又要有流氓的氣概，有權術而又要忠於主義、忠於政策。否則流於迂腐，流於譎而不正，皆不是成功的人才。顧孟餘是有學問而沒有梁山泊氣概的人，陳公博以及若干政治人物，都是譎而不正的人！

李樸生又說他勾結軍閥官僚、追求個人利祿，有失學者身份。他說：「存齋(顧孟餘)現在打起鮮明的旗幟來搞，所依附的卻是軍閥官僚，大失學者身份，必無好果。捧李失國人之同情，尤甚於汪昔日之捧閻也。現在他們在香港之作為我想是希望借美人之垂青，在『大世界』撈翻若干名位置而已！豈真反共乎！豈真反共乎！」。⁷⁴香港人士則說顧缺乏組織活力。黃宇人(國民黨立法委員、黃埔四期)在回憶錄《我的小故事》中說：「香港辦事處既未設立，顧孟餘在首次會議後，仍回香港，住處不公開，童冠賢時而澳門，時而香港，很少在廣州。同盟沒有固定的辦事處，又無定期的會議，盟員想找負責人，很難一見……於是，

東北大學……謝澄平是他的老師……一九五〇年他應謝澄平之召而來香港，主持自由出版社編務。」「陳濯生先生。他也是北大出身，在校時即堅決反共，到香港後也曾一度參加過《自由陣線》編輯部」。余英時，《余英時回憶錄》，頁137–139。

73 〈本刊鄭重推薦下列各大刊物〉，《中國之聲》，第1卷第9期(香港，1951年12月6日)，頁11。

74 「李樸生致陳克文函」(1950年8月20日、1952年2月8日)，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陳方正藏未刊函件。

這個組織即陷於若有若無之狀」。⁷⁵陳克文也記載：「外面雖有人傳說，顧先生如何積極的做組黨的活動，實際上十幾日來連開會談話的時間都很少，更說不上有甚麼活動了」。⁷⁶的確，1949年底至1950年初，陳克文日記中不再記載第三勢力的組織活動，顧孟餘、童冠賢，程思遠、甘家馨，乃至批評顧孟餘的黃宇人等人，都在關心生存的問題，或是租屋、或是投資要合股經營小飯店，希望「急功近利」，很快能賺到錢。陳克文描寫他所看到的顧孟餘與童冠賢：

顧先生和童先生約到顧先生的寓裡，談了兩三個鐘頭，都是討論如何維持今後個人的生活方法的。他們想化一點小錢造一所小房子，同時給我一點錢替他們做生意，藉以維持今後的最低生活。他們處在這樣的生活環境之下，怎樣去做政治活動呵。我接受他們的付托，又不知怎樣去對他們負責。⁷⁷

顧、童跟陳克文說「他們說現在他們每人所有的財富都不超過一萬元，都想統統交給我，要我替他們做些生意賺點錢，好維持未來的生活」。⁷⁸後來「童先生交給我四十兩金子，托我給他做生意。生意很不易做，看一班朋友的困難，比自己的困難還要難過」。⁷⁹黃宇人則「十二月底交來港幣三千元，托我〔陳克文〕替他做生意。昨日對我說時間已經不少了，沒有甚麼好消息，想把這一筆錢取回。……他今日和他的太太來取錢，我把本利還給了她，又附一封說明的信。雖然是事實，不能夠

75 黃宇人，《我的小故事》，下冊，頁121。

76 陳克文著、陳方正編輯、校訂，《陳克文日記，1937-1952》，1949年12月24日，下冊，頁1273。

77 陳克文著、陳方正編輯、校訂，《陳克文日記，1937-1952》，1950年1月9日，下冊，頁1293。

78 陳克文著、陳方正編輯、校訂，《陳克文日記，1937-1952》，1950年1月11日，下冊，頁1294。

79 陳克文著、陳方正編輯、校訂，《陳克文日記，1937-1952》，1950年1月13日，下冊，頁1294。

在這短時間給他賺錢，心裡實在是歉然」。⁸⁰由此可見在1950年代初期在香港參與第三勢力者在經濟上為求謀生而出現的窘境。

1952年3月下旬為整合第三勢力，民社黨主席張君勱自印度經印尼、澳洲到香港與張發奎、顧孟餘、童冠賢、張國燾、李微塵等晤面，組織「中國自由民主戰鬥同盟」。⁸¹4月15日蔣收到了張其昀與唐縱有關「張君勱秘密抵港後之行動及各方反應情形」的報告。報告中指出以下幾點：一、張君勱「平時頗以有理想、有幹部、有學術地位、有國際關係自負」。其抵港前先赴澳洲會晤張嘉璈，取得了經濟支持。二、張君勱來港後受「張顧集團」之包圍，只與民社黨人金侯城、毛以亨、伍藻池會面，並「撇開伍憲子、左舜生、許崇智及桂系人物」。三、張君勱與「張顧集團」在對美、對日、對台灣之看法不同，不易持久合作。四、已指示駐港同志針對各方矛盾，因勢利導，加深對張君勱之惡感。⁸²由此可見蔣對張君勱抵港之後情勢有深入之認識。4月27日，張君勱離港赴日，在日本與黃旭初、陳中孚、彭昭賢等晤談，5月4日再從日本飛美國，寓居華盛頓。⁸³5月7日張與胡適共進早餐，胡適表示對第三勢力之

80 陳克文著、陳方正編輯、校訂，《陳克文日記，1937–1952》，1950年2月3日，下冊，頁1298。

81 張君勱於1950–1951年在印度的幾所大學演講中國政治與儒家哲學，1951年12月離開印度。有關此一同盟的簡要敘述請參考Tianshi Yang, “The Third Force in Hong Kong and North America during the 1950s,” in Roger B. Jeans, ed., *Roads Not Taken: The Struggle of Opposition Parties in Twentieth-Century China*, pp. 269–273. 中文版見楊天石，〈50年代在香港和北美的第三種力量——讀張發奎檔案之一〉，收入楊天石，《抗戰與戰後中國》（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7），頁628–634。陳正茂，〈五〇年代香港第三勢力的主要團體——「中國自由民主戰鬥同盟」始末〉，收入陳正茂編著，《五〇年代香港第三勢力運動史料蒐密》，頁45–70。

82 〈台(41)改秘室字第0178號張其昀、唐縱呈張君勱秘密抵港後之行動及各方反應情形〉（1952年4月15日），《蔣中正總統批簽》，台北，中國國民黨黨史館藏，檔號：總裁批簽41/0145。

83 「中國國民黨第七屆中央委員會常務委員會第五次會議紀錄」（1952年12月4日），〈中國國民黨第七屆中央委員會常務委員會會議紀錄（一）/005〉，《陳誠副總統文物》，台北，國史館藏，典藏號：008-011002-00006-005。

發展感到悲觀。⁸⁴他告訴張「與共產黨鬥爭，計算的是兵力，你究有幾師幾團呢？在目前共產與反共大門爭的激流中，不是共產，就應該是澈底的反共，中間決無餘地，可資徘徊猶豫。」⁸⁵

10月10日由顧孟餘與張君勱分別在日、美兩地領銜發表「戰盟」宣言，正式對外公開。宣言隨後刊登於1952年11月10日《華僑日報》之上。⁸⁶此外1952年11月17日《中國之聲》第5卷第6期亦刊登「戰盟」宣言，該期也刊登童冠賢所撰〈讀了自由民主戰鬥同盟的宣言以後〉一文；張君勱主持的《再生》第327期（1952年11月16日）亦同時刊出此一宣言，該期社論以〈民主勢力的再生〉為題，以示感奮。⁸⁷宣言包括「五項信念」、「十二原則」、「四項建議」，其主要內容是結束中共一黨專政與極權制度、建立自由民主政權、軍隊國家化、落實社會福利與教育機會之均等，此一內容表現出冷戰時期兩極化的反共思維，並配合了張君勱自1930年代以來所提倡的社經觀點。⁸⁸同時為避免過度抨擊台灣，據報「李微塵、張國燾等在港起草該宣言時，原另有一段約五百餘字，乃抨擊政府者，後為張君勱、顧孟餘所刪去」。⁸⁹

84 胡適著、曹伯言整理，《胡適日記全集》，第8冊，1952年5月7日，頁759。

85 胡頌平編著，《胡適之先生年譜長編初稿》，第6冊，頁2226。

86 〈中國自由民主戰鬥同盟宣言〉，《華僑日報》，香港，1952年11月10日，第3張第1頁。

87 此一宣言亦刊登於紐約的《聯合日報》與舊金山的《世界日報》（李大明所辦，支持戰盟之報紙）。此外美國國務院中國事務部門的檔案 *Records of the Office of Chinese Affairs, 1945–1955* (Wilmington, Del.: Scholarly Resources, 1989), Reel 27 有一該宣言的英文摘述：“Manifesto of China’s Fighting League for Free Democracy”。參見 Kenneth Kai-Chung Yung, “Chinese Liberal Thought in the Cold War Era: Three Émigré Intellectuals and Their Quest for Liberal Values, 1949–69” (Ph. D. diss., University of Sydney, 2013), pp. 210–211, 218.

88 Kenneth Kai-Chung Yung, “Chinese Liberal Thought in the Cold War Era: Three Émigré Intellectuals and Their Quest for Liberal Values, 1949–69,” pp. 211–216.

89 「中國國民黨第七屆中央委員會常務委員會第五次會議紀錄」（1952年12月4日），〈中國國民黨第七屆中央委員會常務委員會會議紀錄（一）/005〉，《陳誠副總統文物》，台北：國史館藏，典藏號：008-011002-00006-005。

戰盟宣言刊出之後有一位讀者向《中國之聲》投書，表示「貴刊58期轉載的中國自由民主戰鬥宣言，深獲我心。張君勸顧孟餘諸先生的主張，實在是有良心的人們的呼聲，而值得中國老百姓百分之百的擁護的」。⁹⁰美國華盛頓大學教授泰勒 (George E. Taylor) 在戰盟宣言發佈之後，也於1953年4月在《大西洋雜誌》(*The Atlantic Monthly*) 上發表評論。他指出台灣與第三勢力在反共上有不同的意見。台灣以蔣為中心的政權主張「應用共黨的技術」，亦即以「民主集權制」、「一黨專政」來反共。第三勢力則主張「實行民主」，「希望國民政府能把所有反共的中國人團結起來」。泰勒並指出，戰盟的宣言中，除了第三條「軍隊屬於國家，任何政黨或個人不得憑藉武力為奪取政權之工具；現行軍人不得干政」之外，其餘的條文「台灣國民黨似都可以接受的」。即使如此，「台灣國民黨對於台灣以外可能崛起為政治重心的第三勢力仍然不大放心」。泰勒對於第三勢力表示同情，認為「這一群人是需要精神的支持和鼓勵的」。此文刊出之後，《中國之聲》立即將該文摘譯為中文，刊登於第7卷第6期之上。⁹¹

此外，戰盟發起人還簽署了一個「中國自由民主戰鬥同盟生活公約」，希望「認定一個共同的生活方式，懸為理想」，來主動倡導中國社會的改革。公約之內容為：「消除猜忌。力求大公無私，寬宏大度，辨別是非，堅持正義。決不抹殺是非，也不口是心非，歪曲事實、有我無群、退有後言，或尖刻護短。總之，一切傷害感情，損傷群德之事，均須予以糾正」。簽署人為張君勸、張發奎、童冠賢、顧孟餘、張國燾、李微塵。⁹²此一生活公約或許正反映出同盟成員相互間猜忌之情況頗為嚴重。

90 張惠中，〈來函一〉，《中國之聲》，第5卷第8期（香港，1952年12月1日），封底。

91 歐平節譯，〈泰勒教授對中國新勢力的看法〉，《中國之聲》，第7卷第6期（香港，1953年5月11日），頁7。原文出處為：George E. Taylor, "A New Look at Formosa," *The Atlantic Monthly*, Vol. 191, No. 4 (1953), pp. 41–45.

92 楊天石，〈50年代在香港和北美的第三種力量——讀張發奎檔案之一〉，《抗戰與戰後中國》，頁629。

在組織方面，戰盟設有中央委員會，中央委員分別是張君勱、顧孟餘、張發奎、張國燾、許崇智、童冠賢、宣鐵吾、龔楚、蔡文治、謝澄平、劉震寰、黃旭初、程思遠、李微塵、李大明等15人。該盟亦設有七人之「決策委員會」，計有張君勱（在美）、顧孟餘（在日）、張發奎、張國燾、李微塵、童冠賢及宣鐵吾（五人均在港）。戰盟在香港舉行決策會議時，由金侯城代表張君勱、甘家馨代表顧孟餘出席。⁹³戰盟經費主要來自美國中央情報局資助，由該局駐東京盟總之分局代表哈德門支付。此外戰盟還有嚴密的分工，軍事由張發奎、蔡文治負責、政治與組織由顧孟餘負責，宣傳由張國燾、謝澄平負責。⁹⁴其成員約有二、三百人，主要從事文化宣傳活動，辦刊物、報紙，並聯繫各地華僑與反共勢力，如越南、韓國、北美、澳洲、印度等地。此同盟的政治觀點為：一、攻擊史達林統治下，要在共產國家建立「新奴役制度」的蘇聯；二、批評一面倒向蘇聯的中共；三、主張自由、民主、文化與思想的多元，以及私有財產制，並避免貧富差距。⁹⁵

戰盟也從事具體的軍事行動。1952年春天，戰盟與接受美國情治單位暗助、由蔡文治（1911–1994）領導的「自由中國運動」合作。由張發奎在港、澳招募華南地區的流亡青年，赴沖繩美軍基地內與塞班島（Saipan）軍政幹部學校接受軍事訓練，以籌組游擊隊。戰盟也以此為基礎，於1952年中至1953年初發動了幾次對大陸沿海地區的突擊與空投行動，然而這些行動都失敗了。⁹⁶

93 〈台(42)中秘室字第0158號張其昀、張炎元呈中國自由民主戰鬥同盟內部糾紛及張國燾宣告脫盟情形〉（1953年5月1日），蔣中正總統批簽，台北，中國國民黨黨史館藏，檔號：總裁批簽42/0119。

94 汪仲宏譯註，〈台北舊書攤上發現的「總統府秘書長箋函稿」（二）〉，《傳記文學》，卷71期4（1997年10月），頁46。

95 楊天石，〈50年代在香港和北美的第三種力量——讀張發奎檔案之一〉，《抗戰與戰後中國》，頁628–630。

96 林孝庭，《台海冷戰解密檔案》（香港：三聯書店，2015），頁86–91。Roger B. Jeans, *The CIA and Third Force Movements in China during the Early Cold War: The Great American Dream*, pp. 109–135.

在1950年代的冷戰氛圍之下，此一政治主張頗難生存。尤其是1953年以後，美國共和黨政府上台，對台灣轉為積極支持，台灣也要求美國停止支持第三勢力，美國對第三勢力態度因而逐漸冷落。⁹⁷此外，第三勢力內部也有許多矛盾，其中顧孟餘與張君勱「從一開始……就意見不合」，而「美國人對顧孟餘的重視遠甚於張君勱」。顧張的不合首先是因為出身黨派的不同，顧孟餘與張發奎是國民黨的「失聯黨員」；張君勱則是民社黨，而且「不甘心斷絕自己同民社黨的聯繫」。顧孟餘認為張君勱與民社黨之間的牽扯「拖慢了我們建盟的進度」。⁹⁸

在個性方面，張發奎認為顧孟餘、張君勱等名人與常人無異，張「性格不夠強，說得到做不到」，顧的個性過於謹慎小心、膽小怕事，⁹⁹都不適合擔任政黨領袖。當時負責《中國之聲》的張國燾也成為顧、張鬥爭的焦點。張國燾與顧孟餘關係很好，但「私生活腐化」、「手腳不乾淨」，張發奎、李微塵（為戰盟的秘書長、張君勱的追隨者）與童冠賢聯合對張施以壓力，1953年2月間張國燾被「解除文宣組織職務」，憤而辭去決策委員，三月下旬宣告脫離戰盟。¹⁰⁰張國燾的去職在某種程度上反映了顧張兩人在戰盟內部勢力的消長。¹⁰¹再者，從1953年底開始。顧孟餘一直懷疑組織內部有叛徒，希望能重組，並更名；張君勱則同意重組，卻反對更名。顧孟餘與張君勱的矛盾也表現在兩人對現狀之論斷，張發奎說顧孟餘「在存疑的細節慣常是小心翼翼的，他對條件成熟以前

97 程思遠，〈我在香港從事「第三勢力」活動的前前後後（下）〉，《縱橫》，1997年第7期，頁20。

98 張發奎口述，鄭義譯註，《蔣介石與我：張發奎上將回憶錄》，頁488。

99 張發奎告訴黃宇人：「顧孟餘早年在汪精衛的改組派中，即有『取消派』之名，因為有很多事交他去辦，都是大事變為小事，小事變為沒有」。黃宇人，《我的小故事》，下冊，頁143。

100 〈台(42)中秘室字第0158號張其昀、張炎元呈中國自由民主戰鬥同盟內部糾紛及張國燾宣告脫盟情形〉（1953年5月1日），《蔣中正總統批簽》，台北，中國國民黨黨史館藏，檔號：總裁批簽42/0119。

101 萬麗鵬，〈一九五〇年代的中國第三勢力運動〉（台北：政治大學歷史學系博士論文，2001），頁49。

成立正式組織抱有戒心」；張君勱則「過於自信」。¹⁰²此外，戰盟成員對台灣的態度也不一樣。如伍憲子去了台灣，被批評為被蔣所收買，返回之後被張發奎所開除；¹⁰³顧孟餘認為即使對蔣不滿，仍應將台灣視為自由中國的象徵，不應「有攻訐台灣過甚之詞」；¹⁰⁴張君勱則反駁他的觀點，力主批評台灣。張君勱所撰《中國第三勢力》(*The Third Force in China*)一書出版後，顧孟餘在報上發表評論認為其內容矛盾，且對國民黨官員負面批評太多，而「籠統判斷……有損無益」。再者，顧孟餘也反對張君勱的主張，認為蔣反對憲政，故請美國撤回對蔣之援助。顧說：「如果張氏承認『反共為目前第一要事，則美國援助任何反共之人，應為一切中國人所歡迎無疑』」。¹⁰⁵由此可見張君勱與顧孟餘對於台灣抱持著不同的看法。總之，1952–1953年時，一方面美國政策開始轉變，加強對台灣中華民國政府的支持；另一方面第三勢力內在又發生矛盾；再者台灣則嘗試分化第三勢力。這幾個因素造成香港第三勢力的衰微。

第三節 台灣對第三勢力的拉攏與打擊

顧孟餘所領導的第三勢力運動步入衰微與台灣有關。1949年之後台灣對第三勢力採取拉攏與打擊並用的兩面手法。¹⁰⁶1949年11月，當

102 張發奎口述，鄭義譯註，《蔣介石與我：張發奎上將回憶錄》，頁488。

103 張發奎口述，鄭義譯註，《蔣介石與我：張發奎上將回憶錄》，頁490。

104 雷嘯岑在1958年6月7日寫給陳誠的信中表示：「顧氏對政府並不走極端路線，過去張向華等人之『戰盟』即因顧反對其宣言中有攻訐台灣過甚之詞而歸於解體」。「雷嘯岑函論顧孟餘」(1958年6月7日)，〈石叻叢書續編——友聲集下冊/074〉，《陳誠副總統文物》，台北，國史館藏，典藏號：008-010109-00011-074。

105 〈張君勱著第三勢力一書，顧孟餘發表評論，指出張氏論點頗多矛盾之處，實現民主自由須賴自我努力〉，《華僑日報》，香港，1953年7月21日，第2張第1頁。

106 有關1950–1954年間國民黨、第三勢力與美國之間的三邊關係與台灣反對、拉攏第三勢力之作為，請參考Roger B. Jeans, *The CIA and Third Force Movements in China during the Early Cold War: The Great American Dream*, pp. 165–178. 作者主要利用美方檔案與香港第三勢力的材料來做描述。

李宗仁從海南島飛香港將轉赴美國之時，蔣中正派中國國民黨中央黨部秘書長鄭彥棻（1902–1990）自重慶赴港約顧孟餘來台「共同努力」。¹⁰⁷經過陳克文的聯繫，11月23日晚間鄭、顧兩人在跑馬地一個朋友的私宅見面。鄭彥棻代表蔣向顧孟餘表達了問候之意，並再三懇請他去台灣。顧則「頗為冷淡」地表示：「目前的國民政府已經是完全絕望的了，掙扎也屬枉然！」因而無意赴台。然而顧又說「他的反共工作是不會放棄的；他的反共，和目前許多人不同，他要做的是長期的工作，髣髴明末清初的志士一樣；他的努力，說不定要經過一兩百年之後，才能顯出效果來」。¹⁰⁸

鄭彥棻赴港遊說的任務失敗之後，蔣中正仍繼續關注顧孟餘等人在香港的所作所為。1950至1951年他兩度派員赴香港視察黨務，並聯絡反共、非共的中國知識分子與政治人物。¹⁰⁹第一次是1950年10月，雷震奉命赴港，聯絡在港的國民黨立法委員、國大代表與民、青兩黨人士，並成立反共、超黨派之組織「自由中國協會」。¹¹⁰雷震此行並未獲得

107 1949年11月4日，鄭彥棻致電蔣經國，表示將從重慶經香港赴台灣。在港期間順道訪問鄒魯、孫科與王寵惠，「顧孟餘先生處亦欲親與一談，俾明所謂顧童組黨之究竟」。「鄭彥棻秘書長電蔣經國擬赴台灣請示一切順訪鄒魯孫科等並與陳慶雲等面商港澳總支部問題」（1949年11月4日），〈特交檔案（黨務）——中央報告（第〇二二卷）/038〉，《蔣中正總統文物》，台北，國史館藏，典藏號：002-080300-00028-038。此行主要是為了見李宗仁，除了鄭之外從重慶赴港會晤李宗仁的還有居正、朱家驊、洪蘭友等人。程思遠，〈我在香港從事「第三勢力」活動的前前後後（下）〉，《縱橫》，1997年第7期，頁16。

108 陳克文著、陳方正編輯、校訂，《陳克文日記，1937–1952》，下冊，1949年11月23日，下冊，頁1282；陳克文，〈國民黨左派三傑：甘乃光與顧孟餘〉，收入陳方正編輯、校訂，《陳克文日記，1937–1952》，下冊，頁1338。

109 有關這兩次考察及其影響，請參考喬寶泰，〈中央政府遷台初期之中國國民黨港澳政策——雷震、洪蘭友之赴港建議為例（一九五〇—一九五一）〉，港澳與近代中國學術研討會論文集編輯委員會，《港澳與近代中國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台北：國史館，2000），頁627–671。

110 雷震撰，《雷震日記》，收入傅正主編，《雷震全集》，冊32，1950年10月20日，頁208。「下午三時出席自由中國協會，決定章程及幹事人選，幹事為王雲五、左舜生、金侯城、成舍我、許孝炎、卜少夫等七人」。

顯著成效，原因之一是此時台灣當局對第三勢力參與者並不友善。1951年初台灣政府更限制第三勢力人士「尹述賢、甘家馨、邵鏡人、王夢鄰、黃宇人、周天賢、任國榮諸氏」不准入境台灣。¹¹¹此外，台灣也多方限制流亡香港的調景嶺「難胞」入境。¹¹²雷震返台後於11月2日寫了一個報告給蔣，力主團結海外反共力量：

政府方面的反共力量仍應充實擴大。居留海外的反共領袖人物如張君勱、曾琦等應促其返國，而前副總統也應請其回國。留港的孫哲生、顧孟餘諸先生應請其來台居住，以示團結反共力量。留港之立監委及國大代表和友黨人士而急欲來台者，亦應准其來台，例如立委尹述賢、甘家馨、涂公遂、周天賢、任國榮、王俊、邵鏡人、王夢鄰(邵、王係由昆明經臘戍轉仰光來港，請入境證已達三月，在港生活困難，幾被旅館驅逐)，民社黨之戢翼翹(名勁成)及該黨監委毛以亨等。

雷震特別提到「在港生活艱苦之反共人士，如張國燾、顧孟餘等人，政府應有所照顧」。此外雷震還擬訂具體協助約一萬名調景嶺難胞分批來台辦法，並報告「自由中國協會」在香港兩次的開會記錄。¹¹³

1951年1月底蔣又再次派雷震、洪蘭友赴香港聯絡、籠絡粵系、桂系將領與第三勢力人士，「以擴大反共陣營之基礎」，並表達總統的慰問與邀約返台之意。¹¹⁴2月1日，雷震與顧孟餘的秘書谷錫五見面，同進早餐。接著幾天雷震等人會見了彭昭賢(2月4日)、張發奎(2月5日上

111 雷震撰，《雷震日記》，收入傅正主編，《雷震全集》，冊33，1951年1月24日，頁17。

112 周園，〈難民的憤慨〉，《中國之聲》，第2卷第4、5期(香港，1952年1月24日)，頁13-15。

113 雷震，〈給蔣中正的第一次赴港報告、建議〉，收入傅正主編，《雷震全集》，冊27，頁1-19。

114 雷震撰，《雷震日記》，收入傅正主編，《雷震全集》，冊33，1951年1月12日，頁8；冊33，1951年1月24日，頁17。

午)、許崇智(2月5日下午)、張國燾(2月6日,舊曆新年)、李福林(2月8日上午)、伍憲子(2月8日下午)等人。2月9日雷震與張發奎、繆培南、張達、鄧龍光、上官雲相等人聚餐,「蘭友及余吃得酩酊大醉,返後吐了」。¹¹⁵2月11日,雷震與洪蘭友一起去拜訪顧孟餘,「代表總統慰問及歡迎去台之意」;顧孟餘則表達了他對時局的看法,如美蘇鬥爭下,世界大戰將愈逼愈緊;香港內部緊張、中下層政治腐敗;吸收反共青年時,範圍要廣、尺度要寬;許崇智曾邀請他參加組織;印度為美蘇爭奪之戰略地帶等。¹¹⁶1951年3月2日雷震乘船返台。¹¹⁷1951年3月中,雷震向行政院報告此行之觀察與建議,其中特別提到第一次赴港時,第三勢力僅有青年黨謝澄平與民社黨孫寶剛在活動,此次則許崇智亦開始活動,「如左舜生、顧孟餘等,渠均曾自往訪問,且多受其影響。現已開過一次會,訂有大綱組織名稱,即為『中國民主自治聯盟』,並對美國人謂渠等乃由各黨各派所結合,並不反對在台灣之國民政府」。¹¹⁸

此時顧仍然不願赴台,並於三月底,與張發奎參加了上述許崇智的中國反共民主同盟的成立大會。蔣透過雷震再次招安顧孟餘一事未能成功。張發奎等人也對雷震此行亦頗有怨言,「張向華對我等過去到港,未攜總統之函,認為不重視,殊不滿意,甚至對我等身份表示懷疑」。¹¹⁹第三勢力人士對台灣不滿的原因還有:蔣採行一黨專政、發展軍隊黨部、隨意捕人、重用蔣經國、氣度狹小、不准異議者返台、不准「自由中國協會」返台發展組織、不准香港的一些刊物行銷台灣等。¹²⁰這一些抱怨使蔣氏父子感到惱火。

115 雷震撰,《雷震日記》,收入傅正主編,《雷震全集》,冊33,頁27–32。

116 雷震撰,《雷震日記》,收入傅正主編,《雷震全集》,冊33,頁33–34。

117 雷震撰,《雷震日記》,收入傅正主編,《雷震全集》,冊33,1951年3月2日,頁57。

118 雷震,〈向行政院報告〉,收入傅正主編,《雷震全集》,冊27,頁44–45。

119 雷震撰,《雷震日記》,收入傅正主編,《雷震全集》,冊33,1951年3月27日,頁69。

120 雷震撰,《雷震日記》,收入傅正主編,《雷震全集》,冊33,1951年4月16日,頁81。蔣對於廢止軍隊黨部的提議深表不滿,認為「此等行動與匪謀及漢奸無異」。

這時顧孟餘的護照已到期，他向台灣申請展期，以便赴美、日旅行。¹²¹ 4月23日，台灣核准了顧孟餘的出國護照，¹²²以示善意，不過顧孟餘似乎仍無返台之打算。5月3日，中央改造委員會開會，蔣力主開除顧孟餘、張發奎的黨籍，「到中央黨部會議商討中央委員到期未登記者開除黨籍問題，有人以張發奎、顧孟餘二人暫不開除，免其加入第三勢力。余力持反對，以若輩叛黨不只二次、三次也」。¹²³

其後蔣一直密切注意第三勢力之發展，1951年6月19日他閱讀了上述許孝炎、王任遠的報告書，6月29日蔣「召集情報會談」，他的感想是「可知香港所謂第三勢力政客與軍閥，欺詐美國與破壞中央之如何卑劣可笑矣。張發奎、顧孟餘等叛徒，誠漢奸之不若矣」。¹²⁴ 10月23日蔣又說「顧孟餘、張發奎、黃旭初等所謂第三勢力者，聞已離港赴日，其因何在，應加注意」。¹²⁵ 11月26日，蔣在日記中寫到：「最近大陸匪報與

121 〈谷錫五致雷震函〉，收入傅正主編，《雷震全集》，冊30，頁126。

122 雷震撰，《雷震日記》，收入傅正主編，《雷震全集》，冊33，1951年4月23日，頁85。

123 《蔣中正日記》，1951年5月3日。1950年在台灣的國民黨曾通知張發奎要重新做黨員登記，張接受孫科的建議，「把這一紙『指令』扔進了字紙簍」。張發奎口述、鄭義譯註，《蔣介石與我：張發奎上將回憶錄》，頁479。蔣對張發奎一直不滿意，在1949年7月他去廣州之時即在日記中表示：「張發奎聞余來粵，而先避香港，表示其反對本人，不惜反叛之決心，並明示效忠桂系之精誠，此皆余對叛逆者屢赦妄用，不咎既往之過誤。凡自十五年以來廣東一般軍官由余提拔、赦免、重用者，今幾無一人知恩感德，而且只懷怨恨，希圖報復矣。豈只張逆一人而已哉，此實為平生重大教訓之一也。」《蔣中正日記》，1949年7月16日。

124 有關蔣中正對於顧孟餘、張發奎等醞釀第三勢力之態度，可參考陳三井，〈蔣介石眼中的香港自由民主運動〉，收入黃自進、潘光哲主編，《蔣介石與現代中國的型塑——領袖的淬鍊》，第1冊，頁575-582。

125 《蔣中正日記》，1951年10月23日。蔣的資訊可能來自外交部，外交部檔案中藏有1951年10月20日的一則抄自《自由人》報的一則訊息，「（本報專訊）息影居此之反共人士張發奎、顧孟餘、黃旭初、童冠賢等人，最近已離港日，張並攜其夫人同行，此去有何任務，及是否短期內仍回香港，則即詢諸張等親友，

香港所謂第三勢力報《中國之聲》周刊皆一致攻擊我父子，尤其對經國詆毀無所不至。此張發奎、顧孟餘等敗類投機求美不成，乃決心降匪，願供其驅使反誣，不惜為共匪反蔣之工具也，惟有置之一笑」；次日又說「閱顧孟餘等所出之《中國之聲》，對余父子攻訐侮辱甚於共匪，顧、張等自知其忘恩負義，罪在不赦，乃不得不投共以自救也，其果自救乎，亦自殺耳」。¹²⁶ 蔣氏所看到的文章應該是1951年11月15日出版的《中國之聲》第1卷第6期的社論〈我們對台灣的態度〉一文。這一篇文章的緣起是「伍憲子事件」。伍憲子原為中國民主憲政黨主席，1946年民憲黨與國社黨合併為中國民主社會黨後擔任副主席，1951年在「重金引誘下」赴台灣參加雙十國慶，由蔣中正接見，並被安排與美國大使館官員見面。¹²⁷ 台灣藉此來抗議美國一方面表面上支持台灣，另一方面「又支持張、顧在香港搞第三勢力來破壞台灣」。美國不得已才考慮撤回對張、顧之支持。¹²⁸ 張、顧等人對台灣收買伍憲子一事深惡痛絕，因此顧孟餘、張國燾、李微塵共同商訂，由李微塵執筆寫了這一篇社論。¹²⁹ 文

亦均謂彼等均無所知云」。外交部立即請香港方面查詢此事，11月30日香港回報情報司，「張發奎……並未打算往任何地方。顧孟餘蹤經多方探悉，已於最近赴日」。「駐日代表團電外交部呈報第三勢力在日本活動情形事」（1951），〈港九政治性組織〉，《外交部/歐洲司/香港及澳門地區/香港》，台北，國史館藏，典藏號：020-042701-0056。該則簡報原始出處為邵一成，〈張發奎等赴日有何任務外間尚無所知〉，《自由人》，1951年10月20日，第1版。

126 《蔣中正日記》，1951年11月26、27日。

127 蔣中正於10月7日宴請伍憲子與李福林，「晚宴伍憲子與李福林等，伍為前民社黨副領袖，政客色彩甚濃，為一學者而已」。《蔣中正日記》，1951年10月7日。當時謠傳伍憲子拿了台灣三萬美元。1952年9月伍憲子向他的學生胡應漢表示不必理會這些流言，他去台灣是因為「凡反共者即是朋友，即須合作。台灣當局幾度相邀，台灣是中國反共基地，我何故不去，我平日雖不滿意國民黨之一黨專政，然為了反共，即無意算舊帳，即須並肩作戰。我去台即本此觀點而去」。胡應漢，《伍憲子先生傳記》（香港：作者發行，1953），頁96。

128 程思遠，《政海秘辛》，頁238。

129 程思遠，《政海秘辛》，頁234。

中批評蔣的個人獨裁，以及「視國家為其個人所有的私產觀念」，「成為今日中華民族的毒瘤」；此外蔣「近數年來對其兒子的培育與拔升，近年來令其兒子從事對軍隊的控制，這些都是蔣先生培育傳人的跡象」；¹³⁰「以一國元首之尊，退到相當於行政專員管治的細小區域，仍然不知覺悟……我們從蔣先生錯誤的觀念來看，我們亦認定是蔣先生根本不行」。該文的結論是：

蔣先生個人獨裁的政權是今日中國的毒瘤。這毒瘤已使民主政治在中國流產，今日又使台灣無法進行有效的反共鬥爭。這個毒瘤如果不即時割治，它可能陷中華民國的台灣和反攻基地的台灣於淪亡……這毒瘤的割治，是急不容緩的。如果蔣先生能夠悔悟，也許還可以用民主方式來治療這毒瘤，他當知如今已快到最後自處的時候了！否則無情的歷史是有其割治這毒瘤的途徑的。¹³¹

再者，1951年11月22日出版的《中國之聲》第7期則刊有〈華僑起來〉、〈國民黨執政二十五年的歷史教訓〉均針對「蔣氏視國家為個人私產，對僑民從不關懷」、蔣氏統治下「國家的法律制度，皆隨個人為轉移，此種政治，當然是獨裁政治」而有所批評。¹³²

這些批評使蔣感到十分不滿，而認為顧、張等人乃以反蔣來作為「投共」之資產。蔣又下令將此案交中央改造委員會，就「《中國之聲》周刊屢次刊載攻訐政府及詆毀元首文字，在我宣傳上應有所措置」提出討

130 此時蔣經國擔任國防部政治部主任、中國青年反共救國團主任。根據CIA的情報與口述訪問，蔣經國的救國團與調查統計局聯合起來打擊在香港的第三勢力，此舉可能也引起第三勢力對蔣經國的不滿。Roger B. Jeans, *The CIA and Third Force Movements in China during the Early Cold War: The Great American Dream*, pp. 167–168.

131 〈我們對台灣的態度〉，《中國之聲》，第1卷第6期（香港，1951年11月10日），頁2–3。

132 任仲時，〈華僑起來〉，《中國之聲》，第1卷第7期（香港，1951年11月22日），頁2–4。譚時實，〈國民黨執政二十五年的歷史教訓〉，《中國之聲》，第1卷第7期（香港，1951年11月22日），頁5–8。

論。經大陸地區工作指導委員會與第四(掌管宣傳)、六組(掌管資料收集與對共鬥爭)會商，在報上投書反駁。¹³³反駁的文字刊於陳克文主編的《自由人》之上，作者蘇辛，文章的名稱是〈論毒瘤：與《中國之聲》記者提出商討〉。文中反駁蔣氏為毒瘤之說，認為他是一個「真誠的愛國者」；真正的毒瘤是「日帝侵略」與「俄帝侵略」。最後該文呼籲「反共人士應當大家團結；人人有責任，人人要悔過」。¹³⁴12月1日蔣又再次在日記中批評第三勢力的幾位領導「所謂香港《中國之聲》一群，顧孟餘、張發奎為汪精衛改組派之餘孽，張國燾為共產黨之垃圾，今皆以反蔣為其投共之資本。但一面偽裝反共，又反蔣也，可知惡肖終為惡肖，乃可得一定理，只有好人變惡，決無惡人變好之理，感化云乎哉。一生革命經驗至此，方敢下此定理也」。¹³⁵

《中國之聲》的〈我們對台灣的態度〉一文中，將蔣稱為「毒瘤」也使台灣的一些人士感到不滿。當時僑委會副委員長李樸生因而撰文批評第三勢力，1952年3月3日，他寫信給他的好友陳克文：

弟評擊「第三勢力」張君勱大為不滿，函蔣勻田提及兄以為缺乏涵蓋，弟當承認，但當知此稿是寫于〈我們對台灣的態度〉以後，他們罵蔣先生是毒瘤，是夠涵蓋麼？如果《中國之聲》諸先生前日在彌敦道躬逢衝突之盛，不嚇得面無人色者，庶幾好漢耳。此輩書生，以為寫文章可以反共，真發夢也！如彌敦道事件再有三兩次發

133 〈台(40)改秘室字第0567號張其昀、鄭彥棻呈為顧孟餘等在港創辦《中國之聲》散播反動言論經指示海外各地黨部黨報予以駁斥謹報請察核由〉(1951年11月29日)，《蔣中正總統批簽》，台北，中國國民黨黨史館藏，檔號：總裁批簽41/0458。有關中央改造委員會的組織與職掌參見楊瑞春，《中國國民黨大陸工作組織研究：1950–1990》(北京：九州出版社，2014)，頁17。

134 「《中國之聲》案」(1952年1月2日)，〈港九政治性組織〉，《外交部/歐洲司/香港及澳門地區/香港》，台北，國史館藏，典藏號：020-042701-0056。其中收有剪報，蘇辛，〈論毒瘤：與《中國之聲》記者提出商討〉，《自由人》，香港，1951年12月5日，第2版。

135 《蔣中正日記》，1951年12月1日。

生，恐李、顧諸先生紛紛要到美國去矣。弟非刻薄，蓋艱難惟一死，理學名家尚且偷生變節，何有「第三勢力」之軍人、政客、書生乎？¹³⁶

文中所謂的「彌敦道躬逢衝突之盛」是指3月1日之時，「粵穗慰問團事件」在尖沙咀引發的警民衝突。此事件的起因是九龍城大火，焚毀數千房屋，造成一萬多人無家可歸，中共要派慰問團前往，被殖民地政府阻止。香港左派因而與警方發生衝突。示威群眾向警署投擲石頭，並焚燒警署懸掛之英國國旗，造成不小的騷動。李樸生藉此表示第三勢力撰文批蔣之不當，並說明反共需要實力，「此輩書生，以為寫文章可以反共，真發夢也！」。

1952年9月，蔣又派洪蘭友赴港聯絡第三勢力人士。洪發現「顧（在東京）張一派諸人號召屢瀕失敗，仍鼓其餘勇，醞釀其未來之組合。但非此時，亦非此地，似亦不足深慮」。¹³⁷1952年11月13日，蔣希望美國「不再製造第三勢力」。1953年2月18日，蔣提及在美國與日本的第三勢力，「在美、在日之反動叛亂分子以第三勢力為名，竭力作祟造謠。彼等實已來歸無顏，賣空技窮，不得不如此也，可憐而已，惟有一笑置之」。¹³⁸在1953年的日記中，蔣多次提到美國的對華政策重點有二，一是積極扶持第三勢力，一是期待朱毛與南斯拉夫的狄托一樣會與蘇聯分途發展。¹³⁹直到1958年，他仍在日記中大罵「第三勢力」之人「對於政客

136 「李樸生致陳克文函」（1952年3月3日），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陳方正藏未刊函件。李顧是指李微塵、顧孟餘。

137 〈台(41)改秘室字第0383號張其昀呈〉（1952年9月12日），《蔣中正總統批簽》，台北，中國國民黨黨史館藏，檔號：總裁批簽41/0307。

138 《蔣中正日記》，1952年11月13日；1953年2月18日。

139 「美國對華政策，其內容與前無異，而且其培植第三勢力與對朱毛為狄托之幻夢至今更烈矣，若不自強，何以復國」，《蔣中正日記》，1953年4月18日。「美國現政府對華政策，仍在積極培養第三勢力，以牽制我政府，並準備乘機替代，其方法之拙劣極矣。但其此種幼稚行動，只有付之一笑」，《蔣中正日記》，1953年4月20日。「美國在三月間復派駐華大使呈遞國書，但其國務卿杜勒斯對承認中共與培植中國第三勢力，以及期待毛匪變為狄托之幻想並未消除」，《蔣中正日記》，1953年12月31日，「本年總反省錄」。

以學者身分向政府投機要脅以官位與錢財為其目的。伍憲子等騙錢，左舜生要求錢，唱中立，不送錢就反腔」。¹⁴⁰對他來說，顧孟餘即屬於此類「卑劣可笑」之人。

台灣一方面拉攏第三勢力成員，另一方面也派遣情治單位聯絡香港政府，打擊第三勢力與「匪共」。1950年曾任總統侍衛長、廣州警察局長之黎鐵漢（1904–1965，黃埔軍校第二期畢業）¹⁴¹曾與香港政府政治部副主任摩里遜（外文原名不詳）交換意見，「彼意，如時間一到，則香港與台灣即攜手合作」。此外，黎建議蔣中正「現刻在港活動與第三勢力有關人士，應分別與之接頭，設法鼓勵其來台。上次伍憲子來台，對第三勢力打擊甚大。其態度頑固曖昧者，則利用香港政府打擊之。如顧孟餘、鄧龍光等經港府傳訊申斥後，即不敢再活動」。此外他還建議「設法慫恿香港政府多方打擊匪共之工會……其餘匪方所劫持之學校報館，亦應注意利用香港政府打擊之」。¹⁴²由此可見台灣所採取的拉攏與打擊的兩面手法。

香港政府對第三勢力並無好感。顧即在1952年受到港府的傳訊申斥，兩度警告要他停止從事政治活動。¹⁴³據記載：「香港政府政治部突

140 《蔣中正日記》，1958年5月10日。

141 黎鐵漢在1950至1952年間在香港、菲律賓等地蒐集情報，根據駐菲律賓大使陳質平致葉公超函「黎鐵漢君與李福林交誼甚篤，熟悉兩廣地下人物情形，其與東南其他省地下組織常有聯絡」，「駐菲律賓大使館電外交部呈報美國在菲律賓組織中國第三勢力事」（1951年7月2日），〈港九政治性組織〉，《外交部／歐洲司／香港及澳門地區／香港》，台北，國史館藏，典藏號：020-042701-0056。

142 「黎鐵漢呈蔣中正對香港及東南亞工作意見書」（1952年3月20日），〈中央情報機關（四）〉，《蔣中正總統文物》，台北，國史館藏，典藏號：002-080102-00013-007。

143 張發奎口述，鄭義譯註，《蔣介石與我：張發奎上將回憶錄》，頁500–507；鄭義，〈張發奎指揮兩次從蒲台島反攻大陸夭折〉，收入鄭義編著，《國共香港江漢戰》（香港：香港文化藝術出版社，2009），頁349；程思遠，《政海秘辛》，頁239–240。程思遠則說：「張發奎曾向顧孟餘保證，說他與港督葛量洪（Sir Alexander William George Herder Grantham）有交誼，顧在港搞政治活動不會受到什麼干擾。可是『戰盟』成立三個月後，顧即被港府警局政治部找去談話，

請顧孟餘去談話，問他是否在香港搞政治活動？是否常去張發奎住宅開會？顧皆否認。政治部的英國官員警告他說：『倘若你再在香港進行政治活動，我們將把你驅逐出境。』從此，顧就與張發奎等人疏遠。¹⁴⁴事實上，除了顧孟餘之外，其他人也遭到英方約談與警告。例如張君勱於1952年3月訪問香港時，「港府警務處政治部向他下達三張傳票應訊」，張君勱離港之後，「港英當局搜查了張君勱居住的妹妹家」。¹⁴⁵其他第三勢力的參與者也不例外，「港政府受共匪方面來港之壓迫，一再傳訊民主人士到政治部去談話……張國燾達七次之多，〔左〕舜生、〔劉〕百閔諸人均有二次，即伍憲子亦不能免，張發奎態度強硬，顧到台灣坐牢，亦不會到政治部，結果政治部派人來談，勸大家不要作政治活動」。¹⁴⁶在港英政治部的壓力之下，1952年中顧孟餘離開香港，轉赴日本發展。顧孟餘離開之後，香港第三勢力運動因力量分裂而日益衰微，顧孟餘的政治生涯也步入尾聲。此時他或許不曾料想到，在他生命的最後二十年，給予他最實質的、經濟上的支持者是蔣中正。

警告他：『如在香港搞政治活動，我們就把你驅逐出境。』顧立即從他的香港堅尼地城寓所搬到九龍花坪球場附近小街的童冠賢家裡暫住，不久又避居東京」。程思遠，〈我在香港從事「第三勢力」活動的前前後後（下）〉，《縱橫》，1997年第7期，頁20。

144 林博文，〈一九四九年後的香港第三勢力〉，《亞洲週刊》，第24卷第2期（2010年1月），頁32-35；劉小清、陳悅，〈顧孟餘與香港「第三勢力」〉，《民國春秋》，1997年第6期（1997年12月），頁43-47。

145 張發奎口述，鄭義譯註，《蔣介石與我：張發奎上將回憶錄》，頁491。

146 雷震撰，《雷震日記》，收入傅正主編，《雷震全集》，冊33，1951年10月2日，頁169-170。百閔為劉百閔（1898-1969）。

第七章

步入尾聲 (1952–1972)

1952年至1972年的20年是顧孟餘生命的最後一個階段。1952年5月他從香港去了日本，在此從事第三勢力運動，致力於文化與教育等「文化冷戰」的活動，不過成就十分有限。1955年他退出政壇，從日本去美國，與夫人在加州柏克萊附近、面對海景的 Scenic Avenue 的一棟房子住了14年。1969年他因病而不良於行，決定返回台灣，三年之後過世，和胡適、傅斯年等人一樣「歸骨於田橫之島」，葬於台北六張犁的墓園。1975年蔣中正與顧氏的夫人韋增瑛亦相繼過世，顧蔣兩人的歷史恩怨劃上句點。

第一節 第三勢力在日本的文化冷戰

當第三勢力在香港的發展受到港英政府的限制之時，許多人都認為第三勢力應轉至日本發展。當時盟軍總司令部為日本最高統治機構（統治時間為1945年9月2日至1952年4月28日），該機構對中國瞭解不足，希望透過赴日的「民主人士」蒐集有關中國的情報。不過盟總並不積極地支持第三勢力的活動。根據黃旭初所述，盟總不願「多管閒事」，他們只能做到以下兩點：一、准許入境（偷渡入境者，如無違法事件亦

准居留)；二、默許反共團體的存在，但不公開扶植反共力量。¹此一態度已經比港英政府要好得多了。

1951年初雷震二度赴港，聯絡滯港人士。他與左舜生談話時，左表示不願去台灣，「擬去日本，與日本、朝鮮連繫，認為日本關係我國前途甚大，應多方與其聯絡，並擬出一中日合璧之刊物，從事兩國文化工作。觀其意似與目前渠在某一場合所云第三勢力要在日本產生同一語調也」。²雷震於三月返台之後向政府所提交的報告也提到「一、由於國際局勢之演變，自本年三月十七日起，外國人赴日本，統由盟總核准改為自日本核准，故多願走日本路線確係事實。……二、第三勢力方面，現在準備在日本創辦刊物，如謝澄平已出有刊物，孫寶剛、孫寶毅仍在籌辦」。³1952年3月張君勱去香港時，鮑大可(A. Doak Barnett, 1921–1999)曾在他妹妹處訪問張君勱對第三勢力組織的看法。張表示他想要將第三勢力從一個潛在的組織轉變為一個實際的組織，不過此一工作在香港，由於對政治活動的限制，是不可能的；但他相信在日本可以實現。⁴

顧孟餘顯然與左舜生、張君勱等人抱持著同樣的想法，1952年5月他離開香港去了日本。⁵有關顧孟餘在日本推動第三勢力的史料非常的少，我們只能依賴片段的材料描繪他在此一階段的活動。根據張發奎的記載，「顧孟餘決心去日本。他起行前三天，才通知我們。……我對此事一無所知。我問顧，他說他再也不能忍受港英政治部的折磨了……

1 黃旭初，〈一九五一年初旅東瀛雜憶〉，收入黃旭初，《黃旭初回憶錄：從辛亥到抗戰》(台北：獨立作家，2015)，頁251。

2 雷震撰，《雷震日記》，收入傅正主編，《雷震全集》，冊33，1951年2月14日，頁38。

3 雷震，〈向行政院報告〉，收入傅正主編，《雷震全集》，冊27，頁48。

4 Roger B. Jeans, *The CIA and Third Force Movements in China during the Early Cold War: The Great American Dream*, p. 81.

5 顧自香港赴日本的時間有幾個不同的紀錄，有些材料說是七月、八月，然而根據張發奎與顧到日本之後寫給王世杰的信(1952年9月17日)，表示到日本約三個月，因此他很可能是五月底時離開、六月抵達。

顧孟餘秘密搭乘一艘日輪赴日。他的朋友李先生，一名歸國的留日學生，為他安排一切，此人是汪偽政權成員，戰後移居日本的。日本人向顧提供一臂之助，你要知道，顧孟餘進入日本是豁免使用護照的」。一開始他住在九州的別府，後來搬到京都、東京。張發奎又說顧並不是與他商量好之後才赴日，而是「自己決定去日本的」。⁶這也顯示顧、張之間並非融洽無間。

顧孟餘赴日本發展第三勢力後行事十分低調，不過不久蔣中正就得到了情報。1952年7月21日，張其昀與唐縱向蔣報告了「張發奎顧孟餘李璜等赴日活動情形」，指出彼等「試圖與美方駐日軍政人員直接取得關係」，蔣批示「張顧等行動希再查實」。⁷1952年8月，香港報紙也刊登了「顧孟餘所領導之第三勢力有將活動重心移轉東京之訊，傳將組織『中國自由戰鬥同盟』」，不過《中國之聲》雜誌在「讀友信箱」中說明，「顧孟餘先生的行動如何，此際尚未見有事實表現，恕無從臆斷」。⁸

1952年9月，總統府機要室指示外交部轉告中華民國駐日本大使館，「顧孟餘於七月初旬乘船赴日。入境證由聯軍總部代辦。顧此次赴日目的仍在促成張君勱、張發奎、李宗仁等『第三勢力』分子聯合運動，並就近與聯軍總部商談援助問題」，「希即查明具報」。10月15日，駐日大使館就回報了此事。1953年1月又有後續報告。兩次報告的內容有以下四點：一、顧孟餘於八月初由香港潛赴日本，⁹最初住在京都，後搬到東京本鄉三丁目何益之（1905–1978）的家中，因行蹤暴露而再遷移他處。¹⁰顧來日之後形跡隱密，不敢公開活動。二、顧來日之前，六月時

6 張發奎口述，鄭義譯註，《蔣介石與我——張發奎上將回憶錄》，頁500。

7 「台(41)改秘室字第0304號張其昀、唐縱呈張發奎顧孟餘李璜等赴日活動情形」（1952年7月21日），《蔣中正總統批簽》，台北，中國國民黨黨史館藏，檔號：總裁批簽41/0246。

8 〈讀友信箱：陳士衡來信〉，《中國之聲》，第4卷第10期（香港，1952年9月4日），頁29。

9 顧孟餘赴日的時間應為該年五月底、六月初，此一時間有誤。

10 何益之，本名夏文運，為遼寧大連人，日本京都帝大法政科畢業，能操流利日語。何原來擔任日本駐華南各機關的華語譯員，後為李宗仁吸收，擔任中

即命甘家馨與美國國務院駐日代表詹森聯絡，決定顧孟餘、童冠賢等人赴日與美方交換意見。三、顧來日之後與韓雲階、彭昭賢往返頗密，擬組織「中國民主建國同盟」。四、顧與美方接觸之後，並無任何特殊進展，「美方對之並不如何重視」。¹¹從這個報告可以大致瞭解顧孟餘來日初期的情況。

顧孟餘從香港到日本發展第三勢力一事並非臨時起意，而是經過規劃。這一動向必須放到當時「東亞冷戰」的架構之中方能理解。第三勢力是美蘇對抗之下的產物。美國在東亞一方面遂行軍事與外交的圍堵政策，同時進行意識形態的鬥爭。第三勢力在此背景之下被認為有助於宣傳、圍堵乃至武裝對抗共產勢力，才得到美國的援助。如上述報告顯示，顧孟餘來日之前即派遣甘家馨（江西人，曾赴日本留學，入早稻田大學學習社會學，1948年當選立法委員）來日本與美國方面聯繫，美方也有意將「戰盟」遷到東京，加上香港政府不准從事政治活動的壓力，才使顧孟餘決心赴日發展。¹²他赴日的主要目的是想將「中國自由民主戰

方情報員。抗戰時期何提供了許多重要的日方情報。李宗仁口述、唐德剛撰寫，《李宗仁回憶錄（下）：唐德剛作品集10》（台北：遠流出版社，2010），頁618–619，689–690。有關何益之的生平事蹟，參見「夏文運」，百度百科，<http://baike.baidu.com/item/%E5%A4%8F%E6%96%87%E8%BF%90>（2017年4月12日檢閱）。亦參見其所撰寫的日文回憶錄：夏文運，《黃塵万丈：ある中国人の証言する日中事変秘録》（東京：現代書房，1967）。根據該書的作者介紹，夏文運在中日戰爭結束時他擔任山西省建設廳長、北京行營主任李宗仁之秘書。1951年亡命日本，曾為「國鐵總裁秘書室囑託」，後於東京新宿的京王百貨店經營中華料理新渝園。

11 「關於顧孟餘赴日聯合『第三勢力』事」（1952年10月），〈港九政治性組織〉，《外交部/歐洲司/香港及澳門地區/香港》，台北，國史館藏，典藏號：020-042701-0056。

12 甘家馨赴日的行程也為台灣的情治單位所掌控，根據蔣得到的情資，甘家馨與李荇庭於五月中旬赴日，經由在日本美軍總部服務之丁鼎標（案：應為丁廷標，江蘇泰興人，1906–1959）介紹，與美軍總部情報部及美國國務院駐日代表人詹遜接觸。詹遜希望香港之中國民主人士「能來京一談」。甘於6月8日啟程返港，向張顧等人傳達了詹遜之意。顧孟餘方決定赴日。「台（41）改秘室字第0304號張其昀、唐縱呈張發奎顧孟餘李璜等赴日活動情形」（1952年7

鬥同盟」的總部自香港遷至日本。事實上戰盟在日本東京設立辦公室，並在《中國之聲》上發表通告。顧孟餘等人與日本第三勢力人士的接觸大約始於1951年底。上文曾談到1951年10月蔣就已經得到情報，得知第三勢力的人打算去日本發展。後來顧孟餘前往日本，張發奎則留在香港。與顧同一時間赴日的人還有桂系的黃旭初與陳維周（陳濟棠胞兄），他們帶了李宗仁寫給在日本第三勢力運動首腦陳中孚（1882–1958，曾留學日本，國民政府成立後，陳中孚成為中國國民黨中的西山會議派成員，後擁立吳佩孚；汪政權成立後，擔任國民政府委員與中國國民黨中央監察委員；汪政權倒台後，赴日從事「日華親善」活動）的一封親筆信，於1951年10月16日抵達東京。上述接待顧孟餘的何益之前往迎接。¹³黃旭初的行蹤為台灣情治人員所掌握。12月外交部將「黃旭初到日後活動情形」呈報給蔣中正。此一報告除了詳細報告黃旭初的住所、租金、聯繫人物與活動外，還附了一封上述的「李宗仁致陳中孚函」及「在日本之第三勢力分析調查表」（圖7.1、7.2）。¹⁴

根據此一報告1951年底之時，在日本的第三勢力有一複雜的網絡，他們的參與者之中有多位屬於汪派分子。日本第三勢力分子（也包括既反蔣也反共的台獨主張者）不但與盟軍總部有聯繫，且與香港、上海等地的第三勢力都有聯繫。根據台灣方面所得到的情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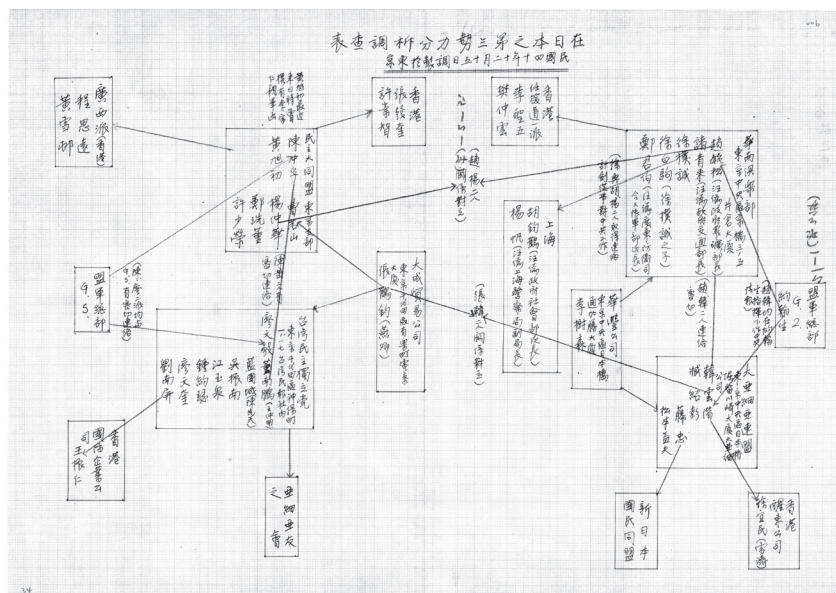
月21日），《蔣中正總統批簽》，台北，中國國民黨黨史館藏，檔號：總裁批簽41/0246。

- 13 黃旭初回憶錄提到「一九五一年秋間，我東遊日本，船抵東京，即承何益之先生偕舊友來接。從此得與何先生往還數年之久」。黃旭初，〈李宗仁口述的一位愛國情報員〉，黃旭初，〈黃旭初回憶錄：廣西前三傑：李宗仁、白崇禧、黃紹竑〉（台北：獨立作家，2015），頁173。有關黃旭初抵達日本的生活情況，參見黃旭初，〈一九五一年初旅東瀛雜憶〉、〈東遊見聞再記〉，收入黃旭初，〈黃旭初回憶錄：從辛亥到抗戰〉，頁249–253、254–260。黃旭初於1951年10月9日自香港啟行，14日下午三時抵達橫濱。因遭遇颱風，16日方抵達東京入關。
- 14 「黃旭初到日後活動情形及李宗仁致陳中孚函及在日本之第三勢力分析調查表」（1951年12月，〈中央情報機關（四）〉，《蔣中正總統文物》，台北，國史館藏，典藏號：002-080102-00013-006。

圖 7.1 李宗仁致陳中孚函(抄件)



圖 7.2 在日本之第三勢力分析調查表



所謂在日本第三勢力分子如趙毓松、曹若山、楊仲華、韓雲階，及台灣獨立派黃南鵬、江玉泉等輩較為接近。替其活動最為賣力者計有陳中孚、楊仲華、曹若山、及何運（京都大學畢業生）。以曹若山、何運二人較為出力，且所發行宣傳刊物《民主勢力》雜誌即由該二人主編。

當時日本的第三勢力又可為三大系統：華南俱樂部（趙毓松、諸青來等）、大亞細亞連盟（韓雲階、臧紹彭等）、民主大同盟（陳中孚等）。韓雲階（1894–1982）早年留學日本，畢業於名古屋高等商業學校；曾任滿洲國新京特別市市長、財政部大臣、經濟部大臣；他與曾任滿洲國產業部次長的岸信介（1896–1987，安倍晉三的外祖父）關係很好，赴日後得其協助而經商致富。趙毓松（1897–1971）早年參加中國青年黨，1940年加入汪政權，出任農礦部部長兼中央政治委員、¹⁵司法行政部長、銓敘部長等，1950年亡命日本，在日本結交了韓雲階，並受閻錫山之指示，從事反共的言論與活動。再者，他又結交了曾任滿洲國國務總理秘書官長的松本益雄，而得其援助。¹⁶台灣的報告指出在三大系統之中，趙與韓聯繫密切，而且都受盟軍總部約翰生的指揮，從事情報收集之工作。此外，華南俱樂部與香港的汪派人物任援道、李聖五、樊仲雲，以及上海的胡鈞鶴（曾任「汪偽政府社會部次長」）、楊帆（「汪偽上海警察局副局长」）均有聯繫。

15 1940年3月汪兆銘任命趙毓松、諸青來等人為南京附日政權之中央政治委員。〈汪逆兆銘指定偽中央政治委員會委員名單（周佛海等十九人為指定委員、齊燮元等十一人為延聘委員）〉（1940年3月24日），《一般檔案》，台北，中國國民黨黨史館藏，檔號：一般715.1/68。

16 松本益雄、古沢敏雄，《迎春花——趙毓松の中國革命回顧録》（東京：明德出版社，1978）。松本益雄生於門司，14歲時即曾赴中國，後入外務省擔任外交官在中國各地服務，滿洲國建國即進入該國政府服務，從昭和10年（1935）至戰爭結束擔任國務總理張景惠（1871–1959）的日本秘書。他與韓雲階熟識，後經由韓而認識趙毓松，兩人成為好友。

至於陳中孚所領導的「民主大同盟」(主要成員有曹若山、楊仲華、鄭洗蒼、許少榮等)一方面與盟軍總部情報署建立關係，¹⁷另一方面則與香港第三勢力之中的張發奎、許崇智，以及桂系的程思遠、黃雪邨有直接接觸；同時他們與廖文毅、黃南鵬等「台灣民主獨立黨」亦有聯絡。如上所述，當黃旭初赴日之時，李宗仁寫了一封親筆函，由黃旭初、陳維周帶到日本面交陳中孚，請陳對赴日工作之黃旭初等人「費神照拂一切」，此外並附一函給即將出任首相的日本政治人物鳩山一郎(1883–1959，1954–1956年繼吉田茂出任日本內閣總理大臣)。李宗仁希望藉此能促成中日反共人士的聯合，尤其是香港與日本第三勢力之攜手合作。根據台灣的情報，黃旭初到日本後聯絡的日本人如下：

〔黃〕到東京後由和知鷹二、池田宗之進、佐藤信夫、清水董三等介紹與日本方面人士晤談。其主要人物計有自由黨廣川弘禪(自由總務會長)、植原悅次郎(自由黨外務委員會會長)；民主黨三木武夫(幹事長)、千葉四郎(調查會長)；社會黨右派野河密、西尾末廣及鮎川義介、久原房之助、山田純三郎、重光葵、河相達夫(日濠協會會長)、齋藤昇(國警長官)、田中榮一(東京警察總監)、大川周明(日本二二六事變幕後人物)等。

這些日本政治人物很可能也是顧孟餘企圖聯絡的對象，不過第三勢力聯絡日本政治人物的工作似乎並無成效。

除了聯絡日本政治人物之外，香港與日本第三勢力另一個合作的具體表現是香港「戰盟」的《中國之聲》與東京的《民主勢力》兩雜誌締結姊妹刊物，相互呼應，李宗仁並允諾由黃旭初、陳維周給予日本報刊經濟援助。台灣方面的情報指出：

香港顧孟餘一派所主辦之《中國之聲》與東京《民主勢力》為姊妹刊物，互相呼應，展開宣傳戰。其宣傳目標在「打倒中共」、「改造國

17 「何世禮電蔣經國及保安司令部」(1951年11月5日)，〈一般資料——各界上蔣經國文電資料(十五)〉，《蔣中正總統文物》，台北，國史館藏，典藏號：002-080200-00662-079。

府」。查東京之《民主勢力》其發行總數為五千份，每份原價為日幣十元。該刊物資金由佐藤信夫（前偽滿鐵路東亞經濟調查員與陳中孚至交）向日本三井礦山旭化成等公司商借。並由楊仲華、黃南鵬等向華僑方面籌募。其不足之數，由黃旭初、陳維周等設法墊付。¹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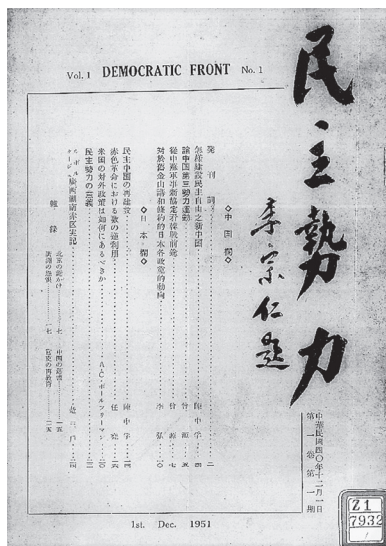
在東京出版的《民主勢力》雜誌延續的時間可能只有兩三年，中文編輯為曹若山、日文編輯為栗本一夫（前上海滿鐵事務所職員）。其社址在東京目黑區上目黑4-2245，黃旭初與陳中孚等人常在此會談。在日本東京東洋文庫圖書館目前保存了1951年12月1日發行的第1卷第1期，以及1952年1月15日發行的第2卷第1期。這兩期的封面均由李宗仁題字（圖7.3），在發刊詞中編者說明了該刊之宗旨：

這個刊物叫做「民主勢力」，在這裡我要簡單地說明我們辦這個刊物的意義，及其命名的理由。中國祇有兩種勢力，正在掌握著政權，鞭策統治著人民。一種是：獨裁包辦「家天下」的勢力；一種是：專制極權「黨天下」的勢力；他們都是在壓迫摧殘民主勢力。……有人或者說，你們這個刊物是不是在宣揚第三勢力？我們可以乾脆地回答，是的。我們所宣揚所主張的第三勢力，就是反獨裁反共產，反對一切禍國殃民的勢力，而要建立起實現真正的民治民有民享的民主國家，和自由和平幸福的民主世界的，堅強的，偉大的民主勢力來！¹⁹

18 「黃旭初到日後活動情形及李宗仁致陳中孚函及在日本之第三勢力分析調查表」（1951年12月），〈中央情報機關（四）〉，《蔣中正總統文物》，台北，國史館藏，典藏號：002-080102-00013-006。《民主勢力》與《中國之聲》的聯繫狀況究竟如何仍須進一步研究。1952年2月5日，李微塵曾表示「本刊與陳中孚在東京所主辦的《民主勢力》月刊，除間接——還沒有直接——作習慣上的刊物例行交換外，亦未嘗有任何的往還」。見李微塵，〈關於「中國民主黨」——答覆由於這問題所引起的一些疑問〉，《中國之聲》，第2卷第6期（香港，1952年2月7日），頁2。

19 〈發刊詞〉，《民主勢力》，第1卷第1期（東京，1951年12月），頁2–3。

圖 7.3 《民主勢力》封面



《民主勢力》為「中國民主大同盟」的機關報，以中日雙語出版，該組織一方面希望建立民主勢力的統一戰線，另一方面則積極地聯絡日本人，不要對中共存有幻想，應瞭解中共的真相，並呼籲祇有中日之間的友好關係，才能使日本建立起安定的經濟與向上發展的文化。²⁰此一理念與顧孟餘的想法是一致的。

1952年4月中華民國駐日代表團又向外交部與總統府發了一份美港日三地第三勢力政治關係分析圖（圖7.4、7.5）。²¹將李宗仁——許崇智的整體勢力依照軍事、政治與財政分為三大塊，張發奎負責軍事、顧孟餘負責政治，另外還有財政方面的負責人。這些台灣情治單位所繪製的圖表不一定反映實情，卻可以幫助我們瞭解當時人們所認定，由美、

20 陳中孚，〈中國民主勢力と日本：同憂の士に告ぐ〉，《民主勢力》，第2卷第1期（東京，1952年1月），頁12-15。

21 「在日第三勢力之分析」（1952年4月10日），〈港九政治性組織〉，《外交部/歐洲司/香港及澳門地區/香港》，台北：國史館藏，典藏號：020-042701-0056。

日、港三地所構成的東亞冷戰架構下各方人馬、各個組織交互聯繫的可能情況。其中香港第三勢力的核心是李宗仁為首的廣西派、張發奎與許崇智的廣東派，以及以孫科為首的「反國府立法院團體」，其中包括梁寒操、顧孟餘、宣鐵吾、劉航琛、黃冠吾、王雲五。日本的第三勢力有陳中孚（西南派）、楊仲華（連日派）、羅堅白、曹若山（民社黨系）、胡蘭成、鄒平凡（青年黨系）、韓雲階（東北系）等人。²² 胡適則列為在美國的「自由民主黨」。

顧孟餘到日本之後即與陳中孚、韓雲階、彭昭賢等人聯合，希望得到美國與日本的支持。1953年6月國民黨中央委員會第六組所撰寫《關於「第三勢力」爭取美國支援的綜合報告》中，談到「在日第三勢力人士與美方之接觸」，其中記載：「顧孟餘、黃旭初等人去日後亦先後與杜德、詹森等人聯繫，但並無具體發展。及日本獨立，彼等乃轉向日本政治人物方面活動，希能獲得奧援」。²³ 此外，顧氏當時在日本擬「創立一所學校訓練第三勢力的青年與幹部」，後來創辦了一所商業學校。他又設立一個編輯委員會，從事英文、法文、德文的翻譯工作，由李聖五（1899–1985，亦曾任職於汪的國民政府，擔任司法行政部部長、中央政治委員會指定委員、教育部長、外交官等）負責，童冠賢亦承攬部分翻譯工作。顧孟餘和童冠賢也努力爭取日本政府及「自由亞洲學會」資助海外中國（主要是港澳及東南亞）學生到日本讀書，²⁴ 由韓雲階、²⁵ 田之炫、

22 有關日本第三勢力之人物研究並不多，其中較受關注的是胡蘭成。參見金文京、濱田麻矢，〈日本亡命後の胡蘭成——保田與重郎との關係を中心に〉，中文研究会編，《未名》，第19期（2001），頁87–105。原始材料可參考胡蘭成等致唐君毅函。薛仁明主編、杜至偉，顧文豪箋注，《天下事，猶未晚（胡蘭成致唐君毅書八十七封）》（台北：爾雅出版社，2011）。

23 「關於『第三勢力』爭取美國支援的綜合報告」（1953年6月），〈港九政治性組織〉，《外交部／歐洲司／香港及澳門地區／香港》，台北，國史館藏，典藏號：020-042701-0056。杜德是美國駐遠東總部情報處上校 C. C. Dutt；詹森是美國國務院駐日工作人員 C. Johnson。

24 當時東南亞有三千萬華僑，而教育資源不足，是一個十分值得開發的市場。

25 韓雲階與相模大學常務理事山口重次（1892–1979，1919年進入滿鐵；1935–1937年曾任滿洲國奉天市副市長）熟識，兩人在滿洲國時期因處理馬占山問題

彭昭賢 (1896–1979，1948年6–12月曾任行政院政務委員兼內政部長，為自由亞洲學會之代表)等與日方聯絡，²⁶並由香港中正中學校長韓文溥協助招生。²⁷日本方面配合此一培養人才計劃的學校是在東京的亞細亞大學 (原為興亞專門學校、亞細亞學園，1955年改為亞細亞大學)，在該校成立時彭昭賢曾募捐一萬美金做為該校之基金。亞細亞大學由太田耕造 (1889–1981，校長任期為1954年5月–1981年11月) 出任校長，由顧孟餘、錢穆等人任該校董事。校中設立日語專修班，每年在港澳招生，²⁸1958年後並與香港新亞書院交換學生。²⁹1954年1月29日有96名港

曾共事，成為莫逆之交。中國留學生本擬赴相模大學留學，後相模大學因校內有人反對而變卦，故由亞細亞大學接手。韓在接洽的過程之中扮演重要角色。亞細亞學園創立五十周年紀念學術論文集編纂小委員會編，《太田耕造の思想と教育》(東京：亞細亞大學，1991)，頁393–394。

- 26 彭昭賢「曾留學莫斯科大學，講一口流利的俄語，在一九二〇年代克里姆林宮中的政要之中，他有不少的同學和朋友，他對俄國的理解，兼有現地考察與書本理論上的兩方面的東西」。司馬桑敦，〈蘇俄問題專家彭昭賢談反攻大陸：不能過於期待大陸飢民暴動〉，《聯合報》，1962年3月20日，第3版。有關彭昭賢之生平參見：彭昭賢、盛世才著，蔡登山編，《彭昭賢、盛世才回憶錄合編》(台北：獨立作家，2014)。他表示「在東瀛除了擔任亞細亞大學一個中國留學生部的名義外，大部的時間，都在家裡讀書閱報，過著韜光養晦的淡泊生活」。見上書頁188。
- 27 藤原繁，〈突発した留学生問題〉，藤原繁先生追悼集刊行委員会，《藤原繁先生追悼集》(東京：藤原繁先生追悼集刊行委員会，1979)，頁187–188。張發奎口述，鄭義譯註，《蔣介石與我——張發奎上將回憶錄》，頁503。此書記載有誤，中正中學在香港，而非台灣；校長是韓文溥。按中正中學成立於1947年，是國民黨港澳總支部為慶祝蔣中正六秩華誕所建之學校，韓文溥為海南海口人，當時擔任國民黨港澳總支部負責人。梁寶龍，〈中正勞工子弟義校〉，香港工人的故事博客，2013年9月4日，http://leungpolung.blogspot.tw/2013/09/blog-post_4.html (2017年8月10日檢閱)。
- 28 〈東京亞細亞大學設日語專修班〉，《華僑日報》，香港，1957年6月4日，第1張第4頁。
- 29 有關兩校的交換關係與太田耕造之生平，可參考譚汝謙，〈屹立在亞洲廣場上的太田耕造先生〉，太田耕造全集編集委員會，《太田耕造全集 (第三卷)》(東京：亞細亞大學，1984)，頁370–401。這兩個學校在冷戰時期發展之比較，

澳學生抵達日本入學，其後每年均有十多名留學生來校，彭昭賢表示1950年代中後期時，該校約有百餘名港澳學生。³⁰

顧在日本所參與推動這些計劃似乎沒有太多成效，然而日本的生活經驗對他來說也是一個新的衝擊。1952年9月17日他曾寫信給王世杰，談到在日本的見聞，「弟於三月前自港來日，觀摩所及，感慨殊多。此邦內政文化，確有根底，而教育普及，工業發達，尤為亞洲各國之冠。是以六年以來際逢時會，恢復舊觀，知其非偶然也。弟在此曾見日人著述與中國近代對外歷史及各地資源有關係，而為我國人未之前聞者頗多。確係寶貴資料。鄙意亟應介紹於國人，以供將來實用。兄其有意加以提倡乎？」；王世杰回了一封很客氣的信，「久疏函候忽已數年，昨接九月十七日手書，藉諗兄已自港赴日，並正從事日本著作物之研究，至為欣慰……承示研究日人對華資料事，弟自樂觀其成。弟未審微力能否為有效之協助耳。尊體及嫂夫人想均康吉，勿復不盡，即頌近安」。他也將顧來信之事報告蔣，然在呈報之時表示他與顧「數年未通訊，此信之來甚為突然」。³¹ 顧孟餘初抵日本即寫信給王世杰應無疑地是希望能與台灣當局保持某種程度的聯繫。

參見李培德，〈亞洲主義在冷戰時代的香港和日本——以錢穆創辦新亞書院和太田耕造創辦亞細亞大學比較〉，「東亞歷史上區域間的認識與互動國際研討會」會議論文，北京大學，2011年11月11日-12日。此文後正式發表：Pui-Tak Lee, "The Re-Adoption of Asianism in Postwar Hong Kong and Japan, 1954-57: A Comparison between Ch'ien Mu and Ota Kozo," *The Journal of Northeast Asian History*, Vol. 13, No. 1 (Seoul, Summer 2016), pp. 55-76.

- 30 有關港澳學生赴日留學，參見〈港澳學生赴日留學〉（1954年1月至1956年3月），《外交部/東亞太平洋司/日本/文教》，台北，國史館藏，典藏號：020-010105-0040。彭昭賢與該校之關係，參見「司法行政部調查局情報報告」（1958年2月12日），〈立法委員監察委員國大代表中央執監委員調查冊等〉，《蔣經國總統文物》，台北，國史館藏，典藏號：005-010208-00020-007。
- 31 「顧孟餘致王世杰函」（1952年9月17），「王世杰致顧孟餘函」（1952年10月3日），〈往來函電〉，《王世杰檔案》，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藏，檔號：302-01-03-11-655。

顧孟餘在日本所從事第三勢力的活動多半都是秘密進行，只有在1953年初，有一公開活動。1953年初他曾在東京與日本新聞界耆宿阿部真之助(1884–1964)對談，談話內容以〈中共の現状とその運命〉為題，刊登於1月15、16日《東京新聞》之上(圖7.6)。後來翻譯為中文，刊登於《中國之聲》。³²阿部為東京帝國大學社會學科畢業，曾任東京《每日新聞》總編輯、主筆、董事，著述頗豐。他在日本是一位具有自由精神之風骨的政治評論家。此文刊出之後甚受關注。台灣的情治單位也密切注意此一報導，並於1月17日立即由駐日大使董顯光(1887–1971)向外交部長葉公超、行政院長陳誠與總統府秘書長王世杰報告，並將顧氏的言論摘譯為中文，呈報蔣中正。這一報告指出：首先，在東京的「戰盟」已由秘密活動轉為公開活動，其宗旨為「反共與反獨裁」，其言論主要在批評中共之虐政。其次，顧認為台灣之兵力不如大陸，如要反攻大陸需配合陸海空軍，且需得到大陸民眾之歡迎。換言之，反攻大陸不只是軍事問題，政治問題更為重要。再者，顧也指出台灣反攻大陸涉及世界性戰略問題，中共的背後為蘇聯，蘇聯如崩潰則全盤問題可以迎刃而解。³³

這一篇談話可以反映顧孟餘在日本從事第三勢力運動時的基本理念。他所從事的教育與文化事業都是為了配合此一理想，從思想、文化上瓦解中共與蘇聯。不過這方向也顯示，無論是台灣的反攻大陸之規劃或第三勢力所從事的種種工作，都是美蘇冷戰的一個環節。受制於國際環境，而且第三勢力的一個致命傷是缺乏軍事實力，所以只能從事「文化冷戰」。1953年12月28日，《中國之聲》在出版了兩年兩個月之後宣布停刊。在此之前美國人曾表示想支持顧孟餘在日本繼續從事反共宣

32 阿部真之助、顧孟餘，〈中共の現状とその運命〉，《東京新聞》，1953年1月15、16日。顧孟餘，〈中共現状及其運命(在東京談話)〉，《中國之聲》，第6卷第4期(香港，1953年1月26日)，頁3–5。

33 「關於顧孟餘赴日聯合『第三勢力』事」(1953年2月11日)，〈港九政治性組織〉，《外交部/歐洲司/香港及澳門地區/香港》，台北，國史館藏，典藏號：020-042701-0056。

圖 7.6 〈中共の現状とその運命〉



傳，張發奎表示：「顧說：『對不起』，他不想再在日本從事任何活動」。³⁴

《中國之聲》停刊的主因是得不到美方經費的支援。1953年共和黨政府上台之後，美國外交政策有所改變，不再積極支持第三勢力。1953年7月1日，上午九點半，蔣中正與外交部長葉公超在台北介壽館接見美國大使藍欽(Karl L. Rankin, 1898–1991, 1953年4月2日到任，圖7.7)。藍欽談到美國對第三勢力政策的轉變：

藍欽：余擬略談所謂第三勢力問題，去年夏季余返美時，曾與主管方面談及此事，未得端倪。……此次余在華府，曾與中央情報局局長艾倫杜勒斯等該局負責人商談四五次，余所得之印象，為彼輩已決定放棄對第三勢力之援助，也許在數月之內，美方將要求貴方之合作，主要在請容納若干人士……進入台灣。

34 張發奎口述，鄭義譯註，《蔣介石與我——張發奎上將回憶錄》，頁505。

他又向蔣說明美國支援第三勢力的經費和支援西方公司的款項「完全相等」，³⁵後來又將第三勢力之款項分撥一部份支援李彌部隊，故「現則用於第三勢力之經費，愈來愈少」。³⁶兩個月之後，美國停止援助第三勢力之政策已落實。1953年9月1日，藍欽與葉公超的談話表示：「本人力向美政府建議，為對貴國政府表示絕對支持，美國政府理應將以前所支持各種『第三勢力』之組織，立予終止支持，本人此項建議，曾蒙敝國政府原則上接受，最近本人接奉敝國政府通知，謂此項組織活動……不日即可全部結束」。³⁷

顧孟餘表示不願意在日本從事反共宣傳應該是因為他已感受到前景黯淡。其實從1953年秋天開始，顧孟餘即多次致函張發奎檢討盟務。10月31日，他認為組織內部有奸細，希望能徹底重組戰盟。1954年1月1日，他又致函張發奎、童冠賢，希望肅清組織之內間諜、破壞分子、投機政客、好出風頭者、妄言妄動者等。1月30日，顧再次致函張發奎，要求思考戰盟之方向，他主張「只宜由少數穩健可靠同志，相互作精神上之聯繫，而不可為形式上之組織；只宜作事實與理論上之研

35 西方公司 (Western Enterprises Inc., WEI) 為美國派駐於台灣的機構之一，於1951年2月在美國匹茲堡正式註冊成立，由最早開始與中華民國政府進行秘密接觸的查理·詹斯頓 (Charles S. Johnston) 擔任董事長，威廉·R·皮爾斯則負責主持西方公司駐台北辦事處的業務。西方公司表面上是民間公司，但實際上隸屬於美國中央情報局，是一個秘密機構。其成員為自美軍各戰鬥單位選出的七十多位精銳軍官團組成，負責訓練中華民國國軍。1955年初結束運作。「西方公司」，維基百科，<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A5%BF%E6%96%B9%E5%85%AC%E5%8F%B8> (2018年11月11日檢閱)。

36 「總統蔣中正與美國大使藍欽談話記錄」(1953年7月1日)，〈港九政治性組織〉，《外交部/歐洲司/香港及澳門地區/香港》，台北，國史館藏，典藏號：020-042701-0056。藍欽的回憶錄也記載了他與蔣的見面。Karl Lott Rankin, *China Assignment* (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1964), pp. 142, 166–167. 亦參見下書 Roger B. Jeans, *The CIA and Third Force Movements in China during the Early Cold War: The Great American Dream*, p. 171.

37 〈駐台大使與台外交部有關第三勢力的談話〉，收入陳惠芬輯，《美國與中國「第三勢力」》(香港：了然軒，2013)，頁183。

圖 7.7 蔣中正與藍欽(1953年4月2日)



究，而不可為公開之號召」。3月，張發奎派童冠賢訪日，與顧孟餘商量戰盟改組問題；顧提出七條意見，引發盟內成員之討論。1954年9月8日，顧孟餘因對戰盟改組、易名等事與張發奎意見不合，自東京發函退出戰盟，「今茲決定，與當時所商根本不同，弟不得已只得退出公司，以後一切概不負責」。³⁸接著張君勱在美國也宣稱退出戰盟。³⁹1954年12月1日，中國國民黨第六組駐港同志得知顧孟餘「自退出『中國自由民主戰鬥同盟』後，精神上不無苦悶」，曾建議蔣派張群致函顧孟餘，「予以適切慰問，似易轉變顧之心理」。⁴⁰此外，該組亦建議張群致函張君勱「表

38 楊天石，〈50年代在香港和北美的第三種力量——讀張發奎檔案之一〉，頁633-634。〈顧孟餘退出自由民主同盟〉，《華僑日報》，香港，1954年9月11日，第1張第2頁。

39 陳正茂，〈五〇年代香港第三勢力的主要團體——「中國自由民主戰鬥同盟」始末〉，收入陳正茂編著，《五〇年代香港第三勢力運動史料蒐密》，頁62-63。

40 張群與顧孟餘可能有一些聯繫，1952年8月蔣派張群訪問日本，與首相吉田茂會談，並9月18日拜會裕仁天皇。根據英國的外交檔案，張群赴日期間曾與

達總統關懷之意，勉其從事反共工作，使張有所感動」；再者，張發奎方面則由陳誠「以光復大陸設計研究委員會及有關反攻等項問題，親切函張，徵詢其意見，並表示殷切之寄望，使張對中央益增其傾向」。⁴¹我們不確定張群與陳誠是否致函顧孟餘等人，不過12月4日，朱家驊透過當時任駐日外交官的朱鳳舉，寫了一封信給顧孟餘，這是兩人自1949年朱家驊去台灣之後第一次聯絡，「孟兄大鑒：港地一別，忽將五載，音訊鮮通，鳳舉兄來此得悉賢伉儷近況，無任喜慰。弟來台之後，退思補過無可告慰。惟三十年來之舊病，今年一月底施行大手術後，身體大有好轉耳」。朱家驊又請朱鳳舉帶了中研院同仁所編的《朱家驊祝壽論文集》及有關院務的報告，返日本後，面交顧孟餘。⁴²無論如何，1954年底之時蔣對香港與日本第三勢力支持者之動向有充分的掌握，他透過外交方面的壓力打擊香港與日本的第三勢力，而造成其瓦解。次年，戰盟在內憂外患之中宣告結束，顧孟餘也離開了日本。⁴³

第二節 低調度日：從美國到台灣

1955年顧孟餘離開日本去了美國。晚年的顧孟餘，寓居於美國加州柏克萊，從事學術和政策研究，並擔任加州大學中國研究中心顧問，生活並不富裕。「每日自駕小車，往圖書館做研究。在公路上以『超緩』

顧孟餘在東京見面。FO 371-105200 FOLDER 1。Archives Direct: Foreign Office Files for China, 1919–1980. <http://www.archivesdirect.amdigital.co.uk/Documents/> (2018/11/11 assessed). 不過英國情報記載是在11月，當時張群其實已返回台灣。

41 「台(43)中秘室字第0422號張厲生、張炎元呈據駐港工作同志建議對張發奎張君勸顧孟餘等疏導意見報請鑒核」(1954年12月1日)，台北，中國國民黨黨史館藏，《蔣中正總統批簽》，檔號：總裁批簽43/0342。

42 「朱家驊致顧孟餘函」(1954年12月4日)，〈人才人事〉，《朱家驊檔》，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藏，檔號：301-01-23-744。

43 有關戰盟結束之過程，參見Roger B. Jeans, *The CIA and Third Force Movements in China during the Early Cold War: The Great American Dream*, pp. 195–211.

著名」。⁴⁴顧在美生活拮据一事為門生故舊所得知。為了想辦法資助顧氏，周德偉、李壽雍、許孝炎、吳鑄人（1902–1984）等聯名寫了一封信給蔣夢麟、胡適、梅貽琦（1889–1962）、錢思亮（1908–1983）等，表示「顧孟餘先生國之元良，亦教育界耆宿，對政治及文化各方面貢獻甚大，國人仰望……顧先生近年僑居美國研究學問，老而彌篤，愛好美國之學術環境，無意返國，惟生活困頓」，希望能由中華文化基金會或清華基金「酌撥專款資助」。⁴⁵此事可能未成。1956年8月24日，顧因經濟問題拜託芝加哥總領事余星燦帶一封信向朱家驊求助，表示「窘困情形，望為臂助」。朱則請總統府秘書長張群協助，張在報告蔣之後決定依照朱家驊之建議，將1949年之後歷年積欠「資政義津公費及隨從秘書薪水」共3,000美元一次匯給顧氏夫婦，並允諾此後每月再匯60–70美元之津貼。朱家驊於9月26日的信一方面告知台灣將資助他的決定，又勸顧氏「羈棲海外自非久長之計，仍祈設法回台，舊友均所切盼，尤望再加考慮」。顧孟餘在10月19日回信致謝，表示已收到張群來信，此一資助「不無小補」，又說「弟與內子連年飄泊，精力頹敝，固因年事漸長，而故鄉之思亦最是催人衰老」，卻並未提及返台之事。⁴⁶此後兩人一直有通信。1963年朱家驊過世，顧致輓聯「發天地之玄近乎牛頓 考古今之事有似馬遷」，表揚他在科學與文史兩方面的成就。⁴⁷

顧孟餘在美國時除了與朱家驊通信外，也曾與胡適、王世杰、錢穆夫婦與郭廷以等人見面。最早的一位友人是胡適。1955年底，顧孟餘去紐約，12月31日顧、胡兩人在駐紐約總領事江季平（1908–？）家中見

44 〈顧孟餘病逝治喪委員會決定喪葬從簡〉，《中央日報》，台北，1972年6月28日，第3版。

45 「周德偉等致胡適等函」，〈南港檔〉，《胡適檔案》，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藏，檔號：HS-NK05-043-022。

46 「朱家驊致顧孟餘函」（1956年9月26日）、「顧孟餘致朱家驊函」（1956年10月19日），〈人才人事〉，《朱家驊檔》，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藏，檔號：301-01-23-744。

47 大陸雜誌社編，《朱家驊先生逝世紀念冊》（台北：治喪委員會，1963年6月），頁72。

面，「因客多不得深談」；1956年1月4日，顧專程訪問了胡適，胡適記載「顧孟餘先生來談……今天我們暢談甚快」。⁴⁸1956年9月至1957年1月，胡適在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講學，此時雷震等人正醞釀籌組反對黨，希望結合「民社、青年二黨及一部分國民黨人和無黨派人士，於國民黨以外成立一個大黨」。雷震希望胡適能與張君勱與顧孟餘合作，三人共同出面領導。他在寫給王紀五的信中表達此一心願：

今胡先生若出來，一定可以來個大團結。茲有二事煩托。第一，請你問問胡先生，如他不願意，請你多勸幾次。我已有三信提及此事。這是今後一條生路。不然反攻即令成功，政治仍無出路。我今生再不為官，如胡先生出來領導，我願盡一切努力促成，並工作至死，決不為官。我年已無多，希望以餘年為民主政治盡一分力量，決無其他意思。第二，張君勱在斯丹福，顧孟餘與胡先生在一城，你應設法使他三人合作。使他三人多談談。張、顧過去已合作，當無問題。今後要做胡先生能與他二人合作，則國事才有前途。吾弟今後必稍閑，請抽暇為此盡力。⁴⁹

胡適卻無意於此，他在柏克萊講學期間曾與張君勱及顧孟餘見面，卻沒有討論共同領導組黨之事。1957年8月，他寫信告訴雷震「我去年秋末曾去斯旦佛大學住了兩天，主人房君開車同我去訪問君勱先生，——那時他病起不久，——並沒有談過政治。我在Berkeley講學近五個月，見過顧孟餘先生幾次，都沒有說政治。這是因為我從來沒有夢想到我自己會出來和他們組黨」。胡適明白地告訴雷震「胡適之，張君

48 胡適著、曹伯言整理，《胡適日記全集》，第9冊，頁165。

49 參見「雷震致王紀五函」（1956年底），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藏，檔號：052-01-11-005-001。1957年4月21日雷震在日記之中仍寫到希望張胡兩人能合作「今日特致函紀五說明此事，並說明今日中國政治，如無有力的反對黨，不僅民主政治沒有希望，根本上無改進之可能。我們希望張君勱與胡先生合作，合力組成反對黨，則中國政治或有光明之前途，不過反對黨的希望亦不甚大」。雷震撰，《雷震日記》，收入傅正主編，《雷震全集》，冊39，1957年4月21日，頁74。

勸，顧孟餘……一班人都太老了，這些老招牌都不中用了」。⁵⁰ 雷震所提到的三位領袖之中張君勸可能較為積極，他寫了兩封信給胡適討論此事，胡適都沒有回信，而據張君勸的觀察，「顧孟餘消極之至」。⁵¹ 1958年3月初，雷震再次致書胡適，希望他四月返台就任中研院院長，經過舊金山時能與張君勸、顧孟餘交換意見，討論組織反對黨問題，他並將顧的地址，1462, Scenic Ave. Berkeley, California 告訴胡適。不過胡適並未去訪。⁵² 胡適1958年4月返台至1962年初過世，在此期間胡顧兩人都不曾見過面。

第二位曾拜訪顧孟餘的是王世杰。1959年12月14日，王世杰赴美訪問，參加聯合國大會後，返程抵舊金山，擬「便道在金山與諾蘭 William F. Knowland 及趙元任、顧孟餘諸舊友一晤」。12月15日他勸顧孟餘返台定居，「下午往 Berkeley 訪顧孟餘君及其夫人，談約二小時。余告以彼儘可回台北閒住，可說話則說話。既不做官，自無重大煩惱之可慮」。隔日，舊金山領事館總領事孫碧奇（1909–1986，1957–1962任總領事）邀約吃飯，又請了顧孟餘夫婦、趙元任夫婦、李卓敏夫婦作陪，席間顧向王世杰表示「在美舉行古物展覽之事，害多而利少，宜再考慮」。⁵³ 1963年10月，王世杰再度赴美，約集留美中央研究院院士談

50 胡適，〈胡適致雷震（1957年8月29日）〉，收入萬麗鵲編著、潘光哲校閱，《萬山不許一溪奔：胡適雷震往來書信選集》（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01），頁117。

51 這是張君勸寫給王世憲的信中所提到。見雷震撰，《雷震日記》，收入傅正主編，《雷震全集》，冊39，1957年5月1日，頁84。

52 雷震，〈雷震致胡適（1958年3月8日）〉，收入傅正主編，《雷震書信集》（台北：桂冠圖書公司，1989），頁122。胡適於1958年4月2日從紐約飛舊金山，住了兩個晚上，4月4日從舊金山飛東京。他在舊金山僅參加了清華大學與西南大學聯合舉辦的餐會。8日返回台北。4月9日胡適與雷震見面，他告訴雷震他沒有去拜訪張君勸。胡頌平編，《胡適之先生年譜長編》，1958年4月2日至4日，第7冊，頁2653–2654。雷震撰，《雷震日記》，收入傅正主編，《雷震全集》，冊39，1958年4月9日，頁263。

53 王世杰著、林美莉編輯校訂，《王世杰日記》，下冊，1959年12月14、15、17日，頁925–926。

話，在舊金山時曾設宴款待趙元任、李卓皓、勞幹、李方桂等，亦邀約顧孟餘、李卓敏、夏濟安等人作陪。⁵⁴

在香港教書的錢穆 (1895–1990) 也與顧孟餘有一些往來。早在 1958 年時錢穆得知「顧孟餘先生夫婦年老不耐西方生活，極想東返，有意來新亞任教」，曾去函顧孟餘邀約他返回香港；⁵⁵顧在回信時「只謝賓四對他的關切，並未具體提到東歸意想，事情就此告一段落」。⁵⁶1960 年錢穆應耶魯大學之聘赴美講學半年。返港之前經過舊金山，曾與夫人胡美琦前往訪問顧氏夫婦。錢穆記載，1960 年時赴耶魯大學講學，回程在舊金山住了兩星期，「顧孟餘夫婦在加州，美琦留學時，亦曾數赴其家。余與孟餘初不相識，至是始獲見面。孟餘夫婦親駕車來三藩市旅社接余夫婦作郊遊，並至其家餐敘，招待殷勤。然絕不與余談及國內政事一語，與前儼似兩人矣」。⁵⁷胡美琦則回憶，「那是賓四第一次和顧先生見面。顧夫人領我們參觀了她的工作間—廚房，廚房隔壁一起居間，與廚房有門相通，是顧先生白天作息的，樓上有書房，一面窗子隱約可遠望到海」。胡美琦對顧氏夫婦留下難以磨滅的印象：「顧先生拘謹寡言，臉上總是掛著笑容。他對顧夫人充滿了信賴。顧夫人樂觀堅定，說話既幽默又親切，沒有一句虛套。最令人感動的，是這一對老夫婦的相敬如親，一切都在不言中流露」。⁵⁸

54 王世杰著、林美莉編輯校訂，《王世杰日記》，下冊，1963年10月16日，頁1009。

55 錢穆也將此事告訴雷嘯岑 (1896–1982)。雷說「近聞新亞書院院長錢穆談及顧孟餘氏曾派人向彼要求來港在新亞教書，謂以貧不能久居美國也，現正在商洽每週教課之時間問題」。「雷嘯岑函論顧孟餘」(1958年6月7日)，〈石叻叢書續編——友聲集下冊/074〉，《陳誠副總統文物》，台北，國史館藏，典藏號：008-010109-00011-074。

56 胡美琦，〈紀念顧孟餘夫人——兼記義風可佩的吳美娥小姐〉，《傳記文學》，第29卷第1期 (台北，1976年7月)，頁26。(此文原刊《聯合報》，1976年1月13日，第12版)

57 錢穆，《八十憶雙親師友雜憶合刊》(台北：東大圖書公司，1983)，頁302。

58 胡美琦，〈紀念顧孟餘夫人——兼記義風可佩的吳美娥小姐〉，《傳記文學》，第29卷第1期 (台北，1976年7月)，頁26。

除了胡適、王世杰與錢穆夫婦之外，1958至1963年之間，郭廷以（1904–1975，當時為中研院近史所所長）去美國時也曾多次走訪顧孟餘夫婦（顧孟餘當中大校長時郭在歷史系教書）。如1958年3月他與房兆楹夫婦「訪顧孟餘先生，精神仍甚好，談中共事」；4月4日郭在房兆楹家聽顧縱論民國人物，「晚在房兆楹、杜聯誥夫婦處用飯，顧孟餘先生夫婦及白華均在座，暢談民國以來政事及要人軼聞。顧先生曾論及梁任公，謂民初梁之助袁，最為可鄙，完全失去立場。又論及陳獨秀、李大釗，謂陳確為一有理想有果斷人物，不惜為社會，為信仰而犧牲。李殊平平，乃一政客，吳佩孚之參謀長白堅武為其同學，民國十年前後，李僕僕於北京、洛陽間，說不上有何主張。談及近人，顧先生則不多作表示。至夜深十二時始散」。⁵⁹

1961年春，顧孟餘曾吟七律一首：「清明海外值良辰，一片鄉心一介身。吳郡舊游常入夢，燕京小苑幾回春。徒傳草澤能興漢，何處桃源可避秦。屈指中原終奠定，蒼生猶待起荆榛。」⁶⁰由此可以反映出顧氏家國情懷與思鄉之念。1962年8月23日，蔣中正又主動請張群由總統府特別費項下支付顧孟餘美金3,000元（圖7.8）。⁶¹在1949年之後蔣曾多次指示撥款資助故舊，目前國史館檔案中留下40餘筆資料，根據筆者所做的不完整的統計（其中有一部分可能為工作津貼，不一定是單純的禮金），其中資助金額較多的對象有胡適（九筆，45,000美元）、顧維鈞（四筆，40,000美元）、陳立夫（六筆，30,000美元）、張靜江及其家屬（三筆，20,000美元）、于斌（三筆，15,000美元）、吳叔維（吳稚暉的兒子，一

59 郭廷以，《郭量宇日記殘稿》（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12），1958年3月24日，4月4日，4月8日，4月10日、1960年8月24日、1963年3月9日，7月8日，7月10日。顧孟餘讚揚陳獨秀而批評李大釗是一個有趣的現象。白堅武（1886–1937），直隸交河縣人。1910年考入天津法政學堂，與李大釗同學。後入吳佩孚幕府，曾任吳佩孚軍總部政務處處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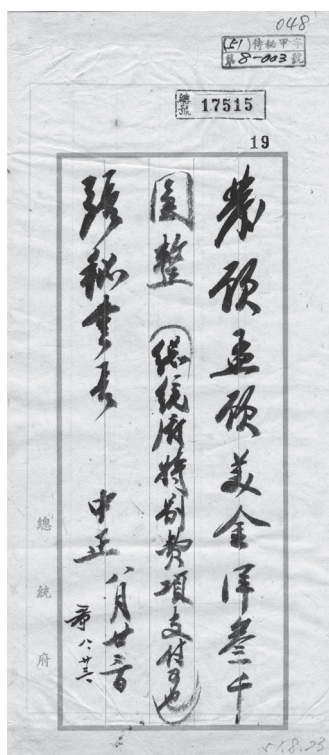
60 張發奎口述，鄭義譯註，《蔣介石與我：張發奎上將回憶錄》，頁511。引文出於鄭義的註釋。

61 「蔣中正指示張羣發顧孟餘美金三千元」（1962年8月23日），〈籌筆——戡亂時期（三十三）〉，《蔣中正總統文物》，台北，國史館藏，典藏號：002-010400-00033-048。

筆，10,000美元)、馬步芳(一筆，10,000美元，旅費)、鈕永建(一筆，10,000美元)、董顯光(三筆，6,000美元)等人。蔣於1956年、1962年給了顧孟餘兩筆錢共6,000美元，此外每一個月還有小額的生活津貼，此一數目遠遠不如他給胡適、顧維鈞、陳立夫等人的金額，然而對顧孟餘來說，此舉無異是雪中送炭，也表現出蔣的寬懷大度。

顧氏返台之行因各種因素，拖了十多年。1969年4月張研田(1910–1986)赴美考察，至舊金山約了陳世驤(1912–1971)夫婦拜訪顧宅，「轉達總統春懷及張〔群〕黃〔少谷〕二先生懇切盼望顧先生及夫人早日回國之意」。⁶²1969年8月，他因身體欠佳、不良於行，終於決定返回台灣，表示要堅決為反共而奮鬥。8月12日抵達台北，張群、黃少谷、谷正綱、袁守謙(1903–1992)、延國符等人至機場接機。⁶³顧的學生李壽雍也去機場迎接，他說「回國之日，政府電約數十人到機場去迎接他，我亦是被約的人之一。飛機到場時，由兩個人抱他下機。老態龍鍾，衰病頹唐，與接他的人點頭舉手致謝，都顯呆滯，目乏神光，已看不出他還認識幾個人。我回憶當年他在北大教書時的風度，與在機場上看到他的身體情況，歲月無情，使我發生無限感慨」(圖7.9)。⁶⁴

圖7.8 蔣中正指示張群發顧孟餘3,000美元



62 張研田，《追憶集》(台北：時報出版有限公司，1979)，頁80。

63 〈總統府資政顧孟餘返國〉，《中央日報》，台北，1969年8月13日，第3版。

64 李壽雍，〈顧先生早年在北大的一些回憶〉，《傳記文學》，第29卷第1期(台北，1976年7月)，頁15–16。

顧氏返台一事得到蔣中正的同意，返台之前即由總統府第三局李碩局長選定陽明山管理局局長官舍（位於陽明山山仔后建業路七號），修葺一新，作為住所。因此他們是作為「總統的客人……是總統請他回來的」，而且「他回國不久，總統和夫人就去探望他……使他感到很安慰，也很高興」。⁶⁵ 8月25日，王世杰也前往其陽明山住所會晤顧氏。⁶⁶

顧氏夫婦返台定居之後行事低調。此時顧孟餘兩腿不良於行，需坐輪椅，而且腦筋也遲鈍了，一切都靠顧夫人照顧。⁶⁷ 1972年2月，顧因病入榮民總醫院治療，6月25日下午5時半，在台北榮民總醫院過世（圖7.10）。6月27日總統府秘書長鄭彥棻向蔣中正報告了顧的死訊與善後情況。當天由親友組成治喪委員會，推舉谷正綱、黃少谷分任正副主席，籌辦治喪事宜。⁶⁸ 7月12日舉行公祭，蔣中正派鄭彥棻出席，於早上8點25分代表致祭，大斂時由張群、李石曾、鄭彥棻、陳建中在靈柩上覆蓋黨旗，火化後葬於六張犁三榮公墓。當日前往弔祭者有嚴家淦、蔣經國、孫科、陳立夫、倪文亞、田炯錦、張維翰等一千多人。⁶⁹

他過世之後，王世杰記載「顧孟餘先生來台一年有餘，常在病中（足不能行），屢次入榮民醫院治療，未能有何效果，月前在該院逝世。孟餘為一沉默寡言而意志堅強之人，近年對於政治未嘗有何評論」。⁷⁰ 1972年8月，蔣經國主持的行政院會通過「呈請 總統明令褒揚總統府故

65 張研田，〈迎接顧先生回國定居的經過〉，《傳記文學》，第29卷第1期（台北，1976年7月），頁24；張研田，《追憶集》，頁80–81。

66 王世杰著、林美莉編輯校訂，《王世杰日記》，下冊，1969年8月25日，頁1264。

67 胡美琦，〈紀念顧孟餘夫人——兼記義風可佩的吳美娥小姐〉，《傳記文學》，第29卷第1期（台北，1976年7月），頁27。

68 「總統府秘書長鄭彥棻呈總統蔣中正」（1972年6月27日），〈政務——九年義務教育之研究與建議等/008〉，《蔣經國總統文物》，台北，國史館藏，典藏號：005-010201-00023-008。

69 〈顧孟餘之喪昨公祭安葬〉，《中央日報》，台北，1972年7月13日，第3版。黃華山，〈顧孟餘、黃朝琴相繼辭世〉，《天文台》，香港，1972年7月28日。

70 王世杰著、林美莉編輯校訂，《王世杰日記》，下冊，頁1443–1444。

見到三個多月前過世的老戰友。1975年12月6日顧孟餘夫人韋增瑛女士亦過世。⁷⁴12月13日舉行葬禮，遺體火化後，送六張犁墳場，與顧先生合葬。⁷⁵

顧氏夫婦過世之後，錢穆曾感嘆地說：「顧先生夫婦可算得是能隱的人物了。中國歷史上，不只看重顯在政治社會上層的人，更能看重隱在一旁的人。這是中國傳統文化精神的偉大。如果我們只懂得前者，易於導引人性爭奪，而看重後者可使社會平衡，可使人心獲得安慰振奮」。⁷⁶中國傳統士人一向將「仕」與「隱」視為兩種主要的生命情調之抉擇。顧孟餘從民國初年以來在中國政學界都是叱咤風雲的人物，1955年之後退出政壇、低調度日，錢先生所說的「能隱」確實是顧孟餘晚年的最佳寫照。

夫婦及抗日名將張發奎」(1972年10月14日)，〈總統事略日記61.09-61.10〉，《蔣中正總統文物》，台北，國史館藏，典藏號：002-110101-00099-041。

74 王世杰著、林美莉編輯校訂，《王世杰日記》，下冊，1975年12月13日，頁1676。

75 胡美琦，〈紀念顧孟餘夫人——兼記義風可佩的吳美娥小姐〉，《傳記文學》，第29卷第1期(台北，1976年7月)，頁29。〈顧孟餘夫人的喪禮十三日舉行〉，《中央日報》，1975年12月11日，第1版。

76 胡美琦，〈紀念顧孟餘夫人——兼記義風可佩的吳美娥小姐〉，《傳記文學》，第29卷第1期(台北，1976年7月)，頁30。

第八章

結論：從挺汪、擁蔣到支持第三勢力

本書以顧孟餘一生的生平與思想為中心，探討二十世紀一位知識分子從政的曲折過程，此一過程亦反映了時代的重要變化，如國共之合分、國民黨內的派系競合，乃至美蘇冷戰期間「流亡知識人」對於「中國往何處去」之議題的探索。顧氏早年接受新式教育，又出洋留學，接受現代知識，屬於新一代的知識分子。他於清末就讀譯學館時即受革命思想之啟蒙，留學期間參加了中國革命同盟會，在海外鼓吹革命、支持共和，民初之時又致力於反袁的「二次革命」。返國曾短暫在教育部與企業界工作，後應蔡元培之邀，出任北京大學的教授。顧的學術專長為德語教學與人口、財政等專業的政治經濟學之領域。在1924年，他選擇了一條與胡適等人不同的道路。經由蔡元培、李石曾與李大釗等人的介紹，顧孟餘加入中國國民黨而投身汪派，經歷了由「聯俄容共」到「分共」的過程。這一階段他為汪的貼身軍師，汪的重要決策都曾與他及陳公博兩人商量，並接受其建議。1928年他在上海辦《前進》雜誌、陳公博辦《革命評論》，討論中國農民、土地與革命理論，確立了「汪派」、「改組派」的政治與經濟觀點，一方面右批「腐化的反革命派，言必仁義而行同盜賊」（指蔣），認為「中國沒有農民問題。談農民問題的人，都是共產黨或準共產黨」；另一方面則左批「惡化的反革命派，是奉蘇俄若神明」（指中共），主張「中國革命若想成功，非學蘇聯實行土地革命不可，

非使農民暴動自動的沒收地主的土地不可」的激進路線。¹顧孟餘在《前進》雜誌中的觀點與陳公博在《革命評論》之中的觀點有所不同，陳主張以工、農與小資產階級為中心的國民革命，以達成民生之改善；顧則反對階級觀念，強調黨內外「民主勢力的養成與充實」，而對於此一分歧，汪兆銘表態支持顧氏的主張。1930年改組派完成「太原約法」之後，以顧孟餘為主的汪派確立了支持自由、民主、憲政的政治立場。抗戰爆發前後，在汪蔣合作的格局之下，他努力推動黨內民主，又成為國民政府的高級官員——鐵道部長，致力於交通建設，此一階段顧與蔣的關係有所改善。然而1938年底豔電之後，他不贊成汪所從事的和平運動，力諫不成，1940年轉而投向蔣的陣營，協助國際經濟合作，並出任中央大學校長，為國家培養人才，1943年初因CC系的掣肘而辭職。此後他不再出仕為官，抗戰勝利前後他在美國滯留了四年多的時間（1943年12月至1948年1月）。1949年國共內戰結束之後，他又從政府官員回復到知識分子的身份，因對國共兩黨均不滿意，沒有留在中國大陸，也沒有跟隨蔣中正去台灣，而投入美國所支持的，以香港、日本為基地的第三勢力運動，與張發奎、張君勱、張國燾等人合作，辦《大道》、《中國之聲》等雜誌，表達政治理念，從事「文化冷戰」，企圖以民主憲政體制為基礎，尋求救國家、救民族的百年大計。1955年之後他退出政壇，赴美國低調度日，1972年病逝台灣。他一生的政治生涯可以簡單地歸納為：從挺汪、擁蔣到支持第三勢力等三個主要的階段。

書中的主角顧孟餘，乃至與他們命運息息相關的兩位政治領袖汪兆銘、蔣中正都經歷了張灝所謂清末民初中國歷史文化的「轉型時代」。²他們均出生於1880年代，除了汪兆銘病死於1944年之外，顧、蔣二人先後於1972與1975年過世。他們所處的時代在學術上是一個從以儒家

1 公孫愈之編著，《中國農民及耕地問題（前進文選之一）》（上海：復旦書店，1929），頁2。

2 張灝，〈中國近代思想史的轉型時代〉，《時代的探索》（台北：中央研究院·聯經出版事業公司，2004），頁37-60。王汎森，〈序〉，收入王汎森等著，《中國近代思想史的轉型時代》（台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2007），頁i-vii。

傳統為主的經學時代到以西學為中心的科學時代；在政治體制上是從「天下」到「國家」(Joseph R. Levenson 語)，³或說從帝國到民國、從專制到共和的變遷；在身份認同上則是從士紳到知識分子；這三重的變化深深地影響了他們的一生。

其中從士紳到知識分子角色的變化，配合政治體制與思想文化的變動，使他們在民國之後身處一個嶄新的時代。汪、蔣在生活上與思想上與傳統文化的關連較深，均自幼學習傳統典籍，但兩人似乎選擇性地繼承了傳統的不同面向，汪參加過科舉，喜歡詩詞，傾向於文人認同；蔣則喜好宋明理學、酷愛王陽明，具有儒者氣息。相對來說，顧與傳統文化的聯繫就不那麼直接，在他身上也看不到太多傳統與現代的糾結。他接受現代教育、通曉西語與西書，瞭解西方文明，而且在生活上如飲食、衣著、舉止等都很洋化。蔣、汪、顧三人都有國外留學的經驗，而受到西方文化的諸多影響。顧留學德國，先學電機工程，再轉而專修經濟；汪留學日本與法國，研習法政；蔣則留學日本，研讀軍事，此外蔣又受宋美齡影響而篤信基督教。他們在國外習得的專業知識與國際視野，成為他們一生貢獻國家、成就事業的重要資產。他們共同投入孫中山所開創的政治事業，結合在三民主義之理念與「政黨」組織——中國國民黨（及其前身同盟會）的旗幟之下，共同經歷了辛亥革命、五四運動、聯俄容共所造成的左派與右派之爭、汪蔣之爭、國共之爭。這些鬥爭又與國人反對軍閥割據與帝國主義的侵略結合在一起，先是與俄國結合來反對西方帝國主義侵略，完成北伐建國，再來則是依賴英美等西方國家的協助，抵抗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不過在西化的背後，他們顯然都在某種程度上繼承了傳統士大夫的精神特質，立志為聖賢或豪傑，而勇於「以天下為己任」。

在某種意義上來說他們三人都是杜亞泉所說的「游士」，脫離了傳統地方上的鄉土社會、依附於政黨組織而向全國發展。但是從另一方面來看，傳統的地緣關係仍影響了他們的社會關係與人際網絡。其中顧孟餘

3 Joseph R. Levenson, *Confucian China and Its Modern Fate: A Trilogy*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65), pp. 100–104.

的地緣因素較不明顯，他是河北人，返國之後任教於北京大學，而有機會接觸到來自全國各地的學生。因為李大釗、李石曾與蔡元培等同事的介紹，他加入國民黨，參與北京政治分會之黨務，而認識丁惟汾（山東人）等北方的國民黨員。他與李大釗（河北樂亭人）的交往可能具有地緣因素。三一八慘案之後顧氏南下赴粵，在廣州任中央黨部宣傳部長，又任中山大學整理委員會主任委員，其後赴武漢協助汪，轉戰南北，與北方的地緣關係較為淡薄。在汪、蔣之中，他選擇了興起於南方的汪。汪是廣東人，他的侍從與僚屬有不少是他的粵籍親戚（也包括陳璧君的親戚），而汪派成員之中廣東人士較多，如陳公博、林柏生、陳樹人等，此外廣西人也很重要，如陳克文即因甘乃光的引介與他建立關係，而陳與甘都是說廣州方言的廣西人，汪又依賴其派系內的廣西人與「桂系」合作。在寧粵分裂之時，汪所歸屬的粵方除了有改組派（以汪兆銘、唐生智為首）成員之外，也與胡漢民的同情者，如古應芬、陳濟棠等「國民黨右派」；孫科、鄒魯等「西山會議派」，以及「桂系」等兩廣人士。⁴再者，汪雖起於南方，然而1924年底他隨孫中山赴北方發展，他以精彩的演講將「三民主義傳播於北方知識群眾」，「北方群眾……受汪精衛號召，知有汪，而輕視蔣」、「視蔣為純粹軍人，無學問，不足為政黨領袖」、「將三民主義帶到北方，精衛是無可爭議的首功」；⁵顧孟餘、童冠賢、周德偉等北大師生即在此一氛圍之下跟隨了汪。這樣看來，汪的班底也結合了南北菁英。蔣則是浙江人，他的系統包括侍從、僚屬，主要多是江浙人士。但蔣掌握軍權之後，用人以黃埔軍校的畢業生為主，打破了地緣觀念，擴大了權力的基礎。⁶因此汪、蔣之爭，除了有思想觀念上的不同，兩廣與江浙的地緣因素也不容忽視，然兩人亦努力於突破地域限制。

4 金以林，《國民黨高層的派系政治：蔣介石「最高領袖」地位是如何確立的》，頁289-290。

5 周德偉，《落筆驚風雨：我的一生與國民黨的點滴》，頁214、229、163。

6 楊維真，〈蔣介石的地緣關係〉，收入呂芳上策劃、導讀，《蔣介石的親情、愛情與友情》，頁197-217。林桶法，〈蔣介石的親族關懷〉，收入呂芳上策劃、導讀，《蔣介石的親情、愛情與友情》，頁103-125，文中列出許多蔣因地緣與親族之關係而重用的浙江人。

顧與汪的結合即超越了地緣因素。這涉及共同理念以及共同利益、權力關係所結合成的派系意識。在加入國民黨之初，顧、汪、蔣三人均信仰三民主義，而孫中山過世之後則出現了主義的繼承權、詮釋權之爭，起初是胡漢民、汪兆銘與蔣中正之爭，而胡氏最早落敗（1925年廖案、1931年「湯山事件」被蔣軟禁、1936年過世），此後則是汪蔣之爭。汪派成員無疑地以汪兆銘馬首是瞻，為其效命，而且在早期汪、蔣分裂之時，他們共同點是「擁汪反蔣」。然而汪的思想、立場也經歷了很複雜的變化，先是在思想上從容共到分共、從左到右，此一轉變中顧孟餘扮演了關鍵的角色（尤其表現在對「三大政策」的態度與反對階級觀念之上）；再來則是因應時事之變化，在對日政策上從主戰到主和，其中數度與蔣分和，最後走向在南京建立附日政權的「漢奸」之路。孫中山逝世之後，汪與鮑羅廷接觸後便對他深感佩服，胡漢民說汪「事鮑羅廷如總理，甚至想與之生在一處，死在一處，結起所謂革命的聯合陣線來……而自為其所謂左派的領袖」。⁷顧在1927年7月中「分共」之前與汪同調，肯定聯俄容共、反帝國主義、扶持農工的左傾路線，顧孟餘與陳公博、甘乃光等三人號稱「左派三傑」（另外兩位著名的左派領袖是廖仲愷與鄧演達）。吳稚暉則稱他是「額角上沒有刻字的共產黨」。1927年，顧在武漢擔任宣傳部長，主持漢口《中央日報》；此時甘乃光負責農民部的工作（陳克文為秘書），後又與鄧演達（繼甘乃光接任農民部長）、毛澤東等人共同從事具體的農民運動組織工作。由此可見汪派成員因在聯俄容共方面的具體推展，而與蔣漸行漸遠。4月1日，武漢的國民政府下令撤銷國民革命軍總司令蔣中正職務、通緝他，並由中央黨部開除蔣中正黨籍。4月12日蔣首先展開清共。5月之後，汪看到各地激烈的民眾運動，認為「暴徒」有「過火」之行徑，⁸又瞭解共產國際之野心，知悉鮑羅廷欲分化國民政府，協助中國共產黨奪取武漢政府權力之策略，

7 胡漢民，〈汪精衛的評價——十九年七月二十八日在立法院紀念週演講〉，《中央週報》，第114期（廣州，1930年8月），頁3。

8 陳克文，〈鄧演達和國民黨左派〉，收入陳克文著、陳方正編輯、校訂，《陳克文日記，1937-1952》，頁1389。

再加上馮玉祥在汪蔣之間的合縱連橫，7月15日武漢展開分共，此後顧也依然跟隨著汪（鄧演達、宋慶齡、陳友仁等則與汪意見不合，先後離開武漢，赴莫斯科）。顧一方面質疑「三大政策」是「共產黨的越俎代庖……這個政策是共產黨代我們定的，也是共產黨在替我們宣傳，所以弄得外界對於本黨很是懷疑」，同時堅持採取和平分共的政策，准許鮑羅廷辭職歸國，左傾分子與共黨分子則允許自由離境，這樣的處置方式使武漢分共與蔣中正「四一二」清黨大規模的流血屠殺截然不同，而頗獲好評。1927年12月11至14日中共在廣州武裝暴動，汪派的國民黨人如陳公博、顧孟餘、陳樹人、何香凝、甘乃光等因而受到擁蔣派黨人的猛烈攻擊。次年初，汪經香港赴法國休養；甘乃光被人指稱捲款潛逃，⁹赴英國避難，再赴芝加哥大學讀書。汪出國之時，陳公博與顧孟餘在上海辦《革命評論》與《前進》雜誌，致力於民生革命與民主政治的理論探討。此時汪派散居各地，不成氣候。

1928年底，改組同志會成立，以顧孟餘、陳公博、王樂平、王法勤為首，奉汪為精神領袖，「從之者有柏文蔚、朱霽青、白雲梯、郭春濤、谷正綱諸先生」。¹⁰汪派展開新的集結，「改組派」代替「左派」成為汪派在國民黨內的派別名稱。¹¹此後至擴大會議（汪派聯合西山會議派與閻、馮等地方實力派），汪派在思想上建立起較多的共識，在組織上也因改組派的發展，凝聚性較強，¹²這也是汪派共同反對蔣中正「武裝同

9 張發奎說：「廣州市長甘乃光是唯一帳目不清者——他離開廣州時，從市財政局取走了十六萬銀元。李濟深對他下了通緝令」。張發奎口述、鄭義譯註，《蔣介石與我：張發奎上將回憶錄》，頁163。

10 周德偉，《落筆驚風雨：我的一生與國民黨的點滴》，頁268。

11 田守業，〈國民黨改組派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博士論文，2001年6月）。

12 1929年上半年，「改組派」在國內發起反南京三大大會與策動各地實力派軍人張發奎、石友三、唐生智等，發動「護黨救國軍」諸役起兵反蔣，同時改組派與南京國民政府也在海外進行組織的爭奪戰。張順良，〈改組派與國民黨中央海外黨務組織爭奪戰初探（1928-1930）〉，《花蓮教育大學學報》，第23期（2006年11月），頁331-356。

志專政」的重要基礎。¹³因此汪派作為一個國民黨內的政治派別，在1927年分共之後並不是一個缺乏思想特色而沒有意識形態共識的組織。改組派成立後，汪派雖缺乏十分系統的論述（如上所述顧孟餘、陳公博兩人有不同的觀點，而汪在思想上較傾向顧孟餘），後來又因日本的侵略與汪自重慶出走，至南京成立附日政權，打斷了他們理論建構與實現理想的機會，以致他們想法不為人們所認識。然而如依賴相關的文獻，仍可勾勒出以汪兆銘、顧孟餘、陳公博等人為中心的汪派政治思想的主要觀點，而此一理論建構的核心人物是顧孟餘。這些觀點包括：

第一，黨的改造方面，他們以繼承孫中山的遺志、實行三民主義為號召，勵行黨的「改組」。然而在提倡改組之時，他們必須表明與1924年孫中山「容共」之改組有所區隔，而重新界定改組的精神。汪兆銘在〈一個根本觀念〉一文強調：「容共屬一時政策，決不能謂容共即為本黨改組精神所在」。他主張「欲求黨員真能為主義而奮鬥，則不能不鞏固黨之組織森嚴黨之紀律，使黨員之行動，趨於一鹄」。¹⁴為此他特別強調「黨紀」的重要性，而有「黨紀先生」的封號。¹⁵由此可見，汪派對黨的改造之看法與孫的想法有其延續性，仍強調嚴密黨的組織與效率、民主集中制等。在這方面汪、蔣並無太大的分歧，都受到蘇聯列寧主義模式的影響。不過汪派堅持「取消黨權至上口號，黨只能在國以下，不能在國以上；只能在國以內，不能自外於國」。同時他們也主張黨內的民主，「儘速實行黨內普選，凡各級黨部委員，一律由選舉產生」，「全國代表大會……代表一律由選舉產生」。¹⁶這一部份的想法則與蔣中正的觀念有

13 周德偉，《落筆驚風雨：我的一生與國民黨的點滴》，頁207、268。

14 汪精衛，〈一個根本觀念〉，《革命評論》，第12期（1928），頁1。

15 「黨紀先生」之名起於1930年代，是吳稚暉對汪的調侃之詞，見琪華，〈汪黨紀之由來〉，《福爾摩斯》，上海，1933年9月9日，第2版。陳克文說「民十六他反對清黨，後來又反對特別會議，所持的都是黨的紀律問題。當時吳稚暉等諡以『黨紀先生』的名稱，可見汪先生是頂看重黨的紀律的」。《陳克文日記，1937-1952》，1939年1月2日，上冊，頁344。

16 周德偉，《落筆驚風雨：我的一生與國民黨的點滴》，頁268-269。

所差距，而更傾向孫中山的民權主義、五權憲法的政治構想，並強調黨內民主。

第二，民族革命方面，帝國主義與軍閥為國民革命之對象。這一點汪派一方面繼承了孫中山的想法，同時與蔣之間並無不同。

第三，民權革命方面，政治建設的目標是以民主來保障人權，而以《建國大綱》作為實行的方法與程序。擴大會議時期之宣言與「太原約法」表現出汪派對民主政治的根本想法。他們主張從黨內民主，延伸到黨外民主與廣大民眾的政治參與。汪派成員陳克文對此有很深的體會：

「改組派」對於國民黨後來實施民主政制的影響，還是頗有可述的地方……擴大會議當然談不到有甚麼重大的措施或成就。然就它前後兩次宣言所提出的有關政治、軍事和黨務的主張，不能不說是當時較為開明，較為符合民主原則的。而尤可稱道的，則為他們在太原所草擬的二百十一條約法草案。這一草案雖沒有甚麼法律上的地位，但亦與尋常學者一家之言不同，故當時報紙頗有讚美之詞，認為若有實現機會，國民不勝企盼。民國二十年五月，國民政府召開國民會議，通過「訓政時期約法」，並正式頒行全國，更〔便〕是受了擴大會議主張與太原約法草擬的影響而來的。¹⁷

張朋園的研究也肯定了陳克文的論斷。¹⁸從這一點可見汪派雖強調「黨紀」，然他們亦繼承了孫的「民權」思想，而非只關注「威權」思想。汪倡言「建立民主勢力以反抗蔣介石的獨裁」。¹⁹改組派綱領尤其強調「儘速結束訓政，制訂憲法，尊崇法治，還政於民，以示大公」；「國憲內，須有容許各省制訂省憲、自選省長之明文規定，以收中央地方合作之

17 陳克文，〈改組派與回憶錄〉，收入陳克文著、陳方正編輯、校訂，《陳克文日記，1937-1952》，下冊，頁1363。

18 張朋園，《從民權到威權：孫中山的訓政思想與轉折——兼論黨人繼志述事》，頁119-120。

19 有關汪對於民主的認識，參見張朋園，《從民權到威權：孫中山的訓政思想與轉折——兼論黨人繼志述事》，頁123-130。

效」。再者，主張軍隊國家化，「將現有中央地方各軍一律改編為國軍，編制、裝備及預算必須一致，不得有任何歧視：核實員額以節政費……軍隊屬於國家，任何黨派不得領軍」。²⁰這也是汪顧與蔣有所歧異之處，這也是部分汪派成員在1949之後不願意跟隨蔣中正等人去台灣的根本原因。顧孟餘在參與第三勢力之時所秉持的自由、民主、憲政的理念也與「太原約法」的想法有很強的連續性。第三勢力所辦的雜誌大力批評蔣在台灣搞威權統治，建立特務系統，並培養蔣經國掌管特務而進行接班等；其次則抨擊中共的極權統治。簡單地說，他們反對蔣的「家天下」與中共的「黨天下」。很可惜，汪派（除了建立附日政權外）不曾掌權而無法實現這方面的構想，汪派的民主憲政思想也在帝國主義侵略導致的民族危機中被隱蔽起來，這在某種程度上呼應了李澤厚所謂「救亡壓倒了啟蒙」。²¹

第四、在社會民生方面，汪派的立場是「喚起民眾『農工商學聯合起來』，及扶助農工」；「從速從事文化經濟建設，實行中山之實業計劃」，並以和平的方式實施平均地權與耕者有其田的土地改革，而與中共所採取的蘇聯式激烈的土地革命、農民暴動、階級鬥爭的想法有所區隔。²²至於顧孟餘與陳公博對於「階級」的有無，以及國民黨究竟應代表何種階級的爭論，汪派內部顯然並無共識。不過如上所述，分共之後，汪傾向顧孟餘所主張的放棄階級與階級鬥爭的觀念，主張國民黨代表一切被壓迫的民眾。再者，汪派也嘗試將孫中山的民生主義與共產主義作一區隔。顧孟餘尤其清楚地一貫反對馬克思主義的唯物辯證論、階級鬥爭論與激烈革命論，以及蘇聯式的計劃經濟（他在返國之後的想法在思想上有很強的連續性）。汪派的觀點與「戴季陶主義」的想法有一些一致之處，戴也反對階級鬥爭造成的社會階層撕裂，認為在民族國家內需要進行各階級聯合的革命；不過汪派並不像戴季陶《三民主義之哲學的基

20 周德偉，《落筆驚風雨：我的一生與國民黨的點滴》，頁268–269。

21 李澤厚，〈啟蒙與救亡的雙重變奏〉，《中國現代思想史論》（台北：風雲時代出版公司，1991），頁1–54。

22 周德偉，《落筆驚風雨：我的一生與國民黨的點滴》，頁268。

礎》一書那樣將孫中山思想「儒家化」，認為孫中山的思想「繼承堯舜以至孔孟而中絕的仁義道德的思想」，因而與中國「道統」建立關連。²³這一點與顧孟餘的思想傾向有關，顧不具有傳統儒家的「道統觀」。在經濟政策上，顧孟餘的思想依違於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的兩個典範之間，他的想法是以資本主義的方式來致力生產，然而以國家調節來預防貧富不均，並致力於經濟發展之規劃，推動工業化，不過不採取蘇聯的計劃經濟模式。他的經濟發展觀與1949年之後台灣所採取的方向也有類似之處。這可以說明為何顧孟餘在反共的前提之下一直與台灣保持聯繫，而晚年願意返台定居。

這樣看來汪派對蔣的不滿在思想上來說主要在第一、三項，亦即秉持黨內、黨外的民主立場、軍隊國家化，反對蔣所主張的「以黨治國」、「武裝同志之專政」，至於其他的幾項，包括黨組織之改造以嚴明紀律、反帝國主義與軍閥、反馬克思主義，以及社會民生方面根據民生主義，從事文化經濟建設等，汪蔣其實是有共識的。1930年10月3日，蔣受到汪派「太原約法」的影響，發表「江電」，主張速開國民會議及制訂約法，批評胡漢民「黨治」觀念，²⁴而有1931年6月制訂的《中華民國訓政時期約法》。張朋園指出：「《太原約法》不僅影響到《南京約法》的制定，同時也形成了汪精衛與蔣介石合作的轉捩點。民國20年（1931）『九一八事變』爆發，蔣汪合作，汪任行政，蔣負責軍事，一拍即合」。²⁵

23 有關戴季陶的思想及戴對蔣的影響參見黃克武、趙席箕，〈戰時的知識分子與學術發展〉，呂芳上主編，《中國抗日戰爭史新編：戰時社會》，頁297-298。施純純，《革命抑反革命？蔣中正革命道路的起源》（台北：國立中正紀念堂管理處，2017）。汪派對戴季陶「道統說」的不滿，在周德偉的言論中可以反映出來。周德偉說「孫公之著作則採自西方，為無可否認之事實，戴傳賢之道統說，實一文不值」。周德偉，《落筆驚風雨：我的一生與國民黨的點滴》，頁157。

24 金以林，《國民黨高層的派系政治：蔣介石「最高領袖」地位是如何確立的》，頁94-102。

25 張朋園，《從民權到威權：孫中山的訓政思想與轉折——兼論黨人繼志述事》，頁122-123。

從上述汪蔣兩派思想的對照，也可以重新的思考蔣中正三次下野。這三次下野中前兩次與汪兆銘和顧孟餘有關，第三次則與顧孟餘與桂系有關。就第一次下野來說，在1927年武漢分共之後，雙方隔閡剷除，蔣為促成寧漢合一，在武漢方面的壓力下辭職下野。然根據黃道炫的研究，「蔣氏8月下野是當時政治、軍事形勢發展使然，是蔣、桂雙方暗中角力的結果。蔣下野前夕，政治上漢、桂已日趨接近，蔣氏孤立，難有作為；軍事上徐州慘敗，蔣遭重挫，加之桂系主力佈防長江中游，奄有南京，蔣氏在寧已無武力可資依託」。²⁶由此可見，汪派與桂系的合作是蔣第一次下野的原因，而主要是出於軍事與政治的因素，與思想並無太大的關連。雙方隔閡消除之後，蔣氏再度出山，完成北伐、統一全國。

1931年初，蔣介石因約法問題與胡漢民衝突，引起黨內反蔣各派聯合發難，而有「寧粵分裂」。九一八事變之後，蔣在內憂外患之下於1931年12月15日第二次通電下野。這一次下野是國民黨內部派系分裂所造成的。中國國民黨第四屆中央委員會第一次全體會議開會，粵方人員僅一部分人參加，胡漢民等在上海堅持要蔣下野；蔣為促成黨內團結，辭國民政府主席職，離京回鄉。這一次蔣汪之爭主要也是權力、地域鬥爭，與思想因素關係不大（蔣對約法的看法其實與汪派相近）。寧粵分裂時，粵方對汪採「去皮存骨」政策，蔣則透過宋子文對汪表示「南京要汪先生是連骨帶皮一起要」，汪蔣再度聯合。六週之後，孫科下台，汪蔣重返中樞。

蔣的第三次下野是在國共決戰與和談的糾結之中，這一次下野牽涉到桂系對蔣的施壓，而桂系又與原改組派聯手。此時改組派已「解體」，²⁷原改組派的人士雖仍有聚會，然並無組織力量，只有人脈的連

26 黃道炫，〈關於蔣介石第一次下野的幾個問題〉，《近代史研究》，1999年第4期（北京，1999），頁142-165。

27 陳克文表示「以國民黨言，則同志多矣，以過去之改組派言，則改組派久已解體矣。況在目前情勢之下，同志又安從為力耶！」。陳克文著、陳方正編輯、校訂，《陳克文日記，1937-1952》，1938年2月11日，上冊，頁184。

結。²⁸例如陳克文因廣西籍的關係，以及在黨內競選的多次挫折漸與蔣疏離，支持李宗仁選副總統，與桂系關係更為密切。陳克文在立法院內加入「民主自由社」，反對國民黨的正統派。立法委員童冠賢（顧孟餘在北大時的同事，也是他在中央大學任校長時的老幹部，亦被歸為改組派）又在桂系與民主自由社等力量的支持下當選立法院長，任命陳克文為秘書長。²⁹1949年初蔣下野之後，在立法院之中原改組派的童冠賢、范予遂等立法委員擬支持顧孟餘出來組閣，然顧以為和戰均無希望而婉拒；後由何應欽組閣（1949年3月12日至6月12日）。至1949年組織第三勢力之時，以顧孟餘、張發奎為首的汪派分子方與桂系合作，致力於反共與反蔣。

由此可見，蔣的三次下野雖與汪派（或與桂系等）的反對有關，然均出於政治與軍事上的原因，並非思想上的根本分歧。汪、蔣唯一思想上的分歧是在於民主、憲政、軍隊國家化與反對黨權至上、「武裝同志專政」等方面；1931年蔣中正公布訓政時期約法之後，雙方分歧變小。汪派人士對於國民黨一直有很強的認同感與向心力。在寧漢分裂之時，汪曾說「我們國民黨人應有同氣類之感，精誠團結，永遠廢止『武裝同

28 抗戰時期原改組派成員有不少的聚會。例如根據《陳克文日記》的記載，1937年11月8日，「昨日劉叔模之約，一方面為前時福建人民政府之幹部人物，陳真如亦在內，一方面則前時改組派之主要分子」（上冊，頁131）。有關劉叔模的角色見：劉叔模，〈一九三一年寧粵合作期間我的內幕活動〉，《文史資料選輯》，第17輯，頁105-124。又如「仲鳴又邀宴於國際聯歡社，主客亦兩桌。先到留春幄再到國際聯歡社，後者皆以前改組派之中級幹〔部〕人物。今政治情勢雖已大變，人事淵源仍時時保存過去的歷史關係」，見《陳克文日記，1937-1952》，1938年10月22日，上冊，頁304。抗戰後期之後，改組派的聚會多半是為了選舉動員。如「下午六時半到羅家灣黃少谷寓參加談話會。到者均以前改組派之同志而現時被選為代表者，約二十人，欲利用舊關係，為此次競選之一助也。談到九時許，復與少谷、和軒、俊龍、子航同赴和平路谷正綱寓，與正綱同商競選方法，十二時始分手」，陳克文著、陳方正編輯、校訂，《陳克文日記，1937-1952》，1945年4月28日，下冊，頁972。

29 陳正茂，〈童冠賢：從大學教授到第三勢力主將〉，《南方都市報》，廣州，2013年7月31日。

志專政』。³⁰這一觀點與顧孟餘的想法頗為一致，1929年時顧表示：「吾輩所主張者，為反對軍事同志專政，不涉及私人恩怨……凡國民黨人，不論其現在擁護何人，將來均可化敵為友，為吾人之政治資本，決不能隨自己之好惡作人身之攻擊。吾人如離開國民黨及黨員，即無政治資本」。³¹這一觀點也使汪派能夠與國民黨內的其他派系，如桂系、西山會議派乃至與蔣建立合作關係的重要原因。顧孟餘晚年願意接受蔣的資助，乃至受邀返台定居，與此亦不無關連。

1949年之後，顧孟餘的選擇也有重要的意義。他對國民黨與共產黨兩個「專政」的政權均喪失信心，因而與張發奎、張國燾、張君勱等人投入國共之外「第三勢力」之政治運動。第三勢力運動以香港為基地並非偶然。在冷戰時期，香港成為雙方陣營鬥爭的場域，也是華人世界中少數的自由城市。汪派分子很早就開始在香港布局，使此地成為該派的財政與宣傳之基地。在1929年改組派成立之初，在香港即有由陳克文負責的分會，「大概有改組派數十人，分為幾個小組，偶然集會閒談」。此外，改組派最重要的宣傳機構就是在香港出版的《南華日報》（後來的豔電與汪派重要的政治主張都在此報上發表）。³²抗戰時期汪派在香港還有其他幾個宣傳機構，較重要的是由樊仲雲主編的《國際週報》。該週報是由周佛海所主持的「藝文研究會」在香港分會「國際編譯社」之下的刊物，每週出版一期，主要刊登翻譯文章。根據朱樸的回憶，該社之組織為「柏生主持一切總務，思平主編國際叢書，仲雲主編國際週報，我則主編國際通訊。……國際編譯社編定各國時勢雜誌，每星期出版國際週報一期，國際通訊兩期，選材謹嚴，為研究國際問題一時之權威」。³³香港除了是汪派的宣傳中心之外，也是財政中心。顧孟餘擔任鐵

30 周德偉，《落筆驚風雨：我的一生與國民黨的點滴》，頁207。

31 同上，頁213。

32 陳克文，〈改組派與回憶錄〉，收入陳克文著、陳方正編輯、校訂，《陳克文日記，1937-1952》，下冊，頁1361-1362。

33 朱樸，〈記蔚藍書店〉，《古今半月刊》，期13（1942年12月），頁19-20；蔡登山，〈文史雜誌的尤物——朱樸與《古今》及其他〉，收入蔡登山主編，《古今（一）》（台北：秀威資訊科技，2015），頁iv。

道部長之時，曾在香港辦銀行，籌募經費。1937年至1940年之間與1949年前後，顧孟餘長期住在香港。這些背景都與1949年後顧在香港從事第三勢力運動有關。

顧的政治命運和汪、蔣兩位政治領袖的領導風格密切相關。顧看到汪的缺點在「感情用事」，不如蔣那麼理智。顧孟餘說：「余識汪有日，細察之，汪之弱點甚多，感情用事，考慮不周，無論辦黨為政，汪均不如蔣」。³⁴同時他也看到蔣的缺點在於為人過於精明能幹，不能用人，喜歡直接負責，預聞大小事，並讓屬下彼此牽制。顧說：「蔣氏對於書生言論，向不重視」，「蔣非可運用之人」。³⁵在此認識之下顧孟餘選擇了汪。汪與顧早期之交往，在某種程度上屬於「以義相交」，兩人為共同的理想而努力。1938年底之前，汪對他幾乎是言聽計從，兩人「是志同道合的夥伴」、「如魚之得水」，³⁶顧孟餘曾說：「如果是道義的結合與思想的相同，出自自然，才有力量」，這應是他發自內心的深刻感觸。³⁷然而在關鍵時刻，汪卻不能接受顧之建議，反而常受到陳璧君等人左右。此舉讓顧等人感到扼腕。³⁸至於顧與蔣，雙方則從一開始就是「道不同而不相為謀」，顧並不認同蔣的人格與專政、獨裁的作風。然而1938年底汪出走之後，他喪失了長期投資的「政治資本」，體認到在外敵侵略、國家面

34 周德偉，《落筆驚風雨：我的一生與國民黨的點滴》，頁203。陳克文也說：「政治家所重者為理性，感情用事鮮有不失敗者。汪先生之詩詞固為至性流露之傑構，亦足反映其平日治事偏於感情」。陳克文著、陳方正編輯、校訂，《陳克文日記，1937-1952》，1939年4月7日，上冊，頁395。

35 周德偉，《落筆驚風雨：我的一生與國民黨的點滴》，頁214、198。

36 胡耐安，〈皓首榮歸顧孟餘〉，《傳記文學》，第22卷第3期（台北，1973年3月），頁32。

37 白瑜，〈出身世家而愛惜羽毛的顧先生〉，《傳記文學》，第29卷第1期（台北，1976年7月），頁17。

38 周德偉對此有所體會，他說「汪深感於其妻陳璧君……凡汪失意時，陳不予安慰，且借往事刺激之，此余後此數數所聞。汪亦感情衝動人物，不能自制，對顧雖禮貌有加，實則不能盡用其策，顧之不能制汪陳，猶諸葛亮之不能制劉備及關羽……牝雞司晨，惟家之索，信矣古人之言也」。周德偉，《落筆驚風雨：我的一生與國民黨的點滴》，頁277。

臨生死存亡之際，不能不與蔣合作。蔣對顧一意籠絡，也加以重用，請他負責國際外交與財政經濟等大計，任命他為中央大學校長等。然蔣顧之間仍存芥蒂，1943年顧從中大校長卸任之後即逐漸淡出政壇。

1949年之後顧不滿蔣氏的獨裁統治、培植蔣經國接班，因而不願赴台，另一方面又反對中共的極權統治，缺乏「工業城市的治理和外交的知識、能力」，³⁹故選擇在海外從事第三勢力的工作。不過，顧孟餘、張發奎與張君勱等人對蔣的看法仍有重要的不同。張君勱對蔣的批判性較強；顧、張也批蔣，「對政府有反感，然亦非決絕態度」。⁴⁰他們肯定「自由中國」在反共方面的重要性，也希望美國能繼續援助台灣；他們不反蔣，也不發表「攻訐台灣的過甚之詞」，⁴¹但希望蔣能朝開明寬大的方向走，容納各黨各派組織聯合陣線。

對蔣來說，在1950年代之時，他即深知顧孟餘與張發奎等人多次「叛黨」，因而開除其黨籍。然而，當顧孟餘退出第三勢力，在美國窮途末路之時，蔣仍對其施以援手，曾兩度給予3,000美元的禮金，而且顧氏夫婦的晚年在美國的生活有一部分是靠蔣每月給的小額津貼而維生，1969年之後他返台定居也是得到蔣的許可。由此可見，蔣對「孟餘同志」豁達大度的一面。

從擁汪、挺蔣到支持第三勢力，顧孟餘的一生見證了二十世紀中國政治的激烈變化，也代表了汪派分子對中國未來的一種追尋。在國共對峙、美蘇對抗的冷戰格局之下，此一追尋最後歸於幻滅，而顧孟餘也逐漸為人所淡忘。綜觀顧孟餘的一生有兩點值得吾人注意。

39 陳克文著、陳方正編輯、校訂，《陳克文日記，1937-1952》，1950年1月23日，下冊，頁1296。

40 「雷嘯岑函論顧孟餘」（1958年6月7日），〈石叟叢書續編——友聲集下冊/074〉，《陳誠副總統文物/文件/石叟叢書/續編》，台北，國史館藏，典藏號：008-010109-00011-074。

41 「雷嘯岑函論顧孟餘」（1958年6月7日），〈石叟叢書續編——友聲集下冊/074〉，《陳誠副總統文物/文件/石叟叢書/續編》，台北，國史館藏，典藏號：008-010109-00011-074。

第一、就個人出處進退而言，顧一生能仕能隱。他在清末時支持革命運動；五四運動後走出書齋，開始投身群眾運動，又加入國民黨下海從政；在抗戰前致力國家建設，抗戰時在汪從事和平運動的關鍵時刻則堅守民族大義。1945年8月23日，在「總統府人事登記片——顧孟餘」上給他的評語是「性剛正，尚氣節，沉默寡言，言則極有份量，出處不苟，持身清廉」，此一論斷頗能反映其人格特徵與道德操守。⁴²1949年之後他對國共批判與支持第三勢力的抉擇也顯示他的堅持。他出於「忍不住的關懷」，既不像張東蓀、潘光旦、王芸生、賀麟等人選擇留在中國大陸，後來在極權政治之下「停止思想，集體轉向」，向中共投降，表現出知識分子的「軟弱」；⁴³也不像胡適、雷震與殷海光等人先後跟隨蔣去台灣，致力於「反共大業」，卻因宣傳自由理念與蔣發生衝突並受其箝制。顧孟餘選擇了國共之外的第三條道路，旗幟鮮明地主張自由、民主憲政、反對蔣氏的專制獨裁與中共的極權統治。他的選擇使他避免了留在大陸或赴台知識分子所受到的困境與考驗，而以他自我認可的海外漂泊的方式維繫了個人尊嚴，並堅持個人的政治理念。1950年代末期，雷震想要組織反對黨時，他心中的理想人物是胡適、張君勱與顧孟餘，此一抉擇並非偶然。誠如錢穆的評論，顧氏不但在早年「能仕」，晚年亦「能隱」。在1949年前後中國知識分子的表現來說，顧氏不愧為一個令人尊敬的豪傑之士。

第二，就思想而言，他的觀點源自二十世紀中國歷史上國共對峙與美蘇冷戰的時代背景，無疑有其局限性，然而卻代表了他對「中國往何處去」的真誠追尋。在政治轉型上來說，他的觀念與蔣經國的民主化發展的想法配合。他在香港時期對蔣氏父子專制的批評，和胡適、雷震的《自由中國》一樣，共同推動了思想動員，促進台灣的民主化。顧孟餘、

42 「軍事委員會委員長侍從室人事調查表」，〈顧孟餘〉，《軍事委員會委員長侍從室》，台北，國史館藏，典藏號：129-200000-3519。

43 楊奎松，《忍不住的關懷：1949年前後的書生與政治（增訂版）》（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3）。黃克武，〈蔣介石與賀麟〉，《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67期（台北，2010年3月），頁17-58。

張君勱等第三勢力的領袖通過出版報刊、書籍的方式傳播「中國必須建立一個開放與寬容的民主體制，才能走上現代化之路」的理念，影響深遠。⁴⁴在社會經濟發展上，顧的想法基於孫中山的理念，結合了資本主義的市場經濟與社會主義對公平與正義的追尋，其構想與1949年後台灣所推動的經濟改革，以及大陸改革開放之後的主要發展方向也有一致之處。這樣看來他的生平與思想雖已為人們所遺忘，然在二十世紀中國歷史上，顧孟餘以及與他立場接近的汪派或改組派人士在反蔣、反共的努力之中，仍表達出他們對中國所面臨之重大課題的敏銳觀察。

顧孟餘在1930年編輯出版的《革命的真理（前進文選之二）》中，一篇名為〈那裡是出路〉的文章中有以下一段話，「我們要問前途如何，最好先回顧過去的事實如何。惟有冷靜的誠懇的檢查過去的事實，才能曉得我們的力量之所在和我們以前錯誤之所自生」，⁴⁵這一種經由對歷史的反省而掌握「我們的力量之所在」及「以前錯誤之所自生」，不但是顧孟餘所強調的觀念，也是筆者認為顧孟餘的一生在今日仍值得吾人思索沉吟、引以為鑑之處。

44 余英時，《余英時回憶錄》，頁129。

45 公孫愈之編著，《革命的真理（前進文選之二）》（上海：復旦書店，1930），頁7。

顧孟餘著作分類目錄

一、學術論著與書評

顧兆熊，〈馬克思學說〉，《新青年》，第6卷第5號（上海，1919年5月），頁450–465。

顧孟餘，〈人口問題，社會問題的鎖鑰〉，《新青年》，第7卷第4號（上海，1920年3月），頁1–14。

顧孟餘，〈書籍批評：陳長蘅著《中國人口論》〉，《新青年》，第7卷第4號（上海，1920年3月），頁1。

顧孟餘，〈錢幣理論與本位政策〉，《國立北京大學社會科學季刊》，第1卷第1號（北京，1922年2月），頁1–9。

顧孟餘，〈現代銀行信用之性質〉，《國立北京大學社會科學季刊》，第1卷第3期（北京，1923年5月），頁429–437。

顧孟餘，〈學術書籍之紹介與批評——Karl Helfferich, *Geld und Banken: I Teil-Das Geld* 第五版〉，《國立北京大學社會科學季刊》，第1卷第3期（北京，1923年5月），頁515–517。（按：此書為《錢幣與銀行：第一卷錢幣》）

顧孟餘，〈學術書籍之紹介與批評——Robert Liefmann, *Beteiligungs-und Finanzierungsgesellschaften. Eine Studie über den modernen Effektenkapitalismus etc.* 第三版〉，《國立北京大學社會科學季刊》，第1卷第3期（北京，1923年5月），頁517–518。（按：此書為《投資和金融公司：德國，美國，瑞士，英國，法國和比利時的現代股權資本主義研究》）

顧孟餘，〈學術書籍之紹介與批評——Edwin R.A. Seligman, *[The] Shifting and Incidence of Taxation* 第四版〉，《國立北京大學社會科學季刊》，第1卷第3期（北京，1923年5月），頁525–526。（按：此書為《租稅轉嫁與最後負擔之人》）

顧孟餘，〈學術書籍之紹介與批評——Georg Friedrich Knapp, *Staatliche Theorie des Geldes* 第三版〉，《國立北京大學社會科學季刊》，第1卷第3期（北京，1923年5月），526–527。（按：此書為《國家貨幣理論》）

顧孟餘，〈學術書籍之紹介與批評——幾種近年出版的關於社會主義的著作〉，《國立北京大學社會科學季刊》，第2卷第3期（北京，1924年5月），頁433–440。

二、演講、談話記錄與提議

顧孟餘，〈採辦歐制儀器創設天然科學展覽所計畫〉，《北京大學日刊》，第544期（北京，1920年2月23日），第2版；第545期（北京，1920年2月24日），第2版；第546期（北京，1920年2月25日），第2版。

顧孟餘，〈顧孟餘教務長演說詞〉，《北京大學日刊》，第694期（北京，1920年9月16日），頁2。

顧孟餘講、陳政筆記，〈本校紀念日演說錄 顧孟餘先生演說詞〉，《北京大學日刊》，第774期（北京，1920年12月21日），頁2–3。

顧孟餘，〈二十日歡迎蔡校長大會顧孟餘先生之歡迎詞〉，《北京大學日刊》，第847期（北京，1921年9月22日），頁1。

顧孟餘講、梅心如筆記，〈外資外債國家破產監督財政〉，《北京大學日刊》，第904期（北京，1921年11月29日），頁1–3；〈外資外債國家破產監督財政（第二講）〉，《北京大學日刊》，第911期（北京，1921年12月7日），頁2–3；〈外資外債國家破產監督財政（第二講）（續）〉，《北京大學日刊》，第912期（北京，1921年12月8日），頁1–3；〈外資外債國家破產監督財政（第二講）（續）〉，《北京大學日刊》，第913期（北京，1921年12月9日），頁2–3；〈外資外債國家破產監督財政（第三講）〉，《北京大學日刊》，第921期（北京，1921年12月19日），頁2–3。另合併刊於顧孟餘，〈外資·外債·國家破產·監督財政〉，《北京大學月刊》，第1卷第9號（北京，1922年2月），頁1–20。

顧孟餘講、梅心如筆記，〈體育、道德與智識階級的擔負〉，《北京大學日刊》，第1008期（北京，1922年4月23日），頁1。另刊於顧孟餘，〈體育、道德與智識階級的擔負〉，《晨報副鐫》，北京，1922年4月26日，頁2。

顧孟餘講演、蘇芬筆記，〈經濟生活底條件〉，《晨報副鐫》，北京，1922年3月4日，頁1–2；1922年3月8日，頁1–2。

顧孟餘講演、羅敦偉筆記，〈中國出入口商業的現狀〉，《東方雜誌》，第19卷第9號（上海，1922年5月），頁113–120。

顧孟餘講演、陳東原述，〈顧孟餘氏之工讀互助論〉，《晨報副鐫》，北京，1922年11月27日，頁1–2。另刊於《山東教育公報旬刊》，第57冊（1922年12月），頁35–41。

- 顧孟餘講演、黃慶中筆記，〈賬目折現〉，《北大經濟學會半月刊》，第11期（北京，1923年6月1日），第3-4版。
- 顧孟餘講、陳寶麟筆記，〈銀行信用與出產消費之關係〉，《北大經濟學會半月刊》，第12期（北京，1923年6月16日），第4版。
- 顧孟餘講、陳政筆記，〈顧孟餘先生開學演說詞〉，《北京大學日刊》，第1291期（北京，1923年9月15日），頁1。
- 顧孟餘講演、吳祥麟記，〈紀事——顧夢漁先生在政治學會的談話〉，《北京大學日刊》，第1350期（北京，1923年11月27日），頁2。
- 顧孟餘，〈祝辭〉，《北大經濟學會半月刊》，第29期（北京，1924年12月17日），第1版。
- 顧孟餘，〈顧孟餘演說詞（要點）〉（1926年3月18日），《國民新報》，1926年3月19日。亦收入江長仁，《三一八慘案資料匯編》，出版資料不詳，頁41。
- 顧孟餘，〈關於登記意義之演說辭：顧孟餘部長演說辭〉（中央組織部印行），1926年7月6日，收入中國國民黨黨史館藏，《五部檔案》，部4198。
- 顧孟餘，〈中國南方生物學會開歡迎大會名人演講辭彙錄大意：顧孟餘先生演說〉，收入《國立廣東大學演講錄》（第二集），廣州：國立廣東大學秘書處，1926年8月，頁87-88。
- 〈維經斯基同顧孟餘談話記錄〉（1926年8月17日於廣州），收入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譯，《共產國際、聯共（布）與中國革命檔案資料叢書：聯共（布）、共產國際與中國國民革命運動（1926-1927）（上）》，第3卷，頁398-401。
- 〈維經斯基同顧孟餘談話記錄〉（1926年8月31日於廣州），收入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譯，《共產國際、聯共（布）與中國革命檔案資料叢書：聯共（布）、共產國際與中國國民革命運動（1926-1927）（上）》，第3卷，頁422-424。
- 顧孟餘，〈學術與革命的關係〉（武昌中山大學開學典禮演說詞），《中央副刊》，漢口，1927年3月26日。
- 顧孟餘，〈顧孟餘發言〉（1927年7月15日），中國國民黨黨史館藏，「二屆中央第1-20次擴大會議速紀錄」，檔號：會2.4/14。
- 汪精衛、顧孟餘，〈汪顧兩委員在臨時宣傳大隊開會時之演說〉（1927年8月9日），中國國民黨黨史會藏，《一般檔案》，一般436/160.2。
- 顧孟餘，〈顧孟餘昨談兩種宣傳工作〉，《京報》，1930年8月30日；收入燕塵社編，《現代支那之紀錄（一九三〇年八月）》，頁410-411。
- 顧孟餘，〈中國現在的鐵道——二十一年七月十三日在總理陵園歡送學術專家席上講演〉，《中央週報》，第215期（1932年），頁4-5；《中央日報》，南京，1932年7月14日；《鐵道公報》，第298期（1932年），頁18-20（標題改為〈中國現有鐵道狀況——七月十三日歡送學術專家席上顧部長報告詞〉）。
- 顧孟餘，〈資本主義與中國經濟之路——二十二年一月二十三日在中央紀念週講〉，《中央日報》，南京，1933年1月24-25日；《中央黨務月刊》，第54期（1933年1

月)，頁1163-1165；《銀行週報》，卷17期4（上海，1933年2月7日），頁1-4；《華僑週報》，第25期（1933年），頁29-31；另收入李劍虹審閱，《當代黨國名人講演集》，出版地不詳：軍事新聞社，1934，經濟篇，頁1-8；沈雲龍主編，《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第82輯，台北：文海出版社，1972。

顧孟餘，〈顧孟餘談話否認違法舞弊〉（1934年7月1日），《大公報》，1934年7月2日，第3版。

顧孟餘，〈必超群紀錄，〈民國三十一年元旦顧校長對全體師生致詞〉〉（1942年1月1日），《中央大學日刊》，復第54號（1942年1月7日），第1版。

顧孟餘，〈英國議會訪華團顧孟餘致詞〉（1942年11月13日），《英國議會訪華團資料》，出版地與出版者不詳，1942，頁22-23。

顧孟餘，〈中共現狀及其運命（在東京談話）〉，《中國之聲》，第6卷第4期（香港，1953年1月26日），頁3-5。原為日文版〈中共の現狀とその運命〉，刊於《東京新聞》，1953年1月15、16日。

三、政治評論與序文

夢漁，〈社論：生計問題之一二〉，《獨立週報》，第1年第1號（上海，1912年9月22日），頁10-13。

夢漁，〈社論：官吏問題〉，《獨立週報》，第1年第10號（上海，1912年11月24日），頁19-22。

夢漁，〈社論：評粵省維持紙幣價格〉，《獨立週報》，第1年第14號（上海，1912年12月22日），頁18-20。

顧兆熊，〈論政黨（未完）〉，《獨立週報》，第2年第4號（上海，1913年2月2日），頁31-33；顧夢漁，〈論政黨（續）〉，《獨立週報》，第2年第5號（上海，1913年2月9日），頁27-29。

夢漁，〈社論：說幣制（其一）〉，《獨立週報》，第2年第11號（上海，1913年3月23日），頁14-18。

夢漁，〈社論：論社會主義〉，《獨立週報》，第2年第12號（上海，1913年3月30日），頁18-20；《獨立週報》，第2年第13號（上海，1913年4月6日），頁17-19。

夢漁，〈社論：中國國民生計之現狀〉，《獨立週報》，第2年第14-15號（上海，1913年4月13、20日），頁39-42。

顧兆熊，〈顧兆熊來稿〉，《國民雜誌》，第1年第3號（東京，1913年6月15日）。

顧兆熊，〈文理兩科合併之理由〉，《北京大學日刊》，第223期（北京，1918年10月9日），頁2-3。

顧兆熊，〈對於北京學生運動的輿論：一九一九年五月四日北京學生之示威運動與國民之精神的潮流〉，《晨報》，1919年5月9日，第6版；《每週評論》，第22期（北京，1919年5月18日），頁4。

- 顧孟餘，〈三民主義與虛無主義〉，《中央日報》，漢口，1927年7月10日。收入中央宣傳部編輯，《中國國民黨黨務文件論說集要·第一輯》，武漢：中央日報印刷所，1927年8月，頁49-53。另刊於《大公報》，天津，1927年7月24日，第2版。轉載自7月10日武漢的報紙。本文的英文版“Sun Yat-sen vs. Nihilism”刊於 *People's Tribune*, July 12, 1927, p. 1. (Milly Bennett, *On Her Own*, p. 294)
- 顧孟餘，〈糾正幾種錯誤的思想〉，《中央日報》，漢口，1927年7月15日。（參見〈漢口通信〉（7月15日），《大公報》，天津，1927年7月26日，第2版）。另刊於江西省政府秘書處總務科宣傳股叢書編輯室編，《到革命之路》，南昌：江西省政府秘書處總務科宣傳股出版室，1928，頁215-218。
- 顧孟餘，〈蘇聯政策的航線〉，《中央日報》，漢口，1927年7月26日。收入中央宣傳部編輯，《中國國民黨黨務文件論說集要·第一輯》，頁89-91。（參見〈漢口簡短〉（7月26日），《大公報》，天津，1927年8月5日，第2版）。
- 顧孟餘，〈怎樣完成國民革命〉，《中央日報》，漢口，1927年7月29日。收入中央宣傳部編輯，《中國國民黨黨務文件論說集要·第一輯》，頁97-103。
- 顧孟餘，〈糾正幾種錯誤的思想（二）：國民黨必須有階級基礎嗎？〉，《中央日報》，漢口，1927年8月10日；收入中國國民黨文化傳播委員會黨史館藏，《一般檔案》，一般436/160.2；重刊於〈國民黨必須有階級基礎嗎？〉，《前進》，第1卷第3期（1928年7月），頁6-12。原文另刊於江西省政府秘書處總務科宣傳股叢書編輯室編，《到革命之路》，南昌：江西省政府秘書處總務科宣傳股出版室，1928，頁218-227。〈糾正幾種錯誤的思想（一）、（二）〉合刊於中央宣傳部編輯，《中國國民黨黨務文件論說集要·第一輯》，頁64-79。
- 顧孟餘，〈發刊詞〉，《前進》，第1卷第1期（1928年6月1日），頁1-3。
- 同文，〈怎樣到了現在（上）〉，《前進》，第1卷第1期（1928年6月1日），頁1-6。
- 愈之，〈怎樣到了現在（下）〉，《前進》，第1卷第2期（1928年6月16日），頁6-12。
- 愈之，〈由日本問題談到所謂外交〉，《前進》，第1卷第2期（1928年6月16日），頁1-6。
- 公孫愈之，〈我們對於第五次會議最小限度的要求〉，《前進》，第1卷第3期（1928年7月），頁1-6。
- 公孫愈之，〈中國農民問題（未完）〉，《前進》，第1卷第4期（1928年7月），頁1-11；〈中國農民問題（下）（續第四號）〉，《前進》，第1卷第6期（1928年8月），頁1-11。本收入陶希聖編，《中國問題之回顧與展望》，上海：新生命書局，1930，頁257-286；潘甯編輯，呂夢南校訂，《中國經濟論戰》，上海：上海長城書店，1932年4月，頁309-346。
- 公孫愈之，〈為第五次會議再進一言〉，《前進》，第1卷第5期（1928年8月），頁1-9。
- 顧孟餘，〈國際形勢〉，《前進》，第1卷第6期（1928年8月），頁1-7。

桑土，〈中國經濟之路〉，《前進》，第1卷第8期（1928年9月），頁1–10。孫愈，〈中國經濟之路〉，收入陶希聖編，《中國問題之回顧與展望》（上海：新生命書局，1930年），頁349–363。（Arif Dirlik 認為孫愈是顧孟餘的筆名，¹此文刊於《前進》，其立場無疑為改組派之觀點，然而桑土並非顧所慣用之筆名，且文中主張中國為「封建社會」與顧之立場不同，也有可能不是顧孟餘的作品。）

公孫愈之，〈關於階級問題的幾件事實〉，《前進》，第1卷第9期（1928年9月），頁1–13。

公孫愈之，〈答覆中國無政府主義的《革命週報》〉，《前進》，第1卷第10期（1928年12月），頁1–4。

公孫愈之，〈社會階級論中的幾個根本問題（未完）〉，《前進》，第1卷第10期（1928年12月），頁1–10；〈社會階級論中的幾個根本問題〉，《前進》，第1卷第11期（1929年1月），頁1–7。

顧孟餘，〈關於階級問題之最後一言〉（1930年4月22日），收入《汪精衛先生最近言論集》，香港：南華日報社，1930，頁157–164。

顧孟餘，〈論唯物史觀〉（1930年5月14日），收入《汪精衛先生最近言論集》，頁165–180。另刊於《革命戰線》，第8期（北平，1930年6月5日），頁58–63。

顧孟餘，〈革命者今日應有的信念〉（5月21日寄自天津），《南華評論》（週刊），第1卷第3期（香港：南華日報社，1931年），頁2–4。另刊：公孫愈之，〈革命者今日應有的信念〉，《民友》，第1卷第5號（上海，1931年5月4日），頁5–6。

顧孟餘，〈理論之厄運與中國人之厄運〉，《南華評論》，第1卷第4期（香港，1931年），頁9–11。

顧孟餘，〈革命者之內省〉，《南華評論》，第1卷第7期（香港，1931年），頁7–9。

顧孟餘，〈關於階級問題的幾件事實〉，《南華評論》，第1卷第15期（香港，1931年8月29日），頁7–14。（原刊於《前進》，第1卷第9期）

顧孟餘，〈序一〉（1932年12月），鐵道部鐵道年鑑編纂委員會，《鐵道年鑑（第一卷）》，南京：鐵道年鑑編纂委員會，1933，頁1。

顧孟餘，〈膠濟鐵路接收第十週年紀要序〉，膠濟鐵路管理局編，《膠濟鐵路接收十週紀要》，青島：膠濟鐵路管理局，1933年1月，卷首無頁數。

顧孟餘，〈鐵展題詞〉（1933年4月10日），收入鐵道部全國鐵路沿線出產貨品展覽會編訂，《鐵展滬會講演錄》，上海：鐵道部全國鐵路沿線出產貨品展覽會，1933，頁2–3。亦收入鐵道部編，《鐵展匯刊》，第1期，上海：鐵道部全國鐵路沿線出產貨品展覽會，1934，卷首無頁碼。

顧孟餘，〈正太鐵路接收紀念刊序〉，正太鐵路管理局編，《正太鐵路接收紀念刊》，石家莊：正太鐵路管理局，1933年5月，頁1–2。

1 Arif Dirlik, *Revolution and History: Origins of Marxist Historiography in China, 1919-1937*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9), p. 283.

- 顧孟餘，〈顧孟餘申辯文〉（1934年6月），收入先導社編印，《監察院彈劾顧孟餘案始末記》，廣州：先導社，1934，頁22-47。
- 顧孟餘，〈鐵展之意義〉，收入鐵道部編，《鐵展》第2期（北平：鐵道部全國鐵路沿線出產貨品展覽會，1935），頁1-2。
- 顧孟餘，〈序一〉（1935年5月），交通部考察團編，《考察歐美交通報告》，上海：商務印書館，1936，頁1。
- 顧孟餘，〈序〉，楊裕芬等編，《粵漢鐵路株韶段通車紀念刊》，粵漢鐵路株韶段工程局，1936年7月出版；台北：傳記文學出版社，1971年10月影印初版，頁9-10。
- 顧孟餘，〈追悼蔡子民先生特輯 憶蔡子民先生〉，《東方雜誌》，第37卷第8號（香港，1940年4月），頁63-64；〈蔡子民先生謝世六週紀念特輯（上）：憶蔡子民先生〉，《龍鳳月刊》，第1期（福建永安，1945年4月30日），頁66。
- 顧孟餘，〈顧序〉（1942年8月），陳伯莊，《蘇聯經濟制度》，重慶：商務印書館，1943年3月，頁1。
- 存齋，〈平坦之路〉，《今日》（半月刊），第1期（香港，1950年3月10日）。
- 存齋，〈中國現在所急切需要的是什麼？〉，《大道》，第1期（香港，1950年4月20日），頁3。
- 存齋，〈資本主義之前途〉，《大道》，第2期（香港，1950年6月28日），頁1-3、7。
- 存齋，〈民族之生命〉，《大道》，第3期（香港，1950年12月5日），頁2-4。
- 存齋，〈再論民族之生命〉，《大道》，第4期（香港，1951年5月15日），頁1-4。
- 存齋，〈寫於本刊發行之日〉，《中國之聲》，第1卷第1期（香港，1951年10月11日），頁3-4。
- 存齋，〈往自由與民主之路〉，《獨立論壇》，第1卷第11期（香港，1951年10月25日），頁3-5。
- 存齋，〈辯證唯物論近解新估（上）〉，《中國之聲》，第3卷第2期（香港，1952年4月10日），頁2-4；〈辯證唯物論近解新估（下）〉，《中國之聲》，第3卷第3期（香港，1952年4月17日），頁2-5。
- 顧孟餘，〈經濟制度問題〉，《中國之聲》，第5卷第3期（香港，1952年10月27日），頁3-6。

四、編著書籍

- 公孫愈之等著，《中國農民及耕地問題（前進文選之一）》，上海：復旦書店，1929年10月，95頁。
- 公孫愈之等著，《革命的真理（前進文選之二）》，上海：復旦書店，1929年11月，140頁。

五、信函、電報選輯

- 「顧孟餘致胡適函」(1923年6月9日)，〈北京檔〉，《胡適檔案》，藏中研院近史所，檔號：HS-JDSHSC-1648-002。收入耿雲志主編，《胡適遺稿及秘藏書信》，合肥：黃山書社，1994，第41冊，頁615—619。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編，《胡適來往書信選》，香港：中華書局，1983，上冊，頁205。
- 「顧孟餘致胡適函」(1920年代)，〈北京檔〉，《胡適檔案》，藏中研院近史所，檔號：HS-JDSHSC-1648-003。
- 「顧孟餘致胡適函」(1920年代)，〈北京檔〉，《胡適檔案》，藏中研院近史所，檔號：HS-JDSHSC-1648-004。
- 「顧孟餘致胡適等函」(1920年代)，〈北京檔〉，《胡適檔案》，藏中研院近史所，檔號：HS-JDSHSC-1648-005。收入耿雲志主編，《胡適遺稿及秘藏書信》，第41冊，頁611。
- 「顧孟餘致胡適函」(1920年代)，〈北京檔〉，《胡適檔案》，藏中研院近史所，檔號：HS-JDSHSC-1648-006。收入耿雲志主編，《胡適遺稿及秘藏書信》，第41冊，頁612。
- 「顧孟餘致胡適函」(1920年代)，〈北京檔〉，《胡適檔案》，藏中研院近史所，檔號：HS-JDSHSC-1648-008。收入耿雲志主編，《胡適遺稿及秘藏書信》，第41冊，頁609—610。
- 「顧孟餘致胡適函」(1920年代)，〈北京檔〉，《胡適檔案》，藏中研院近史所，檔號：HS-JDSHSC-1648-009。收入耿雲志主編，《胡適遺稿及秘藏書信》，第41冊，頁613—614。
- 「顧孟餘上中執會函」(1926年10月1日)，中國國民黨文化傳播委員會黨史館藏，《漢口檔案》，漢3041。
- 「顧孟餘、何香凝電汪兆銘」(1927年1月14日)，〈汪兆銘投日前與政府首要函電(二)〉，收入《汪兆銘史料》，台北，國史館藏，典藏號：118-010100-0049-049。
- 「顧孟餘致蔣介石等電」(1927年2月8日)，武漢地方志編纂委員會辦公室編，《武漢國民政府史料》，頁78。
- 「顧孟餘致蔣中正函」(1935年12月25日)，〈一般資料——名人書翰〉，《蔣中正總統文物》，台北，國史館藏：典藏號：002-080200-00622-023。該信在資料庫之中未繫年，應為1935。
- 「顧孟餘電汪兆銘」(1938年11月22日)，〈抗戰前汪兆銘與各方首要函電〉，收入《汪兆銘史料》，台北，國史館藏，典藏號：118-010100-0055-023。
- 「顧孟餘電汪兆銘」(1938年12月30日)，〈汪兆銘投日前與政府首要函電(二)〉，收入《汪兆銘史料》，台北，國史館藏，典藏號：118-010100-0049-056。
- 「顧孟餘致蔣中正函」(1941年2月9日)，〈革命文獻——對美外交：居里兩度來華(一)〉，收入《蔣中正總統文物》，國史館藏，數位典藏號：002-020300-00033-011。

「顧孟餘致王世杰函」(1952年9月17)，〈往來函電〉，收入《王世杰檔案》，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藏，檔號：302-01-03-11-655。

「顧孟餘致朱家驊函」(1956年10月19日)，〈人才人事〉，收入《朱家驊檔》，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藏，檔號：301-01-23-744。

參考書目

檔案與未刊手稿

- 《一般檔案》，台北，中國國民黨黨史館。
- 《五部檔案》，台北，中國國民黨黨史館。
- 《王世杰檔案》，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藏，〈往來函電〉。
- 《朱家驊檔》，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藏，〈人才人事〉。
- 《宋子文檔案》，美國，史丹佛大學胡佛研究所藏，吳景平教授提供。
- 《汪兆銘史料》，台北，國史館藏，〈抗戰前汪兆銘與各方首要函電〉。
- 《汪兆銘史料》，台北，國史館藏，〈汪兆銘投日前與政府首要函電（二）〉。
- 《汪兆銘史料》，台北，國史館藏，〈汪兆銘投敵前與政府首要函電（一）〉。
- 《汪兆銘史料》，台北，國史館藏，〈汪兆銘組偽政府時各方函電〉。
- 《汪兆銘史料》，台北，國史館藏，〈汪兆銘與中國國民黨有關之各項函電（一）〉。
- 《汪兆銘史料》，台北，國史館藏，〈汪兆銘與汪政府各省市長函電（一）〉。
- 《汪兆銘史料》，台北，國史館藏，〈汪精衛致總裁函電〉。
- 《汪兆銘史料》，台北，國史館藏，〈國際各有關方面致汪兆銘函電〉。
- 《南京大學歷史檔案》，南京，南京大學檔案館。
- 《吳稚暉檔案》，台北，中國國民黨黨史館。
- 《胡適檔案》，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藏。
- 《軍事委員會委員長侍從室》，台北，國史館藏，〈顧孟餘〉。
- 《國民政府檔案》，台北，國史館藏，〈汪兆銘叛國（一）〉。
- 《教育部檔》，南京，第二歷史檔案館藏，1941。
- 《陳誠副總統文物/文件/石叟叢書/續編》，台北，國史館藏，〈石叟叢書續編——友聲集下冊（74）〉。
- 《黃淬伯先生日記》，未刊手稿，陸遠整理校注。

《蔣中正日記》(手稿本)，美國，史丹佛大學胡佛研究所藏。

《蔣中正總統文物/特交檔案/黨務(黨史館)》，台北，國史館藏，〈特交檔案(黨務)——中央報告〉。

《蔣中正總統批簽》，台北，中國國民黨黨史館藏。

《閻錫山史料》，台北，國史館藏，〈討論黨國大事之件〉。

《譚延闓日記》，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藏。

「李樸生、陳克文往來書信」，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陳方正藏未刊函件。

Foreign Radio Broadcasts, Foreign Broadcast Information Service (FBIS) Daily Reports.

(「美國中央情報局海外情報檔案：1941–1996」資料庫)

Archives Direct: Foreign Office Files for China, 1919–1980. <http://www.archivesdirect.amdigital.co.uk/Documents/>.

Digital National Security Archive. <https://search.proquest.com/dnsa?accountid=13877>.

The U.S. Department of State Freedom of Information Act (FOIA). <https://foia.state.gov/>.

Central Intelligence Agency (FOIA). <https://www.cia.gov/>.

報紙

《人民日報》，北京，2011。

《上海日報》，香港，1950。

《大公報》，天津，1903、1912、1923–1925，1927、1930、1939、1941。

《工商日報》，香港，1927。

《工商晚報》，香港，1933、1947。

《中央大學日刊》，重慶，1942年

《中央日報》，台北，1969、1972。

《中央日報》，南京，1929、1932、1948。

《中央日報》，重慶，1941。

《中央日報》，漢口，1927。

《中國時報》，台北，1983。

《天文台》，香港，1972。

《天光報》，香港，1933、1936、1937。

《北平北方日報》，1948。

《北京大學日刊》，北京，1921、1924。

《民國日報》，上海，1921。

《申報》，上海，1925、1926、1935、1937、1939、1940、1944、1948。

《立報》，上海，1948。

《良友畫報》，上海，1926。

- 《社會日報》，上海，1931、1932、1933、1936。
- 《東京新聞》，東京，1953。
- 《南方都市報》，廣州，2013。
- 《南華日報》，香港，1934、1935。
- 《建設日報 中國日報 評論日報聯合版》，1948。
- 《星島晚報》，香港，1951。
- 《香港工商日報》，1928、1935。
- 《香港華字日報》，1935、1937。
- 《真報》，香港，1955。
- 《時事新報》，上海，1931。
- 《國民政府公報》，南京，1929。
- 《教育部公報》，重慶，1943。
- 《晨報》，北京，1925。
- 《善後會議公報》，1925。
- 《晶報》，1936、1938。
- 《華字晚報》，香港，1937。
- 《華僑日報》，香港，1948、1952、1953、1954。
- 《順天時報》，北京，1925。
- 《新加坡南僑日報》，新加坡，1948。
- 《朝日新聞》，大阪，1939。
- 《滿洲日報》，大連，1934。
- 《圖畫時報》，上海，1925。
- 《福爾摩斯》，上海，1932、1933、1937。
- 《聯合報》，台北，1962、1963、1975、1980。
- 《羅賓漢》，上海，1949。
- 《讀賣新聞》，東京，1940。
- The China Press*, Shanghai, 1934, 1935.
- New York Times*, 1926, 1939.
- North China Herald*, 1940.
- The Illustrated London News*, 1935.
- Time*, 1945.

專書

三民主義青年團中央部編，《三民主義青年團團史資料第一輯初稿（上編）》，重慶：

三民主義青年團中央部，1946。

于右任，《右任詩存》，上海：大東書局，1948。

大陸雜誌社編，《朱家驊先生逝世紀念冊》，台北：治喪委員會，1963年6月。

不詳，《汪陳甘願出席問題》，出版地與出版者不詳，1928。

不詳，《英國議會訪華團資料》，出版地與出版者不詳，1942。

不詳，《財政經濟：交通郵電》（出版時地與出版者不詳）。

中央宣傳部編輯，《中國國民黨黨務文件論說集要·第一輯》，武漢：中央日報印刷所，1927年8月。

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編譯，《共產國際、聯共（布）與中國革命檔案資料叢書：共產國際、聯共（布）與中國革命文獻資料選輯（1926–1927）（下）》，第六卷，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1998。

———，《共產國際、聯共（布）與中國革命檔案資料叢書：聯共（布）、共產國際與中國國民革命運動（1920–1925）》，第一卷，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1997。

———，《共產國際、聯共（布）與中國革命檔案資料叢書：聯共（布）、共產國際與中國國民革命運動（1926–1927）（上）》，第三卷，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1998。

———，《共產國際、聯共（布）與中國革命檔案資料叢書：聯共（布）、共產國際與中國國民革命運動（1926–1927）（下）》，第四卷，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1998。

中共北京市委黨史研究室編，《第一次國共合作在北京》，北京：北京出版社，1989。

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全國委員會文史和學習委員會編，《文史資料選輯合訂本》，第45–47輯，北京：中國文史出版社，2011。

———，《文史資料存稿選編：軍政人物（下）》，第20冊，北京：中國文史出版社，2002。

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福建省委員會文史資料委員會編，《政壇浮生錄——林知淵自述》，福州：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福建省委會文史資料委員會，1989。

中國文化書院學術委員會編，《梁漱溟全集（第六卷）》，濟南：山東人民出版社，1993。

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中華民國史研究室編，《胡適來往書信選》，香港：中華書局香港分局，1983。

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中華民國史組編，《中華民國史料叢稿專題資料選輯第三輯：胡適駐美大使期間往來電稿》，北京：中華書局，1978。

中國青年軍人社編，《反蔣運動史》，台北：李敖出版社，1991〔1934〕。

- 中國留德同學會理事會編，《留德同學通訊錄》，重慶：中國留德同學會理事會，1944。
- 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編，《中國國民黨第一、二次全國代表大會會議史料》，上下冊，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86。
- 王子壯，《王子壯日記》，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01。
- 王世杰著，林美莉編輯校訂，《王世杰日記》，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12。
- 王正華編，《蔣中正總統檔案：事略稿本》，第1冊，台北：國史館，2003。
- ，《蔣中正總統檔案：事略稿本》，第20冊，台北：國史館，2005。
- ，《蔣中正總統檔案：事略稿本》，第34冊，台北：國史館，2009。
- ，《蔣中正總統檔案：事略稿本》，第40冊，台北：國史館，2010。
- 王汎森等著，《中國近代思想史的轉型時代》，台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2007。
- 王克文，《汪精衛·國民黨·南京政權》，台北：國史館，2001。
- 王奇生，《黨員、黨權與黨爭：1924–1949年中國國民黨的組織形態（修訂增補本）》，北京：華文出版社，2010。
- 王效挺、黃文一主編，《戰鬥在北大的共產黨人》，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1。
- 王萍訪問、官曼莉紀錄，《杭立武先生訪問紀錄》，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0。
- 正太鐵路管理局編，《正太鐵路接收紀念刊》，石家莊：正太鐵路管理局，1933年5月。
- ，《全國鐵路職員錄（正太鐵路）》，石家莊：正太鐵路管理局，1934。
- 北京大學經濟學院編，《北京大學經濟學院（系）百年圖史》，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2。
- 先導社編印，《監察院彈劾顧孟餘案始末記》，廣州：先導社，1934。
- 全國經濟委員會編，《全國經濟委員會成立紀要》，南京：全國經濟委員會，1934。
- 朱其華，《一九二七年底回憶》，上海：新新出版社，1933。
- 朱浚源，《同盟會的革命理論：「民報」的個案研究》，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85。
- 朱斐主編，《東南大學史（第一卷），1902–1949》，南京：東南大學出版社，1991。
- 江西省政府秘書處總務科宣傳股叢書編輯室編，《到革命之路》，南昌：江西省政府秘書處總務科宣傳股出版室，1928。
- 江勇振，《舍我其誰：胡適，第二部，日正當中，1917–1927》，台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2013。
- 行政院秘書處編，《行政院工作報告》，南京：行政院秘書處，1935。
- 行政院新聞局，《粵漢鐵路》，南京：行政院新聞局，1947。
- 余英時，《余英時回憶錄》，台北：允晨出版社，2018。
- 吳淑鳳編，《蔣中正總統檔案：事略稿本》，第6冊，台北：國史館，2003。

- 呂芳上主編，《蔣中正先生年譜長編》，第2、3、4、6冊，台北：國史館、國立中正紀念堂管理處、財團法人中正文教基金會，2014。
- 李大釗，《李大釗文集》，下冊，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4。
- 李玉貞，《國民黨與共產國際（1919-1927）》，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 李志毓，《驚弦：汪精衛的政治生涯》，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2014。
- 李宗仁口述、唐德剛撰寫，《李宗仁回憶錄》，南寧：廣西人民出版社，1980。
- ，《李宗仁回憶錄（下）》，台北：遠流出版社，2010。
- 李珂，《陳公博》，石家莊：河北人民出版社，1997。
- 李書華，《日本一周》，出版地不詳：李書華發行，1948。
- 李雲漢，《從容共到清黨》，台北：中國學術著作獎助委員會，1973。
- 李微塵，《中國局勢的必然發展》，香港：自由出版社，1950。
- 李戡，《國民黨員毛澤東》，台北：李敖出版社，2014。
- 李潔明著、林添貴譯，《李潔明回憶錄——美、中、台三角關係大揭密》，台北：時報出版社，2003。
- 李學通等整理，《翁文灝日記》，北京：中華書局，2014〔2010〕。
- 汪兆銘，《汪先生最近重要論文：舉一個例》，上海：中華日報館，1939。
- 汪朝光，《1945-1949：國共政爭與中國命運》，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0。
- 汪榮寶，《本朝史講義 第2編：全盛時期》，北京：京師譯學館出版，清光緒三十二年（1906）。
- 汪精衛，《汪精衛先生最近言論集》，香港：南華日報社，1930。
- 沈亦雲，《亦雲回憶》，台北：傳記文學出版社，1968。
- 沈雲龍，《黃膺白先生年譜長編》，台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76。
- 沈雲龍訪問，林能士、藍旭男紀錄，《凌鴻勛先生訪問紀錄》，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82。
- 沈雲龍訪問，陳存恭紀錄，《劉景山生訪問紀錄》，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87。
- 沈寧，《難忘帥府園：民國時期美術史料札記》，台北：新銳文創，2015。
- 沈醉，《我知道的軍統內幕》，出版時地與出版者不詳。
- 周佛海著、蔡德金編註，《周佛海日記全編》，北京：中國文聯出版社，2003。
- 周利生，《吳廷康與中國大革命關係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4。
- 周美華編，《蔣中正總統檔案：事略稿本》，第28冊，台北：國史館，2007。
- 周恩來，《周恩來選集》，上冊，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
- 周德偉，《落筆驚風雨：我的一生與國民黨的點滴》，台北：遠流出版社，2011。
- 林本元，《三一八慘案始末記》，台北：革新堂，1926。
- 林孝庭，《台海冷戰解密檔案》，香港：三聯書店，2015。
- 林志宏，《民國乃敵國也：政治文化轉型下的清遺民》，台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2009。

- 林溪聲、張耐東，《邵飄萍與〈京報〉》，北京：中華書局，2008。
- 武漢地方志編纂委員會辦公室編，《武漢國民政府史料》，武漢：武漢出版社，2005。
- 波多野乾一編，《現代支那之記錄》，北京：燕塵社，1924-1932。
- 竺可楨，《竺可楨全集》，第7卷，上海：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11。
- 邵元冲，《邵元冲日記》，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
- 邵建，《瞧，這人：日記、書信、年譜中的胡適(1891-1927)》，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7。
- 邵銘煌，《和比戰難？八年抗戰的暗流》，台北：政大出版社，2017。
- 金以林，《國民黨高層的派系政治：蔣介石「最高領袖」地位是如何確立的》，北京：社科文獻出版社，2009。
- 阿納斯塔西婭·卡爾圖諾娃編，張麗譯，李玉貞校，《來到東方：加倫與中國革命史料新編》，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17。
- 施純純，《革命抑反革命？蔣中正革命道路的起源》，台北：國立中正紀念堂管理處，2017。
- 查建瑜編，《國民黨改組派資料選編》，長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
- 洪葭管編著，《中央銀行史，1928.11-1949.5》，北京：中國金融出版社，2005。
- 胡頌平編，《朱家驊年譜》，台北：傳記文學出版社，1969。
- ，《胡適之先生年譜長編初稿》，台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84。
- 胡漢民，《胡漢民先生演講集》(第三集)，上海：民智書局，1931。
- 胡適，《丁文江的傳記》，台北：胡適紀念館，1973。
- 著，季羨林主編，《胡適全集》，第2、20、21、23、24卷，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7。
- 著，曹伯言編，《胡適日記全集》，第2、3、4、6、8、9冊，台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2004。
- 胡適、雷震著，萬麗鵲編著，潘光哲校閱，《萬山不許一溪奔：胡適雷震往來書信選集》，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01。
- 胡應漢，《伍憲子先生傳記》，香港：作者發行，1953。
- 若林正丈著、洪郁如等譯，《戰後台灣政治史：中華民國台灣化的歷程》，台北：國立台灣大學出版中心，2016。
- 孫科，《二十五年來之鐵道》，南京：鐵道部印行，1930。
- 徐友春主編，《民國人物大辭典(修訂版)》，石家莊：河北人民出版社，2007。
- 徐永昌，《徐永昌日記》，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1。
- 徐永棠編，《顧案紀詳》，出版地與出版者不詳，1934年9月。
- 徐志超編著，《蕉嶺人新傳》，北京：人民日報出版社，2004。
- 徐珂，《清稗類鈔》，上海：商務印書館，1916。
- 海天出版社編，《現代史料》，第一集，上海：海天出版社，1934。

- ，《現代史料》，第二集，上海：海天出版社，1934。
- 耿雲志編，《胡適遺稿及秘藏書信》，合肥：黃山書社，1994。
- 高平叔編，《蔡元培年譜長編》，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8。
- ，《蔡元培年譜》，北京：中華書局，1980。
- 高宗武著、陶恒生譯，《高宗武回憶錄》，北京：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2008。
- 高拜石，《新編古春風樓瑣記》，台北：正中書局，2002。
- 高素蘭編，《蔣中正總統檔案：事略稿本》，第26冊，台北：國史館，2006。
- ，《蔣中正總統檔案：事略稿本》，第39冊，台北：國史館，2009。
- ，《蔣中正總統檔案：事略稿本》，第54冊，台北：國史館，2011。
- ，《蔣中正總統檔案：事略稿本》，第75冊，台北：國史館，2013。
- 國史館史料處編，《第二次中日戰爭各重要戰役史料彙編：長城戰役》，台北：國史館，1980。
- 國史館編，《國史館現藏民國人物傳記史料彙編》，第17輯，台北：國史館，1998。
- 國立政治大學人文中心主編，《民國二十八年之蔣介石先生》，台北：國立政治大學人文中心，2016。
- 國際問題研究會編，《五卅事件》，上海：國際問題研究會，1927。
- 張友仁，《張友仁回憶文集》，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2。
- 張朋園，《從民權到威權：孫中山的訓政思想與轉折——兼論黨人繼志述事》，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15。
- ，《梁啟超與民國政治》，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06。
- 張朋園、沈懷玉合編，《國民政府職官年表（1925—1949）》，第1冊，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87。
- 張朋園等訪問，陳三井、陳存恭紀錄，《郭廷以先生訪問紀錄》，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87。
- 張研田，《追憶集》，台北：時報出版公司，1979。
- 張國燾，《我的回憶》，第2冊，香港：明報月刊出版社，1974。
- 張發奎口述，鄭義譯註，《蔣介石與我：張發奎上將回憶錄》，香港：文化藝術出版社，2008。
- 張緒印主編，《國民黨派系鬥爭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
- 張靜廬輯注，《中國現代出版史料甲編》，北京：中華書店，1954。
- 梁培寬編著，《梁漱溟往來書信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
- 梁漱溟，《東西文化及其哲學》，上海：商務印書館，1922。
- 淞滬員警廳政治部編，《護黨救國重要文件彙編》，上海：淞滬員警廳政治部，1927年5月。
- 許小青，《誠樸雄偉——中央大學校長羅家倫》，濟南：山東教育出版社，2012。
- 郭廷以，《郭量宇日記殘稿》，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12。
- 郭廷以、張朋園訪問，馬天綱、陳三井紀錄，《白瑜先生訪問紀錄》，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87。

- 郭廷以編著，《中華民國史事日誌》，第1—4冊，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79。
- 郭華倫，《中共史論》，第1冊，台北：國際關係研究所，1969。
- 陳公博著，汪瑞炯、李鐸、趙令揚編註，《苦笑錄：陳公博回憶，一九二五至一九三六》，香港：香港大學亞洲研究中心，1979。
- 陳丕士著、郭濟祖譯，《中國召喚我——我參加中國革命的歷程》，北京：商務印書館，1983。
- 陳布雷，《陳布雷先生從政日記》（未刊稿樣，東南印務出版社承印），台北，國史館藏，個人史料。
- 陳正茂，《敝帚自珍：陳正茂教授論文自選集》，台北：秀威資訊，2009。
- ，《逝去的虹影：現代人物述評》，台北：秀威資訊，2011。
- 陳正茂編著，《五〇年代香港第三勢力運動史料蒐密》，台北：秀威資訊，2011。
- 陳玉堂編著，《中國近現代人物名號大辭典》，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5。
- 陳佑慎，《持駁殼槍的傳教者：鄧演達與國民革命軍政工制度》，台北：時英出版社，2009。
- 陳克文著、陳方正編輯校訂，《陳克文日記，1937—1952》，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12，上、下冊。
- 陳明遠，《陳明遠文集一：文化人的經濟生活》，西安：陝西人民出版社，2013。
- 陳惠芬輯，《美國與中國「第三勢力」》，香港：了然軒，2013。
- 陳進金，《地方實力派與中原大戰》，台北：國史館，2002。
- 陳耀煌，《統合與分化：河北地區的共產革命，1921—1949》，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12。
- 陶希聖，《中國社會之史的分析》，上海：新生命書局，1929年1月。
- 陶希聖編，《中國問題之回顧與展望》，上海：新生命書局，1930。
- 陶英惠，《典型在夙昔：追懷中央研究院六位已故院長（上）》，台北：秀威資訊，2007。
- ，《蔡元培年譜》，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76。
- 陶泰來、陶晉生整理，《陶希聖年譜》，台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2017。
- 陶菊隱，《最後一年》，上海：中華書局，1947。
- 傅斯年著，王汎森、潘光哲、吳政上主編，《傅斯年遺札》，第2卷，台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2011。
- 彭昭賢、盛世才著，蔡登山編，《彭昭賢、盛世才回憶錄合編》，台北：獨立作家，2014。
- 曾慶榴，《共產黨人與黃埔軍校》，廣州：廣州出版社，2013。
- 森川裕貫著、袁廣泉譯，《政論家的矜持：章士釗、張東蓀政治思想研究》，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7。
- 游鑑明、沈懷玉訪問，周維朋紀錄，《曾祥和女士訪問紀錄》，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18。

- 程玉鳳編註，《蔣中正總統檔案：事略稿本》，第72冊，台北：國史館，2013。
- 程思遠，《我的回憶——百年中國風雲實錄》，哈爾濱：北方文藝出版社，2011。
- ，《李宗仁先生晚年》，北京：文史資料出版社，1980。
- ，《政海秘辛》，香港：南粵出版社，1988。
- ，《政壇回憶》，南寧：廣西人民出版社，1986。
- 舒新城編，《近代中國教育史料(第3冊)》，上海：中華書局，1928。
- 黃宇人，《我的小故事》，香港：吳興記書報社，1982。
- 黃旭初，《黃旭初回憶錄：李宗仁、白崇禧與蔣介石的離合》，台北：獨立作家，2015。
- ，《黃旭初回憶錄：廣西前三傑：李宗仁、白崇禧、黃紹竑》，台北：獨立作家，2015。
- ，《黃旭初回憶錄：從辛亥到抗戰》，台北：獨立作家，2015。
- 黃克武主編，《1960年代的台灣》，台北：國立中正紀念堂管理處，2017。
- ，《同舟共濟：蔣中正與1950年代的台灣》，台北：國立中正紀念堂管理處，2014。
- ，《重起爐灶：蔣中正與1950年代的台灣》，台北：國立中正紀念堂管理處，2013。
- ，《遷台初期的蔣中正》，台北：國立中正紀念堂管理處，2011。
- 黃克武等訪問、周維朋等紀錄，《蔣中正總統侍從人員訪問紀錄》，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12。
- 黃道炫、陳鐵健，《蔣介石：一個力行者的思想資源》，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2012。
- 黃福慶，《近代中國高等教育研究：國立中山大學(1924–1937)》，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88。
- 黃麗安，《朱家驊與中央研究院》，台北：國史館，2010。
- 楊奎松，《忍不住的關懷：1949年前後的書生與政治(增訂版)》，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3。
- 楚崧秋口述，呂芳上、黃克武訪問，王景玲紀錄，《楚崧秋先生訪問紀錄：覽盡滄桑八十年》，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01。
- 粵漢鐵路株韶段工程局編，《粵漢鐵路株韶段民國廿四年工作之回顧》，出版地不詳：編者印行，1935。
- 葉飛鴻、程玉鳳編，《丁惟汾先生史料彙編》，台北：國史館，2014。
- 葉惠芬編註，《蔣中正總統檔案：事略稿本》，第46冊，台北：國史館，2010。
- 道清鐵路管理局編，《道清線全國鐵路職員錄》，道口：道清鐵路管理局，1934。
- 雷震撰、傅正主編，《雷震全集》，台北：桂冠圖書公司，1990。
- 聞黎明，《第三種力量與抗戰時期的中國政治》，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04。
- 劉國銘主編，《國民政府軍政職官人物志》，北京：春秋出版社，1989。

- 劉維開編，《中國國民黨職名錄》，台北：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委員會，1994。
- 廣州平社，《廣州事變與上海會議》，廣州：廣州平社，1928。
- 歐美同學會編，《歐美同學通信錄》，北京：歐美同學會，1922。
- 歐陽哲生，《五四運動的歷史詮釋》，台北：秀威資訊，2011。
- 潘肅編輯；呂夢南校訂，《中國經濟論戰》，上海：上海長城書店，1932年4月。
- 膠濟鐵路管理局編，《膠濟鐵路接收十周紀要》，青島：膠濟鐵路管理局，1933年1月。
- 蔡元培，《蔡元培文集》，台北：錦繡出版社，1995。
- ，《蔡元培自述》，北京：中國言實出版社，2015。
- ，王世儒編，《蔡元培日記》，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0。
- 蔡登山，《叛國者與「親日」文人》，台北：獨立作家，2015。
- 蔡德金、王升編著，《汪精衛生平紀事》，北京：中國文史出版社，1993。
- 蔣中正，《民國十八年蔣總司令言論集（下卷）》，出版時地、出版者不詳。
- ，《先總統蔣公思想言論總集》，台北：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委員會，1984。
- 蔣永敬，《胡漢民先生年譜》，台北：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委員會，1978。
- 蔣寶麟，《體國經世：民國的學人與商人》，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15。
- 鄭天挺，《鄭天挺西南聯大日記》，北京：中華書局，2018。
- 鄭義編著，《國共香江謀戰》，香港：香港文化藝術出版社，2009。
- 魯迅，《魯迅全集》，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7。
- 盧豔香，《中國國民黨中政會研究，1924–1937》，北京：社科文獻出版社，2016。
- 蕭李居編註，《蔣中正總統檔案：事略稿本》，第42冊，台北：國史館，2003。
- ，《蔣中正總統檔案：事略稿本》，第43冊，台北：國史館，2010。
- 錢穆，《八十憶雙親師友雜憶合刊》，台北：東大圖書公司，1983。
- ，《治統與道統——從中國文化來看國父與故總統孫、蔣二公及當前之學術界》，台北：中央研究院三民主義研究所，1977。
- 薛仁明主編、杜至偉，顧文豪箋注，《天下事，猶未晚（胡蘭成致唐君毅書八十七封）》，台北：爾雅出版社，2011。
- 薛月順編註，《蔣中正總統檔案：事略稿本》，第44冊，台北：國史館，2010。
- 羅成典，《立法院風雲錄》，台北：獨立作家，2014。
- 羅家倫主編，《革命文獻》，第16、17輯，台北：中央文物供應社，1957。
- 鐵道部秘書廳編，《鐵道年鑑》，第3卷，上海：商務印書館，1936。
- 鐵道部鐵道年鑑編纂委員會編，《鐵道年鑑》，上海：鐵道部鐵道年鑑編纂委員會，1933。
- 顧乃眷編纂，《上虞西華顧氏宗譜》，上虞：格思堂活字本，宣統三年（1911）。
- 顧維鈞，《顧維鈞回憶錄》，北京：中華書局，1983–1994。
- 顧頤剛，《顧頤剛日記》，第5卷，台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2007。

- Bennett, Milly. *On Her Own: Journalistic Adventures from San Francisco to the Chinese Revolution, 1917–1927*. London: Routledge, 1993.
- Boorman, Howard L, ed. *Biographical Dictionary of Republican China*, Vol 2.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67–1979.
- Bunker, Gerald E. *The Peace Conspiracy: Wang Jing-wei and the China War, 1937–1941*.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2.
- Chang, Carsun. *The Third Force in China*. New York: Bookman Association, 1952.
- Chang, Fa-k'uei. *The Reminiscences of Chang Fa-k'uei (1896–1980) as Told to Julie Lien-ying How (1926–1982)*. New York: Chinese Oral History Project, East Asian Institute, Columbia University, 1970–1983.
- Chen, Percy. *China Called Me: My Life Inside the Chinese Revolution*. Boston: Little Brown, 1979.
- Deville, Gabriel. *The People's Marx: A Popular Epitome of Karl Marx's Capital*. Translated by Robert Rives La Monte. New York: The International Library Publishing Co., 1900.
- Dirlik, Arif. *Revolution and History: Origins of Marxist Historiography in China, 1919–1937*.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9.
- Eastman, Max. *Since Lenin Died*. New York: Boni and Liveright Publishers, 1925.
- Isaacs, Harold R. *The Tragedy of the Chinese Revolution*.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1 [1938].
- Jeans, Roger B., ed. *Roads Not Taken: The Struggle of Opposition Parties in Twentieth-Century China*. Boulder: Westview Press, 1992.
- . *The CIA and Third Force Movements in China during the Early Cold War: The Great American Dream*. Lanham, Maryland: Lexington Books, 2018.
- Han, Xiaorong. *Chinese Discourses on the Peasant, 1900–1949*. New York: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2005.
- Hirson, Baruch and Arthur J. Knodel, ed. *Reporting the Chinese Revolution: The Letters of Rayna Prohme*. London: Pluto Press, 2007.
- Levenson, Joseph R. *Confucian China and Its Modern Fate: A Trilogy*.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65.
- Miles, Steven B. *The Sea of Learning: Mobility and Identity in Nineteenth-Century Guangzhou*.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 2006.
- Mitter, Rana. *Forgotten Ally: China's World War II, 1937–1945*.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Harcourt, 2013.
- Pakula, Hannah. *The Last Empress: Madame Chiang Kai-Shek and the Birth of Modern China*. New York: Simon and Schuster, 2009.
- Rankin, Karl Lott. *China Assignment*. 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1964.

So, Wai-chor. *The Kuomintang Left in the National Revolution, 1924–1931*. Hong Kong: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1.

US Department of State.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1949, Vol. 8: The Far East: China*. Washington, DC: The Government Printing House, 1978.

Wei, Shuge. *News under Fire: China's Propaganda against Japan in the English-Language*.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2017.

小野稔，《汪兆銘名古屋に死す》，東京：東京ジャーナルセンター，1998。

山田辰雄，《中国国民党左派の研究》，東京：慶応通信，1980。

日本外務省調査局編纂，《現代東亞人名鑑（昭和二十五年版）》，東京：東邦研究會，1950。

松本益雄、古沢敏雄，《迎春花——趙毓松の中国革命回顧録》，東京：明德出版社，1978。

夏文運，《黃塵万丈：ある中国人の証言する日中事変秘録》，東京：現代書房，1967。

菊池貴晴，《中國第三勢力史論》，東京：汲古書店，1987。

論文

〈「任重致遠」〉，《交通雜誌》，第1卷第6/7期（南京，1933），彩頁無頁碼。

〈「作育恢弘」〉，《中法國立工學院院刊》，第1期（上海，1934），無頁碼。

〈我們對台灣的態度〉，《中國之聲》，第1卷第6期（香港，1951年11月10日），頁2–3。

〈每月人物專題座談會：顧孟餘〉，《傳記文學》，第29卷第1期（台北，1976年7月），頁6–30。

〈汪精衛到北平〉，《通問報：耶穌教家庭新聞》，1407回（上海，1930年7月，第29號），頁12。

〈汪精衛電陳璧君〉（1936年12月14日），蔡德金輯，〈西安事變前後汪精衛與陳璧君等來往電函〉，收入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史資料編輯組編，《近代史資料》，第60號（北京，1986），頁133。

〈時事日誌〉，《東方雜誌》，第21卷第7號（上海，1924年4月），頁156。

〈時事日誌〉，《東方雜誌》，第23卷第13號（上海，1926年7月），頁137。

〈時事日誌〉，《東方雜誌》，第23卷第23號（上海，1926年12月），頁143。

〈時事日誌〉，《東方雜誌》，第25卷第5號（上海，1928年3月），頁130。

〈時事日誌〉，《東方雜誌》，第26卷第10號（上海，1929年5月），頁162。

〈時事日誌〉，《東方雜誌》，第26卷第23號（上海，1929年12月），頁114。

- 〈時事日誌〉，《東方雜誌》，第27卷第19號（上海，1930年10月），頁128。
- 〈時事日誌〉，《東方雜誌》，第27卷第21號（上海，1930年11月10日），頁113。
- 〈時事日誌〉，《東方雜誌》，第29卷第8號（上海，1932年12月16日），頁57。
- 〈時事日誌〉，《東方雜誌》，第31卷第15號（上海，1934年8月1日），頁73–74。
- 〈時事日誌〉，《東方雜誌》，第44卷第7號（上海，1948年7月），頁64。
- 〈時評〉，《甲寅周刊》，第1卷第6號（北京，1925年8月22日），頁2–8。
- 〈留學一斑〉，《女子世界》，1904年第10期（上海），頁72–73。
- 〈記事：新加坡商學各界歡迎蔡元培君〉，《教育雜誌》，第4卷第8號（北京，1912年11月10日），頁57。
- 〈國民政府令十八年十月十一日〉，《國民政府公報》，第292號（南京，1929年10月12日），頁1。
- 〈善後會議開幕〉，《東方雜誌》，第22卷第4號（上海，1925年2月25日），彩頁。
- 〈發刊詞〉，《民主勢力》，第1卷第1期（東京，1951年12月），頁2–3。
- 〈開學有定期，三長均實授，院長已發表，分校主任易人〉，《中大週刊》，第16期（重慶，1941年9月28日），第2版。
- 〈簡代辦歐洲遊學生監督學生顧兆熊所請另給廠費之處礙難照准文〉，《學部官報》，期108（北京，1909），頁7。
- 〈蔡元培辭職後之宣言〉，《東方雜誌》，第20卷第1號（上海，1923年4月），頁145–147。
- 〈鐵道部部長次：部長：顧孟餘：〔照片〕〉，《鐵展畫刊》，第1期（北平，1934年5月），頁2。
- 〈顧孟餘接收中大〉，《教育通訊》，第4卷第32、33期合刊（漢口，1941年8月），頁7。
- 孔曰，〈顧孟餘內助得人〉，《攝影畫報》，第9卷第10期（上海，1933年3月），頁11。
- 孔祥吉，〈辛亥革命前后的朱啟鈐與北京〉，《福建論壇（人文社會科學版）》，2011年10期，頁95–104。
- 孔祥吉、鄭匡民，〈英倫蹈海烈士之真史——楊毓麟未刊函簡述考〉，鄭大華、鄒小站編，《辛亥革命與清末民初思想》，北京：社科文獻出版社，2012，頁385–411。
- 王月，〈李石曾與北京大學（1917–1929）〉，北京：北京大學歷史學系碩士論文，2011。
- 王正華，〈北伐前期的蔣馮關係（民國15至16年）——以〈蔣中正總統檔案〉為中心的考查〉，《國史館學術集刊》，第7期（台北，2006年3月），頁193–221。
- 王汎森，〈「主義時代」的來臨——中國近代思想史的一個關鍵發展〉，《東亞觀念史集刊》，第4期（台北，2013年6月），頁3–88。
- 王汎森，〈序〉，《中國近代思想史的轉型時代》，台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2007，頁i–vii。
- 王良卿，〈美國報刊裡的「Chiang Kai-shek」——對於*Time*、*Life*與*The New York Times*的基本調查〉，黃克武主編，《海外蔣中正典藏資料研析》，台北：國立中正紀念堂管理處，2013，頁107–148。

- 王奇生，〈搖制與強控：莫斯科與早期中共的權力機制〉，「五四運動 100 週年國際學術研討會」會議論文，台北：中央研究院，2019 年 5 月 2-4 日。
- 王鼎，〈彭學沛與顧孟餘〉，《時代風》，創刊號（上海，1946 年 4 月 6 日），頁 5。
- 丘文豪，〈梁啟超的政治面向〉，台北：師大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2013。
- 左雙文，〈「九·一八」事變後南京國民政府設立的特種外交委員會〉，《近代史研究》，2003 年第 1 期（北京），頁 296-314。
- 本刊記者，〈新聞人選有六人〉，《新聞雜誌》，新第 2 卷第 11 期（南京，1949 年 3 月），頁 2。
- 田守業，〈國民黨改組派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博士論文，2001 年 6 月。
- 白瑜，〈出身世家而愛惜羽毛的顧先生〉，《傳記文學》，第 29 卷第 1 期（台北，1976 年 7 月），頁 16-18。
- 任仲時，〈華僑起來〉，《中國之聲》，第 1 卷第 7 期（香港，1951 年 11 月 22 日），頁 2-4。
- 吉岡文六，〈談汪精衛〉，《時代精神》，創刊號（重慶，1939 年 8 月），頁 95-96。
- ，〈論汪兆銘〉，《中央公論》，第 54 年 2 月號（東京，1939 年 2 月），頁 383-388。
- 朱家驊，〈悼滕若渠同志〉，《朱家驊先生言論集》，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77，頁 727-728。
- 余英時，〈中國知識分子的邊緣化〉，收入氏著，《中國文化與現代變遷》，台北：三民書局，1992，頁 33-50。
- 克明，〈東南西北風：顧孟餘有官不做〉，《時局觀察》，第 2 期（上海，1949 年 2 月），頁 16。
- 克思明，〈三大政策的辨正：論國共互爭革命正統的歷史根源〉，《輔仁歷史學報》，期 15（台北，2004 年 7 月），頁 145-205。
- 吳克輝，〈北伐時期「迎汪」事件探究〉，《理論界》，2011 年第 6 期（瀋陽，2011 年 6 月），頁 111-115。
- 呂芳上，〈抗戰前的中央與地方——以蔣介石與廣東陳濟棠關係為例的探討（1929-1936）〉，收入氏著，《民國史論》，中冊，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2013，頁 1002-1029。
- 呂實強，〈胡適對學生運動的態度〉，周策縱等，《胡適與近代中國》，台北：時報出版公司，1991，頁 253-274。
- 李文平，〈論李大釗與丁惟汾在國共合作的關係〉，《河南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第 32 卷第 5 期（新鄉，2005 年 9 月），頁 90-93。
- 李玉貞，〈共產國際、蘇聯與黃埔軍校關係的幾個問題〉，「國軍與現代中國：黃埔建軍九十年國際學術討論會」會議論文，台北：國史館，2016 年 6 月 13 日。
- 李君山，〈中日塘沽協定後「關內外通車」談判之研究〉，《興大歷史學報》，期 16（台中，2005 年 6 月），頁 305-344。

- 李志毓，〈國民黨左派問題的再思考〉，發表於國立政治大學人文中心、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等主辦，2016年4月16-18日「蔣介石日記與民國史研究的回顧」學術討論會。
- ，〈論汪精衛1925-1927年「聯共」的策略性〉，《史林》，2009年第2期（上海，2009年4月），頁62-68。
- ，〈汪精衛視野中的國民黨：《汪精衛「自傳」草稿》解讀〉，《史林》，2017年第6期（上海，2017年12月），頁165-175。
- 李國祁，〈民國十四年汪精衛的爭權〉，《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期17（台北，1988），頁115-145。
- 李培德，〈亞洲主義在冷戰時代的香港和日本——以錢穆創辦新亞書院和太田耕造創辦亞細亞大學比較〉。北京大學，「東亞歷史上區域間的認識與互動國際研討會」會議論文，2011年11月11日-12日。
- 李微塵，〈關於「中國民主黨」——答覆由於這問題所引起的一些疑問〉，《中國之聲》，第2卷第6期（香港，1952年2月7日），頁2。
- 李壽雍，〈顧先生早年在北大的一些回憶〉，《傳記文學》，第29卷第1期（台北，1976年7月），頁13-16。
- 李樸生，〈參加黨務工作的甜酸況味（上）〉，《傳記文學》，第8卷第3期（台北，1966年3月），頁24-28。
- ，〈憶甘乃光先生〉，《自由人》，第649、650期（香港，1957年5月25日、29日），第2版。
- 李澤厚，〈啟蒙與救亡的雙重變奏〉，《中國現代思想史論》，台北：風雲時代出版公司，1991，頁1-54。
- 汪仲宏譯註，〈台北舊書攤上發現的「總統府秘書長箋函稿」（二）〉，《傳記文學》，第71卷第4期（台北，1997年10月），頁43-48。
- 汪兆銘，〈我對於中日關係之根本觀念及前進目標〉，《三民週刊》，第1卷第1期（上海，1939年8月），頁19-22。
- 汪榮祖，〈從文化與政治解讀五四前後的李大釗〉，收入黃克武主編，《重估傳統·再造文明：知識分子與五四新文化運動》，台北：秀威資訊，2019，頁134-153。
- 汪精衛，〈一個根本觀念〉，《革命評論》，第12期（上海，1928年7月），頁1-7。
- ，〈時賢自傳：自述〉，《東方雜誌》，第31卷第1號（上海，1934年1月），頁1-3。
- 汲冢，〈顧孟餘悄然去國〉，《天文台半週評論》，第36期（香港，1937年3月17日），頁4。
- 沈昌，〈黃膺白先生所期望於後進者〉，黃膺白先生紀念刊編輯委員會編，《黃膺白先生故舊感憶錄》，上海：黃膺白先生紀念刊編輯委員會，1937，頁50。
- 沈雲龍，〈廣州非常會議的分裂與寧粵滬四全代會的合作〉，《傳記文學》，第35卷第3期（台北，1979年9月），頁15-26。

- ，〈擴大會議之由來與經過〉，《傳記文學》，第33卷第4期（台北，1978年10月），頁11–20。
- 沈寧，〈走進滕固〉，《傳記文學》，第86卷第1期（台北，2005年1月），頁109–123。
- 沙培德，〈民權思想與先鋒主義：民國時期孫中山的政治主張〉，《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78期（台北，2012年12月），頁41–28。
- 亞光，〈新生活運動中知識分子應有的覺悟〉，《警醒》，第1卷第7期（漢口，1934年4月），頁31–43。
- 周一志，〈「非常會議」前後〉，全國政協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文史資料選輯》，第9輯，北京：中華書局，1960年9月，頁71–85。
- 周佛海，〈武漢追憶鱗爪〉，《古今半月刊》，第31期（上海，1943年9月16日），頁1151–1157。
- 周琇環，〈抗戰前後中英庚款會的交通建設〉，《國史館學術集刊》，第5期（台北，2005年3月），頁161–208。
- 周園，〈難民的憤慨〉，《中國之聲》，第2卷第4、5期（香港，1952年1月24日），頁13–15。
- 周普，〈在國民革命路上知識分子應認清的方向〉，《訓練月刊》，1928年第4期（上海，1928年9月），頁15–18。
- 周開慶，〈追懷胡耐安先生〉，《中外雜誌》，第23卷第1期（台北，1978年1月），頁33–35。
- 周德偉，〈谷錫五先生事略〉，《自由中國》，第13卷第1期（台北，1955年7月），頁15–17。
- 征鴻，〈汪精衛被刺目擊記〉，收入任思等著、蔡登山編，《汪精衛集團》，台北：獨立作家，2014，頁29–33。
- 林桶法，〈蔣介石的親族關懷〉，收入呂芳上策劃、導讀，《蔣介石的親情、愛情與友情》，台北：時報出版有限公司，2011，頁103–125。
- 林博文，〈一九四九年後的香港第三勢力〉，《亞洲週刊》，第24卷第2期（香港，2010年1月），頁32–35。
- 林瑾芬，〈抗戰時期行政三聯制的推動與檢討〉，台中：東海大學歷史學系碩士論文，2015。
- 邵一成，〈張發奎等赴日有何任務外間尚無所知〉，《自由人》，第66期（香港，1952年10月20日），第1版。
- 邵銘煌，〈汪政權的登場與落幕〉，收入呂芳上主編，《中國抗日戰爭史新編：戰時社會》，台北：國史館，2015，頁471–525。
- 邵銘煌，〈蔣介石的愛與恨〉，收入呂芳上策劃、導讀，《蔣介石的親情、愛情與友情》，台北：時報出版有限公司，2011，頁45–66。
- 金以林，〈地域觀念與派系衝突——以二三十年代國民黨粵籍領袖為中心的考察〉，《歷史研究》，2005年第3期（北京），頁115–128。

- ，〈汪精衛與國民黨的派系糾葛——以寧粵對峙為中心的考察〉，《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青年學術論壇（2007年卷）》，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9，頁450-473。
- ，〈蔣介石的一九三二年〉，收入呂芳上策劃、導讀，《蔣介石的親情、愛情與友情》，台北：時報文化出版企業股份有限公司，2011，頁227-257。
- 查子仁，〈一談顧孟餘〉，收入好文章社編輯，《好文章（二集）》，上海：好文章出版社，1948，頁54-57。
- 段智峰，〈蔣汪合作研究（1931-1938）〉，杭州：浙江大學歷史系博士論文，2012。
- ，〈蔣汪合作格局下的另一種局面——以1934年顧案為中心〉，《民國檔案》，2011年第1期（南京，2011年2月），頁103-110。
- 為人，〈國民黨左右派之爭〉，《嚮導週報》，第80期（上海，1924年8月），頁638。
- 胡美琦，〈紀念顧孟餘夫人〉，《傳記文學》，第29卷第1期（台北，1976年7月），頁26-29。
- 胡耐安，〈談漢口發行的中央日報（上）〉，《傳記文學》，第29卷第1期（台北，1976年7月），頁65-68。
- ，〈我所認識的顧先生〉，《傳記文學》，第29卷第1期（台北，1976年7月）頁21-32。
- 胡漢民，〈汪精衛勾結共產黨之淵源與經過：十九年八月十一日在立法院紀念週講演〉，《中央週報》，期116（南京，1930年8月），頁1-7。
- ，〈汪精衛的評價——十九年七月二十八日在立法院紀念週講演〉，《中央週報》，期114（南京，1930年8月），頁1-5。
- ，〈唯物史觀批評之批評〉，收入《唯物史觀與倫理之研究》，上海：民智書局，1925，頁1-62。
- ，〈閻馮汪勾結的因緣與汪精衛降共的實證：十九年八月十八日在立法院紀念週講演〉，《中央週報》，期117（南京，1930年9月），頁1-6。
- 胡適，〈工讀主義試行的觀察〉，《胡適全集》，卷1，頁701-706。
- ，〈陳伯莊「卅年存稿」序〉，收入陳伯莊，《卅年存稿》，香港：東南印務出版社，1959，頁1-3。
- 胡適等，〈我們的政治主張〉，《努力週報》，第2期（北京，1922年5月14日）
- 凌霜，〈馬克思學說的批判〉，《新青年》，第6卷第5號（北京，1919年5月），頁466-469。
- 唐潤明，〈汪精衛出逃後軍統對汪系人物的監視〉，《民國春秋》，1997年第2期（南京，1997年4月），頁10-12。
- 唐潤明選編，〈1939-1944年蔣介石為改善重慶市政的106道手令〉，《檔案史料與研究》，2001年第4期（重慶，2001年12月），頁2-18。
- 容啟聰，〈民主社會主義在冷戰香港：從理論闡述到參與本地政治〉，《中國文化研究所學報》，第67期（香港，2018年7月），頁229-251。

- 徐升，〈民國立法院重構及運行中的派系鬥爭（1946–1949）〉，《暨南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總第187期，卷36期8（廣州，2014），頁94–101。
- 朔一，〈大學條例又引起了學潮〉，《東方雜誌》，第21卷第7號（上海，1924年4月），頁5–8。
- 桑兵，〈馬裕藻與1934年北大國文系教授解聘風波〉，《近代史研究》，2016年第3期（北京，2016年5月），頁32–55。
- 馬敘倫，〈對於敬師運動的感想〉，《馬敘倫言論集》，大連：大眾書店，1947，頁165–170。
- 高廷梓，〈悼吾師蔡子民先生〉，《東方雜誌》，第37卷第8號（香港，1940年4月），頁64–65。
- 區志堅、侯勵英，〈香港浸會大學圖書館友聯資料介紹〉，《近代中國史研究通訊》，期31（台北，2001），頁92–101。
- 張允中，〈財政部特級秘書孔令侃〉，《民心》，期2（上海，1937年12月），頁40–42。
- 張有高選編，〈軍統局渝特區1939年度工作總結報告（續）〉，《檔案史料與研究》，1993年第2期（重慶，1993年6月），頁12–30。
- ，〈軍統局渝特區1939年度工作總結報告〉，《檔案史料與研究》，1993年第1期（重慶，1993年3月），頁10–24。
- 張朋園，〈近代中國的政治領導階層〉，收入氏著，《知識分子與近代中國的現代化》，南昌：百花洲文藝出版社，2002，頁277–289。
- 張武軍，〈國民革命與革命文學、左翼文學的歷史檢視——以武漢中央副刊為考察對象〉，《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2015年第5期（北京，2015），166–177。
- 張研田，〈迎接顧先生回國定居的經過〉，《傳記文學》，第29卷第1期（台北，1976年7月），頁23–25。
- 張惠中，〈來函一〉，《中國之聲》，第5卷第8期（香港，1952年12月1日），封底。
- 張順良，〈改組派與國民黨中央海外黨務組織爭奪戰初探（1928–1930）〉，《花蓮教育大學學報》，第23期（花蓮，2006年11月），頁331–356。
- ，〈析論國民黨改組派的由來、起迄時間與綱領〉，《正修通識教育學報》，第2期（高雄，2005年6月），頁337–360。
- ，〈國民黨中央如何取締改組派的言論及其報刊（1928–1930）〉，《正修學報》，第20期（高雄，2007年11月），頁303–325。
- 張劍，〈學術獨立及其限度——1940年中央研究院院長選舉與任命再探〉，《華東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6年第6期（上海），頁43–51。
- 張灝，〈中國近代思想史的轉型時代〉，《時代的探索》，台北：中央研究院·聯經出版事業公司，2004，頁37–60。
- 望平軒，〈改組派健將：顧孟餘苦諫汪精衛〉，《快活林》，第14期（上海，1946年5月），頁6。
- 梅恕曾，〈五十年前的一段往事〉，《傳記文學》，第29卷第2期（台北，1976年8月），頁83–86。

- ，〈孟餘先生的生平與往事〉，《傳記文學》，第29卷第1期（台北，1976年7月），頁6-9。
- 凌鴻勛，〈悼念顧孟餘先生——並述粵漢鐵路之一段故事〉，《傳記文學》，第21卷第2期（台北，1972年8月），頁26-28。
- ，〈悼陳伯莊先生〉，交大同學會友聲月刊社編，《友聲》，第96期（台北，1960年11月），頁2-3。
- 符滌泉，〈顧孟餘傳〉，《國史擬傳》，第3輯，台北：國史館，1992，頁295-299。
- 許紀霖，〈「土豪」與「游士」：清末民初地方與國家之間的士大夫精英〉，《華東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5年第4期（上海），頁25-37。
- ，〈重建社會重心：現代中國的「知識人社會」〉，收入王汎森等著，《中國近代思想史的轉型時代》，台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2007，頁137-168。
- 許倬雲，〈序二〉，收入余英時等著，《中國歷史轉型時期的知識分子》，台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92，頁v-x。
- 郭岱君，〈蔣介石在國民黨之崛起（1925-1928）〉，呂芳上主編，《論民國時期領導精英》，香港：商務印書館，2009，頁90-99。
- 陳三井，〈蔣介石眼中的香港自由民主運動〉，收入黃自進、潘光哲主編，《蔣介石與現代中國的型塑——領袖的淬鍊》，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13，第1冊，頁559-590。
- 陳公博，〈黨的改組原則〉，《革命評論》，第10期（上海，1928年7月），頁1-5。
- 陳正茂，〈「第三勢力運動」史料述評——以自由陣線週刊為例〉，收入陳正茂，《中國青年黨研究論集》，台北：秀威資訊，2008，頁13-39。
- ，〈五〇年代香港第三勢力的主要團體——「中國自由民主戰鬥同盟」始末〉，《傳記文學》，第98卷第3期（台北，2011年3月），頁51-66。
- 陳正茂、李語寧，〈書生從政的悲劇——顧孟餘政治活動之探討〉，《台北城市大學學報》，期37（2014年3月），頁247-268。
- 陳克文，〈甘乃光先生事略〉，《自由人》，第604期（香港，1956年12月15日），第2版。
- 陳春圃，〈汪精衛集團投敵內幕〉，收入黃美真編，《偽廷幽影錄——對汪政權的回憶》，上海：東方出版社，2010，頁74-75。
- 陳哲三，〈鄭州會議與徐州會議：馮玉祥在兩次會議中所扮演的角色〉，《傳記文學》，第45卷第4期（台北，1984年10月），頁63-72。
- 陳棉武，〈魯迅與上虞人的交往〉，趙暢主編，《上虞文史資料選粹》，北京：中國廣播電視出版社，2008，頁277-282。
- 陳進金，〈另一個中央：1930年的擴大會議初探〉，國史館編，《國史上中央與地方的關係——中華民國史專題第五屆討論會》，台北：國史館，1999，第2冊，頁1441-1470。
- 陳德林，〈中央大學素描〉，《行健》，第4卷第7期（未陽，1942年8月），頁27-29。

- 陳獨秀，〈陳獨秀告全黨同志書〉（1929年12月10日），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編譯，《共產國際、聯共（布）與中國革命文獻資料選輯（1926-1927）（下）》，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1998，第6卷，頁349-366。
- 陳耀煌，〈北方地區的共產革命，1920-1927——一個組織史的考察〉，《新史學》，第26卷第1期（台北，2015年3月），頁105-156。
- 陶希聖，〈記顧孟餘先生〉，《傳記文學》，第21卷第2期（台北，1972年8月），頁29-30。
- 喬寶泰，〈中央政府遷台初期之中國國民黨港澳政策——雷震、洪蘭友之赴港建議為例（一九五〇—一九五一）〉，港澳與近代中國學術研討會論文集編輯委員會，《港澳與近代中國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台北：國史館，2000，頁627-671。
- 湯銳，〈民國初年的進德活動——以上海、北京為中心的考察〉，天津：天津師範大學歷史文化學院碩士論文，2011。
- 硯農，〈三週間國內外大事紀要：自二十八年二月一日起至二十八年三月一日止〉，《國聞週報》，第11卷第9期（上海，1934年8月），頁1。
- 程思遠，〈我在香港從事「第三勢力」活動的前前後後（上）〉，《縱橫》，1997年第6期（北京，1997年6月），頁18-22。
- ，〈我在香港從事「第三勢力」活動的前前後後（下）〉，《縱橫》，1997年第7期（北京，1997年7月），頁15-20。
- 馮自由，〈新湖南作者楊篤生〉，《革命逸史》第二集，北京：中華書局，1987，頁116-119。
- 馮靜甫，〈讀者投書：顧孟餘〉，《觀察》，第4卷第16期（上海，1948年6月12日），頁2。
- 黃自進，〈青年蔣中正的革命歷練（1906-1924）〉，《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65期（台北，2009年9月），頁1-50。
- 黃克武，〈民族主義的再發現：抗戰時期中國朝野對「中華民族」的討論〉，北京中國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編，《近代史研究》，總214期（2016年7月），頁4-26。
- ，〈修身與治國——蔣介石的省克生活〉，《國史館館刊》，第34期（台北，2012年12月），頁45-68。
- ，〈蔣介石與賀麟〉，《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67期（台北，2010年3月），頁17-58。
- ，〈顧孟餘的政治生涯：從挺汪、擁蔣到支持第三勢力〉，《國史館館刊》，第46期（台北，2015年12月），頁103-168。
- ，〈顧孟餘與香港第三勢力的興衰〉，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編，《二十一世紀雙月刊》，總第162期（香港，2017年8月），頁11-27。
- 黃克武、趙席賢，〈戰時的知識分子與學術發展〉，呂芳上主編，《中國抗日戰爭史新編：戰時社會》，台北：國史館，2015，頁255-316。
- 黃道炫，〈關於蔣介石第一次下野的幾個問題〉，北京中國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編，《近代史研究》，1999年第4期（1999年7月），頁142-165。

- 黃興濤、張丁，〈中國人民大學博物館藏「陳獨秀等致胡適信簡」釋讀〉，《中國人民大學學報》，2012年第1期，頁25–32。
- 新，〈誰是國民黨的左派〉，《三民週報》，第7期（上海，1927年5月），頁5–7。
- 楊天石，〈北伐時期左派力量同蔣介石鬥爭的幾個重要回合〉，《中共黨史研究》，1990年第1期（北京），頁31–43。
- ，〈北伐時期的遷都問題與宋子文〉，收入楊天石，《國民黨人與前期中華民國》，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7，頁515–517。
- ，〈再論龍雲和汪精衛出逃事件〉，收入呂芳上主編，《戰爭的歷史與記憶2：戰時政治與外交》，台北：國史館，2015，頁385–417。
- 楊天宏，〈蘇俄與20年代國民黨的派別分化〉，《南京大學學報》，2005年第3期（2005年5月），頁86–96。
- 楊維真，〈蔣介石的地緣關係〉，收入呂芳上策劃、導讀，《蔣介石的親情、愛情與友情》，台北：時報出版有限公司，2011，頁197–217。
- 萬麗鵲，〈一九五〇年代的中國第三勢力運動〉，台北：政治大學歷史學系博士論文，2001。
- 業裕，〈左派改組，與取消〉，《一九》，第1期（上海，1930年9月），頁22–28。
- 萱，〈顧孟餘的籍貫與學歷之謎〉，《文飯》，第18期（上海，1946年6月27日），頁4。
- 運公，〈舉國悼念蔡元培〉，《東方雜誌》，第37卷第8號（香港，1940年4月），頁54–58。
- 雷震，〈雷震致胡適（1958年3月8日）〉，收入傅正主編，《雷震書信集》，台北：桂冠圖書公司，1989，頁122。
- 管雪齋，〈武漢新聞事業〉，收入《新聞紙展覽特刊》，漢口：新聞紙雜誌暨兒童讀物展覽大會，1936，頁10–42。
- 翠芬，〈顧孟餘軼事〉，《社會新聞》，第2卷第24期（上海，1933年3月12日），頁341。
- 劉小清、陳悅，〈顧孟餘與香港「第三勢力」〉，《民國春秋》，1997年第6期（南京，1997年12月），頁43–47。
- 劉云虹，〈從顧孟餘案看監察院的彈劾制度〉，《民國檔案》，2010年第4期（南京，2010年11月），頁80–85。
- 劉百閔，〈為討論而討論：我對存齋先生提出討論〉，《自由人》，第66期（香港，1951年10月20日），第1版。
- 劉叔模，〈一九三一年寧粵合作期間我的內幕活動〉，全國政協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文史資料選輯》第17輯，北京：中華書局，1960年9月，頁105–124。
- 劉楠楠、蔡全周、龐璐，〈故宮博物院古物南遷各方來往函電一組〉，《民國檔案》，2014年第3期（南京，2014年8月），頁3–10。
- 劉維開，〈七年中國國民黨秘書長的吳鐵城〉，收入陳鴻瑜主編，《吳鐵城與近代中國》，台北：華僑協會總會，2012，頁16–35。

- ，〈訓政前期的黨政關係(1928–1937)：以中央政治會議為中心的探討〉，《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報》，第24期(台北，2005年11月)，頁85–129。簡體字版，收入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民國史研究室、四川師範大學歷史文化學院主編，《一九三〇年代的中國》，北京：社科文獻出版社，2006，頁77–94。
- ，〈蔣中正第三次下野之研究〉，《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報》，第17期(台北，2000年6月)，頁131–156。
- 德器，〈顧孟餘廉介自處〉，《照明彈》，期1(廣州，1946年6月)，頁8。
- 撒翁，〈請看中國的階級與爭鬥！〉，《布爾塞維克》，第1卷第15期(上海，1928年1月)，頁501。
- 樊洪業，〈中央研究院院長的任命與選舉〉，《中國科技史料》，第11卷第4期(北京，1990年8月)，頁48–54。
- 歐平節譯，〈泰勒教授對中國新勢力的看法〉，《中國之聲》，第7卷第6期(香港，1953年5月11日)，頁7。
- 潘光哲，〈《我們的政治主張》及其紛爭：1920年代中國「論述社群」交涉互競的個案研究〉，收入李金銓編，《報人報國：中國新聞史的另一種讀法》，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13，頁147–188。
- ，〈胡適與《努力週報》的創辦〉，收入李金銓編，《自由的理解與實踐——民國時期知識分子與報刊》，台北：政大出版社，2008，頁81–108。
- 編者，〈關於顧孟餘先生及本社座談會的一些報告〉，《傳記文學》，第29卷第1期(台北，1976年7月)，頁30。
- 蔡元培，〈我在北京大學的經歷〉，《東方雜誌》，第31卷第1號(上海，1934年1月)，頁5–13。
- 蔡登山，〈文史雜誌的尤物——朱樸與《古今》及其他〉，收入《古今(一)》，台北：秀威經典出版策劃、秀威資訊科技發行，2015，頁i–xi。
- 蔣中正，〈致于院長右任請勸各監委對彈劾顧孟餘案適可而止電〉，秦孝儀主編，《總統蔣公思想言論總集》，台北：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委員會，1984，卷37，別錄，中華民國二十三年，頁101。
- ，〈新生活運動之要義〉，《現代社會》，第3卷第1期(天津，1934年5月)，頁1–8。
- ，〈蔣總司令告全國國民黨同志書〉，《清黨特刊》，第4期(重慶，1927年7月15日)，頁36–56。
- 蔣寶麟，〈抗戰時期的國家與大學政治文化：中央大學「易長」研究〉，《史林》，2009年第3期(上海，2009年6月)，頁89–100。
- 黎明起，〈汪精衛死後遷棺瑣憶〉，收入任思等著、蔡登山編，《汪精衛集團》，頁118–120。
- 盧華，〈孫中山的第三條道路：張朋園《從民權到威權》書評〉，《思想史》，第7期(台北，2017)，頁209–226。

- 錢穆，〈學統與治統——政學私言五〉，刊於《東方雜誌》，第41卷第15號（香港，1945年8月），頁4-8；後收入《政學私言》，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67，頁64-75。
- 閻鴻聲，〈顧孟餘軼事——沙坪壩中央大學雜憶〉，《中外雜誌》，第38卷第5期（台北，1985年11月），頁87-91。
- 龍敏賢，〈章士釗與《獨立週報》〉，《出版科學》，2004年第4期（武漢），頁67-68。
- 韓家騭，〈翁內閣為何需要顧孟餘？〉，《建中週報》，第1卷第4期（南京，1948年6月），頁6-7。
- 羅君強，〈細說汪偽（上）〉，《傳記文學》，第62卷第1期（台北，1993年1月），頁86-95。
- 羅志田，〈近代中國權勢的轉移——知識分子的邊緣化與邊緣知識分子的興起〉，收入許紀霖編，《20世紀中國知識分子史論》，北京：新星出版社，2005，頁127-161。
- 羅敏，〈蔣介石與1932年汪（精衛）、張（學良）交惡〉，收入黃自進、潘光哲主編，《蔣介石與現代中國的型塑——領袖的淬鍊》，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13，第1冊，頁469-499。
- 譚時實，〈國民黨執政二十五年的歷史教訓〉，《中國之聲》，第1卷第7期（香港，1951年11月22日），頁5-8。
- 顧彥和，〈我所知道的顧孟餘〉，刊於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北京市委員會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文史資料選編（第32輯）》，北京：北京出版社，1987，頁216-222。
- 顧頤剛，〈顧頤剛自傳〉，收入《寶樹堂文存》，北京：中華書局，2010，卷6，頁357-421。
- Bian, Morris L. "Building State Structure: Guomindang Institutional Rationalization during the Sino-Japanese War, 1937-1945," *Modern China*, 31:1 (2005), pp. 35-71.
- Harris, Lane J. "Defining the Nationalist Party Center: The Text and Context of Gan Naiguang's Outline of Sun Wenism," *Southeast Review of Asian Studies*, Vol. 34 (2012), pp. 87-113.
- Lee, Pui-Tak. "The Re-Adoption of Asianism in Postwar Hong Kong and Japan, 1954-57: A Comparison between Ch'ien Mu and Ota Kozo," *The Journal of Northeast Asian History*, Vol. 13, No. 1 (Seoul, Summer 2016), pp. 55-76.
- Taylor, George E. "A New Look at Formosa," *The Atlantic Monthly*, Vol. 191, No. 4 (1953), pp. 41-45.
- Yang, Tianshi. "The Third Force in Hong Kong and North America during the 1950s," in Roger B. Jeans, ed., *Roads Not Taken: The Struggle of Opposition Parties in Twentieth-Century China*, pp. 269-273.

Yung, Kenneth Kai-Chung. "Chinese Liberal Thought in the Cold War Era: Three Émigré Intellectuals and Their Quest for Liberal Values, 1949–69." Ph. D diss., University of Sydney, 2013.

山田辰雄，〈序論——現代中国における代行主義の伝統について〉，《歴史のなかの現代中国》，東京：勁草書房，1996，頁1–9。

———，〈湯良禮訪問記〉，慶應義塾大學法學研究會編，《法學研究》，第45卷第10號（1972年10月），頁113–125。

金文京、濱田麻矢，〈日本亡命後の胡蘭成——保田與重郎との関係を中心に〉，中文研究会編，《未名》，第19期（神戸，2001），頁87–105。

區志堅，〈自由なくして生きる道なし：一九五〇年代の香港と「自由陣線」〉，中村元哉編，《憲政から見た現代中国》，東京：東京大學出版會，2018，頁269–286。（此文標題譯為中文為：〈沒有自由，絕無生路：一九五〇年代的香港與「自由陣線」〉）

陳中孚，〈中國民主勢力と日本：同憂の士に告ぐ〉，《民主勢力》，第2卷第1期（東京，1952年1月），頁12–15。

網路資源

《香港時報》，維基百科，<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A6%99%E6%B8%AF%E6%99%82%E5%A0%B1>（2017年4月12日檢閱）。

「大事年表」，汪精衛網站，<http://wangjingwei.org/wang-jingwei-life-cn/timeline/>（2016年6月5日檢閱）。

「反腐還是權鬥？1934，監察院彈劾鐵道部長顧孟餘」，搜狐，http://www.sohu.com/a/208176260_631330（2018年1月11日檢閱）。

「北京大學經濟學院」，維基百科，<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8C%97%E4%BAC%E5%A4%A7%E5%AD%A6%E7%BB%8F%E6%B5%8E%E5%AD%A6%E9%99%A2>（2016年3月21日檢閱）。

「西方公司」，維基百科，<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A5%BF%E6%96%B9%E5%85%AC%E5%8F%B8>（2018年11月11日檢閱）。

何孟恆編，《汪精衛先生政治論述》，汪精衛網站，<http://wangjingwei.org/zh/his-ideas-cn/political-writings/#1447608167429-b11a662e-ac7d>（2017年3月14日檢閱）。

「抗日戰爭與近代中日關係文獻數據平臺」，<http://www.modernhistory.org.cn/index.htm>（2018年11月11日檢閱）。

「兩航事件」，維基百科，<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85%A9%E8%88%AA%E4%BA%8B%E4%BB%B6>（2018年2月2日檢閱）。

- 「夏文運」，百度百科，<http://baike.baidu.com/item/%E5%A4%8F%E6%96%87%E8%BF%90> (2017年4月12日檢閱)。
- 「袁世凱」，維基百科，<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BC%A0%E7%99%BE%E7%86%99> (2018年1月13日檢閱)。
- 「當年全國最高學府在重大松林坡叫國立中央大學」，http://big5.xinhuanet.com/gate/big5/www.cq.xinhuanet.com/2013-04/25/c_115534910.htm (2017年4月13日檢閱)。
- 「葉德輝」，維基百科，<http://zhm.100ke.info/zh-hant/%E8%91%89%E5%BE%B7%E8%BC%9D> (2018年5月30日檢閱)。
- 〈蔡元培發起的北大組織：進德會〉，http://article.netor.cn/article/memtext_12403.html (2017年3月25日檢閱)。
- 「龍雲」，維基百科，<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BE%99%E4%BA%91> (2016年6月5日檢閱)。
- 「顧孟餘」，百度百科，<https://baike.baidu.com/item/%E9%A1%BE%E5%AD%9F%E4%BD%99> (2018年2月1日檢閱)。
- 丁仕原，〈「二次革命」中的章士釗〉，辛亥革命網，<http://www.xhgmw.org/html/xiezhen/renwu/2017/0210/23221.html> (2017年3月29日檢閱)。
- 李志毓，〈汪精衛視野中的國民黨：《汪精衛「自傳」草稿》解讀〉，<http://www.wenxiba.com/gk/12730.html> (2019年4月7日檢閱)。
- 辰易，〈民國奇人顧孟餘〉，上虞新聞網，<http://synews.zjol.com.cn/synews/system/2010/05/24/012149015.shtml> (2018年1月7日檢閱)。
- 張譯元、王曉萍，〈珍貴的回憶——張友仁教授訪談錄〉，「我與北大經濟學院」，網路資源：<http://econ.pku.edu.cn/displaynews.php?id=15176> (2017年5月6日檢閱)。
- 梁寶龍，〈中正勞工子弟義校〉，《香港工人的故事》，http://leungpolung.blogspot.tw/2013/09/blog-post_4.html (2017年8月10日檢閱)。

圖片出處

- 圖 1.1 據青蘋果數據中心製作，《申報全文資料庫》統計而成。
- 圖 1.2 據青蘋果數據中心製作，《申報全文資料庫》統計而成。
- 圖 2.1 顧乃眷編纂，《上虞西華顧氏宗譜》（上虞：格思堂活字本，宣統三年〔1911〕）。
- 圖 2.2 《傳記文學》，第29卷第1期（台北，1976年7月），封面、封底。
- 圖 2.3 《新青年》，卷6號5（北京，1919年5月），封面。
- 圖 2.4 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胡適紀念館藏，館藏號：HS-JDSHSC-1648-002。
- 圖 2.5 《努力週報》，第2期（北京，1922年5月14日），第1版。
- 圖 3.1 〈北大教授北方共產黨領袖李大釗與顧孟餘合影〉，《良友畫報》，第5期（上海，1926年6月），頁4。
- 圖 3.2 〈胡適照片資料庫〉，《胡適檔案》，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胡適紀念館藏，館藏號：HS-08-06-01-081。
- 圖 3.3 《東方雜誌》，第22卷第4期（上海，1925年2月25日），彩頁。
- 圖 3.4 「剪報：顧孟餘的清高」（1925年2月23日），〈北京檔〉，《胡適檔案》，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胡適紀念館藏，館藏號：HS-JDSHSC-0267-049。
- 圖 3.5 《申報》，上海，1925年7月21日，第6版。
- 圖 3.6 中國國民黨黨史館藏。
- 圖 3.7 中國國民黨黨史館藏。
- 圖 3.8 黃克武攝於2017年6月23日。
- 圖 3.9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黃克武拍攝）。

- 圖 3.10 「明令通緝陳逆公博等十人」(1929年10月11日)，〈違法人員通緝案(六)〉，《國民政府》，台北，國史館藏，典藏號：001-101500-00027-009。
- 圖 4.1 〈財政委員會組織法令案〉，《國民政府》，台北，國史館藏，典藏號：001-012071-00339-027。
- 圖 4.2 「特任顧孟餘為鐵道部部長」(1932年3月9日)，〈鐵道部官員任免(二)〉，《國民政府》，台北，國史館藏，典藏號：001-032171-00004-010。
- 圖 4.3 正太鐵路管理局編，《正太鐵路接收紀念刊》(石家莊：正太鐵路管理局，1933年5月)，卷首附圖。
- 圖 4.4 粵漢鐵路株韶段工程局編，《粵漢鐵路株韶段民國廿四年工作之迴顧》(出版地不詳：編者印行，1935年)，卷首附圖。
- 圖 4.5 *Illustrated London News* (London, November 9, 1935).
- 圖 4.6 李敖收藏，黃克武拍攝。
- 圖 4.7 「王世杰、彭學沛、石瑛、顧孟餘函汪兆銘」(1935年)，〈汪兆銘投敵前與政府首要函電(一)〉，《汪兆銘史料》，台北，國史館藏，典藏號：118-010100-0048-005。
- 圖 4.8 「汪兆銘電郭泰祺」，〈國際各有關方面致汪兆銘函電〉，《汪兆銘史料》，台北，國史館藏，典藏號：118-010100-0056-032。
- 圖 4.9 「汪兆銘電中央黨部蔣中正暨中央執監委員」(1938年12月29日)，〈汪兆銘與中國國民黨有關之各項函電(一)〉，《汪兆銘史料》，台北，國史館藏，典藏號：118-010100-0005-064。
- 圖 4.10 《南華日報》，香港，1934年11月27日，頭版。
- 圖 4.11 「顧孟餘電汪兆銘」(1938年12月30日)，〈汪兆銘投日前與政府首要函電(二)〉，《汪兆銘史料》，台北，國史館藏，典藏號：118-010100-0049-056。
- 圖 5.1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藏。
- 圖 5.2 〈開除汪兆銘黨籍案(一)〉，《國民政府》，台北，國史館藏，典藏號：001-014162-00001-008。
- 圖 5.3 「彭學沛致蔣中正函」(1939年6月8日)，〈汪兆銘叛國(四)〉，《國民政府》，台北，國史館藏，典藏號：001-103100-00004-016。
- 圖 5.4 「滕固電蔣中正」(1939年9月4日)，〈汪偽組織(一)〉，《蔣中正總統文物》，台北，國史館藏，典藏號：002-090200-00022-123。
- 圖 5.5 「王世杰呈蔣中正」(1939年2月11日)，《蔣中正總統文物》，國史館藏，數位典藏號：002-080103-00009-012。顧孟餘所寄來的簡報是：佩弦，〈「答問」的幾點解釋〉，《南華日報》，香港，1939年2月7日，第1版。

- 圖 5.6 「汪兆銘叛國行動經過」，〈汪兆銘叛國（二）〉，《國民政府》，台北，國史館藏，典藏號：001-016052-00009-007。
- 圖 5.7 黃克武攝於2017年5月18日。
- 圖 5.8 「顧孟餘函蔣中正提交居里參考資料及重要方案均應經由鈞座孔祥熙閱過」(1941年2月9日)，〈革命文獻——對美外交：居里兩度來華（一）〉，《蔣中正總統文物》，台北，國史館藏，典藏號：002-020300-00033-011。
- 圖 6.1 自有收藏。
- 圖 6.2 「唐縱、張其昀呈蔣中正留港九華人政治活動經過及派系分析與各派系主要人物動態等現狀」(1951年3月31日)，〈一般資料——民國四十年（二）〉，《蔣中正總統文物》，台北，國史館藏，典藏號：002-080200-00345-057。
- 圖 6.3 自有收藏。
- 圖 7.1 「黃旭初到日後活動情形及李宗仁致陳中孚函及在日本之第三勢力分析調查表」(1951年12月，〈中央情報機關（四）〉，《蔣中正總統文物》，台北，國史館藏，典藏號：002-080102-00013-006。
- 圖 7.2 「黃旭初到日後活動情形及李宗仁致陳中孚函及在日本之第三勢力分析調查表」(1951年12月，〈中央情報機關（四）〉，《蔣中正總統文物》，台北，國史館藏，典藏號：002-080102-00013-006。
- 圖 7.3 自有收藏。
- 圖 7.4 「關於『第三勢力』爭取美國支援的綜合報告」(1953年6月)，〈港九政治性組織〉，《外交部/歐洲司/香港及澳門地區/香港》，台北，國史館藏，典藏號：020-042701-0056。
- 圖 7.5 「關於『第三勢力』爭取美國支援的綜合報告」(1953年6月)，〈港九政治性組織〉，《外交部/歐洲司/香港及澳門地區/香港》，台北，國史館藏，典藏號：020-042701-0056。
- 圖 7.6 《東京新聞》，1953年1月15、16日。自有收藏。
- 圖 7.7 「總統蔣中正與美國大使藍欽談話記錄」(1953年7月1日)，〈港九政治性組織〉，《外交部/歐洲司/香港及澳門地區/香港》，台北，國史館藏，典藏號：020-042701-0056。
- 圖 7.8 「蔣中正指示張羣發顧孟餘美金三千元」(1962年8月23日)，〈籌筆——戡亂時期（三十三）〉，《蔣中正總統文物》，台北，國史館藏，典藏號：002-010400-00033-048。
- 圖 7.9 《中央日報》，1969年8月13日，第3版。
- 圖 7.10 《中央日報》，1972年7月11日，第1版。

索引

英文部分

Bennett, Milly 96–97, 323, 340
Blum, Robert 248
Chinese Correspondence 96
Hwa, William 8
Krause, Karl 46
Levenson, Joseph R. 303, 340
Oppenheimer, Franz 44
People's Tribune (1926–1927) 96–98, 323
Prohme, Bill 96
Prohme, Rayna 96–97, 340

中日文部分

一劃

一黨專政 25, 246, 256–257, 263, 265

二劃

丁文江 14, 61, 63, 158–159, 335
丁廷標 (鼎標) 274
丁惟汾 (鼎臣) 69–71, 74–76, 89, 91, 94–95,
98, 121, 141, 304, 338, 344

九一八事變 2, 19, 133, 135–136, 310–311
二次革命 41–42, 71, 301, 354
《人民日報》(北京) 50, 89, 330, 335
《人民日報》(閻錫山支持) 132
《人言報》252

三劃

三一八事件 xviii, 75, 84–87, 92, 304, 321,
334
三木武夫 278
三民主義 xii, xx, 3, 11–15, 27–29, 70–71,
74, 99, 109–115, 118, 123, 128, 147,
227, 233, 303–305, 307, 309, 322, 332,
339
三民主義實踐社 74
三青團 227, 233
上官雲相 234, 245, 263
下野 2, 13, 19, 23, 83, 120, 132, 137, 140,
225, 311–312, 350–351
久原房之助 278
于右任 75–76, 87, 95, 98, 109, 121, 138, 141,
144, 162–164, 186, 332
于樹德 30, 69, 75, 87–88
千葉四郎 278
土地國有 xx, 126
大川周明 278

《大公報》xxii, 9, 32, 36, 39, 70, 77, 80,
102, 108, 116, 131, 204, 210, 223, 225,
322–323, 330
《大西洋雜誌》(*The Atlantic Monthly*) 257,
253
大亞同盟 242
大亞細亞連盟 277
《大道》xx, 230, 237–239, 302, 325,
小市民 125–126, 128
小資產階級 113–115, 125–126, 128, 302,
山口重次 282
山田辰雄 xi–xii, xvii, xxiv, 5, 14, 98, 117,
341, 353
山田純三郎 278
工讀互助團 48–49, 320, 346

四劃

中山大學 85, 91–92, 304321, 338
中央土地委員會 105
中央大學 xiii, xx, xxii, 2, 55, 175, 203, 206,
210–219, 220–221, 227, 233–235, 302,
312, 315, 322, 330, 336, 349, 352, 354
《中央日報》4, 9, 32, 55, 95–97, 111, 115,
128–129, 153, 159, 165, 222–223, 225,
290, 295–296, 298, 305, 321–323, 330,
332, 346, 357
中央研究院 xiv, 6, 11–14, 16–17, 20, 25–26,
34, 37, 45, 51, 61, 71, 80, 83–84, 88,
92, 100–101, 108, 122, 139, 146–147,
155, 158, 163, 166, 175, 192, 201,
206–208, 212, 215, 217–218, 220–221,
248, 284, 289–292, 294, 302, 316, 327,
329–330, 333–339, 343–345, 348–352,
355–356 : 院長 206, 208, 348, 351 ; 代
理院長 208
中央執監委員非常會議 132–133, 345
中法大學 84–85
中俄大學 84–85
《中美關係白皮書》23, 233, 235
《中國之聲》xx, 230, 250–253, 256–257,
259, 262, 265–267, 273, 275, 278–279,

285–286, 302, 322, 325, 341, 343–345,
347, 351–352
中國民主建國同盟 274
中國民族主義與東亞民族主義 24
中國自由民主戰鬥同盟 (戰盟) 234, 255–
260, 270, 273–275, 278, 285, 287–289,
348
中國自由黨 240
五卅慘案 82, 336
五四運動 xiii, xvii, 11, 26, 49–50, 53, 62,
65–66, 145, 149, 200, 303, 316, 339,
343–344,
今井武夫 178
卞斯天 (Bernstein, Eduard) 51
友聯集團 xxiv, 234, 248, 250, 347
反革命 18, 28, 100, 104, 116, 118–120, 301,
310, 335
反國府立法院團體 282
反蔣 xi, xv, xvii, 3, 18, 104, 129–130, 132,
141, 143, 154, 231, 234, 236–237, 244–
245, 265–267, 275, 305–306, 311–312,
315, 317, 332 : 反蔣援胡 132
太田耕造 283–284, 344
太原約法 xi, xv, 5, 131–132, 302, 308–310
孔祥吉 33–34, 342
孔祥熙 21, 82, 137, 184, 190, 194, 208–210,
357
尹述賢 231–232, 236, 246, 262
文化冷戰 271, 285, 302
方治 (希孔) 152
《日華協定記錄及諒解事項》178
日華親善 275
毛以亨 255, 262
毛澤東 xi, 5, 49, 69, 87, 89, 105, 107, 268,
305, 334
王子壯 162–164, 166–167, 169, 333
王世杰 xviii, 8, 56, 60, 67, 70, 79, 145, 148,
152, 158, 160, 165, 169, 170–172, 200,
202–203, 205–209, 211–212, 220, 222,
225, 240, 248, 272, 284–285, 290,
292–294, 296, 298, 327, 329, 333, 356
王正廷 144

王仲裕 67
 王任遠 235, 244–246, 264
 王光祈 48–49
 王伯秋 63
 王克文 1, 2, 29, 128, 333
 王克敏 70
 王孟群 46
 王孟鄰 237
 王季高 235, 237
 王法勤 75, 98, 104, 109, 121–122, 128–130, 140–142, 213, 306
 王芸生 xviii, 316
 王厚生 234, 244
 王星拱 (撫五) 42–43, 47, 58, 60, 64
 王紀五 248, 291
 王書林 213
 王無生 41
 王雲五 197, 220, 282
 王夢鄰 262
 王徵 (文伯) 63
 王德芳 212
 王樂平 122–123, 128–130, 306
 王懋功 141–142, 151–152
 王鴻韶 231
 王寵惠 47, 60–65, 168, 208–209, 261

五劃

代行主義 14, 353
 以俄為師 24–25
 加州 3–4, 221, 230, 271, 289, 291, 293
 加拉罕 (Karakhan, Lev Mikhailovich) 17–18, 70, 82, 85, 90–91
 加倫 (Blyukher, Vasily Konstantinovich, 瓦西里·康斯坦丁諾維奇·布留赫爾) 95, 108–109, 335
 卡爾 (Kerr, Archibald Clark) xiii, 209
 去皮存骨 132, 311
 古應芬 16, 91, 132, 137, 304
 台獨 275
 台灣民主獨立黨 278
 四海銀行 161
 外交委員會 141–143, 343

左派領袖 xiv, xxii, 7, 28, 94, 305
 平均 xx, 41–42, 99, 126, 309,
 民主自由社 226–227, 230, 312
 民主社會主義 252, 347
 民主社會黨 (民社黨) 229, 234, 241, 247, 250, 255, 259, 262–263, 265, 282, 291
 民主集權制 xvii, 142, 257, 307
 《民主勢力》277–280, 342, 353
 《民立報》41
 《民國日報》57, 96, 119, 330
 甘乃光 xiv, 6, 7, 12, 13, 70, 89, 90, 93, 98–99, 121–122, 128–129, 138, 142, 145, 177, 186, 188, 190, 231–232, 261, 304–306, 344, 348
 甘介侯 227, 244
 甘家馨 232, 235–237, 245, 252, 254, 258, 262, 274
 田中榮一 278
 田之炫 282
 田炯錦 296
 甲寅 41, 67, 342
 白堅武 294
 白崇禧 95, 121, 226–227, 232, 275, 338
 白雲梯 129, 306
 白瑜 50–51, 53, 314, 336, 343
 石瑛 (薌青) 67, 70–71, 75, 158, 170–172, 356

六劃

任國榮 231, 262
 任鴻雋 145, 208
 伍叔儻 219–220
 伍智梅 193
 伍朝樞 (梯雲) 91, 113, 138, 140
 伍肇池 234
 伍憲子 234, 242, 245, 255, 260, 263, 265, 269–270, 335
 伍藻池 244, 255
 先鋒主義 14, 354
 共產黨 xi–xii, xiv, xviii, xx, 5, 13, 18, 24, 28–30, 50, 53, 62, 74–77, 85, 88–91, 96, 98–101, 104, 106–107, 109–113,

115–121, 123, 125–128, 137, 147,
190–191, 224, 230–231, 235, 239–240,
248, 256, 267, 301, 305–306, 313, 333,
337, 346, 355
《再生》249, 252, 256,
列寧 (Lenin, Vladimir) 25–27, 53, 70, 307
同文館 32, 35
好人政府 60, 62, 65,
托洛斯基 (Trotsky, Leon) 127
朱希祖 43, 47, 67
朱其華 89, 96, 333
朱家驊 (驪先) xviii, 8, 43, 46–47, 67, 70, 75,
83–84, 91–92, 139, 144–146, 155, 158,
160, 168, 184–185, 208, 217–222, 227,
235, 261, 289–290, 327, 329, 332, 335,
338, 343
朱啟鈞 33, 34, 342
朱執信 16
朱培德 (益之) 87, 95, 133
朱深 (84
朱經農 63, 219
朱鳳舉 289
朱樸 20, 313, 351
朱霽青 94, 109, 128–129, 142, 193, 306
江玉泉 277
江良規 219
江季平 290
池田宗之進 278
《自由人》6, 12, 248, 252–253, 264–265, 267,
344, 346, 348, 351
《自由中國》237, 248, 316, 345,
自由中國協會 261–263
自由中國運動 258
自由主義 xiv, 25, 60, 68, 250,
自由民主大同盟 233, 235–237, 239
自由亞洲委員會 (自由亞洲學會、亞洲基
金會、亞洲協會) 247–248, 282–283
自由派知識人 230
自由陣線 230, 241–242, 244, 247–249,
252–253,
行政院參事 7, 146, 174, 192, 197
行政院駐平政務整理委員會 157

西方公司 (Western Enterprises Inc., WEI)
286–287, 354
西尾末廣 278
西南聯大 217, 220, 235, 339

七劃

亨利·魯斯 (Luce, Henry R.) 23
佐藤信夫 278
何炳松 43
何香凝 2, 82, 89, 94–95, 99–100, 102–103,
109, 113, 121–122, 128–129, 306, 326
何益之 (夏文運) 273–275, 341, 354
何梅協定 170
何義均 233–236
何運 277
何德美 46
何魯之 235
何應欽 20, 141, 144, 168–169, 223, 226–227,
312
余英時 xiv, 10, 12, 229–230, 249, 252–253,
317, 333, 343, 348
冷融 195
《努力週報》58, 60, 63, 65, 347, 351, 355
吳玉章 87
吳叔維 (吳稚暉之子) 294
吳忠信 169
吳俊升 217–218
吳南軒 215
吳稚暉 (敬恆) xx, 37–38, 40, 47, 70, 73–76,
79, 88, 91, 98, 119, 122, 126, 137, 161,
185, 196, 294, 305, 307, 329
吳鼎昌 169
吳翰 4
吳樾 34
吳鐵城 91, 113, 137, 191, 201, 203, 227, 230,
351
吳鑄人 290
宋子文 21, 82, 93, 100, 102–103, 105, 109,
122, 124, 133, 139, 144, 153, 159, 174,
205, 208–209, 221–222, 311, 329, 350
宋美齡 21, 297, 303
宋慶齡 87, 93, 97, 105, 117, 193, 306

- 岑春煊 16
 我的小故事 xxi, 253–254, 259, 338
 批蔣 xv, xvii, 2, 24, 268, 315
 投共 236, 240, 265–267,
 改組派 xi, xiii, xvi–xxi, 1–3, 5, 7, 18, 29,
 100, 122–133, 137, 142–143, 145–147,
 149–152, 160–162, 164, 166, 197,
 212, 216, 227, 259, 267, 301–302, 304,
 306–308, 311–313, 317, 324, 335, 343,
 347–348
 李大釗 (守常) xiii, 1, 12, 30, 47–50, 52–53,
 62–64, 70, 72–76, 82, 84–85, 87–88,
 98, 103–104, 294, 301, 304, 334, 344,
 355
 李文範 137–138, 140
 李方桂 293
 李四光 56, 152, 208
 李正樂 163
 李永懋 231, 236–237, 252
 李石曾 (煜瀛) xix, 1, 13, 17, 47, 66–67, 70,
 72–73, 75–76, 82, 84–85, 98, 106–107,
 121–122, 137, 145, 296, 301, 304, 342
 李卓敏 292–293
 李卓皓 293
 李宗仁 (德鄰) xiv, xv, xxi–xxiii, 2, 22,
 121–122, 131, 138, 225–227, 229–233,
 235–237, 240, 242, 244, 261, 273–276,
 278–280, 282, 312, 334, 338, 357
 李彥士 46
 李思浩 84
 李國祁 13, 17–18, 344
 李培基 226
 李培德 284, 344
 李惟果 220
 李微塵 234, 250, 252, 255–259, 265, 268,
 279, 334, 344
 李聖五 277, 282
 李壽雍 3, 54–55, 74, 76, 290, 295, 344
 李榦 248
 李福林 263, 265
 李樸生 xxi, xxiv, 6, 7, 12–13, 70, 196, 231,
 253, 267–268, 330, 344
 李璜 235, 244–246, 273–274
 李彌 287
 李濟深 91, 114, 119, 121, 122, 237, 306
 李鴻藻 32, 66, 72
 李儻 37
 杜亞泉 11, 303
 杜魯門 (Truman, Harry S.) 23
 杜聯誥 294
 《每日新聞》285
 汪之靈魂 xv, xvi, 2, 73
 汪文惺 185
 汪文嬰 185
 汪兆銘 (季新、精衛) xi–xxi, xxiii–xxv, 1–5,
 6, 8–10, 13–22, 27–30, 40, 47, 70–72,
 76–77, 79, 82, 84, 87, 98–100, 103–111,
 113–122, 124, 127–133, 135–141,
 143–145, 147, 150, 153–154, 158–161,
 163, 165–196, 198, 200, 203–204, 210,
 216, 259, 267, 277, 302, 304–305, 307,
 310–311, 314, 321, 324, 326, 333–334,
 339, 341, 343–348, 350, 352–354 :
 汪兆銘史料 8, 103, 172–173, 175,
 178–179, 181, 184–185, 187, 204, 326,
 329, 356 ; 汪兆銘叛國 185, 187–188,
 191, 196–197, 201, 356–357 ; 汪政權
 (汪政府) 19, 87, 147, 161, 178, 181,
 195, 200, 275, 277, 329, 346, 348 ;
 汪偽 146–147, 183, 185, 191, 198,
 273, 277, 352, 356 ; 汪蔣 xv, xviii,
 2, 9, 15, 19, 29–30, 133, 135–136,
 142–143, 169, 190, 302–303, 305–306,
 310–311 ; 武漢分共 xiii, xx, 2, 27, 100,
 109, 114–115, 117–119, 306, 311 ;
 擴大會議 xiii, 2, 7, 18, 100, 109, 122,
 131–132, 306, 308, 321, 345, 349 ;
 豔電 xv–xvi, xxi, 2, 19, 135–136, 176,
 178–180, 182–183, 186, 188–189, 193,
 195, 199–200, 302, 313
 汪杞 (彥慈) 147, 174, 189
 汪東 16
 汪建剛 62
 汪派 (汪派份子) xiv–xvi, xvii–xviii, xxiii–

xxiv, 1–2, 5, 7–8, 18–19, 27, 30, 87, 97, 115, 119, 121, 132–133, 137, 141–142, 145–148, 166, 168–169, 179, 182–183, 188–197, 199–201, 205, 227, 231, 234, 242, 275, 277, 301–302, 304–313, 315, 317
 汪榮寶 33, 334
 汪蔣合作 xv, xviii, 2, 19, 29–30, 133, 135–137, 142–143, 169, 302, 310–311, 沈尹默 47, 67
 沈怡 209
 沈昌 (立孫) 154, 345
 沈剛伯 219–220
 沈雁冰 (茅盾) 95
 沈雲龍 132, 137–138, 140, 155, 192, 218, 321–322, 334, 345
 沙培德 (Peter Zarrow) 14, 345
 沙基慘案 12, 82,
 谷正倫 166
 谷正鼎 3, 141–142, 148, 151–152, 187
 谷正綱 141–142, 145, 152, 166, 169, 174, 187, 193, 295–296, 306, 312
 谷錫五 76, 150, 222, 237, 239, 262, 264, 345
 辛丑和約 84
 辛樹幟 158, 217, 234
 社會主義 27, 41–43, 46, 52–53, 252, 310, 317, 320, 322, 347
 邱昌渭 227, 232–233, 235–236
 邵力子 72, 86, 173, 226
 邵元冲 82, 90, 139, 141, 144, 147, 152–153, 335
 邵鏡人 237, 262
 阿部真之助 285
 附日政權 xvi, 2, 19–20, 182, 277, 305, 307, 309
 八劃
 亞細亞大學 283–284, 344
 京師大學堂譯學館 xix, 32, 34,
 刺汪行動 166, 188,
 周天賢 231–232, 234, 236, 262

周佛海 xvi, 2, 73, 173, 177–178, 180–181, 189, 200, 277, 313, 334, 345
 周炳琳 13, 14, 47, 211, 220
 周恩來 30, 200, 210, 334
 周烈洪 194
 周啟剛 173
 周德偉 ix, xiv–xvi, xx, 3, 5, 6, 13, 15, 32, 44–45, 54, 65–66, 71–74, 76, 79–80, 101, 117, 123, 125, 131–132, 136, 138–139, 142, 144–145, 148–151, 154, 158, 162, 164, 174–175, 237, 290, 304, 306–307, 309–310, 313–314, 334, 345
 周鯁生 145, 221
 和知鷹二 278
 孟格爾 (Menger, Carl) 45
 季山嘉 (Kissarka, Nikolay Vladimirovich Kuibyshev) 87
 居正 140–141, 144, 226–227, 261
 岸信介 277
 延國符 74–75, 295
 房兆楹 294
 易培基 13, 17, 84–85
 杭立武 xxii, 201, 203, 208, 217, 220, 240, 333
 東亞冷戰 274, 282
 《東京新聞》285, 322, 331, 357
 東京盟總 242, 247, 258,
 東南大學 61, 63, 215, 218–219, 241, 333
 林長民 (宗孟) 60–62, 64
 林柏生 179–181, 193, 200, 304
 林森 133, 140, 142, 164, 186, 220
 林損 67
 武和軒 195
 武漢大學 145, 153, 158, 175, 217, 221,
 武漢分共 xiii, xx, 2, 27, 100, 109, 114–115, 117–119, 306, 311
 武漢政府 1, 6–7, 108–109, 117, 305
 河相達夫 278
 法日派 66
 法國 16, 24, 66–67, 70, 88, 100, 121, 147, 151, 175, 188, 218, 303, 306, 319, 341,
 竺可楨 207–208, 219, 335

金侯城 244, 255, 258, 262
 青年部 6, 75, 90, 118, 149
 青年黨 229, 235, 241–242, 244, 246–247,
 249, 263, 277, 282, 348,
 非常會議 132–133, 345

九劃

俞大純 37
 俞飛鵬 144, 168
 《前進》xx, 122–127, 301–302, 306, 317,
 323–325, 344
 南京大學 8, 28, 329, 350
 《南華日報》xxiii, 7, 127, 141, 179–180, 189,
 200, 213, 324, 331, 334, 356
 哈德曼 (Hartmann, Ake) 242, 245, 247
 姚從吾 220
 威廉·拉根 (Largans, William) 247
 宣傳部 13, 17, 75, 89–91, 94–98, 101, 111,
 116, 131, 149, 177–178, 197, 304–305,
 323, 332
 宣鐵吾 245, 258, 282
 封建 104, 117, 126–127, 324
 政學系 169, 188, 222, 225, 227
 施存統 49, 122–125
 柏文蔚 103–104, 129, 306
 柯克 (Cox) 244–245, 247
 柯慎思 (Clark, Lewis) 235
 段祺瑞 13, 67, 76–79, 83–84
 段錫朋 89, 144–145, 206
 洪蘭友 261–263, 268, 349
 流亡知識人 229–230, 249, 301
 研究系 60–62, 64, 169
 美國新聞處 (USIS) 242, 248
 耶芬斯 (Jevons, Stanley) 45
 胡欣平 (胡越·司馬長風) 252–253
 胡耐安 4, 37, 96, 124, 314, 345–346
 胡鈞鶴 277
 胡煥庸 219
 胡漢民 2, 10, 15–18, 20, 51–53, 86–88, 92,
 98, 122, 124, 132, 137–138, 140–141,
 154, 161, 164, 304–305, 310–311, 335,
 339, 346

胡適 (適之) xiii, xv, xviii, xix, xxii–xxiii, 11,
 14, 42–45, 47–50, 53–68, 70, 77, 79,
 –80, 83, 86, 101, 139, 144–145, 153,
 157, 159, 177, 207–208, 221, 225, 240,
 250, 255–256, 271, 282, 290–2992,
 294–295, 301, 316, 326, 332–333,
 335–336, 344, 346–347, 350–351, 355

胡蘭成 282, 339, 353

英美派 66

范予遂 72, 85, 142, 151, 191, 193, 212, 225,
 227, 312

重光葵 278

革命統一戰線 24

《革命評論》122–128, 301–302, 306–307,
 345, 348

革新俱樂部 226, 230, 237

韋伯 (Weber, Max) 44–45

韋增瑛 (顧孟餘夫人) xx, 35, 38–40, 94,
 175, 222, 271, 284, 292–293, 295–296,
 298, 346

《香港時報》240–241, 253, 353

香港新亞書院 241, 283–284, 293, 344

《祖國》230

十劃

凌霜 (黃文山) 52, 347

《原富》xv, 45

唐生智 (孟瀟) 2, 102, 104, 108–109,
 119–121, 138, 142, 166, 168, 304, 306

唐有壬 142, 144, 158, 166

唐君毅 282, 339

唐紹儀 131

夏蓮蔭 (Julie Lien-ying How) 7, 8, 340

夏濟安 293

孫中山 xv, xx, 12–15, 17, 20, 22, 24–28,
 30, 37, 39, 67, 70–72, 74, 76–77, 82,
 87, 97–99, 109, 112–113, 126, 236,
 303–305, 307–310, 317, 336, 345,
 352 : 北上 13, 17, 71–72, 77, 82

孫文主義 115–116 : 孫文主義大同盟 74

孫伏園 95–96

孫科 2, 88, 91, 93, 100, 105, 107–109, 111,

132, 133, 136–138, 140–144, 150, 157,
159, 164, 225–227, 261, 264, 282, 296,
304, 311
孫碧奇 292
孫鳳鳴 166
孫寶剛 234–235, 241, 263, 272
孫寶毅 235, 252, 272
家天下/黨天下 279, 309
師培爾 (Schippel, Max) 51–52
徐仲年 212
徐州會議 109, 349
徐伯軒 63
徐桴 (聖禪) 103
徐謙 75–77, 84–85, 87, 91, 93, 98, 100,
102–105, 107–109, 114, 117
徐寶璜 (伯軒) 63
恩克巴圖 87
《旁觀者》(*The Spectator*) 41
栗本一夫 279
桂系 xviii, 2, 7, 23, 119–121, 125, 129, 137,
225–227, 231, 234, 241–242, 252, 255,
262, 264, 275, 278, 304, 311–313
殷同 158
泰勒 (Taylor, George E.) 257, 353
浙江大學 122, 207, 217, 346
租借法案 210
《紐約時報》23, 204
翁文灝 (詠霓) 67, 144–145, 169, 177,
206–209, 222–223, 225, 236, 334
耕者有其田 xx, 110, 126, 309
袁世凱 34, 39, 235, 354
袁守謙 295
馬克思 (馬克斯 · Marx, Karl) xii, xiii,
49–53, 55, 74, 98–99, 125–126, 252,
309–310, 319, 340, 347
馬步芳 295
馬洗繁 219, 234
馬乘風 193
馬寅初 43–44, 47, 139
馬敘倫 43, 47, 55–56, 75, 347
馬超俊 164
馬裕藻 47, 57, 67

高一涵 53, 62–63
高宗武 xvi, 178, 201, 336
高雲渠 46
郭廷以 51, 53, 83–84, 108, 129, 209, 212–
216, 219, 226, 234, 290, 294, 336–337
郭春濤 74, 76, 129, 142, 145, 306
郭泰祺 175–176, 356
陳大齊 42–43, 47, 58, 60
陳中孚 242, 255, 275–280, 282, 353, 357
陳公博 xiii–xvii, xix, xxi, 1–2, 5, 29, 84,
86–87, 92, 98, 100, 104–105, 107, 109,
114, 121–132, 138, 140–145, 147, 151,
160, 165, 168–169, 173, 177–181,
184–185, 189, 200–201, 253, 301–307,
309, 334, 337, 348
陳友仁 75–76, 86, 88, 93–94, 97, 117, 138,
140, 143, 306
陳丕士 (Percy Chen) 86, 94–95, 117, 337
陳世驥 295
陳布雷 153, 168, 178, 197, 203, 206–207,
211–212, 218–220, 337
陳立夫 70, 93, 145, 147, 153, 162, 210, 215,
217–219, 294, 295–296
陳西滢 79, 152
陳伯莊 157, 233, 325, 346, 348
陳克文 xiv, xvi, xxii, 6, 7, 29, 117, 150,
177, 195, 199, 224, 227, 307–308,
337, 348 : 入黨 12, 70 ; 農政部 6–7,
305 ; 遷都武漢 93–94 ; 改組派 131,
146, 308, 311–313 ; 蔣中正 188–189,
194 ; 汪兆銘 174, 189–193, 314 ; 甘乃
光 6, 12, 186, 188, 190, 304 ; 羅君強
191–192 ; 李樸生 xxi, xxiv, 7, 12–13,
70, 196, 231, 253, 267–268, 330 ; 第
三勢力 2, 231–237, 248, 253–255, 261,
267 ; 桂系 234, 312
陳依範 117
陳其美 20
陳其璦 94
陳昌祖 196
陳果夫 73, 88–89, 93, 129, 141–142, 145,
152, 162, 217

陳春圃 180–181, 196, 348
 陳炯明 20, 25, 79
 陳英年 32
 陳皋 146, 191
 陳啟天 242
 陳啟修 53, 55, 58, 95–96, 117
 陳國琦 190
 陳寅恪 xviii, 207
 陳雪屏 235, 244–246
 陳焯 166
 陳維周 275, 278–279
 陳銘樞 (真如) 102, 121, 136–137, 140, 143, 145
 陳儀 160, 225
 陳潔如 91
 陳樹人 2, 121–122, 128–129, 132–133, 142, 145–165, 169, 186, 191, 195–196, 304, 306
 陳獨秀 42, 47–49, 61–62, 72, 98, 106, 114, 294, 349–350
 陳翰笙 123, 158
 陳濟棠 23, 132, 213, 275, 304, 343
 陳濯生 249, 252–253
 陳璧君 xvii, xxi, 16, 124, 131, 140–142, 148, 168, 173–174, 180–181, 185, 189–190, 196, 201, 203–204, 304, 314, 341
 陳耀祖 148
 陶成章 20,
 陶希聖 xvi, 3, 44, 123, 125, 177, 181–182, 323–324, 337, 349
 陶孟和 (履恭) 43, 55–57, 61–63
 陶知行 63
 陶履謙 166

十一劃

國民政府 xvii–xviii, xx, xxii, 1, 5–6, 8–9, 14, 19, 29, 36, 53, 84, 86–89, 92–95, 100–101, 103, 105, 107–111, 120–122, 129–133, 139, 142, 144–145, 147–149, 157, 161, 164, 169, 175, 183, 185–188, 191, 196–197, 200–201, 216, 222–223, 225, 230, 249, 257, 261, 263, 275, 282,

302, 305–306, 308, 311, 326, 329, 331, 335–336, 339, 342–343, 356–357 : 遷都武漢 92, 100, 103, 105, 350
 國民參政會 191, 193, 196, 219
 國民會議 67, 76–77, 79–80, 82, 308, 310
 國民黨 : 四一二清共 18, 27–30, 102, 107, 119, 305–306 ; 七一五分共 xiii, xv, xx, 2, 27, 29, 97, 100, 108–109, 112, 114–115, 117–120, 301, 305–307, 309, 311 ; CC 系 145, 162, 169, 210, 215, 217–220, 225–227, 230–231, 234, 236–237, 244, 248, 302 ; 革新俱樂部 226, 230, 237 ; 二屆二中全會 88–91, 106 ; 二屆三中全會 105–107 ; 二屆四中全會 121 ; 二屆五中全會 122 ; 三大政策 xv, xx, 24, 27, 72, 111–115, 305–306, 343 ; 上海大世界十委員 141 ; 四屆一中全會 133, 140–142, 164 ; 四屆三中全會 154 ; 四屆六中全會 166, 169 ; 五屆一中全會 166, 168 ; 五屆三中全會 174 ; 五屆五中全會 193 ; 五屆六中全會 203 ; 五屆九中全會 213 ; 中央政治會議 92, 100, 131, 133, 142–143, 153–154, 163–164, 351 ; 北京執行部 71, 74–75, 82, 149 ; 西山會議派 28–30, 82, 84, 90, 113, 129, 131–132, 275, 304, 306, 313 ; 民主自由社 226–227, 230, 312 ; 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 17, 26, 70, 75, 111 ; 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 xiii, 30, 69, 75, 84, 87 ; 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 121, 129 ; 第四次全國代表大會 138 ; 第五次全國代表大會 135–136 ; 新右派 29, 106, 113 ; 整理黨務案 88, 91 ; 總裁制 26 ; 黨國體制 26–27
 國民黨左派 xi, xiv, xvii, 1, 3, 5, 7, 18, 27–30, 89, 91, 93, 98–99, 115, 117, 120, 188, 229, 231–232, 261, 305, 344
 國立編譯館 158, 217–218
 國共內戰 xvii, 2, 7, 23, 229, 302
 國共合作 18, 34, 28, 71–72, 74–76, 82, 87–88, 109, 120, 174, 332, 344

國防最高委員會秘書長 6, 208–209

國際週報 313

國際編譯社 313

國難會議 144

婦女部 75, 89

密旦兒 (Michels, Robert) 25

張友仁 46, 211, 336, 354

張北海 217–218

張永福 195–196

張百熙 33–34

張伯苓 224

張作霖 70, 84

張君勱 xiv, xvi, xxii–xxiii, 2, 229, 234,
244–245, 249–250, 252, 255–260, 262,
270, 272–273, 288–289, 291–292, 302,
313, 315–317

張其昀 234–235, 242, 244–246, 255,
258–259, 267, 268, 273–274, 357

張朋園 10, 24–27, 51, 61, 139, 145, 192,
212, 214–215, 218, 308, 310, 336, 347,
352

張東蓀 xviii, 41–42, 316, 337

張知本 131

張研田 295–296, 336, 347

張純明 235, 237

張國燾 xiv, 2, 47, 80, 244, 250, 255–259,
262–263, 265, 267, 270, 302, 313, 336

張景惠 277

張發奎 (向華) viv, xvi, xxi, xxiii, 2, 7–9108,
119–121, 138, 229, 234–235, 237,
241–247, 249–251, 255, 257–260,
262–265, 267, 269–270, 272–275, 278,
280, 282–283, 286–289, 294, 297–298,
302, 306, 312–313, 315, 336, 346

張群 (岳軍) 136–137, 168–169, 183, 206,
209, 222, 225, 288–290, 294–296

張道藩 166, 177

張達 245, 263

張嘉璈 (公權) 64, 139, 152, 167, 169, 209,
225, 255,

張榕 (蔭華) 34

張維翰 296

張厲生 224, 289

張慰慈 61, 63, 144, 177,

張慶楨 213

張學良 131–132, 152, 159

張靜江 73, 88, 91–92, 95, 100, 102, 104,
121–122, 137, 294

張繼 136–138,

張顧集團 237, 244, 255

張瀨 10, 302, 348

《晨報》49, 53, 79–80, 320, 322, 331

曹宗蔭 (少岩、少巖) 147, 174,

曹若山 277, 279, 282

梁啟超 xi, xix, 16, 61–62, 64, 294, 336, 343,

梁寒操 164, 243, 245, 282

梁漱溟 xxii, 47, 52, 63, 203, 225–226, 239,
332, 336

梁鴻志 20, 84

梅思平 2, 178, 180, 200

梅恕曾 4, 32, 36, 44, 135, 348

淞滬會戰 175

凌鴻勛 4, 155, 157–159, 334, 348

清水董三 278

章士釗 41, 42, 47, 67, 84–85, 337, 352, 354

章廷謙 220

章炳麟 (太炎) 16, 67

第三國際 109–111, 113, 119–120, 189

第三勢力 124, 210, 221, 227, 229–230, 233–
237, 239–249, 251–255, 257, 260–270,
271–289, 297, 302, 309, 312–317, 337,
341, 345, 348–350, 357

許少榮 278

許世英 79

許克祥 108

許孝炎 235, 240, 244–248, 262, 264, 290

許冠三 252–253

許崇智 12, 17, 18, 234, 241–247, 255, 258,
263, 278, 280, 282

許德珩 47, 122–123

野河密 278

鹿鐘麟 85

進德會 46–47, 349, 354

階級鬥爭 xi, xx, 50, 52, 98–99, 118–119,
125–127, 309

十二劃

傅汝霖 47, 131
 傅斯年 (孟真) xviii, xxii, 149, 207–208, 271, 337
 勞幹 293
 善後會議 xxii, 67, 77–80, 331, 342
 彭昭賢 245, 255, 262, 274, 282–284, 337
 彭學沛 132, 142, 145, 152, 158, 165–166, 168, 170–172, 183–184, 186–187, 189–190, 193, 195–199, 343, 356
 彭澤民 94–95, 109
 彭鎮寰 231–232
 惲代英 49
 曾仲鳴 xxii, 131, 141, 142, 144, 145, 148, 159, 160, 165, 167, 168, 169, 172, 174, 178, 188, 189, 201, 204
 曾祥和 220, 338
 曾琦 242, 262
 曾毓雋 84
 植原悦次郎 278
 游士 11, 303, 348
 湯山事件 132, 305
 湯良禮 (T' ang, Leung-li) 98, 353
 湯爾和 63–65, 144
 程天放 226
 程思遠 227, 231, 233–239, 242, 246, 252, 254, 258–259, 261, 265, 270, 278, 338, 349
 程潛 (頌雲) 87, 95, 98, 109
 童冠賢 2, 76, 213, 219, 226–227, 231–237, 240, 245, 253–259, 264, 270, 274, 282, 287, 304, 312
 華南俱樂部 277
 《華僑通訊》 249
 虛無主義 115–116, 322
 賀之才 45
 賀耀組 95
 賀麟 14, 316, 350
 鈕永建 295
 馮玉祥 xviii, 22, 84, 88, 91, 108–109, 120, 129–131, 138, 193, 306, 349
 馮澤芳 219

黃如今 235, 237
 黃宇人 xxi, 231–232, 236, 245, 252–254, 259, 262, 338
 黃旭初 226–227, 234, 241–242, 252, 255, 258, 264, 271–272, 275, 278–279, 282, 338, 357
 黃伯樵 154
 黃昌穀 86
 黃冠吾 282
 黃南鵬 277–279
 黃郛 136–138, 140, 154, 157, 170, 209, 334, 345
 黃淬伯 213, 329
 黃紹紘 119, 226, 236, 275, 338
 黃雪邨 231, 278
 黃華表 137
 黃濬 146
 達維德 (David, Eduard) 51
 鄒平凡 282
 鄒魯 82, 84, 92, 132, 140, 185, 261, 304

十三劃

《傳記文學》 xxiii, 3–4, 13, 32, 36–39, 43–44, 53, 55, 74, 96, 109, 124, 132, 135, 146, 155, 258, 293, 295–296, 298, 314, 325, 334–335, 341, 343–349, 351–352, 355
 塘沽協定 157–159, 170, 344
 《新青年》 xv, xx, 49–53, 62, 64, 67, 319, 347, 355
 新政俱樂部 226–227, 230
 楊天驥 163
 楊永泰 166, 169
 楊仲華 277, 279, 282
 楊全宇 195
 楊帆 277
 楊振聲 220
 楊毓麟 (守仁) 34, 342
 楊銓 (杏佛) 139
 楚崧秋 215, 233, 338
 粵派 132
 經亨頤 109, 133
 經濟合作委員會 (ECA)

經濟學 vii, xiii, 4, 10–11, 14, 35–36, 43–46,
50, 55, 60, 69–70, 142, 301, 320–321,
333, 354
葉公超 269, 285–287
葉恭綽 151
葉楚傖 90, 141, 213
葉蓬 200
葛量洪 (Grantham, Alexander William
George Herder) 269–270
董顯光 178, 285, 295
詹大悲 109
資本主義 xx, 29, 42, 49, 52, 60, 126, 238,
252, 310, 317, 319, 321, 325
資產階級 26, 52, 113–115, 125–128, 302
路友于 74
農奴 126
農民問題 126–127, 301, 323
農民部 6–7, 75, 89–90, 93, 305
雷嘯岑 244, 260, 293, 315
雷震 xix, xxii, 241, 243–245, 248, 261–264,
270, 272, 291–292, 316, 335, 338,
349–350
鳩山一郎 278
褚民誼 2, 92, 144, 145, 174, 189, 200
褚松雪 75

十四劃

僑務委員會 xxi, 7, 145, 148, 165, 173, 195,
253
寧粵分裂 2, 132–133, 136, 304, 311, 346
寧漢分裂 1–2, 107–108, 115, 120, 311–312
廖文毅 278
廖仲愷 xiv, 15, 17–18, 28–30, 70–71, 82,
185, 305
廖維藩 76
滿洲 158, 170, 277, 283, 331
熊式輝 137, 225
端木愷 146, 174
維塞爾 (Wieser, Friedrich) 45
維經斯基 (Voitinsky, Grigori Naumovich)
71, 91, 98–99, 321
臧紹彭 277

賓步程 35–36
趙毓松 277, 341
齊宗頤 (壽山) 35
鄧文輝 74
鄧飛黃 76, 142, 149, 151, 191
鄧演達 xiv, 18, 29–30, 89, 93–94, 105,
107–108, 117, 229, 305–306, 337
鄧龍光 263, 269
鄭天挺 220, 339
鄭州會議 108–109, 349
鄭彥棻 261, 267, 296
鄭洗菴 278
鄭義 8, 242, 250, 259–260, 264, 269–270,
273, 283, 286, 294, 306, 336, 339
鄭震宇 231

十五劃

劉百閔 252, 270, 351
劉攻芸 236
劉侃元 122–123, 125
劉侯武 162–164
劉師培 43
劉航琛 282
劉健群 177, 226–227
劉莪青 163
廣川弘禪 278
廣州外交代表團 84
廣州執信學校 84, 118–119
廣州張黃事變 119–121
廣東大學 84, 86, 90, 92, 321
廣東高等師範 6, 12
德國社會黨 (Social Democratic Party of
Germany) 25, 51
樊仲雲 20, 277, 313
樊宏 76
樓光來 214
滕固 146, 174, 192, 197–199, 345, 356
潘光旦 xviii, 316
潘雲超 109, 122, 123, 124, 129, 131, 142
畿輔大學 84
蔡元培 (子民) xiii, xvi, xviii, xix, xxiii, 1,
10, 32–43, 47–48, 54–58, 60–66, 70,

72-73, 121-122, 136-138, 176-177,
201, 203, 206-207, 301, 304, 336-337,
339, 342, 350-351, 354

蔡文治 258

蔡廷鍔 237

蔣中正 (介石) xi-xxi, xxiii-xxv, 2-5, 7-9,
11, 13-15, 17-24, 27, 29-30, 36, 73,
87-95, 98-110, 113-114, 119-122, 124,
128, 130, 132-133, 135-147, 152-155,
158-165, 167-169, 173-174, 178, 181,
183-188, 190-191, 196-198, 200-201,
203, 205-206, 208-211, 215-217,
220-222, 224-227, 229, 232, 234-235,
241-246, 248, 250, 255, 258-262,
264-271, 273-275, 279, 283, 285-289,
294-298, 302, 304-312, 316, 326, 330,
334-336, 338-339, 343-352, 356-
357; 中山艦事件 87, 100; 中派 27-28,
30, 90; 赤色將軍 (Red General) 30;
委座 (委員長) 31, 38, 43, 85, 134,
143, 145, 184, 186, 188, 190, 193,
197-198, 203, 210, 219, 316, 329;
清共 18, 27-30, 107, 119, 305; 第一
次下野 311, 350; 第二次下野 13; 第
三次下野 2, 23, 311, 351; 蔣中正日
記 8, 93, 100-105, 128, 138-139, 141,
143, 152, 154, 167, 174-175, 183-184,
186, 188, 203-204, 206, 209, 211-212,
216, 219, 222-224, 248, 264-265,
267-269, 330; 蔣中正總統檔案 xiv, 8,
107-109, 129, 153, 160, 163, 166-168,
175, 183-184, 205, 209, 212, 220, 222,
224, 333-334, 336, 338-339, 342; 蔣
汪 xvii, 4, 122, 143, 159, 161, 164-165,
177, 190, 200, 310-311, 346

蔣作賓 143-144

蔣廷黻 14, 67, 145, 192, 194, 240

蔣復璁 222

蔣經國 246, 261, 263, 265-266, 278, 284,
296-297, 309, 315-316

蔣夢麟 xiii, 43, 54-56, 60, 67, 70, 220, 290

蔣緯國 91

調景嶺 262

諸青來 277

魯迅 85, 339, 349

黎鐵漢 269

十六劃

《獨立週報》xx, 41-42, 322, 352

《獨立論壇》230, 249, 252, 325

蕭人鵠 77

蕭忠貞 74, 142

蕭淑宇 123

諾蘭 (Knowland, William F.) 292

賴特才 89

錢方度 (軼表) 35

錢宗澤 158

錢昌照 13, 14, 209

錢思亮 290

錢穆 xxii, 11, 241, 283-284, 290, 293-294,
298, 316, 339, 344, 352

閻錫山 xviii, 8, 22, 129, 130, 131, 132, 138,
226, 277, 330

閻鴻聲 214, 352

鮎川義介 278

鮑大可 (Barnett, A. Doak) 272

鮑羅廷 (Boradin, Mikhail) xx, 17-18, 26,
, 28, 36, 53, 86, 88-91, 93-95, 97,
100-101-102, 107, 109, 112, 114-117,
305-306

龍雲 183-184, 187, 350, 354

十七劃

戴季陶 18, 70-71, 90-92, 102, 113, 141, 309

戴季陶主義 309

戴笠 (雨農) 194, 200, 201, 203

繆培南 245, 263

《聯合評論》230

聯俄容共 xiii, xvii-xviii, xx, 2, 9, 18, 24-30,
70, 72, 87, 102, 106, 111, 112-114, 236,
301, 303, 305

薛岳 (伯陵) 237

薛頌瀛 (仙舟) 35
 薛篤弼 131
 謝持 82, 131–132, 140
 謝晉 109
 謝澄平 235, 241–245, 249, 252–253, 258, 263, 272
 韓文溥 283
 韓雲階 274, 277, 282
 齋藤昇 278

十八劃

瞿秋白 126
 瞿鴻禨 33–34
 薩福鼎 151
 藍公武 (志先) 61
 藍欽 (Rankin, Karl L.) 286–287, 341
 轉型時代 xix, 10–12, 16, 302, 333, 343, 348
 顏德慶 151
 魏道明 192

十九劃

廬山談話會 177
 羅文幹 58, 61, 63, 64, 65, 144
 羅君強 190–193, 198, 352
 羅家倫 xviii, 47, 104, 106, 121, 210, 215, 217, 312, 336, 339
 羅素 (Russell, Bertrand Arthur William) 61
 羅貢華 145

羅堅白 282
 羅常培 47, 220
 羅夢冊 241, 252
 藝文研究會 313
 藤原繁 283
 譚平山 86, 87–88, 90, 94, 105, 107
 譚延闓 (組安) 37, 71, 87–89, 91–92, 94–95, 98, 100–101, 105, 107–109, 114, 121–122, 141, 147, 149, 330
 譚熙鴻 (仲達) 67, 75, 77
 邊緣化 12, 343, 352
 關德懋 191–192, 218
 關賡麟 151
 類似列寧主義的政黨 (Quasi-Leninist Party) 26

二十劃及以上

蘆溝橋事變 177
 鐵托 (狄托) 主義 (Titoism) 248, 268,
 鐵血除奸團 166
 顧兆豐 32
 顧兆麐 (兆林) 32
 顧孟餘先生事略 3, 4, 38, 69, 117
 顧彥和 (顧孟餘姪) 32, 176, 352
 顧維鈞 64, 144, 221, 248, 294–295, 340
 顧頤剛 72, 217–219, 222–223, 234, 340, 352
 龔楚 258

作者簡介

黃克武，美國史丹佛大學歷史系博士，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特聘研究員。曾任近代史研究所所長，台灣師範大學、台灣大學歷史系兼任教授。研究領域為清末民國思想史、政治史以及明清文化史。主要著作包括：《一個被放棄的選擇：梁啟超調適思想之研究》(1994)、《自由的所以然：嚴復對約翰彌爾自由思想的認識與批判》(1998)、*The Meaning of Freedom: Yan Fu and the Origins of Chinese Liberalism* (2008)、《惟適之安：嚴復與近代中國的文化轉型》(2010)、《近代中國的思潮與人物》(2013)、《言不褻不笑：近代中國男性世界中的諧謔、情慾與身體》(2016) 等；並編有《畫中有話：近代中國的視覺表述與文化構圖》(2003)、《同舟共濟：蔣中正與1950年代的臺灣》(2014)、《兩岸新編中國近代史》(與王建朗合編，2016) 等十餘部著作。

顧孟餘在近代中國的影響力縱橫政學兩界，然而在今天卻鮮有人知。

他曾任北京大學教授，一度與蔣夢麟、胡適齊名；抗戰時期又擔任中央大學校長。在蔡元培、李大釗的舉薦之下，他棄學從政，輔佐當時被視為孫中山接班人的汪精衛，成為國民黨左派領導人，力倡「民主勢力的養成與充實」。1938年底，汪精衛發表豔電、建立附日政權，顧孟餘苦勸不成，與之分道揚鑣，轉投蔣介石抗戰陣營。最終他對國共兩黨皆感失望，於1949年赴香港領導「自由民主大同盟」，與張發奎等籌組第三勢力，但終以失敗收場。

本書係顧孟餘的第一部學術評傳，通過描繪這位從政書生的政治選擇、人際交往勾勒國民黨高層的派系競合，乃至二十世紀中國在國共鬥爭與美蘇冷戰之中的激烈變化。他的一生既是時代的縮影，亦反映了知識分子對「中國往何處去」的探尋。



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Press
cup.cuhk.edu.hk | HONG KONG, CHINA



ISBN 978-968-237-133-0



9 789882 137133